

目 录

没画句号的故事	(1)
梦断君子兰	(99)
来自居里大学的报告	(156)
生活的蒙太奇	(238)
雨燕岛	(312)
乔迁之喜	(379)
故乡明月在	(433)
老将离休之后	(497)
离离原上草	(542)

没画句号的故事

苦恼的抉择

蝉鸣连成一片，压倒一切音响，使人听不到人间的欢笑和叹息。

市委宣传部长杨铁办公室的双层窗子都紧紧关闭着，他仍旧被蝉鸣搅扰得发烦。

杨铁面前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份道林纸印的表格，组织部昨天发下来的，秘书处的秘书包芳曾经关照过他，按要求，要每个人亲手填写。言下之意，她不能代劳。

杨铁一生中填写过的各种表格，如果加起来，怕能有几公斤重，轻车熟路，闭起眼睛都可以做到准确无误。他像所有“三八式”干部一样，当兵，进抗大，强渡黄河，解放全中国，然后进城……履历表上一片光荣，那些“需要向组织说明的问题”栏、“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反动党团”栏，以及“受过何种处分”栏，一向是空白，而立功受奖栏却从来都不够用。

不知为什么，杨铁今天填起这张表来，手总有点发抖，不听使唤，像是害了神经性抽搐。特别是填写年龄时，就有如往雪白的纸上涂黑点那么不舒服！64，两个阿拉伯数字写上去多么简

单，可他觉得手上的笔有千斤重，画出的笔道是弯曲、不圆滑的，有点像学龄前儿童描出来的，丑陋不堪。

他放下笔，长叹一声，呆愣愣地望着那两个陌生而别扭的符号。这到底是光荣的标记呢，还是没落的象征？

你多可笑！生命是抗拒不了自然规律的，过一年，长一岁，怎么会为年龄发愁呢？

这种潜意识的惆怅，是从什么时候袭扰杨铁内心的呢？从前自己在讲台上，不是时常摆一摆自己 40 多年党龄的历史吗？那口吻可没有半点不自在呀！自从党的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杨铁不再夸耀年龄优越了，他意识到，年岁的大小是与劣势成正比的。

他顶讨厌小青年问他的年龄。笑眯眯的，一口一个“您老”，够尊重的了。可在杨铁听来，那笑眯眯的发问后头，仿佛藏着凶相，直译过来，无非是：“你 60 多岁了，还不退休？占着茅坑不屙屎……”

啊，64！假如这两个数字调换一下次序，是 46，那该多好！可笑，近乎荒唐！

人进入老年，精力、体力都日趋下降，干吗非要占住这个位置呢？中央的方针大计无疑是对的，尽管感情上过不去，你难道可以凭感情来对待党的事业吗？

譬如这聒噪的蝉鸣，从前可是他的催眠曲，现在呢，神经脆弱了，常常被它们吵得睡不成觉！

离休，这是势所必然的了。杨铁绝对用不着别人动员，像当年在战场上杀敌用不着别人动员一样。明年，机构改革就轮到省、市一级了，杨铁没有叫别人推着走的习惯。

真的到了老迈不堪的地步了吗？

杨铁总是产生这样的怀疑。

此时，他又一次不自觉地站起来，挺起胸脯，在办公室里走

了两圈。他自我感觉是良好的，迈步利索，举止即或不比当年那么潇洒，也算不上老态龙钟。

杨铁站到了大镜子前头。

他有点灰心了，一种酸楚的滋味从心底油然而生！年岁的标记，岁月的刻痕毕竟是掩饰不住的！

腹部隆起，手背上长起了老年斑，头发脱落，只剩下耳际一圈茸发，脸上发胖，虽然没有多少皱纹，可那下垂得很厉害的眼袋，却无法掩盖一副老相了。

你这样快就老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像是从去年吧？像地壳变动一样，也是突变！在抗大时，听别人讲“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发”，他根本不信，骂一声：“扯淡！”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在特殊情况下，人的苍老确是以跨越时间飞跃的。

对着镜子叹气，唉，在你还能演说、鼓动，还能对党工作的时候，你必须离开这间办公室了！这是中央的决策，没有理由，也不习惯来对抗。

这也许是杨铁格外憋闷的原因。

敲门声，轻而有节奏。

杨铁听得出是秘书包芳的独特叩门声，他走回到写字台前，只是向门口“嗨”了一声。

包芳夹着文件夹蹑手蹑脚走进来。

包芳是个很漂亮的姑娘，28岁的年龄，摒除了她身上少女的天真、幼稚，她是很能适应机关生活节奏，在老头子们之间周旋的人物。她上身穿一件白纺绸的短袖衫，下面是藏蓝色斜裙，平底塑料凉鞋，朴素、健美。她在机关里，从来没穿过直筒裤、高跟鞋，因为杨铁讨厌。有一次，包芳穿了一件的确良短袖衫，由于胸罩隐约看得见，杨铁都感到很刺眼，正式告诉她“这是机关，注意影响”。

包芳并不是宣传部长的专职秘书，按级别、职务，杨铁还没

有资格拥有秘书。不过，包芳和前任秘书吴药川一样，虽然编制属于宣传部秘书处，可由于工作需要，整天不离部长左右，写材料、搞调研、起草报告，跑前跑后，面授机宜，久而久之，实际形成了不是专职秘书的部长秘书了，约定俗成，秘书处长向来不另支配。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写完了吗？”杨铁暂时驱散了笼罩心头的云雾，语气平静地问包芳。

包芳文静地点点头，送上文件夹，打开，里面是一沓写满了字的稿纸。

杨铁大致翻了翻，问：“黎省三教授的房子解决了吗？”

包芳说：“上面写着呢。学院答应下一批房子盖成，就叫黎教授搬进去。”

“这是什么话？”杨铁突然发火了，“不像话！黎省三 50 年代远涉重洋回国，‘四人帮’时期扣上特务帽子坐了 5 年大牢，我们让这样的老教授至今一家三代住二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于心何忍！你去告诉李院长，让他们把新建成的院长楼倒出一套来……算了，我打电话找他。”

说罢，杨铁亲自拨电话，对方占线，他气呼呼地把耳机子摔到叉簧上，说：“我们连教授都容不下，还干什么‘四化’？怪不得上海来人调黎教授呢！老黎头如果为了房子，早走了！”

见部长发火，包芳一声不响，微笑着站在那里，这种忍耐的谦恭态度，也许就是自然的灭火器！过了一会儿，杨铁火气消多了，他瞥了秘书一眼，突然觉得她的谦恭有点像前任秘书吴药川。若论能力，可是相去甚远了。

吴药川多么得心应手啊！

他像个泔水桶，酸的、臭的全能装。你发火，他微笑；你息怒，他才办别的事，一切都想在前头……

这时，包芳又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来，放到他眼前。

这是一张备忘录，写着几项工作提要，第一项是“家访”，开列了一些名字。

杨铁看着这些熟悉的、半熟悉的名字，眨眨眼，问：“干什么？”

包芳莞尔一笑：“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查、访问，好像……应当由杨部长亲自登门好些。”

杨铁心里一动，一股热浪冲击着他。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访问这些人的使命，交给秘书处的干事们代劳，本来就是一种疏忽！

杨铁露出了笑模样：“你真精明！看来，你已经知道怎样当秘书了。”

包芳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这是吴处长提醒我的。”

杨铁心里又是一动。

只用“精明强干”的字样来评价现任秘书处处长吴药川，看来是太不全面了。这个人脑子里有政治，也有极强的政策观念。他为人不露锋芒，不张狂，脚踏实地，确实是杨铁须臾不能离开的手。

对于吴药川，市委机关里可以说是有口皆碑，上上下下都喜欢他。

可说心里话，杨铁对他是使用两分法的。喜欢他，又本能地防范他。防范的来由，完全是由于1979年全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时发生的那件事。一开初，是中央报纸渗透了一点，市委常委会上，有些人一时还没有搞通，没有几个人表态，除了市委文教书记季青以外，别人都在等中央文件。后来，吴药川替杨铁起草了一份反对“凡是派”观点的文章，打印出来，散发给常委们，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杨铁得了阑尾炎，正在空军医院住院，事前，他只是暗示吴药川，相机替他起草一份表态性的书面发言，并没有指明观点。在

杨铁看来，这是不消嘱咐的，凭吴药川这样一个政治上极度敏感的人，会看错大方向吗？

当有人大惊小怪地把吴药川起草、署了杨铁名字的书面发言稿送到空军医院病床上时，杨铁气得从床上蹦起来，顾不得创口疼痛，一连骂了十几声“吴药川这个球”，一边打电话，把吴药川叫来，好一顿痛骂。杨铁怎能容忍强加给他的观点？他多少年来都是按毛主席的话来检验一切的，岂能容忍让实践来检验真理？

在杨铁暴跳如雷，严厉要求吴药川公开声明他是“强加”的时候，吴药川一直静如处子，笑眯眯的。直到杨铁的火山平息下来，吴药川才拿出一份《人民日报》给他看。

原来，好多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已经纷纷表态，观点同“强加”给杨铁的一致。

当然，过了不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已经真相大白，杨铁成了全省第一个头脑清醒，思想解放的干部。

杨铁高兴，却也捏了一把汗。他心里不安，几次想找市委书记把事情谈清楚，他不能冒领这个功。他杨铁当时确实没有想通，没想通并不是什么罪过。他也担心，万一吴药川事后把挨骂的委屈事露出去，杨铁反而更不光彩。

在杨铁犹豫着的那些日子里，他从多方渠道得知，吴药川是守口如瓶的。而且，在全市机关干部大会上，在杨铁宣讲“真理与实践关系”之前，主持会场的吴药川又一次当众把杨铁推到了“思想解放先驱”的高台上，叫他想退都退不下来了。

杨铁很矛盾，他曾怀疑，吴药川是不是有什么个人目的？讨好？巴结？他用心考察过吴药川。吴药川本来分了一套房子，却让给了处里一个新转业军队干部；哪家出现生老病死、大小事情，吴药川是必到的，跑前跑后，连口茶水都不肯喝人家的，他被宣传部的人戏谑地称为“大总管”。

这样的人，当然只能用“心地善良”、“急人之难”来评价。杨铁放心了，不再内疚。如今反省起此事来，他仍然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可是他有原谅自己的办法：有哪一个人不是爱听好话的呢？

见杨铁陷入沉思，包芳给他泡了一杯茶，问道：“要定一部车子吗？您什么时候去家访？”

杨铁打了个哈欠，说：“家访要车子，官气未免太大了！算了，我有时间就开始走访，坐公共汽车去。”

包芳微笑着退了出去。

退休前干点好事情吧！

杨铁已经多次这样提示自己了。去走访有名望的教授、作家、科学家们，使他们感到党的温暖，使他们意识到，像杨铁这样离休在即的人，在站最后一班岗的时候，也还在体现党的关怀……

杨铁的心情好起来，窗外几乎从不间歇的蝉鸣也好像悦耳多了。

他推开正面的两扇窗子，饶有兴致地看着楼前的一排胡杨树。噢，看见了，有一个个头很大的蝉正伏在灰绿色的树干上振翅长鸣。

小外孙子不是吵着让他上树抓蝉吗？上树，对一个60多岁的老头儿来说，是不可能的了。在树底下挖蝉洞总是可以的，那需要有闲心、有闲空。退了休就有时间了，像那些退休工人一样，养花、钓鱼……那是多么陌生的生活啊！他将要同那些老钳工们泡在一起，老张、老杨相称，领着孙子逛大街……

他浑身上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1937年参加革命，却是“三八式”。有没有一点遗憾呢？按“老红军”的标准衡量，他只差2个月零3天。也就是说，他如果再提前2个月零3天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他就是“老红军”

了。尽管人类历史的长河悠远得很，人的一生都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可是，你得承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差一天都不得了！就拿文教书记季青来说吧，他也仅仅比自己早参加革命4个月，可他是老红军，地地道道，退了休可以住红军楼……比这个当然没意思，可现在呢，毕竟人家早就是市委书记了。

想到这里，杨铁又有点快快不快。

如果没有五中全会的新精神，杨铁是肯定要出任市委书记的。早在半年前，省、市委就酝酿过了，他不怀疑自己有这个能力。现在呢，呼声一天天弱下来，也许根本没人再提起了。

像刘副部长，像市委饶书记，像关副市长，长年病着，脑子也不灵活了，确实该退休，不然耽误多少大事啊！杨铁也不能容忍这样的“老人政府”持续下去。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杨铁觉得自己既没老耄昏聩，也不是卧床不起，尽可以再为党工作几年。假如，他能升任市委书记，那么，64岁就不算大了，也许……

又想到哪去了？难道你非得当官不可吗？你当年抱着放羊鞭子投向革命怀抱时，你想过要当官吗？

离休吧，大势所趋，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那么，一年以后，将是谁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呢？

这种近乎无聊的设想，已经不止一次地折磨他了。

当他坐回到皮转椅上时，有几个人的影子又走马灯一样地在他眼前转开了，叫他一时委决不下。当然，未来宣传部长的接班人，并不是由他杨铁拍板就算数的。但是杨铁掂量得出自己在市委的分量。他从1954年起，就干宣传部长，除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他几乎没离开过市委机关大院。他了解上级、同级和下级，他是这个链条中关键的一环，不敢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能，却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未来的部长人选，杨铁的意见还是不一般的。在这一点上，“文革”后才从山东调来的市

委书记季青，除了级别，威信是无法超越杨铁的，他感觉得出来。不然，为什么有些干部，明明是接受了季青的任务，却不马上去干，倒要来向他这部长汇报一下，征询意见呢？自然喽，每逢这种情况，他总要批评下级，他不满意干部们轻视市委书记的表现，但是心底未免有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满足。

未来宣传部长的人选，可以说已经缩小到焦点很实的小圈子里了。杨铁在抓紧考察、抉择，以便拿出自己的见解。同时他也知道，季青也在加紧考察，他们是心照不宣的。

此时，三个人的面孔像过电影一样交替在杨铁眼前出现，忽而入画，忽而定格，真难以判别优劣、高下。

这是三个经历极其相似、能力旗鼓相当的 60 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生，四十几岁正当年，不属于“三种人”，都有机关工作经验，意识品格都是好的，这是市委几经筛选剩下的几个。

第一个是宋恭，44 岁，艺术学院毕业生，当过郊区文工团团长，现任职务是宣传部副处级巡视员。宋恭二十几岁时写过小说，后来专攻文学评论。他作风泼辣、能吃苦，交给他一样事，你不用再催问，一定是出色完成。一想到宋恭，杨铁只能评价为：“像我。”

第二个叫闵桐，43 岁，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当过导演、话剧团编剧，1964 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留在宣传部艺术处当干事，1979 年末提拔为艺术处副处长。闵桐是属于那种有内秀的人，言语不多，为人平和而呆板，一个唾沫星一个钉。他的剧本轰动过北京戏剧界，得过头等奖，小有名气。当季青书记问起杨铁对闵桐的看法时，杨铁只说了两个字：“放心。”

还有一个，就是吴药川了，也是 43 岁，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毕业，当过两年马列主义研究生。他与前两个人稍有不同，一离开大学校门，就进了市委机关。吴药川是机关里公认的“理论权威”，先在理论教育处，后来才调到秘书处。他笔下能守口如

瓶，锋芒从不外露，群众关系好，上下级都得意他，现任秘书处处长。杨铁对他也有过评价：“可靠。”

人，总是不能十全十美。若讲缺陷，三个人都有。宋恭有时显得莽撞，闵桐过于不灵活，而吴药川呢，过于内向……内向能算是毛病吗？这只是性格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杨铁刻意要抓吴药川一点毛病，就是抓不到，只有偶然的感受，而感觉毕竟代替不了事实。

按目前的情况看，最有希望接任部长职务的是宋恭。年初，宋恭就随同 21 个中青年干部下到基层去锻炼了。宋恭在双榆县当县委副书记，据说干得不错。

机关里的人都明白，凡是首批送下去锻炼的，一二年后，都是将要提起来委以重任的。杨铁心里有数，委以重任是必然的，但并不一定非是宣传部长不可。

正在杨铁沉思的时候，闵桐走了进来。他把一沓什么文件放到杨铁面前，说：“这个要签字。”

杨铁茫然地戴起老花镜，看了看，签好字，递还给他。

闵桐看了看，说：“签错格了。”用手点了点部长应签的位子，又送到他面前。

杨铁皱了皱眉头，说：“算了，签在哪儿都一样，要的是那两个字嘛。”

闵桐好固执，他说：“那怎么行？不合手续。”

没办法，杨铁只好重签。

闵桐还不算完，逼杨铁在签错的地方打上私人印章。

杨铁向来没用过图章。图章有，在秘书处，是顶公章用的。他有点恼火，说：“你去找包芳要章子。”

闵桐说：“那是代公章，要你私章。”

杨铁憋了一肚子气，只好蘸着印泥，在错处捺了个手印。

闵桐这才罢休，走出去。

望着闵桐那文弱的身影，杨铁突然想：“这么玃唆、琐碎！像个宣传部长吗？”

可旋即又自我嘲笑起来：难道宣传部长办事就应当马马虎虎吗？

唉，考察人是世上最难的事情了，若有一架心灵、品格的天平，或者有一台透视人灵魂的投影机，该有多好啊，省去多少烦恼！

荒唐！怎么想到这儿去了？

当年哭鼻子不肯当连长的人

橘红色的钠灯全笼罩在烟雾之中。晚上气压很低，水蒸气、油烟被压到地表，城市里显得烟雾迷蒙。

这是晚上8点多的光景，杨铁部长同市委书记季青走在行人稀少的人行道上。他们不是相约出来散步，完全是撞车！撞在市委管组织的书记齐彬家里，双方都有点尴尬。

杨铁是坐车子去的，应齐彬之邀去打牌。而季青却是为一件事去拜访，无意间撞上了。

牌，打不成了，要谈的事也没谈成，季青和杨铁都有点索然寡味，仿佛那是个不该相遇的地方。

杨铁不好再叫车了，反正齐彬家离市委机关宿舍只有两站地路程，告辞出来一路同行。

杨铁感到别扭，无话可说，抬头看着路灯，半晌才冒了一句：“这种红灯挺亮呢，又不刺眼。”

季青说：“叫钠灯，北京主要街道都换上了。”

又沉默下来。两个人并肩走着，各自看着自己拖出来的忽长忽短的影子。

走在杨铁身旁，季青显得有些小气。他比杨铁矮半头，干

瘦，比杨铁小一圈，满头花白头发，因为推成平头，根根直竖起来的头发，显得特别粗硬，像一把尼龙刷子。他的脸上皱纹很深，如果蒙上一块白羊肚手巾，他倒像标准的陕北牧羊老汉。走起路来，也没有什么风度，两只胳膊大幅度摆动，显得挺有朝气。其实，他比杨铁还要大一岁，今年整整 65 岁了。

林阴路上、幽暗的地方，到处有一对对情侣在喁喁私语，不远处电车站站牌下，一对男女公然在明晃晃的路灯下接起吻来。

“不像话！”杨铁像吞了苍蝇，扭过头来说。

季青哈哈笑了：“没听人家说吗？夜晚，林间树下，是求爱者的天下；而早晨，人们在这里打太极拳、跑步，又成了求生者的领地。”

杨铁心有所感，说：“对于 60 岁的人来说，59 岁都是值得羡慕的。”

季青说：“可是，生老病死，谁都没办法逃脱规律，大自然对人是绝对平等的。”

杨铁来了个借题发挥：“年龄，并不是衡量人衰老与否的惟一标准。有的人，虽然正值芳龄，却是暮气沉沉；有的人，即使是垂暮之年，仍不愧为斗士——我指的是精神。你好像无动于衷？”

季青只是嘿嘿一乐。他明白，杨铁对他是一种试探。迄今为止，季青尚未向任何人露过自己要退休的口风，他自有他的想法。

季青和杨铁是老相识了，但进城以后各奔西东，季青“文革”后调来 R 省，才又同杨铁打交道。此前还有一段渊源，1969 年，他们在北大荒干校又碰面了，那时同是阶下囚。杨铁干事情，还是像从前那样雷厉风行，性格也没有多少改变，可季青仍然觉得杨铁很陌生，觉得这副健壮的躯壳里，早已换上了新脏器似的。

他们的交往是从 1942 年开始的。那时季青是边区数得着的“文化人”，担任着边区小报的战地记者。而杨铁，那时可没有现在的风度、文采，不过是个扛马枪的大头兵，是季青的采访对象。他比不得季青，季青进过延安“鲁艺”，担当过边区抗敌剧社的团长，后来改行搞新闻，一直干到边区小报的副主编。进城以后，三十几年来，他的椅子从中央报社、电台搬来搬去，始终没有离开过宣传口，1968 年贬到北大荒干校，直到 1978 年调来 R 省当市委文教书记。

他从没料到，是什么机缘，把杨铁变成了“文化人”，而且一直是文化人们的领导。记得 1956 年杨铁到北京开会，季青大吃一惊，见了面，狠狠地打了杨铁一拳，说：“你这大兵管起秀才来了？还不如管你的迫击炮去！”

这当然是玩笑。尽管杨铁自己也说这是“一场误会”，可后来季青发现，杨铁的进步真大，真是“士三日不见，须刮目相看”呢！他简直是天生的宣传家、鼓动家，发起言来，引用经典大师们语句的次数，比谁都多，比谁都准确无误。

季青深知杨铁此时的内心。他是不情愿退休的。他今天为什么又到齐彬书记那里去了？这和齐彬一向负责组织部工作有无内在联系？季青尽管到市委时间不长，好多人事关系不摸门路，但也有一些耳闻。据他知道，齐彬和杨铁两人是不对付的，私人关系一直紧张。那么，是从什么时候起，他们之间的裂痕开始弥合了呢？又是用什么方式弥合的呢？

齐彬直至昨天，在常委会上仍然坚持维持原方案，主张提拔杨铁为市委书记，并且声称与退休无关。

那么，杨铁向齐彬的靠拢，是不是与此有关？

季青不能发问，他知道问也枉然，他觉得杨铁的外围有一张透明丝织成的网，包着杨铁，使他无法触摸到实体，而季青自己，又无能为力去搅碎这张无可奈何的网。

杨铁从前是这个样子吗？那时，他的心，简直就是悬挂在心坎外面的，是红是黑，路人都是可以看得见的。

1942年，他刚认识杨铁时，杨铁还叫杨福宝呢！

从杨福宝到杨铁，这之间有过多么漫长的道路啊！云烟阻隔，仿佛是前世的事情，又仿佛就是昨天，忽远忽近，飘忽不定。

那时候的杨福宝，是裹着白羊肚手巾，掖着放羊鞭子，带着地主打在背上的累累伤痕来到晋中军分区投军的。

怎样想起改名字的呢？

那时延安有一股改名风。好多来自国统区的人，把改掉俗名看成是同旧世界的一种决裂。有的人甚至连姓氏都抹掉，干脆起一个百家姓里找不到的姓。杨福宝也动了心，认为福禄财宝都沾封建的边儿，不够革命，央求“文化人”季青给他另改一个。

季青有意捉弄他，拿起一本小学生字典，对他说：“你知道为啥名字越起越蹊跷吗？都是顺手翻字典，碰上这页的第一个字就是。你起单名吗？那就翻一次。”

杨铁有点怵头，他问季青：“那若是碰到个脏字、骂人话呢？”

季青说：“那没办法，就看你的运气了。”

这位仁兄的手气虽说不上坏，可也不算好，他翻出的字是“贴”。他又噤鼻子又咧嘴，认为贴和赔是一个意思，不好。要求重翻。幸而季青打圆场说：“贴者，铁也，谐音字。铁够硬的了，只是不如钢，总比豆腐强。”

“蛮好，”杨福宝这才高兴起来，“有铁，就不愁炼不出钢来。”从此起用新官号。“杨福宝”三个字，几十年来，只有躺在档案袋曾用名那一栏里睡大觉的份儿了。

眼前过来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婆，径直把小车推到他们面前，吆喝着：“新来的冰棍，五分一个，奶油小豆的……”

杨铁摸钱，买了两根，两个人吃着向前走。

季青还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他说：“我说福宝同志，你现在还常常想延安时代的事吗？”

杨铁愣了一下，仿佛对“福宝”的称呼极为耳生，半晌才回过神来，不禁哈哈笑了，说：“怎么不想。”

季青说：“你觉得你变化大吗？”

“人人都在变嘛，”杨铁说，“你一叫我福宝，我真感到亲切，多少年没人叫了。最后一次叫这名字是1958年，我老妈在咽气前拉着我的手叫过一次……”显然杨铁有些激动，手里擎着冰棍，有几分感慨地说：“延安时代多有意思！吃小米，喝南瓜汤，头枕着子弹袋睡大觉，号声一响，往上冲，一根肠子，哪儿来这么多烦恼啊！”

季青有意地说：“那时候，让你当连长，简直像绑你上法场一样！”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杨铁嘿嘿地乐起来。

40年前的杨福宝哟，你真是个蠢货呀！杨铁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觉得好笑。

那是在反扫荡的时候，杨福宝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司号员，一下子成了轰动全边区的战斗英雄。战地记者闻讯赶到杨福宝所在部队去采访，他们的友谊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当季青被通讯员带着，跨进设在文昌庙里的团部时，正碰上一个小战士在哭鼻子，鼻涕一把泪一把。二尺半灰棉袄拖到膝盖，好几处被弹片撕开，被火药熏黑，露出污浊的棉絮。他瑟缩地站在大个子团长面前，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季青以为是个犯了纪律的新兵在挨训斥。

当团长看了季青的证明信以后，抱起膀来，哈哈一乐，说：“你要见识见识我们的战斗英雄杨福宝吗？现在可不行。叫你见了，你会笑掉门牙的，他嘛，正在甩大鼻涕。”

季青一时摸不着头脑，后来发现团长的警卫员冲着哭鼻子小兵捂嘴直乐，这才恍然明白，原来那个哭鼻子的小司号员，便是他要宣传的新闻人物！

“怎么了，受委屈了？”季青关切地问杨福宝。

杨福宝扭过身去不答。

团长代他回答说：“我们的英雄在耍熊！叫他当连长，他不干，哭鼻涕。”

杨铁噘着嘴插了一句：“人家干不了嘛！我管好自己就不容易了！”

多有意思！这样的“熊货”，有谁能相信，他在战场上是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呢？

事后，季青找杨铁攀谈，让他谈英雄事迹，他死活不肯说。问急了，就那么一句：“那有啥稀奇的？换上你，你也能那么干。”

应当说，杨铁的事迹平常又不平常。那是一次大型伏击战，杨铁所在的连队奉命穿插深入到日寇据点外围的河滩地，借着芦苇的掩护，一百多战士布成散兵线，沿着河滩隐蔽起来，单等主力部队运动上来以后，他们连队立即炸毁日寇的碉堡，为大部队扫清障碍。但是，具体出击时间，除了连长、指导员和担任司号员的杨铁知道外，别人并不知道，约定以冲锋号为行动命令。那时的杨铁是通信员，兼着司号员，背上背着一把闪亮的铜号。

天有不测风云。半夜时分，色厉内荏的日军照例向旷野发射一顿六〇炮，借以壮胆。谁想一颗炮弹落到连首长潜伏的地方，轰隆一声，杨铁只觉得一座大山倾倒一般，自己被厚土、卵石埋了起来。等他醒过来扒开厚土爬出来时，发现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连长那块夜光表甩出老远，躺在沙滩上还咋咋地走动。啊呀，只差五分钟就到三点了！连长不是说过，一到三点，就吹冲锋号，分路越过大河去炸碉堡吗？可是连长、指导员都不在了，

谁下令让他吹号？找排长吗？却不知道他们藏身何处，在敌人眼皮底下，他不敢贸然去找，万一暴露了目标，那会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

他急得出了一身冷汗，拾起连长的手表，握在手心里，咬了咬牙，解下铜号，甩了甩号筒里的泥土，将号嘴堵在两片嘴唇中间。他当兵好几年了，吹号也有二年的历史，可从来没像这回这样，嘴唇直打哆嗦。

三点整，他一闭眼睛，一仰脖，吹起了冲锋号！

可想而知，战斗按预期的方案取得了胜利，杨铁所在的连队仅仅用 20 分钟时间，就摧毁了日军十几座连环堡，大部队潮水般涌上来，攻占了县城。

当战斗结束时，团长大踏步来到连里，一迭声叫着连长、指导员的名字，喊着：“好样的，我给你们请功！”

然而，杨铁含着眼泪交给团长的却是连长的手表、指导员的牛皮文件包。

团长大为惊讶：“他们……是炸碉堡时牺牲的？”

杨铁摇摇头：“半夜敌人打炮的时候。”

团长更奇怪了：“那，是谁下令叫你吹号的？”

杨铁垂下脑袋，像犯了错误似的低声嘟囔说：“我自己。”

“好小子！”团长突然猛地捶了杨铁一拳头，继而发狂似的把他拦腰抱起来，在屋子里转了好几圈，大声嚷着：“好小子！是带兵的料，我批准，你给我接任五连连长！”

杨铁反倒吓哭了！

后来，团长把他送到抗大分校去念书，就在那里，季青帮他改了名字的。

季青从前每次提起这件往事，总忍不住要笑得肚子疼。但是，今天却笑不出来。40 年前他为当连长哭鼻子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情呢？杨铁自己说得好：“当多大官，得有多大道行。

咱自己半斤八两还不清楚？百八十号人归你领导，你说东就东，你说西就西，万一指挥错了，就可能毁了一百多个战士的命呢！”

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十分朴素的责任感。勇于挑担子是责任感，为革命事业负责而推卸某种自己不能胜任的职务，不同样是责任感吗？

40年过去了，一个大头兵当上了一个大城市的宣传部长。如果没有特殊的历史原因，杨铁自然而然地要升任市委文教书记。此时此地，40年前那种责任感，在他心中还有多大比重呢？

季青犹然记起了不久前发生过的一件事。省电视台在电视新闻里播放了一条新闻片，在一家人头攒动的百货大楼门前，不少汽车上下来的人都是保姆、孩子。不用加旁白，人们也能明白，这是提醒某些干部，要注意教育家属，不要搞特殊化。

姑且不去说放这种电视的社会效果如何，在季青看来，这确实是值得人深思的问题。收看电视的第二天，在省委办公会上，季青提出要对省委机关的车子使用情况检查一下，做出几条规定。话还没有说完，杨铁铁青着脸闯了进来，站在省委常委们面前，说：“我工作失职。我已经责成电视台检查错误，叫他们写书面材料，对主张拍摄、播放这条新闻的人，要给点处分！”

常委们一时都没有回过味来。只见杨铁情绪十分激动，挥动着帽子，说：“他们想要干什么？为什么专门把眼睛盯住高级干部呢？当年我们把脑袋掖到裤带上出生入死的时候，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然，杨铁受了批评，是季青专门找他谈的话。杨铁没有服气，他此时可不是向季青问“马克思是不是山西人”的年月了，他现在是有能力大本大套地宣讲《反杜林论》的理论家了。杨铁对季青的批评，不单感情上扭不过劲来，理论上也没有被驳倒。

季青事后很苦恼。他现在连杨铁都说服不了，是不是悲剧呢？他很久以来，总是感到杨铁的话反胃，“我们……出生入死

的时候，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解释：我打了江山，我应当享受特权？

当然，你这样去质问杨铁，他不会承认的，他会用“辩证法”把本来黑的东西辩白了，鬼知道他的辩证法是哪家的法！

季青今天去找齐彬，当然不是没事闲聊，他是为着一宗人事任免事端去再次说服齐彬。此前，他已经同第一书记徐大为说好了，徐大为同意复议。季青以为虽然常委讨论过了，毕竟没有发下令去，还来得及更改复议。但他知道，说服齐彬不那么容易，恐怕首先得说服杨铁，因为那一批提拔的干部名单是杨铁呈报上去的。

事情的起因，是为安排文教、卫生系统十几个老同志的事。这十几个人，都是杨铁的老部下，年龄都超过或接近退休年龄了。上个月，宣传干部处向市委报了个名单，这十几个人都分别要提拔为副处级、处级。这举动简直令季青大吃一惊。他立刻打电话把杨铁叫到自己办公室，问他：“你搞什么名堂？你生怕干部队伍不够老化怎么的？”

杨铁有他的一套理论。他说：“这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你总不能说他们不称职吧？年轻化，要一步步来，当前是个青黄不接的空当，没人干，工作要受损失，先过渡一下，明年改革到省市一级，再一刀切不迟。”

季青不同意。他拥有的权利，是文教书记不签字的权，仅此而已。

季青万万没有想到，昨天午后的办公会上，竟然批准了杨铁递上的那份擢升名单，只差叫组织部下任命令了。会上，尽管季青和另外几个常委极力反对，可是他们是少数派，没起到决定性作用。

现在，令季青苦闷的不只是这一错误决定的本身，而恰恰是它的背后。他这几年，就很想对杨铁下下针砭，可总像隔靴搔痒

一样，不解决问题。认真同杨铁面对面一谈，他又常常败下阵来，抓不住杨铁的真凭实据，按不倒他。就拿这项决定来说吧，即或是大错特错，你把板子打在他这个宣传部长屁股上，他能不叫冤吗？他当然会说，名单是我报的，可批准权在市委呀。

啊，隔岸观火！为什么总是这样不痛不痒呢？

想到这里，季青对杨铁说：“昨天的任命事项，你觉得你胜利了，是不是？”

意外地，杨铁并没有显出骄横模样。他叹了口气，说：“你太……那个了。其实，我并没有把这件事看成是什么胜利，不过是心里稍安就是了。”

“心里稍安？”季青显然不懂。

杨铁用老朋友间那种推心置腹的口气说：“他们至少是天亮前干部，干了这么多年，要退休了，给个处级，退休时，在待遇上，能稍好些。”

原来是这样！季青冷笑几声，他确实有点过于“那个”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唔，搞安慰赛！古代就有先例的。削去你的权柄，给你加上个几品顶戴，衣锦还乡！共产党也要用这种手段来赎买自己的干部吗？”

杨铁吓了一跳，扔掉没吃完的冰棍，眨眨眼，说：“你这纲，上得可不低呀！”

季青没有吱声，他觉得心口隐隐作痛，他在极力控制自己，不然，他说不定要骂人了。

“太那个了”……啊，多好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代名词啊！是啊，自己是“太那个了”，所以才事事感到苦闷，奋力挣扎，又总是被无形的网缠住。杨铁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得“不那个”了呢？四十多年前，他赤着脚去当兵时，他想过要捞个一官半职吗？不会的。然而，他今天的一言一行都在表明，他在变。

明明知道杨铁要退休了，却还要把他先提起来，任命为市委

书记，用齐彬书记的话说“这样合适些”，这又是为了什么？

“那个”、“合适”，都是挺含蓄的词儿，甚至可以做任何解释。难道杨铁对部下的“加恩”，正是为了给他自己加恩做铺垫和寻找根据吗？

他真想当面问问杨铁。但他知道这是徒劳的。但是，这些迹象，使季青头脑中本来有点“那个”的神经更加绷紧起来。过去出于信任，对未来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的人选，季青至少是半放手的，现在，他感到有必要亲自过问了。

人才“投标”

又是失眠。利眠宁反倒使他的精神格外亢奋，烦躁、头疼。

躺在床上难受，季青掀开毛巾被，轻轻下床，回眸看了睡得正香的老伴一眼，真有点嫉妒。唉，她的心里从来没有这么多乱事！

季青趿拉着拖鞋来到书房，也不开灯，摸黑坐到沙发上，两个拳头揉着太阳穴。

北方的夏夜并不太闷热，不用开电扇。清凉的小风从铁纱窗网眼里钻进来，带着夹竹挑的幽香。

他想看看报，就扭亮了台灯，顺手抓起茶几上的一份《参考消息》。

投标！几十个国家向即将开发的我国南海油田争相投标！

遴选接班人，像不像经济界、贸易界的投标呢？季青觉得自己正握着若干筹码，仿佛是个举棋不定的投标者。尽管发挥集体领导，但各人有分管范围。譬如在市内文教、宣传、卫生系统，选择未来的接班人，他这个文教书记投出的筹码，那是有举足轻重分量的。资本家投标失误，顶多是赔本、破产，而人才投标的失误，却足以导致坑害国家、贻害革命。

季青感到，当务之急是选好宣传部长的接班人。他十分清楚，别看杨铁背后发起牢骚来好像不大乐意退休，可他毕竟明白这是大势所趋，他其实在抓紧考察干部。

说实在的，季青有点信不过杨铁。这种不信任感，对老战友来说，近于不恭，可他压不下去这种本来不该有的心理。就拿由杨铁提名新提拔的这些干部来说吧，如果孤立地看某一个人，似乎没有什么，可是当季青偶然排列名单，把这些新提拔的干部凑成堆来研究时，他有些吃惊了！

这些人，几乎都是同杨铁有点私情瓜葛的。这倒不是杨铁提拔了三亲六故，也不能说这些人怎样不称职，但季青能感觉到，这是杨铁自己的一套马车！

这样说，也许过分了，可季青是必须这样认识的。譬如新任命的文化局副局长周欲南，是1959年同杨铁一起被反了右倾的前文化科长；文化局艺术处副处长林典，是杨铁从前的秘书；京剧团团长韦陀，是杨铁妻子的入党介绍人；宣传部新闻报道处副处长于又云是1958年给杨铁写过回忆录《火红年华》的干事……

这种图谱系列，任何精明的市委常委都不可能审查出毛病，季青也只是意会，无法言传的。

季青是从对比出发的。反对过杨铁的人呢？几乎全部送出了宣传口，譬如市报的副总编李言道，文化大革命前历来不大听杨铁的招呼，前几年从干校回来，尽管季青再三强调，李言道是办报的好手，因为杨铁坚持不同意，到底安排到商业局去当了办公室主任；还有电台的副总编李诚，因为事先没有请示杨铁，前年播发了一条批评话剧团领导请客送礼的消息，惹恼了杨铁，就把李诚热情推荐给省外贸局去同外商做生意去了。

从前，杨铁可没有这个毛病，他使用干部没有亲疏嫡庶之分，在市委大院里是很有点好名声的。季青弄不清，他是从什么

时候起，以什么方式悄悄演变，也学会了这一套的。

但是，季青一直没有同杨铁正面交火。光凭感受、分析同他对阵，那等于放教练弹，是打不中他的。

令季青忧虑的是目前，他明显地感到杨铁在安排后事。啊，又是讨厌的“感觉”！生活里，最敏锐的要算“感觉”，可最无能为力的又是“感觉”，“感觉”永远拿不到桌面上来，永远不能充当证据。

有时，季青真想甩手凭它去了。是啊，老伴说得何尝没道理？“你还能管得了你死后的事情？自己马上要卸任了，平民百姓一个，写写回忆录，帮年轻人出点主意，不是很好吗？干吗非要苦苦寻这些烦恼？”

可他最怕同躺在九泉下的战友们对话，真的，他常常在梦境当中同这些死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战友们对话。他们只消问上一句：“你还活着，就把责任心出卖了，你不感到羞愧吗？”他都会受不了。

季青是有些“呆气”的人，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多年不改！1966年，一伙人冲进电台，要他承认几个中央负责干部是“走资派”，季青死也不承认。他明明看到别人按红卫兵的意图说了假话，马上得到“宽大”，他也不干，结果被打得皮开肉绽。

自从到R省来工作以后，他发现自己常常是孤立的、苦闷的。他坚持原则，人人都躲着他，他反而成了聋子、瞎子。反之，他让步一次，就发觉和周围的人融洽一点，真是怪事！他觉得自己有如掉进了棉花窝里，柔软、舒适，没有危险，可是感到窒息。他力图挥起拳脚打出一个窟窿透透气，可是无论向哪里打出一拳，都是软鼓囊囊的，手一收回来，又恢复了原状。他每天听到的都是成绩，眼睛看到的却是问题。后来，他不得不常常泡在司机班里、食堂工人当中，从他们满口牢骚、俏皮话当中分析到一些问题，他认定自己是在孤军作战！

就拿未来部长接班人人选问题说吧，认真说起来，季青也不否认这三个人的长处。无论从年龄、政治品格、经历、工作经验、思想水平哪方面说，他都得承认，杨铁的眼光没有偏。

可是，“像我”、“放心”、“可靠”……这种评价对味儿吗？怎么有点像帝王托孤时的话呢？

话又说回来，总不能同时提拔三个宣传部长吧？如果让他季青马上画圈，你该画哪一个呢？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宋恭似乎应当名列前茅的，他已经在乡下锻炼了。从前，杨铁是言必称宋恭的，有人戏称他为“小杨铁”，可见宋恭的受器重。但自从宋恭下乡后，杨铁就很少提到他了，这对季青来说，是个猜不透的谜。

这应当说是个小小的转向。半年前市委商讨未来宣传部长接班人时，杨铁最中意的人是宋恭，其次是闵桐，提到吴药川，杨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也不错。”倒是季青主张把培养重点放到吴药川身上。

季青相中了吴药川什么了呢？用四个字概括，叫“原则性强”。有几件事情，季青是对他刮目相看的。

季青是在宣传部秘书处支部过组织生活的，吴药川是支部书记。季青算是相当自觉的干部，有时出于表现，他也乐于多参加几回基层支部活动。但是，官身不由己，每逢周一晚上支部活动时，差不多都与常委会撞车，他总不能舍弃常委会去参加支部会，所以三天两头告假。

有一次，季青好歹赶来参加一次支部会，一进会场，还解嘲地叨咕：“我快成特殊党员了……”没料到吴药川当众板起面孔来，说：“季青同志，你的特殊，不光表现在不按时过组织生活方面，由你的秘书替你交党费，这也不像一个共产党员！”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季青闹了个大红脸，赶忙作了检讨。

从原则上来说，没有什么特殊党员，可从习惯来考虑，人们

又总是把市委书记们看成是特殊党员。敢于这样直率地批评市委书记的人，除了要有几分胆量，还真要灭掉私心呢！事后有人说吴药川“犯傻”，没想到，却博得了季青的青睐，他这个老古板终于碰了“小古板”，不但没有生气、记恨，反倒对吴药川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好感。

前些天，每个人按工资比例购买国库券，又是吴药川负责，他竟然当众动员季青填写了 1 000 元的巨额。而且对他说：“季青同志，你不用分 5 个月扣齐，一次交付，你有存款嘛。”

曾有人担心季青不会愿意出这么多。但是，吴药川说：“他应当带这个头。”

这一次又正中季青下怀！他高高兴兴地拿出了 1000 元，好像他同吴药川有什么思想上的默契一般。无疑的，季青对吴药川的好感又增加几分。

就这两件小事，季青曾和杨铁说过好几次，一再赞叹：“谁说老传统后继无人？我们的党还是有希望的。”

杨铁呢，无动于衷，只是用意不明地笑了一笑。季青很纳闷，是杨铁为了避嫌才不愿从他口中说出称道吴药川的话吗（吴药川毕竟做过杨铁的秘书，又是杨铁一手提拔起来的）？但看杨铁的神情，又不像。季青甚至怀疑，杨铁所以不甚得意吴药川，也许正是由于此人的刚直不阿。凭直觉，季青宁可相信自己对吴药川的直观印象，而不肯相信杨铁。这是因为他发现，今天的杨铁，离几十年前憨厚、忠诚的杨福宝相去甚远了。

对一大批市委机关未来接班人的人选，季青知道自己起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他这一票抵不过十票，可他还要抗争，要不屈不挠地影响别人。

他有时也想过一点消停日子，他知道怎样办才能讨人喜欢。像他现在这样尽办讨嫌事，说不定他一旦失势，真的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呢！就拿去年季青主持的揭发、处理高等学校考试舞弊

一案来说，他得罪了多少人啊！他胜利了，报上发消息表扬了季青，可他季青认为是寒心的胜利，他毕竟不是生活在报纸栏目里的抽象的人，他是生活中的活人。他到处见到白眼、冷脸，人们在当面恭维他，又像躲避瘟神一样远离他，他内心是痛苦的。季青也是人，也需要友爱、以诚相待、和谐，他没有受孤立的嗜好！

一次作弊，送进大学几个不合格的学生，除了破坏党风，倒不会因此而扯了“四化”的后腿。那么，面临着的挑选市委一级领导人的工作，稍一马虎，那是要出大纰漏的，他准备着把人得罪光，非圆睁双目不行。他意识到，这是在向杨铁挑战，正确地说，是向他周围那张网挑战，他不能有一点松懈。

季青苦苦地思索着，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假如像杨铁说的那样，假如能发明一种心理品格测试仪该有多好啊！

滑稽！他不由得讪笑起来。他觉得舌头发木，口里又麻又辣，这才捻死香烟头，抓了一块方糖扔到嘴里，稍解苦味。

夏天天亮得早，东面的窗子早已发白。他打了个哈欠，换上长裤，穿上鞋子，走出房门。这时候刚刚是早上4点钟，街面上已有行人。更多的是黎明即起，聚在广场上打太极拳的老头、老太太们，即人们戏称的“求生者”们。

季青走出机关宿舍大院，活动活动胳膊腿，向闹声震耳的农副产品贸易市场走去。

季青倒背着手，信步走在瓜果摊头、蔬菜挑子之间，随口问着鱼、肉、蛋的价钱。

一直转到尽头，正要找一家浆汁馆去喝碗热豆浆，吃几根油条，猛然看见一个眼熟的女人正在鱼市买鱼。

这女人三十七八岁光景，脸很白，皮肤很细，梳着长波浪披肩发，白色方口连衣裙外面罩件米色马甲，纯白的坡跟凉鞋，打扮得入时。季青认出她是演员，说不定在一起开过新年茶话会，

是哪个剧团的却分不清楚。她好像经常出入机关宿舍大院，大约是市直机关哪一位的妻子。

这女人所以引起季青的注意，是因为她抢先替别人付了鱼钱。那个买了两尾鲜鲤鱼的女人，四十几岁的年纪，衣裤干净、体面；头发盘在脑后，不像别的家庭主妇那样高声大噪地讨价还价，有一种天生的随和安静劲儿。季青认出来，她是上个月杨铁家新聘来的保姆，好像姓关。

为什么女演员替她付钱？她们是亲属？朋友？那似乎也不必。保姆既是给杨铁家出来买菜，菜金自有杨家付；向杨家献殷勤吗？没人会这样傻气，何不自己买了鱼登门送去，也好叫人领情。这样不明不白地花了钱，倘保姆回去不说，岂不枉费了心思？

这样想了，季青也凑了过去。

女演员自己倒没有买鱼，秤了一斤西红柿，又挑选了一块生姜。她一转身，发现了季青，文静地笑了：“哟，是季书记？难得您亲自出来买菜。”

季青心里不大是滋味，“难得”两个字未必不含有讥刺。是啊，市委书记出来买菜本来是稀罕的嘛。他只是笑笑，努力回想这女人姓甚名谁。

那女人又说：“季书记该雇个保姆了……”

季青说：“只有我们老两口在家，一点饭好弄，用不着雇人。”

女演员见季青上下打量她，就笑问道：“季书记认不得我了吧？我叫周奉宛，我们那口子是你的部下，吴药川啊！”

季青这才对上号，笑问道：“小吴怎么不出来买菜？大男子主义？”

周奉宛从菜篮子里抓起一块姜来说：“人家是公而忘私的人啊！这不，昨天下乡去，回来淋了雨，发高烧，我弄块姜给他发

发汗。”

听起来，周奉宛对丈夫的表扬，完全是用一种挖苦、怨恨的语气说出来的，女人惯会这样，季青听了反倒挺得意。在他看来，只有把所有的男人都捆在女人裙带上，女人们才能满意。

周奉宛告辞走了，季青挤到鱼市前面来，他也动了吃鱼的念头。其实，他口中倒不缺鱼腥味。办公厅按时按节常分来海鱼、淡水鱼，不过，哪怕是三伏天，也都是冻成冰坨的冻鱼。从冷库里拿出来的鱼再鲜，总觉得没鲜味，嚼起来像木头片。

卖鱼的是个跛子，烂眼边，戴一顶渔翁帽，嗓门倒挺亮：“看好咧，刚出水的龙潭大鲤鱼，没污染，吃了管保你跳龙门！”

季青被卖鱼人逗乐了，凑过去，伸手到盛水的大缸里搅了几把，活鱼甩尾抖鳍，沾了一手鱼鳞，溅了一脸水，他到底没抓住一条鱼。

“您歇着，”卖鱼人说，“您相中哪一条，点一下就行。”

季青点了一条大的，这才想起来问：“多少钱一斤？”

卖鱼人伸手进缸，一把掐住一条大鲤鱼的腮，扑棱一下拎出水来，用根烂草绳一穿，麻利地吊到钩子秤上，说：“两块五一斤，这一条不多不少，四斤六两整。您看好，在秤星外呢，抬头秤？二四得八，四五两块，二六一十二，五六三十，一共您付十一块五角。”

季青吓了一跳：“这么贵？”

“一分钱一分货，”卖鱼人提着鱼说，“不贵咋的？咱不抱铁饭碗，又没有副食补贴，就得自个儿补呗。喂，你倒是要不要？”

季青一边摸口袋掏钱包，一边说：“太贵了，比国营牌价高3倍。”

卖鱼人等了半天，见他所有的口袋都是瘪的，大为泄气，咚一声把活鱼扔进水缸，进了季青一脸水。卖鱼人把钩子秤往肩上一甩，说：“一个大子儿没有，还嫌鱼贵？有便宜的，你去当市

委书记呀，有人把活蹦乱跳的鱼送到你油锅里呢！”

季青憋了一肚子气，又不好发作，谁让自己没带钱了呢。唉，对于他这个市委书记来说，钞票几乎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多少年来没亲自去领过工资，没管过柴米油盐，这一切都有秘书代结。即使是到北京开会，到下面去视察，伙食账也自有秘书代劳。钱，对于他，本来没有多大意义。今天，他却尝到了没带钱的苦头。

他已经离开鱼市好远了，仿佛还听得见卖鱼人的嘲笑声，那么刺激！

身上不名一文，豆浆馆也进不成了，只好回家。

当季青快走到机关宿舍大门口的时候，又看到了杨铁家的保姆，左手提着两尾几乎拖地的大鱼，右手提着装满青菜的菜筐。

保姆显然认得季青，她礼貌地向他点点头：“您早，季书记出来遛遛弯呀？”

季青说：“嗨，好新鲜的鱼！现吃现买嘛，干吗一次买这么多？”

保姆一笑，说：“有冰箱，怕啥！”

两个人一同跨进大门，季青问道：“方才在鱼市上跟你说话的那个演员，若不是她自报家门，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呢。”

保姆似乎有点不自然，但很快就过去了。她说：“小周嘛，是在京剧团里唱刀马花旦的。我们是亲戚，不近，也不算远，她是我表妹，叔伯的。”

她始终没有说出周奉宛代付鱼钱的事，也许是根本用不着说的，市委书记怎么好当面问？

分手前，季青问道：“杨部长还在睡懒觉吧？”

保姆说：“别提了。他昨天晚上9点才到家，洗了脚没等上床，齐书记就派小车把他接走了，天快亮才回来，好人也架不住这么没黑天、没白天的折腾啊！”

季青心里打了个眼儿。这么说，杨铁与齐彬有什么私房话要谈？不然为什么又二次接他去？或许是打牌？他们常聚在一起打牌，季青倒是有耳闻的，这一点，杨铁对他并不避讳，有时还要夸耀一番自己牌打得如何绝。季青是连扑克牌都不会打的人，他不反对别人有业余嗜好，通宵打牌，他却大不以为然。记得有一次在常委会上，他提到过“此风不可长”，有人声援，但杨铁说：“都像你那样夫子相，怎样联系群众？”

季青当然不会苟同杨铁的巧辩。不过他也有些自怨自艾，也许是自己的爱好太少了，所以才弄得好多机关干部敬而远之。在那以后，他很下了一番苦功，总算学会了打扑克、打百分、抓娘娘，虽够不上“上乘”，当三缺一的时候，总可以上场应付。说也怪，他钻到小车队同休班司机们打起扑克来，在那一片不文明的嬉闹、吹牛声中，他一方面感到自己正在向庸俗屈服，一方面又得到了某种乐趣。唉，人真是怪呀！

虽然这样，季青并不能原谅杨铁的打牌。在他看来，打牌只是一种娱乐，若搀有别的成分，那就不光彩了。

他认定，杨铁的学打牌，是抱有某种目的的。而凑到齐彬家的牌桌上，尤其叫他纳闷。

从前，杨铁和季青一样，是个没有业余爱好，生活比较单调的人。进城10年，他们在北京相遇。参加国庆10周年狂欢晚会时，两个人在游艺大厅走来走去，打扑克、下棋什么都会，只好凑到孩子们堆里一起去“钓纸鱼”、“套圈”，赚两块糖吃。季青曾玩笑地说：“咱这土八路，进城10年了，土味儿一点没去掉。”杨铁说：“有精力多学习一点，比玩儿强多了。马拉松冠军应当去种地，开发北大荒，多打点粮食吃了不饿！”

这虽有点偏激，可也看出他的朴实。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学会打牌并且上瘾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和齐彬书记打得火热的呢？他们的间隙，难道是用桥牌来弥合的吗？

1966 年夏天，风暴刚到的时候，大概人们在发蒙之余，都感到运动是抓几个“三家村”之类，自然从文教口开刀。于是，宣传部长杨铁首批被戴上了高帽。但那时抛出他来，并非红卫兵的创举，而是那位齐彬书记在一次文革组长会上宣布的。

为了这件事，杨铁曾说过：“齐某人是投机分子，舍车保帅，他和红卫兵不同，他还不了解全市的干部？永远不能原谅他。”

所以，尽管杨铁戴了高帽后 3 个月，齐某人也挂了黑牌子，戴的不是纸帽子，而是生铁铸的。但是，杨铁在“黑帮派”里也同他说话，以示鄙弃。

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1977 年春天，省委讨论将杨铁从干校调回来时，早已复职主管组织、干部的齐某人则表示反对，杨铁白白拖了半年多。

这就更加深了齐、杨之间的对立。

这些，都是季青从杨铁口中得知的。

天晓得，杨铁会同他成为牌友！而且，在常委会中至今坚持向省委报请批准杨铁提升书记的，又恰恰是这位齐书记。

这是季青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他永远承认，干部也是人，干部中间也有亲疏之分，他自己与齐书记就只有工作关系。这关系如果发展为朋友关系，像他同杨铁那样，似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嫉恶如仇的杨铁却这样快地放弃了前嫌。是他的胸怀大度呢，还是一种姿态？抑或是一种谋求某种利益的手段？

季青觉得不寒而栗。如果是后者，那太可怕了，意味着什么呢？

几年来，他季青立志洁身自好，直到死，决不玷辱自己的称号。他不是没有过向不良倾向斗争的念头，他感到受孤立，他只能在心中叫苦。

譬如，去年他带队到下面六个县去检查工作，到处都是四凉

八热地招待，他提出了批评，并且当众宣布，只准一菜一汤。

他放心了。他每到一处，都被安排到小食堂，有秘书陪着，吃他的标准，可他终于发现，其余的人背着他，依然在吃大鱼大肉，他的制度只不过是人们用来对付他自己的“请君入瓮”法。

他发了火。

然而得到的是什么呢？机关里的人都说他“太那个”，甚至没有人愿意陪他一起下乡，人们见了敬而远之，他连搜集群众反映都有些困难了。

与他相反，从前比他难接近的杨铁却声名鹊起起来。

是自己变了呢？还是杨铁变了呢？

福星高照

杨铁家的保姆关阿姨，正在厨房洗碗筷，一只大水盆里泡着两条鱼，要在上午收拾出来，杨铁说晚上请客要吃一条，不用问，客人准是齐书记。

杨铁最小的儿子栋栋从房间里走来，抱了一大包脏衣服，朝关阿姨脚下一扔，说：“裤衩快点晾干，下午我游泳时还要穿呢！”

关阿姨显然不那么高兴，只是头也不回地“嗯”了一声。

杨铁的夫人孙静步履艰难地走来，训斥儿子说：“像话吗？真惯坏了，油瓶子倒了不知道扶！连裤衩都不能自己洗吗？”

见有病的孙静有几分动气，关阿姨这才赔笑说：“这有什么？叫他们男孩子洗，洗也洗不干净。锈住了，下回更不好洗了。”

孙静对拿了录像带跨出门去的栋栋说：“我看你什么时候有出息！大学考不上，快成二流子了！又不温课了？”

栋栋反唇相讥道：“谁让我摊上个老正统的爹了！你们不给我想办法，我就在家里待业，你们不怕烦，我怕什么？”说罢，

扬长而去。

孙静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栋栋的妹妹榕榕也从客厅走出来，格格一乐，说：“干吗不把三哥送到兵营里去改造一下呀？”

她说这话是故意气她妈。平时，孙静一生气，总是喜欢说：“若不，把栋栋送部队上去，叫他吃点苦，兴许能锻炼出来。”杨铁也曾萌发过此念，何况，这几年参军并非像前几年那样热，非走后门不可的。无奈儿子死活不肯穿军装。

原来，榕榕就是穿军装的，17岁就当上了卫生兵。她已经在家泡了8个月病号，是医生不好确诊的“神经性头疼”。据她自己说，一疼起来满床打滚。可回来8个月，家里人见她整日里红光满面，没有一丝病痛。杨铁夫妇开始疑心这丫头是装病，几次劝她归队，她就是不肯。催急了，她就一味哭闹：“你们坑我坑得还嫌不够吗？吃高粱米、拉练、跑步……我受够罪了！你们不把我转业到地方上来，我就赖在家里一辈子！”

唉，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别看杨铁在机关说一不二，就是管不了自己的子女！

于是榕榕也乐得逍遥。

听了榕榕的挖苦话，孙静又叹了口气。她看到关阿姨已经把脏衣服泡到洗衣盆中，拿起搓衣板开始洗衣服，有点过意不去，正要回头同女儿说什么，榕榕早不在了。

两分钟以后，榕榕又抱出一包来：有毛巾被、床单，还有内衣……

孙静说：“榕榕，还是去买台洗衣机来吧。我看电视里总介绍小鸭牌，就买小鸭牌的吧。”

榕榕向低头搓洗衣服的关阿姨努了努嘴，那意思是说：“有她，不是比洗衣机好吗？”但她的话是这么说的：“洗衣机不好用！领口、袖口照样得加肥皂用手工搓洗，何必费那二遍事？”

孙静气得脸色发黄，当着保姆面又不好发作，只得忍住。

关阿姨抬头看看孙静，说：“您脸色不好，快回房躺一会儿吧。”说着站起身，在围裙上擦擦手，把孙静扶到她卧房中去。

人都是自尊的。当关阿姨重又坐到洗衣盆前时，洗着洗着，眼泪流出来，泪水滴到泛起的肥皂沫上，发出滋滋的响声。保姆就应该是一台活洗衣机吗？

说实在的，关阿姨并不乐意出来当保姆。她是个寡妇，有两个儿子，一个念高中，一个念初中，虽说丈夫工伤死去只拿40多元钱不够养家，可她尽可以去卖冰棍，夏天旺季，哪天都能挣三块五块的。

她却拗不过情面。周奉宛再三央求她，说自己有一个好朋友，病休在家，需要有人照顾。周奉宛还说：“权当是照顾我，还不行吗？”

周奉宛这么说，关阿姨还有什么可说？人得讲良心啊！她是周奉宛的远房表姐，平素没什么来往。去年夏天，关阿姨的丈夫从仓库平台摔下来，颅底骨折，死去了。出事是在夜里，本来不是她丈夫值班，可他前半夜确实在仓库办公室逗留过，有人证明。但厂方不准备按工伤处理，理由一是没有当班，二是死后闻到他口中有酒气，证明他此前喝过酒，实属不慎失足。倘若按自然死亡处理，只能给一千多元抚恤金，就不可能有按月领到的工资了，儿子也不会抚养到18岁。

后来，关阿姨求到了表妹名下，周奉宛通过丈夫的朋友，把这事儿办成了“工伤致死”，没有费多大气力。从此，关阿姨把周奉宛夫妇视为恩人，走动也频繁了。你想，人家低三下四地求到自己头上，能不两肋插刀吗？何况月月给工资，带出一张嘴去，又算不得两肋插刀的事呢！

可是，到了杨家一个多月，她发觉这活儿并不好干。她听邻居说，这两年杨铁家先后请了几个保姆，有年老的，也有年轻

的。不管性情好的或不好的保姆，都没有在杨家呆过半年以上的历史。外面人传说杨家的人不好服侍。而杨家的人也说得有理：年老的保姆手脚笨、肮脏，往往还有往自家倒腾东西的毛病，能说是好保姆吗？年轻的呢，又过于轻浮，手懒心高，还偷嘴吃，给她一块钱买菜，她也许只给你买回两毛钱的黄瓜，你又不好冲她索要买菜的发货票……

关阿姨曾几次向周奉宛流露过干一段看看的意思。可每次周奉宛总是笑容可掬地说：“一人难调众人口，我还能猜不到你有难处吗？你委屈一点，就算帮妹妹一点儿忙，我会报答你的。”

听她说得有情有义，关阿姨又不好意思走了。她有时自己也纳闷，周奉宛为啥同杨家这样亲呢？周奉宛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不单孙静喜欢她，就是刁钻古怪的栋栋，浮躁娇气的榕榕，都和周奉宛处得来。周奉宛只要隔三天五日不来，孙静必定要叨咕，非让女儿打电话催她来不可，仿佛她是杨家的一颗福星。

屋子里闷热，关阿姨把洗衣盆搬到门口台阶上来。这里有“悬冠”遮住阳光，比屋子里舒服多了。她机械地洗着衣服，想着心事……

一阵脚步声响近，一双穿着高跟皮鞋的脚停在面前。关阿姨意识到是周奉宛来了，一抬头，果然看到了周奉宛那张永远笑眯眯的脸。

关阿姨感到见了亲人般的高兴，甩甩手上的肥皂沫，要站起来。

周奉宛把她按坐下，自己也搬了张矮脚凳坐在旁边，扫了一眼洗衣盆，皱起眉头，说：“怎么，裤衩都让你洗了？这混账小子！太不像样子了！简直成了公子哥儿了。等我收拾他们！”

关阿姨觉得心里十分熨帖，周奉宛总是这样摸自己的心。她也知道，周奉宛说这话，没有半点吹牛的成分，她是敢抹下脸来训栋栋或榕榕的。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大概是卤水点豆腐，一物

降一物吧？孙静和杨铁制服不了的儿子，往往在周奉宛面前像小猫一样老实。也正因为这个，孙静对周奉宛更好，她一来，孙静就像家长对孩子的老师告状一样，数落起来没完。

但是，告状的话如果出自保姆之口，关阿姨是觉得不成样子的。因此说：“惯了，洗洗涮涮有什么？男孩子连手绢都洗不好的。”

“你就惯他吧！”周奉宛这么说了，跑到屋里，和孙静大声说了几句话，提出两桶水来。动手帮关阿姨洗衣服。关阿姨百般不让她沾手，周奉宛说：“我又不是千金小姐，那么娇嫩？”

关阿姨只好由着她。

周奉宛搓了几把，冲屋子里喊道：“喂，榕榕小姐，出来帮帮忙，小心闲出病来！”

真叫怪！榕榕格格乐着，卷起袖子跑了出来。

三个人干，洗的洗，涮的涮，晾的晾，不到一会儿工夫，全部完毕。

等榕榕被周奉宛命令去买豆瓣酱的时候，她同关阿姨收拾着鱼，周奉宛把一卷子钱悄悄掖到了关阿姨围裙里。

关阿姨像被蜜蜂蜇了一口，赶紧掏出来：“你……你这是干什么？”她虽然没数，也知道那卷子钱有好几十元呢。

周奉宛按住她的手，说：“好姐姐，你这不是太见外了！我说话是算数的。就是没有那句话，我能眼睁睁看着你困难不管吗？”

关阿姨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所谓当初的一句话，她本是当成耳边风的，不过视为一句人情话，哪想到周奉宛会认真！原来，在周奉宛劝说关阿姨到杨家来当保姆时说过：“你在他家白吃，做做饭，洗洗涮涮，一个月拿20块钱工钱，少了点，我讲的是一半人情一半钱，关系不是一般，怎么好意思讨价还价？反正，不能叫你吃了亏，余下的工

钱，我给你补上。”

当时，关阿姨也是冲着“一半人情一半钱”的分上来的，不过她是冲着表妹周奉宛，而不是冲着他杨家。她知道行情，别人家的保姆都是净拿 30 元乃至 35 元的。

现在，周奉宛不是来补足（不，不仅是补足，而是大大超额）工钱了吗？她怎么好意思拿呢？

但是，周奉宛说：“你别不好意思，只要你好好干，使杨家的人满意，就算报答我了。”

这究竟是个什么逻辑，关阿姨不明白，她也不想弄明白，她只觉得周奉宛是好心人、正派人，她得对得起周奉宛。只要周奉宛不吐口，哪怕在杨家再委屈，她也得咬牙挺着。

收拾完鱼，周奉宛洗过手，来到孙静的卧室，孙静正无聊地在床上摆扑克牌，见她进来，眉开眼笑地说：“过来，小周，我给你算一卦，准能拣开，像你这种好心眼儿的人，是福星高照的。”

周奉宛哈哈笑着围过来凑趣。

孙静一张张摆着扑克牌，冷丁想起什么来，从床头柜里摸出一包吐鲁番白葡萄干，塞给她：“给你留的，前几天别人从新疆带来的，栋栋他们连味都没闻着。”

周奉宛说：“咱俩吃。”说着要动手拆口袋。孙静按住她的手，夺下葡萄干，替她塞到手提包里：“回去和小吴一起吃。”

孙静这样疼周奉宛，不是没有来由的。她“文化大革命”前是妇联办公室主任，现在虽还挂着妇联顾问的职衔儿，其实不顾也不问，只能长年在家养病。她肝不好，发过几次腹水；肾结石，还有甲状腺机能亢进，用她自己的话说，全身的部件都老化了。去年下半年，她听说西德新出一种药，治肝炎极有效，就打报告申请外汇买一点。报告打上去两个月，如石沉大海，她跑去问，卫生局的人说，外汇太紧张，只有医药公司进口才有办法，

单批外汇是不可能的。孙静很生气，她病中浮躁，一方面认定卫生局是刁难，一方面认定刁难的原因是因为丈夫去党校学习了。假如他在，卫生局看面子也得给想办法。越是买不到这种药，她越心焦，也越发认定这种药是特效，仿佛有药到病除的性能。正在她发牢骚的时候，周奉宛的丈夫吴药川到她家来探望过一次，一起来了好几个处长，都是宣传部的。大家只能帮着孙静发几句牢骚，谁也没本事搞来德国药。一般人，一听到药价就会吓得吐舌头，一盒药要 250 美元，治一个疗程，居然需要 12 盒！在场的人，只有吴药川没吭声。人们走后，周奉宛开始来陪伴孙静，端茶送水，比亲女儿还周到。半个月后，周奉宛拿来了那种装潢极为考究的西德新药，一共 12 盒！

可想而知，孙静会高兴到什么程度。她一再追问药品的来源，周奉宛永远是避而不答，光是笑：“你问这个干吗？我是盼你病好，若讲溜须，也没有送药丸子的。”

从此，她成了杨家的常客。

但周奉宛成为杨家不可少的编外一员，成为他家公认的“福星”，还在于雇用保姆的事。当他家新辞退了一个保姆，张罗不着可心人的时候，周奉宛说：“别发愁，我替你们物色，保管少付工钱，活还要多干，人又老成又麻利。”

杨家的人都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便宜事。尤其是近一年来，由于农贸市场开放，随着个体商业的兴隆，闲散劳力越来越少，好多中年妇女宁可在市场上倒腾瓜果梨桃，也不愿当保姆看别人脸子吃饭。

便宜事世上果真就有。由周奉宛引荐来的关阿姨真是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可心人，就连最能挑剔的栋栋都没向保姆耍过脾气。关阿姨到了杨家，仅仅用了 3 天，就使杨家面貌为之一爽，陈年垃圾全都清除了，窗明几净，里里外外仿佛镀了一层金！

与其说感谢保姆，倒不如说杨家的人更感激周奉宛。大概由

于关系处得好，杨家凡是吃点稀罕东西，总是要打电话叫周奉宛来。也叫她丈夫，不过吴药川几乎从没来过，他总推说工作脱不开。

曾有人当面问过孙静：“你们是亲戚吧？”没等孙静答腔，周奉宛早说了，像是半开玩笑：“当然是亲戚了，她是我表姐。”孙静只是笑，一次都不去纠正，因为她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好妹妹呢。一表三千里，表亲是容易论起来的。

感情和威信有时是同时产生的。开初，孙静一家人只是同周奉宛谈谈家长里短，后来，重要大事都要请她拿主意定夺，栋栋说她是贾府里的琏二奶奶！

“摆通了，摆通了！”突然，孙静孩子气地嚷了起来：“我说了嘛，你是福星，一切都会如意的。”

“这是姐姐的好心，把神都感化了！”周奉宛这样俏皮地说了，笑个不住。

孙静收起扑克牌，问她：“今天不上班？”

周奉宛说：“晚上7点演出，5点化妆，我在家里呆着闷得慌，就出来了。”

孙静说：“你来得正好，我正好闷得过不去呢。”

周奉宛问：“西德的药吃了有一半了吧？近来觉得咋样？”

“好多了！”孙静拍拍肚子，“你听，实音，不像从前，一拍咚咚响，像水泡过的鼓皮！”

两个人又都笑起来。她们天南海北地聊着，最后又谈到了栋栋身上。

周奉宛问：“栋栋今年真的不想考大学了？”

孙静叹了口气：“考也考不上，学那点书底子都就饭吃了。可他爸爸还逼着他再考一次。眼看再有一个月就高考了，还像匹野马，到处乱闯，还不是落榜！”

周奉宛知道，栋栋的事是杨家的一个愁疙瘩。她正要说话，

杨铁回来了，各屋转了一圈，立刻站在走廊里发起了脾气：“栋栋呢？又跑哪儿野去了？不是说好一天复习 4 个小时吗？没出息，呸！”

孙静在屋里搭腔说：“你发什么神经？不怕小周笑话。”

周奉宛赶紧来到走廊：“杨部长今天回来的挺早啊！”

见了周奉宛，杨铁的气立刻消了一半，他应了一声，勉强笑道：“你好几天没来了。”

周奉宛说：“部长总发脾气，我不敢登门啊！”

杨铁哈哈大笑起来，脱去外衣，来到孙静的卧室，缓下语气说：“快高考了，小周得帮我看守那匹野马呀！”

孙静叹着气说：“我看那孩子心不在书上，打骂也没用。”

周奉宛插嘴说：“真得想个办法了……”

想什么办法？杨铁是一筹莫展。

一提起栋栋的事，他就心烦。

杨铁为着栋栋的事，叫季青批得鼻青脸肿，还不够吗？

扪心自问，杨铁也能省察出自己重新工作以来，有些失于检点的作为，当然谈不上什么违法乱纪了，对了，顶多算不正之风。不正之风，人人都有嘛，不信大家抖一抖，也许我杨铁是最干净的一个。就拿齐书记来说吧，不但把儿子、女儿全都安排了理想的工作、住房，连孙子都安排妥当了。而我杨铁，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待业、待调！当然，不能这样比了，总是有好样的，人家季青就是个榜样。他至今还有一个儿子在县城木工厂里当工人，刚满师两年。他是插队下乡时留在那里的。其实，只要季青灵活一点，稍稍暗示一下，办公厅的人早把这个孩子弄回城了，可谁敢？谁乐意办吃力不讨好的蠢事？记得去年高考时，市教育局悄悄做了点手脚，把季青的女儿总分提了 36 分，进入了重点大学录取线，送进了南京大学天文系。天晓得季青发了什么神经，他在高考揭榜前，突然以文教书记的身份，找了纪委

的人作陪，一次把市里厅局级以上干部子女应试者的考卷全部提出来，逐一核对检查。

一起舞弊案暴露了，他把女儿降格送回了师范学院，把教育局长的女儿以及另外一些人的孩子也做了相应处理，杨家的栋栋也在其中。季青还建议市委撤了教育局长的职，而且在省市报上公开了。

这一招厉害，大快人心。从此，那些企图给季青一点甜头然后肆意图一己私利的人，闻风丧胆，至少在季青面前是这样，还有哪个去捋他的老虎须子？

杨铁没有什么大过。他确实没有暗示教育局长作弊，虽然也受了批评，毕竟没有什么把柄落到季青手中。

但是，自从杨铁预感到势必退休以后，他发觉自己过去太“那个”了。他拿自己同周围的人比较了一下，自己掌管的是清水衙门，当然是两袖清风。他在文教卫生系统作报告，喜欢说“我们是清水衙门”这句话，被人们传为话柄。正因为清，他除了看电影、看戏可以省去几毛门票钱而外，他是问心无愧的。

他也有未竟的心事，因此难免有点隐私。杨铁并不是太精明的人，前几年，他发现有些干部的子女纷纷到国外去投亲靠友，留学深造，他还感到纳闷。他甚至怀疑过这些人对党的忠诚。那么多运动，他们都“滑”过来了，居然没有暴露海外有亲属的大事情。后来，还是儿子栋栋埋怨地提醒他说：“就你那么傻、那么革命！丛芳芳就是外商出保证金、出学费，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

丛芳芳的爸爸是外贸局局长，当然同外商尽可以打得火热，只要外贸局长不出卖祖国的利益，外商自愿出资，上赶着送人情，似乎也无厚非。他这个宣传部长就不行喽，除了偶然接待一两伙文化界、新闻界的高级外宾外，就没有过与外国人任何交往。一个加拿大朋友送过他一只电子打火机，他交到了办公厅；

一个日本朋友去年春节寄过一本日本佛寺挂历，他在秘书处那里登了记。

儿子说他“犯傻”，连一向严谨的季青都哈哈大笑，说他太过分了。

杨铁真正动起叫儿子出国的念头，是今年年初的事情。儿子栋栋天天缠着他，说只要打报告，外国使馆肯签字，有人代付学费就行，栋栋甚至举出好多人在外国勤工俭学的例子，他发誓说，白天洗盘子晚上念书，他也要出去深造。

杨铁侧面打听了一下，果然有此事，这等于在他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

采用不光明的手段，送儿子出国，杨铁是绝对不想干的，正确点说，他是不敢。在他灵魂深处，毕竟还有党的纪律约束着他。他明白自己的地位，他不比季青，季青是把一切门路都自己封死了的人，没人赶着去拍季青的马屁，那是一种冒险。只要杨铁动动脑筋，托上几个人（其实他相信不乏愿为他出力的人），栋栋的出国，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他绝不能出这个头，自己被蒙在鼓里可以，事情闹出来，最多担一个“官僚主义”的过失，亲自出马，那错误性质就不一样了。他也明白，自己有一件事办走了样，下面的人就有胆量干十件！到时候还不是“炒豆大家吃，砸锅一个人的事”？

如果能把不合理的事演化成合理的，把不合法的转化成合法的，这是最理想的了。他一直在寻求这种平稳不担风险的办法。这却不大容易。

最后，他还是采用了公事公办的手段。叫儿子栋栋写了一份出国留学的申请书，说是自费出国，愿意用勤工俭学的办法来解决学费。

这当然是名正言顺的，没有丝毫的欺骗。申请了，批不批在你。

谁知道，要有外国人出保证金才行！杨铁满以为公安局的人会给一点面子，把这件事办了，却不料申请递上几个月，毫无消息，不要说拿到外国使馆的签证，听说至今还压在市公安局！

杨铁有点恼火，可又无可奈何，不敢张扬。假如让季青讨到风去，还少得了挨一顿臭骂吗？

这几天，他更急了，中央老干部正在成批地离休，明年就轮到省市一级。一朝权脱手，这事就永远告吹了。

周奉宛给杨铁倒了一杯凉茶，见他捧着茶杯出神，早猜到 he 为什么事苦恼，就问：“杨部长，您光为栋栋的事犯愁也不行啊！”

杨铁轻轻一笑，没有回答。

周奉宛啜了一口茶，说：“人走茶凉啊，不能不说古语说得对。抓紧办，现在还来得及。”

杨铁心中一动，怔怔地望着她，不知道该表示赞同对，还是应当驳斥对。

“我看，应当送栋栋出国留学。”周奉宛进一步说，“公费不行，就想想私费的路子。前有车，后有辙，何况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只要您肯破脸，没有办不成的。”

杨铁心里又是一动，一时竟不好回答。是周奉宛知道了 he 申请让栋栋出国的事呢，还是无心地说一说？假如她得到了风声，是谁告诉她的？孙静不会的，他嘱咐过她不准外泄。那么一定是栋栋自己，或者是关阿姨。

但杨铁知道，周奉宛绝无恶意，于是杨铁做出不大介意的样子，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你把出国看得像走亲戚那么容易？”

“我看也没什么难的。”周奉宛嫣然一笑，说：“这要看您投多大力量了。”

“我有什么力量？”杨铁摊开手，“一无门路，二出不起学费，三不能违犯党纪国法，只好凭他去了！”

周奉宛突然说：“这样吧，栋栋的事，包在我身上了。”

“你？”孙静有点不信，这可不是雇一个保姆啊！

“你？”杨铁的眉毛也耸起老高，他不相信周奉宛有这么大本事，就说：“这可不是到市场去买黄瓜、西红柿呀！”

周奉宛也乐起来：“事在人为。有些听起来吓人的事，办起来不见得比买黄瓜、西红柿难。”

听她的口气，好像早有成竹在胸，她有什么背景吗？杨铁突然记起来，周奉宛的哥哥是市公安局局长，这可是办理出国手续的签证机关啊！可是，省公安厅呢？

杨铁无论如何不肯、也不敢亲自出马去活动这件事，但又不愿意由他自己熄掉这一星希望之火。他既希望周奉宛能办成此事，却又怕她弄不好捅出麻烦来，因此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既没支使她干，也没授意什么，乐得佯装不知。

杨铁的高兴毕竟是隐藏不住的，他一迭声叫保姆：“把鱼焖上，留小周在这儿吃中午饭。”

你常否定你的“感觉”吗？

一连几天，周奉宛没有露面，打过一次电话给孙静，压根没提过栋栋出国留学的事。杨铁每天回家，都希望能碰上周奉宛在屋，却都落空了。在机关，倒是常和小周的丈夫吴药川打交道，可那是个有话能烂到肚子里的人，工作以外的话从不在机关谈，别人说什么，他一律付之一笑。杨铁又不知周奉宛同吴药川通没通气，这种事不好贸然去问下级。

这天中午，杨铁一推开家门，就冲扎着围裙的关阿姨问：“小周来过吗？”

关阿姨摇摇头，见杨铁转身要走，连忙从怀里摸出一封信来递上去。

杨铁接过信，是封着口的，正中写着“杨部长亲拆”，底下没写地址，只有“内详”两个字。

杨铁一边拆信一边问：“哪儿来的？”

关阿姨说：“送信的没露面，是夹在门缝里的。”

不用说，又是告发信。这类没头没脑的信他常收到，有诬告的，也有揭发隐私的，他不能不重视。

他就站在厅房里看信。杨铁看着看着，眉头皱成“川”字。他在屋子里站了好一会儿，大概因为事态严重，回头嘱咐了关阿姨一声：“他们回来，先吃吧，不必等我，我到季书记家去一下，也许在那混碗饭吃。”

关阿姨在厨房里应了一声。

季家很清静，只有他们老两口，大儿子在海军，二儿子在县里，女儿在念大学，这使得本来显得家徒四壁的风子里，更增添了几分冷冷清清的感觉。

季青刚端起饭碗，老伴在给他盛小米水饭，是冷开水泡的，桌子上有一碟酸黄瓜、一碟肉丁辣酱，惟的一个炒菜是素炒土豆青椒丝。

见杨铁进来，季青放下筷子，又拉过一把椅子，说：“你倒会赶饭碗子。怎么办呢？你是喜欢吃大荤大肉的，老傅，再弄两个菜来，别叫他吃饱了肚子又骂街。”

傅碧云笑了：“我只能炒一个鸡蛋，腊肠还有两节，这是全部家底了。”

杨铁也不客气，脱去外衣，朝椅子上一坐，说：“若有啤酒就美了，天这么热。”

“好像有半瓶。”季青撅着屁股在柜子里翻了半天，果真找出大半瓶五星啤酒来，拿了一只茶杯倒着。

杨铁说：“攒钱留着铺棺材底吗？干吗不买一台冰箱？雪花

牌的不错，160 升的才八百多块钱，我买了个日本日立的，太小，49 升，耗电又多。”

还没等季青答话，杨铁一仰脖，咕嘟一下早灌了一大口啤酒，又哇地一声，吐出来，喷了一地，一脸苦相地大声嚷嚷起来：“你要害死我吗？我问你，这啤酒有几年了？”

傅碧云端着一盘子炒鸡蛋进来，说：“怎么了？坏了吧？少说有半年了，还是农工部李部长那次来，非要喝啤酒，我特意跑到小卖店买了 3 瓶，他没喝了。”

杨铁说：“我可不付醋钱！”

这工夫，季青早拿起酒杯凑到鼻子底下嗅了嗅，忍不住大笑起来：“好啊，比山西老醋还酸呢。”

吃着小米水饭，杨铁想起了正事，掏出那封群众来信，铺展到季青面前，说：“边吃边看。”

季青拿起来看了一遍。原来是揭发闵桐的。据揭发者讲，1975 年秋天，当“四人帮”的干将王洪文来本省“视察”时，闵桐曾给王洪文送去 5 斤人参。

“假如这是真的，可不怎么妙。”杨铁吃着傅碧云刚切上来的腊肠说。

傅碧云说：“你们先吃饭好不好？当着我面，最好别谈工作。”

她这并非玩笑。她是个极普通的干部，正确点说，连干部也不算，她只是北京农业银行的一个会计。刚进城的时候，有一次季青带一伙记者和农业银行的人到京郊灾区去调查灾情，解决农业贷款，傅碧云是随行人员之一。他们相识了，结婚了，周围的人都感到意外。上赶着有人给年轻的高干介绍大学生他都不吐口，却偏偏相中了一个会计姑娘！

几十年来，夫贵妻荣，有些夫人本来什么都不行，也都大小混了个科长、主任干干，只有傅碧云依然是会计，去年凭本事考

上了会计师。农业银行曾经去报请提拔傅碧云当营业室主任、乃至副行长，都被季青一笔勾销了。他有一次问傅碧云：“和你一起参加工作的那些姑娘，现在都在干什么？”

傅碧云说：“你问得怪！会计、统计呗！”

“那么，你觉得你能不能当行长？”

“我？你别羞臊人了，我哪是那块料！”

“那，人家为什么偏偏报你当副行长呢？”

“你别拐弯抹角开导我了。”妻子当时憨厚地说，“我又不是3岁孩子，你懂，我就不懂？你不是给挡回去了吗？我这一辈子，就希望当个好会计。”

傅碧云真不像一个市委书记夫人！

不管什么场合，只要来家的客人同丈夫谈起工作，特别是人事安排问题，她总是拉起孩子就走，她从不看丈夫带回来的文件，别人也休想从她口中探去什么“小道消息”，因为她确实不知道。为这个，有人背地里说她“守口如瓶”，有人说她“原则性强”，也有人说她“鬼”、“不好办事”。但是，傅碧云是安静的，没有干扰，她给丈夫省去了好多麻烦。几十年来，没有一个同事、朋友或亲戚托她办过什么事，她的身价，仿佛都不如一个保姆！

就为这个，每年春节家宴上，丈夫总是举起一杯葡萄酒，说：“谢谢你，我的好妻子！有你在，我没有后顾之忧，后院永远不能起火！”

这话是千真万确的。

见她这会儿端起饭碗又要躲出去，杨铁说：“这是何苦呢！我相信，就是你知道的天大的秘密，刀按在你脖子上，你都吐不出半个字来的。”

傅碧云一笑，说：“我不装那么多事。我心里只有阿拉伯数码！”她还是端了碗到凉台上去吃了。

季青把那封信反扣到饭桌上，问杨铁：“你相信吗？”

“又信，又不信。”杨铁说，“这得去调查呀，可这是匿名信，找谁去核对？”

两个人不再出声，都在闷头吃饭。

谁都掂量得出来，倘若这份揭发材料属实，不要说闵桐提拔当宣传部长的事告吹，连现在的副处长也得撤，而且还要立案审查。中央明文规定，凡属于“文革”期间的派性头头、打砸抢分子、帮派体系人物，是不能重用的。

过了一会儿，季青问杨铁：“你打算怎么办？”

“那还用问？查一查再说。”

“我想找闵桐谈一次。”季青推开饭碗，拿着一根火柴剔着牙说：“闵桐是个诚实的人。你记得那次机关支部会的事吗？”

杨铁当然记得。那是去年学习党员十二条准则的时候，季青政编在闵桐那个支部了，市委办公会他都告了假，却没有缺席过一次支部会（当然外出例外了）。对照准则检查自己时，开起了闷会。第一个打破沉寂的是支部书记闵桐。他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差距，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自己公私不分，把公家的信封、信纸带回家去，孩子都用过公家的办公用品……

与会的人一怔，随即爆起了一片笑声。他们所以笑，觉得闵桐的检查过于鸡毛蒜皮了，而且太做作，令人作呕。是啊，一个时期里，机关的人连升学、就业、复转军人安排这样的事，都公开、合法地互相“帮忙”的时候，即使把公用信纸抱一捆回家去，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季青落泪了。他伤心的是那笑声，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我们的党员已经麻木到了香臭不分的地步，这还不是叫人痛惜的事吗？

那一次，闵桐这个人第一回在文教书记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季青不轻易相信谁的演说和宣言，他上过当、受过骗。事

后，他特意到闵桐家里去了几次，他对闵桐的信赖得到了证实。

闵桐当了副处长，按理早该分到大一点的房子了，可他还住在原来当干事时的平房里。只有一间屋子，不足 15 米，中间吊着布幔，里面住着闵桐 70 多岁全身瘫痪的老岳父。

季青第一次闯进门去，正碰上闵桐半跪在床前为老岳父接尿。他的妻子是中学教员，天天加班给学生补课，家务事全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孝子！”市委书记用这个不太确切的传统评价，在内心里赞扬了闵桐。

季青说：“你应当设法叫老人住院。不然你身子绑住，下得了乡吗？”

闵桐倒了便盆、洗净手，替岳父掖好被子，说：“我下乡，有孩子接替我。住过院，不好意思。这是治不好的压床病，人家医院不说，咱心里也不好过，自己有儿有女不侍候老人，推给护士去干，也说不下去。”

季青深深地被感动了。

过后，他考察了闵桐的工作。他主持艺术处工作以来，几个剧团扭转了亏损，几次专业、业余剧团进京会演，都放了响炮。这个人很有点意思，即使在各地争相演出历来被淘汰的淫秽不堪的坏戏时，他也没放一个坏戏出来；而当好多地方意识到社会效果的时候，他又大胆鼓励剧作家写揭示现实生活矛盾的作品。

季青不得不承认，这个人有头脑，懂得政策，也懂得艺术。

有一次，季青同宣传部、文化局的几个人到北京开会，因为走得匆忙，闵桐他们几个人没有买到卧铺票，硬座车里又挤，季青从软卧包房里出来去看他们时，发现他们一直站在洗脸间那里，正赶上闵桐中暑晕倒了。幸好一个旅客带有去暑的藿香正气水，才没有发生意外。季青当即决定，给闵桐补办了一张软卧票，叫人把他扶到包房里来。

可是事后他听会计说，闵桐只报销了硬席票，软卧票钱是他自己掏的。

这件事同检查孩子使用公家信封的事连起来，那就绝对可信了。

这样的人会同王洪文有牵连？为什么“揭批查”运动时没有揭出来呢。

季青仍然决意找他面谈一次，他从直感相信闵桐的忠诚。

见季青长久地陷入沉思，杨铁推开饭碗说：“我看，还是先不要找他自己谈的好。万一是事实，就应当组织专案审查。”

季青不置可否，仍在不紧不慢地剔牙。

停了一会儿，杨铁叹口气说：“如果能像鉴定产品那样，用卡尺一量，就知道这个人合不合格，那就省事了。”

季青笑起来：“恐怕你我都在变化，用同一把卡尺量过，再量量，一定也有不合尺寸的地方呢。”

杨铁不愿谈这些，他望着窗外，说：“听说吴药川给常委写了封书面信，你看了吗？”

季青点点头：“看了。”

杨铁问：“什么内容？”

季青说：“他调查了十几个单位对离休干部的安置情况，觉得退了休有没人管的趋势，因此提出了十点建议，希望省、市委从优安置离休干部。”

“好小子！”杨铁脱口赞道，“有良心！”

“你说什么？”季青感到很刺耳。

杨铁自知语失，乐了：“用词不当。这总比某些青年人强，你忘了，锅炉房那个造反派说什么了？”

季青一听他提起这个事，就觉得胸口发闷。有一天，当过造反派小头头的锅炉工喝醉了酒，用炉钩子敲着锅炉铁门，说：“除非不再搞‘文化大革命’，再搞，可没那么便宜的事了！光叫

他们戴高帽、游街？哼，干脆都打死，叫他们复辟！”

季青从他恶狠狠的话中，更加意识到，重用“三种人”的危害性。闵桐会是这种人吗？揭发他的人为什么要匿名？吴药川确实是令季青快慰的。他的建议，博得了省市县委多少即将离休干部的好评啊！难怪人们交口赞誉他！

想到这里，季青说：“小吴很有点政策水平，善于发现别人不易发现的漏洞。”

杨铁说：“他的工作都做到我头上来了！你知道，我和齐彬多年来是犯相的……”

季青很惊讶：“这么说，你和齐彬的和好，是吴药川做的工作？”

“不信吗？”杨铁有几分自得，“这小子会做工作，不显山、不露水。他教会我打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给了我一种同齐彬接近的媒介。其实，他早同齐彬过了话了，说我感到自己太偏狭，很想同齐彬解除前怨……哈哈，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他又转达了齐彬对他过去做法的失悔。这就见面了，打打牌，过去的事过去了，人怕见面，树怕剥皮呀！”

季青呆住了。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一时不能判定，应该表扬吴药川对，还是应当否定他对。季青本能地感到吴药川的力量，他真是无处不在的人物啊！齐彬和杨铁是多年的对头了，常委们几次试图调解，都没有人取得进展，想不到小小的吴药川这样轻而易举地替他们弥合了裂缝。看来，吴药川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这使他联想起上午的事情。

季青向来是不到会计科去领工资的，自有秘书领来直接交给她老婆傅碧云。上午他突然动了雅兴，亲自跑到会计科里，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挤了一阵儿，签字、领工资袋、数钱……他感到挺有趣。他有意地看了一遍机关干部购买国库券的名单、明细

表。他惊异地发现，宣传部长杨铁名下，只买了 100 元国库券，是吴药川代为签字一次付清的。

杨铁的级别只比季青低一级，他生活也不困难，为什么只买了季青的十分之一？当然，这也是吴药川代为做主的。对不同的上级，采用截然不同的对待方式，这使季青站在会计科里沉思了好一会儿。是不是由于自己一向以“原则”出名，人家就给你来个痛快的呢？

把这两桩事联系起来，季青感到有点心情沉重了。

停了一会儿，季青忽然问起了与谈话内容毫无关系的一句：“听说你雇的保姆挺能干，每月才给 20 元钱？”

杨铁像被人窥破了隐私一样，脸上热辣辣的，支吾着说：“又是什么人嚼舌头？三里地内没准信儿，什么事一传就走样。”

回答得十分得体。既没有否定，也没有承认，反而使对方不好再追问下去了。

“你滑多了！”季青哈哈一笑，说：“退回去 40 年，你可回答不这么利索。”

杨铁明明听出季青的弦外之音，却故意装傻：“那时，我连马克思还不知道是谁呢。人都在发展嘛！”

好一个发展！季青不想再谈下去了，不客气地站起来送客：“你不睡上一觉吗？”

杨铁正好就坡下驴：“午觉比晚上的觉都重要。”

两个人都乐了。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季青心里很不是滋味，是什么东西，像半透明的磨砂玻璃一样插到他们中间了呢？

秘书夫妻

季青到机关上班向来不坐车。从机关宿舍大院到市委大楼，

只隔着一个圆形广场，半里多路，正好散步。

他走到有着八条放射形街道延伸出去的广场附近时，发现他的秘书孔达正和周奉宛在前面走，孔达推着车子，两个人谈得很亲密。

季青放慢了步子。他是个有点神经质的人，他对秘书看管得很严，甚至常常留心孔达的交往。季青还不知道自己的秘书同周奉宛认识，看样子，还相当熟呢。照说，孔达是个蔫呼呼的人，不算精明，比较安分，这是季青称意的性子，才选来当自己的秘书。孔达也有这么广的交际吗？

周奉宛偶然回头，发现了季青，立刻停步，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戏票，递过来：“今天我们团首场演出《春草闯堂》，欢迎您去指导。”

季青接过票子，说：“不开会，一定去。”

周奉宛落落大方地向孔达摆摆手：“再见。别忘了，把票放下，叫大伙帮助提提意见。”

孔达应了一声，看了季青一眼。

季青对孔达这一眼很注意，心想，干吗要看我脸色？

但季青马上又责难自己过于神经质了，看一眼也一定有什么学问吗？

季青同孔达并肩向市委大楼走去。

季青随便问道：“婚事准备得怎么样了？摆几桌啊？”

孔达的脸红了，说：“不操办。到时买几斤瓜子儿、几斤糖块完了。”

孔达是个书呆子，今年满40岁了，一直没恋爱过，机关的人给他介绍的女朋友总数少说也有一打，可哪次都没成，女人都嫌他呆笨。季青倒以为这是优点，他曾张罗着给孔达介绍女朋友，没想到，季青没等实施，孔达就闪电般地同宣传部的包芳好起来了，机关的人都大为惊奇。

这是自然的。28岁的姑娘嫁给40岁的男人，已经够耐人寻味了，更何况包芳是机关里的漂亮姑娘，有风度、又爱动，好像无论如何不会爱上一个榆木脑袋。

“你们俩是自己恋爱的？”为了破除自己的严肃感，季青故意婆婆妈妈地问起了这件事。

“啊，是……”

“是？”季青晓得孔达不会说谎，一说谎就结巴，就打趣地问：“那么，是你先进攻，还是她先进攻的？”

孔达的脸红得像柿子：“是……这个……是小周给介绍的。”

“哪个小周？”季青问。

“方才……你不是见了么？”

噢，是周奉宛？这倒是季青没有料到的。见季青皱起眉头，孔达又赶紧说：“其实，也不算介绍。”

他为什么又缩回去了呢？

已经走进楼门了，机关干部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同他们打招呼，季青也就不再去问了。

刚走进办公室，孔达提起热水瓶没等走出房门，电话铃响起来。孔达拿起话筒，“喂”了一声，马上掉头瞥了季青一眼，他听出是包芳的声音。他小声说：“我是。有事吗？”

包芳的声音好大：“你酸什么？是正经事。方才部长要我把未来部长接班人的缺点材料整理出来，听说是你们那个老头子要，你知道是什么来头吗？”

孔达的脸刷地一下变白了，回头瞥了季青一眼，双手使劲捂住话筒，答非所问地搪塞：“好，中午我同你去百货大楼……”只敷衍了这么一句，赶忙挂断了电话。

“包芳的电话？”季青看到孔达脸上渗出一片细汗，一边看文件，一边似笑非笑地问了一句。

“嗯，”孔达结结巴巴地说，“她……要我、我，同她去

买……毛、毛毯。”

季青没再追问。孔达逃也似的提着热水瓶走出了房门。

季青心里挺不是滋味。孔达呀，你搞这套把戏，还笨拙一点！

其实，包芳在电话里的发问，季青听得一清二楚。杨铁的秘书为什么关心起她不该关心的事情？纯系好奇吗？那孔达为什么吓得脸白出虚汗？又为什么极力遮掩？他们之间的互通情报是偶然的呢，还是经常性的？一上班，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问，似乎不能说是偶然的好奇。

季青最不能容忍说谎。他有一条独特的法则：凡是说谎的人，一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这是屡试屡应的。

前两天，他在市场上碰上周奉宛，她说买姜是为了给下乡的吴药川治感冒，其实，那天一上班，季青就在机关大门口碰上了吴药川，问过他，他根本没发烧，也没下过乡。这曾使季青很纳闷，这个谎撒得有什么价值呢？哦，是了，周奉宛要在书记面前造成这样一个强烈印象：她丈夫确是公而忘私的。

啊，别忽略了，孔达和包芳的结合，牵线人恰恰是周奉宛，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这边季青在屋子里琢磨，那边孔达在通向开水房的路上，心还怦怦直跳呢。他担心包芳的话叫季青听去了。他有点埋怨包芳，太不懂事了，保密、不传闲话，这是当秘书的起码常识，这也好大声疾呼吗？他对未婚妻过于迁就了。

老实说，他能找上包芳这么个对象，他是相当心满意足的。起初，周奉宛向他提起，要把包芳介绍给他时，孔达怪叫了一声，连连晃头摆手，他认为这是没有半点可能的。

天晓得包芳是不是鬼迷心窍，真的爱上了他！与其说孔达感激包芳，还不如说他更感激月下老周奉宛。她真够卖力气了，为了促成这门婚事，她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不要说所有的见面是

她一手导演的，每次孔达的台词，也都是周奉宛事先为他拟好的。

孔达为了表示自己的谢意，曾经给周奉宛送过厚礼，但三番五次都被吴药川夫妇退回来。他们生了气，反而骂他“庸俗”，“亵渎了同志间的感情。”可是，除了送礼，孔达实在找不出第二种报答的方案，因此一直觉得欠着人家什么，心里很不安。

打了两壶水走回来，路过宣传部长办公室门口时，他本想进去，却又怕时间长了季青会不高兴，只好先回去。

包芳此时可没心思再给孔达挂电话了，从方才孔达的支吾搪塞分析，可能季青这个老头子在办公室里。

杨铁看着在阳台上给仙人掌浇水的包芳，说：“别忙没用的了。趁这会儿清静，我把那份材料的要点同你交代一下。”

包芳放下小喷壶，走回到桌前，打开文件夹，准备听部长口授。

杨铁搔了搔光头顶，说：“季书记真会出新花样。非要写一份有关吴药川、闵桐和宋恭的缺点材料。”

包芳很敏感，怎么这三个人名的顺序有点颠倒了呢？过去每次报材料，都是宋恭打头，然后才是闵桐，吴药川是第三号种子呢！是不是杨铁一时口误？

为了试探一下，包芳故意先写上宋恭的名字，然后说：“那您就先说宋恭的吧。”

杨铁也不去看她，冷冷地说：“注意顺序，首先说吴药川！”

包芳心里像注入了一股活水，不免为吴药川高兴。机关行文，可从来不按什么姓氏笔画排列。现在，吴药川突然由第三号种子跃升为头排人物，说明他在部长、甚至季书记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他有可能成为最有希望的部长人选。

可是，为什么要专门考察这几个人的缺点呢？对了，肯定是季青或组织部门更便于全面考察了解。这其中有没有不信赖杨铁

的成分呢？怕未必没有。包芳知道，管组织的书记齐彬对吴药川印象一向很好，然而季青和杨铁的意见也很具有权威价值。

“这倒是新鲜事，”包芳在文件夹上敲打着手，说：“专搜集缺点，咱又不是为纪委提供处分干部的材料。”

“别多嘴。”杨铁说，“谁能没有缺点？重新审查我，缺点可能比他们要多。缺点也不一样嘛，有性格上的，有工作方法上的，也有意识品质方面的。若全面了解一个人，就得把优点摆够，缺欠摆足。”

包芳不再多言，听杨铁讲。大概杨铁经过了长时间周密思考，他像背书一样出口成章：“你记。吴药川作为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干部，是称职的。如果主持宣传部工作，主管文化、艺术，似乎在业务上有所欠缺，还需要更内行一些。”

包芳一边像电传打字机一样忠实地记录，一边不由自主地精神溜号。是啊，杨铁说的何尝不是事实？宋恭是有文才的人，发表过小说，常写文艺理论文章，是好几个社会科学学会的理事呢；闵桐呢，因为是从文工团里滚过来的，编、导都来得，剧本得过奖，也是个内行。与这两位相比，不得不承认，吴药川的条件自然是稍逊一筹的。

包芳一直听部长口授了半个多小时，杨铁才从转椅里站起身来，说：“上午就整理出来，我过过目，然后送给季青同志。”

说罢，杨铁看看表，说：“车子在等我。上午我到电视台去审查一个电视剧，你就不要去了。”

屋子里剩下包芳一个人，她仔细地回味着部长口述的内容，觉得吴药川还是很优越的。

包芳所以对吴药川这样偏爱，倒不是因为他们夫妇撮合成了她与孔达的亲事（在这点上，她反倒有点委屈感），她感激吴药川，那是因为得到这份满意的工作，是他一手办成的。

包芳是大学生，却在大学生前面冠有“工农兵”三个字。在

她毕业的时候，正是工农兵大学生贬值、不吃香的年代。好些单位，一听说分来工农兵大学生，便摇头哼鼻子。省人事局伤透了脑筋，像拍卖残次品一样，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才把毕业生一批批分下去，可仍然有好些单位三番五次地把档案退回人事局，声称宁可要60年代的中专生。

包芳也不例外，她的档案，便是在报社、电台旅行了一圈，又摆回到人事局干部处桌子上去的。

在包芳有可能去当中学教员时，她意外地遇到了福星。那时吴药川急需给杨铁寻找一个能接替自己的秘书，否则，尽管自己已经被任命为秘书处长，无奈杨铁离不开他，死不肯放，也是问题！而他又不能露出半点不乐意当秘书的意思。事有凑巧，包芳不知托了多少人，拐了多少弯，求到吴药川名下了。吴药川借故到人事局看了包芳的档案，一口应承下来。

后来，是齐彬正式找杨铁谈话，把包芳分配给他顶替吴药川的。机关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吴药川在其间起过什么作用。即或将来有了什么一差二错，也都会由齐彬一人承担。

但是，包芳心里明白，是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她也像孔达一样，曾经买下厚礼到吴家去拜谢，同样被谢绝，而且吴药川根本不承认是他起了作用，他一口一个“是组织分配”。

包芳可没有孔达那么多的呆气，她知道，有比一般礼物更珍贵的东西，特别是她和孔达相识以后，她凭感觉，更加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是以独到的方式来报恩。这一点，她即使对孔达，也没有点破过。

这一阶段，包芳凡是从杨铁口中得到什么消息，总是及时地告诉周奉宛，她不能在吴药川面前嘀咕，她发现吴药川对她不冷不热，多一句闲话都没有。周奉宛呢，听她说什么，也好像似听非听，常是一副漠然表情。一度使包芳灰心了。但她随后发现，周奉宛都是句句认真听了的。而且肯定不过夜地转告了她的丈夫，第二

天，吴药川又准是按着对他有利的方式做出迅速反应的。

去年党内十二条准则刚刚公布的时候，机关的人还都没看到条文，只在报上看到一点摘要。头天晚上，几位宣传部长开会，其中谈到先不忙布置，先听听各支部反映，他们感到这几年好多基层支部思想工作薄弱，这正是检查各支部党风的机会。

当包芳把这个消息告诉吴药川以后，虽说他照例没什么反应，实际却是闻风而动，连夜召集了支部大会，讨论准则精神，向机关党委呈递了向其他支部的挑战书。这事，轰动了机关大院，所有的书记都传看、圈阅了他们文化处支部的挑战书，并且打印出来分发下去。

包芳狂喜，觉得自己对吴药川毕竟是有用的。现在就更不一样了，她的消息来源又多了一条渠道，那就是孔达，是来自市委书记的。有时，包芳也多少有点悲凉感。她觉得吴药川夫妇过于谨小慎微，以至于不分真人、假人，一律防范。不过也得佩服他们，干什么事情都是那么敏捷、利索，不露痕迹、不落把柄，你永远抓不住吴药川的尾巴。难怪机关上下都对他十分敬重。也许，只有她包芳可以摸到吴药川一点什么吧！

过了一会儿，孔达推门进来，小偷似的掩上房门。包芳搁下笔，忍不住格格乐起来。

孔达一进门就开始抱怨：“你呀，毛毛愣愣的！我紧着接话打岔，你还说起来没完。”

包芳自知理亏，一笑，问：“老头子听出是我了吗？”

“怎么听不出来？”孔达点着烟，吸了一口，说：“你还不了解他？恨不得把秘书的手脚都捆起来，嘴上贴封条！”

包芳哈哈笑起来：“若是我当他的秘书啊，恐怕不到一天，就能把他气得发八次昏。”

“他不会要你。”孔达老实地说，“我这出名的榆木头，他都不放心呢。”

应当说，孔达没有故意夸大。季青可不像杨铁，他对秘书看管得严极了，像猫看耗子。只有一般性的材料，他才肯让秘书代劳，机密文件、报告全由他自己动手写。有时外面给孔达打来电话，他总要再三盘根问底，惟恐秘书打着他的旗号在外面招摇过市、惹是生非。

孔达刚当上季青的秘书时，有一回，孔达接外线电话，引起了季青的注意。孔达在回话中说：“你放心，我说了就算数！谁都不用请示……哈哈，晚上就兑现……”

季青在一旁听着，越听越不对味，问他同谁打电话，孔达说是医学院的一个老同学，并且告诉了名字。

季青放在心里，亲自去找医学院的人问，才知道，原来孔达把自己刚从机关领到的石油液化气罐让给了同学，他没成家，暂时没用。

一场虚惊。事后，季青向孔达说起这事，他笑个不停，说：“当秘书也有职业道德呀！有些秘书依仗着领导干部权势，为非作歹，这种事情搞得我快神经衰弱了。”

殊不知，季青即使到了神经官能症的地步，也未必能把秘书看住的——只要秘书心术不正。

现在，趁季青到信访室去的机会，孔达不就溜到宣传部来找包芳了吗？

孔达毕竟有些迂腐，他一直闹不明白，包芳干吗愿意打听分外的事？他觉得包芳是“能不够”。可为了不使她扫兴、摔脸子，孔达又不得不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他讨好的是女友，可与吴药川毫不相干。

孔达抽着烟，问包芳道：“你又多事！叫你写什么，就写什么，非要问个水落石出干什么？”

“傻！”包芳小声说，“你以为我吃饱了撑的吗？”

这一说，孔达当真犯了傻劲，眨着眼问：“那，你在干吗？”

窃取情报吗？”

包芳笑得喷了茶，她差点脱口道出了心里话，转念一想，还不如叫他糊涂着好些。包芳说：“你别管了，将来结婚时，一定告诉你。你先说说，为啥想起来问他们三个人的缺点？”

孔达说：“这几天，季书记到处转悠，他在亲自摸底。连吴药川的邻居他都走访过。”

包芳问：“他没说，到底谁的可能性大些？”

孔达摇摇头：“他能告诉我吗？我看，三个人是不相上下，很难下决心。啊，对了，他说过，吴药川的业务本事差点火候……”

包芳猛然联想起杨铁说到的那一条，不谋而合。她觉得，这条不利的消息，是应当马上传达给周奉宛的。她想了想，对未婚夫说：“有机会，你要给吴药川美言几句，要自然。”

“干吗？”孔达又开始犯傻。

“你不是老愁着没法报答人家吗？”包芳忍不住提醒他。

“用这个方法报答？”孔达抓抓头发，有几分为难。

“算了！”包芳绷起脸来低头去写材料，不再理他。

孔达这才说：“我办就是了。这点事，何必又拉脸子。”

一直哄到包芳脸上又有了笑容，孔达才离开，他说：“我得回去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季书记又回办公室的。”

包芳看看表，8点半了，她估计此时周奉宛已经到京剧团上班了，就操起电话，先拨一个零，然后直拨京剧团演员队的电话。

等了半分钟，包芳听到了一阵快节奏的皮鞋声。果然，周奉宛拿起了电话：“我，周奉宛，你是谁呀？”

包芳报了姓名，先扯了一气儿筹备结婚的事，周奉宛答应去帮她粉刷屋子、布置新房。闲话说完，包芳才把最近消息源源本本地透露给周奉宛，还特地强调了一下吴药川惟一的欠缺是业务本事。

周奉宛在电话里没说什么，反倒笑了：“他就是不行嘛，现上轿现扎耳朵眼也来不及了。反正老吴也不乐意当官。”

不乐意当官，似乎是常人眼里的美德，大概谁都不会称赞一心钻营往上爬的人。放下电话，包芳觉得有几分扫兴，觉得受了冷落，她不知道，吴药川夫妻到底属于哪一种人。转念一想，又觉泰然，她相信，周奉宛的内心，是欢迎这种情报的。

试金石

吃过中午饭，按惯例，杨铁部长是要在客厅那张床上休息一小时左右的。今天他刚坐到床沿上，保姆关阿姨悄然走了进来。

“有事吗？”杨铁话是这么问了，手却在拉毛巾被，鞋子也甩到了床下，那意思是告诉保姆，他要睡觉，雷打不动，即使有事，也得另约个时间。

关阿姨没有兴趣地马上退出，她从冰箱里拿出凉水杯，给部长倒了多半杯冰镇酸梅汤，放到床头柜上，不紧不慢地说：“小周末了。”

一听周奉宛在等他，杨铁有如注射了一支兴奋剂，一时睡意全消，一迭声叫着：“快请进来、请进来！怎么不早说。”

关阿姨退出去，少顷，周奉宛矜持地笑着，走进客厅。

杨铁亲自端了那杯没喝的酸梅汤，送到周奉宛跟前，看着她的脸。

周奉宛长吁了口气，拿手绢扇着凉风，说：“那件事，给您办得差不多了。”

“那件事”，不就是指儿子栋栋出国留学而言吗？他这几天像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呢。在他看来，这是比登天还难的事，竟然有了眉目，他欣喜自不必说，也暗自佩服这女人的本事，竟比他这个宣传部长有活动能力。

杨铁是不会像常人那样，轻率地露出惊喜、感激之情的。他只是平淡地“唔”了一声，说：“可不能盗用我的名义啊！搞出不好的影响，要造成不良后果的。要办，也要通过正当手续。”

看他那样子，好像一点都不放在心里。周奉宛心想，你不急，干吗一天叫保姆几次打电话找我？

但她没有捅破这层纸儿。她说：“那自然。出国自费留学，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有批准单位，有接收大学，一切手续都是合法的，用不着走歪门邪道。”

见她不住实质问题上说，杨铁有点焦急，却又不好表现出来，顺手拿起一张《参考消息》心不在焉地浏览着。

周奉宛话锋一转，却说：“不过，功亏一篑，出现了一点麻烦，卡在省公安厅主管签字的邢处长那里了。”

杨铁移开报纸，问：“为什么？”

周奉宛嫣然一笑：“其实，也可以说什么都不为。那个处长纯属私人成见，对您不太满意。”

杨铁眨着眼，有点纳闷：“我连公安厅的一个处长都不认识呀！井水不犯河水，对我有什么意见？”

周奉宛进一步点明说：“春天，邢处长有个女儿从部队文工团复员到地方，想安排到市电视台当演员，好像叫您给驳回了。”

这类事太多了，他哪里记得住？杨铁经常给所属各系统的头头写条子安排人，也常挥笔批上“不同意”、“不能办”之类的话。几十年来，杨铁还没有碰上过正面报复他的人呢（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例外），想不到公安厅一个小小的处长竟然明目张胆公报私仇。杨铁仔细回忆了半天，到底想不起这桩公案来。

现在怎么办？船到江心补漏迟啊。

周奉宛看出了他的心思，就说：“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其实，您说一句话，把他女儿安排到电视台，就完了，这又并不违反原则。”

“不行。”杨铁说，“电视台编制满了，我给他们下过死令，一个不准进。我能带头破坏制度吗？”

这也难不倒周奉宛，她嘻嘻一笑，说：“可以带编制去嘛，电视台白拣个人，怕他们不乐意？筹建曲剧团不是还有十几个指标吗？必要时，拨过去一个指标就完了。”

周奉宛竟这样内行！对文化口的编制都摸得这样准，杨铁不能不疑心这主意是她丈夫吴药川出的。是他出的又怎么样？还不是出于要安排你杨铁的儿子吗？

不过杨铁晓得这事的利害，万一弄得画虎不成反类犬，被季青抓住了把柄，不是玩的，快要退休了，一个人的晚节那是比黄金都珍贵呀！

因此杨铁经过权衡利弊后回复周奉宛说：“不行，不能胡来，这不成了搞人事交易了吗？能办就办，不能办听其自然。”

他顺势倒到床上去，表示不再愿就此事探讨下去，周奉宛也有点索然寡味，悄悄退了出去。

今天有点反常，杨铁没有睡成。往常，他中午这一觉是至关重要的，头一放到枕头上，立刻打起呼噜来，今天却烦躁得要死。

看看快到两点了，他翻身坐起来，正要穿鞋下地，儿子栋栋走进来，气势汹汹地说：“爸爸，给我 500 块钱。”

那神情，好像年关逼债的债主。

杨铁皱起眉头来：“干什么？”

栋栋说：“干什么？你又不能养我一辈子，我得自谋生路啊！明儿个你一退休，我更是两眼摸黑了。”

杨铁问：“自谋生路靠力气、靠本事，要钱干什么？”

“本钱！”栋栋煞有介事地说，“我入股了。我们六个人，组织了一个东方贸易货栈，准备同港商挂钩，从广州往回运港衫、收录机、电饭煲，往南运人参、木耳、发菜、兔毛。干一趟，少

说赚千儿八百的。”

杨铁听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使劲从床上往起一站，吼道：“住口！没出息！你还要去投机倒把、走私贩运吗？”

杨铁能不发火吗？目前，正在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分子，杨铁一直庆幸自己的几个子女没有半点瓜葛，想不到儿子倒要顶风上！

见老子不给钱，栋栋就在客厅里又哭又吵，埋怨爸爸不管他，声称要离家，脱离关系，今后好坏不用父亲管……闹得病在床上的孙静都惊动起来了。周奉宛也没走，赶来左劝右劝，好歹算把栋栋推出去了。

杨铁气得浑身乱抖，孙静坐在床边流泪。

这时周奉宛说：“唉，二十好几的人了，谁没有自尊心？总没个事干，弄不好，容易被人拉下水、走邪道。”

这几句话，倒是正好说到杨铁心里去了。他对儿子有点恐惧，他觉得这一代人心上有一股邪劲，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假如管束不力，有朝一日栋栋成了犯罪分子，那他杨铁一世的清名，也就泡汤了。如今之计，最好是给他找个事干。找一般的职业，也是容易惹人说三道四的，何况栋栋眼高手低，当工人他还干呢。

那么，能出国留学，不就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吗？

午睡前的决心又动摇了。

杨铁一边穿外衣，一边问周奉宛说：“那个处长的女儿现在在什么单位？”

周奉宛听话听音，马上明白了部长的意思，立刻回答说：“在一个区五金厂当钳工。这不要紧，先以工代干，有机会再转干也容易。杨部长给电视台孙台长打个电话就行了。”

杨铁摇了摇头：“不，我不能出面。”

周奉宛又明白了部长的意思，想吃鱼，又不想沾腥味。她沉

吟了一下，说：“除了您，与这事最得力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药川，一个是闵桐，另一个不能算了，宋恭在下边。药川是您部里的人，如果他出面，不打您的旗号，也等于是您出马了……”

“叫闵桐去办吧。”杨铁果断地说了这一句，抽身往外走，“呆会儿我找他，你们不要张扬了。”

周奉宛有点意外，她自然希望闵桐当这根出头椽子。可是她没有料到，杨铁会这样痛快地同意叫闵桐为他办这桩私事。闵桐脑瓜僵，有一股子书生的呆气，这是机关里尽人皆知的“小原则”。前年文化局举办小戏评奖，有一个作者，小戏虽然写得不是怎么样，可人倒挺随和。他一听到评奖委员会组成的消息，立即从家乡打点了十筐国光苹果，运到省城来，所有的委员一人送一筐。委员们乐得白吃60斤苹果，收下了，却又有点犯难，主任委员是闵桐，这么直来直去把苹果筐扛到他家去，他肯定不要。处里几个人一合计，来个掩耳盗铃术，假说办公厅从水果公司批发来一批出口落选苹果，五分钱一斤。闵桐听说人人都有，又是机关搞的福利，收下了，付了三块钱。事有凑巧，闵桐的邻居老曾就是水果公司的，年年秋天要处理一批不易保存或果窖收藏不下的水果，照例来问问闵桐，要不要一筐。老曾知道，他岳父一年到头大便干燥，靠吃果导片和牛黄解毒片通便润肠，如果能多吃点水果，会代替药效的，所以尽管闵桐日子过得相当拮据，每年都买一筐。批发价，总比市场零售要便宜一些。

这次老曾来问，闵桐笑呵呵地辞谢说：“谢谢费心想着。前两天，机关分了一筐，也是在你们水果公司批出来的。”

老曾眨眨眼：“不会吧？我是主管批发的呀！今年还一筐没处理过呢！你说说牌价吧，我就知道是什么渠道来的了。”

闵桐老老实实地说：“今年更便宜，三块钱一筐。”并且拿出一个苹果让他看。

老曾大笑起来：“我说，你太书生气了！这不等于摔个跟头

白拣吗？今年一等果的收购价都提到一角五分了，会有这样的美事叫你们摊上？老兄，不是我多嘴，你这筐果，我看有点怪味。”

一句话点醒了闵桐。他立刻跑到办公厅去，一问，才知道办公厅根本没批来过苹果。闵桐明白了，这是处里的几个人玩了鬼，只是瞒住他一个人就是了。他没有声张，因为还不知道下文是什么。

终于叫他摸到了线索，这不是通过调查得来的，完全凭他的认真和敏感。在第一轮评选剧本时，有人提到小戏《祝愿》不错，一呼百应，人人称道。这使闵桐警觉起来。这些委员们，都是戏剧通，全国叫响的戏，他们都能挑出叫你不得不认为成理的问题来，这么一个艺术粗糙、思想性又不强的小戏，会受到众口同音的喝彩？况且，这个话剧团在省城演出《祝愿》时，第一场只有半数座满，还有一大半是免费招待的，出于礼貌，人们才坚持到散场离开。买票入场的人，看到一半，几乎走光了，一路骂声不绝。从第二场开始，剧组撒下人马，在商店门口、电影院前，公园“蛇展”那里，下死力兜售戏票，才算又维持了一场，第三天，他们便偃旗息鼓，自动拆了景片子打道回府了。

这样的戏，会成为评奖委员心目中得奖的作品？

闵桐提出了相反意见。

这若在平时，主任提出否决，一般不会有人去为一出戏辩解了。这次出奇，好多人面红耳赤地力争，甚至说出了这样与剧本评奖本身毫无关系的话：“作者是50年代的老作者了，参加过抗美援朝，负过伤，文化水平低一点，就算是照顾一下情绪，也是应该的。”

闵桐从直感上确认，这是苹果起了作用！他恍然大悟，这个作者不是生活在苹果之乡的吗？

闵桐不客气地掀了老底，按市场牌价付足了苹果款，下令别人也照办，才算了结了这场纠纷。

这样不圆通的闵桐，会替杨铁部长出力，到电视台当说客，去为公安厅邢处长安排女儿吗？杨铁会这样不了解他的下级吗？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周奉宛此时此地，可没有摸透杨铁的心思。

杨铁是要把这件事当成一块试金石来用的。他坐到汽车里直驱机关时，还不免为自己的设计得意。

多少天来，他一直为不摸闵桐的底而苦恼。闵桐的刚直、本分，他早有耳闻，昨天他给季青的材料里，提到闵桐的缺点，只有一条，那就是群众关系有待改善。其实，杨铁还不知道闵桐的“群众关系”为什么紧张吗？

从能力、从工作，乃至党性方面，他挑不出闵桐的毛病。但是，如果把闵桐推到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去，他是捏一把汗的。他总有一种预感，这种人手中的权一旦大起来，皇上老子他都不会认，更何况他这个宣传部长呢！

耳闻毕竟不如眼见，闵桐没有同杨铁有过私人往来，见了部长，他也没有下级通常做出的那种卑躬屈膝相，看上去有点恃才傲物。他对他的同事、下级那么原则，对上级也会是这样公事公办吗？他曾动过试他一试的念头。

这机会不是来了吗？自己不是表白过对闵桐“放心”吗？那当然是指工作上的一丝不苟、气魄，别的，是不是也都放心呢？关键在此一举。

如果他答应办，而且办得很漂亮，连蛛丝马迹都不露，说明闵桐可以信赖；他要是顶着呢，那就……

又一个影子跳到脑海中来。这是吴药川。

万一闵桐事事如意，那么吴药川往哪摆呢？从私人感情来说，吴药川夫妇是杨家的恩人，就冲他们为栋栋出国的事所费的心思……

可是，别人会不会说你杨铁徇私舞弊、重用亲信呢？不，说

不出。从客观条件讲，吴药川和闵桐、宋恭旗鼓相当，这是人所共知的。而吴药川同杨铁的关系，又是人所不知的，你即使请来包公，也断然抓不到吴药川一点把柄。

杨铁不得不承认，吴药川是个极有心计的人，说得好听一点，人太聪明了。现在回想起来，周奉宛对杨家所做的一切“牺牲”，吴药川未必不是背后的牵线人。什么“未必不是”？他肯定是。他自己不露面，有计划地打出“夫人外交”这张牌，再一步步按他自己的设计图付之实施。他是这场竞争中的强者！

杨铁有点毛骨悚然。这算不算有野心的人呢？给这种人搭梯子，会不会使党和工作受损失呢？

杨铁多少有点后悔。干吗没有早一点看清这一步棋呢？现在抽身退步是不是有点过迟了呢？

然而杨铁总还有点不信，吴药川会是那种人吗？你能拿出一条可以成立的证据吗？不能！他不由得想起了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吴药川告了现任文化局局长老丁头一状。

当然了，老丁头有毛病。他私自决定挪用外县建立农村文化站的款盖机关宿舍，这确是违反财经纪律的，买酱油的钱不能拿来打醋嘛！可是，为什么吴药川早不揭、晚不揭，单等破土动工，建筑材料一应齐备，已经木已成舟时，他才捅到纪委去了呢？是不是看到老丁头退休在即，对他没有用处了呢？很可能是这样。要知道，据杨铁了解，从前吴药川和丁局长还是“生死之交”呢。1968年大型武斗时，吴药川和丁局长都被圈在市委丁字形大楼里。半夜时分，大楼被炮火打着，“黑帮们”夺路而逃，吴药川连拉了7天痢疾，虚弱得一步都走不动，眼睁睁看着人们都跑光了，看看只有烧成灰烬时，已经逃出去的老丁头想起他来，又冒着封门的大火，顶着一条淋上水的湿棉被，冲进火海，上了二楼，把吴药川从险境中背了出来。

对救命恩人尚且如此，何况别人呢？想到这里，杨铁不禁心

里打哆嗦。

可是，杨铁马上又否定了这种推想。怎么能这样看问题？难道吴药川包庇丁局长的错误倒是对的？共产党人不是提倡大义灭亲吗？若换成自己，难道可以把这件事包容下来吗？何况，在丁局长受了党纪处分，住了医院后，拿了水果、罐头第一个登门去探望他的，还是吴药川。也许，这样的同志关系，才是最无私、最值得称道的呢。

一时，杨铁又觉得自己亵渎了吴药川、周奉宛夫妇的好意，把人家想得太坏了。

不知不觉中，车子已经停在市委大楼“悬冠”下了，杨铁这才从胡思乱想中清醒过来，懒懒地推开车门。

看不见的“网”

这是晚上下班以后的时间，季青把孔达打发回家了，关照司机可以自便。文教书记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个人了，显得空空荡荡。耳畔是阵阵蝉鸣。

三面的窗子都敞开着，风在屋子里形成对流，不用吹电扇，屋子里也很风凉。季青站在门口，漫无目的的望下去，院子里花树的影子和大楼的影子交错在一起，形成暗度不一的交织带，十分迷离；还有那些电线、树枝投在地上的影子，简直像一张奇怪的网。

季青心头笼罩的阴影更要重些。

这几天，他都在研究吴药川这个人。你去访问、闲谈，听到的反映，几乎都是好活，没有人非难吴药川。

一个完人？

季青反倒信不實了。多年来，凭经验，他敢认定，一个叫人提不出缺点的人，可能荫蔽着致命的缺陷。一个人，怎么可能叫

所有的人说好呢！

是不是犯了经验主义？他又否定不了自己的立论。

他终于在一个极偶然的的机会，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口。

季青昨天到 35 中去了一趟，找到了关阿姨上初中的二儿子，闲谈之中，他发现，孩子对母亲当保姆很得意。一个月赚 20 元钱有什么可高兴的？那孩子说，不止 20，周阿姨每月贴补 15 元呢！

没有企图的人，谁肯干这种傻事？

季青分明看出了周奉宛给杨铁推荐保姆的背后阴影。

接着他查问了包芳的来历，名正言顺，是人事局分配，齐彬点头，杨铁同意的，与吴药川毫无瓜葛。可是，齐彬无意中露出来，包芳是吴药川举荐的，并非大学直接分配来的。

事情怕联想。那么，包芳同他的秘书孔达的结合，怕也不是偶然的了，孔达为什么承认周奉宛是介绍人，继而又慌忙否认？

当然，即使这一切都是事实，你也没有理由导出结论，证明吴药川有什么不轨行为。但是，做了事情，却又不留痕迹，这总是叫人疑心的。

吴药川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对于像季青这样的“老原则”，他表现得比“老原则”还原则，讨他喜欢；对于杨铁，他可以按部长喜欢的口味下菜碟；对于生活困难的同志，他能够主动为他们报请困难补助费；对于文化局长老丁头的违犯纪律，他又能破了脸斗争。工人说他“没架子”，干部们说他“通情达理”，领导们说他“原则性强”……真有趣！

季青记起来最近看过的一本西方政治家的回忆录。里面有一章写到了一个野心家，他善于在政敌中间周旋，使角斗的各方都把他当成知己，他利用这种平衡术，到底达到了出人头地的目的。一旦上台，不动声色地扫除了一切政敌，因为这些人的弱

点、把柄全在他手中。

季青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哪怕选一个有明显缺点的人掌权，也不要紧，只要他的缺点是表面化的，那是可以在党和群众监督下克服的。倘若是利己主义者上来，那危险性就太大了。

此前，他对吴药川的印象一直是好的，如果当时常委会讨论表决未来宣传部长的人选，他本来会毫不犹豫地首推吴药川。现在，他有点动摇了。

他有点自我嘲弄地想，你呀，是有过几十年政治斗争经验的人，自以为是一眼可以看透一个人的，现在怎么说？你不也一样受蒙蔽吗？你被人家包在网里，为人家鸣锣开路，却不自知呢！

是不是又神经过敏了呢？假如是误解了一个好同志，那你可太不像话了……还是先下结论吧，好在还有时间。

季青从窗口走过去，从卷柜里找出一副象棋，可惜缺了一个老帅，便拿墨水瓶盖暂代。他逐渐冷静下来，在等待闵桐的到来，是季青约他来的。

6点30分，闵桐准时敲响了书记办公室的厚重橡木门。

季青喊了声“请进”。

闵桐有点拘谨地推开门，说：“您找我吗？”

为了和缓气氛，季青捋了捋衬衫袖子，说：“来，杀一盘，人家都说你多才多艺，看你能不能赢我这老头子！”

闵桐当然不会相信书记专门约他来是为下棋消遣，何况他还是第一次走进季青的办公室呢。若换成一般人，就会讨人喜欢地坐到棋盘前，明明能赢，却故意输给首长以博欢心。

闵桐果然有点呆气，他说：“何必下棋耽误时间呢！我知道，您找我有事情谈，您谈好了，不用考虑我能否接受。”

一听这话，季青先自有三分欢喜。他哈哈一笑，说：“小伙子，你倒没有一点世故啊！”他从茶几下搬出一盘血红色的水蜜桃来，自己先抓一个，啃了一口，让着闵桐说，“这个，总可以

吃吧？”

闵桐乐了，拿起一个桃子。

“听说，你们在抓进京汇演的剧本，是不是？有没有能打响炮的？”季青问。

“郜建义的剧本很有前途，正在改，是写工厂体制改革的，挺尖锐。现在改到第四稿了，立起来过一次，内部看了一下，提了意见。”闵桐答。

季青又问：“你亲自挂帅吗？”

闵桐笑了：“这不用挂帅。作家的艺术风格应当尽可能保持完整，木匠多了，盖歪房子。我觉得，惟有文艺创作，不能搞百团大战。兼听可以，大家起来动手，好戏也得改砸了。”

季青点点头：“剧本叫什么名字呀？”

闵桐说：“叫《这一代人》。”

“唔，”季青说，“有点时代气氛。等你们彩排时，能不能送我一张观摩券呀？”

闵桐说：“到时候，当然要请您去审查。”

“干吗叫审查？”季青说，“我也是个观众嘛，只代表一票。我希望，你这艺术处长那一票，也不要成为具有杀伐大权的特殊票。管文艺，不能像检验工厂产品那样，拿卡钳卡，那样，越管越死，要看主流。”

闵桐表示赞同，渐渐不拘束了，他主动讲述了戏的故事梗概，讲到兴头处，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表演起来，逗得季老头不住地抚掌大笑。

“省委关于‘三种人’的文件，你们局里传达了吧？有什么反映？”话题一转，季青问道。

“基本是拍手称快，”闵桐说，“个别十年动乱时造过反的人有点沉闷。”

“这自然。”季青说，“不过，也不要背包袱，不是听说有参

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叫‘三种人’，那么算，恐怕我这挨过斗的也得算‘三种人’了。”

闵桐笑了起来。

季青趁机直截了当地问道：“我听说，1975年，你给王洪文送过5斤人参，这事是谣传吧？”

“是真的。”闵桐老老实实地说。

季青多么希望这是假的呀！他的情绪有点低落了：“那，你从前为什么没谈过？”

“我揭发过呀！”闵桐说，“远在1976年8月，‘四人帮’还没跨台的时候，我就向中央报告了这件事，王洪文还带走了其他一些高级东西。”

季青有点莫名其妙，心想，你送礼，倒去揭发，揭谁呢？

闵桐看出了季青的疑问，就解释说：“其实，只能说是我捐的。捐给谁，我并不知道。那天下班时，我要到宾馆去结会议伙食账，当时的军代表拿了这包东西，叫我捐给宾馆岳经理，我问给谁，他说，交给老岳就知道了。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这是捐给王洪文的礼物。”

季青长长地吐了口气，如释重负。他又问：“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闵桐说：“岳经理知道。还有吴药川知道，我揭发此事时，告诉过吴药川，万一我出了事，叫他接着上告。”

季青百分之百地相信闵桐的诚实，他甚至用不到再找人核实，就可以确认，闵桐不但没有什么过失，反而是斗争性很强的党员。

伤脑筋的是那封告状信。究竟是什么人写的呢？如果是听到传闻，捕风捉影的人写的，倒没有什么，假使是有意栽赃，那倒有点学问了。

季青放下这件待查的公案，又扯起了别的：“你跟吴药川是

朋友，是不是？”

闵桐点点头：“老朋友了，比着肩膀长大的。”

季青又问：“你对他的印象一定很好了？”

闵桐说：“他很能干，有组织能力。还是孩子时候，他就显示了非凡的才能，大伙总是公推他当‘小领袖’。”

季青笑道：“那么，同你比呢？”

闵桐说：“比我强。他有工作方法，懂得领导艺术，所以群众关系比我好。”

季青注意审视着闵桐说话的表情，看不出一点虚情假义，有的是十二分的坦率、真诚。

停了一会儿，季青又问：“听说他同杨铁家关系处得不错？”

闵桐瞥了季青一眼，说：“那是周奉宛的关系，她热心，好交际。有一回，我在吴药川家，杨铁的儿子去找周奉宛，周奉宛送走了栋栋，吴药川还不高兴地批评过小周，叫她今后少去杨家呢。”

季青没有再往下问。他自然不好动问周奉宛推荐保姆的事。这一席谈话，季青感触颇深。如果按一般人的观点看，闵桐无疑是个方正君子，从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种人永远不会干出越轨的事来，可以放心。他如果掌管一个部门，肯定不会搞自己一套马车。可是，也有弱点，他心眼太好，反倒难于明察秋毫了。

这时，闵桐突然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要求：“我想回到剧团去，从事创作，或者去当我的导演。”

“为什么？”季青一时转不过弯来。

“我不适合当领导。”闵桐说，“真的。我也不愿意夹在一种没意思的争夺中，何况，我迟早要走这一步，不如自己提出来好些。”

季青突然发觉，自己方才的结论是欠准确的，谁说闵桐不明

察秋毫？他所说的“没意思的争夺”，不是暗指未来宣传部长的人选吗？这就是说，他已经意识到，他不管主观怎么想，他已经不可避免地处在漩涡中心了。

那么，他指的“迟早要走这一步”，又是什么意思呢？

季青问道：“你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你能不能向我摊牌？”

“不能。”闵桐孩子似的说，“因为，有些还是感觉，感觉是不能代替事实的。但是，请您相信，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一句话说得季青心坎热乎乎的。在党内需要肃清不正之风的时候，有人郑重宣称自己没有忘记是个共产党员，这句听起来极为普通的一句话，却是多么有分量啊，它唤起了季青多少值得回忆的回忆啊！

季青不强人所难，他同闵桐使劲握了握手，一直送他下楼，看他骑自行车消失在林阴道上，季青仍旧站在大楼门前的“悬冠”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是啊，“感觉不能代替事实”，说得多好啊！一个多么持重的党员！自己又何尝没这样想过？对杨铁，不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令人不舒服的“感觉”吗？你不是也没同人家摊牌吗？

但是，同几天以前相比，季青已经由“感觉”升级为“触到”什么了。

他再一次感觉到了那张在暗处悄悄张起来的网。或者，连闵桐也是感觉到了网的存在。假如织起这张网是有意的、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那就很可怕了。

季青觉得，斩断看不见的网，要比当年扫清战场上的碉堡、鹿砦要难，那是因为，我们的某些干部，本身就是网中人，或是这网的一部分，而且自己还不察觉。

生活连续剧导演

杨铁脸上像挂了一层霜，下了班，一头扎到客厅里生闷气。

闵桐连敷衍都不肯敷衍一下！杨铁上午亲自找到文化局，同他谈了那桩事。闵桐当时一笑，说：“这事干不得，此例一破，后果不堪设想。何况，电视台不准再进人，这是您的死令，再由您开门，更不行了。我不知要办的人是谁的女儿，她就是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我看也不行。”

话不投机，杨铁反倒被下属教育了一遍，他当时二话没说，推门就出来了，自然也算是给闵桐一点脸色看。

闵桐也真算有本事。上午他给部长吃了闭门羹，下午就拿了一份名单去找部长签字，新成立的曲剧团一下子进 13 个人。

杨铁气不打一处来，把名册往桌上一扣，说：“还进人？要缩编，你不知道吗？”

闵桐说：“这不对呀！这是省计委和编制办公室上个月才批的编制啊。”

杨铁自知理亏。找借口说：“人员总要再审查一下吧？我这点权力也没有了？”

闵桐寸步不让：“人员全部是落实政策回来的老艺人，人事处审查过 3 个月了，您不是一个个审批过了吗？我是来找您签字的，这 13 个人早都来了，住旅馆，花了那么多冤枉钱，您签了字，好马上办落户手续。”

杨铁说：“先放这儿吧。部务会议还得复议一下。你要认为没这个必要，你就拿去办好了。”

闵桐没有吵，也没有闹，又心平气和地汇报了进京汇演的剧目准备情况，直到杨铁不耐烦地闭起了双眼，他才不得不开。

一想起这一天恼人的情景，杨铁气得现在还打哆嗦。这还了

得？翅膀还没硬呢，就盛气凌人了！哼，瞎了眼，“放心”？他哪一点可以放心？他一旦当上了宣传部长，不剜坟掘墓才算怪呢！

可是，杨铁却拿他毫无办法，即使你暴跳如雷，他还是那么有涵养，仍然若无其事地向你汇报工作，做到他应当做到的一切。何况，这种反感是端不到桌面上来的。

吞了两片安定片，喝了一杯浓茶，杨铁渐渐平息了怒气。他忽然又觉得脸热，仿佛看到闵桐那双眼睛在对面盯着他，那是一双充满讥刺神情的眼睛！闵桐好像在说：“你还有点党性吗？你给下级树立什么榜样？你公报私仇，拿工作出气……”

杨铁打了个哆嗦。

是有点过分了！假如换一下位置，闵桐是部长，自己是处长，他这样对待自己，自己会怎么样？

难怪季青暗示自己变了，真的是官气越来越重了……这事若叫季青知道，他会怎样说？说不定要来一顿炮轰！季青一定又说起“从前”……从前，从前是令人向往的，可是今天毕竟不是从前了。也许，季青正因为事事总抱着从前的老“黄历”，才弄得格格不入，总是被人防范的角色。

杨铁想起了昨天晚上做的梦，他是哭醒过来的。他梦见了同他一起参军的放羊娃裘三宝。裘三宝是在攻打太原的战役中倒在他脚边的。

裘三宝在梦里出现，浑身带着好多血，他对杨铁说：“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我看不见全国解放的日子，你若能活到那一天，可要好好干哪，别忘了倒下去的人……”

他哭醒了，心怦怦地跳。回味梦境，他感到惭愧。

此时他的心底，仿佛并存着两个杨铁，一个是从前的，一个是现在的；或者说，一个是用党性衡量的杨铁，一个是替自己打算的杨铁。这两个人在打架，相互间猛烈攻击，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把杨铁的脑袋都搞晕了，就是生不出第三个可以仲

裁、调停的杨铁来。

这时，孙静在关阿姨的搀扶下，走了进来。孙静问：“什么事，生这么大气呀！”

杨铁说：“闵桐这小子，在我面前讲起原则来了！我亲自上门，叫他在电视台安排个人，他不办，反倒训了我一顿。”

关阿姨觉得自己在场不便，急忙退出房门，站在走廊里听了几句，忽然想起周奉宛的嘱咐，赶忙给她挂了个电话，只说了一句：“那件事没办成，顶回来，部长正在发火。”

10 分钟后，周奉宛就赶到了杨家。

这时杨铁已经消气，坐在那里有点发呆，见周奉宛进来，勉强笑笑，让她坐。

周奉宛似乎有意又似乎无意地说：“是您打发闵桐到季书记那里汇报去了吗？”

“什么？”杨铁瞪圆了眼睛。

周奉宛说：“您不知道？季书记单独同闵桐谈的，把孔达都赶走了。”

这消息如同一个炸弹，炸得杨铁目瞪口呆。还用问吗？闵桐到季青那里去告黑状了！真是不隔夜呀，他说不定在借机抱市委书记的粗腿，看我这个即将离任的部长没有用处了！

这样的势利眼，发展起来不是野心家是什么？

至此，三个未来宣传部长的人选，已经有一个从宣传部长的名册上一笔勾销了。他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服季青，季青不是最讨厌搞小动作、找靠山的干部吗？

当着周奉宛的面，杨铁不好露什么，但是对吴药川的好感，与对闵桐成反比，猛增了几倍。

周奉宛是有眼力的女人，凭着杨铁亲手打开冰箱，给她倒了一杯冷饮的举动，就可以判定，她说什么，都不会讨嫌。

周奉宛啜了一口桔子汁，问道：“那件事，落实了吗？”她这

是明知故问。杨铁碰了闵桐钉子的事，早有耳报神关阿姨告诉她了，她正是为此事来的。

杨铁不想把“走麦城”的不光彩事告诉她，只是叹口气说：“我们总是容易把事物看简单了，以后再说吧。”

周奉宛没有戳他伤疤，却用极为轻松的口气说：“这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别说是您吩咐下来的，就是您儿子求到我名下，也该办的。您放心吧，事情已经办妥了。下星期一，公安厅邢处长的女儿就可以到电视台去上班了，导演连角色都给她号上了。”

杨铁半信半疑，问道：“当真？”

周奉宛笑起来：“这玩笑开得吗？”

杨铁又问：“谁去办的？”

周奉宛卖关子地说：“这您就别问了。反正给您办事的人是信得过的人，也是不指望图到什么好处的人。”

她虽然没说，还是等于说了。除了吴药川，还会有别人吗？他真佩服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吴药川，平日里走起路来脚步轻得像个幽灵，说话都从来不用大嗓子。可办起事来，总是爽急、麻利，常常在你不知不觉中已经大功告成了。

事情怕比。相形之下，吴药川要比木头橛子一般的闵桐会来事多了。

会来事，到底算优点，算缺点呢？

正在这时，走廊里的电话铃响起来，栋栋“喂喂”地呼叫两声，对客厅里喊道：“爸爸，电视台有人找您。”

杨铁心情已经渐趋平静，他走去接电话。电话是电视台的导演小孟打来的。小孟是个“自来熟”，见人嘻嘻哈哈，很平常的话，一到他口中，就增加了不少喜剧色彩，大概因为他有这点职业病，所以他给省委第一书记打电话都是不打怵的。

小孟在电话里说：“杨部长，我这人天生是个挨骂的角色。我又来找挨骂了……”

杨铁叫他逗笑了：“你别跟我演戏，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小孟说：“那我可要念台词了！咱们不是要拍电视剧《合家欢》吗？这可是您亲自审批的剧本，大伙都指望今年拿个大奖什么的呢，您说过，有啥困难找您……”

杨铁说：“你少哄我，要人要物？”

“当然都要，”小孟说，“当务之急是人。到现在为止，演二妞的女主角还没有呢。”

“你尽管到各剧团里去挑，要不动，找我。”杨铁说。

小孟说：“京、评剧演员受不了，一开机器就给你走台步，水上飘似的，半年顺不过架来；话剧演员一个个龇牙咧嘴猛做戏、猛夸张，更费劲。”

“那你想怎么办？”杨铁耐住性子问。

小孟说：“我自己物色了一个。形象好，口齿清爽，戏打人，很有生活，那剧本的角色简直就是为她写的。”

杨铁问：“是哪一个？”

小孟说：“姓邢，工厂的。”

杨铁心里一动，恍然明白了，这便是公安厅邢处长的女儿无疑，不会是巧合。他有点纳闷，既然方才周奉宛已经向他暗示，是吴药川为他办妥了这件事，干吗小孟又来找他这部长呢？

在他沉吟的时候，小孟说：“我可先斩后奏了！反正找谁都不点头，吴处长也不批，您又有过令，电视台不准进入。可您没有说急需的、特需的不能进吧？若不，我不导戏；若不，我就要这个人。从工作出发嘛。我知道您会顶回来，那我也要用，没人开工资，从我那62元里分她一半！”

杨铁动开了脑筋。看来，这一切都是吴药川的拿手好戏，他在导演电视导演小孟！你看，事情又要办成，又要把吴药川和杨铁摘得一干二净，万一出了事，小孟会以“工作需要”为理由全部揽过去，你能把一个导演怎么样？时间久了，木已成舟，部

长、处长、台长再虚应故事地把小孟批评几句，也就过去了，谁都不担责任！

杨铁虽然不掏吴药川的心，也可以确认，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连环套。

杨铁深知自己在导演面前应当怎样表演，于是他在电话里说：“胡来！尽干先斩后奏的事，将来我要查出你用的人不会演戏，我可饶不了你。”

他挂上了电话，对自己的表演十分满意，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一切都是活口，本来是杨铁要办的事，闹来闹去，他倒成了“受蒙蔽”的领导，太有趣了。

这个及时的电话，全部证实了方才周奉宛的话句句是实。这样说来，公安厅邢处长会为栋栋出国留学的事大开绿灯了，杨铁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但是，冷静下来以后，他也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对吴药川怎么办？你只好全力以赴地把他推到宣传部长的椅子上去了！

这不是任人唯亲了吗？

不，他本来就是三个后选人当中的一个呀！况且，有谁知道骨子里的微妙关系呢？

可是……良心呢？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呢？

这涉及到良心什么事？吴药川既不是“三种人”，又不是有劣迹的干部，他当了宣传部长又不会在他的地盘里搞修正主义！

人无完人，谁没有私心？只要吴药川主持宣传部工作，那，宣传系统仍然等于是没有杨铁的杨铁执政！不知为什么，近来令杨铁坐卧不安的，是他总担心后来者会全盘否定他执行过的一切！当然这没有根据。真若是那样，他即使退休了，也会被气死，他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至少不能发生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不能发生在他培养的第一代接班人身上！

这时，有人在敲房门。

“谁呀？”周奉宛走过去开门。

门外一个男子怯生生的声音：“是我，杨部长在家吗？”

周奉宛回头瞄了还站在走廊里的杨铁一眼，那是征询是否接待，好决定挡驾与否。

大概因为心绪好，杨铁和蔼地点点头，示意周奉宛开门。

进来的人 40 岁左右，头发有点蓬乱，戴着深度眼镜。看来这是不修边幅的人，半袖白衬衫上面有油渍，两只裤腿一只吊得老高，另一只拖到脚面上，赤着脚，拖着人造革凉鞋。

杨铁不认得他，上下打量他几眼，问道：“你找我？”

那人赶忙自我介绍：“我是戏剧创作室的，叫郜建义，我想……跟部长谈点问题，太冒昧了，没有事先同您约个时间，就闯来了。”

“没关系，”杨铁说，“要来就来嘛，打什么招呼？我这又不是深宫禁地！进来坐吧。”一边说，一边带郜建义到客厅去了。

杨铁一定见过郜建义的，说不定在文艺界的新年茶话会上，或者是另外什么接见剧组的场合。不过，杨铁一般不大留心编剧，而在前台露脸的演员，他倒大多数认识。这个郜建义，名字是满熟的，听说很有点水平。可杨铁向来对文人的作风不大满意。

因此，一落座，杨铁就半开玩笑地说：“留长头发呀，不刮胡子呀，邋邋遑遑呀，只有这样才算艺术家的风度吗？这倒要请教请教你。”

郜建义有点无地自容，搓着手，说：“不，这是坏习惯、坏习惯。”

杨铁哈哈笑起来：“我还以为这里头有什么讲究呢！”

大约是为了避免闲话吧，周奉宛早退了出去。杨铁的小女儿榕榕探探头，她斜了这个不体面的客人一眼，说：“爸爸，要开

饭了！”

这等于下逐客令，弄得郜建义马上欠起屁股：“那，我到外面转转，一会儿再来吧。”

杨铁的手举起来向下压压，示意让他坐，扭头对榕榕说：“要你多嘴！你们先吃嘛，没看见我在接待客人吗？”

榕榕撇撇嘴，一扭三晃地出去了。

杨铁忽然想起闵桐向他汇报过，郜建义写了一个反映工业战线体制改革的剧本，据说很有基础，有可能打响，就问道：“你那个剧本改好了吗？什么时候彩排呀？剧本叫什么来着？”

郜建义说：“改过四五稿，这个月底争取定稿。话剧团正边排边改，剧本现在叫《这一代人》，还想再换一个名字，类似的名字太多了，雷同。”

“雷同在其次，”杨铁说，“干吗叫《这一代人》？这一代人够叫人伤脑筋的了，我看，名字得改——当然我不是下命令。”

郜建义说：“是要改，是要改的，吴药川同志也认为这名字概括不了主题。”

这才言归正传。杨铁问道：“你可是常到我这儿来呀。有什么困难吗？你尽管说。”

郜建义沉吟了片刻，说：“不是找部长来喊困难的。我想……请示个事。”

“你说嘛，”杨铁做了个手势，“这是在家里，可以随便一点。”

郜建义拿起茶杯，小心地抿了一小口，说：“是这样。本子改到第四稿，实在改不下去了，我有点晕头了。重新到工厂里去，边生活边改，还是想不出点子来。后来，幸亏吴药川同志帮了大忙，他亲自和我打了几个通宵，他出了一大堆好点子，这才救了架……”

“好嘛，”杨铁很高兴，“他是主管这一行的，应当出力的。”

郜建义咽了唾沫，又说：“我觉得，吴药川同志花的力气够大了，等于救活了一个剧本，所以我提出，剧本署两个人的名字，这是公平合理的，否则我心里不安。可是，吴药川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没办法，我来找您……”

对吴药川这种高风格，杨铁很受用，心里甜丝丝的，他回答郜建义说：“不挂名就不挂吧。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他这种当无名英雄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嘛。”

“可是，”郜建义又在唠叨，“可是，他风格高了，我心里委屈呀！我不等于独占别人的劳动吗？况且，署他名字又是我们自愿的事。”

杨铁转念一想，觉得署上吴药川的名字也好，反正不是剽窃，双方自愿，他乐得顺水推舟。何况，只要吴药川有了作品，他就在业务上胜过闵桐、宋恭一筹了，对未来的遴选只有好处，何乐而不为？

所以，杨铁说：“那好吧。既然是这样，我来定好了，可以署吴药川的名字。不过，排列顺序不能变，你打头，行不行”

郜建义点点头，表示满意，站起身告辞，连一句题外的话都没说，仿佛他匆匆忙忙赶来，就是完成一种什么义务似的。

在饭桌上，杨铁当着周奉宛的面，表扬了吴药川，也说出了自己对郜建义的答复。

周奉宛说：“这不好吧？人家会说闲话的。”

“有我呢！”杨铁大嚼着山蕨菜，“实事求是嘛，况且又是我定的。”

周奉宛又夹了一筷子蕨菜送到杨铁碗里：“多吃点，降血压，降低胆固醇。”

杨铁冲她笑了笑，一天的不快早烟消云散了。

“开洋荤”的梦

杨栋栋已经在试穿出国服装了。一切都极为顺利，只待出国护照批下来，他就可以横渡太平洋，到大洋彼岸那令他神往的“乐土”去了，观洋景、开洋荤，哼，在本国念大学算个什么！真是想一想都心醉的美事，栋栋这两天走路都有点飘飘然了。

除了杨铁，全家人都在客厅里围着栋栋忙活，春秋呢大衣、两套西装，还有中山装、三接头皮鞋，摆了一大片，杨栋栋一件件在穿衣镜前试穿，听着家人的品评。

恼人的是领带无论如何打不好，大家每人试了一回，终归还是系红领巾的样子。

栋栋赌气把真丝领带撸下来扔到一旁，说：“周阿姨怎么不来？”

孙静说：“周阿姨准能会打领带。”

榕榕揶揄道：“难道你上了哈佛大学，还要把周姨带去侍候你不成？”

说得一家人都乐起来。

正说闹时，客厅的门突然推开，杨铁凶神恶煞般地闯进来，冲着穿衣镜前的栋栋凶人地吼了一声：“脱下来，你给我滚出去！”

人们都吓了一跳！杨铁发火是常有的，发这么大的火，那是连孙静都没见过的，她赶紧向栋栋、榕榕和保姆挥挥手，几个人连忙抱起一大堆衣服，一溜烟跑进屋里。

客厅里只剩下孙静和杨铁两个人。望着丈夫阴森森的脸，孙静颤着声问道：“你怎么了？不问青红皂白，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杨铁的脸色紫青，真像一块生铁。回到卧室，他外衣也没

脱，直挺挺地躺到床上，鼻翼一扇一扇，直喘粗气。

孙静给他端来一杯桔子水，又投了一块冰块，劝慰地说：“好容易把栋栋打发了，全家人都在高兴……”

“高兴个屁！”杨铁闷声闷气地说，“出国？你想得美！我叫人家告了！”

孙静问：“为什么？为栋栋的事？”

杨铁直视着天花板，说：“方才，纪委的正副书记一起同我谈的。”

“你有什么触犯党纪国法的事吗？”孙静不禁忧虑起来，“我早说过了，过杠的事干不得，到时候，总是事呀，喝凉水、花赃钱，早晚是病……”

“你别 唆了行不行？”杨铁愣头愣脑地说，“天塌不下来。一不能坐牢，二不会开除我党籍，只是寻思起来倒霉，别人偷驴，我拔橛子，赶到文件下来，碰了点子！”

孙静说：“你就别打哑谜了吧！”

杨铁这才从兜里掏出一份文件，扔给孙静：“你看看就明白了。”

孙静拿起文件。文件是有关整顿自费出国留学的。文件肯定了近几年自费出国留学的人，大部分途径是正当的、手续是合法的，学生在国外也是爱国的、刻苦用功的。但是，也指出少数高、中级干部采取不正当手段，收取外商贿赂，让子女出国，有人在国外表现不好等等。

孙静头皮发炸，她联想起前些天《人民日报》报的云南的那个干部的事来。他作为一个老革命，却丢失国格、丧失人格，支持、纵容女儿到香港去给一个资本家当三房姨太太……因而受到了严厉处分。

那么，栋栋的事呢？和云南那个人有没有共同的地方呢？当然，栋栋是男孩子，不会有人怀疑什么做姨太太了。可是能说手

段都正当吗？万一……

“纪委怎么说？”孙静急忙问，“看来栋栋出国的事没有挽回的希望了？”

“挽回？”杨铁咕嘟咕嘟地喝干了那杯桔子汁儿，“再出，不是成了顶风上了吗？”

孙静说：“不出就不出吧，即或出去了，跟前没人管束，在那种花花世界里，我也不放心，将来还不定是个什么德性呢！”

“你想得倒简单！”杨铁说，“纪委已经插手，还怕他们不查个水落石出吗？我受处分不说，还要牵涉进去好些人，这才叫赔了夫人又折兵！”

事已至此，孙静只好宽慰丈夫：“算了，应当悔恨当初不该动这份邪念。我看，你得如实地向组织汇报这件事，请求处分。”

“我已经表示过了。”杨铁说，“又得写检查材料，一份不行两份……哈，自打从干校出来，再没有写过检查材料，手都生了。”

“这事季青知道吗？”孙静问。

“瞒得了他？”杨铁又是一声长叹，“他早拎着棒子在那等着打我闷棍呢！这下子叫他等着了。听说，这一状，原来并不是告到纪委的，正是告到季青那里的。”

“你也该骂了！”孙静说，“季青没有找你？他可是个眼里揉不下沙子的脾气呀！”

“发昏当不了死，”杨铁说，“我等着就是了。我估计，他快登门了。”

正说着，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敏感的杨铁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说：“他来了！”

果然，季青推门而入。

他的打扮，差点叫孙静笑出声来，毕竟现在没有发笑的心情，只愣愣地看着他。

季青完全是一副老渔翁打扮。头上戴一顶尖顶芦苇草帽，身上披一块长不长、短不短的塑料布，左手提一个葫芦形鱼篓，右手是一小捆套节竹竿，竿上坠着折迭式小凳、蚯蚓罐，还有戴布套的手电筒。

“走啊，钓鱼去。”季青兴冲冲地说，“好几年没钓过了。今天气压低，老云接驾，后半夜准有雨，下雨前正是鱼抓食的时辰。”

杨铁没出声，哭笑不得。

孙静说：“老季真有闲心。上哪儿去钓啊？”

“不远，”季青说，“转山湖水库开放了，卖钓鱼票，五角钱一张，你看，票都买好了。”

果然，他从兜里摸出两张像电影票一样的纸头。

杨铁没好气地说：“你自己去吧，我没那份闲情逸致。”

“嗨！”季青挖苦道，“你倒有情绪！我管不着你，纪委管得着你。你若吃不住骂，那你就在家躲着好了。”

孙静倒是巴不得季青把丈夫带走。在她看来，一物降一物，只有季青能降伏他，出去散散心，开导他一下，总比闷在家里强。

孙静这样信赖季青，是有历史渊源的。

记得1969年在北大荒干校时，杨铁白天干活，晚上挨斗，跪在碎玻璃屑上，鲜血淋漓，旧的疤没结成，新的伤又来了。杨铁犯了高血压症，一天说不定昏晕几次。他有点受不住了，写了封给党中央的遗书，拿了根绳子，跑到柳树林子里去上吊。

孙静发现遗书，找到季青，两个人追到树林子里，杨铁已经在树枝上结好了绳套，正准备横下心死呢。

孙静发疯地扑上去抱住杨铁的双腿，哀求他、劝慰他……无效。杨铁说：“你们不会永远寸步不离的，一个不想活下去的人，谁都防备不住。”

季青真怪。他一句都没有劝。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走过去，把孙静拉开，对杨铁说：“你说得对，我来成全你。”季青伸手抽了抽绳套，说，“这样结法不对，再说，你脚下得垫个箱子什么的，站上去，套进脖子以后，一蹬，才能悬空。你这样站在地上，你会后悔的。”

孙静以为季青迷了心窍，又扑过来抱住他：“你怎么了？你说些什么呀？”

季青又一次推开孙静，厉声对杨铁说：“你过来，死吧！我要亲眼看着，一个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是怎样结束他自己的生命的！”

这炸雷似的吼声把杨铁镇住了，半晌做声不得。过了好久，他才说：“我冤枉啊……我实在受不了啦……”

“呸！”季青毫不客气地唾了他一口，“那些在你身边倒下去的同志，他们又应当怎么说？他们能说，我死得可惜，流了血，是为别人流的，一天光明日子没过着……能这么说吗？你不觉得可耻吗？过去，你当党员，是为了斗争、奋斗，现在，共产党员的职责，仍然要你勇敢地奋斗，可是你，你选择了一条最胆怯的、最省力的道路！你应当先申请退党，然后再去死！”

特殊方式的教育，常常可以得到异乎寻常的效果。孙静没有想到，丈夫硬是叫季青这一顿冰雹给砸醒了，杨铁抱着季青痛哭失声。从那以后，死神同他分手了，他挺过来了，像季青一样，是硬骨头。

在孙静看来，丈夫现在又遇到了相当于那次自杀的“坎儿”，她相信，季青能够再次挽救他。

所以，孙静对丈夫说：“去吧，出去钓钓鱼，等你们钓来鱼，我给你们上灶。”

杨铁开始翻雨衣。他心里未必愿意去钓鱼，可是他自知不是季青的对手，只要他拿准了主意，你不上钩也得上钩，谁要你叫

他又抓住了把柄呢。

季青说：“你光带雨衣就行了，鱼具我都准备了双套。对了，拿盒烟，我忘带了。”

杨铁不吸烟，乱翻一气找不到，还是栋栋送过来一盒，是英国三五牌的。

季青在手里掂了掂那装潢得十分考究的香烟盒，不无讥讽地说：“嗨，你比我气派多了，抽三五烟！高等华人，我才抽大前门呢。”

爸爸怕季青，儿子可不怕。栋栋说：“消费，也是一种美德，可惜还不被不文明国度所认识。只有拼命消费，才能刺激生产。外国提倡的是用最新产品，我们这里还在强调穿打补丁的衣服为荣，如果都这样，服装厂都得关门。一件衣服穿它老少三代，或者披树叶，就更朴素了。”

“原则上，我不反对你的观点，”季青点燃一支香烟，说：“可我要问你一句，你这个伟大的消费者，你给我们的社会生产了什么可供消费的产品？一粒粮食？一寸布？一两煤还是一度电？去你的吧——望房梁接馅饼的小寄生虫！等到你知道了什么是人生的时候，再来同我说话！”

伶牙俐齿的栋栋被骂得哑口无言，一句话答不上来，连孙静都解气地乐出声来。

只求你想一想……

转山湖，名副其实。这里原是一条涨落不定的野河，随着桃花水、雨水大小抬高水位。1958年市里动员六县民工拦山修筑拦洪坝，蓄起一湖水来。因为水库绕山而成，远看像是几个孤岛，所以剪彩那天，前任市委第一书记顺口说了句：“真是山不转水转，一片转山水！”水利局长灵机一动，立即命名为转山

湖了。

转山湖的黄昏实在要比北京的北海、中南海美。反射到湖面上的夕照虽然不及北海绚丽，山上也没有那么多人工雕饰出来的楼台殿塔，可是它朴实、自然，有一种天然的雄浑风貌。

残阳犹在，斜晖描画着山顶的大锅形的电视微波站装置，把自来水源的高层水塔投到平静的水面上。围湖全是芦苇和刚刚结出穗头的蒲草，野鸭子成群地在蒲草丛浅水里游来游去。

转山湖离开喧闹的城市不过十几华里，却是一派恬淡、静谧的山光水色。

看季青的神情，好像真的是为钓鱼而来的样子。他钓鱼是行家，杨铁在干校时就领教过了，同样一人一把鱼竿，下同样的钓饵，别人连咬钩都没看见，季青却能接二连三地往沿上甩鱼。

今天，一到湖边，站在高阜处打量一阵儿，季青立刻选定了下钓竿的地点。他卷起裤脚，下了水，拿起镰刀，从一片蒲草中间打出一道空当来，然后投上几大块包在纱布里的豆饼。他走上岸来，点上一盘驱蚊香，不紧不慢地说：“这叫喂鱼窝子。豆饼可以招来鱼群，可是它啃不动，只能围在那里转悠，叫它等着吃咱们的活食！”

季青点上一支烟，刁在嘴上，从蚯蚓罐里抠出一根用沙土喂得红红的蚯蚓，用手拍了拍，再吐上点唾沫，掐成几段，穿到钓钩上去。

“你愣着干什么？”季青见杨铁还抱着膝盖坐在那里发愣，就说：“下竿呀！姜太公钓鱼，也不会是你这样子呀！”

杨铁这才把套在粗竹筒里的竿子一节节拔出来，拴好“救命线”，下上钓饵，贴着蒲草根甩进去。这是学着季青的样子的。据他说，夜晚鱼都愿意游到浅水草丛下，可以捕捉到小鱼小虫吃。

季青这时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面团似的东西，在手心揉来

揉去。

揉好了，掰了一块，扔给杨铁。杨铁问：“这个行吗？面团到水里一涮，还不涮掉了？”

季青说：“不是面团。那是我到煎饼铺现定做的煎饼团。煎饼浆刚一上铁鏊子，马上刮到一起，团成团，再合上点甘油，又香又粘。什么鱼抓什么食，鲫鱼、鲤鱼最爱吃这个，鲇鱼是爱吃活食的。”

风平浪静，水面倒映着一堵绿墙似的蒲草，再染上红彤彤的晚霞，美极了。在这天水相连的地方，几支塑料浮子在水中垂直立着，竟有一只蜻蜓落在上面歇脚。

季青又点起一支烟，青烟缕缕上升，熏得他眯细了眼睛，专注地盯着水里的浮子。

鱼浮子纹丝不动。

季青完全没有谈正事的苗头。

杨铁有点耐不住性子了：“该打雷该下雨，痛快点好不好？”

季青不理他，自言自语地叨咕着：“鱼呀鱼呀快上钩，没有大的小的也将就。”

正叨咕间，中间那把竿的浮子上下颤了几下。杨铁瞪大了眼睛：“快，快！”

“急什么？不是大鱼。”季青老谋深算地说，“大鱼咬钩来实的，不逗钩。”突然，浮子向上一蹿，迅速向旁一倒，这一刹那间，季青轻轻一提竿，说声：“来吧，鲫鱼一条！”

果真是一条鲫鱼，太小了点，只有寸把长。

他把鱼篓坐在水里，将小鱼往篓里一丢，洗把手，上完鱼食，又甩下去。

“我以为多大个呢！”杨铁说，“尾巴连着眼睛。”

季青说：“该来条大的了。你一擎竿，就知道水里的鱼多大个，若是碰上2斤重的鲤鱼，那才来劲。别人都说吃鱼香，我看

钓鱼最香的。”

杨铁觉得蚊子总往脸上叮，就也要了一支烟，吸着说：“别吹了，方才还说‘没有大的小的也将就’，钓上一条，就又想2斤重的了。”

季青哈哈一乐：“人心不足蛇吞象嘛。我说福宝（注意，又叫杨铁从前那不雅的大号了），你说，人生像不像钓鱼？”

杨铁怔了一下，一时转不过弯来。人生和钓鱼有什么关系？也许这是他正式谈话的开场白吧？

杨铁哼了一声：“看不出。”

“我说像。”季青说，“没有钓着的，希望钓一条开开眼，小一点都不在乎，钓着一条的，希望再凑一条；钓上小鱼的，希望来条大的；钓得着鱼的地方，千方百计对别人保密，留着自个来……我看，这特别像人的私心。”

果然开场了！杨铁能说什么，挺着挨着就是了。

“那鱼，就更有意思了。”季青扬扬竿，又钓上来一条，还是小鲫鱼，他一边摘钩一边说：“凡是上钩的鱼，都是贪便宜的，它若不贪吃，你无论如何钓不上来，我就不相信姜太公直钩能钓鱼。可话又说回来了，若有那么一条鱼上过钩，又逃走了，你说，它下回一定接受教训了吧？一定不会再吞钩了吧？”

“那当然。”杨铁不假思索地说。

“不不然。”季青说，“那年在干校，我钓上过一条2斤多重的大鲇鱼，剖膛破肚时，发现鲇鱼肚子里有一个硬肉疙瘩，割开一看，是一把长了锈的老钝钩，还带着一节鱼线呢。这说明，它吞过钩，只是因为力气大，咬断了鱼线，带着钩逃走了。事后，它不是照样上我的钩？”

杨铁说：“你可以写一本《钓鱼大全》了。”

季青向他噓了一声，双手抓竿，双目盯紧水面。只见浮子一蹿、一倒，刷地划了个弧形，季青喊了声：“领票了，来吧，大

个的！”

竿梢都弯成了弓形，一条尺把长的鲤鱼在水里翻花，终于被扯住上来，甩尾乍腮地拼命在草地上蹦。

杨铁也多少提起点兴致来，开始注意他的钓竿。

把鱼放到篓中，季青说：“写一本《钓鱼大全》不难，使人领悟到其中的哲理，那才有意义。福宝，你说，说人人有私心，这话对不对？”

杨铁也钓上一条鱼来，小鲇鱼。

杨铁费力地掐住鲇鱼腮，从嘴里往外拽钩，他说：“你不就是大公无私的吗？”

“过奖了，老兄。”季青说，“我也有私心，我也有一般人的弱点。譬如，听见人家恭维自己，怎么听怎么舒服；听见别人的非议，即或是事实，自己也承认，甚至能在生活会上给自己上很高的纲。可是，同样的问题，由别人嘴里说出来，哪怕火力只有十分之一，那也会感到不舒服，这不是私心是什么？”

杨铁哼了一声，说：“你不用指桑骂槐了，直说好了。你不就是说我有私心吗？”

季青侧过头来看他一眼，等待下文。

果然，杨铁像放连珠炮似的说：“你若想教育我，你就说好了，你若忘了词儿，我可以给你提醒着点儿。”

季青只觉得心里一阵阵难过。他事先已经料到，即或自己把话说得再厉害，也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好比一个烟瘾很大的人，他自己也能讲出一大套吸烟的害处，可你让他戒烟，那确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40年前的杨福宝吗？开导一个一生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实在不那么容易啊！

可是话不能不说，态不能不表，好像医生不管病人喜欢与否，能否医治，一定要如实指出病情轻重一样。

杨铁呢，现在充塞他头脑的只是“倒霉”和反感，既然事情

露了馅儿，只好听凭“破鼓万人槌”了。反正栋栋出国的事并没造成既成事实，他现在担心的倒是不要把吴药川牵进去，因此他有意把责任都揽过来。他叹了口气，说：“在栋栋升学的问题上，我是有私心，这我应当检查。但我希望就事论事。”

季青很反感。他说：“但是，一时一事并不是突然事件。你当年哭鼻子，死也不肯当连长，你没有官瘾，或者说，还没有体会到当官的好处。那时，我们的中央主席也在同我们一道受苦。你为什么不当连长？你感到力不胜任，会给革命带来损失，是一种崇高的责任感支撑着你。40年后，你不得不离休了——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的最后责任，是向党推荐合格的、大公无私的接班人，你是以什么为基点考虑的？是选拔你的接班人，还是事业的接班人？这难道没有个责任问题吗？当然，这个问题，是没法给处分的，可是共产党人的良心自我谴责，应当比外在的处分更有用。”

奇怪！杨铁等着季青就栋栋出国的问题谈下去，他却引伸到这方面来了，可以说正中下怀。于是杨铁侃侃而谈：“我中意的几个人，你都知道的，我既没有选我的亲属，又没推荐我的儿子。”

哗啦一声，季青把鱼竿扔到水中，气得跳了起来，“无耻！你真说得出口啊！我没想让你一下子认识过来、改过来，你总该沉痛地想一想吧？没想到，你连想都不肯想一下！”

杨铁抗声问：“问题是无从想起呀！”

季青不得不摊牌刺激他一下了：“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偏爱吴药川？你家的保姆怎么来的？为什么一个月才花20块钱工钱？邢处长的女儿怎样调到电视台的？你儿子出国留学的手续谁办的？为什么你批准吴药川在别人的剧本上署名？你为吴药川筹集的资本还少吗？”

杨铁分辩道：“这是公平的。这和吴药川有什么关系？署名

问题，是作家跑到我家去再三要求的。”

“妙就妙在这里，编织一张网，却又让人看不出编织的痕迹。”季青说，“抢别人东西，还要让人家做出乐意奉送的样子！为什么？不过因为郜建义想得到一套房子，吴药川凭手中的权要挟他这么干。”

杨铁眨眨眼，问：“你有证据吗？”

“当然。”季青说，“有证据还怕压不住你呢！我还可以告诉你，写匿名信诬告好朋友闵桐给王洪文送礼的，也正是吴药川。不用我说，你也能分析出吴药川落井下石的原因了吧？”

杨铁虽然心里大吃一惊，但嘴还很硬：“不可能，这不可能！”

季青冷笑一声说：“得到过人家好处的人，被人家网在网里的人，当然不轻易承认了。不是吴药川为了巴结你，搞‘夫人外交’，替你儿子办出国手续吗？你大概还不知道，中央文件一下来，当他觉察到纪委已经插手你儿子走后门出国问题时，发现有可能和你一起倒霉、栽下去，觉得你这个靠山不可靠了，就站出来揭发你不正当行为的，正是吴药川。这就是你将来想倚靠的没有杨铁在的杨铁！”

杨铁怔了好一阵儿，突然握起拳头狠狠地说：“这个坏蛋，这么阴险，险些叫他得逞钻上来！”

这话使季青心底更加凄凉！这样严酷的教训，杨铁仍然是以个人恩怨为出发点的，假如吴药川没有“坑害”到他自己头上，他也会这样义愤吗？吴药川的败露不过出于偶然，假使没有这个偶然呢？

“我算看错人了，”杨铁喃喃地自语着，“没想到他是这么个两面三刀的人！啊，悲剧啊！”

季青苦笑起来：“悲剧决不在于一时失误错看了人，恐怕在于你至今没有看到造成这悲剧的原因，这才是更大的悲剧。”

“你说什么？”杨铁一时没有拐过弯来。

季青说：“让我说白了，就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还给它涂上革命色彩，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大概这话说得太抽象了，杨铁虽然不舒服，一时却也不甚了了。

过了一会儿，杨铁说：“……今天，不白来钓鱼呀！”言下之意，是受到了一次洗心革面的教育。

可是季青却把钓鱼的意义估量得极低：“我不再那么幼稚了。过去咱们之间发生过多次这类的争执，我打雷、下雨，你从不服到认错……其实，一次谈话哪有那么大的作用？我只希望你能跳出个人的圈子，以第三者的身份，好好想一想，就行了。是的。好好想一想，我们都应当好好想一想了……”

季青说得自己都心酸起来，泪水模糊了视线。

夜幕轻轻地从四野垂落下来。银河由北向南横亘天空。天鹅座最先出现，真像一只张着翅膀戏水河滩的天鹅；南面的天蝎座繁星密布，犹如蝎足；更远的东方，天秤座、室女座隐约闪烁在一片朦胧的光影中。

两个人都在看夜空，他们从那若虚若实的苍苍茫茫的银河系里看到的是什么呢？灿烂的北斗，还是流星划过的轨迹？永恒，还是瞬间？

（原载 1983 年 1 期《收获》）

梦断君子兰

“自由职业者”的女儿

辛酸的往事撞击着女大学生的心。

车窗外黑乎乎的，只偶尔有一两星远村的灯火半明半灭地在说不清有多远的地方闪烁。她觉得这列轰轰隆隆的火车就像钻行在深不可测的、没有光亮的山洞里，耳畔是车轮辗轧钢轨发出的沉重而单调的金属撞击声，还有呼啸而来的风声。

风吹起烟尘，迷了姑娘的眼睛，她把一直探在车窗外的头缩回来，轻轻拉上车窗。闷热、恶浊空气的窒息立刻又包围了她。她捋了一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想活动一下压麻了的脚，这可不容易，茶桌底下躺着一个人，还堆着一个麻花被面的脏行李卷、一口袋小米子。她恍惚记得，这脚下的跛足老人是从济宁上车的，好像是到东北去看儿子。老头一上车就站着，而且被挤在洗脸间那里，好心的姑娘把他让了过来。

姑娘一动腿，老头醒了，睁开混浊的一双眼睛茫然看了看，一骨碌爬起来，连连道歉：“你看俺……挤得你不舒服了……”

姑娘从座位上站起来，两只胳膊向上伸，双手抓住行李架上的生铝棍，用力伸了个懒腰，对老头笑笑，说：“您先坐吧。”

老头说什么不肯：“这咋说！俺坐了好几个钟头了。”

姑娘不由分说，把他扶到座位上：“您趴在茶桌上好好睡一会儿，老坐着反倒累，我出去走走。”

老头实在是太困了，胳膊肘往茶桌上一搭，头就歪了上去，立刻打起呼噜来。

姑娘只好站在座席中间尺方的地方。她倒真想离座走走，可过道塞满了人，连列车员不得已通过时，都得大呼小叫，甚至从座席上面“空中飞”，过一节车厢，要出一身臭汗。

若在往常，她满可以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来打发时光，一本小说够消磨一路了。可她这一次心乱如麻，并不是轻松愉快的旅行，说不定是去奔丧！

一想到“奔丧”这两个字，她的心猛地一沉，好像列车一下子栽下深渊了一样。她侧过脸看看车窗，玻璃上模模糊糊映出的面孔，那是双眉紧蹙、布满愁云的面孔，但是，凄伤并不妨碍美丽，她很少对镜整容，她也不像那些同龄女孩子总随身带着小镜子不时照照，她的镜子在人群里，她只消注意到无数投向她的目光，她就知道自己的面孔动人到什么程度了。

她叫蓝小玲，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她本来不会提前回东北，只待毕业分配后，报上到后再告探亲假。

可是前天她接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在没有接到准假通知前的几个小时里，她几乎乱了方寸，那天又偏偏赶上她作毕业论文答辩，由于心不在焉，她对她选下的本来难度很大的题目：《论文学中的“黑色幽默”派》几乎把握不住了，她居然把《第二十二条军规》说成是约瑟夫·巴思的作品，使得这部名著的真正作家约瑟夫·海勒大受委屈。

蓝小玲从上海的真如火车站上车，什么都没带，旅行包里全是吃的，各种南味食品、蜜饯，她能想到的，凡是父亲没吃过

的，她都买了。她真怕父亲已经吃不到了。

蓝小玲的目光从玻璃窗上摆来摆去的墨绿色窗帷子上滑到堆满茶杯、茶叶桶、面包和水果皮的茶桌上。茶桌被山东老汉花白的头占去了一大部分，一只手耷拉到茶桌边缘，随着车身的颠簸，有节奏地震颤着。

蓝小玲的心律一下子又紊乱了。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瘦骨嶙峋，手背黑黑的，好像永远不可能洗干净似的，布满标志着苍老的色素斑散乱地伴着一一条条暴起的、蚯蚓样的静脉血管，指甲很长，里面嵌着泥，五指看来伸不直也并不拢，粗糙得像五根老铧，这五根指头，使人想到它们随时准备去抓取什么，却也使人感到，它们十回九落空，看来是抓不到什么的。

父亲不是也有这么一双永远伸不直、并不拢的大手吗？那双手在蓝小玲柔嫩的面庞上抚摩的时候，她感受到了它们的粗糙，但却是热烘烘的。据父亲说，刚解放那年，一个算命的瞎子给他算命，摸过他的手，连叹三声，说：“这是一双穷手，能拾金，能攥银，珍珠翡翠掌上过，大把垃圾手里抓，不好，不好。”

蓝小玲轻轻叹了一声。她不止一次地听父亲重复过瞎子这一番宏论，他信，也认命。他抓过金、抓过银，那只不过是过过手罢了，真正抓在手里甩不掉的是垃圾。

命运仿佛就是这样为父亲设计的。

“你是捡破烂儿的丫头蛋子！你也是破烂儿！”

这刺耳的声音突然又震动蓝小玲的耳鼓了，这是早已在她耳畔消失了的聲音呀！今天，怎么会又冒出来了呢？

是的，蓝小玲的父亲蓝明超确实是捡破烂的，蓝小玲从懂事起就记牢了父亲的形象：佝偻着腰，戴一项吕宋帽，又旧又脏，也像是从垃圾站捡来的。他仿佛只有一套罩衣，是劳动布的，冬夏都穿，腰间扎一条紫红色的胶皮围裙，脚上是一双布底圆口灯

心绒便鞋，肩上背一个花竹篓，左手提一条麻袋，右手拿一个铁钩子。

小时候，蓝小玲曾经狂热地崇拜过爸爸。别人家的孩子有大熊猫、洋娃娃、小火车，小玲也有。爸爸说过，商店里有的，垃圾站都有。爸爸把捡回来的玩具洗干净、修好，小玲几乎不比小同伴们缺什么。不是有好些小孩子拿新玩具来换她的旧玩具吗？蓝小玲那时还不懂得“垃圾”为何物，当她抱着布娃娃在街上玩的时候，那些嘻皮笑脸的婶子大娘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问她：“小玲，娃娃是哪儿来的呀？”

爸爸从垃圾站买来的。”蓝小玲脖子一歪，像别的孩子一样骄傲。接着，便是照例的一阵哄笑声。小玲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

终于，她明白什么叫垃圾了。那是她同邻居的孩子拌了嘴以后，那几个小姑娘骂她“捡破烂儿的”，“臭垃圾堆里捡来的破烂儿”，不但孩子骂她，连大人也出来帮腔。

她终于明白，垃圾站并不是神圣的殿堂，从垃圾站里捡来的东西也决不可能同百货商场里买来的东西放在一起。

蓝小玲哭了很久，她把所有的玩具都塞到灶膛里烧掉了。那天，爸爸回来得很晚，看见蓝小玲蜷缩在灶坑门前哭乏了、睡着了，脸上还残留着泪痕。蓝明超用烧火棍拨拉着灶里的灰烬，他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吧嗒吧嗒地掉起眼泪来。

蓝小玲还记得，第二天，爸爸从外面回来，手里举着一只簇新的大熊猫玩具，他满以为女儿会扑上来雀跃欢呼的，可万万没有料到，年仅6岁的小玲小脸绷得紧紧的，正眼都不看爸爸一眼，说：“我不要。”

蓝明超把大熊猫塞到女儿怀中，说：“这是爸爸买的，从商店买来的新玩具。”他特别加重语气说出商店和新玩具的字眼儿。

蓝小玲把熊猫扔在地下，冷淡地说：“新的，也是用捡垃圾

换的钱！爸爸，人家的爸爸咋不捡破烂儿呢？爸呀爸，你不捡破烂儿不行吗？他们都叫我小破烂儿丫蛋呢！”

蓝小玲永远忘不了爸爸的眼泪，顺着皱纹纵横的脸往下流，他一声没吱，只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蓝小玲也哭了，她是委屈呀。

多少年过去了，也只有今天，蓝小玲才能理解爸爸那无言的泪水。

她忽然觉得对不住爸爸，是的，她在内心里是瞧不起爸爸的，这别扭的感情，直到她升了大学也没有改变。

蓝小玲为父亲害过羞，她为有一个捡破烂儿的父亲而害羞。她的几个哥哥前几年曾下决心砸烂了他的筐，扔掉他的铁丝钩子，甚至宣布，如果他再不改变职业，儿子们将同他断绝父子关系。

天知道，这老头为什么迷上了收破烂儿和拾垃圾的差事！他脸不红、头不低，决没有儿女们的情感。

蓝小玲在父亲的职业上，花费了好多脑筋，给他进行了好多合理性的构想。譬如，在填写表格、志愿时，她填过“自由职业”，填过“家务”，后来哥哥们训斥了她，叫她改为“教师”，她这才知道，在她出世以前，她父亲确实当过小学教员，1957年他倒了霉，下放到机车厂去当力工，脚手架子坍塌砸伤了他的颈椎骨，从此驼背，成了半残废，他被强迫领了退职金，在1962年被“精简”回家了。他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家里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炕上还有一个患着八型肺结核的病老婆，他能干点什么糊口呢？收废品、捡垃圾不用人介绍，不要什么政治鉴定，他从此走上了这条道儿。

蓝小玲脑子里不断闪现出爸爸的各种形象，愁苦的、凄伤的……自从妈妈在她3岁那年死去以后，爸爸什么苦没吃过呀！他到底把4个孩子都拉扯成人了，捡垃圾的女儿居然能上大学，

而且马上要拿到学士学位证书，他听了，会怎样地高兴啊！

然而，他要死了，也许不会乐、也不会表达感情了。一想到这里，蓝小玲的心都揪到一起了。

垃圾千金

天已经朦朦发亮了，田野上顶着露水珠的庄稼和一片土坯房的村落越来越清晰地闪现出来。

一片坟地！

蓝小玲特别敏感地注意到了那片坟地，不像是烈士陵园，不整齐，也没有烈士纪念碑。可能是公墓，她小时候管公墓叫乱葬岗子，她给妈妈上过坟、烧过纸，她留意过公墓里几乎所有的墓碑，有墓志的坟。什么样的人都有，生前煊赫一时的将军、市长，还有大学教授、工程师，当然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人。伟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大概在于死后被人们忘却的时间不同，伟人总有人纪念，直至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后；而普通人，除了亲人，很快会被人淡忘。

蓝小玲望着车窗外旋闪而过的一片坟地，她想到了父亲，一个捡破烂儿的人死掉，未必比死掉一只鸡、一只猫有稍大一点的震动，按常理说，居民组长也未见得去关照一下。

奇怪！一周以前大哥蓝仁来信提到过，在父亲卧床不起的日子里，廖副市长几次登门探视，那口气，不像是受宠若惊，倒显得平平常常，这使得蓝小玲百思不得其解。她父亲历尽坎坷的一生，都是在金字塔的最底层度过的，一个居民组长都可以把他叫去大加训斥，像训斥儿女一样不客气，他一生与芝麻大的官儿都无缘，怎么会有副市长屈尊到家去嘘寒问暖呢？

蓝小玲猛然想到了花。

是了，这微妙的变化会不会是由花引起的呢？

说也奇怪，蓝明超这人穷得穿不上一件囫囵衣裳，却酷爱花花草草。他家院子里、窗台上，到处摆着四季花草，竟有上百种，岭南的米兰，云南的山茶，黄山的杜鹃，洛阳的牡丹，还有栀子、扶桑、月季、茉莉，应有尽有，但是，这几年突然名噪一时的花儿，却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君子兰。

蓝小玲记得，她家养君子兰是十多年前的事，这种花和葵红差不多，一年才开一次，一点香味没有，平平常常，不引人注目，它摆放的位置也不在头排。

前年暑假蓝小玲回家，碰到的第一件事就吓了她一跳。一个客人同她二哥蓝义鬼鬼祟祟地嘀咕了好一会儿，二哥才很勉强地从花窖里拿出一盆四片叶子的君子兰花苗，那人竟然甩在桌上两捆十元大票，两千块！更叫她奇怪的是蓝义的风度，面对这么大数字的钱款，他数都不数，拉开抽屉，顺手一划拉，把两捆钱丢进抽屉，那样子像收拾起两副旧扑克牌。从前，二哥可不是这个样子。有一回他带妹妹到运输公司去领工资，薄薄的工资口袋里，只有五十几元钱，蓝义站在会计、出纳和众人面前，反反复复地点了三四遍，点得在一旁的妹妹都不好意思了，最终，蓝义还是向出纳员提出了疑义：少了5分钱。出纳员心里别扭，嘴上总不好说少五分钱还值得张一回口？出纳数，会计点，后来还是调度员有经验，他不声不响地拎起蓝义的工资口袋一倒，原来有5分钱没倒出来。弄得大家没趣！出门的时候，蓝小玲埋怨哥哥：“你真是，少5分少5分呗，多叫人笑话！”可蓝义一点不感到丢人，他说：“分文憋倒英雄汉！5分钱不起眼，可爸爸得捡一大筐废纸才换得来呀，你倒穷大方。”说着，他拿出那5分硬币，在手心里掂了好半天，走到路旁买了一根冰棍，自己咬了一口，剩下的递给她，还嘱咐她：“回家别当你大嫂说呀，啊？”

蓝家人发了君子兰财了！“家有金银邻有秤”，这是瞒不住近邻的。这一点，蓝小玲心里也有数。尽管几个哥哥来信都闪烁其

词，可她还是能从自己的生活费用日渐增多这一点推断出来。爸爸不是张罗要给她买一架钢琴吗？那至少要一两千块钱，从前，那可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呀！

蓝小玲虽是女孩子，却不精通养花之道。她曾认为君子兰俗气，那些好品种没有一个动听的雅号，和尚、油匠、花脸……去年回家，她偶然在菜市场听说，最值钱的已经不是什么短叶和尚，而是“蓝罗锅”。她的头嗡地涨得有斗大。姓蓝的本来就少，姓蓝的有罗锅的就更不会有第二个了，不用问，这带有“污辱性”的“蓝罗锅”，肯定是指她家的君子兰花，是她爸爸培育出来的良种。当时，她又气又羞，连菜也没买就回家了，她真想把这件有损她家名声的事告诉爸爸，可她忍住了，她怕爸爸伤心。蓝小玲不禁想起大嫂苗彩凤奚落爸爸的那回事。有一天，爸爸背了一筐废酒瓶子回来，发现儿媳妇苗彩凤坐在当院洗衣服，她竟用香皂洗，老头看着心疼，可又不好深说，只委婉地问了一句：“没肥皂了？”这惹得苗彩凤好不高兴，噎噎地跑出院去，不一会儿拿了一块新香皂回来，往爸爸面前一扔：“还你一块新的，看好！还是罗锅香皂呢！”说完她格格格地笑了起来。当时，蓝小玲在场，她望望那块罗锅香皂，再望望父亲变得灰白的脸，她真想痛骂嫂子几句。后来，她还是在大哥蓝仁面前告了一状，蓝仁当着爸爸面，打了媳妇一个大耳光，算是给父亲出了一口气。

她真怕，蓝罗锅这外号叫出去，对父亲的刺激太大了。

她蓝家真的发财了？而且发到可以给她买钢琴的地步了吗？

她希望这是真的，她从小过惯了苦日子，不知道享受是什么滋味。她直到上了初中，还是穿男孩子的衣服，老大穿过老二穿，老二穿短了再传给老三穿，等传到蓝小玲这儿，都已成了百衲衣了。小时候，逢年过节，爸爸喝上一杯散装 50 度白酒的时候，总高兴地说：“说不定哪天，在垃圾堆里捡个金元宝呢，那咱家就苦到头了。”

对爸爸这种话，蓝小玲和几个兄长都是当做笑话听的，谁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运气降临到他家寒门。

人世间有很多奇事，本来认为是神话，也有可能成为现实。

“金元宝”果真降临过她家！

1966年，蓝小玲刚刚5岁，已经懂事了。她记得那是秋天的早上，爸爸背起破竹筐正要去捡垃圾，从对面那幢白楼里下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他们是“资本家的狗崽子”，前几天陪他们的“资本家狗婆娘”妈妈一起戴高帽游过大街。老太太不禁折腾，在十字街口昏死过去，没有抢救过来。后来，红卫兵勒令这个人家限期滚到无锡老家去，这几天，他们在忙着收拾东西。这会儿，这两个青年人每人头上顶着一个破旧的沙发来到蓝家土坯小院门前，把那对露了稻草的破沙发放到地上，对蓝明超说：“这沙发，你收去吧。”

蓝明超吓得摆手：“收不起，收不起，收个破铜烂铁、麻绳头儿、废牙膏皮子还收得起。”

“凭你给，”小伙子说，“你给十块八块也行，没有，给三块五块也行，不能白白便宜了王八羔子们。”

蓝明超听了这话，吓得四下张望，确信没有人听见，才放下一条心。他本不想买，可他知道，眼下正是卖主落难的时候，得一块钱是一块。他摸摸兜，把昨天卖废纸箱子的十几元钱全给了两个青年人，他们含着泪，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一对破沙发害得蓝明超好苦，有好几天差点揭不开锅，十几元钱足能买一百多斤苞米面呀！那年月，沙发是和资产阶级紧紧连在一起的，好多大机关都把沙发地毯折腾了出去，换成了硬板凳，你就是把沙发白送人都没人要，怕惹闲话，何况你是卖，谁会买？

蓝明超这种身份的人，更不敢摆阔用沙发了，即使他有胆量用也不行，他那三间用捡来的半截砖盖起的小房，人住都嫌挤，

哪有摆沙发的地皮？

于是，相当于一百多斤包米面的一对沙发就被冷落地放在后院简易小棚子里，任风吹雨淋。

到了1968年，蓝明超实在嫌这对倒霉的沙发太占地方，决定拆掉它们，他算了一下，一只沙发可以拆出18个九环的弹簧来，两只可出36个，把旧弹簧卖给汽车靠垫修理部，大约能卖十几块钱，再卖点破皮子、破棉絮，说不定能赚一点儿。

那是一个暖洋洋的秋天的傍晚，蓝明超带着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在院子里肢解旧沙发，远处高层建筑上的一组12个高音喇叭，正在声嘶力竭地喊着“红色造反者电台现在开始战斗！战斗！战斗！”

当蓝明超用剪子剪开百孔千疮的沙发包套，伸手扯出一团团破棕絮、棉絮时，他的手突然停住了，两眼的瞳人也定住了，他明显地“哦”了一声。几个孩子都奇怪地望着他，蓝明超那副模样，倒像淘气的孩子在房檐底下的麻雀巢里掏雀，掏出了蛇！

蓝明超从弹簧弓子中间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包袱，是水龙布的包袱，用线密密麻麻地缝死了。

孩子们都好奇地围了过来。

蓝明超在手上掂了几下，又往地上掼了几下，听得见金属的轻微撞击声。

“别是手枪吧！”大儿子蓝仁常看反特影片，马上引起了习惯性联想。

“那准是狗特务藏的！”老二蓝义一对小眼睛瞪得溜圆。

蓝明超真的有几份恐惧，像在注视着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愣了好一会儿，他才拿起上了锈的铁剪子，剪开水龙布包袱，立刻有一些各种形状的金光耀眼的东西沉甸甸地落在了地上。

“金子！”蓝明超的一双灰暗无神的眼睛都被面前这一堆金灿灿

灿的东西照亮了。他活了大半辈子，只听别人讲过金子，像听人家讲长生不老的仙丹一样渺然。金子毕竟不是长生不老丹，金子是存在的实体。你看，那元宝状的不是金镲子吗？那有点像“金不换”的香墨状的就是金砖、金条吧？还有那铜纽扣样的，尖大约就是金豆子了！

蓝明超逐个捡起金镲子、金条，在手里掂几下，沉甸甸的煞手！除了金子，任何金属没这个分量。他是捡破烂儿的，铜铁锡铅，什么捡不来？只有金子打制成的器皿，在垃圾堆里捡不到。

蓝明超乐得走路脚都发飘了！

他从抽屉里找来一个量金银的小戥子，这也是他从垃圾站捡来的，戥子杆都折断了，他费了好大劲修好的。

蓝明超称了称，这笔外财真可叫一注大财，竟有 54 两之巨！

蓝明超乐得忘乎所以了。那天晚上，他把过日子用的细水长流的钱全打扫出来，领着几个孩子到胡同口的副食商店去，买了一只烧鸡、二斤酱牛肉、半只熏兔，还买了一瓶 60 度的老窖烧酒、半斤广州出的椰子糖，又买了二斤羊肉，打算包一顿三鲜馅儿饺子。

左邻右舍的人，有几个不认识捡破烂儿的蓝明超的呢？他到副食小店买一块腐乳，总要央求人家搭上满满一碗腐乳红汤，他买咸盐，总是买撒在地上带土的脏盐，可以少花一半的钱，回去用水煮一遍，熬干后，照旧能剩下一层白花花的精盐。小铺的人都说，蓝明超是一个大钱分两半花的主儿，这样的人，突然大鱼大肉地吃起来，怎么不令人吃惊生疑？

居民组长为此召集了紧急会议。治保组长首先想到，蓝明超可能穷急了，或偷或盗，肯定发了不义之财；从前当过教员的街道夜校校长房善却把眉头皱得很紧，他说：“从前，有人不想活时，就拼了命折腾几个钱出来，大吃海喝一顿，然后全家服毒自杀。我看，蓝破烂不怎么正常……”

不管出于什么缘由的分析，反正一连几天，蓝家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了居民组的严密监视之下，只不过当时蓝家的人自己不知道就是了。

那年已经学会了两位数加法的小学生蓝小玲，怎么也弄不明白爸爸为什么那么高兴，她狼吞虎咽地啃着鸡肉，吃着羊肉馅儿饺子，她甚至听爸爸唱起了歌，一边从锅里往外捞饺子，一边摇头晃脑地唱着京剧，但反反复复是“里格隆格里格隆”的过门，还用嘴摹仿着锣鼓家什的动静。

终于，7岁的小玲从哥哥们神秘的交谈里弄明白了，爸爸白捡了一大堆金元宝！

蓝小玲像爸爸一样，睡不着觉了。她知道金子是无价之宝，她看过好多好多的小人书，她懂得金子的价值。她一点都不觉得这事有什么不合逻辑，爸爸是好心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门口来了逃荒讨饭的，爸爸还把人家让到屋里，拢一把火叫讨饭的烤烤心口窝，宁可自个儿厚着脸皮到左邻右舍去借一把苞米面，也要煮上半锅放了盐的苞米面糊糊，让讨饭人喝下热乎乎的一大碗，才打发人家上路。在蓝小玲的心里，爸爸这样的穷人、好人，正是小人书、童话里的善良人，最后总会感动神灵，不是得到一个宝葫芦，就是拿到了开金山的钥匙。爸爸这不是也得到好报了吗？

孩提时代的蓝小玲却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爸爸反倒像有了心事，几天来唉声叹气，饭吃得也少了，一连好几天没出去捡破烂，一个人常常坐在门口小板凳上发呆。

终于，有那么一天，在吃过晚饭后，蓝明超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叫到一起，他把破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又把门带严，脸绷得紧紧的，使蓝小玲感到压抑，也感到几分神秘。在描写地下斗争的影片里，地下党的工作者们，通常都是这样开秘密会议的。

蓝明超揭开了炕席，撬开两块活动的土坯，又拿出了那些金子，这一回，不是包在水龙布包里，而是藏在一个大号罐头盒子里。

蓝明超把金元宝、金条、金豆子全都倒在他面前的炕席上，他把一双常年忧郁的眼睛在儿子、女儿们的脸上盘旋了好一会儿，轻声说：“你们都看见了，这是金子，白捡来的，从破沙发里白捡来的，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刚上初中的蓝义说：“捡的，又不是偷的，该咱家宽绰宽绰。”

老大蓝仁说：“这些金子，都是被赶到乡下去的臭资本家的，全是剥削来的，不要白不要。”

“你说呢？小丫蛋儿？”蓝明超把忧郁而慈爱的目光掉向了蓝小玲。

蓝小玲不知道该怎么说。

爸爸苦笑了，那是真正的苦笑，眼光是苦的，嘴角的两条深深凹陷的八字纹也是苦的。多少年过去了，蓝小玲眼前随时都可以再现出父亲当时那种叫人浑身打战的苦笑。

蓝明超说：“是呀！这是捡来的，是金子，孩子们，你们知道这么多金子都能干什么吗？”

“能买好多烧鸡吗？”蓝小玲尖声尖气地问起来，在她看来，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怕要数烧鸡了。

“买烧鸡？”爸爸说，“也许能买一列火车呀！”

蓝小玲记得，当时听了父亲这回答，她拍起小手，欢呼起来，好像还说过那我们就一天吃一只烧鸡！她也记得，她的话遭到了三个哥哥一致的嘲笑。

爸爸是怎么说的了？啊，他说，这是不义之财，他说，这是有主的钱，昧着良心留下，无异于偷，无异于抢！那我们一家人就成了小偷、成了强盗！

蓝小玲记得，爸爸当时拍着女儿的脖子说：“傻丫蛋儿！买烧鸡算什么？这些金子换成钱，能买一栋漂亮的小楼，就像对面花园巷有汽车那家的房子一样。”

“那咱冬天再也不用捡煤核了！”蓝小玲说，“冻得人家手指头生疼，机务段那个打更老头还总撵！”

蓝明超说：“这些金子，换成粮食，咱家一百年也吃不完。有了这些金子，爸爸可以扔掉铁丝钩子，再也不用去收废铜烂铁、破报纸、破瓶子烂罐子了，再也不用天天猫着腰，在臭气熏天的垃圾箱、粪堆跟前捡破烂儿了。”

“那可好了！”蓝小玲委屈地噘起了小嘴，“那他们再也不敢管我叫垃圾千金了！”

哎，垃圾千金！这个绰号曾怎样尖刻地刺伤了小女孩的自尊心啊！也许，她不应该因为借一块香橡皮与同桌的小女孩吵起来；也许，她不该揭小女孩的短——她抄过蓝小玲的算术作业。反正，蓝小玲惹恼了同桌的那个有着一双单眼皮，高挑着两条细眉毛的高雅丽，一迭声叫着：“垃圾千金，谁不知道你是臭捡破烂儿家的垃圾千金！”

那时，她们班上刚刚传看过“垃圾千金”的小人书。

蓝小玲哭着跑出了教室，她死活不肯再去上学，她向爸爸提出了挑战：除非爸爸扔下铁丝钩和捡垃圾的破竹筐。幸亏几天以后，班主任老师带着高雅丽登门来赔不是，还给她带来一块香橡皮，这场风波才算过去。可是暴风雨过去，却不等于没出现过风暴，它在她幼小的自尊的心灵上仍留下了深深的斑痕。

现在，这些闪闪发亮的金子，居然可以让小女孩从此摆脱“垃圾千金”的厄运，那是何等样的快事啊！

然而爸爸却对孩子们说：“这金子，就是一座金山，咱们也不能动。它不是咱们用汗水换来的，花了这昧心钱，心里有愧，一辈子睡不踏实。人穷，不能穷得没志气。”

于是，蓝明超又把装有金子的罐头盒子塞到了炕洞子里，左打听，右打听，直到10年后，才找到了金子的主人。因为金子是他们家死去的老太太藏的，老太太又没告诉家里任何人，所以这意外的一注财，都使他们吃了一惊。可想而知，他们将要怎样报答这个好心的捡破烂儿的。

可是蓝明超分文不取，那家人家送来谢礼（20两黄金）他再送回去，反复五六次，后来蓝明超急了，他说：“我若希图你这20两，当初早就把五十多两一起吞了！”

那家人家想想也有理，只得作罢。

从那以后，风里雨里，蓝明超还是披块塑料布，脚穿“水袜子”，佝偻着腰，出没于长街曲巷，敲着木梆子收废品，或者徘徊于大大小小的垃圾站，度着捡破烂儿的生涯。他的女儿蓝小玲呢，自然也摘不掉“垃圾千金”的徽号。当然，只要蓝小玲不同别人吵嘴，就听不到“垃圾千金”这句不堪入耳的话。

多少年来，蓝小玲最怕听到的莫过于“垃圾千金”了。她没有办法封住别人的嘴，惟一能做到的就是忍辱负重，她即或在同学当中明显地吃了亏，也绝不同别人争吵，她不怕胳膊粗力气大的男生，她也不怕刀子嘴的姑娘们，她怕的是他们占不到便宜时骂出“垃圾千金”这四个字，那是叫她心灵战栗的字啊！

啊，“垃圾千金”，既雅又俗的名字！

如今，受完高等教育的蓝小玲再想起这四个沾满童年泪水的字来，她突然感到好笑，已经没有昔日的战栗感了。

天渐渐亮了，火车在过一架大铁桥，轰隆隆的声音震耳欲聋，高大的钢梁从窗外闪过。趴在茶桌上的老汉带着腮帮子上的涎水醒过来了，茫然地望着她……

穷人家的温暖

列车正点抵达终点站，蓝小玲不像那些采购员、出公差的人急着去找旅店，她干脆坐在座位上等车厢里走空再下去。

她掀开车窗，向外面张望着。她又盼望家里人接她，又怕亲人出现。她真怕突然见到哥哥嫂子们出现在站台上，一个个面目凄伤，右臂上缠着青纱，那太叫人受不了啦……可是，若是谁都不来接呢？同样可能是凶兆，那就证明父亲已经危重到床前须臾不能离人的最后时刻了！

她后悔，本来不应当拍电报的，你拍了电报，报告了车次，意思不是叫家里人来接的吗？

站台上比闹市还要热闹，接站的人不比下车的人少，大包小裹从敞开的车窗向外传递着，人们大声寒暄着、戏谑着，还有一些没接到人的几个小伙子，别开生面地在刚买来的报纸上写上几个毛笔字，标明接某某，双手擎着报纸，在熙攘的人群中走来走去，样子煞是滑稽。

会是谁来接她呢？大哥蓝仁吗？一般来说，会是他来的。大哥是对蓝小玲最温和宽厚的一个了，不像老二蓝义、老三蓝礼，从小就好和她拌嘴、吵架。大哥平时哪怕烧了一个土豆，也要掰给小妹一半，吃一根黄瓜，总是把尾巴那一端留给自己，而把另一头分给小妹。

若是没有那个嫂子，该有多好呢！

这十分可笑的念头，不止一次地在蓝小玲心头浮起。嫂子苗彩凤不是冷面人，可她心不正，她用买罗锅香皂的手段污辱爸爸人格的事，蓝小玲永远不能原谅。小玲能忍下这口气，全看大哥的面子。当妹妹的知道，哥哥也未必满意这个妻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朋友是可以考验的，日久见人心嘛。当你发现朋友心

术不正时，你可以同他断交；可是对老婆，你就不能这样。在蓝小玲刚上大学的时候，他家的君子兰还没有成气候，经济上相当拮据。临上车的时候，大哥再三提醒，掌管财政大权的嫂子苗彩凤才不十分情愿地从钱包里拿出 30 元钱，扔到炕沿上。蓝仁很不满，刚问了一句：“不是拿 50 吗？”苗彩凤就火了：“你们都肯扎脖，就给她 50！可是没米下锅了！呸！也不搬块豆饼照照，捡破烂儿人家也想念大学！”

蓝仁要揍苗彩凤，倒是叫老头子拉开了。在上车站的当儿，蓝仁把一个小纸卷悄悄塞到了妹妹的香皂盒里，在火车开动前，二哥蓝义给妹妹买了一块冰砖，放到了茶桌上。

火车启动了，蓝小玲发现香皂盒里有 5 元钱，沾着香烟屑，散发着一股烟辣味儿。她知道，这是每月大哥法定留下的烟钱，他把这 5 元钱给了妹妹，他这一个月抽什么呀？当她打开冰砖盒要吃冰砖时，又看到了二哥蓝义塞给她的 5 元钱，也是烟钱……

她哭了一路，多少年后想起来还心酸。她家穷，穷得不多见。可是，她感受到的温暖也是别人家不多见的。记得那是蓝小玲 8 岁的时候，有一次清早 4 点起来，带上早饭到江东广场去开万人大会，庆祝一条最新指示发表。吃饭的时候，她躲不开同学的眼睛，就低着头用饭盒盖扣着饭盒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谁也看不清她吃的是什么饭。她却闻到了从别人饭盒里飘散出来的一股股扑鼻的菜香，小姑娘们互相夸耀着妈妈炒菜的手艺和爸爸对孩子们的关心，互相分尝别人的食品，蓝小玲不用抬眼睛，也感觉到了那些诱人食品的存在，巧克力豆、朱古力糖、栗羊羹、熏鱼片、烧鸡大腿、五香牛肉干、松花蛋、火腿肠，当然还有千层饼、抹着奶油苹果酱的面包片……终于，快嘴快舌的小丫头高雅丽喊了声：“看蓝小玲吃什么好东西呢，一个人吃！”尽管蓝小玲死死地捺住了饭盒盖，腮帮子里鼓着一团没有咽下去的食物，脸憋得通红，死也不肯松手，可饭盒盖到底叫人家揭开了，原来是

几片苞米面大饼子，比平时好一点，用油煎了，舍不得在锅里多放油，有一面煎糊了。同学们都傻了，愣了一小会儿，大家争先恐后把各式各样的好吃的一古脑儿往蓝小玲饭盒里塞，她哭了，真怪，那时为什么哭呢？是对家贫如洗感到羞愧，还是为同学们的友情所感动？也许，那时的蓝小玲太不懂事了，回到家里就同爸爸、哥哥们拉脸子，再带午饭时光带苞米面饼子、萝卜条咸菜，她说什么不带了，宁可饿着。后来，大哥、二哥想了个法子，演了一场戏，如今想来，蓝小玲绝对相信，那是一场有准备的戏！可8岁的她，却一点没有想到他们是在演戏。

有一天，蓝小玲背着补了好几块补丁的书包从学校回来，爸爸正在院台上挑拣、捆扎五颜六色的破布头，大哥蓝仁和二哥蓝义在窗子里写作业。他们见妹妹拿起水瓢在喝凉水，就开始了一场样子很神秘的谈话。

蓝义说：“真的吗？”

蓝仁嘘了一声：“小点声，别叫小丫蛋听着。”

蓝小玲家虽穷，可她在家里也是个“小公主”，平素里是不让人的，一听两个哥哥有事瞒着她，偏偏凑过去偷听。

蓝义说：“把小丫蛋送给人家，她能干吗？”

蓝仁说：“她能乐意。她不是嫌咱家净吃大饼子，净穿带补丁的衣裳吗？上别的有钱人家去吃好的、穿好的吧。”

蓝小玲信以为真，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跺着脚喊叫，不让哥哥把她送人。从那以后，她又照常带苞米面饼子、咸菜条子，只有一样没法改，一到吃午饭时，她就悄悄溜到教室外面去，找大墙下的一角，坐下来，饭盒盖捂得严严的，一个人进餐。

是啊，她怎么能在同学堆里吃呢？即使她不怕寒碜，她也受不了别人那种窥视的、怜悯的、施舍的目光。

她觉得她比别人矮一头。

她也有她的安慰。她有三个爱护她的好哥哥，他们替她编蛔

蛔笼子、鸟笼子，带她到郊外大豆地里去抓大肚子青蛔蛔，用滚笼子去滚苏雀，真有意思极了！滚笼子里放上一撮香味诱人的苏子，引来一群群苏雀，它们在笼子上一站，活动的滚盖一转，一下子把鸟儿滚到笼子里去了……

这种快乐，是班上同学们所没有的，穷有穷的欢乐。

蓝小玲不禁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穿戴。在这节长途客车的车厢里，什么人都有，她蓝小玲穿得不算奢华，可也不能叫寒酸了。

她穿着所谓“开放式”的连衣裙，质料很高级；坐在车窗旁怕风大，她的肩上披着一件开司米薄绒衫；一双薄如蝉翼的肉色长筒连裤袜套在她那两条丰腴的、颀长的大腿上，更显出了她的苗条。不了解蓝小玲底细的人，都以为她有着十分优裕的家庭环境，班上的“女诗人”小凡不是摸着她光滑细腻的胳膊说过：“你的肌肤简直是汉白玉雕成，我们有理由推断，这是奶油的转化……”的话嘛！

蓝小玲也纳闷，她的皮肤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光洁而又富有弹性的呢？小时候，她又黄又瘦，肩胛骨像一副人工的颈托支在下巴底下，脖子细细的，头发又稀又焦，一点光泽都没有。从小学到中学，她的体检表上都写着那句话：营养不良。

这一切，都是遥远的过去了，“垃圾千金”如今是一所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而且即将拿到学士证书。她有理由骄傲，可她没有心思骄傲，一是拾垃圾的人下决心供一个大学生，那该是怎样的艰辛啊！

一想到此时捡了一辈子垃圾的父亲生死未卜，蓝小玲真是嫌这火车跑得太慢了。

“蓝罗锅”不是人的绰号

蓝小玲在接站的人群中寻找着亲人的面孔。她看见，一个老太太搂着一个刚跳下车的女孩子在哭，那是高兴的哭。她也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提着枣木手杖，笑吟吟地会同远行归来的儿子亲热，他们脚下是来自南国的特产、水果，站台上到处是天伦之乐。

假如不是父亲病重，那该多好？父亲就会佝偻着身子，来回搓着那一双粗糙伸不直的大手，走到车厢底下来，把那双虽然混沌却仍充满父爱的慈祥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女儿脸上。

然而，今天却不可能了，也许……蓝小玲不敢想下去了。

她始终没看见亲人的影子。她的心里开始打鼓了，这可不是好兆头。电报已经发了快两昼夜，绝不会接不到。她回头看看车厢，人几乎走空了，只剩下腿脚不怎么灵便的山东老汉正背起他的麻花被行李卷最后一个走下车去。

蓝小玲急急忙忙提起她的帆布箱子和重得几乎提不动的食品网篮。

站台上接站的人差不多都簇拥着亲朋们下了地下道出站了，提着大扫帚的清扫工开始清扫站台。蓝小玲正在发呆，看见三哥蓝礼从地道口钻了出来，一溜小跑，不断地左顾右盼着。

“三哥！”蓝小玲尖着嗓子喊起来。

蓝礼大步奔过来。

蓝小玲向来对这位三哥不怎么折服，也许因为他们年龄的差距太小，兄妹俩从小就是在争吵中过来的，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儿。当然，两个人打架，十有八九是蓝礼要败诉，不是挨爸爸一顿训斥，就是叫二哥蓝义打几巴掌，不管有理没理，理由是“妹妹小”。“小，怎么不吃屎？”蓝礼不知从哪儿学来这么一句粗野

的话，常常拿出来对付父兄们的偏向，以示抗议。后来长大了，虽然蓝礼不再和妹妹一般见识了，妹妹也不怎么注意他，他净讲歪理。蓝小玲听人说过，“老大傻，老二尖，胡搅蛮缠是老三”。她把这套并不科学的俚俗话套用到自己家里，倒是真像。蓝仁可不是有一股傻呵呵的劲嘛！对人宽厚，能忍耐；蓝义精明过人，主意特别多，家里遇到大事小情，向来都是他充当首席军师；至于老三蓝礼，那是被父亲骂做“混世魔王”的角色，他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头，都轻易不肯吃亏，他确实有诡辩的天才，能把鹿说成是马，把黑说成白，他干事玄乎，用别人骂他的话来说：“放屁都掺假”。他念书，很少有及格的时候，三天两头有老师来家访。老师站在堆满各种垃圾的当院里，半掩着口历数蓝礼“蔫坏”的时候，也经常要把蓝明超绑在一起训斥，无非是“家教不严”、“纵子为恶”之类。蓝小玲清楚地记得，在蓝礼小学毕业前夕，他的校长亲自登门了，是个个子很小却锋芒外露的精干女人，她一方面宣布“不发给蓝礼毕业证书”，一方面把矛头转向了蓝明超。女校长用脚踢了一下脚边的破铝锅，说：“现在来看，清楚了，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出什么孩子。”言下之意，捡垃圾者的孩子理所当然地是社会垃圾。

天晓得，只念了6年书的蓝礼现在居然是轻工机械厂的供销科长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在当采购员、商品推销员的几年里，居然使一度陷入瘫痪的轻工厂又活了，他成了1200名职工心目中的功臣！妹妹曾经问过他：“你没使过诡诈手腕吧？”蓝礼只是嘿嘿一乐，说：“只要目标达到了，人们没有理由再去追究手段。”

他纯粹是个混世魔王。

蓝小玲打量三哥一眼，他还像从前那么瘦，以至于那么瘦窄的牛仔裤穿在他身上还显得肥。他的头发长得盖住了脖子，从后

面看上去，完全像个女的。

蓝小玲迅速瞥了一眼哥哥的胳膊，她的心放下了，没有戴着青纱。她真害怕哥哥嫂子们是佩着青纱来接站的。

“爸爸怎么样了？”蓝小玲胆战心惊地问。

“够呛。”蓝礼替妹妹提起沉重的网篮，看了一眼网篮里的食品，说：“买这么多东西干吗？现在是吃啥吐啥。”

一句话说得蓝小玲鼻子发酸，眼眶里立时被泪水噙满了。

走在黝黑的、不时地滴水珠的地下道里，蓝小玲说：“若能早一点发现……就好了。”

言语之中，埋怨之意是听得很清楚的。

蓝礼粗声杀气地说：“早有什么用？只要得上了癌，那就是判了死刑，早一天晚一天都是死。”

蓝小玲吃了一惊，她没想到三哥会用这种口吻说自己的爸爸。她本想说几句话给他听听，可转念一想，又忍住了，刚下火车，何必讨个不愉快呢！

蓝礼在走上地道口时，放下了大网篮，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来，烟盒十分讲究，蓝小玲认得，这是美国名牌香烟万宝路牌，在上海黑市上，一盒万宝路卖到4块钱，蓝礼居然抽上了这么高级的烟！真是财大气粗的样子啊！蓝小玲不由得想起了父亲，他也吸烟，戒了多少次都戒不掉。抽不起甲级烟，也抽不起丙级烟，他成年累月地抽一种没有商标、没贴印花的“经济牌”烟，市场价9分，他一个月花两块多钱就够抽了。而如今，他的儿子一盒烟要比他一个月的烟钱高出一倍！

“你有兴趣养花吗？”蓝礼忽然这样问了一句，见妹妹发愣，马上补充了一句：“啊，就是君子兰。”

蓝小玲简直不能理解，除非是他的神经出了毛病，他一不问妹妹旅途劳顿，二不说父亲病状，见面先说君子兰，她心里老大不舒服，就顺口说了一句：“我不喜欢。”

“我就知道你不喜欢。”蓝礼扔掉大半根香烟，提起网篮追上妹妹，说：“你从小就不怎么喜欢花呀草的，一天到晚用功啃书本。若不你能考上大学，成为咱家的女秀才？”

蓝小玲皱了皱眉，强忍着内心的烦躁，她刚要问父亲的病势，蓝礼又把话岔到别处去了：“唉，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同桌吗？对了，她说你和她翻过脸，她给你起过外号？”

蓝小玲马上想到了，他说的是高雅丽，那个有着一对好看的小酒窝的胖脸女孩，头发偏黄，有两道自然的水弯儿，说起话来像麻雀儿，唧唧喳喳，聪明、拔尖，却有点自傲、讨嫌。

蓝小玲不明白，三哥何以无缘无故地提起高雅丽来？无论从时空观念，还是从心理气氛出发，都有点不搭调。她不好冷落了三哥，就应付地说：“哦，你是说那个高雅丽吧？听说她进了地方曲艺团当了报幕员？”

“那是上个世纪的历史了，”蓝礼有点眉飞色舞的样子了，他说：“去年，她考上了市电视台的播音员，报名一百多，高雅丽考上了，大概香港选港姐也没这么难。”

蓝小玲不禁侧过头去望望蓝礼的脸色，她恍然大悟地问道：“这么说，大哥信上说的你那个女朋友就是高雅丽了？她爸爸是特级厨师！”

“你扯哪儿去了！”蓝礼说，“那个，我根本没看得上，站着和躺着一般粗。高雅丽是主动追我的，上个月的事。她今天本想一起来接站的，台里赶着听她录一盘去新加坡参加博览会的带子，临时分不开身了。”

蓝小玲沉默了。她不知道是不是该向三哥祝贺。不假，高雅丽是很迷人的，她怎么会爱上蓝礼这样一个粗俗、刁钻的人呢？他到底有哪一点可取？论长相，他没有大哥那么五官端正，也没有二哥那么洒脱、漂亮；论才学，他没有大哥那么内秀，也没有二哥那么精明、有见地……她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这些都

不是蓝小玲急于要知道的，也就不想多问。

蓝小玲已经来到收票口了，她问：“大哥、二哥都守在医院里吧？”

“唔，”蓝礼含混其词地应了一声，答非所问地说：“大清早起来，谁愿意跑来接站。”

这分明是讥刺大哥、二哥了，这又引起了蓝小玲心底一阵不快，不过她马上又释然了，大哥、二哥向来看不惯三哥那一套，所以蓝礼对两个严厉的兄长有几句微词，用点旁敲侧击的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当蓝小玲要出站时，从背后传了一声浑厚的吆喝：“小玲——”

这好听的声音她太熟悉了，她不用回头也听得出，这是大哥蓝仁的声音。

果然，蓝仁从地道口冒上来，跑得气喘吁吁。满头是汗，这个三十五六岁的人，才进入中年，脑门儿却有点秃了，他的脸圆滚滚的，天生的善相。

蓝小玲喊了声“大哥”，放下皮箱扑了过去，一拉蓝仁的手，泪水就顺脸淌下来了。

蓝仁拿手绢给妹妹擦着泪，说：“别哭，看叫人笑话。我方才到卧铺车去接你了，你怎么坐了硬座？这么远的路，太累了。不是给你寄钱，叫你买卧铺票了吗？”

蓝小玲说：“在西藏路预售票口要排上一天一宿的队，才能抢到一张卧铺票。在露天坐一天一宿，换得在车上躺一天一宿，不合算。”

大哥、三哥都笑了。

蓝礼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以为大哥不会来接小玲了呢。”

蓝仁问他：“这么说，你昨天晚上没守着老人？”

蓝礼说：“怎么没守着？”

“你又撒谎。”蓝仁说，“你若在家住，早晨能赶到车站来？”

这话问得有理。蓝小玲家在西南郊糖厂附近，火车站是在东北郊，正好是个对角线，足有二十多华里远，早晨4点钟电车，汽车都没出来，蓝礼怎么来得了呢？

蓝礼说：“大哥忘了，我有雅马哈！”

蓝小玲从两位兄弟的回答中得知，患了肝癌的父亲没有住医院，竟然还在家里。

蓝小玲觉得有点难过，她问：“怎么，没送爸爸去住院？”

蓝礼说：“住哪都一样。”

蓝仁说：“联系了医大、省院、市院，都不乐意收，治不好又压床。”

蓝小玲不再吱声了，她恨不能一下子就飞到父亲床边去。

站前广场乱哄哄的，人头攒动，细看，并不全是等火车旅客，原来那里新辟了一个君子兰交易市场，出摊床的、摆地摊的，还有捧着几盆小花苗走动叫卖的，一片市声聒噪震耳。

“谁要君子兰，真正‘短叶和尚’，四片叶子一百块，就这么便宜……”

“真正‘油匠’……”

“哎，‘花脸’……”

“谁买君子兰花土，发酵的柞树叶子腐植土咧……”

“六寸花盆，八寸花盆，八折大减价咧——”

“速效君子兰花肥，一片管半月，比浇臭豆子水、鱼鳞水好多了，没有臭味，不招苍蝇不生蛆，物美价廉咧——”

蓝礼摆脱几个纠缠着要他买君子兰的，说，“去去去，都是些花贩子，净骗人。”

一个穿港衫的小伙子把一个花盆快举到了蓝小玲鼻子底下，那是一个八寸口的泥花盆，里面密密匝匝地栽着二三十棵一片叶子的君子兰花苗。他声嘶力竭地叫嚷着：“认货的快买几棵花苗

吧！货真价实的‘蓝罗锅’，人家一颗子儿卖 200 块，咱这在杀价……”

蓝礼有点恼怒，嘟囔了一句：“又来冒充！”

蓝礼回过头来，撂下网篮，点手叫住穿港衫的小伙子，说：“我叫你认识认识什么叫‘蓝罗锅’！”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了蓝皮工作证。

蓝仁仿佛明白了弟弟又要闯祸，赶紧上前去制止：“算了算了，到处都在冒充‘蓝罗锅’，你教训得过来吗？”

蓝礼不听，他走过去，劈胸揪住那卖花小伙子的领子，气势汹汹地问：“你这花真是‘蓝罗锅’吗？”

那小伙子还嘴硬：“你他妈放手！不是‘蓝罗锅’，老子是你养的！”

蓝礼松开手，把工作证打开，说：“你他妈长正眼珠看看，老子是谁，‘蓝罗锅’就是我爹！”

“哎呀妈哟，我可该死了！”那小伙子连连打躬作揖，“对不起，爷们儿，我请爷们儿去下馆子……”

“老子山珍海味都吃腻了！”蓝礼说。

“那是，那是。”卖花的小伙子满脸赔笑，“小的真没法孝敬您老了……我这是为混个三块五块的，才不得不这么没出息，我是认打认罚了。”

“那好吧，”蓝礼说，“不打不成交，你哪天到我那去一趟，有你的好处。你知道我家大门朝哪面开吧？”

“这话说的！”那小伙子说，“全市谁不知道蓝罗锅家的高门楼？改天我一定去看您，我早就想去您手下当个小哥们儿，混上一碗馊饭吃……”

蓝礼大度地一摆手，顺手扔给小伙子一根万宝路香烟，转过身来。

他发现，妹妹傻呆呆地望着他，就说：“走啊，到那边去，

我去叫一辆出租车。”

蓝小玲一动没动。她真纳闷，三哥蓝礼成了什么人？他这一套伎俩，同书上、电影里看到的黑社会势力有什么不同？她不明白，那个玩世不恭的卖花人，怎么对蓝礼那样服服贴贴？她更不能容忍的是，她的哥哥们竟然容忍别人取笑父亲，拿父亲的生理缺陷开玩笑。听他们的对话，在这座君子兰风靡的大城市里，“蓝罗锅”已不再是父亲不雅的外号，它已经是一个君子兰品种的名称，像“和尚”、“油匠”、“花脸”一样，只是一种代号。她感到压抑、悲凉。她不由得想起爸爸在院里养着的几十盆菊花，什么“醉妃”呀、“蟹壳黄”呀、“垂丝”呀、“祖母绿”呀……个个名称都挺雅，使人闻名而思其花。想不到，众口铄金的市花君子兰，却有那么多粗俗不堪名字！

二哥正笑眯眯地等在小车停车场呢！这出乎兄妹三人的预料！

二哥蓝义还和从前一样潇洒，他穿着深咖啡色西装裤子，浅烟色尖头带褶的皮鞋，西装外衣没有穿，却打着一条显然不是国产的雨过天青色领带，挺括而漂亮，还别着一枚镶有一小粒钻石的²⁴开金的领带夹子，鼻梁上架着一副几乎看不出颜色的光学变色镜。蓝义受过中等专业的教育，在蓝家算是秀才了。他在蓝小玲的心目中是威信最高的，换句话说，有时达到崇拜的程度。蓝小玲认为，蓝义靠自修得来的知识，绝不亚于一个拿到学士学位证书的文科大学学生。只不过人总得服从命运的安排，迄今为止，蓝义不过是一家运输公司的调度员而已。

“你把公司的车开来了？”蓝仁问他。

蓝义莞尔一笑，说了句：“哪儿还弄不来一台车。”说着领蓝小玲走向一辆银灰色的皇冠轿车。

老三蓝礼一看车，就叫了起来：“哇，豪华型！啊，认出来了，这是廖副市长的车，对不对？”

蓝义不置可否地一笑。

蓝小玲想起了哥哥们在信中说到的廖副市长去探望父病的事，心里纳闷，这廖副市长和哥哥们有这么深的交情？

廖副市长的司机完全像对待廖副市长一样，把三个车门一一打开，在蓝小玲上车的时候，司机甚至伸出一只手去，挡在车门上方，像保护首长一样，生怕门框子碰上头。

蓝礼不坐汽车，他有他的雅马哈摩托车。

绿色金条

暴发户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蓝小玲今天总算大开眼界，看到了。

她仅仅是两年没有回家，她的家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了。

土不土洋不洋的砖墙足有两米高，砖墙上还拉着 2 尺多高的五道铁蒺藜网，如果公安机关允许，蓝小玲相信哥哥们还会架上电网的。

现在，皇冠牌豪华轿车就停在砖院墙门外了，蓝小玲饶有兴趣地望着那两扇紧闭着的铁门，是刷了灰绿的。她也发现，对面街道有好多邻居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眼光在打量这户壁垒森严的人家，以及出入这户人家的各色各样的人群。蓝小玲突然感到老大不自在，她认得出，那些目光里有怀疑、有羡慕，但更多的怕是嫉妒、轻蔑，甚至仇恨。

她最不能容忍的是门铃旁边公然吊着一块木牌子，上写一行红油漆小字：好消息，供应正宗蓝罗锅花粉，每支价格 35 元，欲购从速。

蓝小玲吓了一跳。她万万没想到，授点花粉，也竟要出这样昂贵的价格！这一来，她更能理解路人为什么投过来鄙夷不屑的目光了。

她心里不舒服极了。

蓝礼的雅马哈摩托车也赶到了。大哥揪了几下门铃，门开了。开门的人是个面目颇似土匪的青年，一脸大胡子，他好像专门为蓝家看门似的，在大门里头搭了个布篷，布篷里挂着一支双筒猎枪。

由于蓝小玲多看了大胡子一眼，蓝礼感到有必要向妹妹解释：“他姓刁，人可不刁，侠肝义胆，是咱家的镖师。”他的话里含着几分自豪，声音很大，故意让大胡子也听得到，大胡子赶忙过来替蓝小玲拿东西，其实，这时的蓝小玲手里只有一个小手提袋了，大胡子还是再三抢了过去。

蓝小玲禁不住打量自家的小院。这还是从前她所熟悉的，终年散发着垃圾固有的霉气的小院吗？一个生人偶然进了院子，他会想像得出，这院子的主人曾经是以捡垃圾为生的吗？绝对不会有一种联想了。

从前堆放破鞋底子、烂布捆和废铜烂铁的小棚子已经拆掉了，院子向外延伸了有十几米，座北面南建了一排平房，不知是舍不得拆还是为了怀旧，在毗连新房的西房山头，还保留着一间旧房，另一半拆掉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院子里高高耸立的玻璃花窖，好气魄！窖里亮堂堂，高低错落地摆着楼梯式的架子，架子上满是大大小小的君子兰，这盛夏季节已经不是君子兰开花的旺季了，可是花窖里仍然有许多棵花开得正红火，那一团一团金红色的喇叭花，特别喜人，你即使是对花卉绝无兴趣的人，也非得朝那里看上一眼不可。当然，你只能看到君子兰影影绰绰的影子，大概为了防止夏季阳光过量吧，玻璃窖里支起了一张张挡光的软竹帘。

这就是号称“绿色金条”的君子兰！在这五面透光的“玻璃金库”中，贮存着从前捡破烂儿的蓝明超想都不敢想的一笔财富啊！

蓝小玲仍然感到这像一场离奇古怪的梦。

大门沉重地响了一声合上了，大胡子又坐到了凉篷下的木椅子上，打了个哈欠，点起一支烟，也是万宝路牌。

门铃响起来。蓝小玲感到好奇，回过头来。

只见大胡子扒在门上的“潜望镜”里看了几眼，根本没有开门的表示，只冲门外冷冷地问：“干吗？”

外面来人全是央求的口吻：“烦您通报一声，我想见见蓝仁同志。”

“见他干吗？”大胡子冷冰冰地问。

“这个……”外面的人犹豫了一下，说：“想看看花……”

“看花？这又不是公园花房子！”大概大胡子觉察到了这样一点：在众多蓝家人面前，这样专横跋扈，不十分妥当，就缓和了一下口气，问：“那么，你有老廖的批条吗？”

“老廖的批条？”门外的声音里透着茫然。

门里的蓝小玲也感到迷茫，抬起脸头来问蓝仁：“哪个老廖？”

“啊，老廖就是廖副市长。”他耐心地给妹妹解释，“前一段社会治安不大好，接连出现几起盗抢君子兰甚至杀人的大案，鞍山的一伙歹徒，光天化日之下，就开来汽车持枪行抢。为了保护一些大养花的人身安全，廖副市长很重视，他规定，凡是没有他批条的人，都不能随便到咱们家来看花。”

蓝小玲感到哭笑不得，她真想冲口说出几句风凉话，可这时哥哥们已经把蓝小玲簇拥到父亲的屋子里了。

蓝明超依然住在他住了大半生的泥坯房子里，墙壁倾斜，潮气把糊了多少层的旧报纸都洒下来了，一进屋，就感到窒息，潮土的气味和什么东西霉烂了的腐臭气味紧紧地包围着小屋。

蓝小玲快步走到父亲床前。

她感到，躺在被子里的已经不是一个活人，而是十足的一副

骷髅。只有那瘦骨嶙峋的脸上还有一对能够转动的眼睛，还能证明他有一口气，还活着。

“爸爸——”蓝小玲哽咽地叫了一声，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个不停。

“爸爸，小玲从上海赶回来看您了。”大哥蓝仁略微弯下腰，在病人耳畔喊了一句。

蓝明超听见了，他的眼珠在转动，他终于看到了女儿。他还有一点气力，从被窝里伸出一双抖抖的手，想抬起来，想握住女儿的手，可是办不到。

蓝小玲坐到了父亲床边，双手握住了父亲的手。

还是这双手啊！粗糙，僵硬，伸不直，并不拢，骨节粗得出奇，黑黑的皮肤上布满蚯蚓样的筋包，散布着大大小小的色素斑。这双手操劳了一世，它们捡过世上最不干净的东西，也创造过世上最圣洁的财富。如今，这双手已经失去从前的刚劲，失去昔日的热力了。在大学一年级的時候，系学生会办了一种不定期的文学刊物，刊名是《苏州河》。编委们再三向蓝小玲约稿，她终于写了一篇散文，写的是她在高中毕业以后的日子里，碰上了一个心地善良的捡垃圾的人。她在那篇作品里，着力渲染了父亲这双看上去并不美的手。当然，那时候，她仍然没有勇气向同学们承认，这个捡破烂儿的人正是女大学生的父亲。她没有想到，这篇作品轰动了复旦大学校园，其轰动的程度不亚于当年卢新华的《伤痕》。在全系一次旅游会上，在平波似镜的淀山湖畔，同学们要她讲述，是什么力量使她能那样真切地写出捡垃圾的老人？同学们说，那捡垃圾的老人有着一颗金子样的心，只有作者也有这样的心，才能碰撞出最亮的火花来。

蓝小玲哭了，她自愧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她承认了自己“垃圾千金”的历史。

她讲完了，几百名同学回答她的是沉默和沉默过后暴风雨般

的掌声，女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上来拥抱她，她非但没有受到歧视，她反而成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公主，她的外号很快传出去了，人人以认识“垃圾千金”为荣。她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从淀山湖回到上海后，她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发现她的床上堆满了东西，简直成了百货摊！大的从毛毯、线毯、毛巾被到外衣、内衣；小的到袜子、牙膏，一切日用品应有尽有。有新的，也有旧的，都是同学们支援她这个“垃圾千金”的，她一下子成了富翁！而此前，她只有一条衬裤，半夜里洗了，悄悄拿到锅炉房，把衣服贴在锅炉壁上烘烤。有谁能相信，这么大的姑娘，直到迈进大学校门，才买了第一双球鞋呢？

现在，握着这双曾经使姑娘备受歧视和屈辱的手，也曾使她获得同情和友爱的手，她真想痛快淋漓地哭一场。可又怕父亲心情会更加沉重，一忍再忍地啜泣着。

大嫂苗彩凤听到信儿过来了，二嫂刘娜也过来了，大家在老人床前围了一圈，都在说些无用的话安慰着垂危的病人。

蓝小玲打开一瓶罐头又一瓶罐头，她恨不能让父亲把一辈子亏空下来的好吃的一下子都补进去。然而，父亲只象征性地喝了一点桔子水儿。

女儿指着堆在一旁的各种水果罐头说：“那是我们班的女诗人廖小凡送你的，菠萝是吴坤送的……”

“替我谢谢你的同学，”泪水在爸爸眼里打转了，“可惜呀，我不能给她们干点什么。”

“怎么不能？”女儿强做笑脸，说：“她们还要你的君子兰花籽呢！”

“行，行。”父亲的头在枕上动了动，眼睛寻找着人，最后，眼光定在大儿子蓝仁身上：“别忘了，给小丫蛋的同学一人一棵小苗……”

蓝仁说：“一定。”

父亲又说：“挑好的给，给‘蓝罗锅’……”

“爸爸，您怎么也这么叫……”蓝小玲一阵心酸，又哭起来。

苗彩凤转过身去，对妯娌刘娜说：“烧的！上百块钱的苗子，大把大把往出扔啊？死人不心疼，活人还心疼呢！”

“少废话！”蓝仁斥了她一句，说：“该上班都上班去吧，叫老人清静清静。”

苗彩凤就坡下驴，走到门口，拽了丈夫的袖子一下：“给我拿一棵‘蓝罗锅’！”

“怎么又要？”丈夫看了两个弟弟一眼。

“要工资改革了，定哪个级上还不是领导一句话？人家能拿‘蓝罗锅’去打溜须，咱不兴去打打进步？”苗彩凤索性明说，话里挟枪带棒。

“你别指桑骂槐好不好？”老三蓝礼吃不住劲了。

“你捡骂呀？”苗彩凤凑了过来。

“算了算了，老人病着呢，你们这是何苦！”幸亏老二把他们拉开了。

这些，都被躺在床上的蓝明超听到了，一直含在眼眶里的两滴泪珠到底流了下来。

蓝小玲用手帕在父亲脸上沾了沾泪珠，说：“爸爸别难过，您的病不要紧的。”

“病，我并不伤心，人总是要死的。”他叹口气，“我捡了大半辈子破烂儿，本来是分文、寸土、片瓦都留不下的，没想到，这几年君子兰花成了气候，无意间倒留了一笔财产给你们。没钱当然不好，分文可以憋倒英雄汉；钱多了，若是使人黑了心肝，那比没钱更不好。我这心不静啊……”

“爸爸，您放心吧，”蓝义走上来，说：“您的儿女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

老人点了点头。

蓝小玲见哥哥们都要退出房间了，悄悄问道：“不能这么硬挺着啊！不能住院，也得请医生来呀！”

蓝仁对蓝义说：“你去找找廖副市长，想想办法。”

蓝义豪不犹豫地点点头：“我去叫廖副市长写个条子，到肿瘤医院去请郭大夫。”

蓝小玲这才放了点心。

蓝明超的脸部肌肉开始抽搐，接着大汗淋漓，肝区又发剧痛，疼得他直打滚，蓝小玲不知怎么办才好。幸亏哥哥拿来一丸绿豆粒大小的药丸塞到病人口中，过了一阵儿，才消停了。

“蓝 罗 锅”

蓝义去找廖副市长求援请医生去了，别人都要到单位去“点点卯”。据苗彩凤说，为了照顾老人的病，她已经被扣发 20 多元钱的奖金了。

蓝小玲巴不得人们都走得远远的，她好有机会单独同爸爸在一起多呆一些时间。

到了盛夏季节，这间小屋子还没有安纱窗，绿头苍蝇结伙成群地从敞开的窗子飞进来，它们不但扑在罐头上、水果上，有几只讨厌的苍蝇偏偏欺侮病人，单往父亲的眼角上叮，怎么轰赶都没用，飞了去还要再盘旋回来。蓝小玲终于看清楚了，苍蝇是相中了病人眼角的眼屎。

她心里挺不是滋味。也许他们好多天没给病人正经洗脸了吧！小玲拿沾了水的白毛巾往爸爸脸上轻轻一抹，白毛巾立刻留下一片灰黑的污迹。她看到了爸爸露在被子外面的脚，干燥得老皮皱裂，黑得如同刷了一层漆。蓝小玲打来半盆凉水，从竹壳暖水壶里倒了点开水进去，伸手试试，掀开被子给老人烫脚。在掀开被子的时候，被子里腾起一股又潮又霉的汗臭气息。

眼泪在蓝小玲的眼圈里打转。方才她到过大哥、二哥们的新房，窗明几净，连地板都刷了朱漆，亮堂堂的照人，蓝小玲没等迈进大哥家的门槛儿，大嫂苗彩凤早殷勤地哈腰摆上了一双锈花拖鞋。一点儿都不夸张，他们的地板要比父亲的床铺干净得多。

也许是怕妹妹有什么误会吧，蓝仁说：“咱爹就是怪，叫他住新房说啥不干。”

蓝义接过话碴儿说：“这叫习惯势力！爸爸看惯了垃圾，你突然把他放到真空中，他非憋屈死不可。”

于是，哥俩都摇着头、耸着肩膀笑起来，特别是蓝义，耸肩膀、摊手臂的动作挺优美，像地道的西方人。他们的笑，当然是笑肮脏的父亲不可救药了，明显地带着怜悯的色彩。

蓝小玲给父亲揩完脚，泼了脏水，坐到床边来，轻声问道：“爸爸，您感觉咋样？”

父亲吃力地睁开了眼睛，眼睛表面像蒙着一层半透明的灰雾，他艰难地喘息着，又抖抖地从被窝里伸出手来。

蓝小玲把他的粗糙大手放在自己的手心上，问：“您想吃点什么吗？”

父亲摇摇头。

蓝小玲说：“二哥去请好大夫了。”

父亲嘴角咧了咧，露出一丝苦笑，那意思是说：再好的药治得了病，却治不了命……

父亲的嘴吃力地一张一合，好像在说什么，声音小得很。蓝小玲侧歪过头去，把耳朵贴近父亲的脸，她听清了父亲那微弱的声音：“我不行了……这一辈子对不起你，叫你跟我背了黑锅。你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爸爸也不好受……”

蓝小玲心里好难过呀！她知道爸爸是指她高中毕业时那件事。她和所有争强好胜的女孩子一样，以为穿上军装当上女兵比什么都神气，她偷偷地报了名。在填写表格时，她很费了一番心

思，她惟恐填上父亲是捡垃圾的叫人瞧不起，就自作聪明地填了个“自由职业者”。当然，这小把戏很快被拆穿了，领兵的人冷冷地对蓝小玲说：“嫌你父亲是捡破烂儿的，我看你脑瓜子里就是一堆垃圾！”

蓝小玲比挨了一刀都难受，她真是死的心都有啊。那天后半夜，全家人总动员，才算在江边把她找到了。父亲一言没发，没埋怨女儿，也没有骂别人势利眼，他伏在江边水泥栏杆上好一阵痛哭，哭得蓝小玲实在受不了啦，她明白父亲为什么哭！

今天，这个捡了一辈子垃圾的人处在弥留之际，仍然以为自己不光彩的职业玷污了家风，玷污了孩子们的名声，他是在向孩子们道歉呢！

蓝明超没有料到，女儿听了她的话，非但没有赞同，反倒说：“爸爸，捡破烂儿有什么丢人的？既不偷又不抢。若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干这个？从前女儿不懂事……其实，作为捡破烂儿、收破烂儿的人的女儿，一点也不低级。”

“不，不，”父亲说，“你是个要出阁的姑娘啊，这名声对你太重要了。好在如今好了，我要……走了，永远走了，你就再没有一个不体面的爸爸了。”

一席话说得女儿泪珠往下掉。

她相信，自觉自愿，并不是父亲的本意，他不过是顺应世俗的观点，让孩子们高兴就是了。她永远忘不了父亲暴怒的那一次，一根木棒打在三哥的后脊梁上，棍子都打折了！为的是什么？还不是因为三哥蓝礼轻侮了他的人格！那是蓝小玲初中毕业的时候，学校照例要召开家长会，汇总三年来的情况，与家长沟通消息，研究报告学校。以往，所有家长会的通知单，蓝小玲都偷偷烧了，根本不叫爸爸过目。她宁可挨老师一顿狠批，也不愿叫爸爸到学校去献丑。平时有些同学都不拿正眼瞧她，假如爸爸一出现在家长会上，还不招来很多闲话？有一次，在谈个人理想

的班会上，高雅丽居然当众嘲弄她，高雅丽说她“长大了要去捡破烂儿”，惹起全班同学一阵哄笑，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蓝小玲，她恨透了高雅丽，也恨爸爸。

毕业前夕的家长会再叫爸爸缺席，那老师肯定不依了，老师不是警告她了吗：“李燕的爸爸是省委书记，人家明天都来，你爸爸总不至于比省委书记还忙吧？”老师是绷着脸说的，很严肃，可女教师却没有让同学们同她一道严肃的权威，她这番话的反响是又一阵哄堂大笑。

蓝小玲想请大哥代劳，兄长也可以算家长的。不料这事叫爸爸知道了，他本人非要去，而且连夜收拾了一身干净衣服。就在这时候，拉了几个同学在他家打扑克的三哥蓝礼摔下一张扑克牌，用轻蔑、揶揄的口吻对爸爸说：“得了吧，你！你一个捡破烂儿的要和省委书记平起平坐啊？你不嫌丢脸，人家小玲脸上还挂不住呢！”

这一回，蓝明超彻底被激怒了，他罗锅着腰，从破烂儿堆里抽出一根拖布把，朝儿子打去，只一下，就打断了拖布把，可见用力之猛。

这是蓝小玲有生以来看到父亲脾气发得最大的一次。

蓝小玲恰恰从父亲的发怒窥测到了他的内心，他有他自己强烈的自尊，他不承认他是下等人。

所以，今天听了爸爸的话，她心里就更不平静。她哽咽着对一脸痛楚表情的爸爸说：“爸爸，您别再这么说了，我到什么时候都是收破烂儿、捡破烂儿人的女儿。爸爸，我已经告诉我大学里同班的同学了，我乐意她们叫我‘垃圾千金’。爸爸，您捡破烂儿的手是脏的，可您的心是干净的……”

也许是女儿的理解和宽容打动了蓝明超的心吧！他的眼眶再一次被泪水噙满，他那被每一根痛楚的神经所制约着的面部肌肉也仿佛一下子松弛下来，露出了只有女儿才看得出来的笑容。

大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接着是汽车刹车声、门铃声，大胡子把门人审慎地向外张望了一阵儿，大门才打开，二哥蓝义陪着一个头发几乎全部掉光的胖老头进了院子。

她知道，这是哥哥请了名医来了，赶紧在父亲床边收拾出一个干净座位来。

医生怎么没进屋来？噢，被哥哥引到君子兰玻璃花窖里去观赏名贵花卉去了。

蓝小玲站在窗前，可以看清玻璃花窖里绰约的人影。那位医生风度翩翩地倒剪双手，饶有兴趣地东看看、西瞧瞧，没有头发的脑袋不住地点着。

过了差不多半小时，蓝义才陪着大夫进屋来了，大哥蓝仁也赶了回来，他握着医生又胖又软的手，左一个“教授”，右一个“教授”地呼唤着，一个劲叫蓝小玲点烟、沏茶、开冷饮，弄得蓝小玲不知道干什么好。

胡教授看来确是权威，他一不披白大褂，二不拿听诊器，悠然自得地倒背着手，略微向前躬着背，以至于脖子后头堆起老大一堆肉，他瞧着病人的模样，和方才在花窖里鉴赏君子兰花没什么两样。

胡教授是有经验的医生，不慌不忙。恰在这时，蓝明超的肝又疼了，疼得一头大汗，左一下右一下地翻滚着。

胡教授像没心没肺似的慢慢悠悠地说：“唔……肝疼，疼时吃什么药？烟土？这不好，容易掩盖病症。打开被子……”

他在父亲隆起老高的肚子上扣了几下，轻轻摆摆手，示意家人盖上被子，走了出去。

蓝小玲一见父亲那涨得像泡过水的鼓皮样的肚子，心彻底凉了。她还对医生抱有一丝幻想，三脚两步地跟出去。

胡教授被让到二哥的西屋，坐到仿羊皮沙发上，抽着烟。

蓝小玲跟进来时，他们并没有谈父亲的病，也没谈药方，却

在说君子兰。

“听说‘宋大绝户’卖君子兰有一百多万存款了？”胡教授问。

“难说，”蓝仁说，“他是个有骆驼不说牛的主儿，不见得有。”

苗彩凤说：“只多不少！越有钱越抠，买国库券你猜他买了多少？一百块！不够一根毫毛！”

“他没儿没女一个老绝户，攒那么些钱干什么？”胡教授的口气是不屑的。

“留着铺棺材底呗！”苗彩凤这么说了，大概首先她自己觉得挺富于语言艺术，格格格地乐起来。

蓝小玲扭身退出了房间，见蓝义正在门外点头叫蓝仁出来，样子鬼鬼祟祟。这时，胡教授已经改换话题，同苗彩凤一起探讨养花经了，施什么肥好？是泡臭豆子水好，还是用发酵的鱼鳞水适宜等等。

蓝仁轻轻关上了房门。

蓝义手里托着三个小花盆，每一个花盆里都栽着一棵两片叶子的君子兰花苗。

蓝仁把三盆花都摆在窗台上，对比地摸着每棵花的脉纹，嘴里啧啧有声，决心好难下。

蓝义在一旁敲边鼓：“这棵是‘大胜利’串的花脸，色气淡，底板也厚实，将来叶子不会宽；这一棵呢，倒是短叶，可不亮；这一棵亮是亮，板也厚，倒是抱头和尚，只是颜色太深。”

蓝仁沉吟着说：“若不，狠狠心，给他一棵‘蓝罗锅’？”

蓝义面有不悦之色：“等全市到处都有‘蓝罗锅’了，你那罗锅可也就没有专利权了。”

蓝仁沉吟着说：“这几棵搪塞不过去。胡教授常到廖副市长家去，方才你又让他看了花窖，他能认不出什么样子的是‘蓝罗

锅’？反正从爸爸那些花苗子里出一棵，你心疼啥？

蓝义叹口气，虽然不怎么痛快，也不再说什么，又把那三盆花端回花窖去了。

蓝小玲在一旁听着两位兄长的对话，她突然觉得两个哥哥都变得陌生起来。

蓝义又从花窖里拿出一盆花，也是两片叶子。蓝小玲分不出是好是坏，不过她从他们的对话里听出来，短叶，圆头，叶宽，叶脉凸起清晰，色发金黄，这就是好品种。那这棵小花正是这样。

蓝义发现妹妹跟在身旁，不知是出于卖弄还是出于惋惜，叹口气，对蓝小玲说：“你别看这棵花只有两片叶，一片叶子就值200块！这就是人人想得到的‘蓝罗锅’，爸爸没白教过植物学，他会远杂交，不知怎么授的粉，培育出这么个好品种来……”

蓝小玲真想给他几句难听话，可她还是忍住了，她只是催他：“快给医生送去吧，听听他怎么治爸爸的病。”

蓝义看了妹妹一眼，说：“是啊，不是为了爸爸的病，我能舍得把这些独一处的花送给他？”

一棵颇负盛名的君子兰引起了胡教授极大的兴趣，又是夸，又是赞，他捧着那棵花，像捧着诺贝尔奖证书一样兴奋。

终于，他无意间瞥见了蓝小玲的冷脸，他下意识地放下花盆，说：“令尊大人的病，说句不好听的话，凶多吉少。不过，我要尽力而为。最近，从德国进口一种新抗癌药，据说疗效显著，只是价格昂贵了点，公费医疗的人一般都不给用。前几天，商业厅余副厅长肺癌晚期，要用几支，都不给报账。你们家是不成问题喽……”他说到这里顿住，笑了笑。

蓝小玲听得出言外之意，像蓝家这样的靠养君子兰起家的暴发户，就是吃龙肝、吞凤胆也吃得起的。

她看见，蓝仁和蓝义迅速交换了一下用意不明的目光，没等

说话，却叫快嘴快舌的苗彩凤抢在头里了：“贵得很吧？一支多少钱？”

胡教授一笑：“一支 200 块钱左右。”

苗彩凤尖叫了一声。

听着这声音，蓝小玲像被锥子扎了一下。

毕竟大哥说了一句：“没关系，也就一棵小苗钱。”

蓝小玲总算踏实了。

官运与风雅

胡教授带着那棵权当“车马费”的君子兰走了以后，蓝小玲就催几个哥哥去买那种代号“SLM”的抗癌新药。

“一天一支，200 块，十天两千，一个月 6 000 块……”蓝仁抱着肩膀，自言自语地算着细账。

蓝义说：“若是能起死回生，就是花再多点也无所谓。”

蓝仁说：“这种进口药，怕是有钱也买不到，一般都是供应高干病房的。”

蓝小玲心急如焚，听他们像讨论菜市场价格一样不紧不慢地讨论着，就说：“你们不是认识廖副市长吗？”

蓝义瞥了蓝仁一眼，说：“大哥，你去吧。我这脸舍了好几回了。”

蓝仁打怵地说：“我去不大合适吧？你跟廖副市长熟，我只跟他的秘书打过几回交道，我去了办不成反倒夹生了。”

蓝义想了半天，说：“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这么办吧，我写张条子，叫小丫蛋去，大学生能办外交。”

没等蓝仁和苗彩凤附和，蓝小玲自己早抢先说话了：“我去，二哥快写条子吧。”

蓝义从台历上扯下一张纸，刚要写，蓝小玲生气地抢过来，

揉成纸团扔到了地下，她跑到父亲的房间，从自己的提包里拿出一本信笺，扔给蓝义。蓝义一边写一边解嘲地说：“这有什么！我那回陪廖副市长在电影公司小放映室看参考片，我亲眼见他扯开一个空烟盒，在烟盒纸上写了几行字，叫人拿走了，一样是圣旨！”

蓝小玲拿着蓝义写的条子跑了一下午，总算在临江门宾馆小宴会厅里追上了廖副市长，他正陪外省来的客人吃饭。服务员不肯为蓝小玲通报，蓝小玲在休息室里等得好心焦，每隔几分钟都要把脸贴到半透明的玻璃隔扇那里去，踮起脚尖朝里看看。碰杯，用纸餐巾擦嘴，把一大勺子菜敬给客人……只剩下了一圈茸发的廖副市长根本无暇旁顾。

终于，廖副市长把膝头上的纸餐巾团成一团扔掉，拿起一根牙签，同客人一起退席了。

蓝小玲顾不得礼貌了，紧迈几步，拦在屏风右出口，叫了声“廖副市长”，就把蓝义的字条递上去了。

廖副市长咬着牙签，打量了蓝小玲一眼，看了字条，拔下口中的牙签，一脸都是笑：“啊，你就是蓝罗锅上大学的女儿？看不出，看不出……”

蓝小玲不明白这一连串的“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她也无心追究，陪着笑脸说：“给廖副市长添麻烦了。”

“没关系。”廖副市长坐到了休息室的长沙发上，向客人们摆摆手。然后向服务员伸出手，要来一支圆珠笔，就在蓝义那信纸的右上角批了几行字：“特药商店保健室：请卖给 SLM20 支”底下是龙飞凤舞的签字。

蓝小玲千恩万谢地告别了廖副市长，坐上公共汽车赶到了特药商店门口，这才想起来没带钱，不要说 20 支，她连一支药的钱也掏不出来呀。

她又乘上无轨电车往回跑，她插在口袋里的右手紧紧捏着廖

副市长签了字的条子，像是捏着父亲的生命线，只要松一松手，父亲的魂灵就会从她手上飞升似的。

三个哥哥都不在。

只有二嫂刘娜在给病人喂粥。爸爸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眼睛都懒得睁开，不张嘴，喂了几口稀饭又全都从嘴角流下来。

天已经黄昏了，夏日白昼长，倒不怎么黑，刘娜见蓝小玲回来，就从病人床边站起来，说：“你在这儿守一会儿，我去给君子兰浇水。”

外面一丝风也没有，屋子里又闷又热，蓝小玲拿一把葵扇给父亲缓缓地扇着。她实在太困了，后来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一阵唧唧喳喳的谈话声把蓝小玲惊醒过来，她捋了一把鬓发，绞了一条湿毛巾给父亲擦擦脸，循声向外望去，原来大哥蓝仁、二哥蓝义站在玻璃花窖门前商量着什么事情。

蓝小玲从兜里摸出廖副市长的批条，正要走过去，却又停住了。

只听蓝义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这种钱，花它一万两万都值得。”

蓝仁显然没有二弟那么开通，他不怎么情愿地说：“修长城咱拿了5 000，少年福利基金会又是5 000，有什么用？一张白纸盖了戳，一张收据！抓咱大头，吃大户罢了！”

蓝义轻轻一笑，说：“修长城，本来应当出一个数！捐一万块，就在长城垛口给你刻一方石碑，写上名字，那不是万古流芳的事？哼，省5 000，可倒好，你的名儿想刻到虎头砖上也不可能。”

蓝仁说：“虽说君子兰有点进项，可也不能摆阔、充富，叫人家拿大头啊！”

蓝义说：“你呀，大处不算小处算。依我看，这钱与其这么东撒一把，西撒一把，你不如拿万八千块钱送送礼，请请客，想

法弄个园林处长之类的小官干干，那可就不是土包子了。”

“算了吧，”蓝仁说，“园林处长算个什么芝麻官儿！一点儿权没有，栽树、种花、养金鱼，我还没瞧起。但这好歹是个官儿，你却要拿一万去巴结个什么市政协委员，那更是图虚名了。政协我知道，都是些民主党派，没职没权。”

“旧脑筋。”蓝义说，“那是社会名流，不能小看。现在我们算什么？土财主、暴发户，背后没有靠山，说不定哪天政策一变，你还不是革命对象？廖副市长都 60 出头了，说不定哪天就要退居二线，那就不灵了！当了处长、当了政协委员就不一样了，谁敢碰一碰？”

蓝仁叹口气：“我真心疼，这么大把大把地往外扬钱……”

“光看到扬，怎么没看到搂？”蓝义说，“别的养花户谁敢在家里成交？自从廖副市长成了咱家保镖，你少上了多少税？别人不敢惹咱，还不是打怵咱背后那根粗腿吗？”

“那，你就照量着办吧。”蓝仁有点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的模样像一个被抢光了钱的人。

蓝小玲十分惊疑，她万万没有想到，生活在 80 年代的兄长们，竟如此笃信金钱的神通！他们企图依仗金钱的魔力，使自己平步青云。过去她看过《官场现形记》，也看过《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她什么都可以理解，却对拿钱捐官感到惊奇，1 000 两白银可捐个四品候补道台，500 两捐个七品知县……哈，如今不是也有人想捐处长了吗？

这时，她又听蓝义在开导大哥：“从前，我把报社呀、电视台呀的记者领家来，你不高兴，送他们几盆花瞧你心疼的，好像摘了你的心肝肺！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些造舆论的人得罪不得，他们都是造蜜甜造醋也酸的人。大笔一挥能弄得你没脸见人，叫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大笔一挥，也能让你出人头地，一下子变成知名人士！没有这帮人，你上电视？没有这些笔杆子，谁知你

老大贵姓？你看。”蓝义从手提兜里又掏出一份报纸，展开给蓝仁看：“这标题多棒：发家不忘爱国，致富争做贡献。我市君子兰专业户蓝氏三兄弟捐款公益事业。”

蓝仁咧开嘴笑了。

蓝义说：“有多少君子兰大户每天提心吊胆，怕有个风吹草动，咱们不怕，背靠廖副市长这棵大树，左手抓住一帮笔杆子，右手攥着一把钱，什么运动能叫咱翻船？”

蓝小玲再一次感到哥哥们陌生得很。这是捡破烂儿人家的孩子？这是捡破烂儿人家孩子说出来的话？特别是足智多谋的蓝义，简直叫她大吃一惊。他那成本大套的处世哲学，她并不感到新鲜。见过，在哪里见过呢？噢，是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她不是写过一篇关于巴尔扎克笔下惟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的论文吗？她那时总感到分析得很吃力，觉得她所要鞭打的丑恶距离自己太远，有隔靴搔痒之感。现在，她忽然感到了心灵的震撼！她一向感到很隔膜的东西就在她自己家里，就流荡在她的亲人当中。

她用了很大的努力才克制住自己，她暂时实在无力旁顾，她惟一牵肠挂肚的惟有父亲的病。她所庆幸的是她家现在不是家无隔宿之粮的年月了，所谓“穷怕有病”，那是真的，蓝小玲小时候只吃过一种最便宜的药——止痛片。牙疼吃止痛片，肚子疼吃止痛片，头疼也吃止痛片。

她默默地把廖副市长的批条递给了蓝义，蓝义看完递给了蓝仁。

蓝小玲没有看到她所期待的欣喜和激动。蓝仁和蓝义交换了一个目光，蓝仁对她说：“你去吧，明天我办。”

蓝义也补充说：“这事不用你管了。”

蓝小玲正要走开，三哥蓝礼回来了，大门开处，雅马哈摩托车一直冲到玻璃花窖前，他停下摩托车，把亮闪闪的防护帽往脑后一掀，气势汹汹地对两个哥哥说：“你们也太心黑一点了！叫

我怎么做人？”

蓝小玲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就站在一旁听。

“怎么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蓝义训了弟弟一句。

“你自己知道！”蓝礼说，“我上次拿钱买咱家两个花籽儿，你们是不是用开水烫过了？怎么一个出芽，一个不出？这不是叫我坐蜡吗？”

“你给朋友买的，怎么会用开水烫？”蓝义心平气和地一笑，斜了妹妹一眼：“你去吧，看爸爸叫你。”他显然不愿叫妹妹听到这些。

蓝小玲简直不可思议。蓝义公开声称，给朋友买的不会用开水烫，那若是卖给素不相识的人呢，用开水烫就是可以的了？她感到不寒而栗。

这时，蓝仁息事宁人地说：“别自家人窝里反了。”

一阵门铃骤响，把门的大胡子接了一个字条，拿过来交给了蓝仁。

蓝仁看了看，交给了蓝义。蓝礼趴在二哥肩头上看了一眼，说：“这廖副市长多事，三天两头写条子来，他自己白得了那么多君子兰，养在咱们家，栽等着点票子，太便宜他了。”

“少胡说八道！”蓝义瞪了弟弟一眼，对把门的大胡子大声吩咐：“快请。”

进来的两个人一男一女，三十多岁，打扮称不上入时，却也不土。这两个人的脸部绷着，像蒙了一层苦霜。

蓝义堆起笑脸往屋里让：“哟，老罗，什么风把你们夫妻俩吹来了？”

老罗夫妻就在玻璃窗前头站住了，怎么让也不肯进屋。

蓝仁也陪着笑说：“进屋，喝瓶汽水、格瓦斯什么的，凉快凉快。”

“不用喝汽水也气饱了！”女的拉长着马脸回敬了一句。

“这是从哪里说起？”蓝义赶忙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冲着你们和廖副市长的交情，我们蓝家人可从来都高看你们一眼啊！”

“幸亏高看一眼，”老罗冷笑一声，说：“若不，你就得拎着棒子劫道了！”

“到底怎么了？”蓝义笑得很勉强。

老罗说：“你别装糊涂了，自己办了亏心事，我不信晚上能睡着觉。”

“这可冤枉！”蓝义的话刚一出口，老罗的女人走上一步，把一方手绢打开，原来手绢里包着三粒发了黑的君子兰种子。

老罗说：“你们哥几个先拍拍心口窝，过来瞧瞧，这种是不是你们的蓝罗锅？我讹没讹你们？”

蓝仁拈起一粒，左看右看，轻轻摇摇头：“这不好说。”

蓝义干脆不看，反问老罗：“你是来干什么的吧？”

“退钱，”老罗的女人尖着嗓子喊，“六粒种子花了1200，我们全家攒了两年呀！夏天连吃个西瓜解解渴都舍不得，希图你家的‘蓝罗锅’名气大，能卖上好价钱，才贴上血本，谁想到你们对谁都这么心黑，还是给三粒开水烫过的！”

“你胡说，”方才还质问两个哥哥用开水烫种子的老三蓝礼，这时双手叉腰，在维护蓝家的声誉和尊严了：“你不能血口喷人啊！大概你常用开水烫种子吧？若不是你说出这鬼点子，我们还没听说过呢！你买走了君子兰花籽两个多月，现在来找后账，谁知道你是不是讹人？”

蓝小玲又打了个寒战。她一刻也听不下去了，赶紧低头走回爸爸的病房。她虽然关上了窗子，仍然能听得见外面的争吵声，蓝家三兄弟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墙，后来苗彩凤也从厨房里跑出来助战，她的尖噪子在三个男低音的合奏里像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

钱能使人变得自己都不认识了吗？

好钢用在刀刃上

5天过去了，抗癌新药 SLM 一支也没买来，蓝仁和蓝义都说“特药商店”无货。

蓝明超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到后来水米不沾，连吃点水果罐头都不能了，全靠着滴注葡萄糖和生理盐水维持生命。

这天下午，蓝明超觉得自己精神略好一些，就把儿女们都叫到床前，他们齐刷刷站了一大片。

蓝明超让蓝小玲在他腰后面垫了两个枕头，还是不得劲，鼓得像临产孕妇似的肚子胀得他气短、气逆。

蓝明超转动着不很灵活的眼睛，看了看他一手拉扯成人的儿女们，说：“我没有多少日子了，我知道，别费力气弄药了。我这一辈子没给儿女们脸上挣下光彩，倒惹来不少骂名。你们吃糠咽菜跟我受尽了苦……”

蓝仁眼含着泪水说：“爸爸，现在不是好了吗？”

蓝礼说得比较粗鲁：“攒房子攒地，也不如你给我们攒下了这些君子兰，无本万利！”

蓝明超皱了皱眉头，喘着气。

趁蓝小玲给蓝明超捶腰的空当儿，蓝义偷偷踢了蓝礼一脚，蓝礼眨巴半天眼睛，弄不明白他哪一句说走了嘴，只好小心地闭住了嘴巴。

气喘匀了之后，蓝明超说：“我正想说说这事儿呢。没钱，不行；把钱看得高于一切，黑了心肝更糟。君子兰前几年只不过是一盆花草，卖上三两块钱是功夫钱，现在一盆好花要价3万、5万，甚至10万，我总觉得不是事儿……你们都有正经事要干，天天算计君子兰，我总觉着玄乎，有那么一天，你们会吃苦头的……”

“您别操心了，”蓝仁赔笑脸说，“我们弟兄几个都长大立事了，还不知道怎么为人？爸爸的话我们记住了。”

蓝义也凑过去说：“爸爸不是常说，老实人常在吗？”

蓝明超又在大喘气，但他似乎并不相信老二的话，一边喘气一边频频摇头叹道：“晚了！我没把你们几个带好，后悔也来不及了，晚了！”

苗彩凤这时向前蹭了半步，用手碰了碰她前面的小叔子蓝礼。

蓝礼会意地点点头，走上去说：“爸爸，趁您还明白，把君子兰给我们分了吧。”

蓝小玲万万没有想到三哥会这样讲话，她马上掉头看父亲，父亲的脸色十分难看。

蓝义想要解释几句，刚叫了声“爸爸”，就被蓝明超摇手打断了。

蓝明超像是赌气地说：“我看你们早晚有一天要毁在这上头。分就分吧，一人一份，男女一样，给我留两棵小苗，摆到我骨灰盒前边去，我一辈子喜欢花，空喜欢了一场。”

一听这话，蓝小玲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她不愿在大家面前哭，就悄悄走出屋子。她在院子里痴呆地站了一会儿，信步来到街上。她偶然发现胡同口那边的杂货铺门前新添了一块牌子，上写“公用电话。”

蓝小玲查了电话号码簿子，查到了“特药商店”的号码，拨通了以后，她客气地询问，那种昂贵的进口药近期能不能到货。

她万万没有想到，对方回答不但说这种药有货，而且说半个月来没断过货，因为价格太高，并不怎么有销路，他们一直发愁推销不出去。据他们讲，这批药过了伏天就有可能失效，因此巴不得有人上门来买，根本不需要什么上级首长的批条。

蓝小玲感到一阵阵耳鸣，她无力地把话筒放到电话机的叉簧

上，竟然忘记交费就走了。杂货铺的老头不客气地叫她：“喂，姑娘，这电话可不是你自己家的呀！”

蓝小玲居然好半天没弄明白老头这话是什么意思。直到老头指了指电话机旁边贴着的“每次四分”的字条，才忽地红了脸，从兜里掏出两角钱，扔到案子上，说了句“对不起”，就逃也似的跑掉了。

她真后悔，干吗要打这个电话呢？这下子可好了，她一下子拆穿了西洋镜，她把两个哥哥一下子都看穿了。大哥唉声叹气地抱怨“特药商店”不多进点这种救命药，二哥煞有介事地骂“特药都走了后门”，咒骂“连吃药都分等级”。其实，他们压根儿都没有去过“特药商店”，或者虽然去过“特药商店”，却将“真事隐去”了。

为什么呢？

除了“怕费钱”这一种解释而外，还能有另外的答案吗？

是啊，一只针剂要 200 元，确实是惊人的，可是，对比起一粒“蓝罗锅”君子兰花籽也卖 200 元来说，这种药又实在显得很便宜了。药再贵，可以救活人命，而君子兰呢，不过是一棵草！报纸上天天宣传它的观赏价值，可是好品种全都锁在深宅大院的花窖里，通电网、狼狗看门，保镖的日夜巡逻，君子兰连观赏价值也丧失了。

更何况，蓝家的花，都是蓝明超所有呢！

蓝小玲机械地迈着步子，她不由得想起了一件往事。

那是她 10 岁那年，她和二哥蓝义到城边去挖猫耳朵菜，在野地里碰到一条野狗，蓝义的小腿肚子被野狗咬坏了，鲜血直流，那几天，正是城里城外大张旗鼓地消灭疯狗的时候，替蓝义包扎伤口的外科大夫不容置疑地要接连注射“狂犬疫苗”，因为他无法断定咬人的狗是不是疯狗。

那时，蓝小玲看见爸爸两眼发直，急得豆大的汗珠子直淌，

他捏着那份交款三联单，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一筹莫展，蓝小玲知道，爸爸没钱。他们家除了一种止痛片可以当“万应散”而外，哪有闲钱买药？

后来，父亲摇摇晃晃地回到外科处置室来了，他本来就黄的脸更黄了，还透着青色。他把交了款、盖了章的药单递给了打针的护士，护士却尖叫起来：“你这是卖血单子！”

原来，父亲误把卖血单子当药方签递上去了。秘密捅开了，两个孩子搂着父亲的脖子又哭又嚎。

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蓝小玲想来，那时候如果医生说，必须用父亲的命换下儿子的命，父亲也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去死。

有谁能想到，就是当年抱着父亲的脖子大哭的蓝义，如今在救父亲命的时候，连一粒君子兰花籽的代价都舍不出来呢！

蓝小玲的脚步加快了，她浑身陡然增添了力气，她要撞开房门，指着蓝仁、蓝义的鼻子大骂他们“不仁不义”。

然而，三位兄长都出去了，扔下处于昏迷状态的蓝明超在床上弃气儿。

蓝小玲气呼呼地问苗彩凤：“他们都上哪儿去了？”

苗彩凤说：“你不风光风光？要去，咱俩一块去，今天他们弟兄可出大风头了。省报、市报、晚报，还有电台、电视台，大大小小的记者都出席咱家主办的记者招待会，听说省市好多头头脑脑的都去，这回呀，不管有什么风浪，咱也是稳坐钓鱼台了，谁敢动咱一根毫毛？看税务局还敢来查偷税！看谁还算计咱们有什么经济犯罪！”

蓝小玲一点儿也听不下去，问：“他们在哪儿开招待会？”

“在省宾馆一楼休息厅。”苗彩凤正把一件入时的连衣裙套在身上左看右瞧，“怎么样？我穿它是不是色太嫩了？唉，钱就是油啊！哪儿浇油哪儿滑溜，你以为那些卖嘴、卖笔杆子的白出力

气呀？还得请他们海吃一顿呢！这早晚什么都涨价，上海参、上对虾、再上点干贝，一桌 150，酒水在外，10 桌要 2 000 来块钱！”

“这可是好钢使在刀刃上了。”蓝小玲望着嫂子冷笑一声，说：“你先别去风光了，先给我拿 2 000 块钱来！”

“干吗？”苗彩凤这才注意到，小姑子的脸色不对，忙笑嚷着说：“要买嫁妆？太早了点吧！也太少了点吧？上个月，园林局邱副局长儿子结婚，你哥哥递上一个小红包，还包了 3000 块呢！”

蓝小玲忍着内心的厌恶，低沉而果决地说：“我不是说着玩的，快拿 2 000 来，我去给爸买特效药！”

“不是脱销了吗？”苗彩凤说，“若有，你大哥他们早买来了，谁不夸他们哥几个孝心？出名的孝子呀！”

“我已经看见孝子了。”蓝小玲咬着牙，说：“别废话了，快给我拿钱。”

“有药了？那种什么 S 什么 M 的？”

“有！从来就没断过。”

苗彩凤咂了咂嘴，说：“哟，花这么大价钱吃药？吃金豆子也没这么贵呀！你等你哥哥回来再要吧，我可做不了主。”

“存折在你手，我打听过了。”

“那又怎么样？我若是不给你呢？”

“那我也有办法。”蓝小玲只觉得一阵阵怒火上攻，喉咙口像架着一堆火。

“有办法你想去。”苗彩凤打扮停当，朝隔壁绿纱窗那边喊了声：“刘娜，走哇，车在门口等半天了，人家廖副市长说不定要等车子用呢。”

刘娜答应了一声，也穿着时髦的连衣裙走了出来。

见她们妯娌扬长而去，蓝小玲只觉得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

上，她三脚两步跑到花窖门前，门锁比新华字典还大。她急了，拿起一个空花盆，照准玻璃花窖砸下去，一块一米见方的五米毛厚玻璃稀里哗啦地碎了，她钻了进去，接二连三地往外搬花，净挑好的搬。

大胡子把门的听到玻璃碎声，跑过来一看，大惊失色，他连忙跑到客厅去打电话。

正当蓝小玲把七八盆正盛开着花朵的君子兰装到筐里打算出门时，门外一阵汽车吼声，随后铁门打开，三个哥哥、两个嫂子，还有一些她根本不认识的人一拥而进。

蓝礼唱黑脸，走过来怒斥妹妹：“吃里扒外，你这是干什么？”

蓝仁出来打圆场：“算了算了，叫人家笑话。”

“笑话我吗？”蓝小玲冷冷地一笑，说：“不是要分遗产吗？这么一大花窖的花，该有我四分之一吧？我拿出我自己的一份，去给爸爸买药，有谁会笑话我呢？”

“药，我买来了。”蓝仁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包装讲究的针剂，他宽厚地一笑：“就你有孝心！”

蓝义也趁势过来收场：“还是小时候那个脾气，惯的你！”

蓝仁把药递给随同他来的小护士，小护士拿着药向蓝明超住室走去。

蓝小玲多少松了口气，怨恨之气也消了不少，她跟在小护士旁，边走边问：“这种药疗效那么好？”

“一般。”小护士说。

“一般？”蓝小玲奇怪了，“既然一般，干吗要 200 块钱一支？”

“200？”小护士也奇怪了，“这药一盒才 4 块多钱呀！”她眨了眨眼，恍然大悟了：“你是说德国进口药吧？那不是这种，这药 50 盒才顶 SLM 一支的钱。”

蓝小玲如同挨了一闷棍，眼前一阵发黑，黑暗中有无数金星在飞溅。她感到胸口堵闷，从来没有过的压迫感。如果说此前她恨的还只是哥哥们的拜金主义，而现在鄙弃的则是他们的灵魂和人格的全部了！

她在恍恍惚惚之中听到了杂乱的、重浊的脚步声和一片大呼小叫声。

屋子里在干什么？噢，有人在哭，或者确切点说在长号，这是男人的哭声，是大哥！

她陡然从迷离中清醒过来，她跑了进去。父亲的病床前围了一大圈人，不知是谁，已经寻来一块白色的蒙脸布把父亲的脸盖上了。

蓝小玲愣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这就是死！

她扑过去，揭去父亲脸上的尸布，摇晃着那张惨白得如同一张纸的脸，哭得天昏地暗。

也许是她丧失了理智，她一边哭一边叨咕着对不起父亲，而对不起的理由就是没有让父亲用上一支价值 200 元的德国进口药。仿佛蓝明超的死，完全因为少了这支药。

蓝小玲被好几个人拖着胳膊架出去了，她在迷迷糊糊中闻到了一种混合香味，她被安顿在二嫂的房间里。她听见各种嘈杂的音响，她觉得这众多的声响简直就不是人间固有的，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

可是，有两个声音从这杂乱无章的声波当中过滤出来了，蓝小玲听得一清二楚。那是大哥蓝仁、二哥蓝义在议事。

蓝义说：“机不可失，要把这丧事办成君子兰花卉联合会的筹备会。”

蓝仁说：“好主意。”

蓝义说：“别怕声势大。另外，把那本小册子散发出去。”

蓝仁说：“万一查出来呢？”

蓝义打了个唉声，不满意兄长的迂腐：“外调还能调日本国去？再说，当时说明白了，就是借日本外宾的面孔用一用嘛，只要人们相信日本人真肯花高价买‘蓝罗锅’，不怕咱们的销路不广，价格还能上涨。”

蓝仁说：“那就按你说的办，把父亲说成是大植物学家。”

蓝小玲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睁开了哭得红肿的眼睛。

“你休息吧，有我们呢。”蓝仁温和地劝她。

蓝小玲头也不回地跑出去。

厨房里烧了一大锅开水，一个帮忙的人正把滚开的水往水桶里打，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蓝小玲突然想起了一句俗语：“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看，不知什么时候，院子里人满了，帮忙的、吊唁的，一伙接一伙，仅仅过了几个小时，院子里已经挂满了用整匹棉布、毛料做的挽幛。

据父亲说，二十多年前妈妈去世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个捡破烂儿的人，用他捡来的破板子勉强拼了个“狗碰棺材”，怕散了花儿，用几道8号铁丝箍住，出殡时说尽了好话，才借了东头豆腐坊的小毛驴车拉出去了。

爸爸自己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死得这么风光！连副市长、局长、科长们都来给他这个捡破烂儿的人送花圈、送挽幛，挽联上写他“功昭日月”、“才富五年”，没有一个不说他“永垂不朽”的。

这一切，不都是因为那一窖绿莹莹的君子兰吗？

突然，蓝小玲提起了人家盛好的一桶开水，一路上泼泼洒洒地跑去。先前没有人注意她，等到有人看见她提着开水跑进了玻璃花窖，便大叫起来。

当蓝仁、蓝义、蓝礼赶到花窖里时，只见花窖里烟雾腾腾，对面不见人，蓝小玲正把开水向一片花丛浇去！

蓝小玲手里的桶被夺下来了，已经是空桶。蓝义的脸都气青了，望着毁掉的几十盆花，都快哭出来了。

蓝礼吼了声：“我劈了你！”抓起一把斧子扑上来，蓝仁夺过了斧子，扔到了地下。

蓝小玲哈哈地狂笑起来……

尾 声

蓝小玲明天就要回学校去了。

她来到存放父亲骨灰盒的火葬场。

不是开放的日子，不让进。

她是中文系大学生，领会别人语气的本领不低。当守门人说：“上回，一个华侨非要看，也不是开放日，也得讲原则嘛，他大方，给了10块钱，是外币兑换券呢！倒不是钱不钱的，我寻思人家是华侨，叫他进去了……”蓝小玲也拿出了10块钱，不过她没有外币兑换券。

她感到欣慰，爸爸的骨灰盒前面真的摆了两小盆翠绿的君子兰，这是老人生前嘱咐过的。送葬那天蓝小玲哭得昏了过去，她被人强迫弄到医院去了，她不知道哥哥们送来君子兰没有。

她向守门人借喷壶。

守门人摇摇头：“干吗？我这儿没喷壶。”

蓝小玲指指高架子上的君子兰：“不浇水，君子兰会枯死的。”

守门人阴阳怪气地笑起来，笑够了，他用脚挪挪小梯子，说：“你上去看看吧。”

蓝小玲踩着梯子上去，这下子看清楚了，这两盆君子兰全是塑料的。她的心在向下沉，好像梯子也在垮下去……是啊，他们怎么舍得把价值几百元、几千元的君子兰花苗送到这里来呢？他

们改送塑料花，却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这才四季长青，真的君子兰谁来浇水！冬天不得冻死吗？”

有理，有理！“还是假的好。”那守门人又阴阳怪气地笑起来。

“还是假的好”，这声音刺得她耳膜疼痛。

果真是假的好吗？

（原载 1986 年 1 期《红岩》）

来自居里大学的报告

“圣女丹兰士”

巴黎是美丽的，巴黎的春天更美。三年前，当夏汉铮离开祖国赴欧的时候，送行的法国专家就曾拍着他的肩膀说过：“去吧，我们的国家是一片玫瑰色的地方。”

如果单就巴黎的市容、风景而言，夏汉铮感到这称道并不过分。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法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巴黎。”他对巴黎作了很高的评价。当你步行在横贯巴黎的辐射形大街——香榭丽舍大道时，当你乘白色游艇绕着塞纳河上的圣路易岛游览的时候，当你举目瞻望神秘的巴黎圣母院时，你都会感受到巴黎的美。何况还有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罗浮宫和蒙马特尔高地、巴黎公社社员墙的历史陈迹！

然而，今天的夏汉铮一点都没感受到巴黎的神奇。他双手插到风衣口袋里，漫步走在塞纳河畔，两耳充满了现代的喧嚣声浪，两眼看到的全是拥塞的车队、人流，仿佛这个拥有法国五分之一人口的大都市正在无限度地膨胀、膨胀，以至于随时有爆裂的危险似的。

夏汉铮的目光，平素是锐利的，但法国朋友说他的目光里总

含有几分无法琢磨的抑郁。也许是吧？现在，他眼里的抑郁成分或许更为浓重了。他没有心思观赏岸旁的夏乐宫、水上饭店，以及载着游客、洋溢着歌声的游艇。

夏汉铮今年 28 岁，脸形是标准的东方型，白里透黄；长短适度的头发有一缕总是贴到前额上，看上去好像无论打多少发蜡，怎样梳拢都不会驯服似的。他的个子有一米七五，即使走在法国仕女当中，也一点都不显得瑟缩。两条腿很长，从体形看，倒像是体操运动员，难怪导师的女儿、画家华莱丽·加士东小姐，总是想约他当模特儿。但夏汉铮没有一次使她满足过，他的时间是以分来计算的，他无论怎样大方，也不会呆呆地坐在画家面前几个小时。

这是春日的黄昏时分，夏汉铮刚从实验室出来，还没来得及回到南郊国际馆公寓去用饭，就接到导师加士东博士从家里打来的电话，约他立即到他家去一次。

夏汉铮来到居里大学快 3 个年头了。他同导师加士东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友谊”，这结论是加士东博士的女儿华莱丽下的，大概是准确的。女儿总比别人更了解她的爸爸。即使是不寻常的友谊吧，3 年来，约客人到家去，这还是第一次。这种隆渥，其他的进修生，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然而，夏汉铮并没有特别开心的表示。加士东博士的住宅在拉丁区，离居里大学很远。加士东已经决定派自己的车来接他，但他没有等。他满可以租一辆车前往，方便得很，只要他向马路一扬手，就会有空座的出租车赶来拉主顾。但他步行习惯了，其实是为了节省几十法郎的交通费。

街心公园飘来阵阵的花香。沿塞纳河栽植的苦栗树早都抽绿了，远看像一片绿色的雾。在这雾的背景上，衬出西天淡淡的玫瑰色的晚霞，及远处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和弓形的耶拿桥。夏汉铮忽然记起，有几个朋友约好，6 点钟准时在埃菲尔铁塔下见

面，要一同游塞纳河。现在，他不得不失约，他不能不先去加士东家。

他思忖了一下，决定先顺河滨路到埃菲尔铁塔那里去告诉朋友们一声。

加士东博士这样十万火急地找自己，会是什么事呢？无疑是商量去日本京都第15届国际半导体物理学会的人选问题。此前，会议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物理学者的论文800余篇，经国际物理学会的专家们以投票方式淘汰了600篇，而夏汉铮的论文却被选中了！

加士东博士高兴非凡，因为他是居里大学实验室的负责人、夏汉铮的指导老师。

加士东博士有可能说服夏汉铮，叫他放弃去京都宣读论文的机会，劝他让给研究组组长、法国人诺埃尔，这是完全可能的。昨天，居里大学学术顾问委员会为此事专门召集了特别会议，做了长时间的研究。这消息是另一个学激光物理的进修生、号称老大哥的姚海透露给夏汉铮的。

夏汉铮感到气愤，但他没有在得到正式消息之前流露出来。他在实验室里照旧专心地搞他的喇曼散射试验，研究他的“共振”，别人无论如何猜不到这位中国进修生心底也在发生“共振”！

他此时走在行人拥挤的人行道上，眼前不禁浮现出诺埃尔油光光的面孔来。那是带有七分傲慢、三分得意的笑脸，镜片里反射出来的光是那么强烈。他为什么笑？是他自以为在这场竞争中胜券在握了呢，还是顾问委员会作出了有利于他的仲裁？

也许，在那篇论文的后面署上了诺埃尔的名字，本来就是一个错误！

不过，这种事是有先例的。同在一个研究小组，同样研究一个课题，彼此之间当然会有征询和交流，诺埃尔执笔的论文，不

是也署过夏汉铮的名字吗？这本来是正常的事情。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夏汉铮坚信这样一种职业道德，那就是，一项研究成果打上谁的标签，远不如那成果本身对人类的价值。因此，他对这类事情，向来是大度的、宽宏的，以至于研究室的人都对这个中国人竖大拇指，说“这是东方人的美德”。

然而，东方人的美德绝不是可以被人利用来巧取豪夺的把柄。今天，夏汉铮就是抱着这样的主意去会见加士东博士的。

一路思考着可能出现的结局，夏汉铮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埃菲尔铁塔下。

夏汉铮睁大眼睛在人群中搜索着，铁塔下人头攒动，都是排队等待乘缆车升到塔顶去眺望巴黎全景的。几乎全是外国游人，一派绅士风度的英国人，刻板严谨的德国人，不拘小节的美国人……可是没有他的朋友们！在国外人群中寻找中国人是不甚费力的。

其实，夏汉铮此时要找的三个人，就站在耶拿桥的栏杆旁。他们早已发现了夏汉铮，见他四处张望，觉得十分开心。他们笑着，故意不及时去喊他。

他们是两女一男，大概由于东方人特有的气质吧，在人海中显得分外出众。

男的叫狄冠云，二十七八岁左右。他身材不高，胖瘦适中，穿一套浅咖啡色西装，没打领带，也没有系扣子，显得和游览气氛十分协调。他的眼睛不大，眉毛很黑，皮肤红里透黑，给人一种健壮的印象。他的父亲狄国良，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生物遗传工程学者，40年代就蜚声国外，50年代初毅然回国，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现已去世。狄冠云继承父志，也学的是生物学，在北京念了3年大学，没有拿到毕业文凭，就投奔经商的叔叔来到法国，在巴黎大学深造。

站在狄冠云左边的女子看上去二十五六岁，有一张圆圆的苹

果脸，眼睛大而有神，皮肤白皙细腻，头发又黑又密，在一片金色、栗色、亚麻色头发中，她是相当引人注目的。这个身材颀长的姑娘，穿一身浅米色西装，朴素而有风度，与她那东方型的典雅、矜持很统一。她是台湾籍留学生，叫李浙杭。人们不难从她的名字猜出，浙江杭州才是她的祖籍。她是学生物化学的。

另一个姑娘是瓜子脸，柳眉凤目，五官都富于表情，一望可知是那种表里一致、藏不住心事的开朗性格。她的年岁与李浙杭相仿，只是没有烫发，而是梳着两条齐肩羊角辫。这发式，本来是过时的，可在 80 年代的欧洲名城，却起到了独树一帜的效果，以至于引起好多法国同龄女孩子的艳羨和摹仿。她的法国同伴们，就有好多姑娘剪短了头发，改梳成了羊角辫。她叫游天凤，来法国留学前是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毕业生。

他们四个人今天的周末聚会，原是游天凤发起的，名堂是敲狄冠云的竹杠。他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遗传工程的论文，得了一笔奖学金。

三个人站在耶拿桥上好一会儿，见站在铁塔下的夏汉铮找不到人急得团团转，李浙杭提议说：“下去吧，他多着急呀！”

“就你心软，”游天凤说，“总是向着他。”说罢带头跑了下去。

三个人从人缝中钻出来，悄悄来到夏汉铮背后。

狄冠云绕到夏汉铮面前，学着法国绅士打招呼的风雅派头，两个手指头向额上一举，用熟练的法语说：“先生，你可是迟到了！”

游天凤的话是标准的湖南腔：“我们把游船都租好了，你迟到了，不守信用，罚你下星期请客。怎么样，浙杭？”

李浙杭文静地一笑，既没有声援，也没有反对。

狄冠云抢着说：“夏先生搞科学，那是采用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时间，分秒不误，而赴朋友约会，却从来都不守信用。”

这时，夏汉铮才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是来告假的。加士东先生约我到府上去，他好像有急事。”

伙伴们都有点扫兴。

游天凤说：“难得过一个痛快的礼拜六。唉！科学有时候真是泯灭人性的恶魔。”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乐起来。

李浙杭事先是知道点内情的，她观察着夏汉铮的脸色，问：“是不是为出席京都国际物理学会的事？”

夏汉铮不想隐瞒，也没心思深谈，只是概要地说了几句，就匆匆告辞走了。

李浙杭冲着他上了公共电车的背影喊：“一会儿，我们到大学城‘四等秘书’那儿去听你的好消息！”

电车一闪，带着夏汉铮走远了。

电车穿过爱丽舍田园大街和圆形的查理·戴高乐广场，越过拿破仑一世时代建成的凯旋门，一直向正东方的辐射大街驶去。夏汉铮站在车中，拉着吊环皮绳，望着闪到身后的高达 50 米的拱形凯旋门，望着记录着 1792 年义勇军高唱《莱茵区军歌》的战士出征历史画面的巨型浮雕，望着凯旋门下的无名战士墓和人们献给壮士英魂的花束，犹然想起了祖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上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按东西方时差计算，此时北京的人们该都沉睡到梦乡了吧？他们可知道此时此地一个远离乡土的游子之心？

不知为什么，自从到了法国，拿着每月 3 000 法郎的助学金，他却留恋着在祖国每月拿 61 元的拮据日子；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一切，却使他感到粗茶淡饭更加可亲。一切他所能见到的、使法国人感到骄傲的古建筑、古胜迹，唤起的是他更炽烈的、向往故土的情怀。

加士东博士的宅院在库尔赛林阴道中段，靠近蒙索公园的地

方，这里地处巴黎略偏西北一点，十分幽静。

当夏汉铮走下电车向加士东博士的院子走去时，他立刻发现有一辆太阳红色的轻便型雷诺牌小轿车停在白石拱门当中，一个金发女郎刚好钻出车子。他认识这辆色泽鲜艳的车，它的主人是加士东的女儿华莱丽。

今天华莱丽好像一反常态，着意打扮了一下自己。她上身穿着一件高领开司米绒衫，裤子是纯白色上等毛料的，裤脚宽得好像能塞进十条腿！由于臀部、胸部的线条全都显现出来，使这个金发女郎显得苗条、丰腴。华莱丽是学美术的，如今在巴黎歌剧院从事招贴画、广告画的设计。她身上那股艺术家不修边幅的味儿极浓。她的头发是不经修饰的，直垂腰际，常常被风刮乱，像一团乱麻。她平素衣着也极随便，喜欢穿男人衣服。夏汉铮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穿着一件西服短裤。会见外国客人，她居然没想到换一换。

那么，她今天为什么着意修饰自己了呢？

华莱丽立即发现了夏汉铮。她跑过来，笑着嚷道：“夏先生，您是个不守信用的人。爸爸在电话里讲好，要您等着，我去接您，可您还是自己走了，叫我白白地空跑了一趟。”

夏汉铮礼貌地躬躬腰：“对不起，我去辞退几个朋友的约会，不能久等。”

华莱丽注视着他的眼睛，忽然一笑，问道：“听人家说，中国人的眼睛都带有几分忧郁，是这样吗？”

夏汉铮尽管晓得天真得像孩子的华莱丽，未必像不友好的记者那样有意提出带有挑衅性的问题，心里仍然不大愉快，一边朝院子里走，一边回答她说：“也许是这样。在我们东方国家，只有懵懵懂懂、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才会像傻子一样整天嬉笑。”

华莱丽两条细弯的眉毛一耸，格格格地笑起来：“但愿我不

是你心目中的那种白痴。”

两个人默默地走进院子。庭院很大，花树成荫，草地上到处是一丛丛郁金香花。在花树掩映之中，有一幢灰色的带四个尖顶的小楼，窗子很小，像一座古堡，特别是四个尖顶阁楼的百叶窗和墙基砌起的两个人高的巨石构造，使人能猜测到，这可能是帝政时代遗留下的建筑物。

华莱丽带他走进一楼楼道，光线很暗，左侧是会客厅，相当宽敞，客厅里有一道螺旋形楼梯通往楼上卧房。由于拉上了丝绒窗帷，虽然天还没怎么黑，屋子里已经点起了灯。

华莱丽给他用电炉子煮着咖啡，说：“请稍等，我马上去叫爸爸。”

这间客厅，可以说是中世纪与 20 世纪 80 年代文明的合璧。也许在买下这栋古色古香的房屋那天，博士就下决心，保持它古朴的风貌。那白漆描金带浮雕的天棚板，糊了红绸的四壁，路易十五时代岩洞式座钟和枝形吊灯，那嵌着意大利乳白石的笨重长桌，那金漆的石膏像，配上咖啡色护壁板，再加上杂乱无章地悬挂在四周的大大小的油画，都使房间增添了庄重和沉郁感。夏汉铮感到自己来到了一家博览馆。

但是，屋子里有电冰箱、空调和一些别的电器用具，毕竟多少使人感受到一些现代的气氛。

房间里特别醒目地悬挂着居里夫人的全身画像。不知是不是出于华莱丽的手笔，显然作者是有意美化了居里夫人的。夏汉铮看到过居里夫人的写真照片，清秀自然是清秀，但绝没有这样美丽。你看，这张油画上的居里夫人，那面目，简直可以同陶里亚美术馆的奥令比亚夫人画像媲美了！

紧挨着居里夫人画像的是加士东的座右铭，那是爱因斯坦的一段话：

荣誉使我变得越来越愚蠢。当然，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就是一个人的实际情况往往与别人认为他是怎样很不相称。比如我，每每小声咕噜一下，也变成了喇叭的独奏。

底下是落款，注着这样一行字：1979年3月14日，时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之时，法国人加士东抄录。

望着这条语录，夏汉铮不禁肃然起敬。加士东本人，也是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世界著名学者。他看重的不是自己的成绩，却是可能由于身价的提高而贻害科学的弊端！

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夏汉铮初来巴黎时，加士东和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我指的是献身科学的你，而不是来寻求巴黎欢乐的你，你不会使我失望吧？”

够不客气的了！好多研究员都替新来的中国留学生捏一把汗。这是叫人难堪的见面礼，有谁准备在踏上异邦土地时，受到的是这种训诫式的欢迎呢？

但是，夏汉铮十分镇静，他回答得十分简捷：“谢谢您！希望您能注意到，我是一个中国人！”

当时，加士东博士怪叫了一声，把他紧紧抱起来，连声喊着：“好样的，中国人！你不愧是中国人！我曾同好几位中国科学家共过事，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天才。”

夏汉铮现在看了这条语录，心里特别振奋。转过头来，他又发现了不协调的东西。

对着窗子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画像，一个穿着帝国禁卫军上尉军服的人，精神抖擞地佩戴着荣誉团的小红丝带勋饰，军帽上高耸着一撮羽毛，样子十分滑稽。

“可笑吗？”捧着咖啡壶的华莱丽走过来，见夏汉铮盯住那幅

画像，就解释说：“这是父亲逼我画的，大概是我的一个什么曾祖父吧，你看他像不像巴拉巴？”

刚啜了一口咖啡的夏汉铮笑了。他知道，巴拉巴是《圣经》中有名的强盗，想不到当年荣誉团骑士的后代，会用这种嘲弄的口吻揶揄她的前辈。

华莱丽就是这样的人，她身上兼有法兰西人的开朗和 80 年代年轻人的爽直。她那对灰蓝色的眸子，永远像深沉的湖，清澈见底。当她眯起眼睛笑的时候，你很容易想到洛兰德圣母院里的画像：美丽绝伦而纯真的圣女丹兰士——她那眯起眼睛望星空的神态，和华莱丽太相像了。

夏汉铮同华莱丽的交往并不一般。他一踏上法兰西的土地，加士东博士就把自己的女儿指定为夏汉铮的业余法语教师。但是华莱丽的随便、夏汉铮的庄重，那是他们之间不太好弥合的鸿沟。所以尽管相处时间很久，他们之间友谊的进展一直不大。

在等待加士东先生下楼来的时间里，华莱丽给他捧来一本厚得像一块砧板的法兰西名画集。

夏汉铮小心翼翼地把画册放到两膝上，左手扶住厚封面，用右手指甲掀开一页。

华莱丽满意地笑了：“你是懂艺术的人，因为你尊重艺术。有些人看画册，总是手指头沾唾沫去翻页子，那样的粗人，我不会给他拿第二本画册的！”

夏汉铮笑了起来。正巧翻到圣女丹兰士的肖像画，他不由得讪讪地站在身旁的华莱丽一眼。

华莱丽不无得意地说：“像我吗？人们都说我的眼睛像丹兰士，其实我的心也许更像！”

夏汉铮敷衍地笑笑，耳朵却注意听着楼上的动静。

加士东博士的天真

顶楼有了轻微的响动。

华莱丽说：“我爸爸下来了。”

夏汉铮赶忙合上画册还给她。华莱丽笑道：“你怕他吗？今天，你可要冷静、机智一点。”

楼梯在响。人没露面，加士东博士的洪亮嗓门在屋顶先响了：“你好啊，聪明的中国人！”

他的嗓音真美，难怪他女儿华莱丽说她的父亲有一副能叫法兰西歌剧院老板发一笔横财的嗓子。

加士东博士没穿外衣，只穿了一件毛坎肩，袖子绾着。他这个大块头，与其说像学者，不如说更像拳击家。他有一部胡萝卜色的卷曲的大胡子，头发又粗又硬，像希伯莱大法官萨姆一样，使人疑心他的全身气力都是来源于头发。

夏汉铮走过去，在楼梯口同加士东博士握了握手。加士东见女儿给他倒来一杯咖啡，摆摆手，说：“来点威士忌吧！加点苏打，还是矿泉水？”

他这话是向客人发问的。

夏汉铮笑笑：“老师知道，我是不会饮酒的。”

加士东也不勉强他，自己从黑橡木酒柜里拿出一瓶双头马牌威士忌酒，斟了半杯，加了一块冰块，一仰脖喝下去，扭头问夏汉铮道：“你能猜到邀请你来的目的吗？我想你是个极聪明的人。”

夏汉铮矜持地笑笑，望着塞满在沙发里的、强壮得如同科西嘉人似的博士，没有回答。

加士东发现女儿还在场，就掉过头去说：“我的小姐，你似乎可以回避了。”

华莱丽耸耸肩膀，站起身，躲到楼梯后面去。那里有一架古式屏风，只能挡住她一半，夏汉铮隐约可以看到她背后画室里凌乱的画具和没完成的画幅、大大小小的画布。

“就我的个性来说，”加士东双臂抱到胸前，说：“好像更具备的是武夫的血质。”说到这里，他有意无意地扫了墙上帝国军人前辈画像一眼，好像在暗示客人注意他的血统和遗传因素。

夏汉铮道：“军人的果决，在科学上也是需要的。”

“说得好！”加士东很兴奋，又倒了半杯威士忌，说“你比其他人更理解我。我是科学家的头脑，军人的作风。过去有一个名人说过，巴黎好比是一片野生的丛林，各种树木、灌木、乔木，都想自由生长，都想探头争得阳光，扎根吸得水分。然而，无能者就要枯死！这是生存竞争吧？”

夏汉铮明白，加士东为什么从这儿谈起。夏汉铮那个研究小组里，惟一可以与他竞争的对手就是诺埃尔硕士了。诺埃尔得过大硕士学位，是高才生，被誉为加士东的得力助手和继承人。确实，诺埃尔极其聪明、好学，而且刻苦，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一连几天叫人锁上门，以至于家里人以为他失踪了，不得不登报寻找。目前，诺埃尔和夏汉铮一样，都在准备考取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它的级别远远高出大学研究生博士学位。用加士东的话来说，这种级别的物理学博士学位，中国人还没有得到过呢。两年多来，加士东相中了夏汉铮，认为他是少有的天才，觉得他在居里大学工作两年就按期回国，未免太可惜了。因此亲自跑中国使馆，亲自跑物理学会，找居里大学校长，为夏汉铮力争，希望他多留法国一年，待拿到国家博士学位后再回国去。但是，这是有困难的。中国科学院与法国科研中心交换进修生的协议规定，中国每年只能向法国输送 80 个学生，是由法国方面出钱的。假如夏汉铮无端地延期一年或两年，就等于挤掉了一个或两个中国进修生出国深造的机会。他于心不忍。他的好朋友，学

业上的尖子，助理研究员耿耶，就是准备接替他下一批来法国深造的，他不能太自私。因此，他谢绝了导师的美意。当然，心里未免有些快快。但是，加士东并没有死心，经他多方奔走，用他的地位、影响，终于说服了法国外交部，外交部破例地同意为夏汉铮每年出一笔可观的学费。

能说加士东博士对夏汉铮不够厚爱吗？夏汉铮本人就十分尊重博士的人品和治学精神。

但是，加士东毕竟是法国人，他也具有法国人的民族自尊。

在他的研究室中，有法国人，有中国人，还有日本人、瑞典人。加士东对居里夫人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他家里就悬挂着居里夫人的巨像。可是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说居里夫人是波兰人，他就要像斗牛场上被惹怒了的公牛一样，跳起来同你争辩。他总要一口咬定，居里夫人是法国人，只能说出生在波兰，充其量是波兰后裔。

平时，加士东对进修生、研究人员们，那是不分长幼，不分国籍，一视同仁，一律苛求的。但是，不管他自己承认与否，在特定的时候毕竟能看出他是向着法兰西人的！

上个月，也是一个星期六，加士东约了诺埃尔和夏汉铮两位高足到距离巴黎西南 18 公里以外的凡尔赛宫去游览。加士东很少有这样的雅兴，尽管夏汉铮有些舍不得一天的时间，还是同他去了。那一天，玩得倒是很愉快，这座建成于 17 世纪的路易十四政府所在地，实在富丽堂皇。这座帝政时代的帝王乐园，从 1837 年以后改成了法国历史博物馆。夏汉铮从大量的文物中，仍可看到路易十六时代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影子，它太像中国的故宫了。

当他们参观完凡尔赛宫，在半月形兵器广场小憩时，诺埃尔赞不绝口地称赞了精美的雕像、典雅的花园以后，突然风马牛不相及地说：“夏先生，我一定能比你早几个月拿到国家博士学位，

你大概会相信吧？’

当时，夏汉铮不明白，诺埃尔为什么冒出这么一句不甚礼貌的话来，他只是付之一笑，没有深想。

可事后，他发现，在安排他们两个人考取博士的次序上，尽管两个人的论文准备情况相差不多，加士东还是优先安排了诺埃尔的论文答辩。考官都是经加士东博士帮学生代请的，可以说法国物理学界的名流荟萃一堂。要知道，考官的身价本身就决定着博士考取者的身价，诺埃尔无形中高夏汉铮一头了。而他夏汉铮的论文答辩，至今还没有确定下来，加士东与夏汉铮的分歧所在，就是五位考官的组成问题。

组成考试委员会，按法国规定，可以由博士学位考取者自己请人。找到的考官声望越高，只会证明你的研究价值越大。夏汉铮请到了5位科学家，两位是法国大学教授，有3位是高等学校的教授（在法国，高等专业学校要高出大学一格，进大学是不用考的，而进入高等学校，那简直同考状元一样难）。夏汉铮连居里大学校长居里教授都请到了。他是居里夫人的后代，巴黎第六大学所以命名为居里大学，也因为当年居里夫人是在这里研究和发现放射线镭的。

在看过考官名单后，加士东基本同意，但提出要换一个人，把新拿到国家博士学位的诺埃尔添到考试委员会名单中去。

加士东的用意，以及为什么匆匆忙忙地先替诺埃尔争得博士考取机会的谜，现在夏汉铮全明白了。如果夏汉铮同意诺埃尔当自己的主考官，不但将使诺埃尔获得非同寻常的荣誉，而且，诺埃尔此后将以导师的身份出现。

夏汉铮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国格与人格的侮辱。夏汉铮在科学上，不耻下问，愿拜一字师。但他不能容忍这种有计划地贬中国人的做法。因此，他在回答加士东先生的建议时说：“我不能请诺埃尔先生做我的考试人，我们是有着两年半以上历

史的同事，不是师生关系。自然，我不否认，他在研究喇曼散射、晶格力学方面，曾给过我帮助，但是，先生当不会忘记，研究固体发光等电子陷阱和异质结，是我开创的课题，而这以前，诺埃尔根本没有接触过。何况，在中国，我是科学院正式考核批准的助理研究员，而诺埃尔先生连这个职衔都没有获取过，只是个大学硕士见习生。试想，要一个见习生给助理研究员当考官，若讲出去，恐怕对法国物理学界是一个很不雅的笑话吧？

一席话，说得加士东博士瞠目结舌，十分难堪。半晌，他起来拥抱了夏汉铮，并拍着他的后背说：“好样的，有国格的中国人。原谅我干了蠢事！法国有句谚语：一个丧失理智的人，可能忘掉羞耻，放把火把巴黎烧掉……”

今天，夏汉铮凭直觉，觉察到加士东也许要重操故技。他也是人，他有作为学者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的一面，也有囿于法兰西民族小圈子在名誉上不平等待人的一面。夏汉铮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不是为了个人出人头地，而是要为祖国保持尊严。夏汉铮决不是那种追名逐利之徒。在国内物理研究所里，1977年，他研究成功了磷砷化镓等电子陷阱掺氮的原理，使每瓦日光灯发光率提高了三个流明。当全国科学大会要他们去宣读论文时，他是叫助手去的。他也没有拿奖金，他觉得一个人搞科学的喜悦是在探索之中，而不在于追逐虚名。

也许，夏汉铮的这些内在品格，是加士东没有研究透，或根本没有着力研究过的吧？

不然，加士东为什么要从生存竞争灌入话题？在他眼里，富兰克林、爱因斯坦、居里夫人，也许统统是生存竞争的胜利者！诚然，加士东平素最喜欢讲科学家的献身精神，他是流着泪讲的，讲的人感动，听的人也动心。在这种时候，他鼓吹的是为科学的“忘我”和“献身”，却从来没有提到过“竞争”。

但夏汉铮却不能否认，在荣誉面前往往存在着各种公开和潜

在形式的竞争，在去京都宣读论文的人选问题的抉择上，不就是一例吗？

夏汉铮曾在旅法同学中宣传过他的观点，中国人是在文明古国受过良好道德熏陶的人，是讲风格的。可是有损国格、人格的事，他将寸步不让！

经过了长时间的沉默，加士东只是不断地喝威士忌。

躲在屏风后的华莱丽好像在作画，膝上垫着一块油画板，手里拿着画笔、刮刀，不时地在画布上涂抹着。由于屋子里过静，岩洞式古钟的钟摆，音响像被夸张了一样大得出奇。

终于，还是加士东博士耐不住沉默，点起一支雪茄烟，叼在嘴上，说：“我的中国朋友，你是理解我的，我同任何人讲话，都是一种乐趣，因为我没有顾忌。但是，今天我有点不好启齿……”

夏汉铮的目光从墙上一幅拉斯达尔的风景画上移过来，看了博士一眼，又去注视紫铜镶嵌的旧式罗马椅子，特别是椅子腿上雕刻着的斯芬克斯头像。他觉得那张说不清表情的脸，仿佛就是从此时博士的脸上套印下来的！

不说话总是不行的，何况夏汉铮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取得结果呢。

因此，他的头又缓缓地抬起来，眼睛盯住加士东的脸，文静而又不卑不亢地说：“记得华莱丽对我说过一句法国谚语：只要心还在自己的胸膛里，即或被绑到火刑柱上，也是坦然的。先生，我希望您有话直说，因为我是您的学生，又是您的朋友。”

“说得好，朋友！”加士东拍着他那大额头，“在朋友面前是可以无话不谈的。”

夏汉铮等待着下文，眼光又扫向墙上的一张临摹画：梵·代克头像。他觉得色调涂得太乱，有点印象派或者野兽派的影子，头像看上去是变形的。

加士东站了起来，在波兰造老式地毯上迈着军人般的阔步走了几圈，站在橡木厚门的旁边，说：“我知道，你是想到京都去开会的，你有这种资格。去年，你在比利时安图惠特欧洲物理学会上的论文就极其精彩，不是有人说这是爆炸了一颗氢弹吗？过去有人说东方人搞科学不行，我看不对。纳粹党人宣传大日耳曼主义，更是混蛋逻辑。中国的现代科学落后，落后于搞科研的条件、环境，绝不落后于中国人的勤奋和大脑。”

又扯远了。夏汉铮怀疑他又要从牛顿或阿基米德讲起。

还好，没有，他开始接近实质性问题了：“我想，你已经比诺埃尔多了一次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了。不久的将来，我还打算叫你去东柏林参加国际固体发光学会议。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你放弃这次去日本京都的机会，诺埃尔很需要出去见识一下。”

急转直下，加士东一下子兜了底。他说完，就抱起臂膀注视着文静的夏汉铮，雪茄淡蓝色的烟雾在他脸部缠绕，熏得他不得不眯起眼睛来。

夏汉铮突然笑起来：“博士给我出了一个比任何实验课题都难做的人生课题。您认为这道题有几个解呢？”

加士东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全身都在震颤。他说：“好幽默的中国人！我原来以为中国人是不善于幽默的。好吧，你随便用任何一种你认为方便的解法。”

夏汉铮胸有成竹地说：“诺埃尔去出席日本京都会议，我不反对，而且我高兴他能有这种机会。”

“这么说，你同意放弃你的权利了？”加士东几乎要跑过来拥抱夏汉铮了，“你真叫人高兴……”

“我会叫你失望的。”夏汉铮轻轻一笑，“但我必须知道，诺埃尔先生是以什么身份去参加这次会议的。”

“当然是论文宣读者，”加士东嘴上的雪茄已经不冒烟了，“他将去宣读《在磷化镓和磷砷化镓中 $J=1$ 和 $J=2$ 的激子的辐

射复合的竞争》。自然不会是以观察员身份。你知道，这种限制极严格的国际学术会议，是历来不设这种名额的。”

“可是，”夏汉铮仍然心平气和，“这项研究，从确定课题到几百次试验，以至于写成论文，得到国际承认，自始至终是我负责的。”

“所以我才同你商量啊，”加士东不耐烦地丢了半截雪茄，“何况，诺埃尔在这篇论文后面署了名字的，他又是研究组的组长，他具备作者之一的合法身份。”

再不能迁回了！夏汉铮挺直腰杆，双目炯炯地凝视着加士东的脸，说：“如果是这样，我现在就向您宣布，在论文打印成文前，我就把诺埃尔的名字拿掉。您，以及全研究室、全实验中心的人都知道，我这样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因为我尊重事实。”

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冻结了！

加士东咚一声坐到沙发里，弹簧弓子嘎吱嘎吱猛响了一阵，接下去是难堪的沉默。

华莱丽停止了作画，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两个人之间来回转着。

加士东曾经设想过，夏汉铮不会轻易同意放弃他的权利。他之所以自告奋勇，在顾问委员会上大包大揽，承担说服夏汉铮的困难任务，基于两点，一是友谊，二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国际上不甚显赫的地位。

他万万没有料到，不卑不亢的夏汉铮会这样强硬地抛出这张王牌，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扪心自问，加士东心里未尝没有愧疚。他所承担的“说客”义务，等于从别人口中往出掏肥肉！何况，顾问委员会里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根本反对这样移花接木！

加士东知道，眼前这个中国人，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他干事既不失礼，又不苟且。假如他执意要除掉诺埃尔的名字，那是顺理成章的，绝对用不着诉诸法律，在居里大学顾问委员会里就会

得到有利于夏汉铮的裁决。到了那时，即使是偏爱诺埃尔的他，也决不会昧着学者的良心坚持反对夏汉铮。

他也存在一丝幻想：也许夏汉铮还有回心转意的可能。

但他马上否定了这种幻想。他怎么能忘记两年前的那件事呢？

那还是夏汉铮刚来法国，刚到实验室不久的事。有一次，加士东布置夏汉铮做一项很一般的试验，并且指示诺埃尔辅助他完成。加士东告诉他，刚到他的实验室来，就放手做这种试验，那是破例的。但是，夏汉铮说：“如果是作业，我乐于做。如果是特别照顾，那就不必了。”加士东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这类试验，我在国内已经交给助手做过几年了。我到法国来，希望学到更接近世界水平、更带有研究性质的学问，而不是从 ABC 开始。”惊奇之余，加士东感到由衷的敬佩，像这样直爽、不客气学生，他还是第一次遇见呢！但他仍不相信夏汉铮真的会做，夏汉铮似乎也看出了导师的心思，就像成年人玩儿童玩具那样，当场轻而易举地做完了这次带有考核性的实验，干净利落，而且替实验室调好了一台已经不精确的示波仪。

加士东不敢小瞧这位中国学生了。他打心眼儿里佩服他。为了测试一下夏汉铮的学识水平，加士东特地布置他写一篇对实验中心未来设想和目前研究状况的报告。

夏汉铮是一个月以后交卷的。他除了高度评价了居里大学实验室在固体物理研究方面的卓越成绩，也指出了若干差距，批评了这样良好条件的实验室不把固体发光尖端项目列入研究课题的重大失误。有理有据！

加士东又兴奋又震惊，把夏汉铮找去训了一顿。但是傻瓜都听得出来，那在餐桌上的“训”，是多么友好、多么真挚、多么器重！难怪他在学术顾问委员会上断然宣称：夏汉铮是无与匹敌的人才，我们应当对他投最优厚的力量、最大的本钱。中国人有

理由骄傲！”

一想到几年来对夏汉铮的了解，加士东有点心灰意冷，一面在心底埋怨这倔强的中国人，一面也不禁哀叹起他手下的一些法国学生来。他们也都是聪明的，可毕竟有夜总会或其他光怪陆离的现代物质文明吸引着他们，分他们的心。

现在，萦回在加士东心中的想法，只能是争取诺埃尔与夏汉铮同去。

他想了一下，说：“谢谢你的提醒，我的想法也许不太现实。我现在同你商量，假如你与诺埃尔同去赴会呢？大约你可以友善地妥协了吧？”

加士东笑咪咪地望着他的学生。

是啊，这是夏汉铮不好反对的。但他知道，这要涉及经费问题。按惯例，参加国际会议的来往旅费，应由所在国科研中心出。但一篇论文，法国科研中心绝不会愿意多出 5 000 法郎。

所以夏汉铮说：“只要在京都会会议上由我宣读论文，我没有理由阻止诺埃尔先生出国。问题是，先生您大概没有考虑到经费来源问题吧？”

加士东沉吟着说：“5 000 法郎两个人用，当然是不充裕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够的。我打算给日本物理学家高崎先生拍个电报，看看能不能破个例，由会议经费里解决一下。这样好不好，可以定下来你和诺埃尔同去，也可以说，每人已经有了 2 500 法郎，各自都做些努力，筹措一点旅费。”

夏汉铮缓缓地站起身来，说：“如果让我来理解，我是否只能认为，我已经拥有了 5 000 法郎的旅费，而诺埃尔先生尚无着落，需要等待有了来源再定？”

加士东显然生气了，脸色由平时的猪肝色变得苍白如纸。他那下垂的眼袋剧烈地抖了几下，才说：“好吧，再见，我的朋友，我祝福你——虽然你叫我很失望。”

他照例拥抱了夏汉铮，不过这次是象征性的，或者说是敷衍而已，夏汉铮觉得贴到脸上来的博士的脸颊也是冰冷的。

加士东回头招呼女儿道：“华莱丽，代我去送送客人，我累了。”说罢，迈着沉重的步子上楼去了。

博士说的“代送”是比较含糊的，可以理解为送出院门，也可以认为是用车送到南郊大学城去。

华莱丽宁愿做后一种理解。她扔下画笔、刮刀，提起画板，追出房门，向独自走去的夏汉铮叫道：“夏先生，请等一下，我用车子送你。”

夏汉铮稍稍犹豫了一下，华莱丽早把车子启动了。他只好同意，弓腰钻进了车子。在偶然回眸的时候，他依稀看到了阳台上加士东的影子。他好像怔怔的。不知为什么，夏汉铮心里也挺不是滋味。

这里并非永远一片玫瑰色

华莱丽是参加过意大利米兰赛车会的，难怪轻巧的红色雷诺牌小轿车在她手中摆弄得那么娴熟。她连踩了几次油门，车子已经绕过蒙索公园白色铁栏杆的东围墙，拐上了马勒柏林阴大道。他们的小红车钻行超越在车流中，一路领先。

夜幕早已降临。各种色彩的霓虹灯织成线条绚丽的图案，忽明忽暗，像是进入了安徒生编织的神话境界。

在车子经过实业宫的时候，专心驾车的华莱丽瞥了夏汉铮一眼，见他一直正襟危坐，脸色不快，就用柔和的法语问道：“你好像不怎么高兴，是爸爸惹你生气了吧？”

夏汉铮微微一笑，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使他生了气，可这没办法。人最大的苦恼在于，你知道应当怎么讨人喜欢，却又不能那么办。”

华莱丽稍稍减慢了车速，跟在前面一辆黑色高级奔驰车后，仿佛在追踪一只硕大的大甲虫。她扑哧一笑说：“你倒是很能体谅人的。我很佩服先生的机智，也许还有骨气。你知道吗？凡是我父亲指导过的人，都得听他的，他一向是不可抗拒的，可是你把他挫败了，叫他生气了。哈，叫他生气——我指的是认真的、不动声色的生气，那是很需要一点本事的。”

“是这样吗？”夏汉铮只能付之一笑，他相信这姑娘的谈吐是真诚的。她一向对夏汉铮很热情，有时不得不叫人想到她有超出友谊的进取心。譬如，她每逢周末，都要不辞辛劳地驱车赶到大学城去找夏汉铮玩。只是十次有九次她都是扫兴而归，夏汉铮不是钻到图书馆里，就是关在实验室里。为此，她当面说过：“你们中国人不懂得生活。”当时夏汉铮笑了，说：“这是一种偏见。中国人同样懂得生活，也懂得你所说的那种优裕的生活。但是，他们更懂得在没有创造出那种生活以前，更需要的是多流汗水。”

停了一下，华莱丽好像用了一种替人赎过的语调说：“对不起。其实，如果作为仲裁者，我认为他所提出的、并要你接受的建议，是十分荒谬的，不尽情理的。不过，你应当原谅他，因为他是法兰西人，不是中国人，他有他的民族自尊。”

“中国人难道就应当放弃自己的民族自尊吗？”夏汉铮不知不觉间提高了嗓音，“我们中国人十分尊重法国的科学、法国的艺术、法国的历史、法国的道德风尚，乃至法国人的尊严。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容许把自己的单方面的尊严凌驾于别人之上。”

华莱丽侧目凝视着具有典型东方美的这位男子，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喜悦。是喜欢他的包括那一络不驯服的额发在内的容貌呢，还是他的才华、人品？抑或是他那不苟言笑、永远显得有三分沉郁的神气？她一时分辨不清。

华莱丽已经把车子驶上了马拉凯滨河街。天虽晚了，塞纳河

畔的游人仍不见少。充满花香气的傍晚，人们是那样迷恋这条缓缓流过巴黎心脏的蓝汪汪的河流！

“塞纳河美吗？”华莱丽不无骄矜地问他。

夏汉铮凝神注目着河上漂浮的游船灯火，说：“塞纳河确实很美。你至少有十次这样向我发问了，我当然要第十次地这样回答你。不过，你只看到过一条塞纳河，假如你有幸观赏过中国的长江、珠江，你也许会另有一种感觉。”

“会变得看不起塞纳河了吗？”姑娘爽朗地、自信地笑起来，“我在卫星电视里看到过中国的江河，可我还是爱我的塞纳河。夏先生，这也是你常说的偏见吗？”

“是的，”夏汉铮说，“爱的背后，总有一种意识在支配。我生长在中国东北一个很荒凉的地方，从我记事起，我就迷恋着流过故乡门前那条蚂蚁河。也许别人看了，它并不美，可我却总觉得它是天下最美的河流。夏天的芳草、青蛙、蝴蝶、蜻蜓，河水里一绺一绺的青丝……我都觉得比塞纳河要美上10倍。”

华莱丽纵声笑起来：“你这是太爱你的祖国的缘故。请原谅，我来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既然你们的国家那么可爱，你们为什么乐于丢开她到法国来呢？据我知道，你们的开国元勋，有好多人都到法国来勤工俭学的，譬如……”她揷了一下汽车喇叭，“生产这种车的雷诺汽车公司吧，你们已故的总理周恩来先生就在那里做过工。你怎样来解释这一切呢？”

夏汉铮莞尔一笑，说：“这有什么稀奇？你们法国人，也未必没有向外国先进的东西学习。世界的文化永远是应该交流的。远在唐代——那是一千多年以前呢，法国的商人就通过伊朗、波斯的商道到中国去过。唐代的首府长安的国家学校里，也有过法国人求学的例子。就是你加士东小姐，不是立志改革西方油画学派、画风，专门请了一位旅居诺曼底的中国画画家指导你画水墨丹青吗？”

“这可叫你问住了！”华莱丽猛然刹住车子，前面好像出了什么交通事故，黑压压地停了近百辆车子。遇到这种情况只好认倒霉，你想从车海当中溜过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她关了油门，干脆转过脸来说：“好像……你们的马列主义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

“也可以这样说，”意外地，这次夏汉铮没有否认，“20年代初，为什么有一大批中国革命家到法国来了呢？本来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俄国。可是中国的反动派惧怕赤色俄国，限制极严，到那里去是很困难的。而当时的法国，是工人运动高涨的国度，又有着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革命传统，当然要到这里来了。”

“可是，”华莱丽双肘驾在方向盘上，妩媚地望着侃侃而谈的夏汉铮，问：“当今，你们为什么又要到法国来呢？你是想承认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吗？”

问过，她那双深邃的灰蓝色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他，完全是挑战的神色。不过，这眼神，也可以解释为调皮，毕竟同怀有某种恶意的专栏记者们的发问不一样。

夏汉铮老老实实地说：“穷，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本来穷，却要打肿脸充胖子，那才是蠢人；正因为我们穷，我们落后，才出来学习，我们总有一天会变得像你们一样富有的。”

这话使女画家十分感动，她忽闪着金色的长睫毛，由衷地说：“我一点都不怀疑。有你这样的人，中国怎么会永远贫困下去呢！”

交通堵塞仍然没有疏通的征兆。前面200米处，出了大车祸，听前边跑去观看的司机跑回来说，至少有十几辆车子追尾相撞成一团，夏汉铮透过警察围成的人墙，已经看到了汽油燃烧的火光。

他看了看表，叹口气，想到公寓里等待他的朋友们，很焦急。

华莱丽却显得很惬意。她用自嘲的口气说：“法兰西并不永远是一片玫瑰色呀！惊人的车祸，大概中国就不多。你着急，前后都堵满了车，前进不能，后退无路，只好听之任之，反正傍晚的马路不烤人，挺风凉呢！”

她这反常的高兴也是真心真意的。她特别喜欢单独同这位顾长、庄重的中国人在一起，只是这种机会太少了。自从夏汉铮学会使用法语以后，这种机会更少得可怜。有一次，她甚至开玩笑地对夏汉铮说：“早知这样，我慢慢教你法语，叫你永生学不熟练就好了！”

华莱丽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从车后座行李箱中取出画板，就着路灯看了一眼，又像淘气的孩子似的背到身后去，问夏汉铮：“愿意欣赏一幅作品吗？”

当那幅钉在画板上的油画递到夏汉铮手上时，他禁不住哑然失笑了。这显然是方才在华莱丽家同博士交谈时，她躲在角落里为他画的。

她真能捕捉人物一瞬间的表情。画板上的夏汉铮像一头倨傲的雄狮。她极度地夸张了他那一络不驯的头发。最有意思的还是潦草地用法文题在油画下角的两行字：“一个抑郁而高傲的中国人。他好像在说，未来是属于他的。”

看着这油彩未干的画，夏汉铮哈哈地笑出声来。

“我损害了你的形象了吗？”华莱丽被他笑得有点不知所措。

“不，很好。”夏汉铮认真地说。

“是吗？”华莱丽又兴奋起来，“假如你愿意接受的话，我愿意把这幅画送给你，永远挂在你的书房中。但不知你的夫人是否认为把你画得太丑了。”

“我想，你是美化了我。”夏汉铮说，“从美学观点说，美化与丑化都是美的，因为它的基点是真实。好吧，谢谢你了。”

见他乐于收下，华莱丽十分高兴，可她仍不满足：“可是你

没有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你的夫人会像你一样高兴吗？”

夏汉铮说：“我没法回答。”

“为什么？你不了解你的妻子？”

“是不了解。”夏汉铮诙谐地说，“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当然无法知道她是喜欢还是讨厌了。”

这一次，引得华莱丽开心地大笑了许久。在他们交往的几年，华莱丽曾经不止一次地以各种方式试探过他，想知道一下这位可敬的中国学者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是温文尔雅的东方女性，还是谦恭好学的学者？可她都碰了软钉子，这就更引起了华莱丽的兴趣。这兴趣，开初还是停留在孩童般的好奇水平，久而久之，它悄然变成了一种带有某种妒忌成分的探索了。

华莱丽是夏汉铮的业余法语教员，这使她在夏汉铮刚来法国的第一年里，有机会经常出入大学城的公寓中，她甚至跟这个中国人学会了包饺子！

奇怪的是，华莱丽既希望夏汉铮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更希望他的私生活是极度不幸的。只是她无论如何没有过第三种设想，那就是夏汉铮根本没结过婚！

这么长时间希图猜破的谜，没想到在交通堵塞的一瞬间找到了答案，而答案又是这样理想！她简直有点不能自制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华莱丽眼睛里的深蓝色湖水在流动，“大陆中国的男人或女人，是不能和台湾岛的女人、男人结婚的，这种理解没有错误吧？”

夏汉铮先是怔了一下，一时想不出她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怪问题。但看她的表情，马上明白了，她是有所指的。确切点说，她知道夏汉铮常同台湾留学生李浙杭接触，而李浙杭的俏丽动人，又使华莱丽本能地产生忌妒。看来，她疑心夏汉铮与李浙杭有成为情侣的可能，又特别希望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有这样突兀的发问。

夏汉铮回答她说：“这样解释，你不感到荒唐吗？在中国，或者在中国的台湾岛，都没有这种法律，成文的、不成文的法律都不存在。巴黎人难道不准同诺曼底人通婚吗？”

华莱丽仰在靠背上孩子似的大笑起来。她现在仍然处在兴奋中。她历来自称，自己是“生活中的进攻型选手”，对任何事情都不采取守势。三年前她夹在二百多位应试画家中去巴黎歌剧院应考，去谋得那仅有的一个画师位置，她就是丝毫没有胆怯，终于取得了成功。在她看来，追求男人，同样需要这种精神，哪怕李浙杭果真比自己暂时领先。

前面的车流终于缓缓移动了。华莱丽启动车子，笑眯眯地说：“一个值得我永远怀念的交通堵塞纪念日。对于我来说，它也许应该胜过 1793 年的盛大节日。”

夏汉铮说：“对于我来说，可是个灾难。时间太宝贵了。”

华莱丽笑起来，她忽然问道：“你喜欢法国女人吗？”

夏汉铮杆了她一眼，虽然她目视前方，可那双眼睛含有一种自我陶醉的色彩。他的心动了一下，平静地说：“我对法国女人缺乏了解。”

“法国女人是很懂得爱情的，”华莱丽仍然兴冲冲地说，“听说东方女人一旦结了婚，就成了私有品，只能绑在丈夫的腰带上，像佩戴一件饰物……假如真是这样，实在是对爱情的亵渎。”

夏汉铮一言不发，眯起眼睛，将头放在柔软的靠背上假寐。

华莱丽还在说：“你喜欢绘画吗？我看出你是喜欢的。你也一定喜欢找一位画家做妻子吧？画家是神圣的职业，从达·芬奇到……”

她终于发现，谈话的对象已经入睡，就闭了嘴，加快了车速。

其实，夏汉铮根本不会睡得那么快，这不过是他的一种抵御办法。他能不懂得华莱丽的用心在哪儿吗？

华夏子孙

大学城一片晦暗。

这里远离商业区和闹市中心地段，是巴黎除掉集中了高等学府的拉丁区以外为数不多的安静地方。

华莱丽本来要陪他上楼的，他谢绝了，说还有好多朋友在等他，华莱丽这才道了晚安，驱车而去。

他穿过美国馆、英国馆、古巴馆，一直向漂亮的国际馆走去。这里林立着以各个国家命名的留学生公寓，惟独没有中国馆，这是留学生们每每一提起都要把蒋介石痛骂一通的话题。原来在 30 年代，法国政府为了给各国旅法学生创造求学条件，特地把幽静的巴黎南郊开辟出来，分别给几十个国家辟地建馆。但建馆的钱，叫蒋介石挪用了。几十年过去了，中国馆的地皮上，仍然是一堆荒草。

夏汉铮下榻的国际馆，听名字很大，其实只能住 36 个学生。这是一栋欧洲式的小巧建筑，外表极像亚得里亚海滨的那种别墅，采用的是冷调子。如果不是外号“四等秘书”的姚海为他联系，他是很难住到这里来的。尽管人员较杂，国际馆的学生分属 9 个国籍，而且房租高达每月 550 法郎，也就是说，每月将有六分之一的学费用于住房。但这里也有好处，与分住各馆的中国同学联系方便，有事好商量，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他的房间在国际馆的二层楼上。当他推开房门时，发现屋子里挤满了人。除了他猜得到的游天凤、李浙杭、姚海和狄冠云之外，连不常来的周樯也凑到了一起，还有一个陌生面孔。

他们在听音乐，声音开得很小。大概又是狄冠云的主意，他们把学习用桌上的东西都挪开了，铺上了台布，摆了许多酒、菜、点心。

一见夏汉铮推门进来，人们全都拥过去，用眼睛探索着他们所期待的答案。

“大家坐，”夏汉铮脱掉外衣，笑了笑。

人们纷纷落座。游天凤迫不急待地说：“怎么样？你一定成功地捍卫了中国人的尊严？”

夏汉铮没有马上回答，却把眼光停留在那个陌生人的脸上。那人有30左右岁的样子，皮肤黑中透黄，很清瘦，唇上蓄着小胡子，烫过。长相使人容易判断是闽南或广东人。

李浙杭比较机灵，赶忙起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没等李浙杭的介绍出口，那人敏捷地从藏青色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来，双手递到夏汉铮手上，说了句“请多关照”，哈了哈腰。

夏汉铮看那竖排铅字的名片，写着长长的一大串：台湾大学哲学系学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肄业、巴黎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班、闽南人沈越。

旁边是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夏汉铮向沈越点了点头：“沈先生来法国多久了？”

“噢，”沈越道，“是同李浙杭小姐一起来的。1971年‘保钓’运动时，我刚好在美国，参加过‘一·二九’芝加哥‘保钓’大示威，同年组织过‘四·一三’华盛顿‘保钓’大游行！后来被民国政府吊销了护照，成了在美国无法留住的‘黑市居民’，不得不来法国权避一时。”

像沈越这种经历的台湾青年并不算少，夏汉铮在异国经常与他们邂逅相逢。有的为争取保卫钓鱼岛，同国民党决裂，毅然回到大陆，也有的竟成了“台独分子”。现在，同沈越初次见面，还一时搞不清他的政治态度，不便深谈，因此夏汉铮只是说：“认识你很高兴。”

这时，“四等秘书”姚海说话了：“来，都坐到桌子周围来，

边吃边谈，听汉铮讲讲同加士东博士的谈话结果，大伙都关心呢。”

李浙杭启开一瓶香槟酒，说：“幸亏你回来得早，不然大家决心等到半夜呢。”

人们围拢到餐桌跟前，抚着倒满香槟酒的杯子，都用眼睛望着夏汉铮。夏汉铮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假如在国内，他是不是能去参加国际会议，也许不会牵动这么多人的心，那是由领导定的事，谁去都一样。只有到了异国他乡，同胞的手足之情、平时不易表现的爱国热忱，才有可能充分显示出来。

夏汉铮一面举起杯来同大家碰了碰，一面把同加士东的谈话内容说了一遍，席间立即热烈起来。

姚海说：“好样的，你的对答，使我们感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游天凤高兴得一口气喝干了一杯酒，说：“咱们的夏先生真行，具有肖伯纳的幽默、苏格拉底的辩才！”

夏汉铮说：“但是，现在我并不放心，加士东先生并没有最后放弃他的打算。”

一直很少说话的李浙杭这时插了一句：“我看，应当马上向使馆教育处汇报，必要时出面干预，也许，使馆能够出一笔钱资助呢！”

沈越摇摇头说：“这种事情，怕大使馆不会管吧？难道外交使团也可以干预不开学术会议的事？”

“怎么不能？”游天凤争辩道，“驻法大使馆，在这里就是中国主权的代表。”

夏汉铮沉吟片刻道：“汇报，当然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向我们的使馆要旅费。”

“对”，姚海老谋深算地说，“本来可以堂堂正正地去日本，却要自己掏腰包，反倒贴了钱又丢了尊严。”

大家都觉得姚海的话有道理。

游天凤说：“还是‘四等秘书’有韬略。”

人们都笑起来。

姚海今年 40 岁了，是旅法各类学生当中的老大哥。他是 60 年代北京邮电学院毕业生，毕业后参加过东南、中南几条微波通讯干线的设计、修建。1978 年调到一个设计院，专门从事激光通讯研究，是副主任工程师，1979 年来法国深造。他为人诚朴、稳重、干练，很受旅法同学的爱戴。他是旅法学生尽人皆知的“四等秘书”。这绰号，是大学城管理部女主任让·勒拿太太起的。在各国使馆里，只有三等秘书，级别算是最低的了，所以称他为“四等秘书”，完全因为他的热心。每次从祖国来一批学生，他都亲自到机场去接，提前为留学生、进修生们寻找大学生公寓。他会挑选条件好、房租便宜的房间给你；他会讲出巴黎各家超级市场副食品牌价的差异；他甚至帮新来的同学排出日用表，帮你合理地使用每月总共三千法郎的伙食费、交通费、房租费、杂费和交际费。为此，游天凤曾经说过，最好姚海永远“留学”下去，在法国开设一个“中国留学生顾问处”。虽是玩笑，也反映了同学们爱戴他的感情。

围绕着夏汉铮去日本的问题，大家在餐桌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只有周樯和狄冠云不大插嘴，他们时而咬咬耳朵。

姚海把刀子拿起来，在盘子上敲了敲，问道：“周樯，你怎么不出声？你有什么高见？”

周樯是个善于高谈阔论的人，但近半年来却有点反常，仿佛得了抑郁症，走路也耷拉着脑袋，心事重重。他已经很久不到大学城来了。

听见问他，这个胖胖的年轻人扶了扶近视镜，说：“我有什么好说的？不要说高见，连低见都谈不到。”

游天凤讥刺地说：“你买洋货，怎么那么内行呢？”

周樯的脸一下红了。

游天凤说的不无根据。在留学生中，周樯是出了名的“生意通”。他在巴黎大学学数学，可他对那变幻无穷的阿拉伯数字、希腊字母头疼，经常旷课。法国的大学是半天上课，同中国不一样，你愿来就来，不来也没人管，一切都等毕业考试时见高低。他几乎每天都要跑市场，各种小玩意儿，诸如电子打火机、电动刮胡刀、电饭锅，他都能买到最便宜的。他很会节约。他是留法学生中第一个实行步行，节省交通费的。这样，一年中可以节余500法郎左右，4年内，可以节约两千的数字。他准备拿这笔钱买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台电冰箱。

夏汉铮听别人说，周樯在国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学生，即或再选送几万名出国深造的留学生，也选不到他头上。所以大家断定，他是靠父亲的力量“运动”出国的。据夏汉铮了解，周樯的父亲是某个外事部门的一位副司长，但周樯的出国有没有舞弊现象，那却是无从了解的。

话题很快地扯到了归国的问题上。这是很自然的。在座的人，大多数都快学业期满了。

从大陆来的学生，那是无需问的，尤其是公费生。可是来自台湾的自费生，未来可供选择的道路就相当多了。可以回台湾，可以回大陆，也可以长期侨居国外。对于他们的去留，有过多次的争论，都不是就事论事，而必然要涉及祖国观的问题。

当游天凤举起杯子，提议“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这些旅居海外的炎黄子孙痛饮一杯”时，这争执又开场了。

大家碰了杯以后，沈越已有几分醉意。他敞开衣襟，一只胳膊搭在椅背上，用十分忧伤的调子说：“祖国，这个在世界上十分鼓舞人的词语，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请问诸君，谁能确切地答出来？”

游天凤说：“当然是指哺育我们的党和人民。”

一句话惹起了狄冠云的反感。他一激动，把酒都泼洒了：“那若是没有哺育呢？或者相反，是虐待呢？”

游天凤站了起来：“你这是忘本、背叛！你想想，你不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吗？你的父亲狄国良教授，不是周总理接回国的吗？别忘了，你父亲是全国人大代表，共产党并没有亏待你。”

狄冠云哈哈地狂笑起来。

“四等秘书”姚海大约意识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同夏汉铮交换了一个眼色，制止游天凤道：“小游，来，为你的毕业答辩成功，咱俩干一杯。”

已经不好收拾了。笑过了的狄冠云忽然满眼流泪，伸开两手，大声嚷叫着：“祖国，究竟给了我什么？30年前，我父亲冲破美国重重阻挠，取道瑞士回国，他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去的，可是他得到的是什么呢？啊？是什么呢？”

没有人回答他，席间气氛一下子沉重起来。

狄国良教授的遭遇，不仅在座的人，恐怕全中国、全世界的生物学界都是知道的。狄教授是专攻生物遗传工程的，归国后立志从事农作物遗传工程研究。然而，他的研究刚刚起步，就当作了“右派分子”，政治生命的结束，使他的科学生命也终止了。从此，他奔波于各种劳动改造的场所：农场、公社、生产队、矿山、直到“五七干校”。1978年的秋天，当植物研究所的党委书记亲自带人到青海荒草滩去接他时，他已经在三天前离开了人世。据说他是过度兴奋致死的。当他得到了来自研究所的一纸“改正”公文时，破例地喝了半斤老白干酒，然后躺在草屋床上，亢奋地编织着支离破碎的科学之梦。他等待了多久啊，竟是一个世纪的五分之一。这对短暂的人生来说，过于漫长了。然而，毕竟有了希望。他激动得不能入睡。他感到头疼，突然“啊”地叫了一声，就昏迷过去，离开了人世。——由于过度兴奋，他的脑血管破裂了。

他没有给儿子狄冠云留下什么遗嘱，但是，儿子承继了父业。没有人知道狄国良教授发过什么怨言，他一生的坎坷，是不是一首本来无须倾诉的哀歌呢？记得，1973年，狄教授的两个学生结伴回国，想探望一下业师。但是，这两个著名的学者失望了，因为那时在祁连山脚下的狄国良，还没有取得人民的资格！

听了方才狄冠云的嚷叫，夏汉铮感到心里十分难过。他沉静地说：“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历史的道路不可能像长安街那么笔直。何况‘四人帮’并不能代表党、代表祖国！”

“像你这样的天之骄子，当然怎样看都能想得开。”狄冠云回了夏汉铮一句。

夏汉铮咬住嘴唇，没有做声。

他何尝是“天之骄子”啊！哪个人心底没有隐痛？但他从来不向别人谈起往事。他忘不了在北大荒劳改农场改造的7个年头，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务”啊！远在1966年春季，夏汉铮就着手研究在零下269度的低温状况下，处理磷砷化镓的掺氮原理了。为了得到国际科研情报，他曾通过大学时代教过他的苏联专家，搞到了一本苏联物理学学报，这便成了风暴年月足以使他劳改7年的罪证！

这时，游天凤又在问狄冠云了：“这么说，你学成以后，是不想回国了？”

这是个爆炸性的问题。人们惊愕之余，都隐约感到有这种可能性。狄冠云在国内已经举目无亲。富有的叔叔在巴黎，他又是自费出国留学的。加上他由于父亲的命运在心上留下的创伤，他是很容易走上这条路的。

狄冠云没有出声。

李浙杭走到窗前，身子靠在空调机上，说：“人，没有不爱自己祖国的。祖国是什么？我觉得她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概念，生育我们的国土、民族、风俗习惯和这一切因素的总和。似

乎不应当加入什么政治概念。”

沈越摸着小胡子附和道：“如果一种主义也可以代表祖国的话，那么，不信仰共产主义或不信仰三民主义的海外侨胞，不是永远没有祖国了吗？”

游天凤立即起来反驳。她双手挥动着刀叉，脸涨得通红：“祖国必然包括政体和指导思想，不可能光是土地、民族、风习。一个反对他本国政府的人，总不能说是忠于祖国吧？”

李浙杭问道：“照你这么说，我毕业后回大陆服务是爱国，那么回台湾去工作，叫不叫爱国呢？”

游天凤眨眨眼，说：“回台湾，那是你的自由，总不能说台湾是祖国！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姚海笑起来：“回台湾，也不能说不爱国，大陆和台湾迟早是要统一的。”

“你搞折衷！”游天凤不服。

“你偷换概念！”李浙杭也不买账。

这时周樯说：“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好像是留在祖国，就是爱国者；反之，只要想去国外的人，都一律看做是不爱国的。按这个逻辑推导下去，钱学森、童第周这些人，只好说曾经有好多年是不爱国的；那么李政道、杨振宁、牛满江这些至今仍留居海外的学者，也是不爱国的了！”

“我怀疑你是为不回国造舆论！”游天凤愤愤地说，“钱学森以及狄冠云的父亲，正是出于爱国心，才远涉重洋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

夏汉铮接过话碴儿说：“爱不爱国的分野，不在于在国内还是国外，而在于他的感情、倾向、作为。”

游天凤鼓起掌来，说：“还是他说得深透。我反正早就声明了，我的知识、我的一切，都是祖国的，只能服务于我的祖国。”

沈越笑道：“游小姐有点失之偏颇了吧？我记得，好像有个

定论，科学是无国界的。”

游天凤一甩羊角辫，说：“科学无国界，人可是有国籍的。”

狄冠云把头倚在墙上，说：“我觉得，祖国观、爱国观都不应当成为科学家的紧箍咒，因为任何一项发明都要进入世界和人类的文明宝库。”

伙伴们热烈地争论着。

夏汉铮很少插言。这些循环往复的争论，已经塞满了他的耳朵。

“亚细亚孤儿”的苦闷

深夜，聚拢在大学城国际馆的人陆续散去。沈越住在北城新月广场附近。他有一辆车，主动要送周樯回去。其实他们并不是同路，周樯住在巴黎 19 区，在西北郊。其余的人，大多住在大学城附近。

在沈越的车启动时，夏汉铮对周樯说：“4 月 1 日快到了，居里大学的法国同事们要举办愚人节晚会，你来吗？”

没等周樯答话，沈越高兴地说：“准时到达，我用车子送周樯来。”

这样一来，本来没邀沈越，也只好一并邀请了。

车驶出大学城的院子，夏汉铮一扭头，发现李浙杭没有走，还留在国际馆门前。

夏汉铮走近她，说：“还不去休息？明天还要上课。”

李浙杭嫣然一笑：“你怎么了？明天是星期天啊！”

夏汉铮也笑了。望着只看得见红色尾灯的轿车，他问道：“这位沈越先生，你早就熟吗？”

李浙杭摇摇头：“相识不久，是在一次台湾同乡会上认识的。他认识我哥哥，好像是参加‘保钓’运动时的朋友。”

“哦，”夏汉铮说，“他挺阔绰啊，自己有一辆车。”

“听说他自己还有一栋房子呢。”李浙杭抱着肩说，“他好像很有钱。”

夏汉铮问：“他有经济来源吗？”

李浙杭摇摇头：“不知道。你怎么对他产生了兴趣？”

“随便问问。”夏汉铮说，“他同周樯的关系挺密切？”

“大概不坏。”李浙杭说，“去年暑假，由他出旅费，带周樯到诺曼底海滨去玩过一次呢。”

夏汉铮想起来有这么一回事。不过，周樯当时说，是他的一个指导教师带他去的。他为什么说谎呢？

夏汉铮吸了一口春夜凉爽的空气，打算回房间去睡了。但发现李浙杭一点走的意思没有，只好在台阶上停住，说：“你好像有什么事情？”

“是的。”李浙杭囁囁着说，“我能再耽误你一点时间吗？”

夏汉铮不好拒绝，礼貌地说：“你太客气了。反正明天是星期天，请上楼吧。”

两个人一前一后，又回到了充满烟雾的房间。

李浙杭把窗子全都敞开，说：“抽了这么多烟，真讨厌！”

夏汉铮坐在硬木椅子上，问：“想喝点什么吗？桔子露还是烧杯咖啡？”

“喝了那么多酒，还不够刺激？”李浙杭一笑，走向床铺，拿起她的手提包。夏汉铮这才发现，她的手提包本来就没随手拿着，她是早就打算留下来单独同他谈话的。

李浙杭从手提包里拿出一筒茶叶，说：“西湖龙井，特级的，家乡茶，好几年喝不到了，今天特意跑了几家商场才买到的，喝茶精没意思。一看到碗里一根根竖起来的绿叶，心里就特别高兴。”

夏汉铮拿起电水壶，注满水，插上插销，烧起水来。

在水没烧开的几分钟里，李浙杭低头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窗外吹进来的风，飘拂着她那披在肩上的长发。在灯光下，她那本来白皙的脸庞显得更加白净，像象牙雕出来似的。

“你有话怎么不说？”水开了，夏汉铮抓了一把龙井茶，放到茶壶里，沏上水，又去涮茶杯。

李浙杭抬起头来，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好像流荡着一层阴郁的云翳。夏汉铮给她倒了茶，又坐回原处，心里想，这个文静的姑娘，碰到了什么难处了吗？

李浙杭捧起茶杯，眼睛掉向窗外，低声说：“你知道，我再有3个月就毕业了，我面临着人生岔路口的抉择。像你多好啊，可以无忧无虑地回到母亲身边去，回到亲人那里去……”

说到这里，她眼睛里那层云翳化成了一片晶莹的泪光。

夏汉铮很感动。一个来自台湾的青年，肯在处于人生抉择关头找他来商量，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任。

他了解李浙杭的苦衷。

在台湾，还有她的双亲。从前，她父亲是南京陆军医院著名的医生，1949年随陆军医院一起撤离大陆去了台湾。据李浙杭说，这几年，年迈退休的父亲惟一的愿望是想取道香港回大陆看看。有一次，他已经在香港托人办好了去大陆的探亲手续，却不料被人告发，被特务盯住，终于又郁郁不乐地回到了台北。

她还有一个比她大10岁的哥哥，在中美建交的第二年，从美国返回大陆，目前在国家海洋局工作。

李浙杭说：“我的苦恼在于，我不知道该怎样选择永久的居留地。我想和父母在一起，又实在不愿意回台湾，哥哥又劝我到大陆去。”说到这儿，她看了夏汉铮一眼，说：“可是，我害怕……”

夏汉铮笑了：“怕什么呢？”

李浙杭说：“我怕你们的政治。真的，我永远弄不懂你们宣

传的东西。过去我在美国时，常看大陆的报纸。可是，2月份的报纸，就能够批自己1月份的社论。你知道，我是无拘无束惯了的，我很怕神经紧张。”

夏汉铮说：“正因为我们的祖国经历了许多人为的挫折，我们今天才更清醒了。你说的，都是过去了的事了。”

“你是在那种环境里习惯了的人，当然……”李浙杭觉得下面的话不好出口，噎住了。

她要说的意思，夏汉铮早已明白。他笑了，说：“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动乱。我从来没有掩饰过我们有过的失误，但现在，总算是一天天好起来了。”

“大陆的情况，我也多少了解一点。”李浙杭说，“1976年夏天，我回国去看哥哥，在北京、杭州各住了10天。”

这是她从来没有说过的事，很使夏汉铮吃惊。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仿佛在探询，你为什么把归国探亲的事情瞒得铁桶一样呢？

李浙杭说：“是的，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连我自己都想忘掉它！”

夏汉铮问：“为什么？”

李浙杭说：“有多少台湾籍的同学和华侨同学向往祖国啊！假如他们知道我回去过，他们会追问我的观感，我能说什么呢？我不愿讲出有损于祖国的话来，又不能昧着良心胡编一通，我只能让痛苦的记忆留在我一个人的心底。”

“哦，”夏汉铮皱起了眉头，“这我倒没想到，祖国给了你这么不好的印象。”

“也可能是坐井观天。”她说，“可是，只要想想我哥哥，我心里总是犹豫。”

接着，她讲起了她的哥哥。

李浙杭的哥哥叫李浙稽，1968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水文系。

按台湾当局规定，大学生毕业后照例要到兵营去服一年兵役。他服过兵役，拿到了奖学金，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1970年获得流体力学博士学位。后来在钓鱼岛风潮掀起时，他成为旅美华人当中“保钓”运动的中坚人物，领导过芝加哥“一·二九”示威，办过《四新周刊》。在这次风潮中，他看清了国民党在“保钓”问题上的昏庸和媚外，开始研究大陆情况。他最早接触的是美国人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和菲利普斯·格林拍摄的纪录片电影《中国》。书是专门托人从加拿大多伦多的长城书店捎来的。书和电影，使李浙稽对祖国和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此后，李浙稽订阅了英文版的《人民画报》和《中国建设》。

李浙杭清楚地记得，那一次，几个留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布朗大学的同乡来到他们的寓所，在围看《人民画报》时，她哥哥指着一帧民兵训练的大幅照片，说：“你们看，谁说大陆人民没有自由？人民多有权啊！连枪都发给了农民、渔民！而我们台湾，即使正式入营受军训，枪弹都是严格控制的，每天背的是空枪！”

李浙稽在决定去大陆之前，曾经赶到姨母家去看妹妹，姨父苏元鼎劝他再看一看、等一等。他说：“我知道，大陆的日子苦，去年我参加五人‘保钓团’访问大陆时，已经看到了大陆很困难。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等祖国建设好了，再回去享福吗？”

李浙稽在离开美国时，曾在同乡会上对同学们说：“我对大陆祖国的感情已不能自制，倘若再不回去，我怕是快要疯狂了。”没有人能理解他，也没有人能理解他的话。

那么，李浙稽本人，是不是真的认识了大陆呢？

李浙杭谈起了1976年那次探亲的经过。

祖国，这是一个多么醉人的称呼啊！飞机一从拉瓦尔品第起飞，航空小姐一经通告，下站着陆点就是中国的广州时，她简直

一刻都坐不住了。超音速飞机她都觉得太慢，恨不能坐上超光速飞机才好！

啊，进入中国的海域上空了！方才，还是一片云层，现在豁然开朗，蔚蓝的天，碧绿的南中国海。她激动地对邻座一个德国老太太大叫：“看，一点污染都没有！我的祖国，这是祖国的天、海！”

老太太和周围的外国人全都友好地笑了。老太太为了表示祝贺，拥抱了她，亲吻了她的双颊。

她真后悔，为什么不早些时候回来？她不得不佩服哥哥的远见卓识。从飞机一进入祖国领空那一瞬间开始，她差不多已经确定了志向，从法国大学一毕业，立刻从巴黎飞回祖国。她甚至后悔，为什么不早一点同中国驻法使馆联系呢？

哥哥大概太忙了，他很少给妹妹写信，即或几个月写去一封，也只是寥寥数语，无非是说祖国建设速度很快，他工作得很愉快。她总是感到有些抽象。她曾经疑惑过，嫂子钱惠英为什么也不写信？她可是个喜欢写信的人啊！

这念头，只是像流过机翼下的流云一样，一闪即逝了。欢乐、激动压倒了一切。

从巴黎启程时，李浙杭给哥哥拍了一份电报；在广州白云机场吃午饭的间隙，她又加发了一份电报。她能想像得出，她在首都机场一落地，哥哥、嫂子会捧着一束鲜花跑上来迎接她。不，不会拿鲜花。她听说，大陆一般没有这种礼节，除非迎候外国贵宾。

他们大概没有轿车，据说大陆只有官员有公用车。那么，哥哥、嫂子将用什么交通工具来接她呢？

她在飞机上想起了一种在台湾很流行的说法——“亚细亚孤儿”。据说，这话最先是吴浊流先生说出来的。意思是说台湾脱离了大陆母亲，漂泊海上，随时受外人欺侮，成了得不到母亲庇

护的可怜孤儿。

从前，李浙杭这种孤儿的感觉是十分强烈的。尽管在物质上她享受到了 20 世纪的文明，可心灵是孤独的，总有一种不安全感笼罩心头。好像她栖身的孤岛，随时有被太平洋海沟巨浪吞掉或颠覆的危险。她儿时曾指着祖国海棠叶形的地图问爸爸：“台湾岛为啥不同大陆连起来呢？”爸爸扬起头来沉思好久，才说：“从前，是连着的，由于地壳震动，一部分陆地下沉，形成了海沟……”

儿时的浙杭，未必能懂得父亲这几句话的引申含义，但现在，她却完完全全地理解了。

飞机在下午 4 点准时降落在首都机场。李浙杭是第一个从舱里跑出去，奔下舷梯的。

没有哥哥的影子，也没有嫂子的笑脸，北京机场显得有点荒凉。上下飞机的旅客显得来去匆匆，都低着头，彼此没有大声的交谈，也没有笑的祝福和哭的送别，仿佛这里是一个冷静的世界。

溽暑 8 月，骄阳似火。李浙杭站在机场烤人的水门汀地面上，感到的不是闷热，却是浑身发冷！

是哥哥没有收到电报吗？国家海洋局，这样的大门头，还会有错吗？

幸好中国人对外宾是极其周到客气的，而且华侨向来是算外宾的。李浙杭这才领出来行李，乘上中国旅行社的大客车进城去，住进了前门饭店。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她就央求一个管外事的人带她去海洋局。当他们赶到东长安街海洋局门前时，人家还没有上班，他们只好在收发室里又等了半个小时。看着看门老头儿有滋有味地喝豆浆、吃油饼，听他讲着前几天发生的震撼全国的唐山大地震。

8 点整，他们来到了政工处。

一开始，政工处里的人待她都很冷漠。好多人扎成一堆，绘声绘色地讲着唐山地震的惨事。后来，带李浙杭来的人把一个处长模样的人叫到一旁，像洽谈生意那样，唧唧喳喳地说了好半天，那人才走过来，跟她握握手，冷冰冰地说着“欢迎”，请她坐，还给她倒了一杯水。那显然是公用杯，茶杯把碰掉了，茶杯里挂满了铁黑色的茶锈，茶杯沿上明显地看出不知多少人的嘴吮过的一圈脏痕。

李浙杭赶紧掉开目光，惟恐再从茶杯哪个地方发现什么更加叫人恶心的缺陷。她问坐在对面圈椅里的那位：“请问，我可以见我的哥哥吗？他叫李浙稽，在你们这里服务。”

“啊，是的，是的，”那位四十几岁的处长努力笑着，又掉身同带她来的人耳语了一阵，这才向她说“请稍等”，匆匆忙忙跑出去了。

李浙杭原以为他去喊哥哥了，一直等到上午 10 点，处长才满头大汗地跑回来，对她说：“你哥哥在吉林，前郭尔罗斯前旗草原。啊，是这样，我们是开门办科研，大搞群众运动。因此嘛，科研工作者经常在下面。考虑到路途遥远，又不知道他们的准确地址，我们希望你不好的。我们想办法请他回来，你在北京等等，好不好？”

奇怪，海洋局的人到草原去干什么？研究旱海吗？李浙杭感到发闷，就问：“那么，我可以到他家去见我的嫂子吗？”

“噢，你嫂子，”处长摸着下巴说，“知道，她好像是麻省罗伯特理工学院毕业的……”

李浙杭纠正他：“是伍斯特理工学院。”

“啊，对。”处长说，“你嫂子的工作，是在冶金设计院。现在，她也和你哥哥在一起。你知道，我们是尽量照顾夫妻关系，不造成两地分居，因此，他们就到一起去了。”

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她只得起身告辞。不过李浙杭表示，如果哥哥不能马上回来，她将要到草原去找他。

就这样，她一直在北京等了一个星期，天天有人陪着逛故宫、香山、颐和园、八达岭。虽然风光绝不会因为外在的因素黯然失色，可李浙杭却一点兴致没有了，完全像被人拥来拥去的木偶。

等到第9天，有人通知她，哥哥、嫂子已经专程赶回北京同她会面。她换上衣服马上就叫车，打算立即去哥哥家。可是陪同人员一再向她解释，要“安排”一下。

妹妹见哥哥，要什么“安排”？这可是李浙杭百思不得其解的了。

终于盼到了见面的日子。有三四个人陪她驱车同去，这也属于“安排”？

哥哥的家好远，在西郊。车子驶进一个相当大的院子。她从车窗里望出去，一栋栋排列整齐的楼房都是同一式样、同一色彩，像祖国的人穿衣服一样统一。她有点怀疑，这样人影皆无的院子会是什么居民住宅区？

然而他的哥哥确实住在后面一栋古式大屋顶琉璃瓦建筑式样的楼中。

哥哥、嫂子老早就在楼门口迎接她。他们笑着，穿得整整齐齐，像要出门拜客一般。哥哥又黑又瘦，嫂子也比几年前显得苍老。李浙杭想，大概是草原太阳晒的吧？

好阔气的房子！一共有三间，卧室、书房、客厅俱全，他们没有孩子，两口人住是够宽敞的了。

兄妹间的谈话相当拘谨，有点像答记者问。李浙杭不能理解，哥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呆头呆脑，不冷不热，连笑都是很有节制的。后来，她终于明白了，是由于那几个陪同者在场的缘故。他们太热情了，跑前跑后，冲茶倒水，热情得让人讨厌，仿

佛他们倒成了这家的主人。

在谈话应该结束的时候，李浙杭耍了个小小的滑头。当陪同人员提醒她，该回下榻处用餐的时候，李浙杭突然宣布：“我今天不走了，就留在哥哥家。”

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李浙稽最先反应过来，他说：“啊，你还是回宾馆去的好……”

一个陪同人员也出来劝阻：“还是回去的好。”

李浙杭觉得很快意。她赖在沙发里不肯起来：“我千里迢迢回到祖国来探亲，我要住在家里，难道还不行吗？”

这是在全世界都讲得通的理。或者说，这是人之常情。

包括李浙稽在内，所有人都愣住了，感到很为难。他们进进出出，折腾了快半小时，才由陪同的人向李浙杭宣布：“那么，你就留下吧。”

李浙杭又将了他一军：“那么，你是不是也要留下作陪呢？”

那个干部太尴尬了，干笑了几声，说：“不，不，失陪了，我们马上走。”

他们真的走了，李浙杭纵声大笑起来，竟笑出了眼泪。她哥哥却重重地叹息一声：“你这是何必呢？”

嫂子钱惠英却说：“叹什么气？留妹妹住一宿总不能说是犯罪吧？”

从这句话，李浙杭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或许她的轻率决定将给亲人带来了灾难！

“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浙杭问，“是对我不放心，还是对你们不放心？”

李浙稽又是一声叹息，他不肯回答妹妹，只是对妻子说：“惠英，到食堂去打点饭来吧？”

钱惠英说：“你真呆。用得着吗？既然做戏，会作到底的。”

她的话音刚落，果然有人提了热气腾腾的食盒走进来，摆了

满满一桌子。

吃着饭，李浙杭说：“其实，应当自己动手做，那多有意思！”

钱惠英苦笑：“傻妹子！你现在还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吗？”

只顾低头吃饭的李浙稽赶忙挥舞筷子制止妻子说下去，但已经晚了。李浙杭似乎醒悟到了什么，挨个房间走了一遍，发现家具都是新的，衣柜空空，一件衣服也没有，五斗橱的抽斗拉不开，清漆黏合处还没拉掉，而且，根本没有厨房！

一切都明白了，这是为了迎接她这个海外来客，专门在这栋闲置不用的专家招待所里布置了一个临时的家！

“临时装样子给我看的？”李浙杭拿筷子敲打饭桌问哥哥，“这是为什么？太可悲了。”

她觉得胸口憋闷，一口东西也吃不下。可是她看哥哥吃得那样香甜，夹着大块大块的半肥半瘦的肉块往口里吞，像吃豆腐那么麻利。样子像挨了几天天饿的人！这是从前的哥哥吗？

见妹妹不吃，李浙稽劝道：“你别使孩子脾气，入乡随俗。”

“不行，你得跟我说实话。”李浙杭猜到，哥哥的生活可能有很多说不出的苦，“你也跟我演戏吗？”

一句话，说得钱惠英啜泣起来。

那是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哥哥不得不讲起了他归国以后的事情。

他们夫妻不能从事所学专业的研究。他们的来路和海外关系，注定了他们与任何有保密价值的工作无缘。李浙稽只能在海洋局的业务处打打零杂。

他气愤过，直接给总理投寄过信函，但没有下文，也许总理根本收不到。他后来又给上海复旦大学一位刘教授写信，请求帮助。那位刘教授是他父亲的同乡、同学。但刘教授一直没有回音。直到这次李浙稽到草原上去，碰到了复旦大学的一个中年教

师，才知道，那位刘教授早在“破四旧”的时候，就去世了。而那时，正是李浙稽在美国以“破四旧、立四新”为宣言，创办爱国刊物《四新周刊》的时候。

李浙稽夫妻俩在草原上根本不是从事什么研究，而是到干校去放牛、牧羊，改造思想。

一桶冰冷的雪水漫过李浙杭发热的头脑。她感到寒冷、恐怖。当她决定去杭州老家住几天时，行前试探过哥哥。她真不忍心哥哥的青春、才华就这样被畸形的条件所断送。

但是，李浙稽没有半点出国的念头。妹妹问他：“从前，你不是想叫我学成后也回国吗，现在呢？”

李浙稽连忙说：“你千万不要回来，我和你嫂子就够了。”

送妹妹上路时，他又叮咛道：“你离开大陆以后，无论见到哪个亲朋故旧，千万不要提起我的现状。如果他们问到，你就说，一切很好，工作得很舒畅。”

李浙杭哭了。她是带着泪水出国的。那天巴基斯坦民航的客机飞临南中国海上空时，天阴着，满眼是湖水般涌来涌去的黑云，她又一次伏在椅背上哭了。她觉得自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没有根基，没有目标，随风飘荡。她确实记住了哥哥那辛酸的嘱托，所以几年来，她闭口不谈她在大陆的所见所闻。

听了李浙杭这段陈述，夏汉铮慨叹地说：“一点都不稀奇，我比你更了解那奇怪的年代，奇怪的事情。”

屋子里一片沉默。两个人都在默默品茶。

停了一会儿，李浙杭突然问道：“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夏汉铮点点头。他发现李浙杭的两颊泛红，眼里浮现出羞涩的光影。他的心不禁动了一下。

李浙杭垂下头去，抚弄着茶杯，低声问道：“你还记恨离开你的那个恋人吗？”

夏汉铮一怔，觉得很奇怪。他的私生活，除了向老大哥姚海说过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她是从哪里知道的？是姚海告诉她的吗？他油然记起上星期他同姚海散步时的一次谈话。

姚海问他：“你今年 38 了，还不考虑个人生活问题吗？”

当时夏汉铮笑了：“你大概忘了我们是在国外。”

“在巴黎的中国人也不少啊。”

夏汉铮说：“回国再说吧。年龄太大了，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姚海说：“你看李浙杭怎样？”

“李浙杭？”夏汉铮哈哈笑了，“你在讲新天方夜谭吧？她才 25 岁，而且，她是台湾人。”

“你太形而上学了吧？”姚海说，婚姻法并没有规定男女双方的省籍。我看这姑娘不错，她的学业很好，一点都不轻浮。”

“不行。”夏汉铮说，“38，25，年龄的差距太大。”

姚海问：“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她？”

“不喜欢。”为了不再扯这种没影儿的事，夏汉铮把门封死了。

姚海仍想撬开门缝：“那若是她喜欢你呢？”

夏汉铮不愿谈这种事情，就把话题扭转到别的身上头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李浙杭向“四等秘书”透露了她对自己的爱慕之情。那天姚海的试探，是不是受了李浙杭的委托呢？

想到这儿，夏汉铮说：“很多年以前，我爱过一个人，她是值得爱的，我的心整个地给了她。我觉得，她也是爱我的。”

“那么，你至今仍然爱她吗？”李浙杭问。

“是的。”夏汉铮老实地回答说，“爱情，大概是个怪物。我有时特别恨她，可我自己知道，这恨的来源恰恰是出于对她的爱。”

“是不是她很对不起你……”李浙杭悄声问道。

“怎么说呢？”夏汉铮有点茫然。

她叫李泽云，长得不丑，也不出众，比夏汉铮小两岁，但她天生具备姐姐的气质。李泽云是夏汉铮小学直到高中的同学，又是邻居，上学一起去，放学一起走，相处得一直很好。

应当说，李泽云是为他作过重大牺牲的。1960 年高中毕业即将高考时，夏汉铮没有报名，他已经悄悄打好行李卷，打算回乡下去了。那年夏天，他的父亲突然逝世，家中丧失了主要劳力。夏汉铮身下还有 5 个弟弟、妹妹都没成人，他怎么能一甩手自己上大学呢？他准备到煤矿上当个临时工。

就在这时候，李泽云拿到了他的准考证，并且替他填好了志愿表，在第一表重点学校栏里，首先填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那天，李泽云简直是哭着哀求他：“你哪怕到时候不去念，考一下，考中了，也行啊。”

夏汉铮被她的真情所感动，进了考场。8 月 15 日发榜，他果真考中了北大物理系，李泽云考取了东北工学院。

老师、亲友、同学一伙一伙地跑到他家劝说，都认为夏汉铮是有前途的人，考上了大学不去可惜。急得他母亲，哭了一场又一场。最后还是支持儿子上了大学。

开学后第 3 个月，他收到了 10 元钱的汇款，却不知道是谁寄来的。又过了几天，弟弟来信，说家里以后将每月收到 20 元生活补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60 年冬天，他回乡度过第一个寒假时，才发现，李泽云放弃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在离家乡 50 里的一个县城当上了中学代课教员，一个月工资 42 元。她既负担夏汉铮的学费，又负担他家的生活费。她自己只留下 12 元钱，恐怕连伙食费都不够。

夏汉铮永远忘不了大年初三那一天。他母亲带了 6 个子女，一同到李泽云家去拜年。一迈进门槛儿，老太太跪在李泽云脚下

磕起头来，把李家人都闹愣了。老太太哭着讲了李泽云对她一家人的大恩大德。

李泽云双手扶起老太太，说：“这没有什么。汉铮在学业上是尖子，同样升大学，我去念，只是个平庸之才；他去念，可能成为科学家。你老人家不要过意不去，权当是您儿媳妇的一片心意。”

1965年，夏汉铮从北大毕业，回乡去看望亲人。他事先已经在信中同李泽云定好，要在毕业分配前夕和她结婚。他所以这样急，是有原因的。按他的学业成绩，物理研究所第一个就把他的档案要过去了。但是经过一番调查后，又把档案退回来了。他们说，发现该生有一个未婚妻，未婚妻的父亲在伪满洲国时当过保长，这虽然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毕竟是问题，而且沾政治边的，非同小可。他们明确表示遗憾，因为物理研究所承担好多国防尖端保密项目研究任务，要求研究人员本人和祖宗三代“半个污点”不能有的。研究所也表示，如果该生不同这个人结婚，他们仍然决定优先考虑。

他没有犹豫，马上把此事写信告诉了李泽云，表白他绝不忘恩负义，宁可分配到县城一个小机器厂当工人，也绝不离开她。

但是，当夏汉铮回到家乡时，发现一切都迟了。早一个礼拜，李泽云突然结婚了，闪电般地嫁给一个从山东逃荒来的煤矿工人。据母亲说，李泽云认识那个工人总共不到5天！

天旋地转，一切都不可思议！

夏汉铮跑去见李泽云，李泽云拒不见他。他一股急火攻心，病倒了十多天。当他回到学校时，系党总支书记高高兴兴地握住他的手说：“祝贺你，你明天就可以到物理所去报到了。”

他还有点愕然：“这……”

总支书记解释说：“看来，你的工作做得很得体。你的未婚妻已经正式给系里来了信，表示已经解除了婚约。这姑娘挺有意

思，她把她同别人的结婚证书也寄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夏汉铮能说什么？他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他爱李泽云，如果说从前为了支持他而放弃了自己的学业是一种崇高的境界，那确是唤起和巩固爱情的举动；那么她同样出于对一个尖子的爱，却反而埋葬了双方的爱，这是高尚，还是残酷？对这种举动是应当恨，还是应当爱？

“从那以后，你就得到了物理研究所的位子，是吗？”李浙杭的眼圈潮湿了。

夏汉铮点点头：“是的。牺牲了爱情，换得了一个保密单位的职务。”

“一个伟大的女性！”李浙杭激动地说，“一个高尚的女性！大概只有我们中华民族，才养育得出这种善良的人！你以后没有再见到过她吗？我觉得，爱，可以埋葬，但却不能死亡。”

这话说到了夏汉铮心里。多少年来，他都想去看望她，但李泽云一直躲避他。他感到自己欠下李泽云的债务，简直是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这绝不单纯是经济的债务，最难还的怕要是感情和良心的债了。

1968年，他又见到了李泽云。她是专程赶到北大荒花园劳改农场去的。有一天，夏汉铮被专政人员押解着从割麦现场回到厂部，管教员叫他：“犯人夏汉铮，出列！”

“犯人夏汉铮在！”他赶忙走出队列。

“你妹妹来看你，10分钟，在会见室！”管教员说罢，头里走了，他默默地跟在后面。

天哪，哪是妹妹，那不是李泽云吗？她老了，瘦了，生活的磨盘在她脸上刻下了无情的痕迹。她哭过，两眼肿得像胡桃。她的打扮像个农村妇女，满身尘土。她呆呆地望了木立着的夏汉铮好久，打开带来的包袱，里面有一套劳动服、一双鞋（手工做的）、一双加底厚袜子、还有一个带“奖”字的大号搪瓷杯、两

袋奶粉、一斤白糖、二斤加了核桃仁的家制炒面。

她半晌没有说什么。后来，才把搪瓷杯推到他面前，说：“老胡给你的，还没用过。”

老胡，不是她那井下当掘井工的丈夫吗？

泪水呀，像开了河一样顺夏汉铮脸颊滚下来。李泽云啊，她总是在你危难时出现，而当你开始走运时，她又远远地离开了！

夏汉铮出国前夕，专门回乡一次，闯到了李泽云家里。

她丈夫不在家，下井了。

一间红砖平房，屋里有一铺一丈长的火炕，地上摆了一张床。凌乱、寒酸，正在团煤球的李泽云脸上都沾了煤粉。她的三个孩子正在厨房里抢吃锅巴……

站在门外，夏汉铮又一次流泪了。

他能说什么呢？来勾起她的伤感？勾起她的后悔？那不是更残酷吗？

他只在她屋里站了 5 分钟，把带来的 500 元钱悄悄掖到炕席底下，走了……

“你是爱她的，”李浙杭从恍惚中醒过来，说，“你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忘掉她的……”

夏汉铮没有出声。

隔了一会儿，李浙杭说：“你一定以为，世上除了你的李泽云，再也找不到这样值得你爱的人了，是吗？”

夏汉铮仍旧没有做声，但这是一种默认。

“我若是李泽云，我也会像她那样做。”李浙杭的头仰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像陶醉，又像自言自语。“不过，我不会像她那样傻。为什么不可以提出假意解除婚约呢？为什么要真的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呢？”

夏汉铮没有吱声。

“有 12 点了吧？”李浙杭这样问了一句，有些茫然地望了望

漆黑的窗外，缓缓站起来，说：“我该回去了。”

但她并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在门附近低头踱来踱去。

“是不早了。”夏汉铮也站起身来。

李浙杭抬起头来，双目凝视着他。夏汉铮分明看出，那双黑而大的眼睛里燃烧着热烈的火焰，他避开了。

临走，李浙杭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支票，压到茶杯底下，说：“姨妈刚刚汇来一笔钱，你留下，准备到日本去时用吧。”

“不，这不行。”夏汉铮抽出那张支票，准备还给她时，她已噔噔噔下楼去了。

愚人节的愚人

转眼到了4月1日，这是西方的传统节日。法国人在这一天都穿上古老的民族服装，科西嘉的短打、罗特省的奇饰、萨沃伊山地人的登山服，一切应有尽有。女人们穿起古老的印花敞领短袖纱衫，衬衣里面垫上硬胸垫，手臂上裹着浅色纱网长手套。人们凑在一起喝甘蔗甜酒、白葡萄酒，吃生蚝，喝青豆汤，吃肉饼，尽情地欢乐，谁都想在这一天里祈福，躲避灾星，没有一个人乐意当愚人。

最热闹的场面是抓愚人，通常在傍晚进行。穿着各色各样稀奇古怪服装的人满院子追逐。有一个打扮成古怪小丑的人，手里拿着一个纸剪的鱼，早已粘好糨糊，悄悄追逐。倘若不慎被人把纸鱼糊到后背上，那他就成了这一年的“愚人”。人们会举起酒杯向他“祝贺”，因为他把每个人身上的晦气和愚笨全都粘过去了，别人便可以期待这一年的吉利了。

居里大学“抓愚人”的活动还没有开始。庭院里到处是火把，电灯有意熄掉了。漆黑的夜幕下，火把闪亮，烟气升腾，仿佛这个世界又退回到了中世纪或更古老的蛮荒年代。

居里大学坐落在巴黎东南方向的塞纳河滨，离巴黎圣母院和巴士底狱旧址都很近。如果登上 28 层的主楼平台，还可以望见市政厅大楼、圣马丁剧院和圣丹尼门。

李浙杭这是第一次到居里大学校园中来。她和加士东小姐站在校园花圃里，忍不住对居里大学的奇特建筑啧啧称叹。

28 层的主楼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关键是围绕主楼的卫星楼。它们是方形的建筑群，共有 26 幢小楼组成两层围墙式格局。没有长廊或大门通向中间的主楼，但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走到主楼跟前去。因为卫星楼都是奇妙的悬空结构，每幢小楼都是用 36 根柱子支起来的。当你看到那些只有碗口粗的实心铁柱时，你准会担心，这样细的柱子怎么能支撑住这么重的大厦！

华莱丽告诉李浙杭：“这是 1968 年的建筑。原来这里只有几幢老式楼房，哥特式的，是当年巴黎大学理学部旧址，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就设在这里。为了纪念居里夫人，政府特地拨款重盖了居里大学。喏，你看，夏汉铮先生的实验室就在第 13 栋。”

两个人围着建筑群绕了一大圈。李浙杭研究了建筑群的力学原理和防震设施。后来，她们陆续碰上了好多熟人。除了诺埃尔和加士东之外，中国留学生到了二三十个。此时周樯、沈越、游天凤、姚海一群人正在喷水池前看法国朋友们化装。连加士东都糊了一顶像飞碟样的扁帽子戴在头上，脚上穿着又长又尖的软底皮鞋，手里拄着短粗的手杖，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响了。

居里大学的校园里骚动起来了。人们纷纷睁大眼睛寻觅拿纸鱼的角色出现，好及时躲避灾星的降临。

华莱丽拉着李浙杭向花圃深处跑去。那里种植着成片的郁金香，还有开黄花带红色放射线的奥林匹克火炬花、火红的斯巴达克花。

李浙杭看见了夏汉铮。他站在居里夫人像前，正和一个亚麻

色头发的年长学者争论着什么。两个人都比比画画，完全没有顾及到“抓愚人”已经开始了。

“我去叫夏汉铮，”李浙杭说，“你看，他那傻样子，说不定要被贴上纸鱼呢。”

华莱丽抢先一步跳出花圃，同她一起奔过去。这时，她们发现，一个打扮成马戏团小丑模样的人，穿着行走极其不便的大皮鞋，正悄悄地向夏汉铮他们袭击。

华莱丽尖叫一声，扑上去，拉起夏汉铮就跑，李浙杭紧紧跟在身后。夏汉铮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哈哈大笑起来。三个人迅速躲进了菩提树林中。

“夏先生愿意当愚人吗？”华莱丽喘着、笑着问。

“愚人总得有人当，”夏汉铮说，“都不当，谁来当？”

华莱丽一边用眼睛向外搜寻着，一边说：“背上贴了纸鱼，那简直等于背上了受难的十字架。”

李浙杭却一声不吱。自从那天晚上她在夏汉铮面前勇敢地表白了以后，她几乎没再主动去找过他。夏汉铮明白，这反常的背后，正是证明她的感情的进展。他不想用她那三千法郎。他去问过姚海，想找出一个不伤害这姑娘自尊的办法，把钱退还给她。可是姚海只说了一句“这事我不管”，显然他是有意站在李浙杭一面夹攻他的。

难道夏汉铮不喜欢李浙杭吗？他不能欺骗自己。开初，对于台湾籍学生或海外侨属学生，他是抱有偏见的。天晓得从哪儿钻出这么一种概念，他总认为他们是同大陆的纨绔子弟一样的人。他们任意挥霍金钱，把消费当成美德，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但是，事实上并不如此。譬如李浙杭，她身上就从来没有那种浮华的脂粉气。她很用功。夏汉铮问过李浙杭的指导老师达利维教授。达利维说：“如果我的学生都像李浙杭小姐那样勤奋，居里大学将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居里夫人。”

但是，夏汉铮考虑的是双方结合的韧带。他总感到他们之间存在一条看不见的鸿沟，这鸿沟，是感情所填不满的。

左前方又爆发了一片骚乱、叫嚷声，说不定什么人被贴上了纸鱼。

“走，我们出去看看。”华莱丽提议说，“总是藏在这里，多没意思！”

夏汉铮和李浙杭没有反对，三个人从菩提树下钻出来。林阴道上的人们像遇难者似的东逃西窜。这里暂时还没有危险。

华莱丽忽然说：“夏先生，我父亲没有找你吗？”

夏汉铮说：“每天都见啊！”

华莱丽说：“我说的是去日本的事。”

夏汉铮说：“大概还没有最后结果，他没有提起过。”

“我同他吵了三次，”华莱丽用夸张的语气说，“他气得把咖啡壶都摔了！我说他自私、不公正、欺侮中国人……哈哈，我替你报了仇。”

夏汉铮笑了：“你说得太过分了。”

“一点都不过分，”华莱丽说，“我已经搬到剧院去住了3天了。”

“为什么？”李浙杭有些奇怪。

华莱丽哈哈笑道：“抗议呀！我向父亲声明了，如不改变决定，不让夏先生到日本去参加国际会议，我就同他断绝父女关系。”

夏汉铮哭笑不得。他了解这个开朗的法国姑娘。她的心像水晶一样，一眼可以望穿。她的爱和憎，都鲜明地表现在外面。

“那天，我们吵得可厉害了。”华莱丽毫无顾忌地说下去，“嘿，气得父亲的嘴噘得像圣诞节的鹅屁股，哈哈哈哈哈。他问我，这事与你有什么关系？你们猜我怎么回答他？我说，我爱他，将来要同他结婚……”接着又是一阵大笑。

夏汉铮觉得很难堪，偷眼看看李浙杭。她的脸色很苍白，身子扭了过去。唉，这个法国姑娘啊，她说起羞于出口的事，竟像问早安一样随便。

为了转变这种尴尬局面，夏汉铮费了很大心思，才琢磨出一句得体的玩笑来：“若是那样，我一回国就得被传到法庭去了。”

“为什么？”华莱丽天真地问，“中国法律有不准同外国人通婚这一条？”

夏汉铮硬着头皮说：“因为……我将被起诉为重婚罪！”

“你说谎！”华莱丽放心地笑起来，“你说过，你没有妻子！”

“没有妻子，难道就一定没有未婚妻吗？”夏汉铮已经决心把戏演下去，以使这火热的法国姑娘冷下去。

“她……是干什么的？”华莱丽问。

“她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叫李泽云。”

华莱丽一听，尖叫一声，双手捧头跑了，消失在黑暗之中。

夏汉铮长嘘了一口气，李浙杭也长嘘了一口气，两个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碰在一起，又都赶紧避开。

李浙杭知道李泽云是谁，她不会产生任何误会。她也听姚海说过，夏汉铮的法语教师在热烈追求他，但李浙杭不相信夏汉铮会娶一个法国女人。使她很不痛快的是，这位美丽的金发女郎，竟能够当着她这个第三者，坦然无惧地宣布她的爱情，这简直吓了她一跳。比起华莱丽来，她的勇气太差了。

两个人默默地向前走着，远处明灭不定的火炬时而照亮他们的脸。

李浙杭带几分挑衅地问：“你不想再编一个未婚妻的神话来对付我吗？”

“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神话是没有作用的。”夏汉铮自己感到这话说得很俏皮、很得体，因此很得意。

岂不知，这话让李浙杭听起来，无疑等于撤销了梗在他们之

间的障碍物，她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

戴着飞碟式纸帽子的加士东在一大群人簇拥下，仓皇逃窜过来。见他们两个人在林阴路上迈着悠闲的步子，加士东气喘吁吁地警告说：“骰子已经掷下！这可不是散步的时候。”

这是什么意思？夏汉铮不懂，李浙杭也莫名其妙。

矮胖的诺埃尔走过来。他的打扮更惹人发笑。他头上戴一顶意大利南部卡拉卜尔强盗式的帽子，上身穿着又短又瘦的骑士褂子，肚皮都险些露在外面，更显出他那滚圆的腰部，像半截啤酒桶。他解释说：“骰子已经掷下，是说今天非抓一个愚人不可，破釜沉舟！当年凯撒大帝渡过意大利吕比贡河，与掌握罗马大权的庞贝大战时，就曾挥舞马鞭子说过这句话。”

所有的人都笑了。

他们高举着火把向远处奔去。

忽然，加士东又趑趄回来，对夏汉铮说：“我们谈谈，好吗？”
“现在？”夏汉铮问。

加士东点点头，抓下那滑稽的纸帽子。

李浙杭识趣地要走：“我找游天凤他们去。”

加士东把脸掉向李浙杭：“这位是……”

夏汉铮这才想起来给他们作了介绍。

加士东伸出宽大多毛的手，同李浙杭握了握。她那瘦长、纤细的小手，几乎没从加士东的手掌里露出来。

加士东对李浙杭说：“用不着回避，请给我 5 分钟的时间就够了。”

三个人向树林里走了几步，加士东的大手在夏汉铮肩上一拍，说：“中国朋友，生我的气了吗？”

“我能够理解您。”夏汉铮这样回答之后，静等下文。

加士东说：“这一切所以会发生，也许因为我是法国人！还是爱因斯坦高明，荣誉会使人变得愚蠢起来。原谅我吧，人不能

没有过失。看来，你是得人心的。国际物理学会支持你，连华莱丽都站在你一边。大概，你是和上帝在一起的人，哈哈……现在，我可以奉命告诉你，你可以准备启程了。而诺埃尔，只能以私人身份出席，旅费由学校出一半，另一半，由他个人负担。”

夏汉铮心里滚过一阵热浪。他想了一下，突然说：“诺埃尔先生的个人负担太重了，他要从私人积蓄里拿出 2 500 法郎。这样吧，我愿意从我的旅费中拿出 1 000 法郎给他。”

加士东异常高兴地拥抱了夏汉铮：“好朋友，我替诺埃尔谢谢你！”

加士东乐呵呵地跑走了。

大话说出去，夏汉铮又有些后悔起来。他并不是富有者，他是公费生，他连买一支铅笔、买一杯咖啡，都是国家出钱。他有什么资格充大方，一次就答应支付 1 000 法郎呢？不这样，他又觉得对不起加士东和诺埃尔似的。他陷入了苦恼之中。

李浙杭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你是在为钱犯愁吗？这样说来，你根本没把我那 3 000 法郎算到收入里去？”

现在，他只好用李浙杭的这笔钱了。他说：“原来，我正想用一种不伤你面子的办法把钱退给你的。现在，只好领你的情了。我是个穷学生，即使回国，也只有相当 180 法郎的月工资，比留学时要少 16 倍，你不怕我还不起吗？”

李浙杭忘情地挎起了他的胳膊。她说：“能对你的事业有所帮助，我即使把衣服都卖掉，也心甘情愿。”

夏汉铮马上后悔起来。3 000 法郎，它无疑是一种媒介、一种信物，答应用这笔钱，不就等于暗示她，自己接受了她的心吗？

他是有理智的人，他知道他可能由爱情的漩涡卷到别的更深的漩涡中去，那时自己该怎么办呢？

正在他沉思的时候，周樯蹒跚地走来。李浙杭悄悄地从夏汉

铮的臂弯里抽出胳膊来，问他：“怎么就你一个人？”

“啊。”周樯无精打采的样子。

夏汉铮问他：“有什么困难吗？”

周樯说：“我这几天正在为房子苦恼。5天以后，我一定得搬家了。”

李浙杭问：“房东赶你搬家？”

“赶倒没赶，”周樯搔着头皮说，“房租又涨了，原来是500法郎，一下子涨到800法郎。”

难怪他苦闷。留学生的用费标准比进修生还要低。按规定，伙食费每月是450法郎，为了应付副食价格的低幅度浮动，又额外加了16法郎补贴。房租是不得超出500法郎的，其余就只有120法郎的生活费。逢年过节的20法郎节日补贴，交通费50法郎，留学生根本不给交际费。这样，周樯是不可能住每月800法郎的房子的。

“你找过‘四等秘书’吗？”夏汉铮问他。

周樯用脚尖搓着草地，说：“找过了，姚海给跑了几天了，又不是学期开头、结尾，大学城里都满员，没有空房间。只有古巴馆有一套房子，房租更贵，1000法郎。”

“实在找不到，你还到使馆去住吧。”夏汉铮安慰他说，“那里条件差点，可毕竟有个住处，骑驴找马吧。”

“我不能去。”周樯说，“那里哪有学习的环境？整天像大车店一样，来往出国的人闹闹嚷嚷……再说，我也不想看那些参赞、秘书老爷的冷脸，动不动训人，好像我们随时能掉进染缸似的。”

夏汉铮皱起了眉头，他本想说：“使馆的同志要求严格一点，还不是为了留学生们不致走邪路吗？”可他没有把话说出来，那未免有训人之嫌。

老实说，他对周樯不放心，也不满意。像他这种整日为追求

物质享受、不肯用功的人，在留学生中是极个别的。凡是国际球赛、音乐会，他都场场不拉，有时甚至舍得 100 法郎去黑市买一张票。周橧是最先“发明”步行的人，节约下的交通费下饭店、逛夜总会。可别的同学拿省下来的钱买学习用具，买科学书籍，或是给国内的所在学校、研究所购买仪器、资料录像带。夏汉铮就给国内的同伴耿耶、陈学模这些人买了不少资料。

有一次，游天凤跑来告诉夏汉铮，说有人看见周橧同沈越到过马尔斯教场附近的一家古董商店，卖了一批中国字画。

这批字画是怎么来的？有人分析是周橧出国时带来的，但游天凤说出国时检查比较严格，似乎不大可能。那么就只能是他当副司长的父亲来法国洽谈贸易时带出来的了？他父亲先后来过巴黎三次。

夏汉铮觉得周橧很危险，他过于好吃懒做，听说学业也极差。因此他同姚海一起找他谈过一次，没有多大起色。这几天，夏汉铮正准备第二次找他谈。因为他发现，近一个时期，他与台湾籍学生沈越打得火热，两个人几乎形影不离，还有人见他们出入过 19 区的妓院一带，这不能不叫人担心。

想到这里，夏汉铮对周橧说：“这样吧，过几天我要到日本去，大约 1 个月，然后还有 1 个月的回国探亲时间，你先搬到我这儿来住。”

周橧说：“那怎么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你也快毕业了嘛，”夏汉铮说，“先准备搬吧。离得近，大家还有个照应。”

周橧含混地说：“我再找找看。”

夏汉铮问他：“你和沈越还常在一起吗？”

周橧很反感：“怎么了？你也来问？”

夏汉铮说：“大家都出于对你的关心嘛。我们都不了解沈越。”

周樯说：“我不管别人，别人也不必管我。我爱交什么朋友，怎样去生活，那是我个人的事，是我的自由。”

“可是，你是祖国派出来的公费留学生！”夏汉铮抑制着愤怒说。

“也可以认为，是我个人奋斗、争取到手的。”周樯说，“我再也不愿意听别人教训我了！”

说罢，他悻悻地走开了。

夏汉铮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好长时间沉默着。

李浙杭说：“这种人，无论在哪儿，都要受到唾弃的。发展下去，不过是损人利己的拜金主义者。”

忽然，灯笼火把出其不意地拥过来，一个人猛地在夏汉铮背上拍了一把。还没等夏汉铮明白过来，李浙杭尖叫起来。随后，拿火把的人跳起鬼怪式的舞蹈，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喊着、狂叫着，仿佛到了世界的末日！

啊，夏汉铮的背上被贴上了大纸鱼！他成了1981年度居里大学的“愚人”！

李浙杭试图替他揭下背上的纸鱼，那是周围的人绝对不许可的。连加士东都赶过来嘲弄他。人们簇拥着他，像火把节游行一样，围着校园游过去，夏汉铮只能傻笑。

李浙杭说：“都怪我，只顾谈话，忘了愚人节的事。”

“没关系，”夏汉铮说，“我本来就是愚人。”

加士东大笑着说：“愚人往往是大智者，法拉第、雨果当年都被别人贴过纸鱼呢！”

人们又是一阵欢呼……

“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再有3天，夏汉铮就要启程飞往日本京都了。这几天，同学

们为他排满了日程表，天天有宴请，争相祝贺他的成就。他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他已经考取了法国国家物理学博士学位。

今天是难得的空闲。本来约定，要同李浙杭、姚海几个人到西郊布伦森林去玩的。对于中国人，那是一块圣地。1921年，以周恩来为首的十几个人，召开了有名的布伦森林会议，成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这就是中共旅欧支部的前身。他们来法国几年了，一直说要去，总没有机会。

正在公寓里准备食品的夏汉铮，在等候李浙杭的到来。

突然，加士东叼着大烟斗走了进来：“在准备行装吗？”

夏汉铮赶忙给老师让座，倒茶。

加士东坐到惟一的一张沙发里，说：“我相信你能为中国人争光的，也能为居里大学争光。”

夏汉铮笑了笑，说：“这和老师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加士东说：“我不喜欢听这些。你不是给老师学习的。爱因斯坦说过，‘推动我进行科学工作的是一种想了解自然奥秘的抑制不住的渴望，而不是别的感觉’。我不想多打搅你，我只是想听听你结业后的打算，你从日本归来，再有2个月，就到期了。”

夏汉铮第一次听到加士东同他谈起“打算”问题。他不能不稍感奇怪。这是用不着“打算”的，中国送出来的进修生，毕业后回到祖国去服务，天经地义。他想了想问：“老师是指今后的研究课题吗？”

“这我用不着关心，”加士东说，“一个科学家，用不着别人为他制定选题。”

夏汉铮眨眨眼，望着他。

加士东说：“我是想问问，你是否只有回国去的一条路呢？”

他没法怀疑加士东有什么挑衅意思。他那双凹陷得极深的深蓝色眼睛是那么真挚，甚至永远保留着儿童那种天真的神情。

“路，也许有很多条，”夏汉铮双手放到膝上，严肃地说：

“可是对我来说，只有一条，从来没有赋予我选择的权利，我也从来没想过要选择。”

“多么可惜呀，”加士东说，“我是料到你会这样回答的。你不要误会，我没有一点有害于你祖国的想法，我只是为你个人着想，为物理科学着想。你知道吗？学术顾问委员会都希望你再留下几年，再完成几项研究。这里条件好，你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这样聘请一位外国科学家，是没有先例的。我知道，你是不看重钱的，可我仍然可以告诉你，你的聘金将是每年4万美元，是美元，不是法郎！”

夏汉铮文静地笑了：“谢谢博士的好意。我的祖国需要我。”

加士东耸了耸肩膀：“这当然。我到过中国，去过你们的研究所。请原谅，我不得不说，你们那里的研究条件太差了。”

夏汉铮说：“没有人去从事建设，条件就永远好不了。”

“那你可能成为铺路的石子！”

夏汉铮说：“我愿意当这铺路的石子。”

加士东叹了口气：“我们的谈话，是不是等于告诉我，可以回绝顾问委员会的聘请了呢？”

“当然。”夏汉铮笑了笑。

加士东在屋子里走了一圈，站在窗下，审视着夏汉铮平静的脸，问道：“你是不是有所顾虑呢？我们聘请你做研究员，一要征得你同意，二要同你们国家交涉，这并不是我们策动你离开祖国。”

夏汉铮友好地笑了起来。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加士东的好意。他说：“老师的厚意我是明白的，也不用再说了。4万美金的年薪、优裕的现代物质生活，特别是先进的科学实验室，都是很吸引人的。可是，希望老师能理解我，世界上还有比这一切更吸引人的东西。”

“我尊重你的意愿。但是，我不打算把你的决定马上回复顾

问委员会，这机会的大门，向你敞开到最后一分钟。”

说罢，加士东起身告辞。

刚送走加士东，李浙杭穿一身浅灰色法兰绒春秋衫跨进楼门。

李浙杭问他：“加士东博士这么早来找你做什么？”

夏汉铮说：“啊，没什么，说点实验室的事。”

李浙杭闪了他一眼，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你笑什么？”夏汉铮在楼梯口停留片刻，问道。

“你真是城府森严啊！”李浙杭边走边说，“加士东先生不是给你下长期聘书来的吗？第一步当然是试探性的。”

夏汉铮有些奇怪：“你怎么知道？”

李浙杭说：“华莱丽在车子里坐着，刚才我们交谈了好久。她不肯上来，但她相信，女人所不具备的魅力，事业将会具有这种魅力，因此她认为她的前途是乐观的。她至今对你没断旧情啊。”

夏汉铮只是笑了笑。

李浙杭推开房门走进他的房间，问道：“华莱丽的愿望没有落空吧？”

夏汉铮反问：“你认为呢？”

李浙杭审视着他的眼睛，说：“看来，你拒绝了。”

夏汉铮说：“这还用问吗？”

李浙杭叹了一口气，说：“这种聘请外籍科学家留法工作的机会多难得呀！又没有改变你的国籍，你还是华人嘛。哪怕在这里工作 10 年，也许比在祖国工作到死都有成就。我哥哥的教训还不够深吗？”

夏汉铮听了内心很反感，他沉默不语。

李浙杭见他不语，误解他动了心，就进一步劝说道：“留下来吧，等你干出名堂再回去嘛。我有一笔积蓄，我打算到西郊买

一所房子，你的日子会好过的……”

夏汉铮平素对这姑娘的好感忽然间烟消云散了。好像吹去了罩在山间的层层岚雾，一下子露出了秃山煞是难看的本来面目。他后悔，对这种人，本来是一丝好感都不能流露的。她能同自己以前的恋人李泽云相比吗？为了支持自己的事业，李泽云可以做出贡献她自己一生的牺牲，她李浙杭能吗？

一群留学生、进修生拥了进来。游天凤带来了好多人，都是即将结束学业回到祖国去的学生。他们都穿上了时髦的春装，连不大修边幅的姚海也擦亮了皮鞋、刮净了胡子。

游天凤把几个同学介绍给夏汉铮：“这位是理学院的乐铄生，陈景润式的人物；这位叫邱竹林，学海洋勘察的；这位叫宫逢春，学纺织机械的，能跑马拉松……”

夏汉铮同这些嘻嘻哈哈的大学生们握手，他的不快情绪一下子消失了。他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问道：“周樯没来？没人通知他吗？”

“人去屋空，”游天凤说，“我是昨天晚上去的。房东克朗索瓦尔太太说，已经搬走3天了，不知去向。后来我听别人说，是沈越给他找的房子。”

乐铄生说：“听说他新找的房子在拉丁区，每月租金两千法郎，阔气得很，从前是什么元帅府呢。”

游天凤吐出了舌头：“莫不是他一夜间发了横财？”

乐铄生说：“法国也并不是随地可以掘金子的乐园。是沈越替他付的房租。”

姚海和夏汉铮交换了一个眼神，都感到事态严重，夏汉铮说：“要了解一下沈越有没有什么背景。”

“肯定有背景，”游天凤冲口说道，“还用去打听？无利不起早，沈越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他来自台湾，从染缸里是扯不出白布来的。”

这无疑等于说，凡来自那里的学生，没有一个是好的。

夏汉铮觉得游天凤过于冒失，马上掉头去看躲在角落里的李浙杭。李浙杭眼里噙着委屈的泪水，低头卷着自己的衣角，趁人不注意，溜出了房门，噤噤地跑下楼梯。

“都是你说话一点顾忌没有！”姚海埋怨地瞪了游天凤一眼，走到窗前，朝匆匆走去的李浙杭喊道：“喂，浙杭，哪儿去呀？我们马上出发了。”

李浙杭只顾低头抹眼泪，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林阴道深处。

转过身来，姚海说：“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呀，总这么冒失。”

人们陆续下楼，坐上了租来的一辆小型旅行车。

姚海不知同法国司机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车子一出了大学城，不是向西，而是向正北开去。

当车子驶上意大利路时，游天凤发觉不对，她欠起身来说：“这不是向意大利广场开去了吗？走市内的路太拥挤了，比蜗牛爬还要慢，不如顺旧城儒尔当林阴道、布吕纳林阴道一直向西行，全是高速公路！”

夏汉铮说：“绕一下，到哥特伏化街去一下。”

同学们都不再问什么了。他们有的去过，有的没去过，他们都知道哥特伏化街是当年旅欧支部的所在地。

这条街是以意大利广场为中心的九条放射状马路之一，是一条相当窄的街道。石头马路，临街的楼房全是中世纪建筑，长满绿苔。你很难相信，在珠光宝气的现代巴黎，还会保存这样一条长一百米的古色古香的街市。

他们把旅行车停在街口，十几个人步行往里走。街牌是蓝底白字漆出来的，标着法文 R · Godefroy 字样。

他们来到 18 号门牌前面。这是一座杏黄色的三层楼房，窗框油成白色，没有雕饰，外表朴实无华，门楣上方醒目地画着一

颗星。

游天凤问：“这颗星是什么意思？”

姚海笑了：“你白住巴黎了，连旅馆的标志都不认得。一星旅馆是房租最便宜的，二星、三星旅馆才高级一些。”

门前出现的人群，惊动了女主人。一位端庄发胖的中年女人踩着木板楼梯走下来，一出门，就惊喜地喊起来：“啊！中国人！你们是来参观周总理旧居的是吧？欢迎！周恩来，伟大的人，我没有见过他，可我的长辈见过他的。这座房子，是你们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法国人的荣幸。快请进来吧！”

姚海一行人向女主人鞠了躬，鱼贯步上嘎嘎直响的楼梯，一直走上了3楼。女主人从腰间解下一串钥匙，打开靠右面的一间房子，人们一拥而入。

这是一间窄小得容纳不下10个人站立房子，纯粹是个斗室。夏汉铮算了一下，面积不会超过5平方米。只有一扇小窗子，可以俯视下面的小院。室内除了能安放一张床、一张学生式小课桌而外，再也放不下别的东西了。

有谁能想到，当年这间斗室里就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所在地？在这里，周恩来、赵士炎、陈延年，以及邓小平、陈毅等同志领导过旅法同学的学习和斗争。有谁能想到，当年周恩来同志就在这间屋子里写下了许多革命文章，陆续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透过历史的帷幕，他们仿佛看到了当年号称“油印博士”的邓小平，正在这间斗室昏暗的灯光下，一私不苟地刻写着《共产党宣言》和革命刊物的社论文章！

夏汉铮感叹地说道：“我到过圣安娜街鲍狄埃当年栖身的寒苦小阁楼，那也比这楼强呢！”

“应当把周樯绑架来，”游天凤愤愤然地说，“让他这个想住两千法郎公馆的浪子哥受教育！”

人们都沉默不语。六十多年前，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远

涉重洋，到法国来学习、探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他们得到了成功；半个多世纪以后，夏汉铮这些热血青年，不正是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又为了振兴中华来学习了吗？

乐铄生拿出了照相机，给大家留了一张影。

游天凤说：“应当题一句什么词儿。”

姚海说：“就叫‘周恩来法国故居留影’吧。”

“没文采。”游天凤反对。

望着门旁锈迹斑斑的自来水龙头，夏汉铮沉思着说：“周恩来同志当年与同学分别时，曾题过这样共勉的词句：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妙！”游天凤第一个叫好，“这多现成！而且时至今日，仍很合适。”

姚海也说：“就这句吧！回国后，我们各奔西东。等我们再次相会时，希望周恩来同志当年的宏愿已经变成现实。”

当这些人走下楼梯时，每个人都感到自己身体里热血沸腾。

吾土吾民

北京的6月中旬，已经处在蒸笼的热度中了。仿佛地球发生了某种变异，这几年北京一年年热起来，竟亚赛“三大火炉”的南京、武汉、重庆了。

夏汉铮也是带着满腔热忱回祖国休假的。实际上，他个人并没有提出休假的要求，因为距离结束学业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了。完全是由于组织的照顾，他才就近从京都直飞北京。

他的休假期是4个礼拜。他打算抽出一个星期回东北故乡去探望一下父母，顺路去看看李泽云。

他是傍晚时分到达首都机场的。因为事前没给所里拍电报，当然不会有人来接他。他在北京没有家眷、亲人，孑然一身惯

了，用不着惊动别人。他没有叫出租汽车，挤在民航大客车里，坐到民航大楼，再转两次公共汽车，回到研究所宿舍，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

空气像从蒸汽锅里放出来的一样，扑到身上热乎乎的。他提着仅有的一只旅行箱上楼，在院子里没碰见什么熟人。

他在日本京都国际会议馆打了响炮。他在宣读论文时，离开讲稿，侃侃而谈，一直讲了4个小时，几百人的会场，静得能听见银针落地的响动，没有一个听众中途退席——包括那些年迈的物理学家。

他博得了长达5分钟的热烈掌声。十几位华裔科学家拥到讲台前，围着他，向他祝贺，祝贺他为祖国争了光。加士东博士没有出席会议，但他第二天就收到了国际物理学会发给他的祝贺电。这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马上给他的学生加急拍发了一份不太科学的电报：

日本京都第15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转中国
科学家夏汉铮先生

居里大学万岁！夏汉铮先生万岁！

加士东于巴黎

收到电报，夏汉铮忍不住想笑。“万岁”在法国博士心目中，是一种高兴和祝贺时的呐喊。由此可见，他是多么兴奋了。

走廊里漆黑。不是没有顶灯，是灯泡安不长。在家时，谁都不肯出钱买灯泡，丢了憋气。只有夏汉铮差不多每个月要新装上一个灯泡，反正才四角五分钱，不过照样丢。后来，隔壁的助理研究员耿耶想出个办法来，用铁丝做了个网罩，罩在灯外面，等于把灯泡关进了笼子，还好，直到他出国前一直安然无恙。可是，现在他举目望望房顶，不单灯没有了，连网罩也不见了，只

剩下一个黑洞。

夏汉铮苦笑了一下，在黑暗中摸索着，不是脚绊到人家的煤气炉子上，就是手触到了盛蜂窝煤的破筐子。有什么办法呢？粥少和尚多，虽然研究所房子年年盖，可总得按级别、资历依次解决。那些暂时没房子的人，只好挤到单身宿舍里来，拿走廊当做仓库和厨房！

门锁好像生锈了。夏汉铮摸黑拧了好一会儿，才勉强打开，黑暗中一股潮湿、霉烂的味道像沼气一样冲出来。他赶忙打开灯。哈，大概他委托代晾衣物的耿耶忙昏了头，也许从来没光顾过这间斗室。你看，连床上的凉席都长了绿毛，靠窗子暖气片底下，不知是雨水还是暖气片漏了水，汪了一大片，几只旧鞋漂在上面，满地爬着叫人头皮发麻的潮虫。

他摇摇头，放下旅行箱，赶紧收拾。他先打开窗子。

坏了，蚊子和各种飞虫一团一团地扑向灯亮，他这才想起来没有纱窗。往年他自己用图钉安上过一块纱布的，一时又想不起塞到哪里去了，只好再关上窗子，任霉气熏着。

他呆坐到床沿上，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法国大学城国际馆那干净、舒适的公寓来，电冰箱、空调机、吸尘器……哈，现在他好像一下子跌回到中世纪！

又胡思乱想！多少年你不都这样生活过来了吗？

他重新振作起来，开始打扫。大概隔壁的耿耶不在，这么大的声响他会听不到吗？这书呆子，也许还泡在实验室里呢。

当夏汉铮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结了蜘蛛网的塑料水桶，打算到一楼水房去打水时，走廊尽头房门开了，一个人顺手操起一只拖把跑过来，厉声断喝：“谁？干什么的？”

夏汉铮吓了一跳，冷静一辨，听出来了，他说：“老陈？我是汉铮啊！”

那人似乎不信，手持拖布又向跟前靠了几步，借着屋里追出

来的灯光，他到底看清了，马上扔了拖布：“是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一点响动没有？”

“难道我回家来，还要先放一通爆竹吗？”夏汉铮扔下塑料桶，一把把陈学模扯到房子里来，两个人又是拍、又是打，好一阵亲热。

“胖了，白了！”陈学模歪头打量着他，说，“看来，洋面包到底是养人啊！只是，你的穿戴可不怎么洋气，没改造过来！”

两个人都哈哈笑了。

“你可瘦多了，”夏汉铮也打量陈学模，说，“你有病吧？肝好一点了吗？”

“没事，”陈学模说，“就是老一点，我本来就长得老相。”

夏汉铮这才注意到，他的头发早就谢顶了，只剩下四周一圈茸发，中间形成难看的黄土岗。看上去，这个年仅 45 岁的助理研究员，活像 60 岁出头的老人了。

夏汉铮说：“你真见老了。”

“你怎么没学会西方人的恭维？”陈学模说，“当面说人家老，多不舒服？前几天我到北戴河休假，在中海滩碰上一些年轻人，他们听说我是搞科学的，把我围上，问我是几级教授。我一想，他们准把我当成老前辈了，就叫他们猜，我有多大年龄。你猜他们怎么说的？”

夏汉铮忍住笑，反问：“怎么猜的？”

陈学模拿腔捏调地说：“有个姑娘十分客气、礼貌，她说，您不老相，大概不过 70 岁吧？”

说到这儿，陈学模和夏汉铮都捧腹大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

夏汉铮问：“怎么，你老兄到北戴河去疗养了？季节早了一点吧？”

“这是一种新兆头，”陈学模说，“咱们所去了 20 个人，下一

批在7月初，还有20人。北戴河有咱们的足迹，还是第一回吧？

夏汉铮被他说得热乎乎的。

陈学模说：“等一会儿再谈你的成绩，你在日本京都放‘氢弹’，冲击波早就到咱所里了，你老兄给中国人长脸了！我先问你，我要的资料，给我带来了吗？”

夏汉铮拍了拍旅行箱：“当然带来了。不过，你研究的那个课题，在法国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加士东博士已经在设法从西德给你搞资料了，下次才能带全。加士东是个好老头。”

陈学模这时才想到问：“哎呀，你还饿着肚子吧？叫贱内弄点菜，咱俩喝两盅，为你接风！”

夏汉铮一把拉住他：“别去麻烦了，我在飞机上吃了点三明治。云洁累了一天，早该休息了。”

“休息？”陈学模用手指敲打着表蒙子，说，“你真像从大西洋海底来了的人了！这才9点多钟！你什么时候看见她11点以前睡过觉？”

这倒是实话。从前，一谈起家务事，陈学模总是幽默几句：“我想写一本《家庭的科学组合》，保证风行一时，找老婆，不要找有事业心的，否则，只好受罪。”然而，事实上他支持妻子的工作，那是全所公认的“模范丈夫”。他老婆白天要在大学教课，晚上要给电视大学赶写讲稿，家里上有八旬老母，下有两个孩子，家务事陈学模担起百分之八十。从洗尿布开始，到近年来给母亲倒便盆，样样都干，他的科研成绩居然还居上游。他永远是个乐天派。若讲日子清苦，他数第一；若论埋头苦干，他也数第一。在他面前，似乎别人都没有叫苦和发牢骚的权利。

想到这里，在夏汉铮眼前犹然浮现出加士东博士那幽静舒适的小楼来。那满院的花树，那宽大的阳台，那永远不会受到干扰的环境，那才是科学家的乐园。倘若陈学模也有那样的条件，那

会是什么样子呢？

“怎么，今年分房子又没你的？”夏汉铮问。

“我嘛，不鸣则已，一鸣则惊人！”陈学模说，“不搬则已，一搬则永逸！我把房票出让了！明年落成的房子可以洗热水澡呢，那多棒！”

别看他说得那么轻松，夏汉铮知道他是装出来的。凭他耐得住苦楚的性子，他肯定是这座楼里最后一个乔迁的人。

陈学模不顾夏汉铮的阻拦，执意要去弄菜喝两杯，只得由他。夏汉铮赶忙打开箱子，拿出几袋水果糖、干果，还有从日本带回来的袖珍电子计算器、小玩意儿，塞到陈学模手里，说：“这是给芳芳和东东的礼物。”

不一会儿，走廊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陈学模带着妻子贺云洁和女儿芳芳、儿子东东跑来了。他们寒暄了一阵，贺云洁扎上围裙去炒菜，叫两个孩子打下手。东东把房间里的灯扯到走廊，灯线不够长，只能用手高擎着。

菜很快端上来了。一碟花生米，一盘炒鸡蛋，一碗素炒莴笋，还有一个凉菜，糖拌西红柿。贺云洁抱歉地说：“你们将就吃点素吧，家里不能存放隔夜肉，没冰箱。”

陈学模用牙启开一瓶二锅头酒，风趣地说：“我最怕吃肉，脂肪积存、胆固醇过剩，可是个灾难。”

贺云洁笑着说：“我还有半节讲义没写完，不陪你们了。”

门关上，走廊也静了下来。

夏汉铮启开一瓶从法国带回来的酒，说：“你尝尝，这种威士忌，酒味不错。”

“咱也开开洋荤！”陈学模接过大肚子瓷瓶，说：“像个夜壶，这造型可不怎么讲究。”接着抿了一口，又皱眉头又噤鼻子：“老天爷！马尿一样。”

夏汉铮哈哈大笑起来。

吃着菜，喝着酒，陈学模向归国的同事详细询问了巴黎和居里大学的种种情况，夏汉铮一一作了回答，又关心地问：“你们六室的课题进展怎么样？”

陈学模扮了个鬼脸：“手巧不如家什妙，还是陈景润舒服，有两张演草纸就行了。”

“我走时，科学院不就拨了外汇，定下来进口一套设备了吗？”夏汉铮问。

陈学模脸上一副苦相，说：“钱花了，设备来了，扔在露天地里，可以卖给废品收购站，价钱不会低，都是优质钢材！”

“怎么搞的？”夏汉铮放下了酒杯，“你发牢骚的水平可是大有长进！”

陈学模说：“那是一套外国人甩下来不用的、30年代的破烂儿货，重新涂了漆，根本不能用。”

“退货呀！”夏汉铮有点愤慨，“干吗不拿出合同来罚他？”

“罚得了吗？”陈学模说，“这叫哑巴吃黄连！后来我们查了合同，才发现，合同上写的机器型号，就是这些破烂儿，人家卖主并没有偷梁换柱。”

经陈学模一说，这才弄明白，去同外国人签订合同的人，是研究所里一个即将退休的管行政的副所长。大家都反对他去，可是考虑到他就要退休了，再没有出国机会，还是派他去了。这位仁兄在外国饱了一顿眼福后，不懂装懂地看了仪器，签了字，就带着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打道回府了。

“这种人应当处分！”夏汉铮把筷子狠狠摔到了桌子上。

“处分了，”陈学模说，“党内警告，撤销职务。不撤销他反正也要离休了。就这样，一百万元的外汇就打水漂了。”

“荒唐！”夏汉铮喝了一大口酒，觉得口腔又麻又辣，极不舒服。“有些人把出国当成开洋荤，尽去些外行人，难怪赔本、上当。”

“熬吧，”乐天派陈学模也感到愁苦了，“你信不信？即或我从今往后一篇论文也写不出来，到 60 岁时，也能混上个副研究员。说起来，我们的研究员、教授又值钱，又不值钱。你那位导师，不是 24 岁就当教授吗？我们这里还是吃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只要年头熬到了，不管水平如何，就能评上去。”

“我不信你会随波逐流地混日子！”夏汉铮说。

“这倒对，”陈学模说，“发一点牢骚，活照样干。不干于心不安啊。”

听了陈学模的话，夏汉铮心中一阵阵痛楚。

“你快回来了吧？”陈学模又喝了一大口酒，问道。

“8 月中旬。”夏汉铮说。

陈学模说：“真有意思！有人说你可能不回来了，有人说你在巴黎银行有 3 万法郎的存款。人言可畏，人多了，吐一口唾沫能把你淹死。”

夏汉铮问：“你信吗？”

陈学模哈哈大笑：“我们剃鬼头、坐牛棚的年月都没想到跑，日子好过了反倒去仰人鼻息？梁园虽好，毕竟是人家的呀！”

夏汉铮心头一热，痛饮了一杯。

他问道：“耿耶干什么去了？又把自己锁进实验室了？”

“你还不知道？”陈学模十分惊讶，“你走后，他是平步青云了。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物理学界重视，得了科学奖金，入了党，分了一套 80 平方米的房子，被美国请去讲学了。哈哈，对于西方人来说，我们也是‘洋人’，也有给他们‘念经’的时候！”

夏汉铮听了为耿耶感到高兴。

陈学模说：“说真的，咱们的困难不仅在于器材、设备，也不仅在于生活的困苦，这一点，中央想到了，正在逐步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待遇。我最头疼的是庸俗的关系学，应酬太可怕了。”

夏汉铮说：“老办法，不予理睬就是了。”

“可它不断来找你麻烦啊！”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夏汉铮说，“几年以前，你能想到你又能回到物理研究所来吗？重要的是争分夺秒，让我们的科研工作进展得快一点。”说罢，他突然间觉得自己中途回国休假是一种浪费。他决定取消这次休假，马上回到法国去。他本来还要去拜会海洋局的李浙稽、还要到东北去看看父母、看看以前的恋人李泽云，可他觉得来日方长，现在一分一秒，对于他都是太珍贵了。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乡

7月的巴黎，到处飘散着郁金香和梔子花的芬芳。巴黎的夏天并不闷热，早晚凉爽，气候很类似中国的长春、哈尔滨。

回到巴黎以后，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杜绝了一切交游，用百米冲刺般的劲头去攻另一个课题。留在法国的日子在一天天地缩短，他十分珍惜所剩不多的时间。

这期间，李浙杭不断地打电话给他，他一律不接。他事前关照了诺埃尔，代为挡驾，说他关在实验室里做连续实验，脱不开身。

这天傍晚，夏汉铮结束了实验，把未来准备写实验报告的数据整理妥贴，到14楼冲了凉水澡，换上衣服走出居里大学庭院，已经是晚上7点了。他看看表，赶回大学城吃晚餐已经来不及了，就打算步行到水上饭店去买点小吃，吹吹风散散心。

没想到，一出校门，看见李浙杭站在树阴下冲他笑呢。她今天的着装很特别，上衣是紧身黑色薄绒细毛线衫，下身却是一条西式白色小喇叭裤，白色坡跟网眼凉鞋，提着个黑色羊皮兜，黑白反差极大，更显出她那俏丽的容颜、苗条的身材。这个向来朴

实无华的女子这样着装，还是不多见的。何况她又施了粉、涂了唇膏，头发也是着意梳理过的。

现在，他想溜也溜不掉了，只得硬着头皮打招呼。

李浙杭雍容大度地走过来，问道：“回避我，是吗？”

夏汉铮急忙说：“你说哪去了，我这些天在忙实验。”

李浙杭说：“你心里发慌吧？生怕叫我这台湾人传染了是不是？”

夏汉铮没料到她这样说话。

李浙杭说：“站在这儿干吗？走吧，吃点东西去。你不是还没吃晚饭吗？”

夏汉铮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吃？”

两个人顺着马路斜上塞纳河堤，慢慢走着。李浙杭说：“你的一举一动，都有华莱丽监护着。看来，这个法国女郎对你够痴情的了。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

夏汉铮说：“我快要走了，一切可以结束了。”

“那样，并不能了结。”李浙杭向一个卖郁金香花的孩子买了一束花，捧在手中，说，“华莱丽为了你，可以放弃她的法国籍，追到中国去，她干得出来的。”

夏汉铮吓了一跳，他倒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性。

李浙杭说：“现在，只有我可以帮助你。但你必须说实话，你如果确实爱她，我会成全你们。”

“你不要说了，”夏汉铮说，“这是决不可能的。”

“那么，”李浙杭笑道，“也只有我，可以让她从此罢手。”

夏汉铮不相信李浙杭有这么大本事。李浙杭只是笑笑，仿佛在说你等着瞧吧。

走了一段路，李浙杭说：“我万万没有想到，你没去看看我哥哥。”

夏汉铮说：“很对不起，原准备去的。后来因为急着走，一

切计划都取消了。”

李浙杭说：“他最近来信了。”

“他一切都好吧？”夏汉铮问。

“其实，你上次即使去看他，也会扑空的。”李浙杭笑着说，“他在南海，参加了海上油田勘探工作。他是副总工程师，上个月还立了功呢。”

夏汉铮不由得高兴起来：“我说过嘛，总有一天，会人尽其才的。你哥哥没有让你回去吗？”

“那还用问吗？”李浙杭说了这一句，一直望着他的脸。

夏汉铮问：“你定了吗？去台湾？回大陆？还是留在巴黎？”

“你希望我怎样呢？”李浙杭狡狴地笑了笑。

“人各有志，”夏汉铮故意说，“只有自愿者，才吃得住苦。”

“说得对。”李浙杭的眸子里蕴藏着深沉的光。她说：“凤凰向着亮处飞，蝙蝠却跟着黑暗走。我已经决定了。你没有注意我今天稍稍修饰了一下吗？”

夏汉铮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站住，打量着她。

李浙杭说：“我是来向你告别的。后天，我就要启程了，连机票都拿到手了，你看——”她刷地拉开黑色手提包的拉链，拿出一张机票递到夏汉铮手中。

他简直惊讶得叫起来。这是法国民用航空公司的双联机票，是从巴黎经卡拉奇直达广州的。

这是他此前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她过去的言谈、举止，从没表露过对大陆的好感。他曾试图劝说她回祖国去，但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她不同于自己，她从小没有得到过大陆祖国的抚慰，自然没有义务去分担忧患。她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什么动力使她这样快地抉择了去向？简直是不可思议！

李浙杭轻轻地从他手中抽回机票，装起来，不无得意地说：“走啊，站在这里干什么？你不用发问，我来解释。直接的原因

有这么几件事。”

接着，李浙杭讲了起来。

第一件事是她观看国际体操邀请赛时的感受。她的一个老乡邻替她买了一张入场券。那天有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参加决赛。李浙杭了解这个老头，他是一位退了休的国民党将军，西山会议派的骨干。他对大陆实行的共产主义是不赞成的，看样子至死不能改变。奇怪的是他主张国共合作，但前提又是以三民主义为治国方略。基于这种状况，李浙杭料想他对中国女队的输赢不会有什么兴趣。殊不知，当中国女子体操队获得总分第一名，比赛场高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时，这个老将军发疯般地鼓掌、喊叫，向中国运动员投掷鲜花，最后竟然不顾比赛场工作人员的阻拦，冲上去，向队员们祝贺。

回家的路上，李浙杭问他：“您今天是怎么了？”

他说：“你笑我疯狂是不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哪怕大陆祖国容不得我，我也要回去。有志者，宁在家中饿死，不当在别人篱下吃闲饭。我老了，愧对祖国。你们年轻人，可不能忘了你们是炎黄子孙啊！”

另一件事，对李浙杭的刺激也相当大。她父亲通过海外的朋友辗转来了一封信，叫她千万不要回台湾去，如果能去大陆，他在九泉之下也心安了。父亲说，他将用儿女的劳动赎回自己对祖国的欠债。父亲所以如此说，那是因为她姨父的遭遇引起的。几个月前，李浙杭的姨父苏元鼎决定从美国的 IBM 高级电脑公司回台湾去服务。他是由台北大学的副校长聘请的，打算到台湾咨询工业策进会工作。但是，台湾驻美办事处只准许他在台湾停留 30 天，他的夫人倒可以呆 60 天。他只好寄希望于台湾当局，谁料台湾当局根本不通融，只能在期满后延期两次，也就是说，期满 90 天，他就变成非法居留了。更恼人的是，李浙杭姨父在美国使用的汽车带回台湾，但按规定要上 120 万元新台币的关税，

上不起，只得扣留在海关，又要每天付仓租。假如长期扣留，最后就是汽车不要了，也折卖不出关税、仓租钱。那天，苏元鼎先生找到台湾“行政院”，同官员们吵起来。最后，这位一心扑向故土的专家一气之下，跳海自杀了。

在向女儿叙述这件悲惨事件时，李浙杭的父亲在信中说：“这就是今日的台湾！去吧，到大陆去吧，苦一点没什么，只要真能为国家做点事。”

第三件事情，是周樯的叛国出逃。这是夏汉铮一回到巴黎就听姚海气愤地告诉了他的。周樯花了沈越那么多钱，越陷越深，终于秘密潜逃了，已经不在巴黎，去向不明。到此时，人们才弄明白，沈越是个“台独”主义分子，他是主张“台湾独立”，另成立一个国家的。在这一点上，无论大陆留学生，还是台湾留学生，都骂他是民族的败类。

由于这几件事情的刺激，李浙杭毅然决然地跑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开始办理回国服务的手续。

听了李浙杭这番话，夏汉铮的心底剧烈翻腾起来。

他们已经来到了埃菲尔铁塔下。仰面望去，有三层平台的塔上，已经是灯光如织，塔尖的灯光是橘红色的，像一颗搏动的心脏。

李浙杭提议说：“乘电梯上去怎么样？115米的平台上设有酒吧间、餐馆，我举行告别宴会。”

夏汉铮笑了，点点头。

巨型电梯载着他们徐徐上升。逶迤的塞纳河、万家灯火的巴黎尽收眼底。他们一直升到最高层平台，是276米的高度，那里有一家别致的餐馆

李浙杭找了一张方桌，坐下来，点菜、要酒。

喝着白葡萄酒，李浙杭说：“稍等一下，我去打个电话？”说着起身走到前台去借电话。

过了一小会儿，她春风满面地回到餐桌前面来，给夏汉铮斟满了杯子，凝望着无比绚丽的巴黎夜景，轻声说：“多美啊，巴黎！可是，你记得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吗？梁园虽好——”

“不是久恋之乡！”夏汉铮接了下半句，心潮一阵起伏。

李浙杭又要来一个空杯子、一副餐具，摆好。

夏汉铮问：“你打电话是约人？”

李浙杭含羞带笑地点头。

“约的是谁呀？”夏汉铮有点摸不着头脑。

李浙杭嫣然一笑，说：“这就不要问了。来的人是来祝贺你，也祝贺我的，确切点说，是祝贺我们两个人的。”

月亮升起来了。它周围缠绕着一片腾腾的雾气，不很圆，也不很亮。

“这时候，北京的月亮会是什么样呢？”李浙杭双手支着下颏，瞩望夜空，无限向往地说。

一股浓重的乡思袭上夏汉铮的心头。他仰望着月亮说：“记得有一句古诗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两个人都沉浸在对祖国美好的怀念之中。

隆隆的电梯响着，又一伙游人登上了埃菲尔铁塔。夏汉铮突然发现，一个身穿红衣服的金发女郎朝他们的餐桌走来，还背了一架尼康照相机。啊，那不是华莱丽吗？她来干什么？难道……李浙杭打电话约的人就是她吗？只见华莱丽已经走过来了。她大声说着：“祝福你们，一对理想的情人，今天该由我出钱请客！”

霎时，夏汉铮仿佛一切都明白了。

（原载 1983 年 2 月号《十月》）

生活的蒙太奇

戴面纱的女明星

滇南的雾真大，白天行车要开亮大灯，也只能照出 5 米远的路面。好在这是一支相当庞大的车队，前面有部队的车当前导，慢慢向前开就是。车速最高能有 15 公里的样子，背着木炭篓傍山而行的布依族老乡，都一伙一伙地超越车队，不时地向汽车里的人们打打手势，多少有点嘲笑的意味。

谷樾脸上蒙着一块透明的纱巾，是浅烟色的，中间散布着许多故意纺出来的黑疙瘩，总使人疑心是这姑娘的脸上长了些俏皮痣。除了电影界的同行，没有人明白，谷樾为什么总像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女人那样罩一块面纱。这里没有风沙，用不着像 5 月份北京的女孩子们那样，头上缠着纱巾防沙土。谷樾是天下人都认得出来的电影明星，也大可不必像印度、巴基斯坦女人那般羞赧地不露真容。

“这叫不露庐山真面目！”这是谷樾邻座另一个女演员嘉桦戏谑的回答，是回答一位诗人的。于是车里爆起一阵笑声。

谷樾只是淡淡地一笑，两腮的一对小酒窝稍稍深了一点，随即复原。

还是那位秃顶的诗人说：“据说，演员们从不大笑，是很有节制的，可能怕面部肌肉会松弛、老化。”

又是一阵笑声。

嘉桦简直笑出了眼泪。她拿纱巾抽了诗人一下，说：“你真会挖苦人！挖苦人可没有什么诗意。你看我，什么时候怕过肌肉松弛？大哭、大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确实，嘉桦不同于谷樾，她号称是“开放型”的性格。无论你是多么拘泥的人，只要同她在一起呆上3分钟，都会误以为同她是多年交往的老朋友了，她是个道地的自来熟。

同坐在这一辆面包旅行车上的十几个人，虽然来自电影厂、各省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几天前还不太熟悉，但他们认识谷樾和嘉桦，就如同没有人不认识月亮一样。电影银幕、电视屏幕上，她们的大特写镜头太多了，打在人们脑海屏幕上的印迹，那是无法抠掉的。

嘉桦什么时候都是人们中的当然核心，她长得真漂亮，是带有一点“洋味”的漂亮。她的眉脊骨略有点高，因此显得眼窝很深，加上那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天生带点蓝颜色，披在肩后的长发有一半是浅棕色的（当然别人不知道，这一半是染的），好多人都以为她是维吾尔族人，至少猜她是混血种。昨天晚上在昆明集合宣布编组时，新华社一个记者在打量了一阵嘉桦以后，礼貌地问道：“您，会不会是维吾尔族血统？我指的只是血统。譬如，远在公元7世纪，维吾尔族的祖先回纥部就曾有一些部族迁到河套平原一带，难免留下后裔……”

当时嘉桦朗声大笑起来：“这需要考古的，先生。我只知道，我是吉卜赛人！”

新华社记者莫名其妙地眨眨眼，不得要领。后来还是场记兼副导演李忌告诉他，嘉桦在电影界有个绰号：吉卜赛女郎。这完全是根据她的面部特征和好动的性情叫出来的，并无恶意。

嘉桦确是一个极有个性的女孩子。

就拿这次来云南慰问自卫反击战英雄们的活动来说吧，大家都是临时接受任务，有人连牙具都没来得及带，就向云南进发了。但嘉桦的行李仍然不啻出国的讲究。她所在的摄制组当时正在洪湖一带体验生活，得到命令，从武汉出发时，准备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嘉桦还是带了一只大皮箱，里面盛满了各种时髦的衣服。在昆明住了两天，同行者们看她换过四套服装！都是极雅致的。她到街上和翠湖走了一趟，竟然惹得同样爱美的昆明女孩子成百上千地围她转，偷偷地画她的服装样式。

这使得制片主任余晶磊很不高兴，昨天晚上，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制片主任把嘉桦找去，说：“这次是来慰问解放军的，不同于在家。我提醒你，在服装上稍稍注意一下。”

嘉桦眉梢一耸，笑嘻嘻地问：“那么，穿中山装，还是找一件道袍来合适？”

余晶磊不再理她，悄悄告诉与她同房的谷樾关照一下。

没想到，今早上一登车，余晶磊真有点啼笑皆非！嘉桦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套洗白了的旧军装（上衣还是解放战争时那种双排扣的列宁装），一顶军帽角度很大地扣在头上，披肩发全部塞进了帽盔中，加上腰间束起了一条皮带，除了没有袖章，就像“史无前例”年代的红卫兵一模一样。

不舒服，也无可挑剔。余晶磊只能叹口气，在车梯上点点嘉桦的翘翘鼻子：“你呀，你……”如此而已。

有嘉桦，就有笑声，她自己宣称：“我就是欢乐，我就是快乐之神。”一路上，她的笑话特别多，叫别人想打一会儿瞌睡都不可能。但你没法讨厌她，跟她在一起，你有什么怨气都发不出来。

如果说嘉桦的个性是“动如脱兔”，那么，谷樾就实实在在是“静若处子”了。

她的美，有一种天然的含蓄成分。永远像云雾飘拂的翠峰，忽掩忽露，忽远忽近，亲切而庄重。她的皮肤很好，白得如同整块羊脂玉雕出来的，细腻得看不出纹理。无论拍多大的特写镜头，都无须加用柔光镜来粉饰。一张典型的东方美人面孔，鸭蛋形，眉弓如月，睫毛如帘，那一双秋水般深邃明活的眼睛，使人在它们面前杂念冰释。

谷樾的发式并不时髦，甚至有点背时。她梳着两条齐肩的羊角辫，用青丝带扎在一起。裤子是浅灰隐条花呢的，是筒裤，显得她那两条本来修长的腿更修长。上身只穿了一件薄毛衣外套，老式样，没有高领。朴实无华的着装，却更显出了她那淡雅的美来。

谷樾一路很少说话，也不轻易笑。这未免使同行的人纳闷。这样一个文静的女孩子，同她在电影里饰演的“小辣椒”，实在是对不起号来。

汽车发出牛吼一样的哞哞，在爬一座大山。谷樾摇下车窗，伸出手去，浓雾简直就是细雨，湿漉漉的，沾在袖子上仿佛是一片茸毛。8点半钟了，山间的岚雾还不消散，以至于公路两旁的桉树、被伐薪人砍成奇形怪状的“挨刀树”，都看不清了。山谷间回荡着懒猴一声声的啼唤。

啊，旧地重游！有多少年没听过懒猴的叫声了啊！谷樾说不清自己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生疏？留恋？恐怖？还是梦绕情牵？

是梦绕情牵，这是她无法欺骗自己的。她在心底曾多次诅咒过那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她险些在那里丧命。那偷去他们食品的成群的懒猴，那冷不防会钻到被窝里的胳膊粗细的蛇，那叫人防不胜防的旱蚂蝗，那比蜜蜂还要大的长腿花斑蚊子……最可怕的要数那神奇的瘴气了。

啊，瘴气，比山洪、泥石流都要恐怖的瘴气。当地的傣族老

乡叫这种浊雾为瘴气，古代人称这里为“瘴疠之乡”，医生说这是恶性疟疾。

从山间汹涌滚来的瘴气，像洪水一样向低处山谷流动，多像眼前这场大雾啊！

记得她和知识青年同伴们在经历了一次瘴气的袭击险些丧命后，她的同学许营营曾提笔在竹棚壁上写了一首打油诗，最后两句，谷樾至今仍记得：隔山莫望慈母泪，此身愿埋瘴江边。

许营营说得好，对于画家和音乐家、旅游家来说，西双版纳的密林，是难得的圣地。威武的油棕林，粗壮得吓人的剑麻，坐上一个孩子不会沉的王莲，瑰丽的湖泊，开不败的山花，是永远不会枯竭的写生对象。可当年的知识青年们却不是观光者，也不是去攫取美的享受，他们将要在那四季酷热、空气的湿度达到能拧出水来地步的地方生活一辈子！风景的优美并不能代替一切，他们有的是被放逐到大洋孤岛上的感觉。

柳暗花明，他们毕竟从那闭塞而又美丽绝伦的地方走出来了，没有一个伙伴葬身在瘴江之畔。这不是值得庆幸的事吗？

可是，人的感情真是难以琢磨！

现在，谷樾却被一种浓重的乡思样的情愁包围着，就像眼前这厚重的雾！这也许是多年来对西双版纳怀恋的总爆发吧！谷樾1975年秋天，是同伴中第一个走出西双版纳的。当同伴们把她送到公共汽车可停可不停的“招呼站”时，谷樾折了一根被老乡称为“挨刀”的黑心树一根枝条，抽打着落在身上的红土，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说：“这个挨刀的鬼地方，我做梦也不想再回来了！”

这是真心话，她恨在这里度过的6个春秋！

是谁说过，爱和恨在同一深度。他真是名副其实的先哲啊！这句对人生高度概括的话，不是正好道出了后来谷樾对西双版纳的复杂情感吗？

此时，这女孩子望着满山遍野的凤凰花、叶子花，她不得不承认，她是留恋这里的，她无法从她 27 岁的年龄里，挖除那 6 年！是的，人生，也不过有 10 个 6 年而已！

叫不叫衣锦还乡呢？

她，如今是带着影坛新星的光环重蹈云南的。论年龄，她是这个文艺慰问团中最年轻的一个；论资历，她是慰问团中最浅的一个（她跃上银幕才不过 3 年时光）；然而，她无疑是这支队伍中的头排人物。无论在军区或省委的招待宴会上，她的名片必定摆在最尊贵的主宾桌上，她几乎总是被安排坐在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或别的最高贵的主人跟前。而从延安走过来的诗人、作家们，只能屈尊坐到由部长、处长们作陪的桌前。这使谷樾感到别扭，心底也有那么一丝隐约的自豪感。

那么，退回去 4 年，倘或她只是靠近缅甸边境勐勒小寨的农场橡胶工，会怎么样呢？她即或有非见省委书记不可的理由，那也许连省委书记的大门都摸不着。啊，万次闪光灯的闪光，景泰蓝奖杯的光芒，高脚杯里轻轻跳荡的琥珀般晶莹的葡萄酒……她的生活，她的一切，都是被层层奇异的光圈包围着的，她过的是万人垂涎、千夫仰视的生活！

然而，她怀念那叫她恨过的瘴疠之乡！不是在梦中，是天天咬着她心的现实！这种怀念，来得很强烈，愈是她出人头地，愈是她过得舒适，也愈是对酷热、潮湿的亚热带村寨怀念不已。去年她随同电影艺术家代表团出访英伦三岛，在雾都伦敦乘玛丽亚号游艇观览泰晤士河风光时，时值大雾迷漫，向导不无骄矜地说：“如果没有雾，就称不上伦敦了，雾是英格兰人的骄傲。”

当时，谷樾只是淡然一笑。她想，如果雾也称得起骄傲的话，祖国西双版纳的岚雾比伦敦的灰雾要美上十倍！不是吗？混合着煤气、硫磺和别的现代工业污染物的伦敦大雾，比起纯净得透明的西双版纳来，是不值一提的。

汽车好像加快了速度。噢，雾气开始消散，苍绿的山、深蓝的山、淡青的山，以着它们固有的透视比例，一层一层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汽车行驶在凹进石山中的S形公路上，眼前不时地闪过带惊叹号和不准超车、减速鸣号的标志牌。山崖底下，是一片飞松、滇柏的树梢露出来。只消向车窗右面望一眼那幽深的涧谷，都会使人眼晕、心悸。车上又活跃起来，人们先是惊叹这条马帮路改修的工程浩大，接着是赞美水墨画般的景色。后来“吉卜赛女郎”唱起了邓丽君唱的一首什么歌，毛毛雨之类。她学的真像，用的是半嗓，轻轻的，像在你耳边嚶嚶飞鸣的昆虫，更像推着摇篮在低哼浅唱。

一条碧绿的河！真绿，像是从染织厂染槽里流出来的一样。

勐勒寨橡胶林山脚下，不也有这么一条碧绿如染的河吗？当地傣语叫它卜少河，译成汉语，就是少女河的意思。多贴切啊，天真无邪，没有一点污染，透明地流来，再澄碧地流去……6个年头，谷樾在卜少河里融进了她多少幸福、欢乐和悲伤啊！

她忽然有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了。她把蒙在头上的纱巾扯下来，自己对自己说：“回去一次！慰问一结束，哪怕是步行，也要回勐勒寨一次！”

她这样下了决心，心里才觉得平静了一些。

她心目中的第一颗星星

芒街本是个小集镇，至多在每年三月三盛会时格外热闹些。但今日的芒街，和当年谷樾印象中大不一样了。镇边的集市场，伐倒了一片桉树林，如今盖起了二层楼的百货商店。镇子里多了好几家小工厂，人显得增加了几倍似的。特别是自卫反击战以来，一所军级的陆军野战医院移驻芒街，加上第二炮兵部队在附

近扎下大营，每天大批军队过境，潮水般涌来，竟使往昔冷冷清清的芒街大大改观了。

谷樾所在的文艺慰问团是傍晚时分到达的。跳下车来，谷樾看看表，有点不相信的样子，晃了晃表，问嘉桦：“喂，几点事了？”

嘉桦把腕子举得老高，使好多人都能看清她那最新款式的雷达表。她揶揄地说：“你那老8点趁早扔垃圾箱去算了！5点半。也不知你留着钱干什么？换块雷达坤表吧，绝棒！领导世界新潮流呢！”一边说一边格格直乐。

“才5点半？”谷樾说，“我的表也没错。”她不觉抬起头望望明亮瓦蓝的天空。

“噢”，嘉桦明白了，“是感觉欺骗了你！这里再往西走，8点钟都黑不了天呢。”

从部队院子里拥出一大堆人来，都是军人，高声叫着“欢迎、欢迎”，这些身上还残留着弹洞和硝烟味道的军人们，跑过来抢慰问团成员们手中的提包，和他们握手。当然，照例是谷樾和嘉桦受包围的时间最久，有几个小战士还拿出笔记本来请明星签名。

嘉桦被谷樾称为“好事之徒”，每逢这种场合，她都抑制不住地流露出十二分的热情，有求必应，这次还加送签了名的照片。鬼知道她来前冲洗了多少张照片，此时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沓来，像散扑克牌一样散给那些陌生的景仰者们。

客观上，她倒是救了谷樾，使谷樾很轻易地随上大流向招待所房间走去。

临时的房间打扫得很洁净，屋子里弥漫着来苏儿和石碳酸的混合气味，很好闻。两张帆布行军床上叠着方方整整的军用棉被，床前摆着盛好水的洗脸盆，毛巾一半搭在盆外面，只是蚊帐还没有吊好，扔在床上。

把小小的手提包丢到桌上，谷樾打算洗洗头，黄土公路上的灰尘叫她吃够了苦头。

直到谷樾用清水洗了第二遍头，嘉桦才提着她的大箱子笑嘻嘻地走进来，四下打量一下，说：“嗨，好像修道院，这么冷清、这么简陋！”

“闭上你的嘴巴，”谷樾用干毛巾来回搓着湿发，说：“你是来慰问的，不是来接受慰问的！”

“是啊，”嘉桦挤了挤眼睛，两手泡在水盆里，说：“你瞧，那些战士多可爱，傻呵呵的，小老虎一样。再激动一会儿，我差不多要嫁给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了。”

“又是你的博爱！”谷樾往脸上轻轻涂着味儿很淡的珍珠霜，打趣她说：“照你这么下去，你一天爱一个都轮不过来。”

嘉桦笑着，往脸上撩着水，说：“一个女人，被许许多多的男人爱着，那是一种幸福，起码，我不用到婚姻介绍所去登记，也不用摆出条件、价码，叫别人介绍，我不是商品！”

谷樾笑道：“不是商品？北京西单和东长安街上的广告画呢？还有理发馆、馄饨馆呢？”

嘉桦笑了：“又提这个干什么？”原来，嘉桦的形象被广告师临摹下去，有的手托一瓶香水，有的肩搭一块花布料，当了广告用。这些犹可，叫谷樾不能容忍的是成都的一家抄手（馄饨）馆，竟然把嘉桦的头像画在罗圈幌下的木头牌子上，下面吊着两绺红布条，大书特书：真正龙抄手，物美价廉，实惠可口。而画面上的嘉桦张着大嘴，正在吞吃馄饨，像一头饿狼。去年年底，谷樾在锦江畔薛涛井附近拍一部古装戏，她是在寻找厕所时发现这家馄饨馆的。她当时又气又笑，跑回拍摄景地，把嘉桦拉来看。她满以为嘉桦会大发雷霆的，至少要去找馄饨馆老板算账，勒令他把罗圈幌摘掉。

谁料嘉桦歪起头来端详一阵儿，摇摇头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不像，不像，这位画师，可能是从前画棺材头的画匠出身。走，咱品尝品尝他的抄手，是不是经济实惠，别瞎了我的招牌。”

当然，谷樾无论如何没有这个雅兴，一甩手走开。事后听嘉桦告诉她，老板一看见明星降临，脸都吓黄了，把她让到雅座，桌子少说抹了20遍，一再道歉、赔礼，生怕嘉桦恼了砸了他的店铺。谁知嘉桦只是说：“画的太差劲了。何不到美术学院请个高手来？”老板喜出望外，他连连打躬作揖，说：“是画的不好，明天就请人重画。我家祖传三鲜馅儿的龙抄手，冒了你的大名，从打起了营业执照，到如今才4个月，干赚了一千多元呢！托福、托福。”不用说，嘉桦美美地吃了一顿泡了红油的特制龙抄手，还为她加添了刘丸子、赖汤圆、夫妻肺片以及三合泥等成都著名小吃。

今天见谷樾用这件事来奚落她，嘉桦一边往毛巾上打肥皂，一边说：“别人景仰你总是一片好心，抄手馆为什么不挂江青的头像？太恶心的！天底下的人，各有各的崇拜法，印挂历、卖明星彩照、上刊物封面，你别看有些老头子噤鼻子瞪眼说：‘尽搞美人头，太不像话了。’可我敢打赌，他们也愿意看！”说到这儿，她扑哧一下笑出来：“你不信？《大众电影》如果封面全印什么老头子、老太婆，不要说发行一千万份，连一百也卖不出去。爱美，是人的一种天性。你还记得去年《瞩目》月刊的笑话吗？”

谷樾当然记得。那是在一次新年茶话会上，几位作家、导演半开玩笑地“攻击”《瞩目》的副主编说：“你们的两只眼睛尽往美人头上瞩目，一部电影拍出来，编剧、导演全被人们遗忘了，成了一堆灰烬，灰烬中惟一的火星便只是女演员了。”当时不知是这位副主编被攻得呆气大发，还是他真的意识到了每期封面用女明星照有点过分，反正他来了个改弦更张。两个月后，他接连出了3期不同凡响的封面，先后把几位导演、编剧的大幅照片赫然印出，不谓不漂亮，或秃顶、或满脸核桃皱纹，叫人目不忍

睹。他说《瞩望》刊物的印数一下子由 10 万份降到 6 万份，好多书亭要搭配着卖，卖一本《大众电影》，必须搭一本《瞩望》。

这件事，不去说叫不叫编剧、导演们伤心、恼火，反正嘉桦可是大为开心，逢人便讲。她以为这是违反了人们审美观念的常识。

谷樾苦笑了一下，说：“假如，你的父母没有给你一个漂亮的躯壳呢？”

嘉桦稀里哗啦地洗着她的长发，说：“那又当别论。那我会去当纺织女工，去卖菜、吆喝着卖油条、卖冰棍。既然有这点资本，就该充分利用它。你以为我是个狂热的傻瓜吗？我看不出各式各样的崇拜后头有各式各样的动机吗？”

谷樾想走开，这话题是她最讨厌的了，而一说起来，嘉桦却总是谈兴极浓。

见她要走，嘉桦叫住她：“哎，别走啊，你老实在这呆着，一会儿，有一位名人来拜访你。”一边说，一边侧过滴水的脸，冲谷樾神秘地一笑。

“又是记者？”谷樾问。

“你甭用这种酸腔好不好？”嘉桦说，“这几年，记者们帮你多大忙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别太轻狂了吧。告诉你，不是记者，是一位作家，很有名气的。你真走运，你知道，十个作家九个狂，都不大兜揽演员，好像他们是清教徒！”

“是哪一个？”谷樾沉吟着问，“我认识的作家有限。”

“你别心跳就行！”嘉桦抬起满是洗发膏泡沫的头，说：“樾！嘿，看他的文章，我原以为是个糟老头子，没想到，是个奶油小生，才三十来岁！”

“我并不认识樾。”谷樾说的是实话。不过，樾的小说，她倒是看过几篇，文风泼辣，泥土气息很浓。谷樾本来是不大看小说的，就因为樾的小说差不多都是以西双版纳风土人情为题

材的，使她感到亲切，常常唤起她心底的感情复苏，这是她对樯橹乃至樯橹作品偏爱的理由。

“他可认识你！”嘉桦眼里闪动着探究的、要窥破某种秘密的光，“什么叫认识？概念要弄清，单方面认识，能叫认识吗？他不是个影迷，我敢打赌！我从他的眼神里、语音里都判断得出。当我说你在这儿时，他那眼睛瞪得大极了，嘴也张开，半晌合不拢……你还要狡辩吗？”

“你说出天花来，我反正不认识他。”谷樾说罢，坐在床沿上，问嘉桦：“晚饭后去慰问伤员吗？”

嘉桦说：“听说是明天。今天晚上，少不了有一顿丰盛的洗尘酒。讨厌，又要没完没了地叫我们表演小品！”

真正讨厌这些场合的倒是谷樾。她用不着点破，她明白，嘉桦的讨厌是要打引号的。嘉桦恨不得一生一世都在狂热的捧场和热闹的酒宴中度过。

有人在敲门。

嘉桦正在拢头发，向谷樾挤挤眼，对门外说：“正在洗头，请您稍候片刻。”她说得拿腔拿调，一口京调，使地道的北京人都羡慕——其实她并不是北京人。她生活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使人看到“有戏”。谷樾正相反，即使站到拍摄现场镜头前面，也如同在日常生活中那样松弛。

敲门声被打断了，门外响起轻轻的踱步声。

“听，这是急不可待的脚步声！”嘉桦又冲谷樾挤了挤眼，这才坐到床沿上，那里是冷眼旁观的好角度。她礼貌又严肃地冲门外说：“哪一位呀？请进吧。”

应声走进一个30岁左右的人，高个头，略嫌清瘦，脸黑黑的，眼睛大而有神，但绝不是“奶油小生”。来人穿着一身半旧的、洗得很干净的深灰色涤卡中山装，脚上是一双军用解放鞋。门开着，最后一抹夕阳余晖从他背后铺过来，把他那颇长的影子

一直铺到谷樾站脚的窗前。

谷樾是逆光看他的，他脸部是暗调子，但却像一瞬间布上了主光、眼神光一样，驱走了他脸上所有的阴影，这张脸明显地令谷樾发出了无法控制的震颤。

这表情，当然一下子被嘉桦不失时机地捕捉到了。她看一眼谷樾，再扫一眼站在门口的来客，嫣然一笑，说：“请过来坐呀！不要太激动，又不是在镜头前面，你们的面部肌肉那么紧张干吗？来，我给你们泡一杯‘滇绿’，一级‘滇绿’，刚喝味儿似乎淡一点，喝上几口，回味却是绵长的。”

无论来客，还是谷樾，会听不出嘉桦话里话外的意思吗？谷樾的脸忽地红了。

“小樾，你认不出我了？”还是来客最先恢复了常态，落落大方地走过来，坐到方才嘉桦坐过的地方。

“怎么也想不到是你。”谷樾觉得眼睛和鼻子发酸，特别便当的眼泪就快流出来了。她暗暗埋怨自己，这又不是做戏，可不能掉泪。可是，眼泪还是流了出来，她赶紧背过身去。

“你还那么好哭？”来客轻轻一笑，说：“16岁的时候，好哭鼻子是不必难为情的，可你今年27岁了！”

“谁哭了？”谷樾笑着强辩。

这回可叫嘉桦抓住了把柄，她把泡好的两杯茶（其实就是两只印有部队番号的大搪瓷缸子，是草绿色的，与军衣、军被、军用水壶一样色泽），分别放到两个人面前，抱起双肩，退后两步，审视着两个人，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只差没有‘执手相看泪眼’了。我还有事，你们谈。”说罢，扭动着她那丰满而不失窈窕的腰肢走出门去，临关门时，还特意给了谷樾一个暗示的眼神，那意思只有谷樾懂得：等晚上熄了灯再来审你！

“原来你就是樾樾！”谷樾见嘉桦一走，心里坦然多了，“怪不得你笔下的西双版纳写得那么像呢！你干吗不用你的本名发表

小说？许营营不好吗？我若早知道你就是樯櫓，我上次在成都就去找你了，你不知道我在那拍了好几个月戏？我是从报纸的介绍，才知道樯櫓在四川工作，可惜对不上号。”

谷樾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这可是不多见的，她自己都意识到说得太多了，赶紧闭住嘴巴。

走南闯北的许营营早已没有拘束，他跷起一条腿来，打量着近在咫尺的谷樾说：“我知道你在成都拍过戏。报纸、电台、电视台天天吹，瞎子聋子也会知道的。可是，我觉得……我太忙，后来到渡口林区去了……”

谷樾敏感地听出来，许营营把本来要说的话缩回去了。所谓到渡口去不过是临时编出来的。他为什么吞吞吐吐？他为什么明知我在成都，却不去见她？谷樾觉得像有一根针扎到了心上，在剧痛、在出血，忽然之间，她觉得她和许营营之间陌生得很、遥远得很，像站在地球上企望浩渺的太空星球，模模糊糊。那么，从前那两千个朝朝暮暮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呢，怎么也显得那么遥远了？啊，许营营没有说的、不愿意说出口的，肯定是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们的距离太远了……”

泪水一下子涌满了她的眼眶。如果说许营营刚跨进屋门时她的泪水是兴奋的、感慨的，那现在的泪水却是委屈的、难过的了。她觉得，被自己视为亲人的同伴所曲解，是最大的苦痛了。

“他们几个的下落、近况，你都知道吗？”许营营似乎没有理会到谷樾的委屈，这样问了一句。

“我只知道郭秀川是最后一个离开西双版纳的，他入伍当兵去了。”谷樾说了这么一句，赶紧咬住嘴唇。她忽然意识到，许营营所以这样发问，是对她的一种变相责难，等于说她“小人得志”，忘了患难与共的朋友。方才的委屈一下子又被深深的内疚取代了。

能怪许营营吗？他有权利把话说得再苛刻些、再冷些。不

是吗？1975年，她谷樾是第一个被推荐上大学的人。她比谁都明白，论学业、论年龄、论出身，她都是同伴当中最处劣势的一个。是同伴们众口一词推举了她，鉴定书上几乎把他们羽翼下的小妹妹说成了完人，连她所学的植物专业，都是朋友们反复磋商了好几个晚上才定下来的。由于谷樾和尹兆强在西双版纳引种咖啡树的成功，她被称为“小米丘林”。尽管他们都诅咒流放式的生活，却又不约而同地要小妹妹学植物专业，用心不是极为明显吗？

殊不知，谷樾仅仅在大学学习8个月，就被导演选中去当演员了。她被明星的神秘生活所吸引，她为当时“样板团”的得意所感染，她连同朋友们商量都没来得及，就轻易地离开了伙伴们忍痛让给她的大学课堂。

从那以后，朋友们不再理她。她给他们写过信，除了许营营回过信，说她“除了相貌，并不具备演员天才”而外，别人几乎都没有妄加非议。可她感觉得到，朋友们是怪罪她的。

自己真的没有演员才华吗？可能是这样。有好几个导演说过她：“表演痕迹重”、“若不是人聪明，不过是个幌子……”奇怪，她又非常红！是天下共知的大明星！难道只因为自己有着一张充满魅力的脸盘儿吗？

想起来，叫谷樾自己都不能容忍的是许营营的三次约会、三次请柬。那时，许营营是朋友间惟一同她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桥梁。据许营营信中告诉她，谷樾每次写给许营营的信，许营营都用影印机影印三份，分别发给另外三个伙伴。后来，不知是不是由于许营营的斡旋，也许是老成持重的郭秀川的大度起了作用，反正大家无形中原谅了他们的小妹妹，于是连续三次邀请她回西双版纳去团聚。

如今，她真想大哭一场，把自己骂上一顿。她真后悔，为什么她不应邀到西双版纳去聚会呢？第一次接到许营营的邀请，她

正在摄影棚里日夜赶拍几场戏，即或她情愿去赴会，导演和电影厂厂长也不会同意，七八十人的摄制组，停拍一天的费用就要损失几千元，她能张这个口吗？那么，第二次呢？她正要出国，到英国、意大利去访问，还有吸引力极大的戛纳电影节，她也要去出席。当然，她可以提出不出国，有多少人望眼欲穿地等待出缺递补啊？她倘若说一声不去，那不知要乐坏多少人！然而，出国，对于谷樾来说，无疑像万花筒对孩子的吸引力，她舍不得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异国风光，抵消了西双版纳朋友们的拉力。她连思想斗争都不曾有过，她相信朋友们会百分之百地谅解她。第三次邀请，倒是正值谷樾拍戏的间隙，上一部片子已经双片送审，不需要再动机器补镜头了，下一部戏虽然导演又物色了她，然而那古装戏，光等待美术师、化妆师、道具师筹备的时间，就至少要3个月，她是有充裕时间的。

她曾经萌动过再返西双版纳的念头，她也确实想念那些在人生路上给予她帮助的真挚朋友。然而，她怕西双版纳毒热的太阳、凶恶的花斑蚊子，还有旱蚂蝗。谷樾那不亚于蛋清般柔嫩的皮肤，是影界公认的好皮肤，化妆师省力，镜头前不用加纱来掩饰皮肤的粗糙。要知道，拍戏期间脸上起个粉刺都是相当恼人的，导演会叫医生给你连续注射激素类药物消除它们。倘若去西双版纳晒黑了皮肤、晒脱了皮，再被各种蚊虫咬出些疙瘩，那实在有点得不偿失。

这一次，她是几经犹豫，才字斟句酌地给许营营写了一封信。她不敢说实话，又以拍戏为由婉言谢绝了。她知道，只有事业的理由，才可以获得朋友们的谅解。

不管是经意或不经意的欺骗，这在西双版纳朋友间是第一大忌，彼此有过约法的。今天想起来，谷樾能不脸红耳热吗？

许营营似乎没有注意到谷樾脸上的困窘，他手里转动着茶缸，说：“我是昨天赶到的，我可不是参加到作家慰问团行列

的……你，来得正好，我还以为他……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许营营的眼睛被一层透明的泪水蒙住了。

谷樾的心咕咚一沉，预感到了有什么不幸发生，她迷茫地忽闪着大而黑的眼睛，悄悄站起来，颤着声问：“是秀川大哥他……”后半句她咽住了，她多么希望这只是她职业性的敏感反应啊。

可是，许营营点了头，他说：“郭秀川受了重伤，我是陪他母亲来的，我的身份是家属……”

谷樾的脸刷地一下白了，眼前一阵阵金星乱窜。听许营营的口气，郭秀川的伤势肯定是相当危重的，也许……

谷樾镇定一下自己，拉住许营营的袖子，急急地说：“你还那么沉得住气！他在哪儿住院？走，咱们快去呀！”

许营营说：“正在手术，不让进，大约还得几个小时。他的两条腿都断了，治好了，也要成废人的……”

谷樾咕咚一下坐到床沿上，伏在许营营的肩膀上抽抽咽咽地哭起来。多好的大哥呀！在谷樾的成长历史上，郭秀川就如同一堵又高又厚的墙，替她遮着风、挡着雨。他被许营营称做一个泔水桶，酸的、臭的都能盛，不论谁不如意、不顺心，都可以在他面前发牢骚、发脾气，又总是这位憨厚的老大哥百般抚慰、开导他们。啊，西双版纳的6年，如果没有郭秀川这根支柱，她谷樾也许早就倒下去了！

郭秀川为什么要当兵去呢？他是个有内秀的人。在伙伴们当中，他是学问最大的一个，在他们自办的文化补习班里，郭秀川是公认的第一号讲师。他尽可以考大学，完全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也许，他当时那句话并不是玩笑！

记得，穿出潮湿的莽林，伙伴们把谷樾送到长途汽车站的“招呼站”时，谷樾问过他：“你将来打算干什么？”

“我也许去当兵，”郭秀川说，“我身上缺少一股刚劲。”

伙伴们无不大笑。谁都不相信他会去投军，他过春节听别人放爆竹，都吓得直闭眼睛呢。

但是，郭秀川说：“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垮掉的一代。看着吧，祖国，不是几个口号喊得最响者的祖国，有朝一日，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才见高低。”

郭秀川不正是用他的血来兑现他的诺言的吗？

人生的“第二悲剧”

手术大概很复杂，又不十分顺利。谷樾和许营营在临时野战医院手术室平房的窗外站了足有一个钟头。

窗帘拉着，只见人影在窗帘上来回闪动，听不见说话声，顺着手术室瓷砖墙壁流下来的去尘水声，哗哗作响，遮没了一切声音。

谷樾双手扶着窗框，木头人似的呆呆立着，说不清此时此地她是一种什么情感。她演过这么多部影片，扮演过各种复杂心理的人物，但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感情绝不是导演启发几句就可以了然的。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许营营悄悄碰了她一下，两个人默默穿过院中踩倒了的草丛，走出院门。

夕阳沉到山岳后面去了，西天还残留着一片好看的玫瑰色。

许营营默默走着，一直在看他那双脚的挪动，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瞥一眼晚霞，说：“古往今来，有多少诗人、作家，千百次地赞美朝霞，却很少有人咏叹落霞。”

谷樾侧过头来，望了他一眼，不甚了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呢？

许营营是这样解释的：“当然，朝霞是生机勃勃的，代表生

命；落霞却标志着沉没。可是，如果一个人，在他生命结束时，也能给人间留下一片明媚的霞光，那是多么不容易啊！”

谷樾懂了，此时此地，他这话的内涵，除了拿煊红明亮的晚霞比喻郭秀川，还能是什么呢？她相信，此前许营营一定是从军医口中得到了实底，也许，留给郭秀川的生命已经极其有限了。可她不敢问，生怕问得的实底太残酷。可怜郭秀川 68 岁的老母亲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儿子的腿上被子弹打了个洞，也许像儿时淘气时跌破了皮肉一样，她没在意，更不会把死亡同儿子联系起来。她给儿子带来了两篮子上海小吃，还有一根沉香木拐杖。方才谷樾去看老太太时，老太太还大把大把地抓糖给大伙吃。她还说：“这沉香拐，从前是川儿爷爷的，川儿他爹，没少挨棍子。后来棍子传到川儿他爹手里，也没少打川儿。不打不成人啊，川儿长这么大，没说过一句谎话。”

是的，郭秀川从来没说过谎，他也容不得别人说谎。那是 1974 年的事情了，知识青年当中传出一股风来，说是要保送一批人上大学。就在这时候，他们的同伴之一张冬冬告了假，到县城去了 3 天，他说肝部疼痛，一见油腻就想呕吐，打算到县里去验验肝功，做做超声波检查。张冬冬回来以后，只是说肝有点问题，但问题不大。那个 month，郭秀川一连托人到镇子里给张冬冬买了 4 斤白糖。那时，一个人每月只发三市两糖票，许营营、谷樾和同伴们都把自己的糖票塞给了张冬冬。半个月后，一个昆明知识青年从县城捎来一张字条，不巧落到了谷樾手中，那字条上只写了短短一行字：速来县城，“五七办”方面还需打点，招生表马上要下发。

谷樾把字条交给了郭秀川，朋友们都非常气愤。这字条戳穿了张冬冬化验肝功能的谎言，他是背着大家挖门子、找关系，为自己升大学在奔波。

那天，大家照常喝一碗稀稀的米线，吃着咸菜条，晚饭时谁

都不说话，好像都感到集体的荣誉受到了侮辱，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当然，如何裁决、发落张冬冬，那要看郭秀川了。

郭秀川待大家都放下碗筷，才温和地把字条递给张冬冬，说：“我们都希望你第一个走出森林，走到大学校门里去。有什么要我们出力的，尽管说。”

他竟然一句重话都没说出口。

但是张冬冬哭了，无地自容，他当大伙的面撕了那张字条，悔恨自己的自私。后来，他们之间没有一个走成的。到了1975年末，已经是谷樾升大学以后的事情了，农场指名叫郭秀川填表当工人，但郭秀川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揣起表格，上上下下四处奔走，到底促成了张冬冬取代自己，在昆明一家工厂当了工人。这事，直到农场开欢送会时，才露了底。那天夜里，张冬冬痛哭流涕地跪在郭秀川面前，无论如何不肯起来，死也不肯顶替郭秀川进工厂。郭秀川说：“我不喜欢当工人，我等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才会去呢。”

郭秀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五脏，仿佛能照人！

想到这里，谷樾问许营营：“你给冬冬拍电报了吗？”

许营营说：“我上路前同他打过招呼，他说随后就来。好像他们厂里有什么急事要处理一下。”

谷樾又问：“尹兆强呢？他离得太远了一点。”

尹兆强是最后一个离开西双版纳的，他是凭能力考取林业专科学校的。

“他已经毕业了，”许营营说，“不在南京。”

“他分到哪儿去了？研究所还是大学？”谷樾的猜测一点都不过分，尹兆强没升大学前，他研究的橡胶、茶叶、沙仁混种法，已经被西南植物研究所推广了，他肯定是学业的尖子。

许营营说：“他嘛，离我们很近，又回到勐勒去了，在热带植物研究所工作。”

谷樾惊愣地站住了，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犯了错误？”

许营营苦笑了一下：“按常人的观点，他的错误在于‘犯傻’，别人升大学，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现状，是为了永远脱离农村；他呢，傻到可以的地步了。”

谷樾明明知道，对尹兆强这种人格应该赞扬，可这只是理智的产物。而感情的因素，使她难过、可惜，替尹兆强抱屈。她觉得，几年之间，她同朋友们的距离越拉越远了……

对面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谷樾不用抬头，也听得出是嘉桦。果然，嘉桦拎着一大串香蕉迎过来。一套恶作剧式的红卫兵串联服早已脱去，换上了一套奇异的服饰。上衣是男式的，数不清有多少口袋，肩膀上扣着肩章似的布带，背后开气，领子又尖又长，衣服袖子只有大半截，而且类似清代官员的马蹄袖。她的衣领大大地敞开着，露出又白又长的脖子，带十字架的项链在脖子上悠悠荡荡。裤子却是运动员式的，紧紧箍在腿上，裤缝处有三条白杠。

谷樾情不自禁地皱眉头，我真不知嘉桦是怎么想的。这又不是在广州、上海，那是见怪不怪的地方。穿这样的衣服来慰问带着征尘刚刚撤下火线的英雄，她觉得太不搭调了。

她的话虽然没说出来，眼神却表达了这层意思。嘉桦一面把香蕉分给他们俩，一面嘻嘻哈哈地说：“想批我几句吗？我替你把潜台词说出来吧！有伤风化，在战士面前影响不好。可是，我要反问一句，战士是不是人？他们难道就只以为二尺半的军装是世界上惟一的美吗？我要让英雄们看看，生活是美的，他们用血和生命保卫着的祖国大地，有鲜花、有欢乐、有爱情，他们的战斗是有意义的。作家同志，我说的有错误吗？”

许营营没心思同嘉桦斗嘴闲扯，看了谷樾一眼，不置可否地笑笑。谷樾更没这份闲心，她想尽快甩掉这个打诨的角色。

谈何容易！精灵无比的嘉桦像年糕一样地黏住他们，她说：“你们不会讨厌我吧？假如有我在不方便，那我就走开。”

这一招真厉害。谷樾说：“你胡说些什么？”

许营营赶紧说：“我们是散散步，老同学多年没见面了。”

三个人不知不觉走到集镇中心了。好多人在围观什么。嘉桦说：“走，看看西洋景去。”许营营和谷樾却站在原地没动。

原来人们围观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和尚，他剃光了头，披一件红袈裟，一半膀子露在法衣外面，手里掐着一串上了颜色的楠木念珠，正自得其乐地吃香蕉，一边望着人们嘻嘻地傻笑。看神态，他还不明白什么叫僧俗之分，他也许还没受过缅寺老方丈的严格戒律，不明白一个和尚是不可以像常人一样走在街面上大吞大嚼的。

“喂，小和尚，会念经吗？”好事的嘉桦挤了过去，故意托起脖子上的耶稣受难十字架给小和尚看：“认识吗？这个耶稣可是你们释迦牟尼的死对头。”

好多人都笑了，小和尚摇晃着香蕉皮，鼓胀着腮帮子，也跟着傻乐。

“一品红！”突然一个小青年尖叫起来，“快看，她是一品红！”

轰的一声，人群里像扔了一颗手榴弹，人群散开，撒下小和尚，登时把嘉桦一下子围到了核心，指手画脚，评头品足：“没错，是她！”“她怎么比电影里年轻呢？”

原来，这里最近刚刚上演了一部描写地下党斗争生活的影片，嘉桦在影片里饰演了一个军统局女特务，外号“一品红”。

人层越来越厚，许营营有点替嘉桦难过，很想替她去解围。刚迈了两步，谷樾扯住他，她一边赶紧用纱巾包起头来，一边拉起许营营就走。她说：“你别多事。嘉桦最陶醉的就是这种场面，离了这个，她会感到空虚寂寞的。”

许营营有点不信，忍不住回头向人群里望望。可不是，嘉桦不但不感到尴尬，难堪，反而神采奕奕，不断地向人圈后头那些跷脚的人们打着飞吻。最可乐的是有一个傣族小姑娘不懂嘉桦这样礼节，大声问别人：“她干什么？好像要吃的？”这自然要引起一些影迷的嘲笑了。

哄闹声渐渐远去了，他们向一片攀枝花林子走去。天边的晚霞淡下去，淡得同深蓝色的天幕融成一体了。离远看，那一片几十丈高的攀枝花像是倚在天边上似的。

许营营问谷樾：“你也经常碰到这种围观场面吗？”

谷樾点点头：“有一次在上海南京路拍外景，一百多警察维持秩序都不行，交通全部堵塞，两个镜头折腾了6个小时。中国人哪！唉！”

“你对这种特殊的荣誉感到不舒服吗？当然，我相信大多数人围观是出于好心：对明星的崇敬，对拍电影的好奇……”

“我曾经适应过、振奋过、陶醉过。”谷樾声音低沉地说，“不过，那是从前了。不知为什么，现在我常常感到自己很可怜。真的，可怜极了。”

她的意思并没有说清楚，许营营却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伤感的暗影，他没有再问下去。

是的，谷樾有过影坛明星们相似的经历，被突然降临到头上的荣誉陶醉过。恐怕连国家主席也不会像电影明星那样出名吧？一部片子打响，明星就成了天下人争颂的对象。海报上、电影刊物上、各省电影公司的电影杂志上、报纸上、电台里、电视屏幕上、挂历上、广告牌上，到处有明星们的头像、声音、文章。谷樾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认出她来，恭敬的、好奇的、探询的，各式各样的眼光投向她。一颗年轻的心，如同插上了幸福的双翼，真的快从地球上飞翔起来了！

嘉桦是最懂得利用荣誉的人了。她曾经对谷樾说过：“你干

吗那么呆呀！别人对你笑，不能白让他笑，要从这笑里抓点什么；别人对你恭维，恭维本身是没价值的，可你利用了想恭维你的人，那就会有实惠。我们靠什么？一没有权，二没有钱，惟一可以利用的就是这张脸。”

谷樾不能否认，电影明星这张脸就是介绍信，就是软席车票，就是各种票证、通行证，换而言之，就是一切。

嘉桦是从来不放过一次机会的。买的是硬卧票，她会被客客气气地请到软卧包房去休息，至多给列车员们讲点“七仙女从天上飞下来是怎样用特技拍出来的”，不搭什么本钱。无论市场上出来什么畅销紧缺商品，嘉桦都能买到，用不着排队，她那张脸就是优待证；她有办法兑换外币券，使她能用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到别人买不到的高档商品；她能够自由进出外国人才进得去的外汇商店。

嘉桦从不隐瞒她的观点，她曾经对谷樾讲过她跨进文艺界的戏剧性情节，使人不知道应当赞美她对，还是唾弃她对。

谷樾不知道别的明星是怎样看待第一次崭露头角的。反正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形象固定在标准拷贝上时，她的心都醉了，以至于好几天吃不下饭去。第一次在《大众电影》封面上登她的生活照时，她被极度兴奋包围着，弄得她一天几次跑到售书亭和书摊那里，看这一期《大众电影》销售得快不快，注意观察别人用怎样的眼神看她的照片，用怎样的语言品评她的形象、仪态和风度。只要读者掏出钱来说“买一本”，她的心都要怦怦地猛跳一下，仿佛那一期《大众电影》就是她的一切！

糖是甜的，吃多了也许要得糖尿病；恭维是令人舒服的，恭维得过分也会走向反面。

近年来，谷樾已经有些腻烦、反感了。这变化，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着的呢？

谷樾到过各种人家，当然是包括为了熟悉角色去深入生活。

工人、农民、干部家庭，都有她的尊容写真的存在。她几乎像耶稣对基督教徒那样不可缺少。或是挂历，或是年画，或是电影海报，常常是家庭的装饰品。当然也有叫她不甚痛快的时候。譬如有一次她到一个市民家里，墙上糊着一张她的大幅彩照，不过实在看不下眼去，被烟火熏得黄糊糊的照片上，散布着一些苍蝇屎，又恰恰分布在脸颊和鼻梁两侧，宛如是个一脸雀斑的丑女人。下巴颏上一道道捻死臭虫的黑血道道、抹上的鼻涕污痕，就更叫人恶心了！

这算是谷樾第一次感受到人间对女明星的大不恭。

后来的一次打击，是在成都杜甫草堂拍外景，她去公共厕所解手，发现粪便中漂着一张有她剧照的纸页，看不出是什么省电影公司的宣传刊物，反正印有女明星彩照的纸页，已经被人惶恐之中用来当揩屁股纸了！她气得两顿没有吃饭。至于陆续发现有她形象的海报，被淘气的孩子摔上泥巴，画上两撇小胡子，更是常事了。

对这些，嘉桦坦然自若，她劝谷樾想开一点，认为这是“中国人缺少文化”的表现，不足为奇。

那么，发生在上海大光明影院门前的事，却叫她不能容忍了，她几乎想过去扇那几个流氓的嘴巴。

去年，谷樾主演的一个影片在大上海首轮上映，场场满座，一片喝彩声。谷樾买了一张票，想和观众们混到一起听听反映，既可以检验自己的表演艺术，又可以享受到演员本人才能享受到的快乐，大概这种享受，同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坐在火车上是一样滋味吧。

走到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谷樾被全国第一流的海报橱窗吸引了。影院美术师真有水平，他没有临摹电影厂发下来的影片海报，自行设计了一幅，是谷樾的全身画像，运用了明暗对比和轻度夸张的手法。谷樾真满意，她以为画师笔下的她，比自己本人

要增加三分光彩。

电影还没有开演，一群嗑着五香瓜子、吃着冰淇淋的青年人围在海报前议论纷纷。

其中一个人说：“嘿，谷樾的腿真够长的，跳天鹅湖差不多。”

另一个人说：“脸长得够漂亮了，你看那两酒窝，真逗人，若能挂上这小妞儿，玩上一天也不白活了！”

一阵淫邪浪气的笑声，简直像一根根带刺的鞭子抽打在谷樾的心上。她电影也没看，一口气跑回申江饭店下榻处，伏在床上哭了很久。

这是谷樾第一次感到，女明星有时并不那么伟大，也不永远是人们仰视的人物。在若干时候、若干人心目中，她不过是点缀品、玩物、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一文钱都不值！而可悲的是她自己居然把自己看成了牛顿、富兰克林！

恶意的诽谤是可憎的，并无恶意的谣传又怎样来评价呢？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对她的传闻不胫而走，添枝加叶，比真的还真！传说她当了某某名人的情妇；传说她准备嫁给香港一个阔老，只拍最后一部影片告别影坛；传说她因失恋而自杀……今年一月份，她从外地刚回到家里，晚上 10 点钟，她已经洗过淋浴要休息了，爸爸的一个老朋友叩门来访。他是爸爸大学时的同学，在一家无线电厂当副总工程师，一天忙得两耳不闻窗外事，绝不是电影迷。那天，他一拉开谷家门，就用十分沉重的语气对谷樾的爸爸说：“唉，我知道得太迟了，真想不到啊，会出这种事……”

爸爸莫名其妙，望着老朋友一脸沮丧神气，问他：“出什么事了？”

老朋友说：“唉，我早说过，还是不当明星的好。孩子聪明，放着大学不念，何苦呢？我看过西洋小说，好多明星都因为失恋

走了这条绝路，太可惜了……”

谷樾在里间听得分明，她一下子明白了，这位老伯是听到了关于谷樾失恋自杀的谣传，专程从实验室里跑出来吊唁的！

真叫人哭笑不得，荒唐啊荒唐！

谷樾一个箭步蹿出来，故意纵声大笑，倒把老伯吓了一跳。

难怪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副总工程师都信以为真，三人成虎，告诉他消息的人，说电影厂连追悼会都开过了，还能假吗？

谷樾曾经听一位著名编剧告诫过她：“出多大名，就有多大的风险。”她当时听了如山风过耳，没往心里去，也没能真正理解。不久前在成都锦江畔拍片的一次事件，几乎使谷樾想从此放弃电影生涯了。

大夏天，围观的人还是那么多，有如蚁附膻！九眼桥附近万人空巷，高高低低的遮阳伞像是平地钻出一片蘑菇。市公安局出动了几百名警察维持秩序，仍然阻止不了向机器前涌动的人流，有好几次险些把摄影师连同移动道上的摄影机一起挤到江里去。无奈，导演只得宣告收摊，停拍。就在谷樾拿软纸蘸着凡士林油一边卸脸上的妆，一边往汽车跟前走时，突然有一个青年冲出警察的警戒线，猛地冲向谷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抱住她，接连在谷樾的脸腮上吻了几下。

警察呆了，观众愣了，连谷樾一时也没反应过来，木雕泥塑一般任他轻薄了。等谷樾尖叫一声，人们爆起轰雷一般笑声时，警察也明白过来，一拥而上。

那个轻薄青年根本没有逃走的意思，傻呵呵地笑着，僵立在汽车旁。电影厂的摄影助理、照明工、机械员一齐跳下车来，一顿拳打脚踢，把那个青年打得鼻青脸肿，七窍出血。

不用说，这青年被牢牢地锁上手铐带走了。审过几次不得而知，反正5天以后，导演和谷樾本人被请到公安局看守所去。那时谷樾的两只眼睛还肿着，她哭了好几天，怎么劝都不行，已经

停止拍戏 5 整天了。按导演的意思，恨不能枪毙那个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演员的小流氓才解气，他带着谷樾来看看守所，是来听结果的。

在看守所里，那个青年双手戴着手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见谷樾进来，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悔罪，两眼发直地盯着谷樾。于是导演斥责他、骂他，小青年始终是那一句话：“枪毙我吧，枪毙我吧……”

奇怪的是，当犯人被带出去后，公安局的同志反倒征求起谷樾的处理意见来了。据公安局的同志介绍，这青年是一个学徒工，电影迷，一心想当电影演员。自己拿路费先后五次到过北京、长春、上海、广州几家电影厂，希求把他留下，甚至让他在电影厂打扫厕所也行。可想而知，除非电影厂的人事处长是癩病患者，否则就不可能收留他。这青年有全国青年男女明星的照片，不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而是小摊上卖的那种翻拍照片，8 英寸大小，厚厚的一沓，装在一个扑克盒里，每天工间休息时都拿出来摆弄一阵，同伴们都拿他取笑。

5 天前，正值公休日，他和十几个同伴一起，骑着自行车到九眼桥去看拍电影。他把自行车支在人圈外，站在车货架子上，给同伴们当义务解说。他不但说得出哪个演员是谁，从哪儿借来的，而且能认出打板的是场记，拿软纸给演员脸上沾汗水的是化妆师，拿皮尺、量光表的是摄影助理，真是电影通。就在这时，一个同伴打趣他：“你甭跟我们吹！你干吗不挤上去和他们打打招呼，握握手？”又有一个人恶作剧地激他：“你不是最崇拜谷樾吗？你若是男子汉，跑过去亲她一口！”同伴们大笑。没料想他说了一句：“你以为我不敢吗？真能那样，死也心甘。”大家显然以为他说疯话，就说：“你若敢，我们几个这个月的奖金全给你！”这只是无聊的说笑而已，谁也不会相信这个电影迷会迷了心窍，干出不能想像的事。

然而，他真的冲过警察的防线冲过去了！

他是个流氓吗？他所在的厂子、车间、班组，除了说他是电影迷以外（假如这算是缺点的话），再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劣迹。大家都对他的行为不解，保卫科长甚至说他“着魔了”！

听了公安局同志的调查结论，谷樾是哭着跑出看守所的，关门时她进着哭声说了一句：“放了他吧……”

这种态度，是导演和公安局一些人不能理解的，或者怀疑她这是盛怒下的反话。其实，谷樾说的是真话。她感到生活捉弄了她，也捉弄着那个犯罪的小青年，他（她）们在生活巨人的手掌上，不过是被随意捏圆、搓扁的小泥块而已。她恨他，却又不愿意一个崇拜自己造成精神变态的人为了崇拜而被关押。

应当说，直到此时，她谷樾仍然被崇拜者造成的迷雾托在云雾间，只是有时感到两脚悬空，离地面太远罢了。

近一个时期以来，谷樾有点反常。她变得像大家闺秀那样很少出门了，不多说话，不轻易见人，尤其是坚决不见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拒绝任何人写她的通讯、报道，更不要说人为地矫饰一番去拍什么演员生活照了。她有时真想急流勇退，像日本红极一时的影坛明星山口百惠那样，戛然而止地终止从事电影艺术的生涯，回到人群中来，当一个没有苦恼的普通人。

然而，她像一片鹅毛，借风力飘上云端很容易的，由于它本身的力量太小，分量太轻，若想再落下尘埃，再力求落得准确些，却并不容易，弄不好，也许就落在世上最不干净的地方。人间毕竟不是到处都是芳草、鲜花。

况且，几年来已经适应了、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一旦让它骤变，在谷樾的心理上，无疑是一次决裂性的变革，她会不会因此而寂寞得发疯？她见得多了，一些芳年已逝的旧日明星，还都不甘寂寞呢！为了争演主角，为了表示自己艺术的魅力犹在，不惜一次花费三五个钟头的化妆时间，粘乳胶、织头套、拉平皱

纹，以那令人发笑的臃肿形象再现银幕……她谷樾不是被艺术和年龄淘汰了的演员，她正是处在向“影坛皇后”进军的路上，她正享受着众星捧月、有口皆碑的隆遇，忽然地来个丢盔弃甲，来个艺术的自戕，这实在是太难了！世界球王在他不得不退出战阵，借以保持一生不败纪录的最后一次表演赛的时候，他不是踢球，而是抱起足球，跪在中线上遥拜八方观众，满面泪痕……老将尚且如此，她，怎么能轻易退出那闪烁着奇异光芒的艺术殿堂？

谷樾这所有的复杂心理，当然不是三五句话就能表白得清楚的，她觉得许营营也未必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所以才说出自己“可怜”那样模棱两可的话来。

路上不时地有行人驻足，侧目盯视谷樾，窃窃私语而去。看那神情，一定是透过她那面纱，恍惚认出了她这最红的明星。每当这时候，谷樾总是扭过头去，把纱巾包得更紧些。

忽然，许营营也感受到了谷樾所说的“可怜”。他深情地望着她一眼，说：“小樾，我现在多少懂得你方才话里的意思了。”

“是吗？”谷樾多少有点反感。她觉得许营营脸上露出的自信令人很不舒服。不要说一别几年的许营营，就是朝夕相处的同行们，乃至她的父母，都无法摸清她的脉搏，在她无缘无故地烦恼时，大家总是劝她：“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许营营具有作家惊人的观察能力，他立刻品出了谷樾两个字反问后头的反感味道。他不介意地笑了笑，说：“英国戏剧家肖伯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是两个悲剧，一个是达到心愿，另一个是不能达到。”

这话是很含蓄的，本来肖伯纳的话也够耐人寻味的了。可是却打中了谷樾的心。她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下意识地扯下了裹在脸上的纱巾，露出她那略显苍白的脸颊，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直视着许营营，半晌才说：“你再重复一遍，我怎么从来不知

道有这样的格言？”

许营营轻轻挽起谷樾的胳膊，用更加缓慢、更加深沉的语调，把肖伯纳的话又复诵了一遍。然后，他说：“天上有数不清的星星，有的星星很亮、很大，但它是借着太阳的反光来炫耀自己的；有的星星在银河系里似有若无，需要天文学家用高倍天体望远镜去寻找它们，它们又黯淡，又渺小，可它们却可能是自身在发光、自身具备能源。”

谷樾没有从许营营的肘弯里把胳膊抽出来，他们已经走到芒街村外了，背后的灯火远去了，没有行人。她觉得有点难为情，但又觉得凡夫俗子眼中认为男女拉手便是在恋爱，未免庸俗，她是把许营营视为兄长的。何况，从前在西双版纳的岁月中，许营营还背她涉过涧水呢！

天渐渐暗了，白纱幕一般的水雾又从田野升起来，罩住远处的群山、小河、缅寺和山林，留在眼前的只是长着利刺的粗壮得惊人的剑麻，和藏在剑麻丛中的荆棘小路。

谷樾在静静地听着许营营的话，他永远是喜欢讲点哲理性语言的。从前的许营营常常带点卖弄性地在伙伴们面前贩卖，被张冬冬斥为“哗众取宠”。但现在，从作家檣橹口中道出来的话，却不能不引起谷樾的注意了，他没有必要在她面前取悦。

然而，许营营却不说了。他站在一处水塘面前，听着一种弹拨琴弦般的动静，问：“还记得，这是什么声音吗？”

谷樾不会那么健忘，这是蛙鸣。西双版纳有一种比牛蛙还要大得多的青蛙，因为它们鼓鸣的声音像弹拨琴弦，当地人称它为琴蛙。据说四川峨眉山的清音阁也有。

谷樾点点头，仰起脸来，说：“你要说的不是这个吧？”

许营营淡淡地一笑，说：“你别生气就行。我看你很苦恼，一个名人的苦恼。一个人，总不能一生一世在浮云上头，在捧场中过日子，何况有些捧场本来就是十分肮脏的。你说你自己可怜

极了，但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你离凡人太远了，又离庸俗和无聊太近了。”

许营营说过，轻轻抽出挽着她的胳膊，看着她的脸，仿佛在等待她作出什么不平凡的反应。

谷樾的全身似乎机械地颤栗了一下，慢慢地垂下头去，望着倒映在水里的倒影。

许营营的话，好像无情的气锤，一下子把她心间浮游的铅块锤结到一起去了，沉甸甸地压到心房里。本来自己都没理清楚的东西，却叫他轻而易举地理清了。“离凡人太远了”，何其形象！难道自己的乐趣和苦闷不是由此而来？“离庸俗和无聊太近了”，何等一针见血！难道自己的徘徊、犹豫不正是由此而生？

怎么办？求他帮自己一把吗？不，不能。新生活可能是清新的、诱人的，但未必不是像眼前的路一样，荆棘丛生，剑麻拦路，人毕竟各有各的苦衷啊！

她始终没有抬起头来，她不愿让许营营看见自己的泪水，更怕让他看透自己的内心。

芒街营房传来了一阵清亮的军号声。

两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回头望望掩在大雾中的几星灯火。

突然，谷樾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搂住了许营营的腰，眼睛里闪出恐怖神色，望着剑麻地后面的山坡。

许营营也看见了，二十几个战士，抬着几副担架，正走向一片墓地。

坟土未干，青草未合的一排排坟墓，一块块青石碑……这是牺牲在国境线外的人们，他们倒下去了，还像生前参加分列式一样，纵横有序地排列在那里，静悄悄地……他们生前有过追求，有过向往，也一定有过苦恼，可他们在战场上，一定是什么都忘却了的！

“我们……回去吧。”谷樾怕冷似的，打了一个哆嗦，说：“郭秀川……的手术，该差不多了吧？”

许营营只低沉地“嗯”了一声，挽着谷樾，循原路往回走。走了十几步，许营营说：“生和死，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很小很小的，然而，有价值的死和无聊的苟活，它们之间却隔着汪洋大海……”

谷樾不知道他为什么又冒出这么一句来，是在赞叹那些倒在英雄树下的壮士呢，还是另有所指呢？或是在为一种谷樾很难承受的打击作铺垫？

谷樾越发感到冷，抖得不行了……

四万八千字的情书

谷樾很晚才回到下榻处。

“吉卜赛女郎”嘉桦早就回来了，换了一套纱质的睡衣，长长的头发蓬松地披散在肩上，在狭小的房间里水上漂似的轻盈地走来走去，嘴里唱着“你在云里，你在梦里，你在我爱情的漩涡里……”她正在往被头和枕巾上洒香水。

谷樾掩上房门，抽了抽鼻子，没出声。

嘉桦收起香水瓶，指指谷樾床上那床土黄色又薄又小的军用被子，问道：“洒不洒点？谁知道有多少大兵盖过它？汗味都呛鼻子！”

但谷樾分明看出，这些军用被子都是新浆洗过的，就说：“你呀，总是这么讲究！也得分场合呀！”

嘉桦调皮地闪动着黑里透蓝的眼珠，说：“你错了！即使现在马上调我上前线，我中了枪弹，倒在草地上，咽气之前，我也要好好梳梳头，洒上点香水，再望一眼蓝天，然后……”

谷樾脱去鞋袜，打算洗脚。她说：“别罗曼蒂克了！你那是

在拍电影时才会有的浪漫。方才，我看见新下来的一批伤员，浑身的衣服都扯成了碎布条，污泥、布条、血，全都沾到一起，苍蝇围着担架嗡嗡地飞……去你的吧，哼，洒香水！”

嘉桦格格格地大笑起来。

谷樾洗过脚，晾干，身子一缩，钻进被窝，放下蚊帐，伸手闭了 15 瓦的电灯，说：“快睡吧，明天上午要开慰问会了，你还不累？”

嘉桦只得蹭到床上，放下蚊帐，却没有躺下，盘腿坐在床上，将头伸出来，双手捏着脖子下的帐纱，说：“我不信你能睡得着，大长的夜，聊聊天嘛！”

谷樾躺在蚊帐里没出声，她双手枕在脑后，望着漆黑的帐子顶。刚熄灯的时候屋子显得很黑，过了一会儿，屋子又逐渐亮起来，以至于可以影影绰绰地看清嘉桦夹在帐子外头那漂亮的头。原来，外面的月亮正圆，如水的月光透过窗下疏朗的木瓜树丛射进来，屋地像铺了一层霜。

谷樾轻声地叹了一口气。

“别叹气呀！”嘉桦扑哧一笑，“我现在开始对你进行审问！你可以答辩，但必须说老实话。你起誓吧……”

“你又来了！”谷樾真拿她没办法。嘉桦不止一次地玩儿过这种把戏，她自称这是“心理法庭”仲裁。谷樾知道她又要拿许营营作文章，她这根神经向来是高度敏感的。

谷樾躺着不动，不理睬她。

嘉桦说：“好，现在开始。你现在心事重重，是不是？”

谷樾不回答。

嘉桦继续她的“审问”：“你的心事，是由那位作家引起的，是不是？我说他是奶油小生，不过是逗着玩的，他长得又黑又瘦，脸上至少有 5 个以上粉刺，有点粗犷，够不上奶油小生。但，我看他是男子汉，有男子气，中国的导演都是病态狂！一选

男演员就选小白脸子，女里女气。你看美国西部片的演员，一身野气，那才叫男人，你看日本的高仓健……”

谷樾还是不答一言，由着她去唠叨。倘若你接上她的话碴儿，那就不得了，说不定能扯到天亮。

嘉桦突然问：“你从前就认识樾樾，对不对？”

樾樾？啊，这是许营营的笔名。谷樾觉得“樾樾”这两个字十分陌生。这一次她认真回答了：“我们是一起下去的知识青年。”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嘉桦兴味颇浓地说，“你们不但认识，而且很熟；不但很熟，而且有旧！”

谷樾终于忍不住，头从蚊帐里钻出来，矢口否认说：“你瞎说什么，根本没的事！”

嘉桦在脸上拍死一个蚊子，继续说：“你骗不了我！你们没旧情，干吗这么激动？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又忽略了，我是研究恋爱心理学的专家，如果有这么一个学科，我能轻而易举地拿到博士学位证书！”

谷樾叫她逗乐了。谷樾得承认，嘉桦是坦率的，坦率到把不能向别人公开的事情都公开出来的地步。特别是在谷樾面前，什么隐私都讲。譬如嘉桦看中了什么男人，想用什么方法去大胆进攻，她会把策略、手段、步骤和盘托出。她自诩在恋爱场上，是“全能进攻型选手”。这也许是嘉桦的优点，她不是在灵魂外面包一层甲盾的伪人。

今天，谷樾同许营营的重逢，嘉桦是不是又想到别处去了呢？肯定是。谷樾觉得没有必要向嘉桦说谎，就老老实实地说：“说真话，我们从前相处得很好。不单是许营营，还有几个呢。那时我很小，还不懂得什么，我觉得他们对我是有过……的。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以后我才知道，他们当中，还有过‘约法三章’。”

“有意思！”嘉桦说，“任何约法，任何权威的法典，惟独不能约束爱情。我看你又在骗人，也在骗自己。过去的事又怎么了？重温旧梦不是更有味儿吗？这几年你挑来挑去，什么人都不合你的口味了，你不能用英雄和伟人的标准来选择丈夫。我就不这样，今天合得来，就在一起；明天合不来，各走各的。没有什么负担。我也不相信山盟海誓，我也不必受这东西的约束。依我看，你嫁给作家，倒也不辱没你了。”

谷樾调整一下姿势，使伸出到帐外的头更舒适些。她说：“你别瞎说了。女人和男人，除了爱情就没有别的友谊了吗？”

“爱是第一的，”嘉桦打诨道，“若不，咱们的导演李忌为什么总是强调‘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

一提到李忌，谷樾又不便做声了。李忌是谷樾未来要拍的这部戏的导演，高个子，粗犷的脸膛，是一个大军区文工团的导演出身，他跻身电影界才三四年的历史，迄今为止，工作证上的职别栏仍是“场记”。按说他是没资格独立拍片导戏的。电影界都传说李忌的背后有一根镀了金的桩子，所以才能得天独厚，从前年起就单独上戏了。其实，在谷樾看来，这种舆论未免失于公平。李忌实在是个才子，他染指电影时间虽短，却比好多在影界泡了二十几年的导演要灵透。他分出的镜头本，艺术副厂长用挑剔的眼光去研究，都找不出外行的纰漏；他拍回来的外景样片，无论从镜头运用、场面调度、演员戏的处理，还是布光、画面处理，都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有新意，不拘泥。也正因为他有才，他初出茅庐的处女作《山外青山》就一炮打响了，轰动了影坛。从此，再没有人议论李忌背后的台柱子了。

嘉桦一提到李忌，谷樾所以不愿出声，是因为她同李忌有一点微妙的关系。李忌今年40岁，比谷樾大13岁，李忌疯狂地爱上了谷樾。可能任何人都是闻所未闻的吧？几个月前李忌在湖北外景地采景时给谷樾投寄了一封挂号信，沉甸甸的一厚沓。好多

人都以为这是导演寄出来的文学剧本或导演台本，为了选演员，预先给演员寄本子叫他（她）们熟悉一下，这是很普通的事。结果，这挂号包裹被剧团的人打开，翻开一看，所有的人都吐出了舌头！原来这是一封超长情书！足足写了两本稿纸，每页240字，两本就是4.8万字！

这种新闻传播的速度，往往是可以声速甚至光速来计算的。不到几天工夫，电影厂里已经沸沸扬扬，把谷樾弄得十分狼狈。不久以后，当李忌从湖北采景归来时，谷樾倒是把那封长得惊人、热得烫人的情书退还给了这位导演。她声称，自己根本没有看。

谷樾这是在说谎。她不单自己看了，还拿给“吉卜赛女郎”过过目。两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连看了好几个晚上。嘉桦也像今天这样，头伸在蚊帐外，如同念一个激动人心的电影文学剧本那样，有声有色，念得谷樾的脸一阵白、一阵红，身子一阵发冷、一阵发热，羞赧、激动、恼恨、沾沾自喜……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滋味左右着她。

信是退回去了，那令人难以忘怀的热情，也退得回去吗？

说真心话，谷樾同意嘉桦的观点：“李忌倒是个值得爱的人。”但谷樾没有同意嘉桦的结论：“如果你真的爱他，就大胆地去表示！爱是自私的！古人说，金钱、衣服都可以与朋友共有，却从来没有说过妻子可以与朋友共有！李忌爱过他的妻子也好，从来没爱过也好，你都不必去管它，关键是只要他的妻子横在你们当中，妨碍了你们的爱，那就踢开她，把李忌从她手中夺过来。在爱情和婚姻上，道德标准也只能是从一己利益出发的！”

谷樾一个时期以来，耳濡目染，在恋爱方面，已经被父母指责为“解放派”了，她也是抓住经典大师那句“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话为根据的人。然而，她只属于停留在理论探讨范围内的书生派，绝不想去实行。她害怕嘉桦那种赤裸裸的利己主

义观点。谷樾所以根本没有考虑李忌的求爱，主要原因是他有老婆，他妻子原是同李忌在一个部队文工团的，一直留在部队里，没脱军装。

但是，感情有时真是难以驾驭的！理智告诉谷樾不能向李忌投去哪怕是一瞥带有感情色彩的眼神，但感情这个莽撞的东西，却又鬼使神差地一再使她步入歧路！就拿这次上戏来说吧，谷樾并不喜欢她将要扮演的那个角色，她对那种拿腔捏调的大家闺秀既不熟悉、又反感，她完全有理由谢绝李忌的厚意，叫他另觅别人。嘉桦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是带点泼辣气息的“吉卜赛女郎”，可她早已十分热衷那个主角。她是不论气质或其他因素的人，只要角色主要，哪怕多一个镜头，她都垂涎。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谷樾竟违心地答应了李忌，同意饰演这个她并不喜欢的角色，跟着李忌到洪湖地区去体验生活了。

这举动，在嘉桦看来，就意味着谷樾对李忌的默许和靠拢。李忌当然也一定是喜出望外的。不过李忌并没有什么格外高兴的表现，谷樾只能从他的眼神、一些在她面前反常的举动看得出他的得意。

这一次，他们又一起来到了镇南边陲。一路上，李忌很少说话，大导演的派头也比从前有所收敛，他除了有些公事同制片主任余晶磊一起交谈几句而外，一直反常地沉默着，显得心事重重。

既然嘉桦又提到了李忌，谷樾不好装傻，就说：“你别瞎说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答应演他拍的戏？”嘉桦说，“这不是欲盖弥彰吗？”

是呀，谷樾怎么也说不圆。

“你是爱他的！”嘉桦说，“我若是你，就用正面进攻对付李忌的进攻！老实说，如果没有你，我早发起攻势了。”

谷樾只把嘉桦的话当成玩笑。她经常开这种玩笑。谷樾说：“一会儿要我嫁李忌，一会儿又让我和许营营好，你呀……你不是立志抱独身主义吗？”

嘉桦说：“没错。可是独身主义不等于僧侣主义。”

“你这又是什么怪论？”谷樾确实不理解她。嘉桦同好多人保持着看来像是恋爱的关系，可又谁也不想嫁。

嘉桦说：“这有什么难懂的？我40岁以前是绝不结婚的。结婚，就意味着爱情的死亡，结婚那天起，就把爱情葬入坟墓了。于是忙于柴米油盐酱醋茶，洗尿布片，哄孩子，为钱不够花而争吵，双方互相警戒、盯梢，惟恐有外心……这还有什么爱情可言？我考察过好多家庭，双方恋爱时莫不是你亲我爱、山盟海誓的，一结了婚，那一切都成了泡影。”

谷樾说：“我不信你能逃脱这个规律！”

“那你看着好了，”嘉桦大概坐累了，把头缩回蚊帐躺下去，“我想同谁好，就同谁好；合不来，就散、就吹，法律管不着。没有子女、没有家庭，永远是一身轻松。没有负担，一生都是快乐的。”

谷樾说：“这太不负责任了。”

“什么叫责任？”嘉桦的头又从蚊帐里探出来，“对我自己的感情、利益负责，就是我的责任。起码，我用不着像有些人那样，为离婚时分配子女而争吵，为分配家产而惊动法庭。我不给社会造成半点麻烦，有什么不好？”

谷樾说：“你这不是什么新发明。当代美国就有好多青年在走这条路。可是，中国会走到这一步？我不相信。法律约束不了你，还有道德的约束呢。何况，你总有老了那一天，无子无女，你会孤独死的。”

嘉桦说：“我有前提。40岁以前我行我素，尽量玩好。40岁以后，找一个我不讨厌的男人作伴，了此残生，就行了。”

谷樾此时才明白，有些人一再宣扬独身主义的真谛。她不赞成，也不认为能行得通，但要她从理论上把这些论调驳倒，她又没有这个本事。

这时，嘉桦神秘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有关李忌的，也许是你的福音！”

谷樾的心怦怦一阵跳，故意平静地说：“我听着呢。”

嘉桦说：“你大概注意到了吧？李忌这几天情绪不高，他心神不定，你知道为什么吗？”

谷樾摇了摇头。

嘉桦说：“他老婆就在昆明军区文工团。这以前，李忌多次给他老婆写信，要求离婚，她老婆始终不吐口。这次，李忌一定会当面提出离婚，也许一下子就能办利索。”

谷樾问：“你怎么知道？”

嘉桦说：“昨天在昆明时，我听见余晶磊问过他，他说希望主任支持他一下，他同妻子的感情实在合不来。”

谷樾说：“你真是包打听。”

“那分什么事情。”嘉桦得意地一笑，“只要我感兴趣的事，我就会探得到绝密消息。这回你该放心了吧？他只要离婚，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嫁给他了。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把别人有没有家庭看得那么重要？你爱的不是李忌这个人吗？只要你真的爱他，他在监狱里要爱，在天堂里也爱，有妻室也挡不住爱，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你又胡说。”谷樾的心又乱起来。

“可是，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来，”嘉桦说，“那位作家是不是又牵动你的心了？”

“我们只是朋友关系。”谷樾把头缩回帐子，懒懒地说：“别说没用的了，睡吧，时间不早了。”

嘉桦也只好缩回头，头一挨枕头，立刻响起了轻轻的、匀称

的鼾声。

熄灯就寝的军号声划破夜空传来，小小的芒街渐渐进入了夜寂。但这毕竟是离刚刚停火不久的国境线很近的小寨，安静中还残留着战争气氛，探照灯不时地仰起、落下，在窗户上留下光柱，远处还有冷落的枪声……

奇特的爱情约法三章

整整6个小时的手术！太长了！

郭秀川在手术台上是清醒着的呢，还是像死人一样地僵卧着？是嘴上扣着乙醚罩呢，还是从脊椎里注射进去全麻的药物？

讨厌，干吗想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郭秀川的伤势会怎么样？残废？太可怕了。从今往后，摇着一架摇椅双轮车……他会伤心吗？他是个很有毅力的人，他也许会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坚强地活下去，他是最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了。干吗一定是残废？医学不是常常创造奇迹吗？断臂再植手术成功了多少例呀！对待这些为祖国流血负伤的人，理所当然地要起用第一流的外科医生，使用第一流的技术。想到这里，谷樾又乐观起来了。

可是，明明手术做完了，那个刚刚摘去口罩的大个子军医，为什么一口回绝他们，说“绝对不能见”呢？是手术不顺利？还是……啊，也许手术过后，郭秀川还没从休克状态中醒过来吧！反正护士长答应了，明天下午是可以去探望的。

那就等明天下午吧，现在该睡觉了……

谷樾使用孩提时代的老办法，默默地数着数，想尽快进入梦乡，可是不行。每次都是数不上几十个数，便被突然钻出来的思绪打断了。

她索性睁开了眼睛。

定格！怎么眼前老是出现人物的定格呢？啊，憨厚老成的郭秀川，才华横溢的许营营，聪明伶俐的张冬冬，还有脾气暴躁的尹兆强！

这四个人啊，是构成谷樾生活路程不能忘怀的一部分！这么说毫不过分。没有这四个人，也许没有谷樾的今天。

黄浦江的涛声是什么时候在她心间平息的？西双版纳菠萝蜜的芳香是什么时候变得陌生的？确切点说，她谷樾是从什么时候起，把这四个伙伴从记忆里开始淡忘的？

也许，根本就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界限，但淡漠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10年前的大上海，还是一片红海洋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热浪席卷着这个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城市。上山下乡的大幅标语顶天立地，从海关大楼钟楼上扯下来，直垂地面。一队队敲锣打鼓的人群拥过南京路、外滩，一眼看不到头的敞棚车队，穿着旧军服、臂戴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们，流着热泪，狂呼着足以让一切人感动的口号，奔赴北大荒，奔赴遥远的西双版纳。疯狂的年代，绝对冷静的人是不多见的。那时，衡量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标准，首先是愿不愿意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它不是对某些人的惩罚，相反是一种时代的荣誉。那种父送子的壮烈场面，也许只有当年翻了身的农民送子参军上前线才能相比。

谷樾却是被抛弃在角落的孤独者。

她只有16岁，学历是初中二年级。她的同学都是开赴北大荒的，每组成一个集体户，都是一阵欢腾。“红五类”们都不肯要她。她的父亲虽然不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残渣余孽”，却比那还要严重，因为工程技术上的什么问题，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的“文化特务”，下到监狱中。因为这个，谷樾从来没享受过戴上红卫兵袖章的荣誉，她是时代的弃儿。

此一时、彼一时。若是那时人们会像现在这样留恋上海，谷

槌就不会在别人激昂地出征时，悄悄躲在白渡桥下苏州河的臭水沟旁啜泣了。如果不是郭秀川他们意外地闯入这小姑娘的生活，她也许成了苏州河里的冤魂。

四个小伙子跑下白渡桥，一个个都是出征的装束，称得上意气风发。他们是到苏州河畔一只乌篷船上来接行李的。苏州河上的船队也一样插满彩旗、糊满标语，坐满整装待发的小将，燃放爆竹纸屑，把水面都遮了一层。

谷槌被这四个红卫兵发现了。好事的张冬冬，最先向同伴们说：“你们看，那姑娘哭得好伤心，也许要投河吧？”

尹兆强说了声“少管闲事”。许营营只是瞥了这长相俏丽的小姑娘一眼。

号称老大哥的郭秀川说声“看看去”，带三个人走了过去。

“你怎么了？为什么哭？”郭秀川问谷槌。

谷槌抽咽得更厉害了，问了半天，她才断断续续地说明了她的处境。

“华山中学太不像样子了！”尹兆强说，“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嘛！”

于是，这几位高谷槌两年级的控江中学学生，在郭秀川的主持下，在大桥墩底下开了个临时会议。谷槌不知他们要干什么，只见他们争论得很厉害。说了一阵儿，四个人又都围拢过来，一个个的神色都像见义勇为的大侠一样。

郭秀川说：“我们是控江中学高一年级的。我们下乡的地点是云南的西双版纳。你看过纪录片《在西双版纳密林中》吗？”

谷槌擦干眼泪，忽闪着浓密的长睫毛，稚气地问：“是那个有猴子和大象的片子？”

郭秀川笑了，点点头：“对。如果你愿意就同我们走。”

“你们肯要我？”谷槌睁大了眼睛。

郭秀川说：“要你。你回去同你妈妈商量一下。你把地扯给

我，下午我们去问准信，明天出发。下午我们帮你办粮食关系、户口。”

谷槌破啼为笑，说：“我家住四川北路 329 号。”

就这样，谷槌意想不到地同他们一起，踏上了云南的大地。

谷槌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她腼腆、胆小，但听话、勤快，即使她惹你生了气，你只要看看她那娇柔、天真的小脸，你必定会像原谅小妹妹一样宽宥了她。

在西南边陲那难熬的岁月里，郭秀川他们几个人，真的像哥哥一样保护着她、爱护着她。谷槌爱吃水果，凡是下来香蕉、菠萝或龙眼的日子，谷槌分到的那一份，总是越吃越多，大家总是把自己分得的那一份悄悄送给她吃；谷槌胆子小，每次走夜路，都是他们前遮后拦地去送她，直到听她拴好房门才肯离去；开初那一年，他们过的是斩草开荒的日子，先砍尽热带林中枝蔓纠葛的龟背藤、荆杞、剑麻，然后再伐倒滇柏、云南松，在 15 度坡以下的地方，种上橡胶林。每天他们都累得筋疲力尽。谷槌瘦弱，翻山回家路上，老是掉队，他们就想了个主意，仿照过去扎滑杆的办法，扎出一副能坐人的土轿子，抬着他们的小妹妹走；那时节，热带雨林里猛兽到处都是，有一次谷槌和郭秀川在林子里割胶，正是夜间，他们被一只游弋寻食的豹子发现了，谷槌吓得挪不动步，郭秀川硬是背着她跑了十几里山路；谷槌虽是个姑娘，针线活却从没练过，她的被子拆洗了，还是郭秀川一针一线地帮她缝起来。

当然，6 个年头的磨练，谷槌到底长大了，像羽翼丰满的小鸟，可以放单飞了。可是，她知道，她是在别人羽翼保护下成长起来的。其实，郭秀川他们，也只比她大两三岁，可她总觉得他们比自己年长得多，或者是两辈人的样子。她可以在他们面前撒娇、抹眼泪，她把饭煮糊了，别人噤一下鼻子，她就要拉脸子哭起来没完，非要大家都说她做的饭好吃，百般哄她笑起来才罢。

也许，谷樾在那段本来应当吃苦的年月里受到的爱抚太多，反倒造成了她更加脆弱的性格吧！脆弱也罢，坚强也罢，她毕竟是日渐长大的女孩子，她也具有所有女孩子的细心。

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她开始留心观察起她周围的四颗卫星了。为什么要常常在心间的天平上把他们来回衡量？起初连她自己都是模糊的、不自觉的。她尊重他们、爱戴他们，在她心灵的天平上，四个人是分不出轻重的，尽管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

事后她想过这件事。假使当时他们当中不论哪一人，偏离“卫星”轨道一度，向她表示哪怕是一点点的爱情，她都会不作权衡地投到他的怀抱中去。

然而，这种偏离轨道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好像在这四个男孩子中间没有生活着一个可爱的姑娘，又好像他们生来只该对她尽到兄长的责任。

啊，不。偏离轨道的事情是有过一次的，只有一次。而且，事情过去多年，仍然是个谜，不但她不摸底，那四个人也都矢口否认，于是成了无头案。可是，当初这无头案爆发的时候，他们那向来运转正常的小集体，出现了多大的风波啊！人人都极为紧张，如临大敌，仿佛他们中间出现了不可饶恕的叛逆！

今天回想起来，谷樾为自己的幼稚感到后悔。为什么要把那字条交出去呢？为什么不顺着这蛛丝马迹找下去呢？

事情发生在橡胶林中。那年春天，春寒正盛，一场春冻毁掉了高处的几百亩橡胶林。这东西是最怕冻害的，气温降到零上4度，它就过不去关。结果，农场下令把这些冻坏了的树伐去重栽幼林。

那天，谷樾只负责砍树头。郭秀川他们每伐倒一棵，她就赶过去用斧头把树冠的枝杈剥掉，树干准备拖下去烧火。她干的活是最轻巧的了，他们怕放树危险伤了她，不让她靠前。

就在傍晚收工下山时，谷樾摘了一些野酸棣果往兜里放时，

发现口袋里有一个叠得齐齐整整的小字条。她好奇地展开，只有寥寥几行字，像是刚学写字的学龄前儿童写的。但她相信，这话语，绝不是出自儿童之口，显然是有人用还童体来掩盖本来字迹罢了。

那字条没有落款，是这样写的：

明晚 7 点，请你到卜少河吊桥等我。

她正在看字条，格格直乐时，张冬冬一把夺过去，大声念了出来。于是他们之间变得剑拔弩张了。先是尹兆强把开山斧咚一声砍到一个树桩上，双手叉腰，向那三个人虎视眈眈地望着：“谁干的？站出来！”

许营营说：“也许，并不是我们当中的一个。”

张冬冬说：“很会选择时机嘛！明晚 7 点，正是农场放露天电影的时候，悄悄躲到吊桥底下，多浪漫啊！”

许营营说：“问题是，咱们有过‘约法三章’，任何人没权利不打招呼……”

这时，老大哥郭秀川制止了大家的争吵：“算了，别在这里吵来吵去，回去再说。”

这时，激动着的人们才注意到呆在一旁的谷樾。是啊，怎么能当着她的面谈这个话题呢？于是大家都憋了一口气，默默地下山去了。

其实，此时的谷樾早已明白了他们大吵大叫的背景。她是不久前无意间听邻场的一个叫柴沪娣的上海姑娘告诉她的。那长相秀气的上海姑娘先是夸赞了一回郭秀川他们四个人的品格、为人，接着问谷樾，相中了他们中间的哪个？谷樾红了脸，一个劲摇头。她真的说不出，若讲喜欢，她都喜欢，可是这种话，天地间又是说出口的。后来，柴沪娣对她说：“你选准了，你得主

动去求爱。他们四个当中，任何一个都不会主动向你表示什么的。”谷樾感到奇怪，问道：“为什么？”柴沪娣说：“什么都不为。他们在离开上海的时候，有过秘密的‘约法三章’。他们相约，要照顾你健康的成长，他们当中任何人不得对你存有邪念，不得私下对你表示超出一般的好感，不准同你谈恋爱。”

这真是一个世上少有的“约法三章”！

听了上海姑娘的转述，谷樾一连十几天心里像长草一般，除了拿水晶来形容四个兄长的心，再找不到合适的譬喻了。那几天，她天天晚上打了洗脚水端到他们每个人床前，看他们洗完了脚，再替他们泼掉脏水。而从前，恰好是反过来的，她干活一累，往椅子上一坐就不想再起来，直到他们当中的哪一个把洗脚水端到她脚边，她才肯洗呢。谷樾啊，一夜之间长大了，她懂得了报恩！她埋怨自己过去的任性和不懂事，她要可敬的兄长们知道，她谷樾的心也是水晶般透明的。

“约法三章”并没有宣布废除，突然有一个单方面撕毁协议，于是他们之间追查“背信弃义者”的举动就势在必行了。在那张字条出现以后，第二天傍晚，谷樾到他们住房前，正准备喊他们一起去看露天电影，突然听到屋里吵成一锅粥，一声比一声高，还有起誓的声音。果然，他们还在为字条的事一追到底。喊声最大的是尹兆强，起誓的是许营营，张冬冬不时地插几句嘴，好像矛头是指向许营营。只有郭秀川很少吱声，大概老大哥的地位注定他是仲裁的角色。这种事，永远怀疑不到他头上去的。

站在窗外的谷樾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她真想破门而入，抱住他们大哭一场，她想向他们说：“一个字条算什么？即使你们四个人一齐向我公开求爱，我都不会怪罪你们……”然而，她没有这样做，太难为情了。

几个人绷着脸从房里走出来了，见了谷樾，立刻没事人似的，像往常一样和颜悦色，关照她带上手电筒，提醒她别忘了在

脸上搽驱蚊油（她最怕蚊子咬，一咬就是一个大水泡）。在她面前，四个人又说又笑，仿佛此前吵得天翻地覆的根本不是他们。这必定又是他们的“新约法”吧？谷樾再也抑制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

这以后，他们四个人到底追查出结果没有，谷樾不得而知。但她相信是个疑案。她也看得出来，重点被怀疑的人物是许营营。虽则查无实据，却可以说是事出有因。许营营有文才，是四个伙伴中被称为“多情”的一个。他琴棋书画都来得，农场办小报，刻刊头，写仿宋字的通栏标题，向来是非他不可。那么，焉知他不会写还童体字迹呢？

这一切，都是往事了，像嚼橄榄一样，吃的时候甜，回味更甜。在当年四个伙伴一同送她出山的时候，她看得出，他们都是恋恋不舍的，她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他们都在悄悄地爱着自己。她暗地里抱怨这些太重情义和诺言的人，干吗这样固执呢？难道你们还等待小谷樾向你们当中的哪个去表白爱情吗？

就这样，大家在“招呼站”遗憾地分手了。谷樾坐在汽车里，不敢往窗外看，手帕紧紧掩在脸上，泪水早就打湿了手帕。她看见，郭秀川是一脸怅惘若失的表情，但他努力笑着。尹兆强木雕泥塑般站着，脸绷得很紧。张冬冬比别人显得自然，居然在山坡上采来一大抱盛开的云南杜鹃，从车窗里塞给谷樾。许营营呢，她只能看见侧景，她看见挂在他鼻梁上的泪水。那一刹那，她更疑心那字条就是许营营手笔了。

黄尘卷起，掩住了愈来愈小的四个小黑点。远去了，绿色王国中的两千个朝朝暮暮；远去了，留在那里的爱和恨。

此后，她谷樾平步青云，成了海内外知名人士！这是她做梦都不曾想过的，来得这么轻易！什么咖啡林？什么人工植物群落？那些费脑筋的事业，全都抵不上一张脸！

她刚到北京大学时，委实猫在教室里认真做了几个月功课，

她的心还留在了值得憎、又值得爱的遥远的西南边陲。

天晓得，有那么一天，电影厂的一个导演会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里盯上了去买肥皂的谷樾！

于是试戏、做小品，朗诵一段普希金的抒情诗。诗念得不算好，她自己都不满意；小品做得也觉着蹩脚，不过是当年红卫兵“战地宣传队”的水平。不过，给她拍的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轰动了电影厂，好多人认为这是难得的形象，至于戏，是可以教出来的。

于是，有那么一天，她突然被叫到大学工宣队队长办公室，工宣队长、人事科长、导演、摄影师都笑眯眯地望着她。于是她曾经热爱着的高山植物退后了，她开始了一种距离常人很远的、又很神秘的新生活。

此后的几年里，她曾经误认为自己天生是电影明星的材料，别人偶尔说她“只卖一张脸”，她都大动肝火，以为别人是妒忌她，她从来没怀疑过她这一步的正确与否。

她未曾忘掉西双版纳的朋友们，真的。特别是在她不顺心的时候。她今年 27 周岁了，应当说，还没有正式谈过恋爱。妈妈着急，同志们好意为她张罗，她自己也觉得应当把珍藏在心底多年的爱情交给什么人了。但她随后发现，寻找丈夫是极容易的，而称得上爱人的人却不多见，严格地说还没有碰到。向她献媚的人不少，经别人提婚的人更多，至于那些以着观众来信的形式求爱的、投寄呆照的人，简直比随手拾芥还容易碰到。

她悉心考察过一些向她倾心的男人，她发现，好多人是慕她的名气、社会地位和容貌而来。她有时甚至悔恨，父母为什么要给自己一副漂亮脸蛋、窈窕体形呢？假如自己失去这副容貌，在她周围还会有这么多求爱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她曾经对李忌动过心，四万八千字的情书，打动过她；李忌的事业心和才华也多少能征服她。可是，他是有妇之夫！听别人说，李忌的老子

当年被打成反党分子押到监狱里，李忌的妻子冒着被开除党籍的危险同他结婚了，然而，李忌要同她离婚！李忌在那封长长的情书里，有过这样一段话：“……爱，是残酷的，而无爱的婚姻又常常是现实的、受保护的，这更残酷！假如你能像我对你一样赤诚，哪怕我们永世不能结合，我都感到幸福。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悲剧呀，一个人有家室，然而他的爱在另一个女人身上，这本来是应当受保护的爱……”

这是什么意思？提倡婚外恋？希望谷樾当他不合法的情妇？这是谷樾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她觉得爱情是天地间最纯真、最圣洁的东西，不能过那种鼠窃狗盗般的地下生活！

应当承认，在西南边陲同许营营的意外重逢，使她本来不平静的心潮更加泛起了波澜。她真想问问他，那张约会的字条是不是他写的？她更想问问，许营营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可她没有这个勇气。其实，本来是可以不问的。时过境迁，字条到底是谁写的，早已失去了意义；许营营是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他要找一个什么样可心的妻子都是容易的，他30岁了，也可能都有了孩子……

尽想这些无边无沿的事干什么？

谷樾感到眼皮发涩，左眼跳得心里发慌。她悄悄掀开蚊帐，穿衣下床，月亮偏西了，屋子里比原来暗多了，几只叫不出名来的小昆虫在墙角暗处吱吱地叫个不停。

她撕了一小片纸，贴在跳个不住的眼皮上，这还是郭秀川教给她的法子呢。这眼皮跳得真恼人，人都说女人左眼跳是跳凶，焉知不是跳在郭秀川身上吗？这样的念头一闪，她吓了一跳。虽也知道这是不可信的唯心玩意儿，她还是走出门来，她想去央求护士、医生，她无论如何要去看一眼郭秀川，哪怕只一眼！

最老实的说谎者

无独有偶！许营营披件衣服，也在朦胧的月色下走来走去。露水把他大半截裤子都打湿了。踱到谷樾面前，他站住了，沉默了好一阵儿，把外衣给谷樾披上，问：“睡不着？”

这不是多余的发问吗？谷樾只是点了点头，两个人沿着草径向前走着。红的、绿的信号弹不时地在山那边升起来，远处传来一阵沉雷般的马达轰鸣声，大概又有一批军队从国境线那边撤下来了。

“为什么失眠？”许营营问。

“你呢？”谷樾以问代答。

“我在想我们的郭大哥，”许营营的调子有几分凄楚，“你还记得他从前贴在床头的座右铭吗？”

怎么不记得？那是伟大先哲的格言：“让别人去做生活的骄子，我们的使命永远是开拓。”

今天想来，郭秀川是问心无愧地这样去做了，他不是天下闻名的人物，除了团队的花名册里有他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

许营营说：“我总有点不祥的预感……”

谷樾忙问：“你瞒着我！有生命危险吗？”

许营营叹口气，说：“听说，他是被地雷炸伤的。如果当时能够有条件及时处理、医治，也许连截肢都不必的……我听护士说，感染得很厉害，就怕转成败血症，那……”

“不会，你瞎说！”谷樾说，“他不会死的，根本不会。”

许营营说：“手术后3天内没事，就平安了。”

两个人又默默地向前走了几步，许营营突然咬着牙说：“张冬冬这个王八蛋！没想到他薄情到这种地步！”

许营营说这话的时候，两颊的肌肉一耸一跳，十分怕人，这

在文质彬彬的许营营，还是不多见的。谷樾忙问：“张冬冬怎么了？”

“他来电报了，不能来云南看秀川了。”许营营凄凉地说。

“看你！”谷樾松了口气，“这也值得骂人！他不来，一定有不来的原因。当工人的，制度挺严，哪比得了咱们搞文艺的人，会这么来去自由！”

“屁！”许营营吐口恶气，说：“他不当工人了，找到了轻活，在化验室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团揉皱的纸塞给谷樾，“你看电报吧，刚接到的。”

借着军营门口的探照灯光，谷樾展开那封电报，很长，几乎是一封短信：

请转告秀川兄，代致问候。我处正评定工资，此时离开，有可能落空。我参加工作年限晚，本不在升级之列，但凭贡献，领导默许，可能在机动数中给以考虑。一生中长级次数有限，恕我不能前往……

电报又重新揉烂在谷樾的手里。她也不能原谅张冬冬，无论怎样宽宏大量，也不能饶恕！

许营营冷笑着说：“是啊，一生中才能遇到几次调薪！可是，毕竟是几次！而人的生命，对人来说，仅有一次！秀川大哥如果按张冬冬的法则去衡量，他无论如何不会去冒枪林弹雨的。”

谷樾直想哭，心里像塞着一团乱麻。

她又听许营营说：“自卫反击战打响的前夕，秀川根本不在队伍里，他在武汉步兵学校学习，夜里听到中央军委的动员令，他给学校留下一张字条，连夜乘车南下，赶回他的连队，他这个离职学习的连长，就这样带队出征了。”

谷樾的眼前出现了幻觉。她好像透过重峦叠嶂的山峰，看到了硝烟织成的黑幕。在那弹雨泼洒的山坡上，郭秀川抱着40火箭筒正向敌人的暗堡运动……炮声、枪声，震耳欲聋的炮声……不，这又是什么声音？打击乐？啊，是的，疯狂的没有节奏的迪斯科舞曲，一群男女青年在地毯上狂舞，猩红的果酒，涂得通红的嘴，扭动的腰肢……而此时，战场上正在流血、流血……

这就是不同步运动！这就是电影术语所说的平行蒙太奇！

她几乎尖叫起来！

谷樾停住脚步，说：“走，咱们去央求护士，哪怕是下脆也行，无论如何要去看秀川大哥，我一分钟也等不下去了。”

许营营说：“等到天亮再说吧。你看，启明星都亮起来了，快了。”

他们又慢慢地向前走。许营营突然说：“你还记得那年给你写字条的事吗？”

谷樾偷看了他一眼。真没想到，他会主动提起这件有点可笑的往事。这曾是谷樾极想知道的，只是她不好问出口就是了。她心想，大概事隔多年，许营营要坦白了。不知为什么，她一直认为那字条就是他写的。

所以谷樾尽量用宽宏大度的口气说：“那有什么？无论是谁写的，一不犯法，二不降低人格。”

许营营说：“当年我们那么认真地吵嘴，原因并不在这里。一来我们有约在先，大家自然都不原谅最先食言的人。更主要的，你当时未必明白真相。你年龄小，正是长知识的年龄，我们不能让这些东​​西过早地分你的心。好多女人，未必不聪明，未必干不出一番事业来，但这些女人往往坏在她们的容貌上。长得美丽一些，就引得好多人狂热追求，使女孩子没心思学习，只顾打扮自己、欣赏自己，结果也毁了一生。”

这缘由，倒是谷樾到今天才听说的，那种感激之情更不同于

过去了。

“你猜得到是谁写的字条吗？”许营营这样问了，又加了一声苦笑。

“我早猜到了，是你。”谷樾脱口冒出这么一句，又马上觉得后悔起来。万一不是他呢？

果然，许营营说：“当初，张冬冬、尹兆强都重点怀疑我的。我倒没料到，连你也是这么想的。说真的，当时我有过这种念头，但我克制了。他们几位，也有过，我敢断定。但谁也没料到，这字条是咱的郭大哥写的！”

谷樾愣了，情不自禁地站住，呆了好一会儿，才说：“不会，不会，你在胡扯。”

是啊，即或怀疑到天王老子头上，也不会有人往郭秀川身上想啊！

许营营说：“你感到惊讶，是自然的。不过，真的是他。老实人有时比别人更有勇气。我也是不久前知道的。”

“他，告诉你的？”谷樾问。

“是写信里谈到的。”许营营说，“在他跨越国境线出国作战前夕，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他是为了他背后的祖国去作战的，死亡随时都可能走近他。他说他一生都是光明磊落的，没有害过人，没有干过一次损人利己的事。他最恨说谎的人，只有一次，他说了谎，好多年来不敢承认，这就是那张字条。他觉得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你，这是他心灵上惟一个黑点。他说，他有可能回不来了，万一牺牲在异乡他邦，就求我把这件事公布于朋友面前，请大家宽恕他，他就可以放心地闭上双目了……”

许营营说得极沉痛，他自己流泪了，谷樾也哭了。

过了好一阵儿，谷樾才带着哭腔问：“那他后来为什么又……”下面的话她没有说完，许营营却懂得了。他说：“那还用问吗？他是始终爱着你的。潜进人灵魂深处的第一次爱情，那是

永远磨灭不了的。有人说过，什么样的爱情是最幸福的、最甜蜜的？只有那得不到的爱情才是最甜蜜、最值得人缅怀、留恋的。因为那里面掺杂了好多想像的理想成分。”

谷樾哽咽着说：“是啊！假使我真的嫁给了他，我会使他满意吗？我好耍脾气、使性子，娇生惯养，什么都不会干，吃不得苦，也可能天天同他吵架……”

许营营说：“你变得客观起来了。你说得对极了。其实，哪有没有缺陷的人呢？当你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出于偏爱，把他的缺点都美化成长处一起爱着。婚姻是恋爱的结果，但婚姻并不是永远像恋爱那样自由，家庭责任、社会义务、生活的担子，会把爱情之火的温度降低。于是，有时对方本来的长处，也可能变成了短处，生活就这么有趣。好在，你在大家心目中，毕竟留下的是纯洁无瑕的形象。我想，即使现在大家都还是单身汉，也不会有人去高攀你，给你写字条了。”

“为什么？”谷樾还要问。

“这还用问？”许营营说，“你的名声、地位，都给你面前开拓出了一片选择性极大的领域，你早已经不是西双版纳密林中的一只小鸟，也不是白渡桥下的可怜虫。我们都得承认，客观条件的变化，可以使同一个人变得他自己都不认识。”

谷樾觉得心里隐隐作痛。听许营营的话，仿佛是说她谷樾现在身价百倍了，像一件商品一样陡然成了奇货可居一样。她苦笑一阵，说：“你这样看我吗？可事实上，我至今什么人都没嫁，严格说，我还没有爱上过什么人。人，不都是商品！”

许营营很后悔，知道自己言重了，伤了谷樾的自尊心，一时又想不出恰当的话来解释，只好低头走路。

他们不知不觉中又来到芒街村外那片剑麻前面，再往前走，就是碑林高耸的烈士墓地了。他们都同时停住了步子。

越是怕不吉利的事发生，越是控制不住往坏处想的思路！谷

樾竟觉得，在烈士墓的哪一块空地上，说不定明天、后天，又要新掘一个坑，新培起一座坟，新竖起一块青石碑，她的朋友郭秀川的名字、籍贯将永远刻在那冷冰冰的石头上！她真怕那样的事情会发生。

谷樾突然仰起泪眼，望着许营营说：“我决定了，哪怕秀川哥哥终身残废了，我也要嫁给他！”

许营营木然。没有惊讶，也没有感动。过了半晌，他轻轻摇着头，说：“还愿呢，还是怜悯？或者说是崇高的正义的冲动吧。但我想，秀川他不会接受的。他不需要同情、怜悯，不需要什么报答。你别伤心，真的。在他面前，你千万不能说这些，他会难过的，你至今还不真正了解他呀。”

谷樾差一点甩袖子走开了。她觉得许营营也变得冷冰冰、不可理喻了。她是经过了怎样内心的痛苦折磨，才做出这样带有牺牲性的抉择呀！然而，在许营营眼中，一点价值都没有，甚至说这是某种冲动！

她的眼泪只能往肚里吞。

芒街军营那边吹起了起床号，天已经放亮了。两个人正想往回走，发现剑麻掩映的小路尽头走来一个人，背上背着一个竹篓，看样子分量不轻，佝偻着腰。

“尹兆强！”许营营喊了出来。

许营营的眼睛真尖！走近一看，果然是他。

三个人见了面，自然是一番高兴。尹兆强的个子比分手时好像又长高了一寸，脸又红又黑，看不出是个大学毕业生，倒像个山里人。

尹兆强把装满了香蕉、木瓜的背篓放了下来，擦着汗，对谷樾说：“好啊，你个小樾，出了大名，把我们都忘到脑后去了！连封信也不写！”

谷樾脸腾地红了，半晌才说：“这不是又见面了吗？”

“张冬冬来没来？”尹兆强也不等别人回答，自顾说他的，“你们见到秀川大哥了吧？伤得重不重？我们那地方，嘿，十天半月不通一趟班车，我走了一宿黑道！秀川大哥可是最爱吃香蕉的，够他吃的了。对了，小樾比别人更爱吃，那你算借光！”

三个人一齐往芒街村里走，谷樾有意落后几步，她怕尹兆强看到她红肿的眼睛。

“张冬冬来不来呀？”尹兆强又问了一遍。

“来。”许营营显然怕这个血性汉子发火，就想先稳住他，“大概过一两天就能到。”

“咱们总算团圆了！”尹兆强说，“我没想到小樾能来，人家出息了，咱不好高攀，人得有自知之明，是不是？”

许营营哈哈大笑：“你再说，小樾可要大哭一场了，叫我熊得够呛了。”

谷樾说：“我真没想到，你念了大学，又回到西双版纳去了。”

尹兆强说：“念大学只为给爬进大城市搭梯子，我看可以不念。有的人，天生是大理石，应该镶嵌到金碧辉煌的大厦上去；我呢，一颗小小的鹅卵石，本来就是铺路的料，铺在哪里都是一样。”

谷樾一笑，说：“你把自己打扮得像西双版纳的孔雀一样美了！若不是那里有一棵美丽的梧桐树，你才不往回飞呢！”

尹兆强哈哈一笑，并不否认：“你说对了，凤凰非梧桐不栖身嘛！”

“柴大姐好吗？”谷樾问道，“我临走时栽的那些咖啡树都结果了吧？”

尹兆强说：“你走后，就是她接管了护林站的工作。你现在若回西双版纳去，柴大姐会亲手给你煮一壶最纯的西双版纳咖啡的。”

谷樾由衷地笑了，她感激柴沪娣大姐姐，尊敬她，觉得她比自己要高尚得多。

不知怎么回事，许营营对这场谈话漠不关心，替尹兆强拖着背篓，沉闷地走在后面。

谷樾有点想念柴沪娣，她为什么不同尹兆强一起来呢？

谷樾认识柴沪娣，是到了西双版纳以后的事。每逢农场开会，谷樾都凑到柴沪娣跟前，她不去听场长讲话，却扬起下巴颏，长久地凝视着柴沪娣的脸。她长得真美！瞳人像黑漆点过，水汪汪的，脸白得不用敷粉，还有那颀长的脖子，看着她，使谷樾自然而然地联想起爱神维纳斯的断臂雕像。

有一回，柴沪娣终于发现了谷樾的目光，就拍了她一下，笑道：“你不好好听会，老盯着我干什么？”谷樾老实地说：“你长得好看。”柴沪娣笑了，轻轻地捏了她脸蛋一下：“小毛丫头！你好好照照镜子去吧，你比我漂亮多了。”

从那以后，她俩混熟了，虽然住地相隔5里地，要翻越一座长满野龙竹的山，可她们经常来往，于是柴沪娣同郭秀川、尹兆强他们也渐渐熟起来。

只是，谷樾从来没有想过，柴沪娣会嫁给尹兆强！她此时觉得，幸福的婚姻，将会使尹兆强在深山老林中获得乐趣，这也是朋友们的安慰。

暗部曝光

一间筒子屋，大约摆了十几张病床。这是战前一所小学校教室改成的临时病房。从越南前线西线下来的轻重伤号，都要在这里经过认真治疗后，再转往昆明、贵阳去住院休养。

这间屋子中间，用绿帆布临时隔成两半，人多的那一面，屋子里洒满阳光，伤员们的床前堆满了各种装着慰问品的花花绿绿

的慰问袋，花瓶里插着野花，伤轻的有说有笑，有的人还帮护士在扫地、浇花。

这一面，却只有两张危重伤员的病床，光线很暗。大概是属于特级看护的范围，谷樾随着许营营他们走进去的时候，立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好大一群医生、护士围在病床旁，见他们进来，才悄然闪开。

郭大妈一直向儿子的病床走过去。

这就是她的儿子郭秀川，静静地仰卧在白色被单里，脸上缠满绷带，只露出五官来。此时，郭秀川闭着眼，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嘴唇也是灰白色的。一只胳膊露在被单外面，根根青筋暴出，正在滴注一种掺了什么药物的葡萄糖水。

“不要多说话。”一脸连鬓胡子的大个子军医这样叮嘱了一句，走向门外。

许营营、尹兆强和谷樾在床前围了一圈。郭大妈坐在床头一把小凳上，泪水无声地流淌，她伸出干枯多皱的手，替儿子掩了掩被子。

谁都没有说话。郭秀川毫无反应。

郭大妈的视线渐渐移到儿子的下肢。被单底下瘪瘪的，好像儿子突然短了半截。

老太太发疯似的瞪大了灰黄的眼睛，样子像要号叫，谷樾紧紧拉着她，防备着。其实，他们一进病房，别人就发现郭秀川的双腿已经不存在了，问题是没有一个人说破就是了。

郭大妈颤抖着的双手在儿子没有腿的空被单里摸了好一阵，双手捂嘴，抽咽起来。她低声说：“我给儿子带一只单拐来……不够啊，儿啊，妈咋没想到给你买一架摇椅车呢？”

谷樾的心酸得不行，背过脸去拭泪。

突然，郭秀川睁开了眼睛。先是欠开一条很小很小的缝隙，

随后突然睁得大大的。他的眼睛里放出了光彩，他看见了所有的亲人。他的头微微动了动，那意思是要抬起来。

许营营弯下腰去，轻声说：“别动。大哥，我们都来看你了，都来了……你看，那是小槌……还有大妈……”

郭秀川眼里滚出两颗泪珠，他的嘴唇张了张，听不清，好像在说“谢谢”，也许是向朋友们问候。他的眼珠灵活地转动着，注视着一张张他永生不能忘怀的面孔。忽然，他的眼光里出现了惘然若失的神色，他喃喃地说：“冬冬……”

啊，他到底发现了朋友当中少一个！

谷槌差点哭出声来。难道可以告诉他，张冬冬因为舍不得丢掉一级工资而不能来看他吗？

许营营还是90度地弯着腰，柔声说：“冬冬明天就到，明天就到……”

郭秀川的眼睛开闭两下，算是点头。

谷槌觉得郭秀川的精神状态很不错，比她想像中的不知要好多少！她一下子记起了自己向许营营发过的誓言：要嫁给郭秀川，哪怕他是个终身残废。是崇高的正义冲动吗？可现在，她却在现实当中！一个锯断了双腿，终生将要坐在摇椅中的废人！

谷槌多少感到了自己的动摇，她恨不能借助一种强大的外力来稳住自己……

郭秀川的眼睛掉向了谷槌，意思好像是唤她走近一点。许营营轻轻闪开，把谷槌推到前面。

谷槌给郭秀川拭掉眼角的泪痕，双手捺膝，弯腰侧耳听郭秀川讲什么。

郭秀川是在讲话，不过声音低而暗哑，别人几乎无法听清。但是，谷槌是字字听清、句句听懂了的。郭秀川断断续续地说：“小、槌……原谅我……有一件、件事，我、我说了谎……让营营告、告诉你吧……”

大颗大颗的泪珠从谷樾的眼里滚落下来，她情不自禁地抓住郭秀川发凉的手，说：“你不要说下去了……”她真想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出你爱我呢？”她更想大喊一句：“你放心吧，我会嫁给你的！”此时，她周身像着了大火，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扑灭它！

医生和护士们出来干涉了，他们不得不退出郭秀川的病房。

走出门外，尹兆强说：“看来，生命是没有危险的了，我们要安排他的后半生。”

许营营说：“比我估计的要乐观。过了3天没危险，就行了。当然，像他这样的英雄，国家会管一辈子的。”

尹兆强火了：“你不用担心，落不到你头上。我会接他回西双版纳去，给他接屎端尿一辈子。”

“就你一个人有感情？”谷樾撞了他一句。

“你呀，还是点火就着的脾气！”许营营说，“我考虑过了，在经济上，只有我可以多出点力。稿酬虽低，一年总有两三千块的样子，我包了。你提到去西双版纳，我觉得倒是个好主意，那里山明水秀，空气好，以后再商量吧。”

尹兆强这才转怒为喜：“我以为你也要打退堂鼓呢。”

这时，导演李忌和制片主任余晶磊走过来。余晶磊说：“谷樾，马上集合，到营房去慰问了。”

谷樾答应一声，给他们互相做了介绍，就同李忌他们一起走了。

上午，他们在营房祝捷联欢会上做了表演，听了英雄事迹报告，直到12点才结束。

嘉桦直接去食堂了。谷樾多年来养成毛病，不管走到哪里，从不使用公用碗筷，总是随身携带一副餐具。她拐回住处去拿时，听见她的屋子里有人说话，而且听到了许营营发狠的声音：“真不像话！你不给她出手续！”

接着听尹兆强说：“那又何必？强扭的瓜不甜啊！我从来不

要勉强的东西，包括感情在内。”

门外的谷樾惊愣地站住了。许营营在斥骂谁？这不明显地在说柴沪娣大姐吗？难道说……她不敢想下去了，就躲在门外听起来。

她终于从他们不完整的交谈中听出了大概。

柴沪娣扔下尹兆强回上海了，事情发生在一周前，就是大学生尹兆强又背着行李卷回到西双版纳的时候。用尹兆强自己的话来说，“在我们自己主宰不了自己命运的时候，柴沪娣是吃得了辛苦的，虽然她也向往着回到大城市去，可是她还能够陪伴丈夫无可奈何地留在西双版纳；但是，当我尹兆强能够摆布自己命运、可以逃避偏僻角落苦日子的时候，我却又一次选择了受苦的环境，她就无论如何不肯原谅我，而终于往亮处飞走了……”

啊，原来他乐呵呵地告诉她谷樾的一切，都是掩饰！什么“凤凰非梧桐不栖”，什么“柴沪娣接管了谷樾的咖啡林”，全是虚构。

谷樾想像得出，柴沪娣留给尹兆强的打击有多大；她却没法估量，一个人压下内心的痛苦，装得无限乐观的样子有多么难！

她本想冲进去，但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尹兆强的一句话阻住了她的脚步。尹兆强对许营营说：“这些事，你千万不能告诉谷樾和郭秀川，我希望，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都是人世间最纯真美好的。”

许营营叹了口气，说：“好吧。不过，你的日子可够苦的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

尹兆强说：“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我恨过那地方，可我又爱它。你有好几年没回西双版纳去了，你现在再去看看，你也许会萌生留下来的念头。”

“那里大大改观了？”许营营问。

“改观？”尹兆强明显地苦笑着，“是改观了。从前的森林，

一片又一片地倒下去了，再也不用害怕大象了，几百头大象都逃到缅甸、泰国的密林里去了。毁林毁得好凶，泥石流爆发，气候开始变干燥，恶性草丛生，总有一天，西双版纳这块号称绿色植物王国王冠宝石的明珠，要彻底失掉光芒。不能这样看着它毁灭，我留下来，实在是为了这个。”

沉默了一会儿，许营营又问：“柴沪娣走了，护林站谁接手了？”

“没人。”尹兆强说，“过去人工栽植的树死了好多，我们研究所正在培植人工群落，就是按热带雨林中灌木、乔木、藤科和草本植物的自然依附条件，试探摸索出人工手段恢复原始林的办法。这工作太需要人了，也许我一辈子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也许，当代人是看不到我这工作的意义的，可我相信，30年后、50年后，我们的后人会明白，我所从事的事业是有价值的！”

又是一阵沉默。谷樾呆呆地立在门外。

“不谈这些了。”过了一会儿，尹兆强说：“你同小樾谈了吗？她现在是在云彩上，是好事。可我总是有点担心，她好像是被大风刮起来的飞松的种子，在云彩顶上是扎不了根的，只有飘落到有土壤的地方才行。”

“是啊，荣誉和虚荣常常奇怪地扭结在一起，”许营营说，“我也感到她离地面太远了。可是，我们没有能力改变她了，她现在的生活，和当年大不相同……”说到这里，他扑哧一下笑起来。

“笑什么？”尹兆强问。

“我笑谷樾，”许营营说，“只有一点，在她心里还没有泯灭，她的天真和善良。她同我说，她要嫁给郭秀川。”

尹兆强脱口说：“小资产阶级的盲目冲动！生活可不是演戏！在舞台上、银幕上，好多善良、美丽的姑娘都是忠于爱情的，嫁给残废人啊，不以贫贱富贵取人啊……鬼才相信！你问问那些明

星们，卸了装，叫她们去爱一个残废军人干不干？”

许营营仿佛在为谷樾辩解：“人不都一样。我发现，谷樾并不满足她现在的微妙处境。成名的电影明星，日子并不好过，她们有她们的苦闷。”

“你别辩护！”尹兆强粗鲁地说，“别叫她拿我们秀川大哥开玩笑。”

门外的谷樾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了，捂着脸跑开，饭也不想吃了。

她像一只受了箭伤的小鸟，又孤单、又委屈。她此前一直以为自己是属于高尚者一群的，没想到，在同伴尹兆强眼中，自己不过是个庸俗的角色。她躲在芒街小花园里，哭了很久。

这里其实称不上是花园，只不过是缅寺后面的一片草坪。和尚们闲来无事，把山坡一块块地开垦起来，种上了杜鹃花、爆竹花、桂花和叶子花，还有爬在架子上的九里香，正开出雪白的、喷香的一大片花来。

远处，有些轻伤员在花间散步，有一个年轻的女护士在采摘红色的杜鹃花，大概是要插到病房的花瓶里去吧？

天是那样蓝，蓝得耀眼；几丝洁白如絮的浮云由南向北缓缓飘移着，像河上的白帆。“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谷樾凄然地想起了这两句古诗，她觉得自己就像那飘忽不定的浮云一样，没有根基，而故人，有谁能理解她呢？

爆竹花的花架子后头有人来了。但是她看不清楚。偌大的竹棚上，密密层层地爬满了爆竹花的藤蔓，形成一堵绿墙，挡住她的视线。但她能影影绰绰看见，有人推着一辆摇椅车，车上坐着一个伤员，两个人却很少说话。

摇椅车在花墙左面停下了。推车的人松开车子，伸手在花棚上摘了一大串爆竹花，插到车上。

谷樾从花间坐了起来。那推车子的不正是导演李忌吗？再细

看，坐在摇椅车上穿军服的是个女兵，梳短发，五官端正，戴着军帽，看上去有三十五六岁光景。

谷樾想，会不会是李忌的妻子边岩呢？肯定是，若不然，为什么由李忌出来陪她？听嘉桦说，李忌不是坚持要同妻子离婚的吗？此时看李忌笑容可掬的样子，完全看不出他们之间感情的隔膜，他不是摘了一串花，插到了摇椅车的扶手上了吗？

这一刹那间，谷樾突然忘却了李忌给她写过的洋洋四万八千字的情书，她为李忌和边岩高兴。她觉得，人心总是肉长的，人血总是热的。也许，当李忌看到自己的妻子为了保卫祖国，也为了保卫他安稳地拍电影，献出了一条左腿的时候，他感动了、心软了、内疚了、自愧了，于是他们之间感情的裂痕被一种崇高的黏合剂黏合起来了！

谷樾感到一阵轻松，仿佛那幸福也有她自己一份。她想悄悄溜掉，她怕听见人家夫妻间的私房话脸红。可是怎样溜法呢？除非像山猫那样，弓着腰从杜鹃花丛间钻出去，否则，只要一站起身来，就要暴露，就得同人家打招呼。

正犹豫间，她听到了李忌和边岩开始了一场谈话，她被吸引了，全身像长了吸盘，被牢牢地吸在地上。

“你是来办那件事的吧？”边岩先说话的。

谷樾浑身一震，“那件事”，不就是指的离婚吗？且听李忌怎样回答。

李忌的表情，谷樾看得很清晰。他大概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上一支，一手扶着车子的摇把，英俊而不显老的脸上存着几分笑意。

他说：“你说哪儿去了。我是来参加慰问团的。我没想到，你会到前线去，更没想到你会……”

“是啊，”边岩双手抱在胸前，说，“假如我战死就好了，那，事情就好办多了，省去很多麻烦。”

李忌有些狼狈，四下看看，说：“你别这么挖苦好不好？我们纵有千日不好，还有一日之好呢。”

“说得对呀！”边岩两眼望着远方灰蓝色的山、丛林，说，“我们是好过。就凭你那长达3万字的情书，我就感动了，爱你了。我那时如果不是18岁，而是28岁，或38岁，就不那么简单了。”

李忌甩掉烟头，叹口气，无话可说。

“说吧，你又爱上了什么人？”边岩是不太客气的，“一个18岁的？你的情书也许不止3万字了吧？那女孩子被你打动了没有？我想你是有这个本事的。”

“你这是干什么？”李忌的语气有点悻悻然。

“不耐烦了？”边岩说，“我10年前住产院才10天，你不就同护士有一腿了吗？何其神速！你那时下跪、打自己嘴巴，我原谅了你。你今天说实话，我还会原谅你的。”

谷樾的心跳得凶极了。她仿佛就站在边岩的面前，仿佛边岩知道了四万八千字情书的事一样，她仿佛成了可耻的罪人！

李忌是这样回答的：“没有的事。咱们感情不合……你哪样都好，就是身上的大兵味太浓了，我……”

边岩打断他：“你回答我，你是不是想趁这次难得的机会把事情办利索？”

李忌有点发慌：“不，不。在这种时候，我怎么能……”

边岩苦笑了一下，说：“是的，你不敢提。我失掉了一条腿，我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假如你胆敢提出同我离婚，伤员们会拿拐杖把你打死，你信不信？”

李忌又是无言以对。

“所以，”边岩说，“还是由我提出为好，万无一失。这是你所希望的，是不是？”

“啊，不……”

“你又说谎！”边岩说，“从前，你提过那么多次离婚要求，我没答应，你以为我是留恋你吗？我知道，勉强讨来的爱情是没意思的，打发要饭的不会给馒头。我只是出于气愤，不给你出这个手续。我也不好，我也有报复心理，我不能让你太顺心了，这就是我的本意。你不感到可怕吗？现在，我更有理由了，只要我不吐口，你就不敢甩掉一个为国流过血的结发妻子！你那荒唐的梦就要破产！”

谷樾看见，平时风度翩翩、口若悬河的李忌垂下了头。在妻子面前，他太丑陋、渺小了。谷樾在心里给边岩叫好，多爽直的人啊！也许只有她，才能一箭射中李忌，叫他的心流血！

好一阵沉默。微风吹过，花丛中一阵簌簌作响，几片枯黄的叶子落到车上。

边岩拿起一片陈叶，在手里捻来捻去，又说：“我的代价太大了！我对你这么多年的感情，到头来换得的是你的背叛，换得的是看透了你的心。如果我还能够回到初恋那时候，我是绝对不再相信什么海誓山盟了。在菜园子里，不能相信羊，在羊圈里，不能轻信狼，生活告诉了我这样的道理。”

“随你的便好了，”李忌终于说话了，“你如果下决心那么做，也没什么，我宁可一辈子不娶！”

“你到底说了一句实话，”边岩说，“枯黄的树叶，是永远不会再长到树枝上去的，我明白。你不必发狠，我早想好了，那是在战场上受了伤苏醒过来时就打定主意了的。我不少胳膊不缺腿的时候，都不能拴住你的心，何况这时候……”边岩好像哭了，手挡在眼睛上，“我给你出手续，不用你说话，我向组织上提出同你离婚，理由就说感情长期不合好了，我永远不会说出你别的什么事来，好欢好散吧。你可以放心，即或有一天闹到法庭上去，有人代打不平，控告你什么，我都不会出来作证，这总可以了吧？”

李忌抬起头来，不知是激动还是感动，话语有点含混不清：“你……你……我太对不起你了。”

边岩把他刚插到车扶手上的一串爆竹花一枝枝揪下来，扔到草丛中。她说：“不过，像你所说的那样，纵有千日不好，还有一日之好。凭这一点，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想再留给你几句话。你再同别的女孩子好的时候，你先问问自己的良心，你会不会变心，你是不是在玩弄她。我希望你不要弄到不可收拾那一步。尽管我们分开了，但两个孩子毕竟是你的，在法律上，你永远是我们的父亲。我不希望在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知道他们有一个不配做人的父亲。”

边岩又哭了，泪出痛肠。

边岩这些话，铁石心肠的人都会被打动，回心转意的，然而李忌却说：“你放心，两个孩子的全部抚养费由我出。”

边岩没理他，高高地扬起头，拍了拍车把，冷冷地说：“送我回去！”

车轮碾轧大地的声音渐渐远去，可是碾轧在心上的伤痕却是那样的深！谷樾在花丛间哭了很久。她可怜边岩、同情边岩，也佩服这个坚强、自尊而又善良的女性。同时，她也更鄙视那卑微的李忌。倘若是她，听到边岩这一番感天地、泣鬼神的话，她会扑上去拥抱边岩，会跪在地上号啕大哭，会下决心收住那心辕意马的缰绳。然而，李忌是那样的绝情！

该结束了，浮云一样的生活！

像是说李忌和边岩，也像是说她自己。

从来没有过的决心，使谷樾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力量。她确信这不是什么正义的冲动，而是理智的产物。她活了 27 岁，好像今天才明白，自己应当怎样活着。电影摄影是讲究暗部曝光的，光圈极大，速度极慢，镜头对准最阴暗的角落，啊，她看到了人心的暗部曝光！

这里应该定格

回到芒街，谷樾迫不及待地要去找导演李忌。嘉桦说：“他也正在找你，我看他喜笑颜开，我猜得到，他离婚离成了，我可等着吃你们的喜糖了！”

谷樾强忍着内心的厌恶，狠狠地说：“那你就等着吧！”说罢跑出门去。

迎面，李忌正向她的住屋走来。离很远，李忌就呼喊起来：“谷樾，你钻到哪儿去了？我差不多连老鼠洞都翻遍了，到处找不到你。”话语中显而易见的轻松和欢乐，是几天来李忌所没有的。

“是吗？”谷樾站住，她真想痛斥他几句，也从来没感到他这样可恶。

这时嘉桦跑出门来，打趣地说：“你找她，她找你，两块磁石快吸到一起了吧？”一边说，一边格格地笑着跑远了。

李忌故意假作生气地说了一句“调皮鬼”，走进屋子。谷樾犹豫了一下，也跟了进去。

李忌在演员面前确是一个极好的本色演员。永远是大度的、矜持的、居高临下的。是表演，又看不出做戏的痕迹。

坐到床沿上，李忌说：“这几天没看剧本吧？这么不用功！我看你精神恍惚，这怎么行？”

“你今天倒是兴高采烈呀！”背靠着房门，谷樾冷冷地说。

李忌站起来，在屋子里踱了几步，站在窗下，望着窗外木瓜树光秃秃的树干和吊在顶端的一串木瓜，说：“你也许说对了。一个人最大的宽慰就是解脱——精神的解脱。自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向往的。”

“导演获得了什么解脱呢？”谷樾故意问。

李忌沉吟了片刻，娓娓地说：“有件事，我本想同你说的。我跟妻子长期合不来，我受不了她那一套大兵的作风、大兵的生活方式。当然，她是个好人……现在，我们总算分手了，和和气气的分手，善始善终。”

“呃，这就是你的解脱，”谷樾仍然冷淡地说，“这么说，旧的过去，意味着新的开始喽？”

对她这种近乎嘲弄的语气，李忌多少有点吃惊。也许，在他想来，谷樾听到这意外的消息，会高兴得溢于言表的。他不相信他对谷樾的追求是完全徒劳的，他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对自己有感情。不然，她不会答应跟他来拍戏。他料想，谷樾所以对他不即不离，其根本原因在于有一个边岩梗在他们中间。谷樾可不像嘉桦，她是无论如何不肯偷偷摸摸给别人当情妇的。可是奇怪，谷樾今天为什么这样冷呢？

为了试探一下虚实，李忌故意叹口气，说：“我决定过独身生活了，不会有人再爱上我，我也伤透心了。”

“是吗？”谷樾一眼就看穿了李忌在耍弄欲擒故纵的把戏。她为自己这敏锐的眼光而惊喜，她真的好像一夜之间成熟起来了，她也想在生活的舞台上演演戏给导演看看。于是她说：“你这是假话。假如有人狂热地爱着你呢？”

李忌此时可不怎么聪明了。他大概误以为谷樾这是在向他调情和送秋波，他有点忘乎所以了，走近谷樾一步，说：“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我心中有一个叫我寝食不安的人吗？不要同我捉迷藏了，樾，还要我给你下跪吗？”

谷樾恶心得想吐。他当年给边岩下跪求爱时也一定是这样低下的吧？那么他今天在爆竹花下的绝情和冷酷呢？

戏不能再演下去了！

谷樾向门旁闪了闪身，说：“请你放尊重些。我找你真的有正事。我决定辞去你这部戏里的那个角色，好在还没有开拍，没

造成什么损失，你可以另请高明。”

说罢，她拉开房门要走。

李忌懵了头，这打击，比他预想的最坏结果还要坏！她不但回绝了他的求爱，而且连戏也不演了。也就是说，向来对征服女人十分自信的李忌觉得，连挽回的希望都破灭了，这真无异于一桶雪水兜头盖脸浇下来。

愣了片刻，李忌窜上一步，拦住她，又摆出了艺术家的身份：“你疯了？一个搞艺术的人怎么这样不珍惜艺术生命？”

谷樾又回身停住步，说：“我看，还是先珍惜自己的人格、道德吧。”

李忌倒吸一口凉气，半晌才说：“你不要以为天下没有你，我就拍不成戏了，你请便好了。我见过的多了，这一套拿不住人。”

这一瞬间，谷樾突然心头打颤了。就这样告别电影生涯？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

李忌仿佛洞穿了谷樾的内心，他缓和一下口气，说：“你呀，太不懂事了！你根本不理解我的心。我原想，叫你演这一部戏，演红了，我指的是在东南亚，不是国内！我下一部戏，已经同香港一家公司挂了钩，我导，你演，合同一订，你就能拿30万元港币！那时，我们在香港买一栋别墅，搞一个皮包公司，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徒有虚名了……”

谷樾又一次清醒过来。这又要感谢李忌这个生动的教员。谷樾真恨不能上去打他几个耳光解解恨。她咬着牙说：“你这一套去对别人说吧。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但辞了你这部戏，而且从此不再当电影演员了！”

说罢，摔上门走了。她的脚步又轻又快，仿佛是卸下了身上的一坨重载，连吸一口空气都感到是清新甘甜的。这才是真的感受到了解脱的轻松。

突然，她听到了哭声！是女人的哭声。

她惊悸回首，哭声是从野战医院那里传来的，医院门口围了一大群人，有医护人员，也有干部、战士。几个护士扶着一个哭得痛不欲生的老太太。

郭大妈？

谷樾的心如同遭了雷殛，头轰轰作响。难道是郭秀川的病势突然恶化了吗？

谷樾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进人群里去的。她的心几乎凝固了、不跳了！

一张军用帆布担架床正缓缓地从病房抬出来，雪白的被单从头到脚地盖着一具尸体。不，郭秀川没有脚了，那盖着的身躯，是残缺了的。

所有的人都脱去了帽子，闪开。只有郭大妈，还有谷樾，两个人大放悲声，扑到担架旁哭得天昏地暗。担架放到了地下，护士们啜泣着，上来搀扶这一老一少。

一张更加惨白的脸，眼睛紧紧地闭着，眼窝好像塌陷了好多，四周发黑。郭秀川仍旧头裹着臃肿的绷带，戴着特大号的军帽，就这样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伤口的感染太厉害了，大量的补血和输液都没能挽回郭秀川的生命，在败血症的攻击中停止了呼吸。

像所有的烈士一样，像谷樾昨天预感到的一样，一堆新坟，一块洁净的青石碑，挂在碑上的花环……首长、朋友和亲人，站在墓前，想着他生前的种种好处，浸沉在极度的悲哀中。

一切到了结束的时候了，结束的标志就是郭秀川的死！谷樾在哀哀哭泣中不再犹豫、徘徊了，从此结束电影演员的生涯，开始一种虽然默默无闻，但对她来说更有意义的生活。她料想得到，朋友们会反对的，电影界的同行们会惋惜的。但是，她决定了，决不反悔。她没有半点贬低演员生涯的念头，只是觉得，对

于她自己，该画句号了。干什么去呢？去当一块铺路的石子吧，像郭秀川一样，像为着净化大自然和社会的尹兆强那样。也许，西双版纳原始林中有她的归宿。

泪眼中，她看到了边岩，她叫护士扶着她的车子，也赶来为这个不熟悉的烈士送葬来了。她和他生前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可是她和他一样，在国境线那边一样洒过血，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边岩没有什么表情，安静地端坐车中，头微微偏向一边，像是倾听树涛的响声，又像是观察那利剑一样的剑麻。

泪眼迷离中，谷樾也看到了缅寺花丛那边与此间相映成趣的场面。别人未必认得出来，那只是两个影子。可是谷樾从身影，不，从他们心灵的哲学就判断得出来，那是李忌和嘉桦在花间漫步。是啊，他们也许在谈一笔交易，未来即将开拍的影片不是已经没有主演了吗？嘉桦不会不被诱惑的，李忌也不会放弃这种诱惑的；也许，他们的关系还会由此前的路人一下子飞跃成为别的什么，这都不足为奇，一个是只要有新欢就能生活的人，一个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并不计较贞节的人。

啊，这就是生活吗？生活难道应当是这样相映成趣的吗？那些应当得到幸福的人永远都有悲伤，在悲伤和挫折中思索、追求、前进；而应当受到惩罚的人，却心安理得，心安理得地去巧取、豪夺、享乐！这公平吗？

生活的逻辑本来不应当如此，可是又常常是如此。电影艺术是讲究蒙太奇结构的，谷樾是很熟悉的。可是，生活的蒙太奇，却是那样地没有固定的章法啊！

许营营和尹兆强朝她走来，他们没有随送葬的大队回芒街去，三个人留在郭秀川的坟前，沉默了好一会儿，许营营开口问她：“你决定了？”

问得平静极了，平静中似乎带有信不实的口气。她没有马上回答。

尹兆强说：“何苦呢！我看，世上哪一行，都没有当电影明星发得快，只要有一张漂亮脸。你会后悔的。”

谷樾感到受了委屈，滴下泪来。

许营营暗中拉了尹兆强一把，意思是不让他再刺激谷樾。

许营营问：“那么，你想干什么呢？”

“先回到西双版纳去，”谷樾说，“种我的咖啡树，搞人工群落。也许，我重新考大学。”

尹兆强高兴地望了许营营一眼，却故意说：“只有你谈清这样大幅度摇摆的原因，才可以考虑。”

谷樾说：“生活中好些事，只是感觉而已，真的谈出来，可能算不得理由。从空中，到地上，相隔千万里，却又可以说没有间隔。”

她真挚地望着两个朋友。

许营营和尹兆强都会心地笑了。

仰视南国的天空，薄云缕缕，飘走了，远去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

（原载 1983 年《小说界》中篇专辑）

雨燕岛

伟大的的是一个天生的孩子，当他死时，他把他的伟大的孩提时代给了世界。

——泰戈尔

她与亨利·迪南、白求恩同在

南中国海的浪，无风也有三尺。

蔚蓝色的海、蔚蓝色的天，除了有几支白翅海鸥追逐着船儿飞翔，辽阔的大海上只有喧哗掀腾的浪。

这是一条只有五百吨位的小船，全身漆成白色，只有吃水线处画了一条红杠。许多面白底红十字旗在桅索上挂着，和船桅上的国旗遥遥相对。

这是一条属于卫生防治站系统的运输船，固定每月一次开往雨燕岛。

对于船员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愉快的航行。一路上，轮机长、船长和水手们只是机械地、一声不响地干着自己的事情，即使在吃饭的时候，也没有海员们通常那种粗犷的戏谑。

然而，也有例外。

从开船以来，一直站在前甲板锚桩旁的那个姑娘，却是一副充满幸福憧憬的面孔。她长得真美，皮肤是象牙色的，眼窝很深，眼球黑得发蓝，凝思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像小扇子般闪动。她上船的时候，曾引起船员们好一阵议论，有人说她不像医生，倒像是本色演员。

她披着一件米色风雨衣，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有时竟能不变姿势地站上一个小时。她是第一次见到雄浑辽阔的海吗？

这倒不是。她从小是在湿润的海风里吹大的。

她完全没有感觉到水手们投向她的叹惋、怜悯的目光，她像步入天堂的孩子，一切都感到新鲜！

难怪水手们为她可惜、为她不平，她要去工作的地方，在人们眼中，就是流放，不，比流放还要不如！

这一切，穿风雨衣的姑娘仿佛都没有意识到。她的眼神是庄重的，像凝思、像遐想、像要在喧腾嚣叫的海浪中间寻找希望的浪花。也许当年哥伦布驾驶着古老的三桅帆去发现新大陆，会是这种神态吧？

海鸥不见了，它们飞行的圈子只囿于近海，这里是雨燕的领地。栖息在岩岛上的白腰雨燕低低地掠过白沫飞溅的海浪，带着水珠的翅膀一振，凌空跃起，在白漆船主桅上留下几声令人感奋的鸣叫。

姑娘微微翘起头来，啊，白腰雨燕盘旋的主桅上，五星红旗咄咄地随风震响，挂万国旗的绳索上，满眼是白底红十字旗。

啊，红十字旗，这是鼓舞这姑娘驭风远航的风帆，这片帆啊，是怎样升起的呢？啊，给姑娘心头挂起这片风帆的人，早就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可是这帆樯却没有倒……

那是1963年的盛夏，姑娘正处在眼花缭乱的时代。在她面前，摆放着全国上百所重点大学的“宣传图册”。工程师的桂冠

是迷人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称号是叫人心跳的，至于遗传工程学、核子物理和地球物理，这些目不暇接的科学新星，简直在姑娘眼前摆出了银河系一样光怪陆离的星云图。报哪个志愿呢？她所以作难，那是因为她的学业太优异了，所有的大学校门都仿佛为她敞开着，正像她的班主任、语文教师给她题的那首唐诗一样：“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她不是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而是处在人生的八卦街上。啊，令人喜悦而又烦恼的抉择！

每个人，大约都会经历过这样幸福的苦恼吧？然而，一个人后来走上哪条路，却往往违背初衷，姑娘只能归结为“成事在天”，哈，又唯心了！可不是吗？她当初做梦也不曾想到，她会吧“医科大学”四个字填写到第一志愿表的第一格里！鬼迷心窍！是啊，她从小胆子不大，同学抓一颗 28 只瓢虫偷偷放到她衣领里，她都吓得要死，怎么能想像会拿起手术刀为病人剖腹截肢呢？

偶然！大概偶然是构成生活必然的重要因素吧？

都怪那个面目铁青的讲师杨旭初！其实他并不怕人，他的胡子太重，大约每天得刮上一次，于是腮边和下颏便成了青灰灰一片了。

唉，他为什么要讲红十字旗的由来呢？这姑娘不是狂热地屈服于那段故事的诱惑了吗？

那是一次萤火晚会上，姑娘所在的连云港中学请来南北各地十几所大专院校的教授讲师，名曰和同学们建立联系、介绍专业，谁知道他们不是来拉夫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罢了。

教授们真够卖力气的了，竞相登台演讲，没有一个不把自己的学院、专业说成是“科学家摇篮”的，惹得中学生们不断哄笑，也许资本主义国家参加总统竞选的人才肯这样下力气吧？

只有来自遥远南方一所医科大学的讲师杨旭初例外。他有点

笨拙，轮到他登台时，他除了自我介绍外，像个天真的孩子似的说：“最没意思的是学医。整天看到的是愁容，听到的是呻吟、哭泣，可我是在呻吟声中给人以快乐的。没有一颗天使的心、孩子般善良的心，就不要报考医学院。”

大约是反色彩吧？这个惟一没有“自卖自夸”的招生大员反倒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学生。

记得有人问他：“你说学医没意思，你干吗去学呢？”

杨旭初耸耸肩膀，说：“我要当人类的孩子，真的。你们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是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始人琼·亨利·迪南说的。他的红十字标记，像万花筒一样吸引了我，我在这万花筒里每天都能看到美的花、美的图案……”

于是，他讲起了红十字的故事。

杨旭初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国际医务界都要使用红十字旗吗？那正是人们为了纪念人类伟大的孩子琼·亨利·迪南。他生于日内瓦，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家很有钱，满可以过舒适安逸的日子，可他一生都是为别人操劳、奔波的。1859年他来到索尔弗里诺，正值拿破仑第三直接指挥法、意联军对奥作战，这就是有名的索尔弗里诺战役。这一仗，双方死亡4万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大批伤员没有人管。迪南深为震惊，他立即组织当地居民，不分哪方伤员，一律救护。事后，他提出应当制定法律，保障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伤员和战俘，在世界各国创立救护者常设机构，不分国籍、宗教和民族。他的倡议，得到了法国大作家雨果和各界名流的支持，甚至连拿破仑第三都是支助者。这样，在1863年初，日内瓦公共福利会成立了包括迪南在内的5人委员会，同年10月，召开了第一次世界性会议，为了表彰迪南本人和对东道国的敬意，与会代表一致决议，以瑞士国旗为标志，只是图案相同、颜色相反，改为白底红十字，这就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由来。迪南的一生都献给了救护事业，他的全部资产都捐献

给了红十字会，他本人却破产了。1867年以后，他流浪街头，晚上就睡在巴黎里昂火车站的长椅上，他是好多人的救命恩人，可他不向人们索取任何东西。而三年后普法战争刚一爆发，这位差不多被人遗忘的人，又带了救护队突然出现在战场上。1890年，迪南已经62岁了，他在瑞士的海登城为年老无依的老年人创立了一所‘济贫院’，使那些鳏寡孤独者得以度过晚年。5年以后，一位新闻记者发现了他，他已经是‘济贫院’里一个贫困交加的老人了。迪南1910年病逝，人们把他葬在苏黎世的苍松翠柏间，为他在墓前树立一座纯白色的大理石纪念碑，没有题什么墓志铭，只有一幅浮雕，一个白衣战士跪在一个濒临死亡者跟前，在给他喂着生命的甘露。对了，我还应当告诉同学们，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杨旭初没有赞美医科大学的阶梯教室，也没有宣扬救死扶伤的高尚，一切应当说而没有说的，全都融到这闪光的故事里去了。

她，就这样，带着对琼·亨利·迪南的崇拜，踏进了远离苏北故土的南方医科大学校门。

当然，后来就不仅仅是亨利·迪南精神鼓舞她了，她所在的医科大学校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她是白求恩卫校的创始人、白求恩的第一代高徒。是她进一步把革命人道主义思想注入了邵蔚平的脑髓。从此，邵蔚平对自己专业没有产生过丝毫动摇，包括医生们被赶到乡下去的年月。在她看来，只要不把医生囚禁到远离人群的孤岛上，她就有工作的机会、有工作的对象！台风有时能卷走一切，却卷不走深藏在人心灵中的美好信念。

应当说，邵蔚平有点“生不逢时”，她仅仅学完基础课，开了一年专业课，大地一夜间震荡起来，医科大学放不稳一张小小的书桌了。

她没有派，她认为白求恩的战友——女校长是枪林弹雨里过

来的老革命，不可能忽然间成了敌人。当老校长被打得遍体鳞伤、弥留之际，邵蔚平是惟一守在她身边护理的人。她永远忘不了老校长临死前对她的嘱咐：“相信党吧，应当像医生相信白血球能战胜任何细菌一样……”

也因为邵蔚平没有派，自然与初级的、高级的武斗都没有瓜葛，可是任何武斗现场都有她的足迹。她邀集了几个同学，自己绣制了一面白底红十字旗，又绣上了“白求恩医疗队”字样，常常躬身冒着弹雨去救护流血者。

有人说她阵线不清，她不在乎。难道必定要说哪一派是反革命才叫革命吗？

历史被污染的一页终于掀过去了——带着干涸的血迹；新的一页翻开了——也未必是干净的。但她记住了老校长的话，她相信党终究有一天会消灭寄生于自身的毒菌。

1970年4月，也就是一个月以前，她盼到了自己可以拿起听诊器为别人解除疾患痛苦的一天。

她是成绩优异者。医科大学六个附属医院都争相提名留她。

她却报名到“亥·十三号”医疗区去！

没有人强迫她、暗示她，她完全出于自愿。其实，最先跳到台上抢麦克风报名去“亥·十三号”医疗区的，并不是她。她只是悄悄写了个字条，由别人传递上去的。

掌握会场的政工组长邹频一经宣读了她的申请后，全场哗然，应届毕业生四百多人都掉头看她，似乎她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她看得出，那些眼光，有惊讶、埋怨、不平和叹息，也许要好的同学正在心里默默地骂她：“傻瓜，你这个牺牲品！”

是啊，昨天一听说应届毕业生有一个名额是分到“亥·十三号”医疗区时，宿舍、饭堂和校园里像潜伏了可怕的鼠疫菌，人人面色紧张，有人声称，宁可去走“六·二六道路”，当拿工分

的“赤脚医生”，也绝不到“亥·十三号”去！几个要好的朋友惟恐她痴性发作，轮番对她嘱咐：千万不能冲动，千万不能报名，千万……

“亥”，也真别扭，在地支顺序中最末一个代号。而“十三”就更不利了，西方人把“十三”这个号码视为最不吉利的象征。现在竟把“亥”和“十三”两种晦气概念中西合璧地串联起来了！

别人的关心，只是关心而已。男朋友的反对，那是不掺半点水分的。他不相信报名去“亥·十三号”地区是她自己的主意，他要去告状，要告政工组长邹频“打击报复”。

然而，这姑娘却天真任性得像一个孩子，事情就这样定了。

此时她眼前还不时地闪过男朋友谭培华那凄楚哀绝的面影，耳畔还回响着他那接二连三的叹息声。今天早晨，他简直像送亲人上火葬场一样痛不欲生，可她却笑着，一直笑着。这也许是谭培华永远不可思议的吧！爱孩子的人，都千方百计地把孩子拉到膝前，可孩子却喜欢摆脱大人的监护，投向大自然！

咆哮的南中国海像一只硕大无朋的铅色巨釜，好像溶着一锅沸腾的沥青，在人们眼里是黑沉沉的一片。

没有路吗？不，白色小艇犁出来的一条浪花滚滚的涛谷，不就是路吗？“正因为世上本来没有路，才要我们去走，去闯出一条路来”。她记不得这是哪位大作家说的话了，可她感到这话是对的。

她——邵蔚平，在那荒凉的小岛上，也许会失去作为符号的价值，可是奋斗精神，会淹没在汹涌的海潮里吗？不，不会的。

她笑了。从今往后，将与她做伴的白腰雨燕不正擦着她的肩头鸣啭飞翔吗？

人生不是蜡烛

灰云压着海面，海水冲击着云层，像在拼搏。邵蔚平有生以来第一次领略这种大自然的壮观，好像那有力的搏击将给她以巨大的能源似的。

希望的绿色终于从灰云墨海中间闪现出来。那就是雨燕岛吗？它绿得多么可爱！像一块翡翠漂在大海上。为什么要叫它“亥·十三号”地区呢？多么不公平的名字！它为什么不该叫生命岛、希望岛？这岛子很小，据海军一位领水员告诉邵蔚平，小岛是由麻粒岩构成，岩洞里栖着成千上万只白腰雨燕。远在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他就在这小岛上登过陆。不过，雨燕岛是否由三宝太监命名，却没有史料可考。

机器的轰鸣声突然弱下去，海浪声压倒了一切。

白漆船渐渐减速向小岛北端靠去。

大概是因为小岛四周有礁石，船照例在离岸 500 米左右抛了锚。水手们都来到甲板上，有人戴起了面罩。

这时从中舱里走出一个 50 多岁的人，他是省卫生防治站副站长，叫殷榛。

他没有戴夸张性的面罩，麻风病菌远不是原子灰尘散落物，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殷榛的脸阴沉着，像灰色的天空、黑色的海。

分配医生到“亥·十三号”地区医疗站来，是他这防治站长的事。上路前，殷榛同邵蔚平做了一次长谈。尽管医科大学管人事分配的邹频一再声称“她是自愿报名的”，可殷榛仍然喜欢把困难向志愿者讲够，他担心邹频是在用堂而皇之的词句哄骗毕业生，那样，他可能受到姑娘一场眼泪炮弹的轰击。这几年的经验证明，临时变卦的人不在少数。

当然，从前是另一回事了。殷慊是个喜欢回头看的人，一提起话头，总是离不了“50年代那时候”，为这个，他曾戴过“今不如昔”论的帽子，可事实叫他这样看。从前，好些研究传染病的有志青年，争先恐后要到“亥·十三号”地区去实地干几年，研究麻风病的专家杨旭初不就在那里滚过好几年吗？

是从什么时候起，“亥·十三号”地区变得无人问津了呢？那是前年邹频公开批了杨旭初的麻风防治经验，公开撰文说从前治愈的麻风患者都是“假愈”以后，麻风病更变得青面獠牙起来。“科学必须服从于政治”，既然“反动权威”杨旭初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他经手研究的麻风病于是也成了洪水猛兽，重新戴上了帽子，像画了骷髅和两根骨头的剧毒药箱一样。

殷慊重新工作后，再往麻风病院派医生可就棘手了。尽管他一再修改去“亥·十三号”地区的条件，诸如两年为期，定期轮换，发放津贴，给疗养休假等等，还是没有减轻这项工作的难度。一般说来殷慊是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惟有去“亥·十三号”地区例外，待遇越是从优，仿佛越证明那是下等差事，是敢死队。

唉，有什么办法？从前还好些，他可以以组织的名义同要派去的人谈话，那时“组织”两个字，在人们头脑中还是神圣的。现在不行了，这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年代，殷慊在蹲了两年牛棚又走了两年“六·二六”道路以后，刚刚被抽回来主持防治站工作，他惊奇地发现，权威、纪律和道德的指北针仿佛已经磁化、失灵了，他一筹莫展。他真害怕同邵蔚平的这次谈话，尽管医科大学分配她去“亥·十三号”地区，可今后的具体工作却要由他来料理，医科大学从此一身清静了。

有谁能料到，没等殷慊张口，邵蔚平先递上了一份“工作设想”呢？

殷慊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反倒同情起这个姑娘来。他甚至

想，假若这姑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呢？自己会怎么办？舍得放她去吗？

脆弱的知识分子！殷慷竟落泪了，感动的泪，也是同情的泪。去做别人工作的人，倒要反过来接受工作对象的安慰！昨天，邵蔚平对他说：“老站长，您什么都不要说了，您的心情我理解。其实，没有那么可怕。退一步说，不正因为这种病可怕，才更需要我们医生吗？当年东北解放的时候，日本强盗将哈尔滨平房细菌工厂的鼠疫菌逸散出来，已经到了千村绝户的危险关头了，您当时不是挺身而出，同医疗队一起奔赴农安、扶余县疫区去了吗？您那时没有想到自己可能染上鼠疫而丧命吗？”

说得多么好啊！这姑娘连老站长的历史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殷慷不能不大为惊诧。邵蔚平笑了，她说：“您忘了，在斗您的时候，不是有人批您深入疫区是沽名钓誉吗？”

苦笑，只能是苦笑。

然而，这出水芙蓉般的姑娘，是不是同样是带着看透了人生的苦笑去承受这一义务的呢？

至少殷慷是这么怀疑。

她是苏北人，离家千里迢迢，她哄骗父母说自己被分配到南海一个岛上，是保密单位。也真像，“亥·十三号”，古怪的代号！既然保密，那她今后从事什么研究以及日常起居，自然都可以蒙上保密色彩，家里就不过问了。

不过，谭培华找过殷慷，请求防治站先不要让邵蔚平到麻风岛上去工作，他要上告，至于上告的理由，据他说是有人对邵蔚平打击报复。

殷慷相信那有可能。这几年，道德的沦丧，早已养成殷慷对任何奇事都不惊诧的习惯。

但是，他怀疑谭培华能够告得赢。“越是艰险越向前”，这是顶时髦的口号，“亥·十三号”地区是和西藏并列的，邵蔚平不

是和十几名进藏毕业生一道，受过省委书记接见的吗？难道可以说用一个最光荣的岗位去打击报复吗？

天晓得！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怪事，当殷慊有意把“打击报复”的事提起来时，正在收拾行装的邵蔚平只是淡淡地一笑，什么都没说。你既看不出她是默认，也断不透她是否认。

基于这些，殷慊对邵蔚平格外敬重起来，他觉得这姑娘身上蕴藏着一种超人的力量，她很天真，在老站长面前，她把雨燕岛想像得像天国一样美丽。仅仅因为天真的幻想和青年人的向上气质吗？殷慊心底一直是个问号。那天，他把自己几十年来的藏书，拣珍贵的，一齐送给了邵蔚平。邵蔚平像孩子一样抱着殷慊的胳膊跳了起来！

殷慊觉得国家需要邵蔚平这样的人，她居然不受周围环境的污染，保持着一颗可贵的童心！啊，童心，这对一个医生来说，是何等难能可贵呀！

但是，殷慊毕竟担心这女孩子的天真会被污浊的现实吃掉！尽管雨燕岛上有两个医生、一个护士，可是三个人都是外行，原来的医生都被揪斗了，留守者根本不安心工作。不中途离开，坚持到有人去接替，那就算好同志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初出茅庐的邵蔚平能够施展她的抱负吗？

按照惯例，白漆船要在海上停留 24 小时，等待乘橡皮艇登岛的邵蔚平去接替工作，换回两年到期的另一位医士上船，才能返航。

水手已经放下了橡皮艇，殷慊看着水手们把一应食品、药物、病人的家信、衣物和邵蔚平的行李用具搬到艇上，才对邵蔚平说：“走吧，我送你到岛上去。”

然而邵蔚平说：“您不要去了，大船您都晕得不行，橡皮艇更受不了。您还对我不放心吗？我不是孩子呀！”

她笑着，笑得那样天真，在殷慊面前，她分明是孩子呀！

邵蔚平百般不要他送，船上的水手们也都劝他不要坐橡皮艇。于是只好在船舷旁同邵蔚平告别。

一时，殷慊感到有如骨鲠在喉，不知说什么好。安慰吗？这姑娘也许根本不需要。鼓励吗？他又不愿意违心地说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他忽然想起昨天饯行的一幕。那是邵蔚平的一些好同学们为她和首批派赴西藏的同学们举办的，殷慊和医大的几个教授应邀出席。从前，50年代和60年代，殷慊参加过许多次这样的告别会，那是充满激情的，即使你是万念俱灰的老朽，你都会被青年人四海为家的豪迈气概所感染，你会感到无比充实。

可是，昨天的告别，那是令人心酸的。

邵蔚平的男朋友谭培华一直枯坐在角落里，他至少吸了一包烟，眼睛被烟熏得眯着，他和分外平静的邵蔚平形成鲜明对照。据邵蔚平告诉殷慊，谭培华是进藏人员，第一轮检查身体没有过关，学校大概怀疑体检里有什么“小动作”，还有第二轮，听说要到陆军总医院去复查。谭培华大概在恼恨未婚妻的固执吧？他只用无言的沉默来对待。

殷慊忘不了，有一个毛头小伙子给邵蔚平献了一首诗。他有点歪才，诗写得有点像挽歌：

别了，朋友
友情的灼铁正卡住我的歌喉。
我想抖掉身上的灰尘，
却又向世俗乞求。
我要科学的自由，
自由到来时我又害羞。
天使般的职业，
却被涂上了耻辱的污垢。

火热的心啊，
神奇可能化为腐朽？
说什么真理、事业，
太阳不过是他们手上玩弄的小球！
去吧，为那高尚的信仰去吧，
只要还有一丝温热在心头。
是花环，也是花圈，
寄托神圣的事业，
哀挽被玷污的春秋。
去吧，为你的良心，
最荒凉的地方也许获得心的自由！

喝酒，唱悲歌，这群大学生仿佛在度过世界末日的最后时刻。

那首“犯禁”的告别诗里潜藏的芒刺，只要不是傻子，都会感觉得到的。好多人哭了，是伤感别离，还是有感于国家、民族江河日下？可能兼而有之。

奇怪，邵蔚平没有哭，她听了那首诗，反倒笑起来，她端了一杯酒，逐个同人们碰杯，她昂起那副大理石般的面孔，朗诵了一句格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不知道别人怎样想，邵蔚平的朗诵至少引起了殷慷的共鸣。

今天，她高举着人生的火炬到“麻风岛”上来了。照亮死亡的角落，驱走死神，这一定是这姑娘心中的宏大志愿，跟这样的人告别，调子不应当太低。

殷慷用力握住姑娘的手，努力做出笑容，说：“去吧，我没有什么话要留给你，我相信你，愿意多为你做点事情。”

姑娘笑了，天真中略带一点羞涩。她只是低低地说了声“谢谢”，回头望着水手们把药物、食品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在橡皮艇里摆好，才松开殷恮的手，下船去了，没有掉泪，没有激动的高喊，只是举起左手，一动不动地同人们致意。

正是退潮时分，两个船员划着橡皮艇，在浪丛间颠簸着前进。

远了、远了，白漆船上的送行者的脸庞渐渐模糊，她仍然看得清殷恮站在甲板上的身影，他高高地举着一只手，像是检阅三军的统帅，他当年为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散布的鼠疫菌，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工作在疫区，也是这样大义凛然吧！

邵蔚平忽然感到自己进入了童话般的世界，她一点都不感到孤独。

橡皮艇离小岛只有百十米远了，作为医疗站的白石条房屋，高高地耸立在绿阴之上，一面红十字旗在海风中款款抖动，真像建在大海绿波上的灯塔，对一个远航人招手。

邵蔚平要泊岸的小岛，据说有 5 平方公里左右，是个葫芦形，小岛这面是医疗站所在地，大的一端是麻风病患者的疗养区。奇怪，什么时候拦了一道连结两端海岸山的铁蒺藜网？中间有一道铁门，上着锁。在从前，这里从来没有设过铁丝网，医疗站的诊室和消毒室、药房，都向麻风病人开放的，医生有时也进入病区，现在怎么了？怕病人出来造反吗？

她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岛子上的树木了，高大的象牙芒果，绿阴蔽日的棕榈，沙滩上长满了丛生的剑麻、仙人掌之类热带植物。

从前，邵蔚平在大学实习时，到过武夷山区的“麻风村”，建在隔绝人烟的老山老岳中。比起这美丽的小岛来，那可是大大逊色了。

听送她的水手们说，雨燕岛变成“百慕大三角区”一样耸人

听闻，那是早在 40 年代就开始了的。那时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年代，日本人把大批麻风病患者（有的只是麻风病的疑似者）武装押送到雨燕岛上来，不给药物，不给粮食，听凭人们死在岛上。那时，由于日本人的宣传和医学的落后，人们视麻风为洪水猛兽，生怕染上，所以过往的商船、渔船离小岛很远就绕开。解放以后，这里虽然沿袭下来仍旧作为麻风病人的隔离区，但是在这里设立了“亥·十三号”医疗站，定时给岛上病人送粮食、副食品和药品。他们一旦病愈，经过检查，便可以回到陆地上去，这里远没有过去那么可怕了。

然而，麻风岛毕竟不是旅游胜地！两个船员帮她把药品扛到医疗站院里，回到海边去等。邵蔚平脚第一次在松软的沙滩上踏出了深深的脚印，海滩上散布着许许多多闪光的海螺、贝壳，那是大陆沿海任何一个海滩都拾不到的珍品。

那是什么？水母！像一把撑开的透明的伞，在沙滩上轻轻蠕动。啊，它被急流勇退的潮水抛在海岸上了，可怜的落伍者。

邵蔚平向芭蕉树后的石屋看去，那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仿佛是被遗弃的空屋子。

难道汽笛声都没有惊动他们吗？难道那个叫侯云峰的医生不知道他今天将要回到大陆去吗？他是知道的呀！

还有一个青年医生李天候嘛，他怎么也不见？

邵蔚平只好赤着脚踩过烫人的沙滩到石屋去。

没有院子，石屋四周铲掉了红椿木和大叶蒲葵，留下四周的红椿、黑心树不动，成了自然的篱笆墙，倒也别致。黑心树树干很粗，细嫩的枝条都是从粗树干上直接发出来的，样子很难看。看了院子里晾晒着的枝丫，她明白了，这种树绰号叫“挨刀树”，发一茬枝条砍一次，再砍再发，是热带最好的薪炭柴，也自然成了小岛医生们的烧柴。

石屋台阶上晒着一些干鱼，奇形怪状，她多数都叫不上名

来。一只虎皮色的猫叼了一条鱼干，躲到门后用爪子捺着嚼吃。

“有人吗？”邵蔚平站在树下朝房里叫了一声。

应声从屋里跑出两个人来，一个戴着眼镜，40多岁，有点知识分子的斯文劲。邵蔚平断定他就是这里的前任站长、中医医师侯云峰。另一个要年轻得多，又瘦又高，脸色发灰，像是睡不醒的样子。邵蔚平却猜不出他是医生李天候呢？还是护士刘栋？

没等邵蔚平说话，戴眼镜的人先抢上来握住她的手：“你来了？今天船到得好早啊，我以为要到傍晚呢。”

邵蔚平问：“您就是侯云峰大夫吗？”

那人抽出手来，摸着胡子很长的下巴，说：“是的，是的。他是刘栋，李天候出去钓蟹子了。请到屋里坐，海上风浪不小，没有晕船吧？”

邵蔚平笑道：“我连晕海宁都没吃，一直站在甲板上，有趣极了！”

“有趣？”侯云峰有点不理解地望望她，心里想，还有趣呢，呆上一个月，你都会变成傻子的！不过他嘴上没有说什么，他在揣摩这女孩子犯了什么过错被甩到这里。他有点可怜她。男人嘛，吃点苦，还挺得过去；她这样一个娇嫩的女孩子，怎么受得了呢？

东屋，看来是他们三个人的卧室，大约15平方米的地方丁字形摆了3张竹床。看来侯云峰正在打点行李，屋子里乱七八糟，废纸、草屑、烂袜子扔了一地。

侯云峰喊着：“小刘，给客人倒茶呀……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叫什么呢。”

邵蔚平说了名字，催促道：“来，我帮您收拾东西。”

侯云峰说：“不用。都是破破烂烂，除了行李，什么都不想带了。”

刘栋从竹壳暖水瓶里倒了一杯水给她。她咕嘟咕嘟地喝了

起来。

她打开随身背着挎包，拿出一捆信来，拣出两封，交给刘栋，说：“你的信。走前我给你家发了电报，你妈妈给你捎来点好吃的，在橡皮艇里呢！”

刘栋是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他干涩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低头去拆信。

侯云峰说：“小刘是个锯了嘴的葫芦，做饭、挑水、采鲜菜，都是他的活，他是伙夫、勤务兼护士。”

刘栋又嘿嘿地笑了。

邵蔚平说：“船在等您哪。咱们办一下交接手续，您好早点上路。”

“交接？”侯云峰反倒不慌不忙起来。他从兜里拿出一包前门烟，抽出两支，扔给刘栋一支。划火点着，慢吞吞地从窗下三屉桌上拿来几本病例和工作日志，说：“说起来够惭愧的。有什么好交接的？我来这里4年了，替了别人一班，我这中医大夫外行，除了按月把大陆运到的给养、药品转交给病人，再就是每周隔着铁丝网，远远地给病人望诊一次，这也不经常。登记病员情况，谁死了，谁活着，像公安局派出所管户卡一样，千篇一律。还有，他们寄出的信件我给消毒，发走；家属捎来的信件、邮包，我给传递，如此而已，我能交给你的，只有这么一本生死簿子。”

他苦笑了一下，递过一本塑料封面的簿子，说：“你自己看吧，人名下头划了红杠的，是死了的，底下标着死去的年月日；这是不能马虎的，要设法通知病人家属。人名底下画了蓝杠的，是病愈送回陆地的，不多。”

邵蔚平翻了几页，觉得那些底下打了红杠的人名特别刺眼，宛如判决书上被“勾决”的标志一样骇人。她轻轻合上花名册，问道：“有临床病例吗？”

侯云峰又从抽屉里翻了半天，才翻出几本病例，说：“都在这儿了，你自己慢慢看吧。”

这时，刘栋悄悄出去了。

邵蔚平翻了翻病例，问：“最近有痊愈，或者接近痊愈的吗”

侯云峰说：“我正要骂街呢！自从批了杨旭初，好像麻风病也升级了！有些病人明明可以离岛了，硬要‘巩固个二三年’！哼，如今，掌管医疗大权的人狗屁不懂。”

邵蔚平鼓起勇气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邪恶毕竟代替不了科学。”

侯云峰摇摇头，打量她几眼，终于忍不住问道：“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被派到这来的呢？”

邵蔚平格格地笑起来：“我？什么都不因为，我自愿来的，我学的是传染病科嘛。为来这里，我和朋友都闹别扭了，您信不？”

侯云峰有点莫名其妙，也不好再问什么。

这时，刘栋扛着一箱药品、夹着一个纸箱，走了进来。

邵蔚平说：“哎呀，你自己干起来了！等一会儿咱们一起搬。”

“我有劲。”刘栋把东西放下，又跑了出去。

侯云峰说：“叫他干吧，他闲不住。唉，他也是个‘黑五类’，父亲是医学院的党委副书记，罢了官。刘栋原是医学院学生科的干部，被下放到这儿来了。”

邵蔚平愤愤地说：“好啊，他们把这里当成垃圾堆了！”其实，她自己被分到此地，除了她个人的因素，难道没有另外的陷害成分吗？

她站起身来，帮侯云峰拾掇东西。可是侯云峰本人似乎不怎么着急，他只带走一套行李，那些土造的油灯、打鸟夹子和一些医药书籍，他早想到留给他的后继人了。

走出屋门，他抱起咪咪叫着的小猫，对邵蔚平说：“这只小猫也留下给你做伴吧。不用怎么喂的，它会自己捉老鼠，有时候退潮时，它还有本领逮住活鱼呢。”

他苦笑了一下，把猫送到邵蔚平怀里。

他俩同刘栋一起把药品、生活品搬到屋里，侯云峰上了橡皮艇，要走了。

突然，侯云峰又从橡皮艇上下来，踏着浅水奔到岸上，对邵蔚平说：“我忘了嘱咐你：刘栋不用你操心。李天候万一得罪了你，你要原谅他。他……也怪可怜的。”

邵蔚平没有追问什么，她预感到那个没有见面的伙伴可能是个古怪的人。她向侯云峰郑重地点了点头。

侯云峰似乎放了心，又喋喋不休地嘱咐了在什么地方取水，什么野菜可以煮吃……这才又上了橡皮艇。

邵蔚平站在岸上，一直目送着橡皮艇向小船划去。

小岛突然静止了，空气也好像凝固了，她仿佛一下子被摔到另一个星球上，突然被孤寂包围了，心头无比凄惘，她为自己选择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本来是充满信心的，现在却有点异样的感觉。

Leprosy

云层越来越低，南风好像把大团大团的云从高空拉下来，骑着海涛飞。

刘栋仰脸望天，说：“又要来暴风雨了。这南海上，有时雨下得对面不见人，叫人喘不过气来。”

邵蔚平抹了一把汗，担心地问：“李天候到哪儿钓蟹子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刘栋说：“不用管他，你就住西屋吧，是女宿舍。一会儿把

侯大夫住的那张床给你搬过去。”

邵蔚平答应一声，简单收拾了一下，约刘栋到铁丝网处，打开尘封的医疗室。靠墙有两个盛药品、器械的玻璃柜子一字排开，药柜上挂着一把通往疫区的铁门钥匙。药柜里面摆放着氨硫脲、大艾松和普洛嘧啶等药物，更多的是化验用的药剂，如石炭酸复红液、亚甲蓝液和卢戈氏碘液，器械盘里扔着玻璃涂片、手术刀片、止血钳。靠窗有一张木质铝面的工作台，白帘下苦着显微镜、酒精灯。

桌子上积了一层灰！邵蔚平伸出手指摸摸工作台，吹吹手指上的灰尘，对刘栋说：“小刘，咱们来个大清扫怎么样？这应是最干净的地方，不是废品收购站。”

刘栋憨厚地笑了：“本来，这屋子应是天天收拾、消毒的。这一年来，每周六法定给患者诊病时，病人常常不来，他们只派人定期取走大陆捎给他们的衣服、用品和信件……他们信不过我们。”

“让别人相信自己，首先得自己相信自己。”邵蔚平说。

他们舀了两盆水，把工作台、药柜里里外外都擦拭干净，用浓浓的来苏儿药水消毒，这才把邵蔚平随身带来的氨苯砒、二乙酰氨苯砒、氨苯硫脲等药品摆到药柜里去。预备直接送到麻风病人手里的，仍盛在纸壳箱中，堆在门口。经他们一收拾，屋子显得敞亮、整洁多了。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起了雨，粗猛的雨流鞭子似的抽打着窗户。李天候还没回来。邵蔚平说：“咱们去找找李大夫吧！”

刘栋说：“他钓了蟹子，就在海边煮着吃，他总是随身带着酒，喝醉了，就钻到鸽子洞里大睡一场。”

邵蔚平陷入了沉思。这李天候如此怪癖？他明明知道侯医生今天要返回大陆，也不回来告别、送行，未免过于不尽人情。今后，她将怎样同这种人一起工作啊？

不过她觉得不成问题。她从小就是孩子们的核心，连最调皮、最野的男孩子在她面前都服服贴贴，其实她并不厉害，天晓得这里头有什么奥秘！

晚饭以后，刘栋回到东屋睡觉去了，临走又嘱咐邵蔚平不用担心李天候，他会回来的。

邵蔚平闩好门，又用纸垫把门掩紧，这才上了床。

不知什么时候，那只虎皮色的小懒猫蜷缩到她被子里打起呼噜来。

邵蔚平摸了摸小猫软缎子似的皮毛，拿起一本病志来，凑到烛光下看。

天地间除了雨声、海潮声，再也听不到别的音响了。从前，她们医大的女宿舍楼，前临马路，后靠集市，每天深夜都是伴着汽车声入睡，早晨常常是被第一声吆喝“浆汁油条”的叫卖声闹醒的，她习惯了。

现在，她却一下子被隔离了！心里突然感到没有着落。

殷慊他们早已经驾着白漆船冒着风浪北旋了吧？500吨位的小船会不会被巨浪掀翻？唉，怎么没注意呢，他们每个人够分一件救生衣的吗？不要紧的，船上有电台，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他们可以呼叫，湛江海军基地就会出动快艇……胡思乱想些什么？还是想想明天的工作吧！

靠小刘是不行的，他不懂业务。李天候是个什么样的人？

浪声、雨声仿佛把世间的一切都吞没了，她忽然想起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著的《神秘岛》来，啊，多像作家笔下的岛屿呀！若是也像神秘岛一样碰上厄运，整个地沉到海底呢？唉，怎么又胡思乱想了……她没有办法摆脱孤寂，孤寂是一切胡思乱想的发源地。

此时此地谭培华在干什么？他的第二次身体复查结束了吗？啊，时间真漫长啊，再等一个月，下一次白漆船来的时候，才能

看到他的第一封信，但愿别只写寥寥的几行！哪怕他写成一本书，也不会嫌它长的。

床头的蜡烛快燃尽了，蜡泪积了好大一堆。邵蔚平注视着焦黑的、渐渐歪斜的烛芯，忽然又想起了自己当做座右铭的那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她一下子振作起来，开始埋怨起自己来，你难道被侯云峰那副颓然的神态感染了吗？还是你受不了这孤寂、寒碜的环境了？你不是事前预想到了更恶劣的条件了吗？也许，侯云峰、李天候和所有来过这里的医生原来都是抱着雄图大略来的，在现实面前失败了……一起步就走他们的路吗？

她感到震惊、害怕，更感到羞愧。她用力晃晃头，试图把这些压抑的黑影抖掉。

放在桌上的那本花名册，那样刺目，封皮上写着一串英文：Leprosy。

像“亥·十三号”一样叫人不舒服，医生有敏感的第二信号系统反射。

Leprosy 就是麻风病的英文名字。大夫们都不喜欢用尽人皆知的“麻风”字样来书写病志和体察记录，像把霍乱症标明为“B 号病”一样，不过为的是减少一点刺激性。

麻风病并非现代才有，远在 3 400 年前，埃及纸草书和印度梵文佛经里就有了麻风症状的记载，后来随着奴隶贩卖，这种病逐渐传入欧亚大陆。中国古代称它为“天刑病”。既称“天刑”，可见其凶险，似乎是任何妙手回春都无法医治的。可那是人们不得不屈服于自然的时代！

麻风病人的隔离也并非现代所有。公元 8 世纪，瑞士的圣加伦就首创了第一座麻风院。早在公元 6 世纪中国的南北朝时，南朝也设立过“病人坊”，而且文献上有“男女别坊，四时供养”

的记载。

解放前，由于医疗水准的低下，更由于统治阶级根本不关心人民死活，对麻风病只有消极防范的办法，麻风病人受到非人的虐待和歧视。日本鬼子侵华年月，甚至有借口消灭传染病，集体屠杀“麻风村”居民的骇人之举。由于种种历史遗留的原因，好多医生都不愿在麻风病院工作。解放后，人民政府建立了麻风村、麻风院和麻风岛，给病人创立了远离人群的环境，治愈率逐年增高。但是，正当麻风病防治工作日益取得成绩的时候，砸烂“城市老爷医院”的运动开始了，研究麻风病的专家遣散的遣散，改行的改行。1968年，一位医科大学的造反派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麻风专家杨旭初的《麻风临床十年小结》一书是“欺世盗名的骗人经”。经他们调查，杨旭初治好的一百多例病人全是“假痊愈”，这样一来，好多地方掀起了如同围剿血吸虫钉螺一般的围歼战，把过去被治愈的麻风患者第二次强行押往麻风岛。与此同时，曾经在邵蔚平心里点亮火炬的杨旭初，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后来传说他跳海自杀了。

邵蔚平也是目睹麻风患者同亲人生离死别的一幕，才下决心研究麻风病学，向死神挑战的。

那是1965年冬天，她到传染病院实习的时候，医院确诊了一位麻风患者，他是个青年作家，写过一部相当轰动的电影，正是步步上坡的时候，一夜之间，毛发突然脱落，脸上出现了结节性红斑。医生要他马上住院，并且不准他回去取衣物。

他被送往麻风岛的那天，真够凄惨的了，他在玻璃房子里，妻子、女儿在外面，他们连拉一拉手都不可能。他的妻子不过25岁，长得很漂亮，是电影演员呢！

她发疯一般地喊着“不”，一把抱住邵蔚平，苦苦地哀求：“让我陪他去麻风岛吧，我求求你们，他还能写东西，他不能没有我呀……”

邵蔚平心酸得掉泪了。她在医院太平间里见惯了痛哭死者的亲人，她没有一次像这一次这样大恸过。死去的毕竟活不过来了，那是无可挽回的悲伤；麻风病患者呢？活蹦乱跳的一个人，竟要被亲人像送死者一样送走，使一个活人看到作为死者对待的一切葬仪，那真是对心灵最残酷的摧残啊。

这次来麻风岛的前两天，邵蔚平打听到了那位作家还活着，而且顽强地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稿。

邵蔚平永远不能忘掉作家与爱妻生离死别的那一幕。如今，她要到那里去了，她能见到那位还活着的作家，她不忍心不告诉他妻子一声。如果可能，邵蔚平真愿意跑遍全国，按麻风岛上的名册找到他们所有的亲属，假如她能带上所有患者家人的乡音，那该多好啊！

邵蔚平找到电影女演员那天，她正在摄影棚里拍样板戏。她走出摄影棚来会客，邵蔚平几乎认不得她了，春风满面，比5年前要丰满、漂亮，完全不是她想像中的一副憔悴枯槁的模样！

邵蔚平一时噤口，不知应该从哪儿说起。看人家的精神状态那样好，还忍心再揭人家心上的旧伤疤吗？正在邵蔚平犹豫的当儿，一个戴着丝线小帽、穿着对襟开司米羊绒衫的男人走过来：“拍戏了，又会什么客？”

听那口气，不像导演训斥演员，倒像丈夫爱昵地批评妻子。邵蔚平正在纳闷，女演员朝那男人一笑，说：“我们还没有谈嘛……”她很随便地向邵蔚平介绍说：“噢，这是我丈夫，导演。”

骄矜、疼爱，全都溢于言表。怪不得人家说，幸福同悲伤一样，是不能藏起来的呢！5年前这位女演员与作家丈夫生死别离时的悲恸欲绝的情景，同今天比较，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在做戏呢？不得而知，也许都是真的吧！邵蔚平是个姑娘，她实在说不清楚，但她的心在本能地发抖。

邵蔚平连自己的身份都没有向女演员泄露。讨厌的 Lepro-

sy，也许早同麻风病作家一起，埋进了她记忆的坟墓。干吗要掘出尸体让人家哭一通呢？忘却本身不就是快乐吗？

啊，人生真像演戏！她当年不是哀求大夫们批准，一同到麻风岛去吗？那时如果真的答应了她，会是什么结果？她会当爱情的殉葬人吗？抑或是逃走？邵蔚平想不出答案。像作家笔下没有结尾的故事一样，耐人寻味，又找不到标准答案，生活本身就不是工厂生产出来的标准件，作家也无可奈何。唉，痴情的作家也许捧着妻子女儿的照片朝思暮想呢，他哪里知道，生活中人的情操远没有他用笔塑造的那样完美无缺呀！

这是往事了，邵蔚平今天想起来还感到热血翻涌。这件事是决定她走上带有冒险家味道生活的导火线，像当年医科大学的讲师杨旭初讲了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迪南的故事，导致她突然奔向医学大门一样。

邵蔚平又打开了 Leprosy 的簿子查看。在第四页，她找到了那位年轻作家的大名：旷怡。

这大概是笔名，心旷神怡的意思吗？不知道。

旷怡的临床栏里填写着这样简单的几句：结核样型，面部、四肢有边界清楚之红色斑纹，皮肤显著障碍，麻痹（+++），神经肥厚。

他还在写作吗？

不知什么时候，邵蔚平在风狂雨骤的轰响当中进入了梦乡。

生活中有垃圾，也有花朵

雨住了，石屋的檐流水滴滴答答摔在湿地上。云大概也消散净尽，有了月色。啊，多好的月亮！它在水洗般的深蓝色天穹上挂着，一尘不染。在内地，就从来没见过这么姣好、明洁的月！

邵蔚平是被一种奇特的音响吵醒的，声音发自隔壁。是李天

候医生回来了吗？听，那是什么声音？像赤道非洲最原始的打击乐，可那乐器又分明不是皮鼓。

咚咚，咚咚咚咚……声音杂乱无章，没有节奏。

邵蔚平有点害怕，头发根直竖。猫儿好像也很恐惧，本来是睡在她肘弯里的，一听到这怪异的音响，一弓腰，钻到被窝深处去，呼噜也不打了。

邵蔚平穿上鞋，大着胆子走出房门，朝隔壁一看，是一个人！他全身都湿透了，蓬乱的头发一绺绺耷拉到凸起的前额上，月光下显得很吓人，真有点像精神病患者处在亢奋状态。

李天候手里抓着两根缠了脱脂棉的木棒，击打着吊在墙壁上的一口铝锅，看样子他是常敲的，铝锅锅底被砸得凸凹不平。

他每敲一阵，便咬一口摆在凳子上的煮海蟹，喝一口酒。

莫非他疯了吗？

更奇怪的是刘栋，在这种不能容忍的干扰声中，他居然充耳不闻，不恼怒、不抗议，躺在床上不动。

邵蔚平在房门口冷冷地望着李天候，冷峻地喝道：“别敲了！”

李天候回过身来，也斜着看了她一眼：“你管得着吗？”

邵蔚平走过去，夺过“鼓槌”，握在手中，说：“你瞧你的样子，还像个医生吗？”

李天候大概好久没有听到教训了，他反感地说：“医生？哈哈哈哈，我不知道什么是医生，我不过是个流放犯，像当年流放到荒岛上的拿破仑一样。”

邵蔚平说：“拿破仑即使在被流放时，还有雄心！你连被流放的拿破仑都不如！”

李天候怔住，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又漂亮、又威严的天使般的女孩子。他恶狠狠地问刘栋：“那爱管闲事的老猴子走了吗？”

邵蔚平点点头，搭话说：“他本来要等你告别的，可是……船急着启航。”

“去他妈的！”李天候又喝了一口酒，“他早滚一天才好呢，要他等我告别！你来干什么？你不怕我揍你吗？”他一边说，一边怪笑。

邵蔚平皱起了眉头，想了想，走上去夺过酒碗，凑到鼻子底下闻闻，哪里是酒？分明是高浓度的药用酒精。

邵蔚平火了：“你还像个医生吗？喝酒精，敲铝锅？”

李天候圆睁着吓人的眼睛，一步步凑上来，从牙缝里挤出话来：“你活得不耐烦了，想管我吗？这里没有工宣队，也没有军宣队，我可以揍你！”

说着，他真的扑上来，伸出双手，像蟹钳一样合拢过来，要掐邵蔚平的喉咙。刘栋吓得赤脚跳下床来。

邵蔚平急中生智，顺手拿起那碗酒精，哗地照他脸上泼去。

李天候被劈面泼来的酒精呛得打了个嗝，踉踉跄跄地回到房里扑倒床上，很快入睡了。

守着睡相很难看的李天候，刘栋给邵蔚平讲起了他的遭遇。

刘栋说，李天候原是X光大夫，对麻风病本来有恐惧心理，加上社会上习惯势力起作用，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因为他当了麻风医生，他儿子上学没人要，为此，老婆忍痛与他离了婚。他受到这一连串打击，就开始借酒浇愁，破罐子破摔。

邵蔚平好久没有做声。她完全能理解李天候的失态，她知道社会上那股不科学的习惯势力，是怎样连麻风病医生都一起歧视的。这是好多麻风病人有病讳疾忌医的原因。她感到，作为一个医生，在给病人治疗的同时，更有义务向人们宣传科学，消除偏见。可是，谈何容易！这里的权威医生都被关进了牛棚，有的麻风村病人都跑出去造反了，想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样子，不容易呀！

她决定感化他，使他振作起来。她对刘栋说：“不要紧的，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时，他就会变得热爱生活，生活中有垃圾，也有花朵。”

刘栋半信半疑地望着她，没有做声。

李天候整整睡了一天都没有醒来。

邵蔚平由于担心，不得不给他做了诊断，他由于长期过量服用酒精，已经得了严重的酒精中毒症，怪不得他醒来以后，手总是下意识地抖着呢。

邵蔚平吩咐刘栋把带给麻风病人的信件、衣物都打点好，自己则坐到他们的屋子里，同李天候展开了一场相当艰巨的长谈。

邵蔚平向他提出第一条命令是戒酒，尤其不准再饮用酒精。

李天候一直闷闷不语，与头天晚上相反，眼光极为灰暗，时而偷偷瞄一眼邵蔚平，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

“你必须答应戒酒，”邵蔚平重复了一遍，说：“然后我们要正式投入工作。我有好多情况要问你的。”

李天候也斜着眼睛，问道：“你是在可怜我，是不是？我用不着别人可怜，我最恨可怜我的人！滚蛋的那个‘老猴’因为管教我，被我痛打了一顿，你比他抗揍吗？”

邵蔚平说：“不靠人的怜悯过日子的人是有出息的；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人，那是一种堕落。”

大概李天候没想到这姑娘还有这一手吧，他眨了眨眼，说：“好吧，咱们和好，大联合，行不行？但有个条件，做饭、洗衣服、干杂活，都是你的事。”

“那你干什么呢？”邵蔚平忍着气问。

“我嘛，”李天候说，“钓螃蟹、钓鱼！”

“对不起，”邵蔚平说，“我是来工作的，为了麻风病人来工作的。叫人侍候你吗？你即使是个大人物，我也不干的。”

“嗨，挺清高呢！”李天候诡谲地笑起来，“那么，你是真想

在这里当医生了？我劝你别热乎3天了罢！前面是‘死亡岛’，这里是‘死神值班室’，我们这些被生活抛弃了的弃儿，做到这样就不错了。再说，按规定，每星期麻风岛上的人都要在对面铁丝网前出现一次，接受大夫检查的，可他们从来不按时来，他们不需要我们，迟早是死，谁稀罕你这医生？你能根治麻风病吗？

邵蔚平说：“不是他们不需要我们，是他们伤透了心。像你这种大夫，他们要你干什么呢？”

李天候冷笑三声，说：“你别装革命了！谁的罪过？是谁把这里变成惩罚场所？这里既然光荣，造反派怎么不来‘光荣’？你是‘黑八类’，对不对？不然你能到这儿来？过不了两天，你就和我一样了……”

邵蔚平感到受了侮辱，她正色地说：“我和你不一样。我是自己报名到这里来的。”

李天候先是张大眼睛和嘴巴，死也不肯信，继而哈哈大笑：“既然这样，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有什么作为！”

邵蔚平说：“你得配合。”

“好吧，”李天候懒洋洋地看了看墙上的挂历，说：“明天是麻风病人就诊的日子，你站到分界线那里去喊话吧，他们如果有人肯露面，我今后就听你的，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邵蔚平乐了：“真的吗？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李天候答应了。

但是，李天候的话应验了。

第二天，她站在铁丝网前疗养室那儿，向对面疗养区喊了一上午，嗓子都喊哑了，竟然没有一个患者露面。那面树影重重，沙滩上拖着铁丝网越来越长的影子，水鸟儿在浅滩上蹦跶觅食，静极了，真像一座没有高级生命的“死岛”。

她累了、困乏了，坐在海边日光下的礁石上，听任闪着光的浪一阵阵卷上来，打湿了她的裤脚，她真不知如何是好了。是麻

风病人都耳聋吗？不，不会的。是他们对治疗失去了信心，都在那里等死吗？多么可怕！

迄今为止，包括非专业医务人员在内，恐惧麻风，他们之中没人真正了解此时此地麻风村人们的现状，尤其不了解他们被判了“死缓”以后群居的精神状态。不难设想，那里的气氛应当是比监狱还要差的。坐牢的人不尽是死刑犯，有期的盼出狱，无期的盼减刑，冤枉的盼昭雪。可是这里的医疗站都被破坏了，他们还能盼什么呢？默默无闻地挨到呼完最后一口气算是终了。

这姑娘突然萌发了一个此前没来得及想的念头：为什么不能越过这道一米高的铁蒺藜网，越过这道人为的界线，到那边去看看呢？

啊，是冒险吗？麻风病毕竟传染，可是从前的医生们所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

南中国海的太阳真毒啊！仅仅在接近赤道的太阳直射下，在沙滩上待了一天，邵蔚平的胳膊、脸、脚，凡是裸露的地方都被强烈的紫外线烤红了，摸一把火辣辣地痛，像伤口抹上了胡椒末的滋味，只有暂时浸泡在凉丝丝的海水里才觉得舒服一点。

邵蔚平叹口气，双手枕在脑后，躺在烤人的细沙滩上，两只脚泡在水中，任海浪一阵阵冲洗着下半身，漫无目的的仰望着天上的流云和短促叫着飞过头顶的白翼海鸥。

为什么岛上的病人拒绝按时就医呢？是他们甘愿默默地死掉、听天由命，还是对这里的医生失去了信心？

无疑是后者！像李天候以及他的前任那种精神状态的医生，他们会博得患者的信赖吗？

想到这里，邵蔚平感到身子底下的沙滩，好像生出好多小小的芒刺，刺痛着她的周身。不，不能这样！医生扑灭病菌，不是同消防队员不怕大火一样吗？

方才她在心中滋生出来又瞬息即逝的念头又一次席卷而来，

像凶猛的海潮！进麻风区里去，取得患者的谅解，取得他们的信任。

当然，第一步应当是把她的助手李天候争取过来，把乖戾变态的李天候变成一个医生，真正的医生！

邵蔚平从海边走回到石头房子，写了几页日记，然后动手准备上岛的药品、器械。

当邵蔚平去准备晚饭的时候，李天候溜了进来，他发现桌上摊着邵蔚平的日记，就顺手拿起来看。

他震惊了！

邵蔚平有爱人，字里行间透露出她对他那么深沉的眷恋！

不可理解！连她的爱人都强烈反对她到这里来冒险，她为什么执意自愿来呢？她不同于自己，是被流放的角色呀！他原来压根儿就不相信她是“志愿兵”！

啊，她是这样写的：“……朝夕陪伴着心爱的人，也许是一种公认的幸福。可是，人活着只是为了追求这样的低档幸福，未免太低廉、太自私！人活着总得有个目标，有一种奋斗的精神，这是生活的支柱。目标定得越高，越给人以奋斗的勇气。世界上，古往今来，没有一个造福人类的学者、科学家是偎在爱人怀抱里造福人类的……”

李天候觉得浑身发抖，不是冷的，也不是打摆子，他觉得这些在他身上消失已久的力量又像看不见的超声波一样震撼着他的心弦。

再往下看，他更吃惊了：“……我决定了，到麻风区去，我不能勉强李天候同志，如果前面是火海、是疫区，迈出第一步的应当是我！我不怪他，他是个X光大夫，他是外行，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像他这样对生活、对祖国，甚至对我们的党失去信心的人不止一个。太阳有时能出现黑子，可是太阳毕竟是太阳，总有一天，李天候会振作起来的……”

李天候没有勇气看下去了，两汪泪水从他的眼睛里落下来。

自己不也常常自诩为追求真理的人吗？可你只等着别人去盗天火给你，你却从来没有想当钉在狷岩上的普罗米修斯！怨艾和颓唐，曾使他绝望，他仿佛是被上帝遗忘了的子孙，可是她呢？她是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人！

他默默地走到院子里来。

邵蔚平和刘栋已经煮好了晚饭，她对李天候说：“来吧，咱们吃饭。”

李天候坐在石头上突然哭起来。

“你怎么了？”邵蔚平问他，“不舒服吗？”

“你……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好人。”李天候有点哽咽地说：“但是，我劝你……千万别到麻风区去……我是好意。”

邵蔚平明白，他偷看了自己的日记。她沉默着，拿一根树枝拨着火，过了半晌才说：“我决定了。万一我染上病，我就永远留在那边，按时把资料送到你这里，我不后悔，我也不会使你们受到传染。”

李天候哭得更厉害了，竟像一个孩子。听说邵蔚平要到麻风病人疗养区去，刘栋也死活不放她去。

邵蔚平反倒十分高兴。李天候的良心并没有泯灭，人的善良还藏在他心灵深处啊！

第三宇宙速度

“亥·十三号”地区医疗站的钥匙不见了。这把钥匙原来就挂在药柜上，带着铁锈色，邵蔚平一上岛就看见了的。她问过刘栋，才知道那是打开铁蒺藜网大门用的，只有放痊愈病人离开疗养区时，才能打开那道大门，或者是送新患者进去的时候。然而，在李天候上任的4年中，他只有往里送过人，却没有放人出

来过。

当邵蔚平决定越过“封锁线”的时候，钥匙不翼而飞了！

邵蔚平想起昨天李天候的劝告，想起刘栋的阻拦，料定钥匙被他们合伙藏起来了，就一再追问他俩，可刘栋和李天候一口咬死没有藏钥匙。

早饭后，邵蔚平装作散步的样子，到铁丝网前去查看，她想钻过去。铁丝网紧紧抵住地面的岩石，又丛生着密密的灌木，想扒开一个缝谈何容易！虽然有一个传递信件衣物的口子，但人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从两端也休想绕过去，一直延伸到高高的狃岩上，人无法爬上去。

海鸥抖动着翅膀，成群地从对面雨燕岛上飞过来，落到白沫冲刷着的礁石上。

是什么人惊动了在海滩觅食的海鸥？

啊，一个人！

邵蔚平简直像鲁滨逊发现了“礼拜五”一样狂喜。她从礁石上站了起来，向对面瞭望。

确实，有一个人从槟榔树丛里走出来，正一步步向铁蒺藜网踱来。咦，他怎么走得这样从容？竟像一个诗情勃发的文学家，背手走在沙滩上，捕捉着高雅动人的诗句！

邵蔚平举起望远镜。

她的心狂跳起来，她自己都听得见，像大海惊涛拍岸的节奏，猛烈、激越！

那不是有过一面之识的作家旷怡吗？是他，离开了生活的土壤，凭记忆中的养分仍在创作的人！

他的脸孔，被40倍的望远镜拉近了，那是一张带有热带紫外线强光斑的脸，啊，不，会不会是麻风病的“斑纹癞”呢？他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吗？不，充沛的生命力不是蕴藏在他那微蹙的眉宇间吗？

旷怡在沙滩上走着，步子缓慢，像在沉思，也许是作家构思时所特有的吧？他走走停停，有时像忽有所得那样自己点点头。

邵蔚平的望远镜头一直追踪着旷怡平行移动，直到旷怡发现了铁丝网北面的她，远远地站住了。

两个人在遥遥相望。不过旷怡没有望远镜，看不清邵蔚平，他只判断出是个女人，一个从前没有见过的女人来当“死神值班员”了。

邵蔚平双手围成喇叭状，拼命向他呼喊着。

海风把她的呼喊削减到差不多等于零的程度。她看见旷怡走了，走到槟榔树丛小径时，回身向她招了招手。

邵蔚平呆呆地站在礁石上，浪花打湿了她的裤子。她在猜测，旷怡是听见了自己的呼喊回去报信了呢，还是由于多年的失望而远远地逃避了呢？

邵蔚平快速冲到铁蒺藜网跟前，用手拔着热带有刺的芒草、剑麻，手都扎出血了，也没有拔下几棵。她又用手攀压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只能撬出小小的弧度，人无法钻过去。她失望地看看被扎出血的手，眼睁睁看着旷怡越走越远了。

刘栋来了，邵蔚平向他要钥匙，刘栋说没有，他劝她说：“你这是何苦呢？连上级都没有要求医生到麻风区去呀！”

邵蔚平在分界线处差不多待了一整天，她希望能同他们隔着“墙”聊上几句，然后再决定到麻风区后的步骤。

黄昏时分，瑰丽的大海呈现出奇伟壮丽的色彩，再不像她刚来那天一片灰黑了。夕阳轻轻擦着大海的边际向下沉降，波涛一涌一伏，血红的太阳像坐在软弹簧片上似的，一跳一跳地往下沉。

它终于沉下去了，好像它那6 000度的高温烧红了海水，西方的水域留下一片玛瑙似的颜色，而在这片红浪上面成群掠过的，大约有上万只白腰雨燕。

真美呀，大海！人们都说登泰山观东海日出是最壮观的，邵蔚平在日观峰看过日出，那景象比起南海的日落，太逊色了。

人群，啊，人群！

披着猩红的夕照，一群人从槟榔树丛下的蹊径走过来，大约有二十几个人，有男有女，有人竟拿着带天线的半导体收音机，他们完全不像病入膏肓的人，倒像北戴河海滨悠闲的避暑游客！

邵蔚平多少感到震惊。按她的想像，这些人一定是满面菜色，一副病容枯槁的模样，衣衫褴褛，走路都会是霜打的一样萎靡不振，可是完全不是这样！啊，他们一定是旷怡去报了信招来的人群！

人的想像常常欺骗自己。

在此之前，包括邵蔚平在内的所有抗麻风工作者，都把“麻风岛”想像成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绝望之地，那里没有欢笑，没有友爱，没有人的正常感情，有的只是暴戾、仇视、颓废和一切变态的东西……

眼前出现的是奇迹吗？

你看，这些男女穿得整整齐齐，像在陆地上人们过盛大节日一样，面带笑容，彬彬有礼，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手上没有摇着小红本本。他们只是远远地站着，不肯往前来。

啊，穿短袖汗衫戴起一顶吕宋帽的作家旷怡夹杂在人群中，比比画画地像对人们讲解着什么。不，他不是中心人物，中心人物是另一个人，他一脸大胡子，有轻度弯曲，手上提一根歪脚龙竹拐杖，穿着一件没有系扣子的旧西服，没有扎领带，也没有打领结，肚子有几分膨隆，裤子是背带式的，他不大像这个年代的中国人。

这是谁呢？邵蔚平努力回想着写在 Leprosy 花名册上的人名，没有这个人啊？

邵蔚平像看到了变幻在海上的海市蜃楼那样兴奋和不敢全

信。她放下望远镜，揉揉眼睛。不，不是幻影，是真的，那群人在大胡子带领下走着。

忘情的邵蔚平真想扑上去同所有的人拥抱，告诉他们：“你们并不孤独，党和国家没有遗弃你们，我不是来了吗……”

但是，人群走回了茂密的槟榔林里去了。邵蔚平像对着瞬息消逝的海市幻影一样惆怅。

她坐在逐渐变冷的礁石上，痴呆呆地眺望着绿阴葱葱的去处，陷入深深的苦恼中。难道一道铁丝网比长城的阻隔还要险峻吗？不见病人，叫什么医生？

导弹发射场可以用电子仪器监控，给病人治病哪可以长距离遥控？

这簇不久前在她心头点燃的火花，越燃越旺，像一支火炬，猛然间照亮了混混沌沌的夜暗。

万一感染上 Leprosy 呢？密切接触可能使她成为病区的一员，那今生今世再也回不到亲人身边了！她连同父母和朋友们诀别的机会都没有。她还不如旷怡，生离死别的关头还能听见亲人的几声哭叫。她呢，一旦那样，将会像一粒小沙子沉到深深的海底，一点音响都没有，只把无法想像的愁苦和思恋留给陆地上的亲人……不，这太残忍了，不敢想像！

邵蔚平又一次推翻了自己的越轨想法。是啊，生活是有常轨的，获得宇宙速度的飞船，必须冲破地球引力，才能走上宇航轨道。而她，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勇气冲破这种阻力。

那么，就像李天候那样混日子，就像离去的侯云峰那样无所事事吗？

邵蔚平坐不住了，她回到医疗站自己的房间。

刘栋留给她的饭菜摆在工作台上，已经凉了。小猫蜷在床上轻轻地打着呼噜。

第二天，邵蔚平偷偷地写了个字条留下。

天候同志：

生活待我们有时可能是不公平的，这应当留给别人、留给历史去评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祖国培养起来的人民医生，我们自己具有的权利只是两个字：工作。我不想说服你。我只想说，在逆境中没有怨言地奋斗下去，那才是值得的。我到铁丝网那面去了，我明白你们藏起钥匙是好意，我谢谢你们。有机会，可以转告陆地上我的亲人：我很好。但无须提及我进入“禁区”的事。谢谢！

邵蔚平 即日

她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带上药品走了。

刘栋最先发现了邵蔚平的字条，飞一样跑去向李天候报信。

李天候扔下钓竿，从海边跑回来，发现了邵蔚平留给他的便条，发了一阵子呆，从床底下摸出那把钥匙来。

刘栋惴惴不安地问：“你……同意她到那面去？”

李天候跨出房门，说：“即使不给她钥匙，一道铁丝网也是拦不住她的，她比我高尚得多呀！”

刘栋看到他眼里噙着一汪泪水，这可是罕见的。于是，刘栋跟在李天候身后，向分界线处跑去。

当他们追到铁蒺藜网那里时，邵蔚平已经到对面去了。她是用竹竿把铁丝网撬出一个豁口爬过去的，她的衣服被划破了好几处，胳膊在流血，她正伸手拿背包呢。

当邵蔚平发现李天候手里拿着那把门钥匙时，笑了：“你呀，你们俩到底还是把钥匙藏起来了！”

刘栋鼻子一酸，说：“你……骂我们吧。我们也是为你好啊！”

李天候声音低沉地问：“你……铁心要过去吗？”

邵蔚平没有出声，只是庄重地点了点头。

李天候在铁蒺藜网前来回踱了很久，终于说：“我……陪你一起过去吧。”

邵蔚平激动得眼含热泪，说：“小李，谢谢你！我代表人民谢谢你！党没有白白培养你成为一名医生。不过，这次你不能去，你等我的消息，摸清了情况，我会让他们按时过来就诊，尽快恢复医疗站。”

李天候微微地笑了。他们达成了协议，邵蔚平这才背起背包向麻风区走去。

邵蔚平走着走着，心忽然狂跳起来。就这样轻率地闯入了麻风禁区吗？假如爸爸、妈妈知道了会怎么说？还有他——谭培华，他如果在场，肯定会跪下来求她放弃这危险的念头。

可是，在她此时的心目中，杨旭初说的话的分量要远比谭培华重得多。邵蔚平的执拗是谭培华永远要服输的。他答应等她，等她过完两年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他嘱咐她不要大意，要经常消毒、注射卡介苗……

如果现在他知道了自己在冒险，他会怎么样呢？埋怨、心疼，也许还要发一个小小的脾气，他会因为这个宣布同自己断绝关系吗？不会的。平时，邵蔚平并不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女孩子，爸爸就说过她是箭尾鲨的性格，任性、固执，喜欢凶险的漩流！有哪一次口角不是以谭培华的赔罪而告终的呢？

但是，邵蔚平却不打算瞒他。他是医生，他应当比别人更理解自己行动的意义。

她仿佛已经收到了谭培华的复信，他的措词，邵蔚平都猜得到：“你呀，一个不避凶险的小鲨鱼，叫我拿你怎么办呢？既然你已经选择了，那就算是我们两个的共同选择吧……”

这几句台词她太熟悉了。这次她坚持要到“亥·十三号”地区来，经过一番苦苦的谏诤失败以后，上面这几句话不就是谭培

华又爱怜、又无可奈何的结束语吗？

唉，当时，谭培华也说过要同她一起来“亥·十三号”。他说：“万一我们染上了 Leprosy，我们就永远留在那里，做一对互不嫌弃的麻风病夫妻吧。”

这话曾经使邵蔚平强烈地兴奋过，她差点冲动地说出“太好了”三个字。幸而没有说。她不愿意自己所爱的人担任何风险。谭培华是个文弱书生，生就一副结核型体质，只要市区有流行病，什么流感啊、腮腺炎啊、猩红热啊，哪怕是儿童易得的疾病，他都无一例外地被传染上。她感到自己上麻风岛可能没事，他一来就非得上不可。

她拒绝了谭培华的要求——虽然她十分希望他们能在一起。

“死岛”吗？不，这里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挺直纤细的槟榔树上，吊着一团团油绿的槟榔果；盘根错节的菠萝蜜，坠着麻面的、长把鸭梨状的果实；巨大的鱼尾葵，高耸的团花树，还有矮蓬蓬的灌木。那是什么？啊，那不是咖啡吗？不，那不是野生的，那是人工栽培的。那一片是什么？茶林，多像庐山云雾茶啊！

她惊奇了。难道，岛上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还有闲情逸致去种植茶树、咖啡豆吗？他们按时可以得到从陆地运来的药品、衣物和食粮，若讲舒服，他们才是真正各取所需的人们。不高兴，他们可以什么都不做，国家以优厚的待遇养着他们。他们是精神炼狱的贫困者，却是物质财富的富有者。

他们为什么要自己种茶呢？不可理解。

麻风区比“亥·十三号”医疗站所在的地盘至少大几十倍，热带雨林几乎保持着没有开发的原始状态。她走进蓊郁潮湿的热带自然群落中，带有巨大板根的和附有寄生根的叫不上名的树木，攀援着粗大的三叶藤、龟背藤。这里的鸟真多、真美，而且不怕人，它们居然试图跳到邵蔚平的肩头上鸣啭。啊，这无人伤

害的生命乐园，比任何一个人间的动物园都要显得生动！

走出这片原始热带雨林，前面豁然开朗，那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山间盆地，绿树环合，掩映着一片小竹楼，没有风，炊烟缕缕，直线上升、飘散，竹楼前有来往走动的身影。

邵蔚平念书时学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今天莫非是闯进了世外桃源了吗？

她加快了脚步，走到村口一簇竹林前，她碰上了一个老汉，他在牧鹿，不，是麂子。大约有十几头，每头麂子脖颈上都吊着一个木铃，是剖空了瓢儿子的红椿木，走起来发出的响声虽然没有铜铃那么悦耳，却也别有一番古朴的韵味儿。

老汉发现了她，稍稍愣了一下，赶忙迎过来，说：“姑娘，你是新来的吗？不要紧的，你别害怕，麻风没有那么吓人。你看我，10年前来的，那时都说我的病没法治了。你看现在，我都能放麂子了……”

他显然把邵蔚平误当成新上岛来的病友了。

邵蔚平笑笑，解释说：“老大爷，我是新来的医生。”

“医生？”老汉吃了一惊，连忙后退着说。“你……哎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不是拦了铁丝网吗？医疗站的医生不都遭了大难吗？”

邵蔚平说：“我不怕，医生怎么能怕病人呢！我若怕，就不过来了。”她很受感动，麻风岛上的人不但没有因为得了天刑病而丧失了理智，反而更加爱护别人，这是怎样一种道德啊！

邵蔚平问他：“你们这里有管事的吗？我想见他。”

“管事的？”老汉说。“管吃、喝、拉、撒、睡，你找我就行；你问文娱、体育上的事，得找我们旷作家；你问医疗上的事，那得去找杨医生。对了，你还是先见见杨医生吧。”

“杨医生？”邵蔚平很诧异。“你们这里有医生？也是患者吗？”

“他可不是麻风人！”老汉颇为自豪地说。“一个天下难得的好人，他原来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呢。”

“他叫什么？”邵蔚平心里一动，急忙追问。

老汉说：“他叫杨旭初！”

邵蔚平“啊”地一声叫了起来。

杨旭初？就是那个“畏罪自杀”了的传染病专家吗？就是那个给她讲过亨利·迪南故事的大学讲师吗？他难道没有死？而且竟然神奇地呆在麻风岛上！怪不得这里好像隐藏着什么奇迹（她只是预感），原来他是奇迹的创造者！

邵蔚平突然感到脸热心跳。不久前，自己还为到不到疫区来动摇过呢，而这条险路，杨旭初早在几年前就踏过来了，第一个冲破大气层，获得宇宙速度的是他。

邵蔚平像雾海夜航中望见了灯塔，像罗盘失灵后的舵手发现了大陆海岸线，希望的地光在黑暗中闪现了。

她跟着放鹿子老汉，恨不能马上见到阔别多年的杨旭初。

灵魂中稀有元素的能量

热带特有的爆竹花爬满翠绿色的竹楼，垂挂下来的成串的花朵，真像正在炸裂的爆竹。

竹楼前，有一个人拿一把蒲葵叶扇子正在扇火炉，缕缕青烟送过来一阵阵浓烈的中草药气息。

那个扇火熬制中药的人就是杨旭初吗？他扎着一条围裙，赤着背，腰有点弯曲了，浑身晒成古铜色，一把弯曲的大胡子飘洒在胸前。

啊，是他！

“杨老师！”邵蔚平轻轻地来到他面前叫了一声。

杨旭初慢慢地抬起头来。

啊，他苍老多了，面目清癯，皮肤黝黑，配上大胡子，比从前要老上十几岁，可是精力却过人地旺盛。他无论如何认不出他的学生了，但从装束和精神状态上判断得出，这不是新来的患者。

于是他问道：“你从哪里来？分界线那边吗？”

邵蔚平说：“我是刚到医疗站来的医生。”

杨旭初复又低下头去熬药，淡然地说：“哦，你怎么心血来潮破了常规，过这边来看看呢？”

邵蔚平感到像被别人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那么难受，怔了半晌，才像负疚似的喃喃说道：“您批评得对……我这不是来了吗？”

杨旭初那双有神的眼睛又在她身上打量起来：“那么，你是过来探险呢？还是……”

邵蔚平说：“和您一样……”

杨旭初站起来，他一步一步走到姑娘跟前，突然双手抱拳，接连拱了几拱，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然后顺手拿一个矮脚竹凳放到她脚边，抓起竹楼梯子上的一把大砍刀，走到竹楼一侧去，左手压弯一根竹子，右手用力一挥，砍下一节竹子来，削去一端，恭恭敬敬地捧给她，说：“喝一点水吧，这是绝对没有污染的。积在野黄竹竹节里的水甜得很呢！”

邵蔚平头一次听说竹节里有水、能喝，试着尝一口，果真凉爽、甜丝丝的，任何泉水都比不上，她笑了。

杨旭初爬上竹楼。房檐底下吊着一只竹筐，他把筐摘下来，放到邵蔚平脚下，里面盛着几种水果，除了香蕉是她认识的而外，那几种她见都没见过。杨旭初拿起一个大个的像柚子似的水果递给她，说：“这叫龙果，又甜又酸，小的是藤黄果。吃吧，我是没有 Leprosy 的，你不必担心。”

邵蔚平告诉他，她是听过他讲过亨利·迪南的故事立志学

医，后来，又受了白求恩精神的教育，要求分配到这麻风岛来的。

“这么说，你是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了？”杨旭初问。

“我听过您的大课。”邵蔚平说，“可惜，您主讲的专业课要在5年级上半年才开，我没来得及听……”

“啊，是呀，”杨旭初有几分凄楚地说，“在我应该在的地方，我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在别人认为不可能落脚的地方，我却找到了乐园……”

“杨老师说的乐园，就是这麻风岛了。”

“是的，”杨旭初说，“你有勇气走过来，很好。过去，人们以为这里是人们排号等待领取死亡通行证的地狱走廊，有些患者酗酒、斗殴，也是精神的崩溃症，并非麻风病本身的后果。”

他一边说，一边整理各种晾晒的草药。

邵蔚平问道：“根据国外研究成果，采用利福平治疗麻风，效果很好。”

杨旭初点头：“氨苯矾类药物当然有效，不过长期服用，毒性太大，对肝脏损害大，容易造成贫血。我仍旧坚持辩证施治，用中西医结合法。我弄了一种杀风丸剂，你看，这是药的原料。”

邵蔚平抓起几种药草，她认不太全，只能辨出白蒺藜、全蝎、苦参、全蛇皮、胡麻仁、大枫子、防风、川牛膝等几种。

她说：“您是用以毒攻毒法吗？”

杨旭初点点头：“在这里只能就地取材，像珍贵的麝香、何首乌等，就没办法搞到，只能找药力相近的代用品。”

邵蔚平说：“您放心，下次来人，我就叫他们把各种中药弄齐送来。这次我带来了少量的利福平。”

第二天早饭后，杨旭初对邵蔚平说：“随我各处走走吧。你能到麻风区里来，值得提倡。别看是一道铁丝网之隔，越过它，可要有点勇士的气概，孩子的天真啊！”

走出杨旭初的小竹楼，她碰到的第一件新奇事便是分麋子肉。岛子上没有猪羊，大陆运给他们的全部肉食都是罐头。他们自己养了麋子，这就有了毛皮和鲜肉。养麋老汉同一个中年人抬着切成块的麋肉，挨门挨户地送。

其实，每一“户”都构不成家庭，都是单身男女。

他们把两份好的交给杨旭初，说：“您跟新来的客人的。”转身走开。

邵蔚平觉得有点像进入了神话王国。古小说《镜花缘》里描述的“君子国”不就这样理想、和谐吗？

她忽然想起了那位作家，就问杨旭初：“旷怡住在哪里？他好吗？”

“他嘛，”杨旭初风趣地说，“他是我们岛上的‘文化部长’呢！我们这里收音机倒有不少，除了《沙家浜》就是《红灯记》，都背得下来了，听厌了，想换换口味，几次捎信给防治站，要点书看，一本小说也没有捎来。当然喽，作家都去放羊了嘛……”

邵蔚平问：“旷怡还在写作吗？”

杨旭初说：“一直在写。读者可不少。没办法付印，只有手抄本在岛上流传，人人都喜欢。他写的东西，有的是直接反映岛上生活的，有的是写陆地上的。别看他身患痼疾，写出来的作品可是真美呀！走吧，你穿上防护服，我带你到咱‘文化部长’家去做客。”

拐过一带葵林，现出旷怡竹楼的一角。

旷怡的居宅要算是麻风岛上最堂皇气魄的一所了。竹楼高爽，绿阴笼罩，窗子宽大，阳光充足，只是没有玻璃，是用透明塑料薄膜蒙起来的。他的院子也特别大，既像果园，又像热带植物园，门前屋后到处是象牙芒果、人心果、油瓜、荔枝、菠萝蜜和椰子林，屋后还有大约十几箱蜜蜂。工蜂嚶嚶地飞过竹楼来往采蜜，这所竹楼显得安静、幽雅，很像王维、孟浩然诗中的田园

风光。

旷怡披着衣服，背向房门正伏在条桌上写作。他仿佛没有听到脚步声，大概正在忘情地构思什么情节。

杨旭初说：“旷怡，你看谁来看你了？”

旷怡转过身来，打量一下邵蔚平，站起来，微笑着同她抱抱拳，说：“对不起，习惯了。雨燕岛上的人，因为你所知道的原因，握手的礼节是自动废除的。特别是对你这来自人间的人。”

邵蔚平坐到一张竹椅上，说：“我也应该算是这个岛上的人。”

旷怡摇摇头，说：“不会的。你骗不了我的眼睛。久病成医，我也有个半仙之眼了，看看你的眼睛、脸色，就断定你没有 Leprosy 哦，我见过你，昨天在分界线对面，是你站在礁石上吧？”

邵蔚平笑着点了点头。她望着旷怡，额头已经有了几条深深的皱纹，鬓角也出现了少许的银发，他同 5 年前有了很大变化，他衰老了，尽管他满意岛上的生活环境，难道就会忘记人烟稠密的陆地？会忘却临别时痛不欲生的妻子、女儿？

啊，平静的海水底下，总是隐伏着漩流的。你看，南面墙上不是挂着好多照片吗？那些照片因为时间过久和受潮，褪了颜色，已经发黄了。那漂亮的女人，不就是他日夜思念的妻子吗？那活泼的小女孩不就是他的女儿吗？他说不定每天要几十次、几百次地凝视这些带着往日幸福的缩影呢！

她猛然想到了几天前在摄影棚里见到旷怡妻子的情景。啊，不，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她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幸福对于她来说，像午潮退去还有晚潮到来一样，只是短暂时间里的事情。

怎样把这消息透露给他呢？告诉他，你的妻子早把你遗忘了吗？不，不，那太残酷了。何况他并不认识我。

杨旭初却说开了：“邵医生上岛第一个就问起了你，看来作家还是受人尊敬的。”

旷怡问道：“邵医生原来就认识我吗？还是只知道名字？”

“不，我不关心小说，不喜欢文艺，”邵蔚平有点慌乱地解释说，“我只是从病员花名册上查到，您是一位作家。”

旷怡轻轻叹了口气，好像十分失望，说：“我还以为你能给我带点什么消息来呢。她一定是病着，或者受到了什么磨难，听说好多名人不都被关起来了么？不然，她会每星期都写信给我的。啊，有两年没有音讯了……”

说着说着，旷怡眼中涌出了泪水。

邵蔚平差点陪他掉下眼泪。她没有勇气把真情告诉给痛苦的旷怡，他承受的肉体折磨已经够多，难道还不应当让他心海中存活一点美好的记忆吗？

千不该、万不该，杨旭初出来帮倒忙，他对邵蔚平说：“你不知道他爱人就是罗方舟？咱们市一流大明星啊！她演过好多电影呀！”

邵蔚平赶忙遮掩地说：“名字好像听说过。我不是影迷。若是上岛前知道这层关系，我说什么也去看看她。”

旷怡一点不怀疑，像当代人不怀疑地球是圆的一样。他抬起深情的眼睛，望着蝴蝶飞旋的竹窗外面，喃喃地说：“是的，她只要处境好，她会写信给我的，她见了你，说不定会大哭一场，甚至会哀求你把她带到雨燕岛来，当年她就这样向医生们要求过。可是，为什么要叫她再痛苦一次呢？你幸亏没有去见她，这样更好些。否则，她将会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我想她、想孩子，这两年我总共写了几十封信，可是一封都没有寄出去。”

邵蔚平不忍心再涉及这个话题了，就问起了他的病情，还亲自为他做了检查。

据杨旭初告诉她，旷怡是属于用了中药以后病势明显好转的

一个，但要痊愈，还需要一段时间。

他从云端摔下来

3 个月的时光过去了。这 3 个月对邵蔚平来说，是宝贵的，铁丝网拆除了，杨旭初同他们一起振兴了医疗站，他们人手虽少，却办得挺红火。

这期间，邵蔚平几次利用班船到来的机会，给省防治站的站长殷慷写信，要求调药品来，要求放医生回来，特别是矫形外科医生是当务之急。药品是运来了，医生落了空，用殷慷的话说：“清队高潮，抽不出人来。”

这一段时间，她对岛上的几十个患者做了详细的检查，她惊奇地发现，杨旭初研制的中药具有显效，40% 的人明显好转，有 8 个人达到痊愈，完全可以出院了。而完全没有疗效的人只占 10% 左右。

邵蔚平用余暇时间浏览了杨旭初积累起来的近 300 万字的资料、数据和临床总结。她万万没有想到，麻风病研究所几十年的成效还不如杨旭初一个人的大。假如她有权，她真想把诺贝尔医学奖金授给他。

是啊，杨旭初为了什么呢？他没有工资、没有学位、没有名誉，甚至他都不如一个麻风病患者，他在人间连户口都没有。没有人知道他还活在世上。

杨旭初没有挽留过她，可他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的背后，都使她感觉到了那执著的挽留。她一直处在新的矛盾当中。

前几天，她又给李天候写了一封信，把她经过检查、确认为已经痊愈的病人名单抄录下来，要李天候迅速报上去，让他们离岛出院。

这天下午，她给病人看病回来，发现好多人往大、小岛交界

处跑，那里出了什么事情吗？莫非大陆又送来了新患者吗？

邵蔚平记得杨旭初告诉过她，每逢有新患者到来，都被麻风岛上的人视为盛大的节日。

邵蔚平跑过去，看见那低着头走过来的人，惊得后退两步，差一点叫出声来。杨旭初问她：“你怎么了？”

邵蔚平盯着新患者那张脸，像见了鬼一样恐怖。

“哦，”杨旭初问她，“莫非你认识这个人？”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这不是医科大学这几年步步走红运的政工组长邹频吗？

他，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在邵蔚平的印象中，这是个很潇洒的人物，脸上从来都漾着笑意，包括他宣布别人为专政对象的时候。有人说邹频生就一副笑面，而谭培华却说他是天生的笑面虎。

那副油光发亮的胖脸，会这样快就出现麻风斑吗？当然有可能，南方湿热，是麻风疫区，更何况韩森式杆菌可以在人体内潜伏3到5年才发作！

为什么不把邹频放在陆地就近的麻风村去隔离治疗？他难道已经是晚期结核样麻风患者了吗？或者是开放性瘤型患者？怎么有点不像呢？当然，毛发脱落是晚期患者的迹象，可是其他征兆呢？

在邵蔚平发怔的时候，杨旭初拿过一页病历卡片，说：“先把他安顿下来，过些天再为他检查，等那边送来病历才行。再说，刚送来的病人往往处于精神崩溃状态，叫他安静一下更好，反正这种病又不是急需抢救的。”

说罢，他吩咐养鹿老汉把病人送到新病人住的竹楼里去，并安排人轮流守候他几天，按时给他吃安定片就行了。

邵蔚平看见杨旭初在病历卡上写上了“邹频”两个字。她大吃一惊地问：“您怎么也知道他叫邹频？您……难道您认识他？”

杨旭初的嘴角在密麻麻的胡须里动了动，那是苦笑，他说：“我……怎么会不认识他呢？是医疗系的同学，从前是朋友呢。你懂得“朋友”的含义吗？没容邵蔚平回答，杨旭初自己讲出了他们这对朋友的经历。

邹频是个绝顶聪明的青年，他多才多艺，会娴熟地玩好多种乐器；会设计《医学周刊》的封面；在联欢晚会上朗诵起郭小川的诗来，催人泪下；在1954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他是蛙泳冠军。就是专业课，他也学得不错，常常在学刊上发点豆腐块文章，虽然称不上学术专著，毕竟出人头地，在同届学生当中，他是天之骄子。

毕业以后，他们都以优异的学业成绩留校当了助教。不过，邹频却走了另一条路，先是当系教师支部书记，由兼职到专职，后来提拔为系党总支副书记，一直干得很红。

在人们都响应号召订10年规划的年代里，大概邹频觉得吃政治饭不那么光荣，也想向博士殿堂进军，他又去找杨旭初，想要同他合力搞传染病学的研究。杨旭初此前已经出过一本书，小有名气了。

杨旭初同意了。

1966年5月，他们处于半地下状态的研究成果出来了。其实，邹频充其量是个助手、资料员。

在论文刚刚脱稿，正要寄往医学杂志发表时，一场最先扫荡大学校园的风暴来临了。他们暂时都无暇顾及论文的事了。

两个月后，杨旭初震惊地看到，那篇题为《遗传因子与传染病学》的论文在杂志上登出来了，只署了邹频一个人的名字。他差点气得昏过去。

刊物发表这篇论文算是一个画句号的时间，他们的友谊也从此画上了句号。不等他抽出空来去找邹频算账，在当天全校揪斗黑帮大会上，戴上红袖章的邹频一个字条传到台上，杨旭初就被

戴上了高帽，他比那些早些时候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教授们还要罪大恶极，因为字条上揭发他私下里议论“文化大革命莫名其妙”！

是对杨旭初的诬陷吗？不，不是。

他真的说过，在邹频家里喝酒、吃花生米时说过。

后来，杨旭初顺理成章地被批倒批臭，以后就被押送到白漆船上服苦役，来往于陆地和“麻风岛”之间，给“亥·十三号”地区的麻风病人运送给养，他瞒过人们耳目，“跳水自杀”，悄悄爬上了“麻风岛”，开始了新的生涯。

杨旭初做梦都不曾想到，令他鄙夷的邹频会和他相逢在“麻风岛”上，真是冤家路窄！杨旭初不愿意让邹频认出自己，所以他破例地戴起面罩来接待这位新病人。当然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但此时他在心里称快，这是敏锐的邵蔚平一眼就看出来的。

她悄声问道：“杨老师，您感到很解恨，是不是？”

杨旭初没有遮掩，说：“大概是。这可能是正常现象，让我不恨他，暂时还不可能。我也是人。”

咀嚼着杨旭初的话，邵蔚平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自己不是同样感到解恨吗？那么谭培华呢？他如果听说邹频得了不治之症，被永远送到荒凉的地方无法再危害别人，他一定会邀集朋友们喝酒庆贺一番！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呢？现在怎么办？他，是仇人，又是患者，自己厌恶他，却又是医生……

这种思绪一直占据着她的心，堵得满满的，一直延续到半个月后为邹频会诊复查的时候。她是多少带一点幸灾乐祸的心理来到邹频竹楼的。

邹频明显地憔悴了，那样子像个久坐监牢的囚犯。

邹频身上确实有细鳞屑状斑块皮疹，是与肋骨走向平行的，这很像一般的玫瑰糠疹。用针尖刺痛，没有感觉障碍，也没有神经功能障碍。

杨旭初说：“进行组织胺试验。”

当邵蔚平将组织胺注射液推入邹频皮下时，10 秒钟后出现红斑；再过 10 秒，围绕第一个红斑出现继发性红斑，最后中央形成风团。

两个人惊异地对望一眼，这种三联式红斑反应，是正常人毛细血管扩张和血管扩张后血清渗出所致，没有病人的症候呀！

再注射微量毛果芸香硷，发现了汗滴，现出紫蓝色，汗腺也没有障碍呀！

杨旭初好像很生气，摊开一块自制的活页本板夹，夹上一张病历用纸，好像十分艰难地在诊断栏里写上了“玫瑰糠斑疹”几个字，后面划了个很大的“？”号。

从化验结果来看，邵蔚平也只好同意他的诊断意见，邹频皮肤创面的病理切片放到显微镜下，没有发现麻风杆菌！

邵蔚平小心地问道：“可是，脱眉毛、脱发，总是一个征兆啊！”

“不。”杨旭初在海滩上走来走去，说：“得麻风的人可能掉眉毛，但逆定理是不存在的，你能说凡是毛发脱落的人都是麻风病吗？”

是大陆医生的误诊吗？难道没有经过化验吗？这事实在有点蹊跷。

当然，粗心的医生是有的，可这不是误把麻疹说成感冒，这可能是宣判了一个人的“终身软禁”啊！

邵蔚平觉得，这种荒唐事发生在别的患者身上，那是可以理解的，发生在医科大学政工组长身上，就有点不可思议了。邹频是上下左右都有关系的人，据邵蔚平知道，由纺织厂女工一跃成为省委副书记的那位，同邹频的关系就不一般。前不久，还有风声说邹频将就任省卫生厅厅长哩。

他这样一个红得发紫的人物，即使有哪个医生“判决”他染

了麻风，上面会不集中起所有传染病专家搞一次会诊吗？一个医生误诊，大家都会误诊吗？

这真是一个谜！

“现在怎么办？”邵蔚平问杨旭初。

杨旭初果决地说：“先把同别的患者隔离开来，再观察几天。同时要给省防治站打报告。你不是说殷懋还管点事吗？这个人我了解，够得上一个正直的布尔什维克。好吧，你写报告，要批评这种马虎的医疗作风！”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起初，邵蔚平并不认识邹频。她只知道他是个有头有脸的老师。至多，邹频在一些集会场合多看她几眼。这已经习惯了，一个女人长得漂亮出众一些，连老头子们都喜欢多看几眼，不分老幼，追求美的享受不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天性吗？

邹频同邵蔚平的接触，是从一次极为偶然的事情开始的。不，说是偶然，不过是从前的印象，现在想起来，那分明是邹频的巧安排。

1969年初，大学政工组给系党总支派下来一个任务，说英国有一批医学界人士来访，要找一个大学生谈谈话。人选由系里提，应选者的条件当然照例由政工组定。

说实在的，那人选的条件真有点苛刻，以至于系党总支书记（是工宣队长兼的）都说：“好像在选妃子、找舞伴呢！”

名目繁多的条件，当然“突出政治”、“拥护文化大革命”是前提。不过这两条最好过关，只要不是隔离审查对象，都可以说合格。学业要优异，这也好选；一定要女同学，这也不难；惟独后面几条有点离奇：身高要在一米六五左右，外貌要漂亮不失国风，要最高年级同学，要对传染病学有研究的，要政治上非党非

团的。最后一条有个括弧注解，说是非党非团的同学更能对外国友人具有说服力。

系工宣队长指令政工组的5个干事查阅一天学生档案，又找熟悉学生状况的舍监老师了解，本来是大伤脑筋、认为海底捞针的事，居然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那人选的各项条件，宛如像是按照邵蔚平的尺寸下达的订货单一样准确，没有误差！

当邵蔚平按指定时间到车库坐进黑色上海牌轿车时，发现政工组长邹频早坐在后座上了。他向司机挥挥手，说了声“天香宾馆”，便伸过头来同邵蔚平搭讪。他说：“我是你的随员，充当翻译，我大致拟了个谈话提纲。当然，谁说话都不可能一字不漏地照本宣科，可是同外宾谈话总是有个准备好，有些外国人调皮得很，专门问些没法回答的问题，他们好从中找到一点乐趣。”

邵蔚平从他手上接过十几页谈话提纲，在车上看了几遍，大体记在心里，才放了点心。说真的，她是硬着头皮来的，谭培华就主张要她推掉这个并不美的差。他说：“北京有两位老画家，在接待归国来访的老朋友时，因为发了几句对文化大革命的牢骚，捅了大娄子。他们的老朋友回到日本后，以《祖国今日观感》的题目发了一篇文章，为老朋友们不能继续从事水墨丹青事业的苦恼大大感叹一番，这可苦了两位中国画家，一下子给定了‘里通外国’的罪名。”

邵蔚平何尝愿意出这个担风险的风头？天知道，怎么会相中了她？

不去是不行的，她推了三次，被批评了三次，她只好从命。

人真怪，你越怕出事越出事。

那天在同英国皇家医学学会的5位博士交谈中，尽管过分拘谨的邵蔚平几乎是照报纸社论口径谈话的，还是险些出了大事故。

大概洋人也不那么好唬，一个调皮的遗传学博士笑着问她：“你们平时也是说报纸语言吗？譬如在餐桌上、在同情人拥抱的时候？”

她脸红了，很紧张地盯着坐在侧后方的邹频，这可是个棘手的问题。答案是事前绝对没有想到的，这是个突如其来的怪题！她心里一慌，脱口说道：“那当然不是。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丰富多样的，绝对不会因为政治信仰的不同，而毁灭这些美好的追求。”

能说她答得不得体吗？但是得体不等于符合当时的口径。

邹频真是个随机应变的才子，他在口译邵蔚平这番话的时候，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样子：“我们的感情、爱情都是建立在共同政治信念的基础上的，离开革命的大目标，活在世上是没有意义的。”

邵蔚平英文口语会话能力远远不及邹频，但却能大致听懂，听得出邹频谈笑风生地、若无其事地篡改了她的原话，一点破绽都没有。

外国友人大概觉得这种“革命感情”实在不好理解，耸了耸肩膀，摆了摆英格兰式的骄傲。

邵蔚平出了一身冷汗，回学校时，一副沮丧气。邹频板着脸孔，几乎一路没有开口。

到了学校，邹频步下汽车，冷冷地说：“跟我来。”

她敢不去吗？连她自己都感到是犯了不可饶恕的过失。

她被带进了政工组长豪华的办公间。“文化大革命”前，这里是校长助理办公室。而今校长和校长助理的名词早都扫进垃圾箱了，早已人事皆非。

她局促不安地站在屏风前头，等待政工组长冰雹一样袭来的批评，她做好了准备，只要不把这事弄大，她就念佛了。

邹频没有发火，这真奇怪！

他像埋怨小妹妹那样说：“你呀！你怎么搞的？幸亏今天外办的人没有在场，否则还得了吗？最轻要说你攻击社会主义、人性论……你愣着干什么？坐下嘛！”

邵蔚平侧身小心地坐到沙发上，邹频给她倒了一杯水，扔进两块方糖，安慰地说：“这件事从现在起就过去了、不存在了，我不要再提起，你更不准向任何人泄露，万一有人知道，那连我也救不了你啦。”

邵蔚平真感激他，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谢词，就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邹频似乎还不放心，又一再叮咛：“你对谭培华也不要讲，他虽是你的朋友，也不能全抛一片心。这场文化大革命，你还看不到人心吗？人有几个是忠诚的？妻子揭发丈夫、出卖朋友，还少吗？你记住，能不叫第二个人知道的事情，就永远叫它烂在心底。”

邵蔚平多少有点惊讶。从前，在她看来，像邹频这种人，不同于充满呆气的杨旭初，好像他们浑身每个细胞的细胞核，都是由特殊的政治材料合成的。可是你听他今天说的是什么？不是有点“那个”吗？

但是，她仍然感激他。

天已经很晚了，食堂早已经封了灶，邹频不容置疑地说：“走吧，吃点饭去。”

这是邵蔚平本来不大愿意的。她能把握自己，她也相信邹频没有什么邪念，她只是不愿意叫别人讲半句闲话，尤其怕被谭培华误解。他是一个嫉妒心过强的人，常常因为她同别的男同学在一起讨论论文或散步，他会找上门来发无名火。他不隐瞒观点，公开说：“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大公无私，惟有爱情是自私的。”邵蔚平内心未尝不承认这个普遍公认的情理，纯粹出于恼气，常常故意气谭培华，故意邀别的男同学一起玩，惹得谭培华生气了，

她还要说：“既然你不放心，就各走各的路，我不是属于你私有的！”这句话是杀手锏，只要她使出这一招，谭培华立即屈服，承认自己过于偏狭，要求言归于好。这种真真假假的吵闹，有时也是爱情生活中一种常见病，甚至是乐趣。

年龄一天天大起来，怄气没意思了，她除了办事执拗而外，叫谭培华挑不出别的毛病了。

她觉得没有必要同邹频一道去吃饭，可是推却别人的好意，那会伤了人家的面子，甚至会使人多心。

于是，她同邹频吃了一餐海滨聚英楼的海味席。

事后，邵蔚平把接待外宾的始末全都告诉了谭培华。他同邵蔚平一样，由衷地感激邹频，把他当成良师益友。惟有邵蔚平同邹频接触，不会引起谭培华的半点猜疑。

在生活中有两种利己主义者，一种人投出一把米，马上想逮住一只鸡，他们不那么高明的手段，明眼人一看便知，不会上当。而另一种人就高明得多了，放长线钓大鱼，等到水到渠成，才肯下手，他们引而不发的一手，有时聪明人也要被迷惑。

邹频无疑是属于第二种人。

他有一种让女人在他面前逐渐拆除防线的本领。

他绝不按一般规律办事。他没有用一条纱巾之类的小玩意儿讨好过邵蔚平，也没有用一张戏票取悦过姑娘，他用孤傲对付清高！

是的，邵蔚平的执拗和清高是出名的，她最讨厌男人向她献殷勤，相反倒敬重那些不把一切女孩子放在眼里的男人。谭培华就是个被人认为很狂的人，他有才气，走路眼睛望着天，从来不在女同学面前献媚。正是这一点吸引了邵蔚平，也只有在她面前，谭培华由骄傲的豹子变成了温顺的小猫。

邹频呢，比谭培华还要盛气凌人。

可惜邵蔚平没有好好分析一下，他们之间表面类似的倨傲有

什么实质的不同。

她敬重、感激邹频，对他无须画一道警戒线，他有妻室儿女，他比任何男人都道貌岸然、不苟言笑。

那是毕业分配前夕，有一天邹频打电话给邵蔚平，用无须商量的口气说：“有些毕业生的档案要整理，我实在忙不过来了。你来一下，要有点思想准备，可能要打通宵。”

邵蔚平去了，忙了半宿。

大办公室的绿金丝绒窗帘拉着，灯光一点都透不出去，门锁死了，没有人知道办公室里有人打夜班。这是不难理解的，人事工作是不能大张旗鼓地干。

屋子里一直只有邹频和邵蔚平两个人，各占着一张写字台工作着。

半夜时分，邹频煮了两杯咖啡，拿出几块点心，说：“先吃点东西吧。”

邵蔚平从堆积如山的档案里抬起头来，在她伸手去端咖啡的一刹那，她发现邹频的眼睛里流露着一种奇怪的东西，她的心一抖，咖啡洒了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会看不出那是什么光焰吗？

不过，那奇怪的东西一闪即逝，邹频又恢复了庄重的样子。他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喝着咖啡，突然说，“你想知道一下你的分配去向吗？”

邵蔚平说：“分配方案不是还没有公布吗？”

“只是没有向学生公布罢了。”邹频说，“我想把你留校。”

邵蔚平毫不掩饰地说：“不，我不愿意从事教学，我的口才不行。我倒想搞点研究，到麻风研究所去。”

“那当然也好，我再考虑一下吧。”邹频说，“今年的分配方案很不理想，有十几个进藏名额，还有去‘麻风岛’的，工作不大好做呀！”

邵蔚平冲口说道：“我倒对‘麻风岛’很感兴趣。”

邹频当然以为她在开玩笑，就哈哈大笑说：“那容易，只要我一句话就行了。”

其实，邹频的话未尝不是一种暗示，他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大学生一生从事什么、到哪块土地上去落户，这种权利能说小吗？

邵蔚平第二次发现了他眼睛里流露着的琢磨不定的东西。啊，那是淫邪的标志。

邹频放下咖啡杯子，打了个哈欠，说：“我对你怎么样？”

邵蔚平的心跳起来，但是出于礼貌，她只好回答：“那当然好了……”

“那你怎样感谢我呢？”邵蔚平听着他的问话，看见他靠到自己身边来了，就有意躲开，说：“要我给你买两瓶酒吗？”

邹频又一阵大笑，他说：“我要你的心，那是最真挚的。”说着，他突然抱住了邵蔚平。

邵蔚平拼力推开他，气喘吁吁地说：“你怎么能这样？我一向把你当成可敬的人，想不到你自己把这张皮撕掉了。”

她夺路想走。

但是邹频叫住了她：“你等等。我是爱你的，但爱有时也能转化成恨，爱和恨在同一范畴，你应当明白。我是主管分配的，我是主管政治档案的，我可以决定你和一切人的命运，你不会不知道吧？何况你并不是清白如水的人。”

邵蔚平全身都在发抖。她知道他在搞讹诈，他最后一句话是不是指接待外宾的纰漏呢？现在她才明白，邹频是握着这张王牌打算占有她的。

邵蔚平冷笑着说：“你应当后悔，你选错对象了。从前我感激你，因为看你是个人；现在，你这套把戏可以收场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工宣队长交代，接待外宾说走了板，我甘愿接受

处分。”

她推开门走了。

她真是一个孤傲任性的姑娘。她连谭培华都没告诉，第二天当真把写好的检讨书递到了工宣队长手中。

邵蔚平当然明白，邹频可以采用名正言顺的手段加以报复，可她不在乎，他总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

她报名上麻风岛！这是她出自真心的。何况她知道，即或她不报名，那个名额也会是她的。

这事她一直没有告诉谭培华，她爱他，却不希望用爱的甜水软化自己的意志。后来，谭培华毕竟知道了，他背着邵蔚平四处奔走、告状，有什么用呢？又没有人把邵蔚平打成反革命，上“亥·十三号”那是被称为头等光荣的事呀！头等光荣的差使往往是谁都不愿去的，也正因为这样，这职业也就越发被宣场得不胜光荣！

谭培华又哪里能想得到，城门失火，要殃及池鱼呢？当他也突然被戴上红花宣布进藏的时候，他简直目瞪口呆了，可怕的光荣。

但是邵蔚平一点都不惊奇，她对谭培华说：“早就料到了。好男儿四海为家，进藏又不是进屠宰场，为这个去告状、去求人，没有意思。打起精神来，到世界屋脊去！”

后来谭培华所以没有去成西藏，完全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他血压高，有轻度心肌炎，第一轮体检就下来了。邹频也无可奈何。

应当说，邵蔚平是被邹频暗算了的人。她鄙视他，不是因为分到“亥·十三号”事件的本身，而是他的灵魂太卑污，手段太恶劣。

邵蔚平和谭培华未尝没想到揭露他一下。弱者有时候被人欺得太甚，也有反抗的欲望和本能，这是一种必然。但这是他们一

个普普通通的人暂时还办不到的。

天从人愿，邹频也有今天！

天理昭彰，邹频落了个“请君入瓮”的下场。

在这点上，邵蔚平同杨旭初是一样解气的。方才在给邹频检查身体时，她有一种连自己都抑制不住的兴奋，她甚至希望邹频的麻风病越重越好，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才活该。后来，当杨旭初肯定地得出结论说他被误诊时，她内心是多么不舒服啊，像是遇上了一生最大的憾事。

邵蔚平不得不暗暗默认，自己的复仇心也是很强烈的。从前，她曾同谭培华打过这样的譬喻：“把我们的心的放到高压灭菌柜里，放到真空箱里，带上这颗滤清、消毒的心到人群当中去……”啊，乌托邦式的幻想！现在怎么样？自己不过也是凡夫俗子！她聊以自慰的是她没有主动对谁落井下石。

月亮偏到大海西面去了，海面蒙上一层阴翳。哗——哗，大海好像在大声叹息，它也疲倦不安了吗？还是在深深地思考着？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阴错阳差——爱过的、恨过的

殷慷接到了邵蔚平打给省防治站的报告，经过 8 方游说，决定将麻风岛上 8 个痊愈的人接上岸来。

为此，防治站特地开了一次加班船。谭培华也随加班船来到了小岛上。

邵蔚平和杨旭初带痊愈病人去小岛之前，决定先找邹频谈一次，把放他回去的消息告诉他。当他们二人出现在邹频面前时，邹频正在喝酒、题诗。他左手抓着一个酒瓶子，右手提着一支毛笔，在板墙上写着。

邵蔚平见他写的是唐代高菊润的诗，只写了七律的最后两

句，却是诗眼：

人生有酒须当醉，
一滴何曾到九泉？

他写完转过身来，“啪”一下，酒瓶子从手里落地，摔碎了。他向后退着，退着，忽然两手抱头，绝望地大叫起来：“饶了我吧，在你们面前，我是该下地狱的，应该受剐刑、点天灯！来吧，杀死我吧！你们动手啊，现在还怕我什么？在这里，没有什么群众专政、阶级斗争了，你们动手吧！”

“是的，没有阶级斗争、群众专政，”站在门口一脸庄重的大胡子杨旭初说，“可是，良心的法庭不是已经使你自己招供了吗？”

邵蔚平说：“迷信传说中的轮回、再生，那是荒诞的。但是，你倒可以再回到人群当中去。”

“你骗人！”邹频顺着墙根颓坐到墙角，眼里闪烁着可怕的光焰，他说：“怎么？你幸灾乐祸吗？你看我得了麻风病，你拍手称快了吗？你对，你对！你往我脸上吐唾沫吧，打我嘴巴吧！我不是人，我用职权把你送到这活地狱里来；我昧了良心使我的朋友遭受不白之冤……旭初啊，你为什么站在那里？拿起刀来，捅我一刀，不要手软，我不会恨你们的……”

杨旭初望望他写在墙上的两句诗，说：“你写这样颓废的诗句？从前你满口的革命辞藻呢？你不怕使那些信任你的人失望吗？”

邹频又歇斯底里地狂叫起来：“去他妈的吧！骗局，都是骗局！别人骗我，我也骗别人。什么友谊？连一个铜子儿都不值！我一得了麻风病，他们的友谊怎么都顺下水道走了？”

邵蔚平说：“你安静一点吧。你把新中国说得太黑暗了。因为你不相信光明。今天你应该清醒了，人间有光明，光明和黑暗永远是并存的，你代表的是黑暗。”

邹频一阵冷笑，说：“来可怜我吗？我不需要，够了！反正我是要死了，能在我活着的时候看见我的仇人来向我讨债，我比什么都高兴。我不是马列主义者，我也没有必要再装了，你们要干什么，请便好了。”

说到这里，他索性闭起了眼睛，好像死刑犯在等待砍下来的那一刀。

杨旭初却字字真切地说：“我们能干什么呢？干一个人所应当干的事，干一个医生所能干的事。你听着，邹频，你不是麻风病，是误诊，我们决定把你送回到陆地去。”

闪电一样，邹频的眼睛刷地睁开，惊愣地望望这个、望望那个，突然纵声狂笑起来：“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讲善良、讲医德吗？你们嘲弄一个患了绝症的人，有什么意思？”

邵蔚平说：“杨老师说的话是真的。我们不是为了可怜你，是为了医学的神圣和尊严，必须这样做，我们不会把一个非麻风患者圈在这里。你的皮肤里没有麻风杆菌，可你的灵魂却早已霉透了。方才，你把你这造反派嘴脸全露出来了。”

说罢，她丢过一张纸去。

邹频抓起那张纸，是一张“亥·十三号”医疗站的专用诊断用纸，开列着邹频的名字和体查记录，诊察结果栏里清楚地写着：“原麻风病结论应予推翻。”处理意见栏里记载着：“经严格消毒后，转‘亥·十三号’医疗站观察一个阶段后，送回大陆。”底下是邵蔚平一丝不苟的庄重签字。

邹频突然趴在地上连续给他们磕了几个响头，像死刑犯在法场上突然遇赦一样，感激涕零地说：“我明白了，我明白是那些人陷害我，不，不是陷害，是正义的报复！我保证永远不追究这件事情，我只要能回到陆地上，我就要重新做人，为了对得起你们这些好人……”

邵蔚平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恶心、怜悯、憎恶……

她说：“人民，总有一天要制裁你这种人的。”

临走，杨旭初对趴在地上的邹频说：“快起来吧。收拾一下，准备出发到对面医疗站上去。”

照理说，邵蔚平应当是最高兴的了，防治站批准了他们扩大研治机构的报告；一直是“黑人”的杨旭初有了出头之日；她马上要见到朝思暮想的谭培华……哪一桩不是喜事呢？

可是她已经知道了给邹频下麻风病结论的医生也有谭培华，她的心里涌流的好像不是发热的血，倒像灌足了冰冷的铅。

她为她的谭培华难过。

邵蔚平和杨旭初，带着 8 名痊愈的患者和邹频走出槟榔树林时，铁门早已打开。她一眼认出了站在刘栋身旁颀长身材的人，那不是谭培华吗？他见了自己会怎么样？会拥抱自己吗？会的。假如邵蔚平不是现在这种沉重心情，她也会不避讳有人在场，毫不害羞地扑到他的怀抱里去。

当她钻出铁丝网大门时，她看见谭培华跑过来了，伸着双臂……

但这一切终于戛然而止，谭培华突然张大嘴巴愣在那里，脚像被钉到了地上。他大概还以为在梦中吧？他揉了揉眼睛。不，不是梦，那不是他视为仇人的邹频吗？他怎么会杂在痊愈者的行列里越过分界线？

谭培华眼里喷放着仇恨的火焰，扭过头发火地大声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把他弄回来了？”

没有人回答他。连邵蔚平都垂下了头，好像是她干了对不起人的事。

本来，谭培华见了杨旭初老师，应当别有一番寒暄的，他是被讹传为死了的人啊！可是谭培华此时的心思全在邹频身上，老师却被他抛到一边去了，他只觉得心里一阵阵的无名火往上攻，他在努力猜测做出这荒谬决定的是什么人？是杨旭初，还是邵蔚

平？或者是殷懔？抑或是三位一体？

杨旭初走过来了，摆动着大胡子下巴，伸手拍了拍谭培华的肩头，说：“小伙子，你好！当个医生，不那么容易呀！”

这是什么意思？

也许这句含糊的话不曾引起谭培华的注意，但却那样强烈地震撼了邵蔚平的心，她在替谭培华难过。

李天候和刘栋跑前跑后地张罗着，说要以一顿最丰盛的海味宴招待大家。

邵蔚平叫刘栋带着治愈的患者先去休息，谭培华突然抓住邵蔚平的手，说：“到底是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把那个坏蛋带到这里来了？你自己恢复传统到‘麻风区’里去，还可以解释为高尚情操，把一个传染病患者带出隔离区，这可是对人类的犯罪！”

“我，真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她轻轻抽出手来，说：“为什么把他带出来？这事，你应当比我清楚。是我做的决定，是我签的字。但是，我希望这也能成为你的决定，在诊断书医生签字栏那里，我还给你留着签字的位置。”

“我不明白，”谭培华说，“你难道疯了？给邹频下诊断，定为麻风病的也有我在内。”

“正因为这样，我才希望再用你的亲笔签字来改正你们的错误结论。”邵蔚平说，“你怎么搞的？他有麻风病吗？当然，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也恨他，有时候甚至也想报复他一下。但是，正常的自卫和恶意的报复，毕竟不是同一概念，你做得太过分了，你玷污了一个医生的起码道德呀。培华，你想想，一个医生运用医疗手段报复病人，同一个法官利用刑名手段杀害无辜，有什么两样？”

“你这样看我？”谭培华没有料到这件事她会看得这样重。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蔚平，我不能签字否定自己，你必须收回你的签字。从前，无论大事小事，我都是

听你的，只有这一次，你听我的吧。蔚平，我为什么这样做，你还不清楚吗？”

“正因为我还能够理解你，我才没有唾弃你，才来劝你纠正你自己的误诊。其实，这已经是我违背良心包庇你了，你是误诊吗？你是有意这样干的。我们不去掉这块心病，今后一生都会于心不安的。”

谭培华苦笑说：“脱了缰的马，就由不得你我了。这么说，你是要我身败名裂吗？说得容易，误诊？会有人相信吗？即使可以掩人耳目，那么邹频这个坏蛋肯善罢甘休吗？这个后果你考虑过了吗？”

“那怎么办呢？”邵蔚平说，“依你，只好让我当你的同谋者，维持原结论，让一个非麻风病人屈死在麻风岛上吗？用这样的手段维护我们医生的声誉吗？是呀，邹频很坏，他可以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却不该用这种不明的手段对待他。”

谭培华被她说得浑身发冷。他在沙滩上走来走去，过了好久，说：“蔚平，看在我们几年时光的相亲相爱，你依了我这一次吧。”

邵蔚平的心像掉在海里一样冰冷，她以为跟他讲了这么多，他会回心转意的，却不料他仍然坚持错误。按他的办法，只有再把邹频送回到麻风岛上去，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叫他连喊冤的地方都没有。这种想法，实在叫这姑娘心里打颤。不，这不是我们的医疗道德！

她是爱他的，难道爱就可以淹没医德吗？沾着污垢的爱是卑微的。

在她陷进痛苦的深渊时，谭培华一直眼巴巴地望着她，那双眼睛里有一点松动吗？没有。

他的心凉了，他长叹一声，说：“这样看来，你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了？”

邵蔚平浑身一震，委屈地说：“你……这样说话？我是为了你，才叫你这样做的……”

“算了吧，”谭培华的脸变得铁青，“谢谢你的关怀。我永远都不会用第二个签名打倒我的第一个签名。你也死了这条心吧！”

谭培华拔步跑了，头也没有回。

海浪一个接一个地拍打着海岸，发出哗哗的声响，像在撕裂着姑娘的心。

一时，她的头脑成了空白，可怕的空白，她什么都没想，一动不动地坐在雨燕翻飞的海滩上。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身影缓缓地向邵蔚平移近，固定不动了。

她转动着不灵活的脖颈回过头来，发现邹频像个罪囚似的站在那里，垂着头，嘴唇轻轻地蠕动着，像要说什么。这就是当年风度翩翩的政工组长吗？这就是随意摆布别人命运的邹频吗？这就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巧伪人吗？

邵蔚平忽然觉得他的可怜相是装出来的，谁能保证他回到大陆去以后不以10倍的疯狂来对谭培华实行报复呢？他，是尝到了造反、整人甜头的坏人啊！

两个人僵持了半晌，邵蔚平语气凌厉地问道：“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把我……送回‘死岛’上去吧。我是罪有应得。”邹频低三下四地说，“你说得对，我的心灵发霉透了，也许这样，我才能赎尽我的罪过……”

邵蔚平注视着他的眼睛，是诡谲的光影，瞳人里有的是装出来的怯懦和可怜。她的心在巨烈跳荡。她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她说出来的话，对邹频这样的人能起到什么作用：“你怎么说这种话？你是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人，为什么要送你到那里去？你从前有过对不起人的事，但用不道德的手段来制裁你，是更大的不道

德。回到大陆上，你好好想一想，你是个聪明人，只是你的聪明为你的野心服务了而已。你有能力加倍陷害我们，但你不要忘了，党纪、国法总有一天会制裁你的。”

邹频低着头在那里僵立了很久，才无趣地走开。望着他那佝背弯腰的背影，邵蔚平有一种说不出的恶心，她狠狠地吐了几口唾沫，再转过头去看谭培华跑去的方向，谭培华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一片热带雨林后头。邵蔚平忽然感到有些冷，大热的天打起哆嗦来。她在扪心自问，自己这样做，对谭培华来说，是不是太绝情了？对邹频来说，是不是充当了东郭先生的角色？

不，没有理由怀疑自己，问题不在于怎样对待邹频这个具体的人，而在于医德在一个医生心目中的位置！

她痛苦，她好像刚刚认识人生，像第一次感受到变幻莫测的大海一样。

她难过，她清醒地意识到，她将失去谭培华，失去保持了多年的爱情。尽管从理智上说，为了爱情不应当牺牲某种公共道德，可从感情来说，毕竟是藕断丝连的。如果她退却下来，屈从了谭培华，那么，她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做人民的医生。

她并不迷惘。大海没有因为江河日下带来那么多泥沙而变得混浊，大海在每时每刻净化着自身，这多么像光明终将战胜邪恶的人类啊！

她觉得自己忽然长大了不少。

(原载 1984 年 4 期《小说界》)

乔迁之喜

高级建筑师死于分房小事

什么声音嘶哑地响着？聒噪的蝉鸣吗？啊，不，是安在校部大楼墙壁上的电铃。电铃处在风雨剥蚀中，早已锈迹斑斑没有光泽，失去了原来清脆的音质。这像不像失去了青春的人呢？既没有闪光，也没有掷地有声的语言……

夕阳把楼外丁香花的影子投到窗里来，一簇簇闪动的光影在一张斜面绘图桌上晃动，像在她心上掠过的一团团阴霾的云。

她叫彭印兰，当了二十几年的描图员，刚提助理工程师不久。她今年刚好 50 岁，头发黑润，很难剔出一根白发丝来。不，经常有的。丈夫祝绰英哪怕只发现她头发里夹上一根白发，都要细心地替她剔除……

然而，那双手的温度正在下降，变冷、僵硬了，那是彭印兰握着它们，直接感受到了的。那双为人间描绘过千千万万张蓝图的手僵直了，啊，不，只剩了一撮骨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这是丈夫祝绰英最得意的诗句，用油笔写在一只搪瓷杯子上，比座右铭更容易随时随地激励自己。

广厦一座座落成；寒士还有，正在一天天减少；他没来得及

笑，那只掉了漆的搪瓷杯子还摆在他的床头几上，他呢，却死了——死在别人称为年富力强的年龄。

蝉声震耳，真容易使人同电铃声混淆。莫非是不解人间喜怒的知了也在催她回家吗？

她不想回家，确切点说，她怕回家去。

对每个人来说，舒适的家、寒酸的家，都是有吸引力的。彭印兰感到自己同丈夫是一对辛劳的喜鹊，整日里衔泥叼草，营巢垒窝，却总是被斑鸠所占有，他们只有一个临时栖身的简陋的巢穴。不过，这并不妨碍有爱、有温暖。

现在，彭印兰今非昔比，竟然拥有一栋漂亮得近于奢华的小楼了，但它却失去了吸引力。堆放着水泥、钢筋和成箱玻璃的库房是阴暗的、空旷的，然而做过他们的洞房。现在这栋房子倒是舒适、漂亮，却比仓库还不如！那是一座幽暗、瘆人的墓穴，是被抽尽了生气后遗留下来的真空巢。

盛着木乃伊的金字塔是不是这样呢？

这是彭印兰宁愿在办公室冷板凳上多泡个把钟头的真正原因，并非她有意在 8 小时以外多做点贡献。

家，毕竟是人们至少要磨掉三分之一时光的场所，何况彭印兰还有一个儿子等她回去煮饭，她还得回家去。

北方的春天来得迟，去得匆忙。丁香花、杏花闪电般开放、闪电般凋谢之后，气温猛然升高，酷夏不待春天站稳脚跟，就把它赶走了。

生活呢？不也是这样来去匆匆吗？

那栋新居，应当说席未暇暖，也许就要易户换主了。特别是对丈夫祝绰英来说，更是这样。自从搬了进去，他只在那幢冬暖夏凉的房子里住过半个月，就带学生到江南实习去了，等他回来，还没来得及坐到他的绘图桌前喝上一杯热茶，就住到医院去了……

啊，新居！不能算新居了。你看，上下电车的人都提着一串串粽子，电车里飘散着粽子叶的清香。端午节不是快到了吗？哦，正是去年的端午节那天，她在新居举行“乔迁喜筵”的。

她苦笑了。乔迁一定是喜吗？夫妇俩被赶出居宅，赶到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里，也是乔迁，也是喜吗？继而在“牛棚”的大通铺上占据62公分宽的铺位，何喜之有？

这次毕竟不同，络绎而来的人到底是来喝乔迁喜酒的，吵着要茅台！总务处长隋云佩张罗得最欢，亲自到圈楼菜市场买来水发海参、冰冻对虾，亲自扎起围裙上灶，好不热闹！

过眼烟云，一切都飘得无影无踪了！

正是杨花飘洒的季节，这座城市绿化虽好，却绿化得没有学问，街道两侧高高低低都是杨柳。凡杨柳入夏总要结籽扬花，纷纷扬扬，像漫天飘洒的雪花，讨厌得很，到处飞落，飘落到马路边，白花花的一片，落满鲜艳的夏装，甚至沾到睫毛上。你看，电车里不是也飘舞着杨花吗？

下一场暴雨就好了，讨厌的杨花柳絮便同灰尘一样被打到地下，化成烂泥！

乔迁的喜悦不是像飞扬的花絮一样，总有一天要化成烂泥吗？啊，有多少人为着一间斗室而苦恼着、奔走着、期待着，甚至要违心地去巴结、送礼，不惜采用一点带有“排他性”的生存竞争手段……啊，“安得广厦千万间”……

“种田老，背花篓；盖房匠，卧街头；抛梭女，露肩肘；卖油娘，水梳头……”是一首古代为劳动者鸣不平的民谣吧？是从民谣集上看到的吗？啊，不，是丈夫祝绰英常叨咕的。他告诉妻子，这就是他革命的最低起点！

但是，祝绰英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挣一栋豪华的房子而起来造反的。他的父亲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建筑学博士，他家在大连黑石礁有一幢连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都淌口水的别墅。祝绰英恰恰因

为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而惹恼了老子，惹得老子发狠地说：“我死之前，宁可把房子一火焚之，也不给这个不肖子留下片瓦！”

祝绰英也是盖房匠。不过他不是博士，他只在清华大学念了两年建筑系，正当父亲写信给梁思成，委托这位大名鼎鼎的建筑师从严课子的时候，祝绰英失踪了。转年，他从哈尔滨给家里发了一封信，说他跟了共产党，干着“逢山劈路，遇水搭桥”的军用建筑行业。

自从祝绰英同彭印兰结婚以来，他亲手设计付诸施工的图纸，毫不夸张地说，也可以堆满一间屋子，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安居过。

电车的窗户真别扭，拉起来又费力又容易碰碎，若是叫丈夫改改图纸，准是美观、适用。为了设计民房的一间厕所，他能花上工夫到处跑，可他前几十年的住房里，从来没有过厕所，即或在零下40度的严冬，他也得到外面去解手。

啊，解放广场！从圆形广场放射出去的八条街道两侧，至少新盖了200栋住宅楼，那是丈夫和他的学生们花费心血设计的。款式新颖、风格各异，没有一栋雷同。那是1965年吧，一个夏日的黄昏，祝绰英带着妻子到解放广场建筑工地来了，上脚手架、爬过正在浇注的混凝土大梁，他让妻子观赏初具规模的民用建筑群。

其实，他们不过是散步，带着柳条帽散步的人不多见吧？

这是建筑师的独特方式，有时夫妻俩还爬到吊塔斗上去呢！

感染是无法抗御的！天晓得，彭印兰什么时候养成了奇特的嗜好：专门喜欢看人家搬迁，大车小辆，喜笑颜开，她也跟着笑。大概种桃子的人看见别人吃自己桃子并且连声夸赞时，也有类似的感觉吧？

不是“盖房匠，卧街头”的时代了。彭印兰一直期待着有一套格局新颖、舒适宽敞的房屋，至少，应当有一间20平方米

房子当书室、工作室，三面摆书架，靠窗子那面摆沙发，中间放一张平面、斜面两用的绘图台。

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这要求算不得奢望吧？

级别呢？啊，不够。

1963 年部分调整工资，祝绰英长了一级，总算够了！房票下来了，妻子把那张梦寐以求的绘图台打好了，纯粹的檀香木原料；乔迁的喜糖一下子买了 10 斤，是奶油巧克力。

谁也没有吃到她的乔迁喜糖，直到化得发黏，粘到糖纸上剥不下来；檀香木的绘图台寄存到建筑材料仓库里去，潮得开了胶。

祝绰英被点了名，登报批评，他是“人民的败家子儿”，专门建筑“高规格的房屋”，是“浪费大王”，是“少慢差费”典型。祝绰英被强行弄到艺术剧场去看了一场专门为他演出的活报剧：《我是败家的建筑家》，他一脸苦相地坚持到把台上的丑角送进大幕，他还得给人家鼓掌。由此他丢了总工程师的职位，弄到大庆去了，去建筑“干打垒”，一干两年。还需要什么图纸呢？不需要，一条直线都画不直的人，只要有力气，也会把黏土打实，盖出房子来，他实际干的是个力工。

“奶奶、奶奶，我要吃粽子……”

被打断了思绪的彭印兰循声望去，是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穿着一件太阳红的尼龙喇叭裤，类似有肩章的背后开襟的港式衫，正偎在一个面目和善的老太太怀中，吵着要吃粽子。那老太太看上去是个有文化教养的妇女，也只不过五十多岁光景，不，比自己老些，至少有一半头发是白了的，但她脸上找不到凄苦、惆怅和空空落落的表情，她肯定有一个幸福的家。她拍了孙子屁股一下，爱怜地装成恼怒的样子说：“小傻瓜！怎么能在电车上吃呢？不怕人家笑话？回家去，和爷爷一起吃……”

小男孩说：“还要吃煮鸡蛋。”

“当然喽！”奶奶用在大槐树下哄孩子的腔调说，“明早晨才是端午呢。今晚早点睡，明早晨姑姑要从医学院回来，带你去采艾蒿，上翠湖滩；你妈妈还给你缝了个香荷包呢，手腕子上要带五彩丝线；要等你叔叔从工厂回来，才能吃粽子、吃螃蟹，还要喝雄黄酒……”

彭印兰眼前闪现出一个和睦的家庭图像，三代同堂，蒲艾簪门，夹着金丝蜜枣的粽子，是在爷爷讲述屈原投汨罗江的絮语中，一个个被吃掉的……

啊，那户人家的房子可能很窄很小，只有一块刚能摆下一张直径一米圆桌的空闲地面。凳子摆不下，奶奶、媳妇不得不坐在床沿上，小孙子不能占一个席位，被爷爷揽在腿上……

然而这里有天伦之乐，是个甜蜜的窝！

房子倒是大了，一套4个房间，有书房，有起居室，有餐厅，可是没有人，有什么意思呢？彭印兰几十年来就盼房子，到底盼到了，老头却伸腿去世了，她自己要一个能摆放两副篮球架子的巨室，难道能够安慰寸心吗？

“彭姐，这么晚了才回家呀？”

突然有人亲切地叫她。

她认出来了，是建筑学院土木建筑系的年轻讲师李文陶。唉，什么年轻，也是过了40岁的人了。你看，他的头都快秃了，脑门儿亮晶晶的，浸着汗水，他是挤车挤出一身大汗吗？啊，不，他左手拿着一张折叠餐桌，右手扶着一个没有橱门的简易书桌，真难为他，这两大件是怎么从车门扛上来的呢？

彭印兰朝车窗外瞥了一眼，是同业商场站，同业商场的家具是全市最齐全的。哦，李文陶不是刚刚分到一套两室房子吗？难怪他去购置家具。

彭印兰要把座位让给他。她的意思马上被李文陶发觉了。他腾出一只手，轻轻地在她肩上捺了一下，让她坐回去，说：“您

坐，我不累。”

彭印兰说：“叫辆平板三轮就是了，再不，找你的学生帮一把。”

李文陶揩把汗，说：“这就蛮好，这就蛮好，学生们功课都很忙……”

噢，他是“万事不求人”的。不是因为孤癖，而是不好意思，面矮得有些过分。去年李文陶带着小女儿到家里来做客，正是海棠果上市的季节，5分钱一斤，彭印兰洗了一大盘子拿给他们吃，小女孩依偎在李文陶怀里，说什么也不肯吃。爸爸说她一吃酸的就牙疼。等送他们出门时，彭印兰看见，李文陶在胡同口给孩子买了点海棠果，那孩子都等不及洗，就大口咬起来。

拘谨、外道到不讲实话的程度，这是优点呢，还是缺点？“见老实人不欺有罪”，这话大概不是合理的，却是流行的。就拿李文陶分房子的事来说吧，那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倒霉的事都叫他摊上了。前年落成了一栋楼，分给他一间半，就要搬家时，总务处长找到他，说：“你再将就一年吧，有几户五七战士回来要急着安排，这是政策。”李文陶一肚子不快，答应了。去年又盖了一栋，李文陶的名字又赫然公布在榜上，纵然是在七楼，毕竟全家人可以直直腰、伸伸腿了！李文陶连墙裙子都漆好了，总务处长又来动员他，让他再克服一下，把房子让给一个刚刚落实政策的锅炉房工人。这个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打成反革命下到狱中，刚刚平反，一听到分房子没他的份儿，就坐到总务处长的办公桌上大骂了两个中午，闹得处长连饭都吃不上。李文陶再次让步，因为这也是政策。

对别人，总有政策杠杠能对上号，惟有他与任何政策都无缘。

今年好了，李文陶连家具都购置了，大概总务处长不会再冒出来个什么政策顶掉他了吗？

“你干吗总是四平八稳地干事情？”彭印兰用埋怨的口气说，“夜长梦多，你马上搬进去嘛！”

李文陶笑了笑，搓着手上的灰，说：“若是那样，搬进去再被赶出来，不是更没趣？”

唉，这个书呆子，真呆到家了！

可是李文陶是业务尖子！祝绰英一见到他，准是眉开眼笑，一谈几个钟头。他在弥留之际，还特意叫人把李文陶唤到床前嘱咐他把一本什么书写完呢！

工人下班的浪峰过去了，电车上的乘客渐渐少起来。一拥而来，一拥而去，唉，人生像不像来去匆匆的电车乘客呢？祝绰英不是下了车的吗？车却还在往前走，她感到孤独。

李文陶显然想要安慰她，他说：“彭姐家里有什么事要我帮助做吗？”

彭印兰勉强笑笑，摇了摇头。

李文陶说：“若不是祝老师力争，我们……无论如何分不到两间房的。”

彭印兰的心像被马蜂蜇了一下。李文陶说的是实话。假如祝绰英不是为这些中年讲师们力争呢？那他也许活得很好，不至于这样快地死掉。啊，他太认真、太固执，写在文件上的和现实生活中的事，总是有误差的，连建筑图纸也还有几分之一头发丝的误差嘛！

60年代的大学生们，像李文陶这批人，都提了讲师，难道不应当给他们房子吗？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一般都是三代同居，一间房怎么行呢？她就亲眼见到李文陶夏天在大礼堂台阶上放了一张学生小课桌，在水银灯下画草图。别人问他，他只是说：“这里凉快。”

是偏见和偏爱吗？也许有点。也许祝绰英被任命为建筑学院院长就是个误会，他没有这个本事！他可以运用自如地设计出各

种规格的房屋，他却没有本事分派它们。盖房子、分房子永远是两个专业！他不该当这个院长，当他的总工程师、教授不是很好吗？

这栋楼房的地基刚一打好，好多人都在打主意、打报告。每套虽然只有两间，但走廊是方形厅，有 10 米，可以住人，可以摆餐桌，实际等于三间，连科、处长们都打它的主意。祝绰英特意把总务处长、行政办公室主任、基建科长都叫来了，给他们泡了茶，客客气气，说是商量一下房子分配问题。好笑的急性人，这不是为时过早了吗？

祝绰英太霸道了，他的话哪有一点商量的余地？“这栋楼，是我为中年教师们设计的，现在财经困难，还达不到国务院规定的米数标准，只好克服一下。不过，除了中年教师，谁都不能住，由我来分配。”

也不能说他专横，院务会议审查图纸时就定下是给讲师的嘛！

总务处长陪着笑脸点头。谁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可能嘲笑这位不明事理的新院长太天真了吧？总务处长才不会在刚栽下树苗的时候急着分桃呢，他有他的主意。

也许，祝绰英的悲剧是注定了的。

当他带着实习生从南方返校时，房子已经落成，分配方案已经下达，有乐的，当然也有不满的。一栋 3 000 平方米的房子，分给中年教师的只有 1 000 米，而且是被称为“包子皮”，六楼、一楼和东西两面的冷山墙是讲师们的，好楼层、双间朝阳的除被处长、科长们占有外，还拨出 10 套给了“关系单位”。什么建筑公司、煤气站、自来水公司、电业局，全有份儿。你要电吗？要水吗？要煤气吗？对不起，拿房子来！他们远比书呆子要精明，懂得什么叫“夜长梦多”，听说院长祝绰英要赶回来参加分配，一个晚上全都住了进去，雷厉风行。

那些应当得到房子而没有得到的人们，眼巴巴地盼着院长归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怕是院长也没有回天之力了。

“官僚作风！”这是处长、科长们狠狠的骂声。

是呀，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祝绰英脑袋那么僵化，一点灵活性都没有！他下车就开会，在院务委员会上摊了牌。他有他的理，全数分给讲师的方案虽然是他提出的，却是校务委员会一致通过的，记录在案，党委也是点了头的，有什么理由推翻呢？对于参加施工和配套工程的“关系单位”，他说是“份内工作”，不该“巧取豪夺”，一律顶回去，一间不给！

他坚持按原方案重分，现有方案立即作废。

全校哗然！又是有乐的、有恨的，只不过同前一次的人员掉了个个儿。

党委第二书记出来打圆场：“木已成舟了，不好办。当然，这次分配存在好多漏洞，好在以后还要盖房子，不要再打乱重来了吧，特别是‘关系单位’，得罪不起，明年再盖房子就要给眼罩戴。那样更会激化矛盾，领导的威信也要受到损失。”

“岂有此理！”祝绰英火了，“坚持错误反倒会有威信吗？”

党委书记住疗养院去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躲开了矛盾的漩涡中心。

谁说祝绰英不是“廊庙之器”？彭印兰不是嘲笑丈夫“连芝麻大的官都做不了”吗？

错了，全错了！祝绰英还真有股子傻劲儿。他召开了全院大会，当众宣布，第一次分配方案无效，搬进去的人一律在3天之内迁回原居宅，这是死命令。至于外单位的人，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天晓得祝绰英哪儿来的官瘾，他满可以一句多余的话不说，他照旧是这个几百万人口城市里建筑行业的第一把交椅，连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称赞他是大学问家。这境遇不是很好吗？干吗要

出场唱黑脸包公，把人都得罪尽了呢？

谁说权利无关紧要？

也许我们的建筑师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掌权的甜头吧？

没有人出来反对他，包括那些背地散布流言飞语的人，也都没有超出 3 天大限，乖乖地迁出了新楼。

名正言顺的报复马上到来！院长忽略了学院还有两栋改建的房屋正在“关键”时刻。这两栋房舍从前是没有煤气和上下水道的，这次改建，煤气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开恩得很，答应给全部解决。但是，当煤气公司经理的小舅子和自来水公司主任的外甥女同时被祝绰英赶出学院宿舍新楼时，正在挖自来水管道的工人和正准备安煤气灶的工人，一个早晨全线撤退了。新宿舍楼有了电源，但灯不亮，有煤气，但不供气。

祝绰英亲自出马打官司，他打得赢吗？

煤气公司说，近来煤质不好，气不够，只能保证原有用户；电业局说，中央严格限电，建筑学院负荷早就超过，不能再给，原有的用户也要分期分区停电；自来水公司说不出水源紧张，他们的理由是：钢材紧张，如果建筑学院自己搞到 15 吨无缝钢管，还可以考虑……

祝绰英发觉自己的官太小了！

他胜利了，是悲剧性的胜利，他在为自己开掘坟墓。对外部的压力，他只能向上级反映，对学院内部，他只是注意到干部们的情绪，他万万没有想到，溃堤在另一个地方。

应当说，被赶出去的行政干部们怨气最大，但他们偃旗息鼓，没有什么反响，最多说几句风凉话。

工人起来说话了。建筑队的工人，锅炉水暖工、木工、勤杂工，一大群人把祝绰英团团围住，一片质问声：“为什么房子不分给工人一间？”

“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了吗？”

“我们变成臭老九了怎么的？”

“知识分子需要工作间搞业务，我们还需要工作间学马列呢，马列不是没过时吗？”

“……”

秀才遇见兵，大概就是这种局面吧？祝绰英即使浑身长嘴，也解释不清。他的脸都气黄了。

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居然有人上来开院长的玩笑。祝绰英不认识他，二十多岁，头上歪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一说话就噤鼻子挤眼睛，带有马戏团丑角的特色。他是总务科的勤杂工，叫李方。李方挤到人群中间，一本正经地对祝绰英说：“院长，走，跟我去看看男女混合双打！”

莫名其妙！祝绰英哪有心思去看乒乓球比赛？

李方伸手去拉院长，硬把他拖到一楼东侧资料室里，那里本来是堆满了书橱的，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书橱之间的间距缩小了，挤到一起，腾出十几米一块空地，劈成两半，中间挂一块线毯隔开，两边各有一张双人床。

李方揭开线毯，两手一摊，说：“我都结婚3个月了，却和别人男女混合双打，半夜起来撒尿，真担心钻错了被窝……”

背后的人群中发出炸雷般的笑声，有人笑出了眼泪。

祝绰英气得浑身发抖，结巴着质问：“这、这是资料室，谁、谁同意你、你们住、住到这里来的？”

“总务科长啊！”李方双手抱肩，嬉皮笑脸地说：“谁让我们不是知识分子了呢？这年头，臭老九又吃香了，活该工人倒霉，院长总不能让我们两口子到马路上去住吧？”

又是一阵笑声，那笑声像一根根利剑，刺痛着祝绰英的心。

他处世无方，但并不比别人傻。他懂得，有人在背后给闹事的工人装枪，他没法向工人发火。

李方带头，一个上午，就有十几户工人强行抢占了宿舍

大楼。

接着，有二十几个处长、科长联名上书省委和省纪委，控告祝绰英“专权跋扈”、“搞土政策”、“排斥行政干部”、“不关心工人疾苦”、“挑起一场矛盾”……他们公然要求同时调离建筑学院。

当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亲自打电话叫祝绰英到省委去一下时，以李文陶为首的十几个中年教师挤到他的办公室来，站在屋里，没有一个人说话。

大汗从祝绰英的额头上滚下来，脸色蜡黄。他重重地放下电话后，发现了李文陶他们。祝绰英笑了笑，说：“你们放心回去工作，在我没有被撤职之前，分房方案不会改变。我马上到省委去，省委会支持我的。”

“您误解了，祝老师。”李文陶声音很低地说，“我们知道，您太困难了……您的精力应当放在科研上……不要再为这点小事惹出更大纠纷了……我们，都是来退房子的，我们18年都等了，还差18天吗？您放心，我们不会闹情绪的……”

祝绰英像被人重重地打了一闷棍，头嗡嗡作响。热泪顺着脸流下来。理解和大度，有时就是一种支持。啊，这些过去常会被推到被改造队列中去的人们，竟是这样一副心肠吗？

“不！”他只喊了这一个字，但这是决心的呐喊，他推开门，闯了出去。

房屋、楼梯是颠倒的，他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他没有来得及走进省委大院，就重重地摔倒在校部大楼的楼梯上，一直滚到一楼前厅。

惊呼，忙乱，痛惜和幸灾乐祸，伴着远去的救护车，消失了……

他有心脏病，不是因胆固醇含量过高而引起的血管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他也没有恐惧过肥肉和猪肝，他是风湿性心脏病。

营建千百座广厦，可以让人们遮风避雨，然而造屋者却过了几十年风餐露宿的生活。恶劣的条件，使他由风湿性关节炎直到累及心脏……但他的妻子总以为只要有了不潮湿的房屋，一切都会好的，这不是太天真了吗？从医学角度说，诱发风湿性心脏病的病因常常是气温和干湿度的骤变，可是社会生活中人们无法衡量的冷与暖，诱发疾病的能量不是更大吗？

人是怎样一种动物呢？最人道的还是最残酷的？抑或是二者混合在一起，像一个混沌的鸡蛋一样？

看望祝绰英的人不少，要排队登记。

只有总务处长隋云佩例外，他同医学院附属医院上上下下都很熟，他即或在非探视时间里进入病房，都如入无人之境。

点心、水果堆得如同小山，隋云佩送得最勤、最多，劝慰院长的话，也是他说得最多，最娓娓动听。当着祝绰英，他骂闹事的工人“又是造反派那一套”，“非要处分几个不行”，他暗示院长要“团结大多数”，他当然是指那些行政干部而言。“他们够苦的了，科长也是天亮前的干部嘛，论资历，难道就比60年代的大学生矮一头？”至于外单位，那更得罪不起，他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他怎么能死呢？才55岁！

楠木雕花骨灰盒是假的吗？里面的红布口袋里盛的不是他的骨灰吗？

晴天霹雳！干吗要当这个院长呢？

后悔，什么时候想起来，彭印兰什么时候追悔莫及，自己怎么没想到劝他呢？明知道他不是当官的料。唉，难道就为了那一百米的院长楼吗？人死了，即或那楼房有一千米、一万米的面积，同一口棺材又有什么区别？

该死的总务处长隋云佩，他杀人是不拿刀子的！

省委为什么要把祝绰英调到建筑设计院去呢？也许省委是有

道理的，在建筑学院，祝绰英已经成了矛盾焦点，回避一下，对解决问题有益无害。总不能留他一个，听任几十个处长、科长同时辞职！可是，太急了，不能等到祝绰英病好出院吗？

不，是这样的，并没有当众宣布任免名单，只不过学院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知道罢了。但这消息像恶性病毒一样，一昼夜间在建筑学院扩散开来，叹息的、称快的、不平的、惬意的，人人奔走相告，只瞒着抱病在床的学院院长，还有他的妻子。

调职与撤职在特定的时候往往可以画等号的。这种裁决，即或出于好意，毕竟是宣告祝绰英在学院分房问题的破产，这一点，守大门的更夫都看得明白。

总务处长隋云佩却带着报喜的笑脸跑到病房里来报丧了。他很懂得语言的艺术，那天只有彭印兰在场，隋云佩一边替院长启开一瓶菠萝罐头，一边宽解地说：“院长是大器，不要同小人物一般见识，有什么了不起？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卖豆腐！”

这不伦不类的劝慰，不是把祝绰英逗得哑然失笑过吗？连坐在窗前打毛衣的彭印兰都撑不住笑了。

唉，真是傻瓜！医生早讲过的，祝绰英半点刺激都不能受。假如自己板起面孔把总务处长轰走，不就免灾了吗？傻，傻呀！她还期望着能说会道的隋云佩能够使丈夫那淤塞的心窍疏导开呢！有谁能知道，他比三气周公瑾的诸葛亮还要可恶呢？他是杀人不偿命的家伙！

那历历在目的可怕的一幕！那昏天黑地的一瞬间！轰隆一声，祝绰英从床上坐起来，他大叫一声，像被宰的牛嚎，一头撞到地板上……

隋云佩说什么来着？啊，在法庭上、在任何官场上都不能加罪的普通语言：“好好养病，建工学院是个是非之地，早离开早好，省委真关心您呀……到建筑设计院当院长，一百多个人，省

心多了……”

对于隋云佩来说，要说的全都说了，他却可以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说。

假如建筑学院院长祝绰英是个麻木的老头该有多好！他恰恰是那种看得见地光就晓得地震顷刻间要发生的精明人。

于是暴怒，心肌梗死，倒撞在地板上。

可怕的忙碌，一屋子白色的人群，男的女的，只露着一对琢磨不定的眼睛，像蒙面的三 K 党徒。氧气袋，粗大的兽医站才有的大针管，鼻梁上贴上横竖胶布，这一切，都伴着彭印兰呜呜的哭声一幕幕地过去了！

死一样的静寂，离医院很远很远的的一个什么工厂在鸣笛，工人下夜班吗？还是志哀的笛声？像东方出现晨曦鬼神逊位一样，穿白大褂的男女一个个退走了。

整容、化妆，套上簇新的中山装，看上去是质地很好的毛料，是哗叽还是华达呢？记不得了，这种衣料，市场上脱销半年了。她一直想给丈夫做一套，每星期要跑一趟商场，每次都是失望归来。祝绰英不比从前了，常常要他去接待外宾，彭印兰讨厌那套混纺的衣服，一次不熨就折皱得像一团抹布……他活着的时候，到底没有穿上，死的时候这样及时地穿上了，这要感谢神通广大的总务处长隋云佩。找人批条、买衣料、下尺寸加工，总共费了一天工夫，就一切就绪了。

那套衣服怎么越看越不顺眼呢？

别人也许认为她好笑，或者怀疑她精神失常了吧？她是那样固执地扑到床前，要替丈夫把那套衣服剥下来。她哭喊着：“他不能穿着这套衣服走啊，天哪……”

没有成功。没有人理解她。也许刚走不远的丈夫理解她吧？

人们把彭印兰拖走了。

花圈，骨灰盒，出出入入的没有笑脸的人群，都像昨天

一样。

一个又一个新的昨天堆积起来，她只感到压抑……

“坏了，您过站了！”李文陶忽然叫了起来。

彭印兰望望窗外，可不是吗？快到终点站锦湖了。那些傍晚散步的情侣们拿着一束束鲜花，向花巷深处走去。红的花，白的花，别人怀里的美好象征，却是彭印兰心目中凄凉的花环……

助理工程师必须迁出院长楼

是李文陶把她送回到翠湖路 11 号的。李文陶扛着书架、夹着餐桌，累得出了一脸虚汗。彭印兰百般催他只管回家，李文陶只是默不做声地陪她走下去，直到胡同口才分手离去。

望得见翠湖路 11 号那幢小白楼了，长春藤密密层层地顺白墙一直攀援到屋顶，差不多盖住了墙的半壁。这是丈夫的手艺，爬到梯子上，把藤蔓一根根理顺，一根根固定到墙上……他去了，翠叶那么可爱，是给谁看的呢？

彭印兰走得很慢，她觉得疲劳不堪，竟然在院门口坐下来了。院门是漆成纯白颜色的，又光又亮，是丈夫自己刷的。他真细心，用小刀片把斑驳的底漆刮掉，再用酒精喷灯烧掉残漆，虫眼处塞上木屑，用沙纸打平，刷了一遍立得粉，再次打平，才刷上白色磁漆。

门可罗雀！这四个字突然间从彭印兰的脑海中冒出来，是灵感还是触景生情呢？

道地的门可罗雀！有几只麻雀落在白漆大门上跳来跳去，肆无忌惮地把屎拉在门上。它们一点都不怕人，仿佛门外坐着的彭印兰不是一个对它们构成威胁的活人。

连鸟都会欺侮人！她不由得心酸地叹了口气。门庭若市同门可罗雀的界限是这么分明！

最热闹的一天，不也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吗？

丈夫当了建筑学院院长，搬到这幢理想的新居里来，祝贺的人不请自到，人人嘴上说的都是恭贺乔迁之喜，没有人提当院长的事。

乔迁就一定是喜吗？

1966 年秋天，他们被造反派勒令“24 小时内滚蛋”的时候，不也是乔迁吗？那时祝绰英挂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剃了鬼头，圈到八个大学的联合牛棚里去，儿子还小，帮不了她什么忙。天下着讨厌的雨，不紧不慢，马路上泥滑难行。去找谁帮一把呢？这种时候即或有亲朋故旧冒险上前，不是都应当谢绝的吗？干吗要牵连别人呢？仅仅一昼夜，彭印兰一家人仿佛成了可怕的麻风窝，谁都不肯靠前一步。

一辆推小孩用的破竹壳车，那是儿子小时候用过的，她从天棚上取下来了，脱胶的地方总算修好，可它的载重量最多有 50 公斤。

泥里水里的 24 小时啊！她像即将崩溃的长堤上的一只老鼠，仓皇地搬迁……

那时有人来恭贺乔迁之喜吗？

人都为讨个吉利，糖啊、烟啊、酒啊，她买了不少，该招待的、不该招待的，大家都来吃个尽兴，彭印兰不是个吝啬的人。

这一切，像昨天刚刚发生，又有点恍如隔世，令她感到陌生。

是的，陌生，连这座叫她朝思暮想的房子此时都感到陌生了。

儿子该下班了吧？啊，今天他是夜班，可能有手术……又要扔下她一个人在这墓穴一样的房子里睁着一双眼睛熬过一夜了。

彭印兰叹口气，站起身来，正要推开白漆院门，忽然听到沙沙的脚步声从院里传出来。幻觉吗？不，分明不是，不但有脚步

声，还有唧唧喳喳的交谈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彭印兰觉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会不会是歹人潜进院子行窃呢？

啊，不，可以放心。那一男一女从房子东面的白果树后转出来了，他们的脚步是那么悠闲、从容，贼也会这样不慌不忙吗！何况，这一男一女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穿着虽然称不上入时，却是讲究的。

彭印兰猜不透他们在院子里干什么，不像等主人归来的来访者，更不会是老熟人，那他们会打电话先找自己的。

两个人绕到房子正面的花坛前来了，双双仰着脖子，比比画画地指着尖尖的屋顶在说着什么。搞建筑的吗？有点像。丈夫不是有这个毛病吗？说真的，彭印兰最不愿意同丈夫一起散步，在祝绰英眼里，只有房子、房子！倘或散步途中碰到结构奇特的房屋，他便流连忘返，伸长脖子左看右看，连墙上的装饰图案都不肯放过。有一次还闹出了一场笑话。那是60年代初，祝绰英刚刚调到这个城市来，有一天傍晚出去散步，他在水路发现了一座标准的哥特式西方建筑，他急得四下找门，围墙太长，一时绕不过去，他竟翻越墙头爬了进去。为这事，他被拘留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建筑学院的老院长亲自把他领回来。原来那是一座旧教堂，从解放那天起，就改成公安局的临时拘留所了。

可笑的职业癖！过去是叫彭印兰哭笑不得的，现在她却感到亲切。眼前这两个人如果不是搞建筑的，会这样仔细地看她的房子吗？

应当招待他们进屋喝杯茶！

彭印兰这样想了以后，还没等张口，就听见那一男一女向门口走来，他们的对话听得真真切切。

男人：“那间最大的，还是当女儿的琴房好。”

女人：“那客厅呢？”

男人在搞折衷：“那只好会客室兼做琴房了，来了客人，叫女儿弹上一曲，也挺雅致的。”

女的发自内心地笑了，算是妥协。

一盆冷水兜头盖脸浇下来，熄灭了彭印兰心头上的美好火焰。

原来是这样！你真傻，怎么会看不出来这一男一女是来相看房子的呢！无疑的，这两个人不久将正式成为这所房子的主人，他们多么自信！当然是够级别的，新来的院长吗？还是党委书记？

这未免过于残酷了吧？这和人没有咽气就计划着分他的遗产有什么两样？

假如我赖着不肯搬呢？你们能把我的家具、行李扔出去吗？祝绰英尸骨未寒，他是个给人们盖了一辈子房子的人，就算照顾一下面子，也总说得过去吧？

傻话，你彭印兰有那么厚的脸皮吗？政策，那是死杠杠，按级别给房子，这是尽人皆知的。院长楼嘛，当然是要给院长住的，院长的遗孀才不过是助教级，她也配住这一套阔气的房子吗？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多没意思！其实你不是早该自觉一点、识相一点，打个报告申请调换房子吗？那样不是光彩得多吗？啊，不是没有想过，所以厚着脸皮拖下来，还不是为了儿子吗？大家碍着死者的面子，总不至于太过分的。

自欺欺人，这不是有人来相看房屋了吗？这是信号，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局。

一男一女只是随便地瞥了呆立在门外的彭印兰一眼，潇洒地朝路口草坪走去。啊，那里有一台伏尔加牌轿车停着。该死，你怎么早没有发现呢？

像被判决了的犯人，又不准上诉，她绝望了。她吃力地打开

门锁。

走廊里静悄悄的，工作室的门开着，里面透出一阵米兰的芬芳。

摆在窗台上的米兰一共有 5 盆，长了 2 尺高，正在开花，花不惹人注意，香气却四处流散。像不像丈夫的性情呢？这几盆花还是祝绰英那年应邀到广州参加白云宾馆的设计回来时带的，那时只有 2 寸高……

屋子中央是一台漂亮的绘图台，丁字尺和鸭嘴笔、圆规、量角器零乱地摆在桌面上，压着一张没有来得及设计好的圆形体育馆草图。

彭印兰没有挪动过任何一样绘图工具，落了灰尘，她只是用鸡毛掸子轻轻地扫一扫，一切都保持丈夫离开前的老样子，这是一种纪念，她总觉得丈夫刚刚离开这个工作间，马上就会回来似的。有好几次，她竟然觉得烟灰缸里的烟蒂在冒着丝丝缕缕的残烟，他仿佛像匆匆离去、马上要归来似的。

如果没有意外的变故，彭印兰直到死，也绝不会将那些绘图工具动一动位置的。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不，本来就是不可能的！

“安得广厦千万间”！

这一行字即使在黑暗中也会醒目地跳出来！那只搪瓷杯子放在绘图台的左角，里面沾满茶锈，有铜钱大小的一块瓷脱落了。那是丈夫关牛棚时被造反派摔的，那个人嘲笑祝绰英说：“臭清高！你成救世主了？叫你住两年牛棚，你就知道什么是广厦了，哈哈哈哈……”

广厦有多大呢？啊，说不清。祝绰英最后的居室不过是骨灰架子上的一个小小的格子，像没人问津的冷门货，永远摆在那里……不，不会永远，火葬场只准她交 3 年的租金，据说过了 3 年不取走，就要扬到菜地里当钾肥，因为死人的住房也是紧

张的。

绰英啊绰英，你活着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给死人设计一栋永久性的大厦呢？

应当给祝融打个电话，万一他不是夜班，是到女朋友那里去了呢？

习惯啊，真害人，她竟然朝茶几那里走去。

茶几上早就没有电话机了，墙上只留下一截残线。唔，电话线路的紧张程度大概远远超过住房的紧张程度，或者电话与级别的关系更要密切些。

那是从火葬场回来的时候吧？也是一个黄昏，祝融扶着妈妈一步一步地走回家门。

一个背着桶式皮兜的人站在院门口，显然等得焦急了，正向路口张望。电工，那是一目了然的，装钳子、螺丝刀和电工刀三大件的皮带沉甸甸地从腰间坠到那人的屁股后头。

彭印兰认得这个毛头小伙子，是学院总务处电工班的，姓王。他给彭印兰的新居安过电表、装过电话，她给小王的皮兜子里塞过好几大把奶油太妃糖呢！那时小王乐颠颠的，一边接电线一边讲着市里的新闻，是个不知犯愁的小家伙。

今天他可是冷着脸，说话吞吞吐吐，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直到小王跟着彭印兰母子进了客厅，他也没说清来意，只是反复说那么几句：“不是我乐意来的，隋处长逼着我，我……怪不好意思的。”

唉，人老了总是迟钝，你彭印兰怎么会看不出火候呢？祝融倒是眼尖，他一眼就看出了小王来的目的。小王那双眼睛不时地向茶几那里瞟一下，茶几上除了电话别无他物，电工与电话不是很对口吗？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小王不得不来扮演拆电话的角色。

儿子几乎生气了，没好气地说：“妈，您怎么还不明白呢？

人家是来撤电话的！”

心里酸啊，委屈得默默流泪！

有什么委屈的呢？电话是装上的，也自然能够拆掉，装与拆不是很自然吗？你的丈夫死了，你家没有需要配备电话资格的人了，人家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在任何时候拆去电话，你却没有任何半条理由阻止人家。

电话除了吵人而外，对于彭印兰来说，没有什么优越性。不，也不能说没有，儿子值夜班不回来不是可以直拨电话了吗？

虽然顺理成章，彭印兰却仍然咽不下这口气！干吗这么急呢？缓一个礼拜也好啊，让人家心头的哀痛平缓一下再下手，不是更能叫人过得去吗？

咋地一声响，祝融把电话线扯断了，朝电工一挥手：“拿走！电灯总不至于也掐掉吧？”

太过分了，拿一个小电工撒什么气呢？他不过是受人支使的。儿子惹下的麻烦还得当妈妈的去了解，她说了好多好话，把小王送走了。

总务处长隋云佩为什么不亲自来掐电话？得罪人的事要看人家白眼，他当然要躲到幕后去，锦上添花那才是他乐于往前钻的。

不是吗？在搬进新居的时候，隋云佩不是亲自带着电工小王来安装电话的吗？

隋云佩事前没有打招呼，其实，早一天迟一天安电话也无关大局。可他是那么积极！那天晚饭后一家人到光明楼影院去看了一场电影。散场回来，他们发现隋云佩带着小王坐在院门口树下，两个人怀里抱着电话机，正嚼吃着干烙饼，他多么耐心，以至于在人面前暴露了过分巴结的尾巴。

院长的任职令是同电话一起到达的，院长死去，电话当然应当随之同去，无可非议。

这难道是正常的风气吗？

电话打不成，她索性打消了这个念头，这附近没有公用电话。在这片高级住宅区里，家家都是有电话的，彭印兰不愿去扣人家门求借电话，太没有意思。

肚子饿了，嘴里发苦，她已经走到厨房门口了，却没有心思去打开煤气炉，哪怕烧杯水冲点奶粉她都没有心思。

还能在这座房子里住几天呢？

她和衣倒在床上，望着淡黄色的天棚出神。

具体日子不好说，那要看自己是否主动去找学院谈。自己采取明智的办法，既给自己铺了下台的台阶，又给学院的领导借坡下驴的机会，两全其美。一方违心地主动退房，一方假作不忍地接受，于双方面皮都无伤。

可是儿子怎么办？祝融的婚事不办了吗？

本来祝融要到年底才结婚的，现在不得不提前了。他被组织上选定为出国医疗队成员，在遥远的索马里首都莫加迪沙，他将要度过三个寒暑。3天以后，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要到省卫生厅集中，半个月后到北京受训，留下的时日实在有限了。

像普通的母亲一样，彭印兰愿意使儿子的婚礼办得风光一点。儿子的女朋友叫蓝月，是市歌舞团的专职报幕员，人长得很漂亮，家里条件也不错，她父亲是警备区的一个处长。

给彭印兰最突出的印象，是蓝月特别喜欢这栋房子，尤其喜欢那个又宽又大的带铁栏杆的阳台，每逢她到阳台上，总要情不自禁地“啊——啊”地喊上一阵儿，一声高一声低，大概是试着吊嗓子。

及早让他们结婚，赶在儿子出国以前，这是彭印兰的主意。她生怕有一天丢了这栋房子，如果让新娘子到一个寒酸的住宅去举行婚礼，未免太委屈了，孩子是那么喜爱这幢楼！

老年人怕孤独，彭印兰也有私心，儿子远走高飞，如果有一

个媳妇在跟前，日子会好过些。

可是，总务处长隋云佩能够给她留下那么充裕的时间吗？万一明天早晨突然宣布要她倒房子怎么办？

那太可怕了！

不，能多赖一天是一天，赖到儿子结了婚，哪怕只让儿媳妇在这栋房子里住上 3 天，她也就知足了。如今，一个小小的助理工程师所具有的能量只有一个字：拖。这一切都怪祝绰英死得太突然了，他带走了一切，也包括房子。

彭印兰躺不住了，把屋子里所有的灯都打开，光明能给人壮胆。

她一步步走上楼梯，来到二楼。

这是一间 15 米左右的房子，未来的洞房。窗子是落地式的，新家具还没来得及置办，屋子里只有儿子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上堆着一些精装的医学书。

靠窗应当有一套全包沙发，立柜、五斗橱应当摆在西墙那里，写字台摆西面，床最好是有弹簧垫子的，斜角摆放……

这么一大套家具筹办起来可不容易。没有木料，现打是来不及了。只好去买，不行，凭结婚证只供应一张木床、一张圆桌、一个很不像样子的衣橱，蓝月在闲谈时说过了，那是“背时货，冷丁看去，像土改分的浮财”……

这种家具，连彭印兰都看不上眼，何况人家年轻人呢？

不是有家具自由市场吗？对了，青云路的市场上什么家具都有，样子百花齐放，只要肯花钱，倒是可以买到可心的。

彭印兰转身下楼，从皮箱里拿出一张票面一千元的死期存款单，是 5 年定期的，再过一年，就可以拿到二百多元利息的，现在取，要损失些利息。为了儿子的婚事，就当丢了一些钱吧！

她决定明天一早就去请假，最好带上蓝月一同到自由市场去，祝融是个无所谓的人，除了他的听诊器，别的好像都可有可

无。只要媳妇满意，就行了。

她的心稍稍踏实了一些，她眼前出现了一间焕然一新的新房，宾客盈门，谁说我们是靠老头子撑门面呢？

儿子还是幸福的，结婚像个结婚的样子，至少是有房子吧！

当年自己同融融爸爸结婚的时候，那真叫“游击式”，她给儿子讲过，儿子非但不同情，反倒哈哈大笑。也许这一代人真的觉得好笑，他们离那种日子太远了。

一排四面透风的旧帐篷，那就是建筑队的驻地了。只有一间水泥结构的房子，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炮楼子，修理了门窗，成为设计师的办公室。只有祝绰英拥有这点特权，别人，包括工地总指挥，都得挤到双层铺的帐篷里去。

在这片沼泽地上，将要建造起一座大型的纺织厂来，年轻的工程师祝绰英不过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他年轻、英俊、有学问，自然成了姑娘们瞩目的对象。

彭印兰是没有非分之想的，她刚从乡下来，念过6年书，是应召来当纺织女工的，在厂房没有建成前，先当建筑工人。因为她念过几年书，施工队的报表之类都由她来填写。

她太认真了，她有一把巴掌大小的化学三角尺，她写在表格里的字都是用三角尺比着画出笔划的，横是横、竖是竖，像印刷铅字一样漂亮。

农村长大的姑娘没见过世面，彭印兰见到生人就脸红。她填写的施工进度表，每天都应当亲手送给炮楼里的祝绰英的。这是她最打怵的事情。有好多次，她都是央求李忆菊替她跑腿，代价是答应抽空给她缝一件花布衫。

李忆菊在女工里是个拔尖人物。长得虽然算不得漂亮，但她是城里人，会打扮自己，懂得扬长避短。譬如她的嘴大，她就浅浅地涂一点口红，抹红的地方比嘴的大小减了一圈，居然不给人嘴大的感觉。李忆菊极其精明，说起话来不让人，若讲吵架，十

个人绑在一起不是她的对手。

李忆菊怎么会乐意给农村大姐跑腿呢？

鬼知道怎么回事，她代劳了两次以后，变成了自觉行动，天天傍收工时守在彭印兰跟前催她：“快点填哪，我好给你送报表去。”那积极劲儿真叫人生疑，好像送了报表她能得到一百两黄金的赏似的。

农村姑娘腼腆，却不见得傻。

渐渐地，彭印兰发现了秘密。李忆菊每次到祝工程师那里送报表，本来是半分钟的事，她却能在那里泡上半个钟头。这还不算，平时李忆菊是大觉迷，吃过午饭，连碗都不洗，一抹嘴，倒头便睡，下午出工的哨子贴她耳朵吹，她都不乐意起来。可是这些天附在她身上的瞌睡虫好像突然飞走了，她天天午间出去逛，回来总是春风满面，快乐的标志是肆无忌惮地拿别人的缺欠开玩笑。

彭印兰无意中发现，她天天中午是在祝工程师的炮楼里消磨的。

是李忆菊爱上了年轻的工程师吗？差不多。

彭印兰是个从来不传闲话的人，她乐意成全人家，有时故意把报表分两次填写，李忆菊就多了一次上炮楼的机会。

有一天，人们都到南郊火车站去卸纺织机了，女工帐篷里只剩下彭印兰一个人，报表早就填好，看看太阳压山了，去卸货的人还不回来，她有点急了。听传言，别看祝绰英年纪不大，可脾气满大，训斥一大把胡子的领工员像训儿女一样不留情面，当然那个马大哈领工员也实在够呛。

再等下去她怕误了事，只好硬着头皮去见祝绰英。

其实，她常见到祝工程师在饭堂、在工地，只是没有说过话，她觉得这个人有点傲气，说起话来旁若无人，大概有学问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吧？

彭印兰蹑手蹑脚地走到炮楼前，焊上去的铁门关着，原来当做枪眼的地方又扒掉了一块，镶上一扇方不方、圆不圆的玻璃，那是惟一的窗户了。她扒着窗子往里一看，祝绰英正坐在绘图桌前拿着铅笔敲打图纸出神，另一只手捧着个大搪瓷杯子，上面写着两行字，离得远看不清。

彭印兰觉得心怦怦直跳，使劲控制了一下，才去敲门。

随着一声“请进”，倒是工程师自己推开了又厚又蠢的铁门。他吸了多少烟啊，门一打开，灰蓝的烟雾一团一团往外冒。

“哦，是你？”祝绰英一边让她进来，一边说：“你好大的架子呀！天天雇个通讯员来送报表。”

彭印兰的脸忽地一下红到耳根，她一句话都答不上来，既不能认账又没法否认，局促不安地立在地当中。

“今天你是亲自来送报表了？”祝绰英坐回到补了一条腿的椅子上，点起一支事前卷好的纸烟，说：“你的义务通讯员到南郊卸货去了，是不是呀？”

看来，祝绰英对这件事很不满意，大概李忆菊对工程师也是一厢情愿，如果他喜欢李忆菊，还会用这样挖苦的词儿吗？

彭印兰试探着解释说：“你别生气……我觉得报表……谁送都一样。”

“是呀，”祝绰英说，“但你选择的人太讨厌了，像只麻雀，一进门就唧唧喳喳没完没了地嚷，翻这个、问那个，天然的干扰器！挺大个姑娘，你又不好下逐客令。唉，你算把我坑苦了……”

李忆菊是什么性情，彭印兰会比工程师知道得少吗？听了祝绰英的话，她后悔极了，嚅嚅了半晌才说：“那……以后我不叫她来送就是了。”

“那也不行，”祝绰英说，“她进这个门槛儿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她不送报表，也会来施放干扰，中午不让你休息，天南地北

扯闲篇儿，你工作，她就在一旁打岔……”

彭印兰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一样，十分惶惑：“那……怎么办呢？”

祝绰英捻灭烟头，说：“你决的堤，还得你来堵，你愿意帮我一点忙吗？”

彭印兰点点头。

祝绰英说：“每天中午、晚上就寝前，你替我把门在外面锁上。”

彭印兰觉得不可理解：“把一个大活人锁在屋子里？”

祝绰英点点头：“白天李忆菊去出工，用不着锁，何况我还要随时出去。休息时间要与外界隔离，不然这套设计图要拖期了，连个描图员都没有，全靠我单枪匹马干。”

彭印兰虽然觉得上锁的招儿不是好办法，却乐意为工程师效劳。祸是自己闯下的，你不替人家周旋怎么办？

一把铁将军，确实把李忆菊拦住了。开头几天她四处访听，以为工程师出差了，打听到施工队长那里，挨了一顿训：“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去工程师那东扯西拉，他那一分钟比你的一年都值钱！”

李忆菊幸亏是个心宽的人，蔫了几天，又活跃如初，抛开没有指望的炮楼子，开始如走平道地跑钳工班了。据说那里有个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见习技术员，成为这姑娘新选中的攻击目标。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两句诗真有意思！当初祝绰英念叨这诗，彭印兰还半懂不懂，结婚以后，当然明白了。

天晓得，她和高不可攀的工程师是怎样结为伉俪的！他相中了她的善良、沉静吗？还是因为她写得一手不比铅字逊色的好字后来被选中为他的描图员？

如果没有那一把将军锁，也许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人都说新婚之夜是最甜蜜的，他们的洞房是什么样子的？说来好笑。

芦席苫顶的破屋，三面用千疮百孔的老帆布围起来，正面是废旧枕木垒起来的，有出口，没有门。结婚那天，人们把这间洞房装潢了一下，油污的枕木上贴了双喜字，门上挂了个印花布门帘，屋子里堆放的水泥袋子归拢到一面，两个玻璃箱子放到地上当床腿，上面铺了十块跳板，不像床，倒像文工团在露天演出临时搭的台子！

寒酸的婚礼不会减低人们的快乐，来吃喜酒的人挤了一院子，每人端一个饭盒，里面是两样菜，白菜烧狮子头，肉片炒木耳，都是人们自己在大食堂打来的，只有两桶烧酒是新郎出钱买的。

多么热闹的场面，火把、篝火，手风琴在演奏青年圆舞曲，青年男女在草坪上尽情跳舞。专搞恶作剧的小伙子们在院子里拴了一根长长的线，线上吊着一个不红不绿的苹果。男女宾相分别押着她和祝绰英去咬那苹果，要求同时咬下一块才算数。真难死人，苹果晃来晃去，等她下决心去咬时，苹果一滑，飞走了，她的嘴贴到了祝绰英脸上……哄堂大笑……

这笑声，多么亲切、耐人回味……

过去了，像翻过去的日历，永远不会再翻回来一样。

啊，那叫什么洞房啊！天下着讨厌的秋雨，外面大下，里面小下，以至于一整夜互相抱着、坐着，床上已经湿得没法躺下了……

那也是家！清苦然而有乐趣。

她和丈夫一生是专门给人们造屋安家的，没有哪一个人比他们乔迁的次数更多的了！油毡纸房、帐篷、破工房、干打垒……什么样的房子都住过。

如今她住的这一套，是惟一像样的，她曾经满足了。可是，

现在她必须考虑马上倒出来，她还要乔迁……也许祝绰英从此省心了，他倒是不用操心搬家了……

彭印兰直想哭！

“赶脚的人”并不指望骑驴

天刚蒙蒙亮，一宿没有合眼的彭印兰就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她冲了一杯麦乳精，嚼了两块咸味苏打饼干，拿上存折，走出房门。她要赶到市中心去，等储蓄所一开门就取款，然后在公用电话亭给制图室霍主任打电话告假。制图室霍主任是个好老头儿，从前给祝绰英当过助手，这几天他一再劝说彭印兰，要她在家养养神，恢复一下体力再上班。彭印兰所以天天去上班，主要是因为耐不住清冷，她怕一个人关在家里。丈夫的遗迹俯仰皆是，只要待在家中，她就想哭。她估计，制图室主任会同意她休息几天的。

锁好房门，走到院门口，她有点神经质地向两面路口张望一阵，生怕附近再有一辆什么车子停着，惟恐再有陌生而自信的男女对她的住房评头品足。还好，没有，马路尽头静悄悄的，一辆洒水车刚刚驶过，后面有几个清扫工在扫着路上的垃圾和雪粉般的杨花。

关好院门，她无意中回头一瞥，瞥见了架在房顶的电视机天线。那天线是鱼刺状的，叫“鱼骨天线”，接收功能极好，是儿子搞来的。其实她家的14英寸彩色日立牌电视接收机图像很清晰，附近又没有工厂干扰，不用外接天线，也蛮好的，架上鱼骨天线不过是防备万一。

应当把鱼骨天线取下来！

彭印兰忽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她家房顶是西方教堂式的尖顶，本来奇特，再架上银光闪烁的鱼骨天线，就更显眼了。人贵

有自知之明，只要把它取下来，就会给明眼人一种印象：主人是明智的，随时准备离开这里，像战败的巡航战舰上降下军旗一样。

这是有前例可循的，原来住在这里姓韩的那户人家不是这样做过吗？前院长上干校，这里曾挤进 4 个工人呢。

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姓韩的人家，她的心就发紧、发抖！她不怕他们，只是讨厌，像吃着饭突然想到粪坑里的蛆一样恶心。

姓韩的原来是个架子工，是省二建公司的工人，在那胆大就可以平步青云的年代里，他当上了建筑工人“红造大”的造反兵。大头头结合到省委、市委，他呢，捞不到大便宜，就和几个工人抢占了院长的小楼，四一二十二，理所当然。

他是否挥舞过钢丝鞭打过人？也许还蘸着凉水！丈夫脊背和屁股上的疤痕说不定就有姓韩的打下的印迹！彭印兰总是疑心。

她问过丈夫，姓韩的动没动过手，都是哪些人打过他……祝绰英每逢听到妻子的发问，不是顾左右而言他，便是反问：“问这个干吗？莫非把打过我的人找来还上几鞭子不成？还是给他们穿小鞋，来个小小的报复？”

彭印兰当然不会这么干，她只不过想知道一下各种人的本来面目，她知道丈夫不愿说，是怕她出去乱传，她觉得丈夫心地太善良了，连起码的自卫的心计都没有。可是你能说这种品格不好吗？只不过是这口气忍不下去。

你自己没有心软过吗？你自己没脸红过吗？你自己没有向丈夫提过延迟一个月再往这座房子里搬吗？

也许姓韩的也是个没房住的困难户，他毕竟是个工人，后来听人说，他除了瓜分院长楼而外，还算本分的。

但当时彭印兰可咽不下这口气，她曾经十分痛恨姓韩的，恨他的老婆尤甚。

你恨人家，人家就不恨你吗？

多么脸红啊！干吗两次偷偷去看房子呢？房子的主人还没有搬走，你就去相看，这同昨天那对讨厌的男女有什么区别？将心比心嘛！

那天，姓韩的正爬到屋顶上往下摘电视机天线，是蛛网式的，好像是土造的。他也有预感，这栋房子即将更换主人了。这是自然的，1976年底，建筑学院开始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对老干部落实政策，那三户识趣的工人早悄悄搬走了，他也回到架子班去爬他的脚手架子。他纵然是个八级大工匠，也断没有占着这栋规格很高的房子之理。

真懊悔！在房前屋后看上一眼就走，也就少惹闲气了，干吗逗留那么长时间？都怪那个隋处长，他唠唠叨叨地讲述着房子冬暖夏凉，朝阳通风的优点，甚至连厕所是坐式抽水马桶，脏了该用硫酸冲洗的常识都没有忘记介绍。

碰上了，讨厌的女主人！

看来她正生孩子，头上包着帕子，怀里抱着裹在襁褓中的婴儿，坐在铺着一条被子的手推车里，从产院回来了。她的丈夫流着汗低头推着车……若是早些时候，还不是轿车接吗？

彭印兰来不及躲闪，同刚生了孩子的女人打了个照面。这女人看上去不超过35岁，长得很漂亮，丹凤眼，吊眉梢，嘴唇很薄，一望可知是个厉害茬子。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姓韩的明明看见总务处长带着院长夫人在看房子，他想装看不见，低头过去就算了。却不料他女人尖利地叫了一声：“停下！”

不用说，在外面可以斗倒省委书记的造反者，在家里却是个败将。姓韩的虽然不乐意，还是顺从地把手推车停下，乞求地说：“又怎么了？看受了风……”

他妻子不理睬，抿嘴一乐，上下打量着彭印兰，夹枪带棒地说：“没什么，认识一下。本来应当请夫人到屋里坐坐的，一来

生孩子秽气大，别冲了你的好运，二来这房子已经不是我们的了。不过，我希望……啊，不说了，杀人不过头点地……”

彭印兰恨她，却又无可奈何，干憋一口气。

倒是隋云佩旁敲侧击地对姓韩的说：“快推她进去吧。这不好吧？这可不是造反有理的年月了！”

姓韩的不吱声光点头，他妻子却怪声地笑了起来。

那天，彭印兰气得两顿没吃饭。但丈夫说：“你呀，到底是女人心肠，太狭隘了。应当原谅她、理解她，她随着丈夫忽而上云端，忽而跌下地，不是她的罪过。她也是人，表现出来，倒是真实的……”

奇怪的逻辑！若讲解气，彭印兰真打算叫总务处长发令，勒令姓韩的立刻搬走！

可她也是母亲，静下心来又心软了。她提出，等到那女人满月再搬家。祝绰英十分高兴，冲她一笑，说：“我以为你要动员一伙人去拔人家锅灶呢！他们毕竟是普通工人嘛！”

事实上，后来的变故，又同拔人家锅灶有什么两样呢？

第二天，总务处长隋云佩突然带来一伙人，两辆解放牌大卡车，要给院长搬家。

彭印兰说：“不是说好，等人家满月后再搬吗？”

隋云佩笑嘻嘻地说：“拖过初一，还能拖过十五吗？他们还算识趣，自己悄悄搬走了。”

彭印兰放了心，人家搬走了进来，总不会落下撵人搬家的嫌疑了。

谎话，隋云佩说的全是谎话！

当彭印兰押着第一车家具、杂物赶到新居时，她愣住了！

韩家哪里已经悄悄搬走？院子里孩子哭、老婆叫，破东乱西堆了一院子。女主人头上的帕子摘掉了，骂着十多岁的大孩子：“死崽子，勤快点不行吗？别等人家大车小辆进来，丢人现眼！”

男孩子嘟囔着不肯：“人家没请假，老师该批评了……”

“不念那个驴马经又能掉块肉？”女主人上去拖孩子，孩子往后挣，她一扬手，打了孩子一巴掌，孩子趁势坐在地上大哭大叫。

拄着一支枣木手杖的老人从丁香树下站起来，袒护孙子。他不好责难儿媳，只好拿儿子出气：“都是你这个孽种！咱家祖坟没冒青气，不好好当你的工人，倒想造他娘的反！造吧，哼，造得凶、摔得重，到头来还不是摔得鼻青脸肿？叫我有什么脸见人？不如一头碰死……”

儿子正往手推车上装箱子，本来没好气，听他爹这么说，一松手，手推车翻了，箱子里的零碎东西扬了一地，他一跺脚，说：“都少说几句行不行？发昏当不了死！谁让我喝了迷魂汤了呢！我若早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我还当逍遥派了呢！”

全乱套了！彭印兰恰恰在这时候赶到，那不是狭路相逢吗？

对比是鲜明的。这边是现代化搬迁，“志愿者”成行；那边是手工作业，肩挑人扛，最多有一辆手推车，连一个上前伸手帮忙的人都没有。一方是乔迁之喜，一方是乔迁之悲……

彭印兰忽然觉得有愧，究竟为什么，自己也说不清。站在汽车挡泥板旁，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呆呆地望着一片忙乱的韩家。

像蚂蚁搬家一样，韩家大大小小跨出门了，连5岁的小男孩怀里都抱着一个包袱。女主人背上背着降生不过10天的婴儿，同丈夫一起推起堆得如同小山一样的车子，一步一颠地走出来。

她那双眼睛是充满敌意的，两道眉毛吊得更高了，像舞台上化过妆的青衣。

她的内心活动，不难猜到，她不会恨总务处长的势利眼，她肯定恼恨彭印兰逼人太甚。

彭印兰恨不能长出八只嘴解释一下，有用吗？人家肯信吗？

女主人走过来了，在离她仅有一米远的时候，她苦笑了一下，说：“你真做得出啊！不觉得太性急了一点吗？登得高、跌得重，但愿你们步步高升，别落到我们这步田地。”

又是无声的苦笑，不，苦笑里分明藏着讥笑……这可怕的笑，永远刻在彭印兰记忆的屏幕上，什么时候再现，什么时候令她心悸。

报应！登得高、跌得重，现在自己不是跌下来了吗？那女人辛辣的嘲讽仅仅时隔一年就成了现实，她将要像当初韩家老小一样，肩挑背驮地悄悄从这栋房子滚蛋，不会再有总务处长来坐镇，也不会有那么多不相识的“志愿者”光临。不，朋友们会来，祝绰英还有一批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学生……

那场面，千万别叫姓韩的一家人看到！那将是最难堪的。失意的事情被朋友看见，还能博得一点同情；倘暴露在仇人面前，那要遭到报复后的快意……

取钱很顺利，告假没有费什么周折，买家具却是大伤脑筋的事。她记得蓝月随口说过，“捷克式”的家具大方、适用。

彭印兰可不懂得什么捷克式、斯洛伐克式，在家具市场上来回转了两个钟头，拿不定主意。

她打电话给蓝月，叫她来亲自挑选，蓝月说她正在排练进京演出的一台歌舞节目，脱不开身，至于买家具的事，她好像说了一句“不必这么早张罗”……

什么意思？不想最近结婚吗？不对呀，如果不出丧事，他们在“五一”节时就要办喜事的。排什么节目呢？她是报幕员，似乎用不着守在排练场……

彭印兰在市场上转得头昏眼花，花2分钱买了一杯凉茶喝下去，又到公用电话亭给儿子打电话，连着打了3次，才算找到了儿子。他在电话里没有什么高兴表示，也没有反对的言词，只是简短地说：“您等等，我马上去。”

儿子来了就好了，就有了主心骨了。

彭印兰坐在马路边上，拿扇子遮着阳光，一直望着 13 路汽车总站那里。儿子只有乘 13 路汽车才最顺当。

然而，祝融却是从相反方向的 4 路无轨车上下来的。噢，怪不得他耽搁了一个多小时，他可能绕到歌舞团去找蓝月商量的了。

祝融像他爸爸一样，高身材，走路有天然的学者风度，一点都不发飘。他的额头也像他爸爸那么高，是被彭印兰戏谑为“下雨浇不着眼睛”的。可她打心眼儿里喜欢高额头。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她惟恐是个扁额头，据医生说，高额头的人聪明，谁知道有没有科学根据！

有其父必有其子，儿子是业务尖子，这不是被选拔出国了吗？彭印兰最欣慰的是儿子和他爸爸一样聪明，和他爸爸一样有事业心。祝绰英曾经开玩笑地说过：“根据遗传学观点，下一代可能继承父母双方的优点，也可能承袭父母双方有缺陷的基因。如果父母双方一方是愚笨的，下一代愚笨的系数就要大得多！”

谢天谢地，儿子承继了父母染色体中最优越的部分，这说明他的母亲也是不愚笨的。

那么下个一代呢？彭印兰最怕儿子找上一个浑浑噩噩的蠢材。还好，蓝月的精明劲胜过自己 10 倍，第三代人也许要出一个高能物理专家呢！

胡思些什么？眼下第一位的是缓期迁居，把漂亮的家具充实进去，一切赶在乔迁之前……

祝融走近了，伸手搀起妈妈，眼里露出怜悯母亲的神色。他说：“大热天，您这是何苦呢？即使要结婚，也用不着这么大操大办。您结婚的时候，不是……”

“瞧你说的！”彭印兰打断儿子的话，说：“那是啥时候啊。来，你看看，那边有一套成套的家具，要 800，贵是贵点，样子不坏，可不知道是不是捷克式的，7 件，少一张写字台……”

祝融不怎么热心，但不愿意伤妈妈的心，就挽住妈妈的胳膊挤过去，样子像很专注，这摸摸，那敲敲，最后说：“妈，听说友谊商店有一种出口的家具，最新式的，咱多看几家再定，好不好？”

“你怎么不早说？”彭印兰瞪了儿子一眼，“叫我白蹲了一上午自由市场。走，咱先回家，午后咱俩一道去，待会儿你再给蓝月打个电话，最好她也去。”

祝融说：“方才我到歌舞团去过了，她们正忙着排练进京会演节目，不好告假。”

“那就算了，”彭印兰说，“有你当参谋就行了，将来蓝月不至于埋怨。”

祝融张了张嘴，本来有话要说的，见妈妈兴致勃勃，又不忍心扫她的兴。

娘俩一路各想着心事，回到那栋宽大然而冷清的小楼里去。

彭印兰到厨房里去准备午饭，儿子坐在厨房门口帮妈妈洗青菜，他说：“我马上就要出国了，时间太紧，我想同您商量一下，回来再结婚吧。”

“那怎么行？”彭印兰用围裙擦着手上的水珠说，“如今的女孩子，水性杨花……我倒不是说蓝月会变心，我是图个快乐，趁咱还住着这栋房子……”

祝融苦笑了一下，说：“您真是……她如果真爱我这个人，就是在露天地结婚她也不会嫌弃。若是希图享受，当这座房子退掉时，不还是要吹吗？”

不管怎么说，彭印兰只是不答应，祝融不好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

友谊商店确实有一套相当高级的家具，特别是那张席梦思床，从垫子到床屉，都做得十分精致，彭印兰一眼就相中了。祝融呢，谁知道他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在一旁笑。

彭印兰问售货员：“这套家具要多少钱啊？”

售货员打量她一眼，没有正面回答：“这是要外汇券的，看好啊！”

彭印兰的心凉了半截。外汇券上哪儿去弄啊？海外一无亲属、二无朋友，难道可以像那些会钻营的人一样，到黑市上去高价套取外汇吗？

正在她犯愁的时候，祝融说：“妈妈，除了这一套，怕蓝月都看不中，您就别瞎买了。等我自己想想办法。”

彭印兰疑心儿子在使用缓兵计，就问道：“你有办法搞到外币券？莫非去偷、去抢？”

“我找找朋友看。”祝融说，“在医院里，我有几个华侨朋友，他们手头可能有。”

彭印兰半信半疑，走出友谊商店还在发牢骚：“越来越邪了！世面上脱销的东西，毛毯啊、呢子毛料啊，外汇商店倒是都有，天上不下美元，地上不长英镑，这叫什么事……”

祝融要到医院去，把妈妈送到电车站，自己走了。

彭印兰白忙了一天，两手攥空拳，儿子、媳妇的消极态度令她心里犯寻思，她在电车站呆了半晌，一连过去四五辆车，她都错过了上车的机会。18路车来了，她稀里糊涂跟在别人屁股后挤进中门，车门一关，才听售票员有气无力地吆喝一句：“18路，开往大光寺……”

大光寺？这不是经过建筑学院的远郊车吗？也好，回家怪闷的，到学院去转转，她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希望来，怎么把李洪济忘了呢？他肯定有外汇券！

对呀，他有，也一定肯帮忙的。

李洪济是祝绰英早年的学生，他父亲在加拿大经营着一家“渤海中国餐馆”，生意兴隆。他是卖豆芽菜出身，30年代漂洋过海去谋生，一开始只开了个小饭铺，专门炒“肉丝细菜”，他

的“细菜”黄盈盈、脆生生，有人拿去化验过，高蛋白，一下子在“晚报”上轰动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细菜”产在哪里，是什么科目的植物。其实，不过是最常见的绿豆芽，他生得好，是放在一个布满小洞眼的水桶里生的，水桶悬空，上面自来水滴滴答答不断流，豆芽菜能长到3寸长，为了叫食客认不出是什么，他在切菜上灶前把豆芽的根和梢都掐去，一个豆瓣都不带，于是发了大财，小饭馆升级，成了大饭店。

由于受了老师的影响，李洪济说什么不到加拿大去接受遗产，反倒劝父亲回国来度晚年。最后还是老子被儿子说服，从1978年起，每月陆续邮寄上千元外汇券回来。

李洪济手里当然有大量的外汇券。

向他张口借吧，用什么还呢？

向他兑换吧，无形中占了人家便宜，人所共知，用外汇券买商品，至少比国内一般市场价格低1/3。

不等价兑换吗？不是等于贬低李洪济的人格吗？

唉，张口求人实在难于启齿啊！去年，李洪济上赶着送来900元外汇券给他的老师，要他到友谊商店去搬一台日立牌彩色电视机。祝绰英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到底多花了一倍的价格用人民币在国营商店买了一台。

现在，你终于到了厚着脸皮去吃回头食的地步了，真有点害羞。

李洪济刚上完大课，捧着教案从阶梯教室走出来，迎面碰上了彭印兰，问她：“听说您上午没来，是身体不舒服吗？”

“啊，不，不，”彭印兰一点勇气都没有了，她本来应当说“我正要找您”，那不是就能逐渐切入正题了吗？

她同李洪济点点头，朝校部楼走去。

李洪济追上一步，说：“您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这几天课排得太满，一直想去看您，总是倒不出空来。”

真后悔！干吗不说呢？脸一红不就过去了吗？死爱面子活受罪！

制图室里的人都忙着，绘图桌底下的荧光灯都亮着，很静，只有鸭嘴笔画纸的嚓嚓声。今年民用建筑大幅度增加，建筑设计院忙不过来，有 1/3 左右的任务压到了建筑学院，制图室首当其冲。

彭印兰心里有事不落底，站在门口犹豫着不知是该进该退。戴着老花镜的霍主任发现了她，悄悄走过来，把她挡在门外。两个人来到走廊，霍主任用一支绘图铅笔朝二楼指了指，说：“包书记找你。”

彭印兰点点头，转身要走。

霍主任又追上来补了一句很含糊的话：“冷静一点，不管对什么事，都得看开一点。”

彭印兰心里一紧，本想问问霍主任有什么风声。听他的口气，他好像摸到一点蛛丝马迹。可是她知道问也是枉然，霍主任宁可把话烂到肚子里，也绝不肯多说半句。1957 年鸣放，他一个字没放；1959 年反右倾，他一句话没说：“史无前例”的 10 年，他一张大字报没贴，亏他憋得住！他这种人永远不会被信任，永远叫人怀疑他肚子里有鬼，可永远整不到他头上，他的一生是跟头把式折过来的，付出了高昂代价换来了可怜的安全。

老霍对祝绰英算是最信赖的人了，所以才半吞半吐地说这么几句阴阳嗑，换别人，他半个字都不会露的。

不会是好兆头！好事还用得着藏着掖着？用得着劝人家“冷静”、“看开一点”？

能有什么厄运？除非是那栋房子！

彭印兰如果不为了儿子结婚，她早递上申请书要求退房子了。

她摸透了几个院领导的脾气，大概谁都不愿出面同她摊牌，

这不是发奖状。5 天以前李洪济和李文陶几个人给她出主意打气，李洪济说：“顶住，您别软下来就行！看谁敢把您的行李扔出去！您得学郭副院长的老婆，先亮出条件来，他们不答应，就无限期拖，搞马拉松！”

学郭副院长的老婆？她学不来，也不想学。

郭副院长是 1974 年病死在干校的，去年开了平反大会，他老婆上去控诉，鼻涕一把泪一把，人人都同情。她真是个人物，正在党委为着安排她的住房感到棘手时，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了原来她住的那栋小灰楼，离彭印兰现在的楼不过 500 米。那栋房子刚刚修理粉刷过，是安排给包书记的，当时包书记的家在原来插队的乡下。

为这件事，党委先后召开了 5 次会，其中有 3 次是扩大会。大家明知道郭副院长的老婆没有资格再住那栋楼，可是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去同她交锋。这样拖了 3 个星期，总务处长隋云佩终于想出来一个绝招：大家一同去。

这总比一个人去得罪人，去说服一个难缠的女人要好得多。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郭副院长的老婆又哭又嚎，又骂又摔，最后提出了条件：要一套教授楼，楼层指定要二层。

虽不合理，党委只得妥协。也有说的，郭副院长被迫害致死，对家属应予以照顾嘛。

为了一套房子卖掉人格，彭印兰不会干的，何况那是给死去的丈夫脸上抹了一把灰。她不想赖住那栋楼不走，也不想以此为要挟条件，下了马再换条驴骑。是赶脚的级别，走自己的路，心里不愧。

万一党委又来个“集团性”的谈判怎么办？

她在楼梯中间怔住了。那就直说，要求延长两个月，或者一个月，叫儿媳妇在那栋舒适的房子里度完蜜月。

这总不能说是过分吧？

阿弥陀佛，只有包书记一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集团冲锋不会有了，她松了一口气。

包书记是浙江人，在东北工作 20 余年，还残留一点温州口音。他为人和气，教师、学生都说不出他有什么缺点，他有好多疾病，连医生都统计不确切，反正他只要乐意，随时都可以住院，而且任何大夫都不会认为他是装的。几十年来，所有大的运动他都没有从头至尾参加过，风一变，他准住院，运动一过，他出来收拾残局。别人都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他呢，干干净净，有发言权。“文化大革命”中，他这一套不那么灵，但也算有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公布的当天，他就住进了医院。他没有当过“镇压左派学生”的“消除队”，没有“保过皇”，没有与任何一个派别挂过钩，当然不是“黑后台”，也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之嫌；他历史上干干净净，没有被捕过，当然不会是“叛徒”，他很少过问学院的业务，他连“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知道怎样迈步！

但那张网是史无前例的，网眼小得连草虾都逃不掉，到底有一天人们想起了这条溜滑的泥鳅，于是把他从医院里揪出来，一起赶到了乡下去。但他受的苦到底比别人少得多。

这次分房子，就是在他主持下推翻祝绰英原方案的，不过你抓不到他什么把柄。在祝绰英离开学院带实习生南下后，他决定召开一次全院干部大会，讨论房子分配方案。新方案是半数以上通过的，他又请示了省委，他有什么责任？

按照包书记的处世哲学，在处理彭印兰退房的问题上，他应当回避才是，他的反常，多少令彭印兰不解。

包书记正在看中央文件，见她进来，笑着让座、倒茶，说：“听说你身体不大好？今年省里给了我一个床位，到大连‘八七’疗养院疗养，我把你的名字报上了，经过力争，省里总算同意了。你应该换换环境，休息一段了。”

她万万没有料到包书记从这儿庵入！“八七”疗养院是高级干部疗养场所，谁不知道？彭印兰是20级，即或不是开玩笑，她也绝不会打肿脸充胖子，去充大个。

她笑了笑，说：“包书记太客气了，谢谢。一来我身体很好，不需要休息，二来您知道我的脾气，上那种地方，您打死我我也不去的。”

包书记宽厚地笑了：“旧观念！等级观念这么强！我准备在大连包一栋楼，或者在星海公园附近盖一栋，将来老教师们轮流去休息一下。”

盖楼、休养，那同彭印兰没关系，她望着包书记气色很好的脸问道：“您找我就为去疗养的事吗？”

包书记点点头：“是呀，你又这么固执，脸皮又薄，和绰英一样，我料定你要推辞的。”

他在屋里踱了几步，问道：“有什么困难吗？找别人谈不方便，直接同我说。”

要不要说房子的事呢？趁这个机会说出自己的要求？要他宽限一个月，等儿子结过婚再腾出来，他总不至于不给这点面子吧？

可是怎么张口呢？她只觉得脸在发烧，坐在沙发上，手脚都觉得无处可放似的。

倒是包书记首先提到了房子。一张口就显得很愤慨：“我真不知道怎样对你说才好！太不像样子了！讨厌的条条框框！依我，都要取缔！院长在世，就可以住大房子，人一死就收房子，这叫什么规矩？郭副院长的遗留问题叫我们伤透了脑筋，如今又碰上你们这一起，唉，院长尸骨未寒就要……成何体统？”

看他的悲愤情绪，仿佛他是支持彭印兰依旧住下去的。不过，她觉得包书记把自己同郭副院长老婆相提并论，心里很不舒服，她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

彭印兰说：“包书记放心，我不会让党委为难的，我应当马上搬出去，我一点赖着不走的想法都没有，只是……”

她的话突然噎住，她实在没有勇气提出那个要求。

包书记在追问下文：“你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没有。”天晓得怎么搞的，彭印兰违心地连着说了两个“没有”。

包书记叹口气说：“我就知道，你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会以大局为重，用不到谁来做你的工作，真是好同志啊……”说到这里，他看了看腕子上的表，这当然是谢客的暗示。

彭印兰知趣地站起来，打算走了。假如这时候包书记再问一句“你有什么要求”，她豁出脸皮也要说了。

人家没有再问，只是再三叮嘱她“节哀”、“注意身体”。

退到走廊里，她的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你多么愚笨，多么软弱！

她像喝醉了酒一样，脚下发软，本来是朝校门走的，不知怎么，竟顺着花坛转了一周，拐到人工湖畔来了。

她发了一阵呆，正要转身，李洪济骑着自行车过来，看她脸色不好，忙跳下车子问：“您怎么了？哪不舒服？我送您到医院去吧？”

“我没病，”她说，“只是心里有点闷……”

“您好像有什么难心事。”李洪济望着她。

可不是吗？再放过这个机会，那就什么都办不成了。既然包书记已经巧妙地告诉了她，房子要收回，隋云佩就会穿梭一样跑来逼她搬家，他为人处事是条地道的变色龙，谁在台上他为谁奔走，你失了势，他立刻不认识你，他有他的逻辑：“大不了再关一次牛棚，干我这差事，想交下所有的人，不可能。”

彭印兰终于喃喃地说：“我……想求你……帮我解决点外汇券……”

话一出口，她像犯了天条一样垂下了头。

“这算什么？您怎么不早说！”李洪济费了好大的周折，才弄清了她要的数目和用途。

李洪济叫了一辆出租车，告诉了司机地址，关上车门，对彭印兰说：“您别急，吃过晚饭我就去。啊，算了，这样吧，我明天上午去，我直接把那套家具送去算了。”

彭印兰只觉得心头发热，苦咸的泪水顺着嘴角流进口中。

苦酒当做甜酒喝

次日早晨 9 点钟，一辆低厢日野货车开进了彭印兰的院子。

彭印兰推开窗子一看，惊喜得差点叫起来。摆在友谊商店里的那套高档家具，全在车厢里！李洪济真是个办事的人。

彭印兰三脚两步奔出房门，拉着李洪济和出租车司机到屋里喝咖啡、吃点心，他们确实到现在还没有吃早点。

彭印兰对李洪济说：“你成全了我，若不，我真比伍子胥过昭关还难受呀！我可是没有外币还你，如数给你人民币，你不会生气吧？”

李洪济笑了：“只要人民币在市面上好花，那就行。我等着吃祝融的喜糖了。”

彭印兰说：“这就快了，有了家具，选个日子就办。我希望热闹一点，你得帮我张罗，能请到的全请。”

李洪济懂得彭印兰的心思，就痛快地应诺说：“吃喜糖的人还不现成？拉一个师团来也不犯愁。回头我到新华印刷厂去给你印大红喜帖，电化铝烫金，印 500 份怎么样？”

彭印兰乐得闭不拢嘴了：“你瞧着办。”

李洪济边吃着点心边上楼看了看新房，说：“午后我找几个人来布置一下。宜早不宜迟，隋云佩那小子是仰脖浇尿的主儿，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唉，您昨天不该轻易吐口，他们是看您好欺，激您自己说出退房的话，您不住这套房里钻，他们拿您也没办法。”

“那多没趣，”彭印兰说，“就是请我住这儿，我也不干，心里不踏实。何必叫别人指脊梁骨？儿子结了婚，我带媳妇过日子，一间房也暂时可以凑合，何况，我们家两代人，怎么也能给两间房子吧！”

显然李洪济事前打过招呼，李文陶打头，陆陆续续来了十多个人，都是教员，大家七手八脚把家具从车上卸下来，抬到楼下客厅里，竟然堆满了大半个屋子。

彭印兰这几天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她想，祝融突然闯回家来，看见这套家具，说不定要惊讶得喊起来呢！这小子大概东跑西颠在筹措外汇券，哪知妈妈易如反掌地办妥了！

送走了客人，彭印兰还在围着家具转，不知从哪儿找出来一盒钢卷尺，逐个家具量着宽度、厚度，然后跑到楼上计算合理的摆设方案。

好像有人在楼下吆喝。侧耳听听，确实有人。莫不是儿子回来了？

她走下楼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在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

彭印兰问道：“你找谁？”

小伙子显然认得彭印兰，他说：“我是总务处的，隋处长叫我给您送房票。”

“房票？”彭印兰吃了一惊，“什么房票？”

小伙子一边递上一张复写的纸，一边说：“隋处长让我告诉您，明天是星期天，最好能搬利索，星期一处里要派维修工来收拾房子，新来的院长一家人还住招待所呢。”

说罢，小伙子匆匆离去。

像被雷殛了一样，彭印兰目瞪口呆，僵立在楼梯口，好半天

一句话说不出来，终于一屁股坐了下去。

隋云佩真做得出啊，拿定这个主意的时候可能连眼皮都不会眨一眨。李洪济说得对，圈套，一个事前结好的圈套，一旦把你诱进网口，立刻捕捉到手，你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看来，让儿子、媳妇在这套房子里过蜜月是不可能的了，她没有回天之力，她相信孩子们能谅解母亲。

她打开了那张房屋分配通知单。新华路 25 号 6 栋 3 楼 2 单元……

天哪，又回老地方去了！搬到这里之前，她家就住在新华路 25 号，不过是一栋二楼，那里一共有 10 栋楼属于建筑学院，竣工的年月迟早不一，最旧的楼是日伪时期盖的，最晚的建在大跃进年代。她不知道 6 栋是什么结构，什么格局，但她想，至少是两间屋子，有上下水道、暖气、煤气的吧？他们总不至于叫她这个可怜的孤老太太往楼上担水、往楼下倒炉灰。

她坐不住，急于去看新住宅，她虽然对隋云佩的霸道不满，可毕竟还有一套房子供她居住，现在有多少新婚青年各自住单身宿舍呀，比起他们来，祝融和蓝月还是幸福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假如他们当初就没有过当学院院长的爸爸呢？

新华路离这里不远，坐电车只有三站，住过几年的老地方，她闭上眼睛也能摸到。

她一路上不断猜测房子的面积、规格。至少有两间吧？最理想是两个朝阳的房间，各走各的门，方便一点。万一是个讨厌的套间怎么办？当然得叫儿子和媳妇住里间，老婆婆好从人家小两口屋子里穿来穿去吗？万一里间的米数少怎么办呢？公家的房又不好改修。唉，但愿是一大一小，小的有 6 米就够，摆得下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她就知足，人老了，要那么大的房子打把式吗？

6 栋，是 4 层红砖楼，保养得不好，砖皮脱落，楼梯凸凹不平，水泥像桃酥一样不结实。这里的住户也好像没有打算长期

住，楼道里垃圾成堆，小鸡竟然蹲在楼梯扶手上拉屎。

彭印兰气喘吁吁地爬着楼梯，心里越来越凉。这样的居住环境，蓝月能习惯吗？她爸爸虽然是个处长，在军区大院里也有三间一套挺阔气的房子呢！

天哪！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3楼2单元是这个样子吗？没错，房门上用红铅油写着房号，而且标上了彭印兰的名字。

上下水道倒是有，但没有煤气，也没有暖气，由于居民冬季升火炉，白墙熏成了黑色。不知道这家房客搬走了多久，狼狈极了。窗台下有一滩滩大便，墙上不知什么人画得乱七八糟，是那种厕所里才有的最低级、污秽的“壁画艺术”。是套间，然而间壁墙是板条子糊纸的，风一刮乱响，像受了潮的鼓皮。毫不夸张，这屋放屁，那屋肯定听得一清二楚。

她记起来了，这是1958年盖的“多快好省楼”，4000平方米只用了10万元，祝绰英激烈地反对过，他说盖房子首先要考虑百年大计，不是搭帐篷。结果，当然以祝绰英的右倾挨批为结局。住户不一定知道内幕，好多人把账统统记在工程师头上，“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有人还写过打油诗嘲讽过祝绰英吗？

彭印兰真想放声大哭一场！一场梦吗？飘飘摇摇从天堂落到了地狱。这是一种对死人的报复，却要死者的孀妻来承受惩罚。

人家使出的招数是杀手锏，下茬子这样狠，斗是斗不过的。怎么办呢？只好说服蓝月，把这一大一小两间房都归他们居住。

突然，隔壁一单元的房门开了，走出一个俊俏的女人来。这是谁？怎么有点面熟呢？吊眉梢，丹凤眼……在哪见过呢？

“怎么，大婶不认得我了吗？”那女人浅浅一笑，如同在彭印兰眼前打了个闪电，随后霹雳盖顶……

啊，天哪，这是不让我活呀？为什么邻居偏偏是她？这个没满月就被赶走的架子工的妻子，这回她可要抚掌大笑、大大称

快了！

一年前她不是说过吗？“……登得高，跌得重，但愿你们步步高升，别落到我们这步田地！”

现世现报，这女人的恶意诅咒不是果真兑现了吗？彭印兰觉得怒火在心底燃烧，她真想上去打她两个嘴巴才解恨。她死死地盯了那女人一眼，转身要下楼。她已经拿定主意，有这个邻居，她死也不来！

意外得很，那俊俏女人突然拦住她的去路，笑容消失了，哽咽地叫了声“大婶”，眼圈一红，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下来：“您一定恨我，我该恨，认不清真假人，错怪了您。我一点取笑您的意思都没有，真的没有。人活在世上，总有个坎坎坷坷，有时候是自己摔跟头，有时候是别人下绊子，笑话人不如人，我从前还是一副刚强好胜的脾气呢……您若不嫌弃，到我屋里坐坐。”

这就是同病相怜吗？俊俏女人的眼泪打动了彭印兰，她情不自禁地随她进了屋子。

房子一般大小、一样的格局，但是经巧手女人一布置，挺漂亮。

俊俏女人请她坐到一把折椅上，给她倒了一杯茶，说：“您看我这屋子怎么样？还过得去吧？房子在人住，邋遢人，你给他水晶宫，也能住成个猪圈样；正经过日子人家，就是鸡窝狗棚也能收拾得亮堂堂、雪洞一样白。您别着急，我这几天大休班，早晚我男人也有空，我们帮您把房子收拾出来，包您满意。您觊觎现成的就行，您一手都不用伸……”

应当说几句感谢的话。哦，还应当加几句抱歉的话，这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啊！

“他嫂子，我……对不起你呀……”

彭印兰的话刚开了个头，俊俏女人格格一乐打断她，说：“这么说就外道了，人生在世，哪能一帆风顺，谁能一辈子不求

人呢？您不要以为我们是刁钻人家，从前俺当家的是个不错的架子工，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上了‘四人帮’的当，干了错事……不说这些闲言碎语了，您忙您的，修房子的事交给我，您愿意交我们这个穷邻居就行。我叫刘芳，纺织厂的……”

彭印兰是噙着泪水离开新华路宿舍区的，又一次绝路逢生，她多少得到了点安慰。

吃过中午饭，李洪济和李文陶领着十多个人，提着灰浆桶、麻刷子来到翠湖路帮助彭印兰去拾掇新房。

当他们得知隋云佩要她在星期天搬走时，都气得不行，李洪济主张到省委去告状。他说：“他们气死了祝院长，推翻了他的分房方案，还不够吗？对一个建筑家的家属采取这样卑劣报复的手段，纪委不能不管！”

彭印兰百般劝解，她不希望把事情闹大，她说：“这何必呢？早一天晚一天，我自己也是同意搬家的。房子破点，收拾一下也行，总比刚解放那时住帐篷好多了。”

只有李文陶一声不吭，听了半晌，才说：“算了，咱们到新华路去看看，只要看得下去，就忍下这口气吧。”

按李洪济的意思，给隋云佩一点颜色看看，你不是限明天一天搬走吗？偏给你磨它十天半月，当“搅屎棍”谁还不会？

彭印兰死活不肯，她宁可雇人，也要在星期天深夜12点以前把房子给人家倒出来。

大家不好违拗她，便协同刘芳夫妇一起，连夜修理新华路的房子。

搬迁的时候，彭印兰把自己的东西和祝绰英的遗物单独打点到一起，不准人们往车上装。

李洪济有点奇怪，走过来问她。

彭印兰说：“新房子那么一点点面积，哪有我这老太太的落脚地？我性子又孤癖，人老了不招人喜欢，别因为我搅和到一

起，惹得小两口拌嘴打仗。这样的事我见得多了，离得远一点，走动起来还香甜。”

李洪济只觉得鼻子一阵阵发酸，他哽咽着问：“那……您到哪儿去住呢？”

彭印兰凄然一笑，说：“我打报告了。我是学院的职工，在单身宿舍找张床，总不至于遭到拒绝吧？”

李洪济的泪水忍不住流下来。彭印兰从 1950 年参加工作那时起，就是建筑行业的人，她和丈夫一样，奋战了 30 年，不知为人们盖了多少房子，有谁能想到，在她晚年的时候，最后一次乔迁是这样悲惨！

李洪济说：“这样吧，搬到我那儿去吧，我给您腾出一间房来。”

“那怎么行？”彭印兰说，“你总共只有两间房，二十几米，你要工作啊，一个建筑师没有绘图室，等于农民没有土地。快别说傻话了……”

当李洪济转过身来时，发现彭印兰单独打点出来的行李、箱笼不见了，问谁谁不知道。

彭印兰很快发现，李文陶不见了。他也没有跟车到新华路去。

李洪济和彭印兰立刻明白了，李文陶默不做声地把彭印兰的东西运走了，运到他家里去了！彭印兰什么都没有说，躲到一旁呜呜地哭起来，感激、伤感，真是什么滋味都有了。

志气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星期天下午 4 点，从友谊商场买来的那套时兴家具全部摆到了新华路 6 栋新房里。刘芳没有吹牛，房子收拾得神速、漂亮。

刘芳早为打帮手的人们准备了晚饭，一个屋子摆不下，分成 3 桌。这女人真有两下子，4 个凉盘，6 个热炒，外加一道榨菜肉丝汤，2 瓶德惠大曲，10 瓶啤酒，人们高高兴兴地吃起来。

这节骨眼儿上，彭印兰的儿子祝融赶回来了。彭印兰一连几个电话打过去，觉得他再忙也该回来看一眼，不然成什么话？

祝融步上楼梯，李洪济这些人都是从饭桌旁站起来同他打招呼，询问出国的事，同他熟的人吵着要吃喜糖……

祝融没有什么格外兴奋的表现，只是礼貌地向大家道谢，人们拉他到桌上喝酒，他推说刚刚会过餐，吃不下，退到走廊里来。

彭印兰替他掸掸身上的灰土（也许根本没有灰土），埋怨地说：“你这孩子，不冷不热，怎么回事？大小也叫乔迁之喜呀。”

祝融说：“我连续开了几个钟头会，听外事口的人讲出国规定，头有点疼。”

彭印兰说：“看到家具了吧？若等你去搞外汇，就晚三秋了。”

祝融苦笑了一下，什么都没有说。其实，他所以提出非要友谊商店这一套家具不可，不过是给妈妈出个大难题，他相信，妈妈这么个老实人，就是跑断腿，也搞不来一元外汇！

真见鬼，妈妈居然这样神速地把家具摆了进来。一看到酒桌上的李洪济，祝融什么都明白了，他也不想问究竟。

“你去叫蓝月。”妈妈说，“这丫头也有点拿大！5点下班后来看看总不误事吧？二十几个人帮了一天多忙，她也该来道声谢。”

祝融冷冷地说：“那又何必？没有这个必要。”

“胡说！”彭印兰有点火了，不觉提高了嗓门，“什么叫必要？大家拼死拼活地帮你们忙活，就是应该应分吗？”

彭印兰这一喊，吃饭的人都探头张望，以为吵架了。祝融赶忙低声下气地说：“妈，您别生气，我……”

“少说废话！”彭印兰怒犹未息，“你去把蓝月叫来，当着大伙面，把喜日子定了。你们忙，张罗的事我来管。”

祝融仍然不动。

李洪济走上来拍了他一下：“融融，别惹妈妈生气，去把蓝月叫来。”

祝融眼里突然涌出泪来，他抓住妈妈的手，说：“她……不会来了，我们3天前就分手了，各走各的路了……妈妈，您别难过，您会有一个好儿媳的……”

彭印兰两眼发直，眼光好像定住了，半晌，扑通一声坐下去，喃喃地说：“不来了？永远？哦，是了，都怪我们没有那栋好房子了……”

“不是的，”儿子急着去扶妈妈，“她……找的是门当户对的人家，爸爸死了，咱家没有院长了，衰败了……”

“不，”彭印兰十分固执地说，“就是因为房子，一定是的，房子……”

一阵风吹来，间壁墙瑟瑟抖动，像一张受了潮的破鼓皮。人们索然寡味地坐在圆桌旁，品不出是喜酒的甜味，还是一杯苦酒……

（原载1981年4期《春风》丛刊）

故乡明月在

这是一出现代悲剧。

尽管女主人公的姐姐再三叮嘱我切勿形诸文字，我还是食言了。惟一可以令其稍安的，是我隐去了所有的真名实姓。

有人说，生活本身绝对不会向作家提供风韵天成的艺术品，我一向坚信不疑。这回多少有点动摇，因为我下面记录的故事无须演绎已经那样完整，主题无须开掘已经那样深刻，倘不把它公诸于世，简直扰得我夜不成眠。这个悲剧对于某些至今沉沦的青年朋友，实在是一面不可多得的宝镜，可以用它来照照自己的心灵。

飘向“极乐世界”的祥云

公元 1979 年 9 月，一个天高云淡的秋爽日子，我们的主人公正迈着富有弹力的步子走向首都机场停机坪。在 3 号机位上停着一架波音 747 大型客机，这是飞往香港的第二次航班。

我们的主人公是个很自信的姑娘，妙龄、姣好，有着电影明星的面孔，体操运动员的身段，不比歌唱家逊色的嗓子。这些如果说都是得益于父母血统，而她引以骄傲的后天禀赋却是个人修

来的了。她是属于纯解放型的新女性，一切传统道德，对她都没有约束力，她蔑视世俗，不愿随波浮沉。

她叫旷观。她既不姓旷，也本不名观，这是她在青年人中间流行改名热时，从词源里查出来的一个词，觉得稍能表白心迹，于是用以取代父母为她起的“王爱华”。

稍稍粗心一点的人，都会被旷观的举止、着装吸引，误认为她是归侨或者海外华裔。当机场服务员称她为“小姐”时，她的得意溢于言表，连走路姿势都带着轻度的摇摆，好像不这样不足以显出文化人的典雅。

旷观离开大陆到海外去闯荡的志向萌生的时日并不太久。怎么会久呢？几年以前，她站在地球仪面前把那个纸浆圆球拨得团团转，甚至不知道五大洲四大洋是什么概念。近年来不一样了，虽然海关的大门只打开了一道缝，可是洋人洋货像海潮一样倒灌进来，电子手表竟然会“滴滴”地叫着报时提醒主人，录音机居然有电脑控制，录像带竟然能把任何一部影片录下来拿到家里去为自己放映……

这一切西方文明，在旷观眼前，展开了变幻无穷的万花筒一样的世界，她陶醉、向往，几乎每天都不忘记到邻居家去看电视，她只是去看《世界各地》和《国际见闻》。高级的别墅、电器化的日用器具、旅游车、可口可乐，都有使她无法抵御的诱惑力。这些逐渐形成的第二信号系统，弄得她倒胃口、食欲不振，一拿起窝头就想骂人！不，确切点说是想骂街。

她对那些国外有亲眷而能出国探亲的人艳羡不已！两个月前，她一个很要好的女伴到加拿大去探亲，走时旷观就没有到机场去送行。从前，她引以为骄傲的是自己家族、亲属中三代以内都查不出半点海外关系，纯而又纯，父母是从小就跟随红军南征北战过来的老干部。就拿出国的那个女孩柳丽丽来说吧，因为海外关系，入不上红小兵，每次学校组织小女孩们手持花环到机场

去迎接外宾，都向从来没有柳丽丽的份儿。她那时何等孤寂苦恼啊！

曾几何时，旷观和柳丽丽掉了个个，幸运之神的星光仿佛全都移到柳丽丽头顶去了！旷观在抱怨自己海外无亲无故的同时，有时甚至异想天开地幻想着，有一天公安部或者外交部会有人拿着查找信来叩她的门，说她有一个舅舅或者姑姑在美国、法国，不，哪怕在突尼斯都成，那该多好啊……当然，凭空跳出个舅舅、姑姑或者别的什么，是不大可能的，剩下的只能是叹气。她什么都看不顺眼。

旷观是待业青年，有一段时间她在前门打磨厂那里和一群街道小青年卖过大碗茶，但只卖了两天，就腻烦了。姐姐安慰她，要她好好复习功课，等待秋季考大学。她摊开书本，常常一个字都看不下去，电视里的外国镜头不断地从字缝里往外跳。她于是摊开书本，受这分累太不值得，与其说升大学将来拿那 56 元钱，还不如到国外去给人家刷盘子，一天也能拿它 50 美元！哼，姐姐不是大学毕业生吗？而且最近提了什么核物理研究员了，又怎么样？不得照样排队去买青菜？星期天要洗堆成山的衣服，全家 12 平方米的一间屋子……这就是自己奋斗的目标吗？

然而，吉人自有天相，幸运之神没有抛弃她，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有人在旷观眼前打开了一道望得见异国星光的门缝，她简直乐得快发疯了。

她得感谢一个叫缪相亚的华侨，是他，为旷观摆好了超脱烦恼的云梯。

这个缪相亚现在就走在旷观前面两英尺的地方，方头高级旅游皮鞋底的钉子敲在机场水门汀跑道上，节奏沉稳，像他的为人一样。旷观望着他的背影，那因为垫肩而显得宽阔的肩膀，那洒着香水的稀疏而黝黑的飞机式发型，顺手牵羊般扯在手上的、带四个小滑轮的旅行花皮箱，走起路来那不摆不摇的上身……都使

旷观肃然起敬。

旷观正在胡思乱想，缪相亚放慢步子，待她跟上来，微微侧过头来，温文尔雅地一笑，问道：“几分钟以后，你就要远走高飞了，你不感到留恋吗？”

旷观摇摇头：“不，一点都不，真的。”

缪相亚含义不明地一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已经是四十七八岁的人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汉语却不怎么熟练，带着广东客家话的腔调。据缪相亚自己说，他祖籍是韶关人，十几岁的时候，由于乡村家族之间械斗，缪姓人打败了，从此抛弃田园，全家漂洋过海。先在印度尼西亚开垦荒地种植橡胶，后来事业大起来，在欧美各国都设立了“泰华橡胶公司”分处。而在哈佛大学学过经济管理的缪相亚，就成了这家橡胶公司驻洛杉矶的总经理。

现在，中外旅客手持登机牌，都来到了那架涂有中国民航雄鹰标志和机尾涂有五星红旗的波音机下，就要验票登机了。

这一刹那，旷观心底突然涌出一股说不清的酸楚味道：这走了吗？从此不再回来了？就这样悄悄地不告诉任何人地去到陌生的异邦了吗？

她情不自禁地回眸向候机大厅和验票口那里望了几眼。直到此时，她才不得不承认，她有些后悔了，起码后悔不该瞒着姐姐——把她抚养成人的姐姐！此次一别，有谁能断定，这不是今生今世的永诀呢？

在这一瞬间，昨天的一幕最先在她眼前复映出来。

星期天，对于夹在事业和家务两座大山中的姐姐、姐夫来说，实在宝贵，每一个小时的利用，往往姐姐在星期五就开始筹划安排了。要洗衣服，要像样地改善一次伙食，要准备好孩子们下周去幼儿园的洗换衣服，要去粮店起粮票，要去买副食，要修理脚踏车的中轴，还要里里外外搞一次卫生，还要例行公事地检

查大孩子一周以来的功课……

被姐姐娇惯出来的旷观，向来是局外人，不负担任何义务，姐姐也向来不把她当成一个星期天的劳动力来支使，除非她心血来潮，才会可怜姐夫，自告奋勇到东单菜市场去采购副食。

但是昨天这个星期天，仿佛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一家人从历来的昏头胀脑的忙碌中解放出来，居然在晚饭后有闲空到没有玩赏价值的东单公园稍坐了两刻钟。这当然要归功于旷观的反常！姐姐、姐夫十分纳闷，近一个时期以来整天不着家的妹妹星期六一天闭门谢客，把塞在床下的脏衣服全洗过，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提早买好了一应菜肴，当姐姐、姐夫从东单幼儿园接回来小外甥时，旷观早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来了。

这是为什么？温柔的姐姐没好意思问，无可无不可的姐夫乐得当几个钟头的“神仙”，还喝了一杯果酒呢！

这一切，只有即将出国的旷观自己明白，临行前给姐姐、姐夫留下一点叫思念吧……动机是十分简单的。

今天早晨，一家人早起一阵总攻一般的忙碌，像出巢的鸟儿一样，各奔东西，去挤电车、去换月票……家里照例剩下旷观一个人。

若在往常，她会连鞋子都不脱，躺到床上蒙头大睡一阵，然后出去闲逛，当然也常常应邀参加一些家庭舞会，只有在邓丽君、徐小凤的歌声中，她才感觉到空虚之后的充实。她的嗓子好，摹仿力强，常常把自己唱出来的歌曲，诸如“你在我梦里”、“爱在我心中”、“阵阵春风柔”、“寄语多情人”等等，录到朋友的“8585 录音机”磁带上，放出来去骗好多人，别人还以为是邓丽君的原装磁带呢。

但今天，她觉得这个狭小、拥塞不堪的家处处都值得留恋，包括小外甥那骑坏了的三轮童车，都似乎有情有意，使她久久不能离开。

时钟已经打10点了，她才把修理好的三轮童车放下，洗洗手，对这熟悉的、浸透了苦辣辛酸的小房子深情地看了好一阵儿，准备走了。为了不招摇过市，她与缪相亚事前约定，她到北京饭店去找他，不要他来兴隆街接她。

她锁好了门，情不自禁地把那个铜钥匙在唇边吻了吻，刚要按老习惯放到门框上面去，冷丁又打开了房门，这混合着油墨味、煤气味和姐夫留下的烟草味道的房子，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她。在这一瞬间，她差不多要动摇了。

但是，理智战胜了感情，她在心里骂了一通自己以后，开始自我开脱：姐姐、姐夫对自己再好，我毕竟是寄人篱下。况且，这种无休止绵延下去的枯燥、乏味生活，就该是我所向往和追求的吗？缪相亚说得好啊，贪恋家庭的人，永远干不成大事业，走，就得下狠心！

于是她抓起姐夫笔筒里的绘图铅笔，在台历上终于写下了这么几句话：“亲爱的姐姐、姐夫，原谅你们的妹妹吧，当你们读到这张条子的时候，我已经不是脚踩祖国的黄土，早已经飞翔在大陆以外的上空了……饶恕我吧，我没有勇气和胆量告诉你们事实真相。再见了，当你们的妹妹得到自由和幸福的时候，你们也会分享到一份的。相信那时候，我一切的过失，都会得到谅解的。再见了，替我吻两个小外甥，等待我的音讯吧……”

纸上的告别，纵然浸透深情，毕竟没有面对面握手无言来得痛快。此时，在旷观即将登上波音飞机前的最后时间里，她多么希望姐姐、姐夫奇迹般地出现在机场啊！

然而，是不可能了！

不知为什么，去意已定的旷观，眼发涩、鼻发酸，差不多要掉下泪来了。

她随着人流走上舷梯，由于她三步一回首，心不在焉，连撕去半截交还给她的登机牌都忘了接。

“爱华——”突然，一声霹雳的呼喊声凄然地响起来。

尽管这声音走了形，旷观还是听出来了，这是姐姐的呼唤。除了姐姐，还有谁肯喊她那早已废弃不用的名字呢？

旷观只感到心头猛烈一震，蓦地回过头去，只见姐姐王重华张着手臂，发疯一样向停机坪跑来，她一路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夹杂着哭声，风摆着她的头发……旷观忽然感到姐姐实在太可怜了，她不顾一切地把提包撂在舷梯上，冲开登机的人流，箭一样跑下去，和姐姐王重华紧紧抱在了一起。

王重华泪流满面，不容分说地拉住妹妹的手，说：“你疯了？走，跟我回去！”

旷观一动不动地站着：“不，姐姐，一切都迟了。别来挡我吧，我要出去透透空气，你何必让我和你一样受罪呢？”

王重华松开了手，像不认识自己的妹妹似的，把她打量了半晌，喃喃地说：“你说什么？你真这样狠心？”

旷观回头望了一眼舷梯，只有最后几个旅客在验票了。已经进了座舱的缪相亚这时又走到座舱门口，显然十分焦急而关切地向下望着她们。

旷观耳旁突然响起一句不知从什么书上看来的“名言”：女人的软心肠，常常是万事皆休的契机！

旷观忍住了就要落下来的泪水，决然地说：“拦也没有用了！我凭什么不走？只要可能，人们都会蜂拥出国的！放着新世界的文明不去享受，却要我绑在冰冷的庙堂里过苦行僧的日子，我不干了！”

王重华大吃一惊，随即有点愤怒了：“谁教你的！真没想到，祖国生你养你，你却成了祖国的叛逆！”

旷观本想与姐姐最后叙叙别情，把这生离死别前的最宝贵的几分钟，编织成心底最珍贵的美好图案，想不到却受到了姐姐这样的谴责！这是她不能容忍的，几年来积存在她心底无从发泄的

怨恨，此时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口而出：“祖国？哼，祖国给了我什么？卖大碗茶吗？就是为了这个祖国，爸爸妈妈流过血、流过汗，到头来被他们一生忠诚服务的祖国判为叛徒、走资派，打下九泉！如今，你正在为这个祖国恨不得一天 24 个小时工作，换得了什么？肺结核、12 平方米的房子、排队买青菜……”

她越说越快，越说越激动，简直忘记了场合。

“啪”一声，王重华打了妹妹一个耳光：“可耻！”

旷观踉跄地后退了两步，架在鼻梁上的光学片茶色镜子也跌到水门汀地上打了个粉碎。挨姐姐的耳光，这是她无论如何没有思想准备的，从她有记忆的那天开始，比她大 15 岁的姐姐就肩负起了慈母的天职，不要说打她，就是申斥、责骂都没有过一次，她爱姐姐，像爱母亲那样笃深！

可是今天，姐姐怎么了？她为什么这样不理解自己的妹妹？哦，还是那句老话，可怕的正统思想把姐姐禁锢得太久了！

旷观不想在长行之前说服姐姐放弃她的人生哲学，但她相信自己所走的路是新生的路，总有一天会得到姐姐的谅解和赞同。

飞机在轰鸣，16 个着陆灯在闪烁，几组发动机发出撼天动地的吼叫，从喷气口喷出的巨大的风在机翼下拧成一股巨大的旋流。旷观猛回头，舷梯下的民航服务员正在焦灼地向她呼喊，旷观没来得及再看姐姐一眼，低头快步跑上舷梯，钻进客舱，她正想回过头来再看姐姐一眼，机上乘务员已经随手带上了舱门，驮着舷梯的车子迅速离去。

飞机正轰鸣着滑向跑道。旷观满眼是泪，脸贴在圆形小舷窗上，向后看，向后看……她看见了姐姐的头发在飞机掀起的大风中凌乱地飘摆着，双手抱着肩，痛苦而瑟缩地站在显得十分空旷的机场上。远了、小了，飞机陡然腾空，昂首直上云天，旷观只是看到了姐姐那孤零零的身影在机翼下一闪，就再也看不见了，眼前是掠过机翼的几缕白云……

一时，旷观的心仿佛沉到了深渊，这倒不是压力所产生的生理现象，实实在在是一种精神压力。她木然地把脸整个贴在有机玻璃窗上向下俯视，那亮晶晶的一片是北海吧？是的，那不是巍巍的白塔，那不是景山的极顶吗？那一片火焰般的红颜色，怕就是枫叶正红的香山吧？

别了，北京，旷观此时就是喊一万句后悔都没有用了。她心底虽然酸楚，却强制地告诫自己不能后悔，缪相亚先生不是说过吗：只会守住房檐下巢穴的麻雀永远是麻雀，只有敢于飞越大海的信天翁才见得了大世面。

啊，旷观是信天翁，而不是麻雀。她觉得座机仿佛是一片飘向极乐世界的祥云，正载着她这个超脱厄运的幸运儿飞升！

她渐渐安静下来，这条路，无疑是对的……

一万米高空的遐想

波音 747 客机飞行在一万米的高空上，机翼下滚荡着棉床一样的云海，偶尔从云隙间可以看到弹丸样的东岳泰山、银链似的南北大运河……

旷观第一次乘坐飞机，她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她久久地靠在舷窗旁，空调器送来一缕缕凉爽的风，她陷入遐想中。她仿佛透过那茫茫的云海，看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还在操着几千年来祖传的锄镰劳作，仅仅能混得温饱，现代文明和他们是无缘的。旷观可怜他们、同情他们，却又不能不抱怨这些人的愚昧。

现代化的蓝图是诱人的，可是要等到世纪末，或许更长的时间。自己今年才 23 岁，等到年过半百才去享受高级的物质文明，未免太晚了，人的青春能有几何？在这点上，旷观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姐姐，她说姐姐是逆来顺受的愚忠典型，是追求绑在牛角上

那束青草的可怜虫！

是啊，姐姐今年已经 38 岁了，像她这种年龄的人，正支撑着祖国各条战线，是台柱子，照说他们应当比别人过得好些吧？可是他们除了把心血花在工作上，还得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老实说，旷观觉得自己看破了红尘，决不走姐姐的路。

想到这些，她侧过头来望一眼坐在邻座的缪相亚，他正剥开一个无核蜜桔，托着桔子皮，笑吟吟地送到旷观面前。

“谢谢舅舅！”旷观由衷地甜甜地叫了一声，接过蜜桔。

她从心里感激这个半空掉下来的舅舅，他是给旷观盗来天火使她得到温暖和光明的普罗米修斯，他是使旷观超脱苦海飞向神话世界的观世音。旷观活了 24 个春秋，她没信过耶稣，没信过任何神雾，但此时却把这个半路认得的舅舅当做头绕光环的神明在心头供奉。

缪相亚是在旷观处于苦闷、彷徨中闯入她心灵的。

那是两个月以前的盛夏季节。

旷观租了一条船，陪着即将出国飞往加拿大的女友柳丽丽玩儿最后一次。

她们买了几瓶特制汽水、两瓶五星黑啤酒、几包点心放在船中，摇着船钻进了 17 孔桥下的柳阴深处。

那天，柳丽丽显得很矛盾，对无法揣摩的国外生活又憧憬又担忧，心绪不太稳定。

她们把船泊在柳丝拂面的桥孔底下，这里十分凉爽，石桥拱壁，苍苔老绿，湿风从桥洞吹过，小船轻轻地在水面上摇晃。

旷观给柳丽丽倒了一杯黑啤酒，自己也啜了一口，说：“你多走运啊！当年有海外关系是污点，今天却是值得炫耀的了。”

柳丽丽说：“一想到出国，我总有点心跳、害怕，那里再好，到底不是祖国、故乡，没有好朋友……怕要吃一口北京果脯、涮

一顿羊肉，也不那么容易了……”

旷观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说：“你真像个孩子！井底之蛙！难道地球上只有北京果脯和涮羊肉是美味吗？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从前咱学过科学社会主义，连马克思都承认，工人阶级无祖国嘛！”

柳丽丽辩不过旷观，她是同学当中被称为“苏格拉底”的有名辩士。不过，柳丽丽却并不赞同旷观的说法，尤其是“工人阶级无祖国”，她更觉得是生拉硬扯。

于是柳丽丽嚼着一块青杏蜜饯，说：“你倒是想得开，我若是能有你做伴该多好啊，又不寂寞，又有人给我出主意……”

旷观长嘘一口气，赌气似的把一枚金丝枣核吐到水里，苦笑着说：“生辰八字不好，托生的家庭不对，海外没亲戚，唉，哪怕能认个干亲戚也好啊，不就可以申请出国探亲了吗？”

柳丽丽被她逗笑了。旷观又半开玩笑地说：“丽丽，怎么样？咱订个君子协定，你在美国、加拿大，不管什么地方，给我找个干亲戚，叫他发函外交部，装腔作势找我这个失散的亲戚……”

“别胡扯了。”柳丽丽在她手背上打了一下，“你别难过，我在国外若呆不惯，我会回来的，我想，我一定会想你们的……”

“你千万别这么目光短浅！”旷观一本正经地说，“恋家有什么出息？放着天堂不呆，却愿意过那团煤球、拉风匣煮饭的日子？”

柳丽丽没有出声，手里撕扯着柳叶，一片片扔到水中漂走。

旷观又叹了口气说：“我只是没机会出去罢了，就凭我的嗓子，我不信压不倒邓丽君！起码和她齐名，不信你听我唱一段儿！”

柳丽丽只是笑，女友的摹仿能力，她是深深佩服的。

借着酒兴，旷观果然唱起了一首叫“想你想断肠”的曲子，用的是半嗓，唱得甜蜜蜜、软绵绵，她自己都好像唱醉了。

柳丽丽说：“你唱的是好。不过，这种调子一唱就叫人心里发酸、全身发软，终究不是咱们应当唱的。”

“假洋鬼子！”旷观嘲笑地说，“你呀，只配去唱那硬邦邦的语录歌。”随后，她装腔作势地唱了几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引得柳丽丽大笑不止。

这一切，当然是旷观肚子里的真话，然而却是在私下里用半开玩笑的口吻披露出来的，说过也就算了。却不料，这场谈话，倒成了旷观人生十字路口的一个重要转机。

这对女朋友把小船摇出 17 孔桥时，发现左边桥墩下还停着一只白漆尖头船，上面坐着一个戴茶色眼镜、绿色贝雷帽的人，西服革履，船上摊放着最新式的录音机、莱卡高级相机、一瓶香槟酒、几样下酒小菜，还有几盒打开的罐头。

柳丽丽划着桨，斜了旷观一眼：“咱们的话，叫人家听去了吧？”

旷观不以为然：“神经衰弱！听去怕什么？现在又不是‘四人帮’那种年月了，言论自由嘛。”

后来她们上了岸，在佛香阁下面一块草坪上坐了下来，那儿有一棵合围粗的老柏树，像一把巨伞，遮住了太阳光。

她们玩儿累了，本想在草坪上小睡一会儿，却不料刚要躺下，那个曾见过一面、戴贝雷帽的中年人走过来，他站在柏树下，用手指了指空着的长椅，礼貌地问道：“可以吗？”

柳丽丽望着旷观不语。

旷观落落大方地说：“当然可以，请吧。”

那中年人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放到地上，往椅子上一坐，摘下茶色镜眼，点点头算是致谢。

这人便是缪相亚。

由于生疏，缪相亚只是随口说了几句有关天气“暑热难当”

之类的话，然后就去买冰镇汽水和冰淇淋，买了好多，带了旷观和柳丽丽的份儿。

两个女孩子都没有吃他的。

缪相亚喝了几口汽水，忽然兴致大发，问道：“坐着没意思，想听点音乐吗？”

音乐，是旷观生命构成的一大要素——她自己是这样说的。她认为，只有音乐飞扬起来的时候，她才能脱离苦闷，进入忘我的境地，升华到另一种世界去，至少精神上是快乐的。

出于这种原因，她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问道：“有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吗？”

“那未免太陈旧了，如今在美国风行一时的‘仿布吉——胡吉乐’不是更好吗？”缪相亚很有风度地一笑，随即摁了一下录音机上的放音钮，疯狂的、混合着非洲鼓点和萨克斯管声的立体声音乐立刻播放开来，旷观忍不住，身子伏在草地上，一只脚却在不住地随着节拍叩打草地。

曲终之后，录音机里放出一阵很不干净的音响，好像摇桨的动静。

旷观正在静心等着听下一首曲子，突然，放出了这样几句：“你多走运啊！当年有海外关系是污点，今天却是值得炫耀的了。”

旷观从草地上爬起来，柳丽丽也瞪大了眼睛。这不是方才在17孔桥下这对女友的私下谈话吗？这个讨厌的家伙怎么给录下来了？而且厚着脸皮当她们面放录音，这不是捉弄人吗？

但是，没等旷观发作出来，缪相亚早已关闭了录音机，诚惶诚恐地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这实在是无意的，我马上消掉，马上……”

从此，他们相识了。

在柳丽丽出国以后的日子里，更加孤寂的旷观与这个新结识

的华侨老朋友越发厮混熟了。

旷观背着姐姐，常常到北京饭店 12 楼缪相亚的房间去，听那号称 70 年代精神排气阀的音乐，看点外国时装画报。

你不要以为旷观是那种轻佻得不值钱的人，她内心还满严谨呢。她在与这个 40 多岁的男人相处的日子里，一直在冷眼观察，她在随时可能受伤害的生活环境里，多次用直感和本能的防御能力保护自己不受侵害。

譬如，她到缪相亚的房间去，从来只到客厅止步，决不向卧室迈进一步，倘若主人给她斟上一杯清凉饮料，她绝对不沾唇，如果是各有一杯，她常常把杯子交换过来，直到看见缪相亚喝下去，她才敢于动用。

这种种“横草不过”的本事，是她学来的，教科书里没有，老师不会开这门课，是她在生活的网中摸索到的独特警惕性。记得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她到一个她很景仰的同学家里做客，同学不在，那个同学的父亲热情地挽留她坐等一小会儿，给她冲了一杯可可。她很讨厌他，总觉得他投到自己身上的目光带有某种说不出滋味的不正经，像攫取，又像燃烧着的邪欲……她警惕起来，蓦然间记起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官级不算低的人被贴过许多生活作风方面的大字报。

还有可疑之点，他冲可可是拿到厨房冲好，然后端了两只杯子出来的，好像经过了挑选，才把一只杯子放到了旷观面前。这细微的动作，只有有心人才会觉察得出来。结果，旷观没有喝，趁门铃响主人去开门的时候，她十分机灵地来了个掉包计，把杯子对换了一下。

旷观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并非恶意地亵渎圣贤，那人自饮了那杯可可，不一会儿便口流涎水，昏沉沉倒在沙发上睡去，这种效果，他显然是打算体现在旷观身上的，结果是自己入瓮。

在旷观与缪相亚交往的日子里，她虽然不知道人家怎么想

的，反正她以保护自己为前提。她逐渐发现，缪相亚待人诚恳，为人持重，很有点中华民族旧礼教的家风，虽说不是非礼勿言、非礼勿视，对旷观可以说是相敬如宾，旷观在拆除警戒线的同时，还多少有点内疚，干吗把所有的人都想得那么坏呢？

有一次，缪相亚喝了几杯酒，叹息着说：“我真替你可惜，如果在香港、在洛杉矶，像你这样一副好嗓子，会成为波利多尔和卡萨布兰卡唱片公司的头号红人，你会成为红极一时的大歌星，会成为百万富翁！”

这句话打动了旷观的心，她觉得自己是一块未琢成美玉的璞，是埋在泥土中的赤金，是怀才不遇的人。在自己周围很少有人了解自己，包括爱她的姐姐，也未见得能准确地掂出妹妹的分量，想不到，真正的伯乐却是缪相亚。

想到这里，旷观深深叹息一声，满腹忧怨地说：“你顶好不要用假设句来说话，因为我不可能去香港，更不要说洛杉矶。”

缪相亚沉默了一会儿，富有同情心地说：“据说，凡是有海外亲属的人，是可以领到出国护照的。”

这倒不假。旷观说：“可惜，我所有的亲属都在大陆上。”

又沉默了一阵，缪相亚说：“如果你信得过我，我是否可以为你提供一个亲属呢？”

旷观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又兴奋又惊奇，睁圆眼睛望着缪相亚那笑容可掬的面孔，她虽然猜到了几分，却不愿意由自己去点破。

缪相亚说：“为了你的前程，我打算帮你点忙，但我得让你委屈一下，我当你的舅舅，行吗？”

真是不谋而合。想不到旷观原来开玩笑的话真的成了现实！

应当承认，缪相亚是个颇有神通、颇具才干的人，在他与拣来的外甥女达成默契以后，开始四处活动，先是煞有介事地通过公安局和街道寻找，接着是操办各种手续，居然在短短的一个月

的时间里打通了各个关节，已经胜券在握，把出国护照亮给旷观看了！

如果说那还只是写在纸上的，现在却付诸实施了！她怎么能不把缪相亚当成再生父母呢！

比地面上明亮一倍的太阳光透过小小的舷窗照进机舱，暖融融的，吃着香甜的蜜桔，她觉得不仅口腔里，全身都浸透了异样的芳香。

她不用闭眼，都能编织出未来动人的前景。她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奋，新生活正在向她招手呢，她是冲破一切罗网，向着自由之神靠拢的天之骄子！

“迪斯科热”和第一束晚香玉花束

当天下午4点，波音747民航客机飞抵号称世界第一贸易大城的香港。

旷观的眼睛不够用了！当她坐上琥珀色奔驰卧车顺高速公路驶向市区时，她几乎怀疑这是梦中！是啊，早晨10点钟还在姐姐那散发着书香、煤气味的小房间里，仅仅半天的时间，她已经踏上了另一块神秘的土地。尽管香港不是国外，可这里浓缩了全球各个角落的一切文明。如果说香港是世界博览窗，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旷观坐在车子里，撩起青色窗纱，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火柴盒、积木式的危楼巨厦一闪而去，他们驱车行驶的Y型立体交叉高速公路，宽得如同画满了粉杠的运动场，一排排按着各自线路飞驰的车子，像流星一样……

不知为什么，缪相亚并没有带她住进上等的国昌饭店，车子渐渐驶进了老市区筲箕湾，走得慢极了，司机不断地掀喇叭轰赶路面上的行人。

旷观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路两旁的石头房子大多是尖顶的古老式样，窗子很小，墙壁上一片片斑驳的彩绘，看样子是剥落的广告、商标。街道吵得要命，双层公共汽车响着喇叭，摇摇晃晃地在人群中钻行。路两旁店铺林立，不是香港画报刊登的超级市场的样子，门面都很小，肩挑叫卖的都有，市声一片。

这是香港吗？旷观忽然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这种街市，她好像并不陌生，在哪里见过呢？啊，对了，在电影里，《不夜城》、《林家铺子》还有香港的新片《巴士奇遇结良缘》……不都有这样的场面吗？所不同的，只是这里没有黄包车罢了。

这一瞥实在有点大煞风景。香港还会保留着 30 年代的陈迹，也有如蚁附膻般挣扎、劳碌的人群，这是旷观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她听过好多次出国人员讲观感的报告会，似乎也都没有提到这一层，像从前只提帝国主义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一样。

缪相亚是个精细人，他看来多少摸到了旷观一点思想脉搏，就带有解释性地说：“庸庸碌碌者，即或在华盛顿也是不乏其人的，这不足为怪。我本来想住国昌饭店的。方才在机场上和一个老朋友通了个电话，他一定要我去住汇海酒家，我倒也喜欢那里，坐落在热闹的铜锣湾，临近大海，空气好些，你也会喜欢那里的风景的。”

旷观无可无不可地点头。反正在香港不过是短暂的途停，她的最终落脚点是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

汇海酒家是一幢三层红楼，主楼突起一个尖顶，类似西方教堂的钟楼，大概钟早已没有了，配有百叶窗的阁楼里，正有一群白羽信鸽飞出飞进。

别看这幢建筑外面古朴，里面却是经过改装的，房间里有空调设备，有电子吸尘器，躺上去软绵绵的席梦思床，当然也有电冰箱，20 英寸的带电脑贮存的落地式彩色电视机，是菲利普牌的。

旷观住在2楼12号房间，缪相亚住在隔壁，却是第14号房间。旷观有点奇怪，问道：“怎么没有13号？”

缪相亚矜持地一笑说：“13，这个数字对西方人来说是最不吉利的，你以后就会注意到，第12层楼以上，一定是第14层，连你们的锦江饭店、北京饭店都不例外，避讳嘛。不然，这一层死也没人去住，岂不是少赚钱了吗？”

原来还有这一说！旷观觉得新鲜。

缪相亚说：“到你房里去洗个澡，然后睡一会儿，傍晚我带你出去逛逛铜锣湾！”

旷观答应一声，进了她的房间。

站在房门口，她不禁又一次打量起这一套铺着波兰大地毯的卧室，她忽然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自己的脚下软绵绵的，像棉团，不，像是云朵，这里的卫生间一尘不染，全是用淡青色磁砖镶起来的。洗澡间很大，怕是比北京城里姐姐家全部居住面积要大！

一天之内，她从那堆满劈柴和蜂窝煤的小天地里一下子来到这豪华富丽的所在，她有一种天壤之别的感觉。天堂啊，竟是这样轻易地出现在她脚下了！

她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换好内衣，穿上了洗澡间里备用的、散发着香水味道的绒质睡衣。

她把替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在手里，想了想，正想泡到澡盆里去洗，一想不对，这样的大酒店，肯定是有人专门替客人洗熨衣服的。于是她把衣服塞到角落里。

回到卧室，她顺势往席梦思床上一躺，身子悠悠直颤，舒服极了。

望着米黄色的天花板和大型枝灯，她忽然想起了姐姐。照说，姐姐是有才干的人，无论讲对人类的贡献，还是讲给祖国创造的财富，都是旷观所无法比拟的，可是她只能住12平方米的

鸽子笼，每天要起大早把泥炉子搬到四合院的小天井里，点燃，拼命扇旺炉火，直到煤烟消尽，她才把炉子搬回屋里，拿一袋豆粉为家人冲豆浆。而这时候的姐夫就要去胡同口的国营食堂去排长龙买油饼。

这种老一套的生活方式，从旷观记事时起就没有改变过，只不过那时点煤球炉子的是妈妈，排队买油条的是爸爸罢了。

旷观感到生活太不公平，对姐夫、姐姐这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太冷酷无情了。姐姐常在被煤烟熏得涕泪交流时抱怨，在买不到青菜时也发牢骚，在家务事夺去她研究学问时间时也有过心灰意冷，可她从来没有过旷观这种远走高飞的思想，真的，从来没有过。

记得，那是邓小平访问日本的那年，电视台播放了一套节目，叫日本风光，其中介绍了一个普通的日本印刷工人的家庭。那天晚上，旷观全家人都看了这条电视新闻。看过以后，感慨万端的旷观叹了口气，说：“你看人家！唉，我这一辈子算是赶不上这种日子了。”

当时，姐姐一笑，说：“你们这一代人啊，真叫人担忧！光想着吃柿饼，却从来不想栽柿树、浇水。日本人的好日子，也是靠双手、靠血汗换来的。”

姐夫接住姐姐的话碴儿说：“羡慕别人的人不算好汉，把人家的长处学到手，才是好汉。富有的邻居，代替不了自家受穷，下狠心叫自己富起来才行。我是从来不望着人家淌口水的……”

旷观当然不会被说服。她感到姐姐、姐夫太傻气、太“正统”！他们堪称是有志气的好汉，可是结果呢？12平方米房子、蜂窝煤……

旷观有她自己的逻辑，她学过科学社会主义通俗教材。既然书上说共产主义也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那这幸福在别国已经有了，不管什么主义，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她不像姐姐

那么傻，为了那看不见影的幸福，为了叫别人幸福，自己一生吃苦，去他的吧，旷观不干。

她也承认，姐姐是好人，正因为她太善良了，才那么固执，才总是吃苦。

此时，躺在席梦思床上听着邓丽君的曲子《美酒加咖啡》，她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她眼前生出许许多多的幻想：她的照片雪片一般漫天飞洒，装在录音机的磁带盒里，在旷观的前面，还加了“甜蜜蜜”字样；她的照片变成了巨幅广告画，矗立在大观楼影院门口；她的形象，播放在“丽的电视台”称为“黄金时间”的专栏节目里，她成了威震好莱坞、名扬四海的大明星、大歌唱家，她压倒了邓丽君……

轻轻的叩门声打断了旷观五光十色的遐想。她从席梦思床上弹起来，习惯地喊了声“请进”。

缪相亚陪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出现在外间客厅门口。

这时旷观才发觉自己还穿着睡衣！她尖叫了一声，无处躲藏。

还是缪相亚沉着，他一边把客人让到客厅里坐下，一边用手指了指卧室左边的一个门，上面挂着个标有英文字的纸牌。

旷观慌忙拉开，才发现那是一间有一人高整容镜和华贵梳妆台的更衣室，赶紧钻了进去。

等旷观换好一套时髦的衣裤走到客厅时，陌生的客人从沙发上欠了欠身子，同时礼貌地叫了声：“旷小姐好！”

旷观含笑点点头，回了句：“先生好。先生是……”

缪相亚把来人向她作了介绍，原来这个秃顶戴光学赤金边茶色镜的胖老头姓贺，是汇海酒家的总经理。

旷观一时还搞不大清楚，堂堂的饭店经理，为什么专程来看一个房客？是因为贺经理是缪相亚的至交好友呢，还是香港生意人招徕生意的生意经呢？

大概由于年龄的关系，旷观并不喜欢客厅里这位不速之客。她本能地有几分讨厌他，张口闭口都是先说“鄙人”，而称呼旷观，一律是“密斯旷”，尾音挑得挺高还要拐点弯，听上去像英国人刚学汉语的味道。

庸俗的客气、讨厌的礼貌！这是旷观给贺经理下的定义。你看他那两只躲在茶色镜后头的眼睛，忽而在她脸上打转，忽而盯在她丰满的胸部，那视线好像从来没从她身上移开过。

这难耐的会见总算熬过去了。旷观刚刚呼出一口气，贺经理提出了新的邀请：“密斯旷，鄙人为给您和缪先生接风洗尘，特在港坞街爱尔兰西餐馆略备小酌，不知肯不肯赏脸？”

没等旷观答腔，缪相亚抢先抱拳一拱，说：“叫贺经理破费了，叨扰、叨扰！缪某代外甥女称谢，恭敬不如从命。”

旷观虽则讨厌这个俗不可耐的贺老板，不愿与他为伍，可是爱尔兰餐馆倒是吸引她的地方，她不止一次地从港澳人士口中听过它的名字，去见见大世面总是好的。

汇海酒家门前停着两辆轿车，一辆是黑色的福特牌，一辆是豆绿色的美式雪佛兰牌。

贺经理亲手拉开雪佛兰牌汽车的后车门，左手臂护在车门上方，等旷观钻进车里，他才随后进去。缪相亚上了那辆福特车子。

车子飞驰在行人渐次稀少起来的街市上，地面上汪着洒水车刚刚喷洒出来的水，亮晶晶的路面上辉映着彩色绚丽的霓虹灯的光亮。街市两旁闪过一家家夜市、夜宵店、酒吧间、夜总会，一阵阵爵士乐和颓废派音乐的旋律飘进她的耳朵。

这真是一座不夜城！仿佛黑夜在这个城市里更带有迷人的色彩。从前，她只熟悉古老的北京城，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东西长安街上虽然灯火辉煌，却永远那么严肃、单调，即使是号称闹市区的东单、王府井、西单、大栅栏，一过晚上8点，也只有几

家夜宵店、通宵百货店开门，而顾客总是寥寥无几，根本不像香港这般畸形的繁华。

爱尔兰餐厅果然名不虚传。但建筑样式却又是法国式的，很有点像巴黎的爱丽舍宫，只是门更现代些，是那种电子感应自动门。

他们一走进餐厅，左右两盘旋转而上的楼梯上方，传来震耳的打击乐声。

旷观抬起头来，才发现二楼是类似挑台的雅座，两盘楼梯中间衔接处，有一个阶梯式包厢，悬吊在大厅半空，显得很突出。一班穿着周末狂热流行服装的乐队人员正击着非洲大鼓，摇着铃，拼命吹着圆号、萨克斯。

这种音乐叫“迪斯科”，就是所谓“仿布吉——胡吉乐”，是旷观从前陌生的东西。如果你是神经衰弱症患者，你一听到那杂乱无章的旋律，一定会吓跑的。你听，迪斯科乐曲的演唱法，最大限度地把主旋律和歌词降到次要位置，相反却拼命突出无重音的、机械而匀称的有如战鼓样的急迫打击乐。

再看舞池里的男女，穿着裸胸露背的衣服，疯狂地抖肩、颤身，既有大幅度的摇摆，又加了狐步舞的跳法。

据缪相亚告诉她，在美国，正是迪斯科热的年月，美国至少有二百个以上的电台不停地播放这种噪音，用这种敲击乐引起人们感观的冲动，用吉他和黑人伏都教圣歌般的旋律和令人心撼的节奏，以每分钟 125 拍的速度控制人们无聊的神经。

旷观有点接受不了，她摇着头说：“我不喜欢，神经病。”

缪相亚用手向餐桌一指，说：“人总是要有点神经病，才是人。你不感到中国人太冷静，有点像清教徒吗？”

旷观不语，四顾各个餐桌，有人兴味索然地支着腮帮喝酒，有人拍桌子跺脚随着迪斯科乐曲大哗……

看来贺经理是很有几分威望的。他在餐厅显眼处一站，立刻

有两个招待者走过来，把他们让到了左面二楼雅座上去，这里居高临下，餐馆里一切尽收眼底。

旷观坐下，男招待送上三杯加了苏达的汽水，贺经理从餐桌上拿起一支铅笔，在菜单上随便地勾了几笔，男招待点点头，拿着菜单走了。

现在是间歇时间，舞池里的人都搭肩搂腰地散到四面，在那一闪一烁的彩灯下，旷观坐着，背后在放冷气，她觉得周身轻爽。

缪相亚嚼着汽水问道：“今晚的拿手节目是什么？邓丽君来吗？”

贺经理抚弄着杯子说：“邓丽君是大人物了，怎么肯在这抛头露面，光是灌唱片，也足以使她成为百万富翁了。”

缪相亚笑道：“人有一副好嗓子、有一张好脸子，就可以当人上人，比办实业不知要少操多少心。”

贺经理附和地一笑，有意无意地瞟了旷观一眼。

旷观心里一动，热辣辣的。他们的谈话，像是一把钥匙，恰巧碰到了她心底的锁簧。她感到，尽管姐姐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弱肉强食，是角逐场，可她确信自己会是佼佼者！她不求得当百万富翁，她只要生活得舒服就够了！假如在北京，即或她成为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的大角色，像李谷一那样有名，也决不会超过文艺辅助一级的工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庆幸自己的这一步。进而，她有点自我陶醉了。她仿佛已经成了香港，不，成了美国的大歌星，在旧金山、加利福尼亚有自己的别墅，她可以一大笔一大笔地把外汇汇到姐姐手里，到那时，姐姐会原谅自己的……

乐池子那边响起了轻柔的丝竹之声，一个穿着袒胸露腹服装的女郎款步走到包厢尽头，一手扶着栏杆，腰肢随着音乐轻度地扭摆着，唱起了缠绵的流行小曲：

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话儿要交代，
虽然已经是百花开，
路旁的野花你不要采。
记住我的情，
记住我的爱，
记住有人把你来等待，
千万不要把我忘怀。
.....

旷观吃着果羹，一点滋味都没品出来，她渐渐皱起了眉头。这个卖弄风骚的女郎简直唱得糟透了，除了用那浑身的肉感来诱惑听众而外，仿佛她没有另外的本事。

旷观恶心地啐了一口，掉过头来。

一直在观察旷观的贺经理，叉子上叉着一块烧牛排，在胖乎乎的手里转动着，带有几分试探地问道：“密斯旷，怎么样？这是红极一时的歌星，仅次于邓丽君，她叫闻兰兰……”

旷观不以为然地说：“不敢恭维。”

缪相亚用餐巾揩了揩嘴角，说：“说句不客气的话，请贺老板不要见笑。凭我外甥女的嗓子，可以唱倒全香港！”

贺经理吃惊地张大嘴巴，摘下茶色镜，打量着旷观，故意说：“这可是有眼不识泰山。那么，密斯旷何不来个逢场作戏，挫挫姓闻的锐气呢？”

缪相亚挡驾说：“莫多此一举，何必砸人家饭碗子？我们旷观半月后要随我去美国，那里才是英雄用武之地。”

贺经理表示万分遗憾地咂咂嘴，说：“可惜，可惜，香港人竟然没有耳福，阳春白雪高雅之音不得聆听，却只能听这乌

鸦叫……”

这时，闻兰兰一曲终了，大厅里报之以疯狂的掌声、呐喊声，有人在向包厢里打着飞吻……

那个闻兰兰摆起谱来，不管人们怎样鼓掌，发誓再不开口，而且大言不惭地向人们说：“我累了，各位只好委屈一下，听点俚俗小曲吧……”

旷观拿在手里的杯子有点抖动，她心里想，闻兰兰未免过于张狂了，这样目中无人。

女人的虚荣和好胜，往往是导致毁灭的开始。

贺经理一眼洞穿了旷观的五脏六腑。他眼珠一转，故意给这个没有人生阅历的女孩子加砝码：“唉，又拿把了，大歌星喽……”

“她算什么歌星？”他的话像火星一样，扔到了旷观心上那虚荣的火药桶上，轰地一下燃烧起来。她一推杯盘，站起身说：“我不信她能垄断歌坛，我今天要亮亮嗓子，出口闷气。”

贺经理大喜过望，连忙站起来，向楼下大厅拍了几下巴掌，说：“诸位雅静，诸位雅静，今有从大陆来的著名歌唱家旷观小姐，愿为我香港同仁们表演几支名曲，定能耳目一新……”

说罢，他笑容可掬地转向旷观，带头鼓掌。

掌声席卷了大厅。对这些各界人士来说，聆听来自大陆歌唱家的演唱，大概都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因此格外有兴趣。许多人翘首张望，都把期待、好奇的目光投向没有一点娇揉造作的旷观身上。

“歌唱家”，多么令人陶醉的称呼啊！这个词儿，只有从好开玩笑的姐夫嘴里吐出过，这个梦她做了多年，想不到第一天来到海外，就有人当众叫开了，叫得旷观心里发痒，叫得她五脏熨帖，舒服极了。

为了不给这顶“歌唱家”的桂冠减色，旷观费了好大劲才使

自己的心平稳下来。她分明看到了眼里含着嫉妒之火的闻兰兰正挑战式地蔑视着她，她借这种目光为动力，大大方方地走到了包厢边缘，向大厅四方微微鞠了一躬，回头看乐师，都躲到一边去了。

旷观一时怒火攻心，正打算清唱，幸好能干的贺经理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或者买通）了一个弹奏电子吉他的年轻乐师，走过来与她合作。

旷观心里有了底。她既然是来自大陆的，本来想唱两支在中国流行的抒情歌曲，可她又临时改变了主意，为什么不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对，就用同样的货相比，才叫人看得出等级。

于是她也唱起了闻兰兰方才唱的那首情歌。

爱尔兰餐厅里鸦雀无声，这使旷观有了发挥天才的余地。她几乎用唱催眠曲的嗓音，唱完了全曲，甜极了、柔极了，她自信盖得过邓丽君，更不要说闻兰兰了！

果然，她轰动了爱尔兰餐厅。她接到的飞吻和花束要比闻兰兰多得多，她胜利了。她抱着一束束晚香玉花束，略带几分羞涩地站在包厢里，频频向人们点头，她仿佛是刚刚出征得胜归来，经过凯旋门的英雄。

不用说，贺经理和缪相亚都是兴奋的。在人们苦苦纠缠的时候，贺经理断然拒绝人们的请求，把她带走了。

旷观被贺经理领到铜锣湾驰名中外的国华国货公司，一口气给她买了十几套装在高级衣盒里的演出服装，一下子竟花去几千港币。

旷观再三推辞，后来缪相亚说话了：“不要推了，我和贺经理是莫逆之交，他给你的礼物，便是我给的一样。”

这一夜，旷观在席梦思床上睡得又甜又香，远离故国的星光照在她的床头，她的嘴角浮着笑意，她也许正做着五光十色的

梦吧？

“舅舅”的人质

旷观一直在香港逗留了 15 天。她玩得痛快极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15 天等于 23 年。23 年所未经历过的、未享受过的、未领略过的，15 天全都补偿了。

按照预定飞往美国的约定时间，只有两天了。旷观早早地整理好行装。来时只有一只箱子，都没有盛满，现在陡然间增至三口皮箱，而且都勉强能盖上盖子，看来非办托运手续不可。

这是一个美丽的黄昏，楼窗开着，来自大海的湿润的海风徐徐灌进来，摆动着长长的丝绒窗帷子。

旷观从冰箱里取出一杯冷饮，坐到面海的窗前，有几分依恋地望着浸在落日余晖里的这座岛城。马上又要离开这里了，美国该是什么样子？当然物质文明还要远远超过香港。一想到未来，她总有那种吃甘蔗上云梯的感觉——步步高、节节甜，幸运之神是不会遗弃她的。

天际有一片云，被夕阳烤红了。更远的地方，朦朦胧胧像是缥缈的迷雾。也许，穿破那层大雾，就可以望见自己的故乡。姐姐这时候在干什么？北京电报大楼的巨钟也许正在打晚 6 点吧？这时候，姐姐也许骑着自行车挤在车队的海洋里向前推进……不，也许她已经捅开了蜂窝煤的炉子，也许她又像往常一样，半征询、半决断地向姐夫发话：“喂，下碗切面算了，省事。”

不知为什么，十多天以来，旷观第一次在心头浮起一阵淡淡的乡愁。她本来早应当给姐姐写封平安家书的，可她多次抑制了写信的冲动。她现在不过是在旅途中，不过是香港纷杂世界的匆匆过客，只有等自己到了太平洋彼岸，有了固定的居址，有了可心的职业、可观的收入，才更具有写信的本钱。对了，顶好随着

第一封信给姐姐寄去 500 美元，叫她买一台电视机，省得小外甥天天饭后端起小板凳守候在人家门外……不，应当先让姐姐买洗衣机，她太累了，她不应当是洗衣妇，她应当是科学家啊……

越是想到写家书，她马上要离开香港，飞往美国的心越迫切，仿佛那里才是她安身立命的乐园。

这几天，干舅舅缪相亚显得额外忙碌，常常从早到晚出去，回来时也是阴沉着面孔，旷观每次问他，他都只是摆摆手：“小孩子，跟你说不明白的……”

缪相亚的反常，弄得旷观心里发慌。这是毋庸置疑的，缪相亚是她的靠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她的一切。在远离故国亲人的异邦，尽管这是中国的地方，又到处可以听到乡音，可毕竟她是举目无亲的。她好像是茫茫雾海中小船上的一个搭乘客，而缪相亚就是惟一把舵的人，她只能与他共存亡，所以缪相亚的欢乐就是旷观的欢乐，缪相亚的苦恼就是旷观的苦恼。

夜幕渐渐垂合，漆黑的夜空反而比黄昏时分明亮，地上的万家灯火组成一团大面积的光源，把天空都照亮了一大片。

旷观独自叫来一份西餐，胡乱吃了一点，就摁铃叫侍者端走了。

电子表的字盘正跳出 20 点 37 分的字样，隔壁房间仍然没有开门的动静，旷观有点心神不宁。

9 点钟左右，走廊里响起脚步声。

果然是缪相亚。他没有回自己房间去，却叫开了旷观的房门。

他还是萎靡不振的样子，听到旷观问了声“晚安”，他也只是点了点头，有气无力地把大衣挂到衣帽架上，脚步沉重地走到长沙发前，颓坐下去，开了一听崂山矿泉水，倒了半杯，一口气喝下去，重重叹息一声。

惴惴不安的旷观问道：“舅舅，你还没有吃饭吧？要不要叫

侍者送来？”

缪相亚摆摆手：“算了。琼浆玉液喝不下，山珍海味难下咽啊。”说着又长叹一声，仰倒在沙发上闭起了眼睛。

旷观绕到沙发后想把湿毛巾敷到他额头上，却闻到一股扑鼻的酒气。旷观迟疑了一下，却没有深想，又悄悄退回原座，愣愣地坐了半晌，终于忍不住问道：“舅舅，你到底碰上了什么难心事这样犯愁？若是……我能替你分忧，那……你就说话吧。”

缪相亚的头在沙发背上转了半圈，斜了旷观一眼，说：“孩子，净说傻话，你若能帮上忙，我不是不用四处拜佛了吗？”

旷观最担心厄运临头，一听这口气，心里咯噔一沉，忙问：“那……到底是……”

缪相亚像被人抽了大脖筋似的，耷拉着头，无精打采地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在香港经营的国泰橡胶商行，有倒闭的危险……”

旷观吃了一惊，问道：“为什么？”

缪相亚道：“如今不比从前了，合成橡胶业越来越兴旺，成本低、售价便宜，垄断了香港市场。除非我马上搞到一大笔款子，否则……把商行全部折卖，也抵不了债啊。”

这番话像一瓢凉水浇到旷观头上，她打了个冷战。但她还清醒，她想了半天出主意说：“那，你快点叫洛杉矶总行拨款来呀……”

缪相亚道：“我一天打了三个卫星电话，这帮王八蛋股东，他们生怕把钱扔进无底洞，推说银根吃紧，不肯救我一把。看来，山穷水尽，我只有马上飞回美国这一条路了。”

旷观急切地喘息着，她的内心经受着熬煎，她与缪相亚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根树了。她说：“提前走吧，咱们明天就飞回洛杉矶！”

但是，缪相亚好久没有做声。他颓在长沙发里，像一堆乱麻

包，一声接一声地叹息一阵后，才说：“你不懂啊！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老子走红运的时日，港九的阔佬、大亨们都来巴结我。到了我倒运的时辰，树倒猢猻散，你想沾他一点儿光他都不干，只落得连路费都凑不够，真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刻了。”

旷观觉得脚下的地板都在下沉，好像整座汇海酒家大楼要土崩瓦解了。她不能想像，万一她视为靠山的缪相亚一旦像朽木一样倒下去，她这棵柔弱的、只能攀援树干而求生的藤罗，岂不是要枯萎下去？

怎么办呢？连向来办事章法不乱的缪相亚都感到濒临绝境了，旷观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不知沉默了多久，缪相亚才用商量的口吻对旷观说：“我……实在有点走投无路了，除非……除非你暂时委屈一下……”

说到这里，缪相亚突然打住话头，望着旷观。

旷观觉得他的目光阴森可怖，眼睛里闪动着鬼火一样的光点，她下意识地退后一步，半晌说不出话来，她简直无法推测，缪相亚所说的“委屈”是什么含义，反正不会是好事，不然他何必吞吞吐吐呢？想到这里，旷观有点骇然，像儿时听别人讲了鬼狐故事那样害怕。

幸好缪相亚作出了一个苦笑：“看把你吓的，脸都白了。唉，其实也没有什么。你知道，我惟一可以相求的就是这家饭店的贺老板了，他还算讲点交情的人，在这世态炎凉的人世间，他算是好心人了。他能够资助我一笔款子买机票，可是……可是，一来不好张口告贷太多，二来你我一起匆匆离去，总有点一去不返的嫌疑。所以，我想，把你先安顿下来，在香港再住上十天半月，我飞到美国，提了款马上飞回来，那时咱再一起走，这样能使贺老板放宽心……只是你要受点委屈了……”

原来是这样！旷观确实感到委屈，泪水就在眼圈里转，她真

想脱口说出：“你真想得出来，拿我当人质抵押在这里吗？”可是，她终于没有说出口，把眼泪吞到了肚子里。她不能光从自己这方面着想，她不能在人家困难的时候再给他增添累赘。要知道，从北京出发以来，所有的费用都是缪相亚解囊出资，人家连眉头都没有皱过。自己怎么好意思恩将仇报？

经过了这一番思想斗争，她咬了咬牙，终于答应下来：“你快去吧，不用担心我，我在这里等着你……”

事情就这样商量妥了。据缪相亚说，贺老板真够仗义了，二话没说，替他拿出了旅行费用。

当天下午，贺经理驱车去送缪相亚，一直送到国际机场。

这是个少有的阴霾的天气，机场上空灰蒙蒙一片，显得十分压抑。

旷观的心情和那铅色低垂的阴云一样。不知为什么，她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单。在她看来，缪相亚是一块浮在海面上的烂船板，抓住它，溺水的旷观还有游到岸上的希望，而现在，这块木板就要被茫茫无边的大海吞掉了，她四顾茫然，觉得一阵阵心慌。

她是个自尊心与虚荣心并存的姑娘，自尊心不容许她在别人面前表露她寄人篱下的苦痛，她咬紧牙关，一句话都不多说，一直看着那架和阴云一样颜色的飞机载着缪相亚飞走了，消失在云层里，才低下头，揩了揩泪水。

也许是幻觉吧？她仿佛看见，一直阴沉着脸孔的缪相亚在关上机舱门的最后一刹那，好像得意地笑了一下。是向旷观笑呢，还是冲贺经理笑？她无法判明，但她觉得那不是苦笑，倒像是满足的揶揄的笑，这真是个费解的谜。

从此，旷观脸上消失了笑容，她很少走出汇海酒家楼门一步，由于心里不踏实，从前对于她像万花筒样的香港渐渐失去了吸引力，从前的吸引力化成了焦灼的盼望。

她一天4次跑到酒家底楼邮差交信的柜台那里守候。邮差倒是一天4次准时来到，但是既没有她的信函，更没有她的电报。失望，一次比一次更甚的失望！

专门分发信函的老差役是个干瘦的老头，是福建人，他见这姑娘神情恍惚地盼信，常常在柜台前的沙发上一坐就是半个钟头，觉得她很可怜，就主动和她搭话：“你在等什么人的信啊？家信吗？”

旷观摇摇头又点点头。

那老头上下打量她一番，忽然问道：“你是从北京新来的那位吧？是跟那个姓缪的来的？”

旷观闪开眼皮望着老人，点了点头。

不知为什么，老人说了这么一句：“金窝、银窝，不如家乡的穷窝啊！早年，我们这些跑香港、下南洋的，都是因为快饿死了，才拼死逃条活路，有一分办法，也不走啊！听说咱中国眼下有奔头了，这时候你往出跑，是怎么想的呢？”

旷观没有回答，她不愿意回答，也无法回答清楚。她只是不以为然地苦笑了一下，站起身来。

忽然，她听到有一阵迪斯科乐声从什么地方传来，她愣了一下，问老头道：“这是哪里奏乐？”

老头似乎很不理解，头向左边的大厅一摆，反问道：“你来了这么久，难道不知道这是出名的夜总会？”

旷观真的不知。不知是贺经理的疏漏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缘故，一直没有说到这个夜总会。

虽然音乐对她的吸引力就是磁石，可她还是向那里走，又回到她房间去了。

她吃不下、睡不好，整天坐卧不安，夜里常常惊梦。就这样度日如年地等了十几天，缪相亚一去无踪影，既没有按约定给她写信来，更没有再返回香港的信息。

她最怕见到贺经理，尽管贺经理还和从前一样彬彬有礼。她心里没有一天不打鼓。她心里明白，香港这样规格的饭店，包一间房子，加上餐价和来往出车费用，每天不会低于 300 港币，一个月呢？长此住下去呢？太可怕了，那对于不名一文的旷观说来，是可怕的天文数字。

从这以后，繁华的城市风貌、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以及从前吸引过她的一切，都相形失色了，连那绵软的席梦思床，一躺上去，都觉得是向无底深渊沉去……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旷观简直快成了抑郁型精神病患者了，她整天待在房中胡思乱想，时而幻想缪相亚会驾着直升飞机来接她，时而梦想有人捐助她一笔钱，买了车票从深圳回国。然而，没有港币，没有英镑，她是寸步难行的。从前她在国内，虽然知道钱的用途，却没有太确切的概念，现在她体会到了，钱是多么重要！

这天，她最担心的事情到底降临了！吃过早饭后，笑容可掬的贺经理来叩门求见了。

一进客厅，贺经理没有像往常那样关切地嘘寒问暖，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问道：“令舅大人还是没有信来吗？”

旷观像被人揭破了疮疤一样难受，心跳个不住，自己都能听到心跳的声音了。她没法回答，她也无须回答，贺老板会知道自己得少吗？既然如此，他今天的光临，将意味着什么呢？是逼债吗？

贺经理没有再逼问下去，他唠起了家常：“他，是你的亲舅舅吗？”

旷观不敢据实回答，万一说破，关系又远了一层，不又增加了不利因素吗？

见她含糊其词，贺经理皮笑肉不笑地抽了抽鼻子，说：“你这个舅舅，不大守信用啊！你是知道洛杉矶地址的，打个长途电

话吧，可以通过通讯卫星接转，又快又清晰。”

亏得贺老板的提醒！旷观心里骂自己糊涂！怎么竟没有想起这个最好的办法来呢？缪相亚走前那个晚上，自己不是向他索取过电话号码吗？

旷观马上翻出记在笔记本里的电话号码，拿到了贺经理面前。

贺老板拨了一串号码，向卫星电话接转台挂了业务号，不过10分钟，来自太平洋彼岸洛杉矶的信号就传过来了。

旷观的心跳得快冲出喉咙口了！她的手颤抖着从贺经理手中接过电话听筒，她多么想一下子听到缪相亚的声音啊！她像一个被困荒岛上的遇难者，最渴望的是收到救生船上发出的电波信号啊！

然而向她讲话的是香港卫星电话接转台的一位小姐，她礼貌而冰冷地说：“对不起，旷小姐，您下次使用卫星电话时，请查准对方号码，不幸的是洛杉矶爱因斯坦路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什么国泰公司，有一家橡胶事务所，是马来西亚人所经营，他们那里从来没有过叫缪相亚的华人雇员，当然更谈不上是总经理了。另外，电话号码的位数不对，这不是洛杉矶的电话。对不起，让您失望了，小姐。”

说毕，啪地一声，电话挂断了。

旷观的手还攥着奶白色的听筒，手都抓得痉挛了，出了汗，过了一会儿，脸上的汗水也从鬓发处流下来。她两眼发直，耳畔嗡嗡作响，嘴唇抽搐着，完全像傻了一般。

正在这时，传来叩门声，来不及安慰旷观的秃顶经理叫了声“请进”，一个穿银灰哔叽西装的中年人走进来，问道：“在这同您谈吗？”

贺经理说：“可以，但愿我不被人捉弄！”

两眼呆滞的旷观仿佛明白过来一点了，她把头偏向刚进来的

人，手里的话筒仍然抓得死死的。

只听来说：“奉贺经理钧示，到橡胶同业会和九家大公司去，都说从来没有过国泰橡胶商行，更没听说过缪相亚这么个人。本年度由于石油提价，橡胶配套产品相应涨价，也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倒闭的趋势。”

又是一个霹雳！

贺经理拍案而起：“骗子手！”

哗啦一声，抓在旷观手里的话筒落地，她一切都明白了，大叫一声，伏案痛哭起来，哭得眼前阵阵发黑……

歌唱家与歌女并非同一概念

旷观仿佛做了一场梦。她梦幻一般地坐着飞机升上了天空，还没等那迷离闪烁的美好的东西捕捉到手，又梦一般从云彩里跌了下来，跌到了比噩梦更可怕的深渊！

她压根儿不会料到那个自称是洛杉矶橡胶公司总经理的缪相亚会是个骗子！

当旷观哭乏以后，渐渐冷静下来，她不得不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去美国，已经根本不可能了，回到北京去吗？她既不甘心又不情愿，她不愿把笑柄留给人们。是呀，一向聪颖过人、自命不凡的旷观会叫一个高级骗子拐到香港，这未免太有损名声了。

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在香港扎下根来，含辛茹苦，干出一番名堂来，一偿夙愿，二可以给自己受伤害的心灵一点安慰。

旷观百思不得其解，缪相亚把自己骗到香港来为了什么呢？自己既不是官方要人脑里藏着重要机密情报，又不是腰缠巨款的大贾大商，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他害人不利己，反而要搭上一份旅费，这是何苦呢？

她真有点后怕！她惟一感到可以骄傲的是少女的尊严。从前她与骗子有过多少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呀，她几乎没对这个拣来的舅舅设过防线，如果他起歹心，那是随时可以得手的。啊，太可怕了，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现在，缪相亚的威胁已经远去了，眼下她更惧怕的倒是秃顶的贺经理。她欠他的房钱、膳费、车马费，他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威逼讨要。她两袖清风，该用什么办法付清这一笔巨款呢？

旷观犯愁了，而且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她太孤单了，从来没这样孤单过。真的，从前在国内，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这种孤单的恐慌感，好像到处有保障她的靠山似的。

记得，前年她和几个同学跑到庐山去听音乐会，几个小调皮鬼口袋里一分钱没有就扒上了南下的火车，直到车过长沙，列车员验票时把她们“揪”到车长室，她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北京的待业青年，要到庐山听音乐会，没有路费！”唉，车长真好，她一边像老妈妈似的教训了她们一顿，一边允许她们坐到终点站南昌，并且把她们交给开往九江的列车员。

这件事，从前在旷观心里，根本没当成一回事，在她看来，就像江河行地、日月经天那么自然。

可是，这里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地面了，没有钱，寸步难行，她能笑嘻嘻地说：“我是北京待业青年”而不付房费吗？她有了困难能去找公安局、市政府，或者跑到信访接待站去吗？

在她最苦闷的时候，贺经理推门走了进来，虽说不像从前那样殷勤、客气，却也没有横眉立目。

贺经理坐到沙发上，不住地打量着旷观，慢吞吞地问道：“密斯旷，你打算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这样坐吃山空啊！鄙人纵然有一副菩萨心肠，可那些股东们未必不说三道四，你可是拖欠了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旷观垂着眼皮立在沙发后面，呆了半天，才喃喃地说：“请

贺经理放心，我……不会白住你的……可是，我能干点什么呢？

贺经理笑起来：“这倒不必发愁。俗语说得好：腰缠万贯，不如一艺随身，你的身上不是带着资本吗？”

他指的资本，当然是歌唱的本领。这条门路，旷观未尝没有先考虑过。可是怎样走法呢？她不知道邓丽君的炮是怎么打响的。在大陆，她知道，考上哪个歌舞团，唱上几场，不用自己说话，只要观众给予好评，自有电台、报社的记者们来采访你……香港是不是这样呢？她一无所知。

听了贺经理的话，她说：“我倒愿意从事声乐……只是，还求贺经理代为谋个地方……”

“这好办。”贺经理又笑起来，笑得额头的皱纹一个劲耸动，他说：“鄙人底楼就开着一个夜总会，歌女、舞女虽说有几十个，像你这样漂亮、有着一副金嗓子的还不多。我想，只要你乐意，肯努力，夜总会那把金皇后的交椅，一定是你坐牢了，到那时，别说几个房钱，你怕要成为轰动港澳的大人物了，鄙人怕还要借你的光呢，哈哈……”

不知为什么，旷观听上去觉得有点刺耳，歌女和歌唱家可是两个概念啊！在大陆，郭兰英、邓韵是人人都尊敬的歌唱家，可她们却不是任人可欺侮的歌女！

贺经理仿佛看出了她的疑虑，就补了一句说：“你不要以为在夜总会里唱一唱低了身份，告诉你，上自总督、大老板、学者名流，下到市民，没有人不到夜总会来的，这是雅俗共赏的地方，从前邓丽君没发迹以前，也是歌女，头三脚要从这儿踢开。不然，你就是金嗓子、银嗓子，电视台、唱片公司也不会来找你，因为你的名字没人知道，不卖钱！”

钱，名字也能卖钱！这就是香港世界衡量一切的标准。旷观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又麻又痛。从前，她不理解“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唱歌就是因为高兴才唱，唱歌和政治有什么关

系？可是抛开这个，再换一个提法，认为唱歌和卖钱连在一起，她同样感到老大不自在。

在人屋檐下，怎好不低头？没办法，她只好勉强答应贺经理，今天晚上就到夜总会去试一试。

夜总会可不像旷观想像中的音乐会、舞会那么高雅！

这里灯红酒绿、杯盘狼藉、迪斯科乐混合着英语、潮汕语、广东话的吵嚷，烟雾腾腾。这里真是各色人等俱全，上九流、下九流杂乱地挤在一起，也有各国登陆的海员。

小小的舞池里，有几个醉鬼搂着几个妖冶的、半裸的舞女下流地扭着屁股，叫人看不下去……

一走进夜总会，旷观的头嗡地响了一下，心里一阵阵恶心。

大概是因为旷观是上了歌女的艳妆，也许还因为这漂亮的歌女首次莅临，她和贺经理在门口一出现，立刻轰动了大厅，好多人叫嚣着向她打着飞吻，口里吐出一些脏话。还有两个里倒歪斜的水兵走过来，伸手就想拥抱她，她吓得后退了一步。幸好贺经理威严地咳嗽了一下，手一抬，把两个醉鬼挡开了。

歌女，原来这就叫歌女！

旷观惊骇地发现，几乎每张餐桌上都有一个浓妆艳抹的歌女，有的被人搂在怀中，有的坐到大亨们的腿上，有的半眯着醉眼，仰着头，让别人把红色的酒液滴到她口中……

不，死也不当这种下作的酒吧间歌女！

旷观突然清醒了，扭身就往外走。

贺经理拦住了她：“别这样。你和她们不同，你是高雅的，走，咱们到后面去，那里都是社会上流聚会的地方。我怎么会让你在这里鱼目混珠呢？”

果然，贺经理带着她绕过乌烟瘴气的大厅，经过一条狭长的走廊，来到另一个小一点的厅堂里。

这里是要文雅得多了。坐在雅座上的人都是衣冠楚楚的仪

表，也有雍容华贵的妇人，有华人，也有相当数量的外国人。他们文质彬彬地喝着大香槟酒，听着歌女的演唱，看着舞女的舞姿。

在门口少站了片刻，贺经理向她投过去征询的一瞥，那意思是问：“怎么样，这里另是一番天地了吧？”

旷观没有吱声，紧张的心弦一直没有松弛下来。

贺经理把旷观向这些大人物们一一介绍了一番，旷观只好在一个外国大亨弗莱斯旁边坐下。这是个蓝眼睛红头发的大胖子，据贺经理说，他是香港的“石油大王”，是首富。他还悄悄附在旷观耳朵边说：“你要好好巴结他，他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一句话能让你成名，送你到美国、到西欧，那都不费吹灰之力。你若惹恼了他，一句话，也能让你身败名裂。”

旷观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觉得从前自己太傻了，光看到这里的高超技术和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怎么就没有看到这现代文明的背后，还藏着这么多令人作呕的污垢呢？

不明国籍的大亨弗莱斯对旷观很殷勤，不断地给她倒冷饮，那双深陷的蓝眼睛，常常死鱼样地一动不动地盯着她，使她浑身上下不舒服。

终于，旷观演唱了几首歌曲。

大概是成功了，她模模糊糊地听到了掌声、喝彩声，弗莱斯给她送上一束鲜花。

快到凌晨3点了，旷观才走出那梦幻般的酒吧间，回到住室去。她头昏脑涨，心乱如麻。她恍惚记起来，弗莱斯曾经邀请她跳过一轮伴舞，每当他们转到幽暗的角落时，弗莱斯那多毛的手就从她腰间滑到她胸前，在她乳房处摸索……她几次都逃也似的推开了他……

这是旷观无法忍受的生活！这和她要当歌唱家的理想有着多大的距离啊！不，她不能沉沦在下流的夜总会和酒吧间里。

第二天，她决然地向贺经理提出：她要去找个正经事干，哪怕是给人家当佣人也行！

她有她的打算，挣够一笔钱，还上住房的积欠账，再凑够路费，回到大陆故乡去，她已经深深地后悔了。

听了旷观的话，贺经理的脸沉下来，半晌才说：“君子不强人所难。既然你下了决心，听便好了。”

他总算没有阻拦，旷观放下了一条心。她有点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叫您失望了。为了不使您为难，我打算找一个比较便宜的旅馆……”

贺经理说：“那又何必？假如你一定要退掉这套房子，也无须另外去找，我这里还有便宜一些的房子，你尽可以去住。”

旷观见他这么说，也不好再坚持另觅住处了，她生怕贺经理怀疑她会逃走赖账，因此就答应下来。

从这往后，她的事情就是翻查各种报纸的广告，专门留意招聘启事。

一连几天，她都往出跑，她到一家大商店去考过服装模特，她考过家庭教师，她到一家大公司去试过打字员。可是一连几天，她都失败了。不知为什么，不管开初人家怎样热情地接待她，只要一知道她是住在汇海酒家的旷观，马上变了脸，不是推说所招聘的人已满额，就是说不打算再招了，她到处吃闭门羹。

这天中午，她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在街上，她连乘坐双层公共汽车的钱都拿不出，更不要说叫一辆出租车了，只好安步当车！

又白白地跑了一个上午，赶回汇海酒家去吃中饭已经来不及了，又没有钱去买点小吃，她只好挨饿。

她走着、走着，一种强烈的孤寂感袭击她的心头，她不由得思念起北京来。倘若是在北京，她无论走到哪一个区，她都可以找到朋友、同学的家，她甚至可以自己动手到厨房去煮面吃！这里啊，她像是两眼摸黑的海外来客，游离在太空和人世间之外。

她深深地叹息了一番，坐到靠海的街心花园长凳上。大海吐着白色的泡沫，一浪一浪地滚上海滩，远方灰蓝一片，一只离群的海鸥凄凉地叫着，在海上飞来飞去。旷观的目光一直追随着这只可怜的海鸟，不知它是被鸥群遗弃了呢，还是它自己迷失了路途？

她觉得，自己的境遇就同那凄然飞旋的海鸥一样……她此时望着大海和天边交界的地方云起云飞，突然想起几句诗来：“故乡明月在，何日彩云归？”

她不觉潸然泪下，她觉得自己不如那一片片自由飘拂的彩云！彩云还可以凭借风力飘到大陆去，飘到故乡去，可是自己如同身陷孤岛的鲁滨逊一样，没有亲朋、没有伴侣，什么时候才能望见故乡的明月呢？

她不知在海滨坐了多久，才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

海滨的上方有一道水泥海堤，海堤上面是一家什么工厂。当她走到工厂大门时，发现门前停着好多半旧的轿车，一群人围在那里像在等待什么。

旷观走过去，她发现了张贴在工厂大门口的一张招工启事。这原来是一家乐器工厂，要招用 4 名清洁工，每月工资两千港币。说是清洁工，那不过是美其名曰罢了，她听来应招的人议论说，这家厂子专门做琵琶和各种琴的弦子，清洁工就是负责洗涤从大陆运来的羊肠子的，活又累又脏。

旷观不管这些，哪怕一天干上 18 个小时，只要能混上一碗饭吃，付得上积欠的房费，她别的都不去计较了。

但是，她又失望了。

她一直在乐器厂门口等到黄昏，她填写的表单一递上去，那个把眼镜推到额头的老头打量她一眼，问道：“你就是住在汇海酒家的旷小姐？”

旷观点点头。

那老头摇摇头，叹口气：“小姐请回吧，敝厂……招够了，实在对不起。”

他明明是在说谎！旷观知道得很清楚，刚好还有一个余额，应招的人几乎都是因为年龄过大、体力衰弱被回绝的，并没有招够。

于是旷观近于哀求地说：“老伯伯，你们明明还有一个空位子嘛！我能干的，什么重活、脏活都干得来……”

那老头同情地看了看她，说：“你再说也没有用的。实话告诉你吧，贺老板早打过电话来了，你看，你的名字早在这儿了，只要碰上你来，我……只好遵命回绝……”

果然不假，老头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上面醒目地开列着旷观的住址身份、年龄……

旷观眼前一片漆黑，差点晕倒！

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所有出了招聘广告的地方一见了她的名字都拒绝录用，原来统统是贺老板在暗中做了手脚！

她又气又恨又不明白！难道贺老板不希望我找到事做尽早还清欠债吗？他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难道，他非逼我再回到夜总会，去当酒吧间的舞女、歌妓吗？

她恨透了贺老板，和恨骗子缪相亚一样。她觉察得到，贺老板在她的四周布下了一张张看不见的网，她东躲西撞，怎样才能撞破这张网飞到自由的天地去呢？

得到的恰恰不是追求的

主意到底被她想出来了：起诉、告状，告贺老板和缪相亚拐骗少女、威逼少女走她不愿走的邪路！

她似乎看见了一线隐隐的亮光，她身上的疲乏也仿佛消失了。她在华灯初上的时候回到了汇海酒家。

她从主楼过道拐到后院，那里有几排鸽子笼似的平房。几天以前，她在外面奔波一天回来时，她的行李、衣箱早被贺老板派人搬到这里来了。

她摸索着走过堆满瓷砖和新运来的抽水马桶的漆黑过道，打开那间散发着霉味的房子，开了灯，坐在床前发呆。饭时早就过了，不会有人来给她送晚餐，她只有再饿上一宿。

她从箱子里找出一个笔记本。

这是一个塑料封皮的笔记本，封面印的是古老的万里长城，还有一行题字：风景这边独好。

看着看着，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滴到封皮上。长城啊，长城，从居庸关到青龙桥，哪一座烽火台上没留下过她的足迹？哪一个城垛上没印下她的指纹？从前，她为什么从来没有感到长城的可爱呢？如今，她有一种切肤之感，她觉得自己的背后正因为没有这堵坚不可摧的长城，才使自己成了任人欺凌、宰割的孤女。

她终于从笔记本上扯下几页纸，铺在桌上，打算给警察局写一份上诉状。

她刚写了几行，有人在叩门。

她把纸反扣到桌上，走过去开门，是贺经理，仍然笑吟吟的样子。

旷观有点讨厌地问：“有事吗？”

贺经理坐到桌旁的椅子上，问道：“怎么样？找事不那么顺利吧？”

旷观一时心头怒火难耐，就说：“多亏贺老板关照，你费了不少心啊！”

贺经理脸上松弛的肌肉跳了几下，尴尬地笑了几声，说：“你知道了就好。也知道鄙人在这地面上是说得出、做得到的人。可话又说回来，我还是为你着想，干吗捧着金碗去要饭呢？我是

惜才的人，不愿意你吃苦去做生活。”

旷观冷笑不语。她还听不出来吗？他不过要把自己当成栽在酒吧间的一棵摇钱树，做一桩一本万利的买卖。

见她不卑不亢的样子，贺经理又满脸堆下笑来，说：“敝人是一片真情，小姐切莫误会。还是听话搬到楼里去住吧，只要你肯为敝人的夜总会增光添彩，敝人决不会亏待小姐，可以立合同二八分成，保你一生享不尽荣华富贵……”

“不，”旷观站在一旁决然地说，“你死了这条心吧。我爱唱歌不是为了当你酒吧间里的那种歌女。那是妓女，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贺经理无言以对，为了摆脱这尴尬的局面，他想重新找个话题，顺手拿起了旷观反扣在桌上的那张纸。

旷观发现了，刚要伸手去夺，贺经理已经看了个大概。

他紫涨着面孔，把那张纸往桌上一拍，嘿嘿冷笑着说：“敝人小看小姐了！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何不早说？所有的警察头子都是敝人的金兰交，敝人替你办，岂不省事？小姐，你错打了主意！你到时候不后悔就好，小姐告敝人拐骗少女，可是没有证据，是小姐自己找上门来住店的，不是敝人强逼小姐来的。再说，所谓逼你去当歌女，这并不算犯法，这里不比大陆，连公开设妓院都是当局所允许的，你能告倒敝人吗？况且，敝人倒有理由告你一个欠债不还却反诬别人的诬陷罪，小姐怕是最低要坐6个月牢，小姐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旷观又气又恨，却一点办法没有。

应当说，贺经理这番话算不得恫吓威胁，在大陆、在社会主义祖国言之成理的事情，在香港地面上却完全可能不是理。退一步说，即或告谁，贺老板这样的地头蛇，会受到当局制裁吗？旷观岂不是要弄个打不着狐狸反惹一身骚的下场？

一见旷观的锐气受挫，贺经理的脸上又堆起了笑容，他用悲

天恼人的调子规劝地说：“敝人是个讲仁义的人，决不把事做绝。小姐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不理解敝人的苦衷。如果你肯答应，咱们可以商讨出一个过得去的办法，我多么不愿意经过警方去处置啊……”

人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常常做出违背初衷的抉择。此时的旷观就是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地步，她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连她自己都不甚理解的念头：答应他！看他能吃掉我？说不定这也是一条绝路逢生的路！

这笔交易顺利成交。贺老板当场喊来侍者把旷观的衣物又搬回原来的房间。她不客气地要他开一桌上好的饭菜，她还喝了点酒，吃饱喝足，把贺老板轰出去，和衣躺在床上。

大概酒精在起作用，她觉得口渴，躺了一阵儿，想挣扎着起来去倒一杯凉开水，可是头晕得站不起来，眼皮总在打架，像是睡不醒的样子。她心里还是明白的，她记得，吃饭的时候，她只是喝了半小杯中国红葡萄酒，这是她点名要的。半杯果酒就能醉成这个样子吗？不，决不会。她虽然从不饮酒，却天生有点海量，记得那年中学毕业的聚餐会上，她逞能和几个男同学碰杯，一连喝下去五杯葡萄酒，还像没事儿人似的参加了独唱演出呢！

她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只觉得意识一阵阵朦胧，好像马上就要沉睡过去的样子。在这一瞬间，她忽然记起了从前亲身经历过、几乎上当的事，那个同学的父亲想要占有她，就在可可杯里加了麻醉药……

一想到这里，旷观的心猛地一阵收缩，她忽然记起来，这瓶红葡萄酒是贺老板特意从外面拿进来的，而且是早就启了封的。她不能不防备这个恶棍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于是她拼死力挣扎起来，想要走到门口，把门从里面锁死。一个流落异乡的少女，只有门锁这一个防身的武器可用了。

然而，她刚刚摇摇晃晃地走了两三步，就感到一阵阵头晕目

眩，一头栽倒在地毯上，失去了知觉。

天亮时分，外面在下雨，楼窗对面的高层建筑全挡在雨帘后头，一片朦胧。

旷观醒来了，仍然头痛欲裂。

她躺在席梦思床上，全身一丝不挂。她有点惊奇，自己从小养成穿内衣睡眠的习惯呀，今天是怎么了？

这一瞬间，可怕的回忆闪电般在她脑海里闪了一下！她记起了昨夜的饮酒，想起了自己曾经去锁死房门，她记得没有走到房门口就扑倒了，自己是什么时候爬上床来的呢？

正当旷观被更为可怕的猜想所折磨的时候，她猛然发现了床头摆着一双男人的皮鞋，不仅是鞋，衣帽挂上还有一套男人的外衣，那咖啡色西装，那方头高级旅游皮鞋好像见过，啊，那不是秃顶贺经理的吗？

骤然间她明白了昨夜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她迅速穿上衣服，刚从床上蹦下来穿上拖鞋，从卫生间里走出披着睡衣的贺老板，他正拿着电动刮胡刀在已经磨得很光的下巴颏上“丝丝”地滚动，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

旷观疯了一般地扑过去，狠狠地打了贺经理两个耳光，接着又把皮鞋、衣服刷子、花露水瓶、矿泉水、罐头盒子……冰雹一样向老板的秃头砸去。

贺经理躲到窗前，等她打完，伏在床上痛不欲生地大哭起来的时候，才慢腾腾地走过来，厚颜无耻地说：“本来，我可以早早走掉，那，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迟早如此……别哭了，我就是让你知道，过了这一关，下面嘛，当歌女呀，被人亲吻、搂抱呀，甚至被哪个大人物接到家里去过夜啊，就都不会忸怩了，不过是这么回事罢了……”

这个恶棍的一番话，像是雨点似的马蹄蹂躏了一个少女纯洁的心灵。她在哀哀哭泣中，感到一切都绝望了！一切都幻灭了，

她的悔恨已经不再是“悔恨”两个字所能表达的了。她从小爱出风头、爱虚荣、爱漂亮、喜欢别人（尤其是男人）奉承，她很少看得起任何一个向她讨好的男孩子。讨好她的，她认为太没出息，对她敬而远之的，她视为假清高，顺着她的，她认为没有思想，逆着她的，又挫伤她的自尊，至于长得不好的、没天才的、性格沉郁的、爱好不广泛的，她简直更不屑一顾了。后来，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将来究竟什么人能配得上娶她为妻了！

她此时伤透了心，她怎么能想得到，就是她这样一个无比骄傲的少女，会得到这样惨的下场呢？她不能想像，在大陆会发生这种事情？即使也有贺经理这样的衣冠禽兽吧，在道德和法律的尊严面前也不敢不收敛，偶尔他们干了坏事，也总要得到制裁！可是，这是香港，她早听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提倡性解放的，这个口号，旷观何尝没有赞同过呢？可是，如果像贺经理这种残暴地毁灭别人青春的行为也算性解放的话，那么，这与低等动物的自然界还有什么区别！

她恨，她仇视，她甚至想杀死这个毁灭她青春的贼！

这时，已经穿好了衣服的贺经理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坦然地说：“好了，密斯旷，我们去吃早餐，你不是喜欢靠海的房子吗？我在筲箕湾有一栋别墅，你一定会满意的。”

旷观不肯去，她哭得泪人一般。

她想到了死，可又觉得这样糊里糊涂地死在异地他乡，未免太冤屈了。她这时才承认，自己是把一口染缸当成幸福泉来憧憬的。现在，她不是已经染黑了一角吗？摆在她面前的路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彻底染黑！

大概贺经理怕她寻短见，他走后，马上找来两个浑身上下散发着香水味道的舞女来陪她解闷。

直到这时，她才觉得应当给亲人写一封信了。她含着热泪，把信纸铺在桌上，未曾落笔，泪水早噼里啪啦地掉到纸上，信纸

打湿了一大片。

她能写什么呢？写上一百句后悔、一千句缅怀？晚了，现在说什么都是晚了。她忽然放下了笔，有什么好写？写自己追求到了光明，还是写自己获得了幸福？说假话还是说真话？

她又一次失声恸哭起来。完了，自己已经是向下沉沦的人了，没有脸面再见亲人，更没有脸面再回到祖国去。

她忽然揩干了眼泪跳了起来，从桌上抓起酒瓶，咕嘟咕嘟喝了几口，啪的一声放开了录音机，一阵近乎疯狂的迪斯科乐曲播送出来，旷观拉着一个舞女说：“来，跳吧，唱吧，喝吧！人生能得几回醉？一醉解千愁！”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两个舞女吓了一跳，赶紧去找贺经理。

贺经理气喘吁吁地跑进门来，一见旷观正在疯狂地独舞，手里还握着一瓶威士忌。他反倒放心哈哈大笑起来。

贺经理对两个舞女说：“你们去吧。她想开了。”

两个舞女半信半疑，还站在那里。

贺经理又补了一句：“去吧。人在想开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反常的背后就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正常！”

从此，旷观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她在夜总会、酒吧间抛头露面，她喝酒、打牌，陪着阔佬们出去兜风，她的绝唱和风采为贺老板赚了大钱，她成了围着幕纱的社会里的知名人物。

你给了祖国什么？

公元 1980 年春天。

这是一个春风送暖万物复苏的日子，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直飞香港着陆。

在这架飞机上，有一个 12 人组成的中国核子物理专家代表

团，他们是应国际物理学会邀请，到日本参加物理学年会后，取道香港，准备回国的。

当代表团成员走下飞机时，《明报》、《新晚报》、《大公报》等好多新闻记者拥上去拍照，镜头最多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圆圆的脸孔，大眼睛，高鼻梁，戴一副银丝边眼镜，穿着剪裁得十分得体的深蓝色小领西装，有风度、典雅而庄重。记者们都在相互议论：“她就是王重华，最年轻的核子物理研究员。”“听说她和日本一位专家联合搞了一项研究……”

王重华便是居住在 12 平方米斗室里从事研究的旷观的姐姐。

一位《大公报》的记者挤上前去，把长杆麦克风送到王重华跟前，请她谈谈这次出访日本的观感。

王重华矜持地一笑，说：“日本人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向世界各国物理学家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科学技术，这对我们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将是一个借鉴和促进。”

一位英国路透社记者问道：“小姐，您能谈谈，您对日本现代文明和物质生活的感受吗？”

王重华又是矜持地一笑，说：“日本比我们富，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可是，朋友和邻居的富有毕竟代替不了自家的富有，我们不停留在羡慕和向往的意识上，我们打算用自己的汗水去建设自己的未来。”

在场的记者都为王重华鼓了掌。

与此同时，香港几家电视公司都在同一时间里把这个镜头播放出去，王重华的讲话，在许许多多电视观众中赢得了掌声，他们绝大部分是华人，他们当然为有这样有志气的同胞而自豪。

然而，也有人流泪、哭泣了，那就是我们的旷观。

她第一眼就从电视屏幕上认出了姐姐那持重、深沉的面孔。姐姐的话，她是熟悉的，她在背井离乡之前，就听姐姐这么说过。可惜，那时候这些话不过是过耳山风罢了。人，只有在碰了

南墙以后，才能掂出一句忠言的真正分量。

旷观的脸一阵阵发烧，她怕姐姐那一双深沉而又明亮的眼睛，她赶紧关掉了电视机。

死水也会再生波澜——只要有风。

风不是来了吗？这风的力量是那样强大，在她心底那潭死水里掀起万丈狂澜。

一奶同胞的姐妹，一个穿着礼服，代表着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去出国观光；一个醉生梦死，为着追求那空虚的物质享乐而沉缅在酒吧间里，作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玩物。

同是父母所生，同在一个国度里长大，一个卧薪尝胆，和苦难的祖国、同胞同甘共苦，用血汗一点一滴地造出自己的幸福大厦；一个贪图虚荣，不惜背弃祖国、亲朋，把青春和韶华虚度在纸醉金迷的地方，成为雕梁画栋里的寄生虫！

应当说，旷观是富有者。她一个人住着最现代化的一套房子，出入有汽车，她可能比祖国的任何人吃得还要好，至于姐姐，那简直更不能相比了。

可是她这个物质生活的富翁恰恰是最大的精神的贫困者。她没有信仰，没有追求，没有精神支柱。她自己都感到，自己不过是用绫罗绸缎围裹起来的一堆肉而已，离开了疯狂、变态和酒吧间，她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她真想去见见姐姐，可是她没有勇气。她怕，她怕自己这座冰山一旦遇到了姐姐那炽热的火焰，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溶化净尽。

她伤心地哭了一阵儿，终于下了狠心，此生此世不能再去见姐姐了，不能再给她抹黑，就当她没有这个妹妹就是了。

她强迫自己忘掉姐姐，忘掉从前的一切、一切，她惟一现实的，是穿起袒胸露背的奇装异服到酒吧间去应酬、去调情、去卖俏、去卖嗓子……

晚饭后，贺经理打来一个电话，对她说，今晚石油大王弗莱斯要出席爱尔兰餐馆的舞会，希望她拿出全套本事来。

她还记得那个蓝眼睛、手背多毛的家伙，从前她把他当成青面獠牙的恶魔妖怪一样看待。时过境迁，现在，在她眼里，弗莱斯不过是个男人，一个喜欢花天酒地的阔男人罢了！她敢于玩弄任何男人，包括总统、国王！她是个被人玩弄过的女性。她出于一种女人特有的变态心理、报复心理，逢场作戏地应付一切！

载着她和贺经理的“雪佛兰”牌高级轿车在爱尔兰酒家门前的停车场刹住，贺经理替她拉开了车门。

颈戴高级项链的旷观走下车子，旁若无人地向正厅前的旋门走去。

这时，有几个穿着中山装的男女恰巧横过马路，走过爱尔兰餐馆门前。从那服饰和拘谨严肃的神态，旷观马上断定这是来自大陆的人。她本能地放慢步子，深情地回眸望了一眼。

糟了！走在人群中那个惟一的女人不就是姐姐王重华吗？

旷观赶快背过脸去，像是行窃的贼遇上了失主一样惶恐。她迅速钻到旋门里去，心怦怦地跳个不停。

站在前厅里，旷观好久都不能平静下来。就这样狠心肠地和姐姐失之交臂吗？姐姐若是知道了妹妹就在这里泥足深陷，她会怎样痛心啊！若是姐姐知道她的妹妹与她对面不相识，她该多么伤心……

理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能够战胜（或叫扼杀）感情的。羞耻心如果也是一种理智，那么，她被羞耻心所驱使，终于含悲忍痛地放过了这个机会。

人啊，真是难以琢磨的怪物！当初，在旷观受了假舅舅的诓骗走投无路的时候，假如有姐姐在这里，她会扑到姐姐脚下，哭着求姐姐快把她带回故乡去……曾几何时，她却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麻木而又带有病态。

妹妹不顾而去，姐姐却被她勾起了心底的隐痛。

在爱尔兰餐馆门前，王重华清楚地看见了一个盛装女子从她面前一闪而过。在她回眸一顾的当儿，王重华一下子认出来，那是半年多音讯皆无的妹妹！是的，错不了，那眉眼、那有鲜明棱角的嘴唇，尽管涂了大量脂粉，可是骗不了姐姐的眼睛。

王重华正要张口喊妹妹的名字，却见那女人一闪身走进了餐馆，这又使王重华犹疑起来，难道自己看错人了吗？不然，她怎么会视而不见？怎么会像路人一样各自走开呢？

王重华迟疑了一阵子，对几个同伴说：“方才，我好像看见了妹妹。”

一个人问道：“是方才进去的那个？”

王重华说：“好像。”

大家都是知道旷观出走这件事的，都提议进去看看。

说实在的，他们这些把时间耗尽在书案前、实验台上的学者们，去逛夜总会是不可思议的，今天只好破例了。

爱尔兰餐馆楼上楼下、甚至左右两旁楼梯上都挤满了人，酒气熏天，古怪的音乐在空间里流荡着。

大约是穿中山装的顾客光临爱尔兰餐馆是稀罕事，一个英国男招待马上走过去，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敞亮的雅座。

王重华看了看同伴们，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坐下，要了一杯咖啡喝着。

先后有一些舞女表演了几出不堪入目的扭摆舞，最后在一片叫嚣、鼓噪的声浪中，人们都向楼上张望。

王重华也向那里望去，只见一个大腹便便的外国人身旁，坐着一个妙龄女郎，不看则已，一看她就坐不住了，那不正是妹妹旷观吗？

几个同伴一见这情景，都猜到了八九，正要随她一同去找旷观，又不得不先耐住性子坐下来，因为旷观这时正扭动着腰肢，

走到前面来，向台下打了几个飞吻，然后向包厢栏杆上一俯，右手支颐，唱了起来：

柳丝长，
情也长，
想你想断肠。
泪汪汪，
心茫茫，
家乡在何方？
我何曾把你遗忘，
故国在何方？
愿白云快把书信来传，
莫让我想你断肠。

王重华多少有点纳闷。这本来是一首思念情夫的情歌，妹妹却把词儿改成了思念故国的样子，唱得凄凉，听来惆怅。她好像看见，有两颗泪珠在旷观的眼里闪动。

王重华为妹妹沦落到这种地步而心痛、心酸，她恨妹妹，也恨自己，是自己从小把她惯坏了，把她喂成了小馋猫，谁家有好吃的往谁家去……

想着想着，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耳畔嗡嗡作响，下面旷观唱了些什么，她一句都没有听见。她下了决心，就是拖，也要把失足的妹妹从泥坑里拖出来，这不但是姐姐的责任，也是一个同胞的义务。

因为不了解旷观背后的背景，王重华一直僵坐在那里，没有贸然上去相认。他们当中有一个在香港工作过一段的人说，在酒吧间，对这些歌女、舞女，常常控制得极严，老板和地痞流氓串通一气。一入了这个门户，想逃出去是相当不易的。所以他们都

主张慎重从事。

就这样，他们一直等到深夜，直到旷观走出餐厅，他们才起身尾随出来。

仍然没有单独交谈的机会。像众星捧月一般，有好多簇拥着她步出餐厅，其中那个外国大亨，竟然陪着旷观进了车子。

王重华他们也随即跳上一辆出租的旅游面包车。司机是个华人，王重华随手掏出 20 元港币塞给司机，用手向开走的车子一指：“跟上那辆雪佛兰。”

他们终于弄清了旷观下榻的旅馆，就跳下车，走了进去。

守门的男招待替他们拉开门，客气地问道：“先生们要包房间吗？”

王重华说：“谢谢，我们下榻在港九饭店。我们是来会一位朋友。”

男招待把他们让进会客室，分别给他们泡了一杯茶，才发问道：“不知要见哪位先生。”

王重华道：“我们要面见一下旷观。”

男招待摇摇头说：“见她不大容易，她吩咐过，没有她的话，不准带任何人到她房中去。”

随王重华一起来的一个人马上掏出 10 元港币作为小费塞过去：“劳驾，无论如何成全我们见上一面。”

男招待买人情地说：“好吧，我去碰碰运气。”

王重华嘱咐说：“她要问起什么人要见她，你最好不直说，随便说一个使她能来的名字吧。”

男招待说：“我会办好的。”

5 分钟以后，走廊里响起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同时听到了一个女人傲慢的声音：“贺经理不是回家去了吗？这么烺唆！”

随着话音，门忽地推开，旷观换了一身纱质连衣裙，风摆杨柳地出现在门口，眼波一闪，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她掉过

头，对男招待说：“你吃了人家多少小费，这么卖力气？”

男招待小心地说：“对不起，他们实在太诚心了……”

旷观说了句：“我谁都不高兴见！”扭身就要离去。

这时王重华再也忍不住了，她从座位上站起身，声音颤抖而严厉地叫道：“站住！你真的是冷血动物吗？”

这句话像几颗钉子，牢牢地把旷观钉在原地，但她仍然没有转过头来。

王重华只觉得一阵阵肝火上升，爱化成了恨，恨又化成了爱，爱和恨的大火把她整个燃烧了！她真想走上去狠狠地打她几个耳光，骂一声“无耻”，可是她控制了自己。她又颤抖着叫了一声：“爱华……你真的连姐姐都不认了吗？”

旷观非常迟缓地转过了身子，她没敢正眼看姐姐一眼，却喃喃地说：“你……大概认错人了，我……根本不是什么你的妹妹，我是个没有亲人、没有祖国的人，我是个被人遗弃的弱者……对不起……”说罢，转身又要离去。

王重华高呼了一声：“站住！”堵住了她的去路，两眼盯住旷观：“你，把头抬起来，眼睛看着我！”

旷观终于没有勇气正眼看上姐姐一眼，她手持门框低声啜泣：“你……就当你的妹妹死去了，不要再寻烦恼了吧，你从前的妹妹确实已经死掉了，我求求你……”

王重华深深地叹息一声，哽咽着说：“想不到你还活在世上，更想不到你变成了这个样子！你拍拍胸口想一想，你给了祖国什么？是荣誉还是耻辱？你从前的誓言都烂在肚子里了吗？”

这几句话的分量只有旷观能够掂量出来，它像千钧重锤，砸开了她心灵上的铁门，把她无情地带回到过去的年代。

那还是祖国天空乌云翻滚的1976年的春天。王重华接到公安局看守所的书面通过，要她立即把保外就医的父亲接回家去。

她们的父亲是在那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暴中，被公安

局从“江西中央五七干校”抓回来塞到监狱的。罪名除了他与“风源”有过上下级关系而外，他还在给一个老朋友的信中，“恶毒地攻击了批林批孔运动”。

父亲被王重华和旷观从狱中抬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姐姐在这个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生的老战士身旁陪他走过了人生坎坷路途的最后一段。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一手拉着一个女儿，问了这么一句话：“你们今后打算怎么走路呢？这是爸爸最不放心的。”

王重华当时说：“中国完了，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妹妹旷观说：“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怕，天塌下来有大个的支着，混吃等死呗！”

“不，”爸爸说，“不能这样啊，孩子。中国完不了。如果中国就这样完结了，岂不是等于爸爸这一代人的血白流了吗？爸爸从15岁起干红军，干到今天，要倒下去了。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只有一句话，要你们记住，做人难啊，做祖国的好儿女更难。时时要拍拍自己的胸口，问问自己，你给了祖国什么？是荣誉还是耻辱，是叹息还是忘我的献身？记住吧，孩子……”

他，就这样溘然长逝了。姐姐王重华时刻记住了爸爸临终的嘱咐，她无论在当“黑五类”、“狗崽子”的年月，还是阳光再现的年代，她都安心于斗室之中，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光和热奉献给祖国。但是她旷观呢？她给了祖国什么？是荣誉还是耻辱？

这句话，勾起了旷观多少美好而又心酸的回忆啊！记得她从前是个雄心勃勃、喜欢幻想的人，她曾经幻想过当运动员，在世界运动会上拿到一项冠军，让自己的成绩赢得五星红旗高高地升起；她也曾吹嘘要考取北京大学生物系，跟随童第周教授研究最有前途的遗传工程学，飞到斯德哥尔摩去，拿回来中国第一笔诺贝尔奖金；她也幻想过当一名电影明星，在国际电影节上，拿到奥斯卡金像奖……

姐姐曾经嘲笑她，说这些都是垒在流沙上的金字塔，因为只有用汗水当黏合剂，用时间和劳动当基石，才能真正建起牢固的丰碑。

今天，姐姐的话都应验了，过去的美好幻想只不过是海市蜃楼，早已消散，她不过是一个不足挂齿的人！

旷观终于伏在姐姐肩头上痛哭起来。

王重华说：“离开这里吧，我明天去给你办手续。”

王重华的几个同伴也都围过来相劝。

但是，旷观摇了摇头：“不，我不能同你们回去。我没有脸……”

天已经很晚了，再谈下去不方便，王重华想了一下，就说：“这样吧，我们在香港还有三五天的逗留。你明天上午到我那儿去一下，我们长谈一次，好吗？”说罢，她从怀里摸出一个印有中、英两种文字的名片，底下有住址和电话号码，她把这张名片交给了旷观。

旷观悲悲切切地点头答应了，一直目送着姐姐他们消失在门外。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从一楼会客厅回到房间去，旷观对仰在沙发里看电视的弗莱斯下了逐客令，不容分说，把他的大衣、帽子、皮鞋统统扔到走廊去了。

弗莱斯恼羞成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汇海酒家。

这一夜，旷观没能合眼。

这是半年来她惟一清醒的一夜。

人在醉生梦死、失去精神信仰的时候，是没有痛苦的；只有

良心再现、向上的力量回复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苦恨。

她该怎么办呢？

此前，她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她逃不出贺老板的手心。

现在不同了，祖国的代表团就近在咫尺，姐姐就在身边，这是感觉得到的坚实的后盾，是炙手可热的能源。她毫不怀疑，只要她愿意，她完全有可能挣脱魔爪，回到母亲的怀抱里去。

她觉得必须这样做。这种行尸走肉的日子也总有个了结的时候，干这种行当，等到人老珠黄的时候，贺老板就会像抛掉一副用过的纸牌那样把她一脚踢开。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前几天她随着弗莱斯去游海滨公园，他们一走下汽车，有一个满脸疤痕、双目失明的女人，撑着一根竹竿，披头散发地循着车声走过来，嘶哑地哀求着：“先生、太太、少爷、小姐，行行好吧……”

旷观让这面目狰狞的婆子叫得心里好酸。她拉开考究的小手提包，夹出十元港币，正要送给她，弗莱斯挎起她的胳膊就走：“密斯旷，不要理她！”

旷观没有听他的，还是把钱给了那贫婆子。她一直走出老远了，还听见了那女人的唠叨：“好心的小姐呀！愿上天保佑你，一生走好运，别像我这样不死不活……”

旷观叹息了一声：“多可怜的人。”

弗莱斯不以为然地说：“可怜？这大概是上帝的安排吧！你不知道她吗？这是从前有名的香米兰啊！”

旷观吓了一跳。香米兰，这个名字多么耳熟啊！对了，她听不少人常提起她。她在十多年前，曾经是香港夜总会里的“金皇后”，红得发紫的人物。谁会想得到，如今落到这步田地！

旷观忍不住问道：“她怎么会这样惨呢？”

弗莱斯打了一声口哨，顺手采了一朵半谢的山茶花，吹口气，剩余的几片花瓣也都落尽了。他把花枝往地上一扔，说：“花谢了谁还要？你们中国不是有那么一句现成话吗？人老珠黄，

就一个钱都不值了！”

旷观不觉打了个寒噤。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她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将来，不也会是香米兰这种下场吗？

现在，虽然事隔许久，这件事仍然刺痛她的心，香米兰那枯干的身影、披头散发布满亮晶晶疤痕的面孔，仍然在她眼前转，她不能走她的路！

她觉得房间里闷得不行，尽管空调机放着冷气，她还是透不过气来，就推开房门走了出来。

月亮好极了，圆圆的挂在中天，美中不足的是有几片云彩不时地飘过，时时把月亮挡住。

她坐在花园的长椅上，仰望着在云中钻行的月亮，一时百感交集。

月亮留给她的回忆真是太多了，儿时她和妈妈、姐姐每年八月十五都要赏月，在那照耀如同白昼的院子里放上一张小几，摆上月饼、西瓜，还有羊奶子葡萄。记得有一次，她天真地问妈妈：“外国也有月亮吗？”妈妈扑哧一笑，反问道：“你说呢？”还没等旷观回答，姐姐说：“怎么没有？你没学过那课书吗？有人崇洋媚外，把外国的月亮都说成比中国的圆！”当时旷观说：“外国一定没有月亮，嫦娥、吴刚都是中国人啊，中国人在上边，怎么是外国人的？”这稚气而又认真的话，引起了一家人的欢笑。

事情过去多年了，如果此时此地再有人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她会毫不带稚气地回答：“故国的月亮是最可爱的……”

陷入深深苦痛之中的旷观无法自拔。她眼前那条早已荒芜了的道路，忽然由于姐姐的到来又开拓出来了，走不走的决心，她必须在天亮前下定。

旷观闭起眼睛仰在长椅上，轻风徐徐吹过花树，空气中洋溢着清幽淡泊的花香。

过了好一阵儿，她从长椅上站起身来，正要回到房中去收

拾，猛听得花树那边有人窃窃私语，听那声音很耳熟，她走到花树下，禁不住向那边张望。

她差点叫起来！她看见了缪相亚，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她不知该怎样教训这个巧伪人才能解气。

不过，她没有轻易走过去，因为她发现，缪相亚正和秃顶贺老板在一起交谈。按她的想像，缪相亚也骗了贺经理，他们见面会有一场恶斗的。

但是不，他们有说有笑，像阔别多年的老朋友那样攀谈着，这是为什么呢？

只听话头渐渐转到旷观身上来了。

缪相亚笑嘻嘻地说：“怎么样？那个绝世佳人给你捞了一大笔吧？”

贺经理轻描淡写地说：“小有收入。我给你准备了5万港币，算做对你老兄的酬答！”

缪相亚道：“你老兄未免太贪了吧？5万，你说得出口吗？石油大王一次就给你15万，你当我不知道吗？你又得钱，又在小妞身上开了荤，我可是出了力把她从大陆带出来的，办事别办一锤子买卖。我这回从印度带来的两个黑牡丹，可又是一笔大财呀！况且5月份我还要去大陆周游几个月，像旷观这样轻浮幼稚的姑娘多的是呀……”

贺老板让步了：“你何必这么认真呢？这都好说……”

两个人狂笑起来。

躲在花树后的旷观直听得毛骨悚然。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恶棍原来是一路货，他们故意演出了一场欺骗旷观的丑剧，一个唱黑脸，一个扮红脸，何等可恶！从前，他只恨贺老板乘人之危，今天，她才看清了一切！这些靠贩卖女人肉体中饱私囊的家伙，是最可怕的强盗。

这时，缪相亚嬉皮笑脸地说：“马打江山驴坐殿，也该我享

点艳福了。今夜她房里没有客吧？”

贺经理说：“我正为这事犯愁，才约你来商量大计的。她得罪了弗莱斯，把他从房间里赶出来了。弗莱斯可是财神爷啊。”

缪相亚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小妞莫不是疯了？”

贺经理说：“方才，招待在电话里告诉我，有四五个从大陆来人会见了她，好像有一个是她的同胞姊姊，还约她明天上午会面……之后，就发生了逐客的事。”

缪相亚有几分惊骇地说：“不得了，宜早作打算。不能叫她回国去，那对我们太不利了。”

“所见略同。”贺老板打了个哈欠，说：“现在，咱们就上楼去，她若是识趣便罢，马上把她转移到一个秘密地方去，躲过大陆来的人的纠缠。特别要对报界守口如瓶，万一有报界干涉起来，我打算牺牲 10 万港币堵他们的嘴。”

缪相亚有几分担忧地问道：“万一她不肯就范，执意要见她姐姐、要回大陆呢？”

贺经理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个扁葫芦状的橡皮球，阴险地一笑，说：“那，就对不起了，只好让她给香米兰去做伴了。”

听了他们这番隐伏着杀机的话，旷观双手抓着胸口，胸膛都快要气炸了。她眼前又出现了香米兰那满脸疤痕、双目失明的恐怖形象，一时不能自制，竟然尖叫了一声。

但她马上意识到这叫声的危险性，连忙捂住嘴，拔脚就跑。

她的惊叫引起了缪相亚、贺老板的注意，他们相对一望，一齐大步绕到树丛这边来，看见了身穿纱睡衣的身影，正向马路上狂奔。

缪相亚吃了一惊：“好像是……她？”

贺老板咬了咬牙，从齿缝里挤出一句话来：“一不做、二不休，不能叫这骚货铲了咱们的根茎。”

说毕，贺老板和缪相亚拔步向前追去。

旷观脚上穿的是高底木齿拖鞋，跑起来极不方便，她气喘吁吁地边跑边回头，瞧见贺老板、缪相亚正恶狠狠地紧追不放，一时心慌，来不及细辩路径，见左边有一条幽暗的小路，就奔了进去。

大路正前方，是立体交叉公路的交会点，如果从上层路面围过去，恰好能拦住旷观的去路。贺老板一挥手，让缪相亚仍然顺着小巷尾追不放，自己却从高速公路转弯处迂回过去。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旷观一上了高速公路，吓得连连后退了几步，原来贺老板双手抄在裤袋里，正也斜着眼睛注视着她。

旷观扭回身又向回跑，刚奔了两步，迎头有人怪笑起来，她一抬头，原来是缪相亚！

两个恶棍都在一步步向前进逼，直到把旷观逼到两个人中间，逼到路旁小树林子里。

现在，到了非拼个鱼死网破的关头了！旷观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股勇气，她扑过去，照着缪相亚的面门狠狠地连捣两拳，只见那家伙啊呀一声怪叫，被打得七窍流血。

旷观再鼓足勇气扑向贺经理。姓贺的见缪相亚吃了亏，早有防备，向侧面一闪身，躲开了旷观这一拳。旷观由于用力过猛，身子前倾的惯力太大，一时收不住步子，狠狠地摔在地上。

趁这个机会，缪相亚疯狗似的扑过来按住她，说：“我掐死你，也叫你认得我的厉害。”

但是贺老板摆了摆手：“我们还是不要给大晚报留下个自讨麻烦的新闻为好。”说着，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了那个扁葫芦状的胶皮囊，在旷观面前晃了晃说：“这是硝酸和浓盐酸混合而成的王水，它能使你变成世界上最怕人的怪物！你如果愿意，就带着那漂亮的面孔回你的大陆去吧。”

说罢，他的手用力猛捏皮囊，一股呛鼻子的烟雾从扁葫芦里喷洒出来，全喷到了旷观的脸上。

旷观一时觉得像有人把一炉钢水浇在脸上那样灼痛攻心，她“啊”的一声惨叫，双手捂脸，昏厥过去。

贺经理吐了一口气，拍了拍缪相亚的肩膀：“咱们走吧，明天，她就和香米兰一样了，谁都不会认出她是谁。咱们是不是去玩玩你那两个印度黑牡丹？”

两条魔影渐渐地远去了，月亮完全被阴云吞没，天地间混沌一片黑。

不知过了多久，旷观在剧痛的折磨下醒来。她的一双手，十个手指头都抠进了树丛下的泥土里。她的脸上，像插上了千万把钢刀，她的眼窝里像塞进了烧红的钢钎。她什么都看不见，没有光亮、没有辨色力，眼前是她从来没有感觉到的浓黑！

完了，她知道自己被毁了容、烧瞎了双眼，她能想像得出自己是什么样子，香米兰那骇人的面孔，就是自己的模样儿。将来，孩子们见了自己，要吓得尖叫，少女们见了，要遮目而过，自己将成为世上最不堪入目的丑类！

她恨，她在心底呐喊，为什么像贺老板、缪相亚这样人世間最丑恶的人却相反高踞在上流社会的宝座上呢？太不公平了。

她没有生的留恋了，她不能像香米兰那样苟活下去。她有自己的祖国，她有自己的亲人，她也曾有过五彩缤纷的理想。可是，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恍如隔世的了，她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奔，有亲人不能团聚，有理想早已付之东流！

她恨恶人，恨恶势力，更恨自己。直到此时，她才明白了，路是靠每个人自己走的。她记起了在高中读书时古代散文里的一句话，不能吃“嗟来之食”，寄人篱下纵然是享尽荣华富贵，那不是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与自己的血汗相连的，是与祖国、全民族的血汗熔铸在一起的。

她想站起来，摇晃了一下，又摔倒下去。她就一点一点地向前爬，她就是爬，也要爬到姐姐下榻的港九饭店。

黎明之前，正是香港最黑的时候，旷观爬到了港九饭店的门前，她拼命地叩门，呼喊……

姐姐终于出来了，她凄怆地哭叫着妹妹的乳名，把她抱到怀里。几个伙伴也都起来了，有人打电话给警方要求缉拿凶手，有人给救护站挂电话要救护车。

但旷观说：“我……用不着去医院了，我活不多久了，我已经吞了药。姐姐，妹妹走错了一步路，一失足成千古恨，妹妹是不干净的人，没有脸再回到祖国去了……”

救护车开来了，但旷观死也不肯上，她伸出双手，抚摩着姐姐的脸，轻声地、喃喃地说：“姐姐，你再像从前那样，问我一句话吧，问哪！”

热泪滚淌的王重华附在她耳边说：“你给了祖国什么？是荣誉还是耻辱？”

旷观似乎得到了少许的安慰，她又重复了一遍：“你给了祖国什么？是荣誉还是耻辱？把这句话，写到咱们的《人民日报》上，写到《中国青年报》上，让别人拿我当个镜子……”

在场的人都哭了。旷观不需要安慰，她用自己走过的歧路，论证得一清二楚，她活得糊涂，却死得明白。

旷观突然仰起头来，问道：“姐姐，你看见月亮了吗？”

月亮完全埋在乌云中，人们都默不做声。

但是旷观直着脖子喊了起来：“不，我看见了，多好的月亮，那是故乡的明月啊……”

（原载 1980 年 3 期《春风》丛刊）

老将离休之后

将军未竟的心事

还是这条土路，还是这片坦荡荡的苏北平原，还是 32 年前的压抑心情……唉，真怪，历史的瞬间给人心灵投上的暗影居然可以左右人半生！

李辅乾坐在越野吉普车里，无缘无故地叹息了一声：“啊，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何所指，司机不大明白，也不敢多嘴，李辅乾是东海干休所出名的“怪老头”。

他今年整整 70 岁了，从去年“八一”建军节起，正式离休。军区从东海干休所给他拨了一栋房子。

他是威震全军的人物，战争年代立过好多传奇式的战功，他身上残留着七处伤疤。只是他有个令人不敢恭维的毛病：从来不在任何场合讲他的战斗经历，有人去请他，他总是那句话：“讲个球！我一个光杆司令能打得赢？”

天晓得他的哪根神经兴奋起来，竟然自告奋勇要到南京军事学院去作报告！干休所轰动了，连军区的首长们都有点奇怪。当然是求之不得，他这个能征惯战的宿将，可是多年没有开过口的

呀！为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专门派人负责整理李辅乾材料，帮他写回忆录的人曾经是大伤脑筋的，惟恐这古怪的老将把宝贵的战术遗产带到上帝那里去。

李辅乾一吐口，好家伙，军装的、便装的记者、作家们闻风而至，都希望捷足先登，把他的库存挖到手。

嘿，百分之百的失败！都被他轰了出来，他说：“写个球！都在肚子里装着呢，化不了，烂不尽，还怕我不照稿念讲走了板儿怎么的？”

记者们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准备录音机，到军事学院礼堂里去录磁带。

他到底要讲什么呢？讲战史呢，还是讲我军的优良传统？还是讲带兵的经验？

这真是个谜！

曾经有人不时地潜到李辅乾的住所去窥视，看他是否在不用秘书代劳的情况下自己撰写发言稿。没有一点迹象！人们倒是同时传开了一个新闻：李辅乾常常独自一人闷坐屋中，拿着一块没有光泽的银元在手里把玩，有时一看就是个把小时，这银元肯定凝聚着震撼他半生的风云。有人猜测，他有可能把这块并不闪光的银元带到军事学院的讲坛上去。

是的，他真的是带着这块银元上路的。

路面是柏油的，淮海战役那时候是烟尘滚滚的土路。现在不吃灰土了，却仍然颠得厉害，太阳一晒就发软的路面被汽车轮子碾成搓板，轮胎滚过，像过横垄地。

李辅乾的光脑袋搁在吉普车的靠背上，司机从望后视镜看去，像滚来滚去的光葫芦，想笑，但又不敢，忙把双眼盯住公路前方。油菜花开了，铺天盖地一片绒黄，麦子刚刚半尺高，翠生生的。头上盖着蓝布帕子，腰间扎着丝线彩色腰带的苏北农妇们，担着箩筐，赤着一双脚在路边走着，看样子是去赶一个大集。

啊，筐里是什么？蚕豆，还有荸荠，小猪崽在竹笼里吱吱地叫，刚从塘里捞上来的草鱼还甩尾张腮呢！

多么熟悉的苏北农村！雪白的比豆腐还要嫩的鱼圆子，加糖的肉片炒荸荠……

李辅乾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郑狩天的拿手好菜是煮五香蚕豆、鱼圆子，还有用炸得松脆的肉皮煮汤吃，比蹄筋一点都不逊色。

可惜，郑狩天已经长眠在朝鲜咸镜南道 28 个年头了。咳咳……怎么掉眼泪了？像老伴讥笑的“越老越没出息”吗？大概有点。从前，李辅乾是号称“吃钢咬铁”的汉子，他自己曾经嘲笑那些看戏掉眼泪的文化兵们是“胡子脸、女人肚肠”，他自己不是把胸脯拍得咄咄响吗？说什么来着？啊，“不是吹牛皮，老子泪腺有点萎缩！”这曾经引得机关的人哄堂大笑，“肌肉萎缩”这个词儿，他是刚从军医助理嘴里掏出来的，现发现卖。

人一老，就变得脆弱了吗？真他娘的见鬼，这几年李辅乾鼻子酸、眼睛发涩的时候越来越多起来。有一回他当着军区司令员哭了，他服从命令，却不愿意退出队列。他说：“你别笑话我，我快成林宝玉了。”司令员哈哈大笑：“你刚看了一出越剧《红楼梦》吧？是林黛玉！”李辅乾说：“不管她什么玉，反正你别笑我。唉，上不了阵的老马，听见金鼓响，也要扬起脖子吭儿吭儿地嘶叫几声呢！”

这不是，一想到老战友郑狩天，这泪河又开闸了？

他从装“炮弹”的左上方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那枚银元。

银元色泽黯淡，中间穿了一个小洞。不是“袁大头”，不是鹰洋，也不是光洋，没有分量，圆洞处有个红色锈迹，这是早年混迹于黑市场上骗人的那种假银元。

这是老战友郑狩天留给他的惟一纪念物。不，它不同于任何烈士的遗物，它是一种精神，一种品格，一种传统。

血的教训是忘不掉的，不能把它带到棺材里去。军事学院不是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的场所吗？这教训，对他们来说，是永远有价值的，哪怕将来打原子战争！

那是什么地方？一片葱葱郁郁的松柏，一座出鞘的剑样的记功碑。啊，碾庄战役烈士陵园。青草黄了又青，青了又黄，他们静静地躺在这里 32 个年头了。时光，只有对死去的人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留在活人脑海中的影像永远是年轻的……

李辅乾叫司机停住了车子，他踏着青草没膝的小径，斜刺里向墓地走去。春花是茂盛的，陵园的杜鹃花仿佛开得更火爆。

春风浩荡，扫过柏树林，发出鸣奏哀乐般的震响，不，那好像 32 年前李辅乾带头鸣枪志哀的余音残响，仍在这块大地上空回荡！

这是当年才有一尺高的小柏树吗？是的，没有错，李辅乾在柏树前头埋过一截不高的花岗石墓碑，战事匆忙，他来不及找石匠，就用刺刀在花岗石光面上鏊了一个“陕”字以为标志。后来，全国解放后，当地政府在每一座坟头上都重新竖起光滑的黑大理石墓碑，然而“陕”字碑仍然在原处没动。

陕，是刘陕的名字缩写。他是个活泼得像云雀一样的女孩子，她的人生全部征程只有 17 个春秋。

听，是什么鸟在鸣啭？百灵呢还是画眉？那委婉动人的歌喉多像刘陕啊！她出生在陕北，是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小鬼，人生的大门刚刚在她面前敞开，她就倒下去了，倒在国民党第 7 兵团的弹雨下。

不，应当更正一下，是自己把她送到敌人枪弹下的。多年来李辅乾一想到功垂青史的碾庄战役，总感到压抑，这是他从来不愿居功的真正原因。

他南征北战，打过好多值得炫耀的漂亮仗，也打过许多并不丢人的败仗。惟有这一次，他感到是打了一次良心受到鞭笞的大

胜仗。

你看，青草萋萋、野花簇簇的一排排坟头，横成岭、侧成峰，像是在这位老将面前排列的井然有序的战阵。幻觉吗？一个个精壮的小伙子不是跃起来了么？一排排闪亮的刺刀不是插到刺刀座上了么？

“个人英雄主义，有时候和‘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军阀主义是同一概念！”

这呐喊像雷鸣，像炮击，震得李辅乾头昏眼花。

他在树涛滚滚的陵园前垂下头，泪水模糊了视线。

他的内心在嘶叫：“你是对的，你骂得解渴呀，郑狩天！”

可惜郑狩天的墓地留在金达莱盛开的异国，他是否能听得见老战友内心的声音呢？

自愧并不能使这位老将军心安。讲出去，让所有带兵的人记住血的教训，那也许是李辅乾真正应当传世的。

“眼泪炮弹”和“算卦的将军”

绿篷车停在黄灿灿的油菜花的海洋里。李辅乾愣在陵园里两眼发直。

金晃晃的菜花褪去了颜色，变成了白花花的雪，那是1948年底第一次降落到苏北平原的雪呀。

天冷得出奇，可是士气却高昂得很。从11月6日起，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从海州运河间迅速聚拢，另一支主力部队通过临沂、枣庄、台儿庄南下，穿过起义部队何基沣、张克侠部贾汪防线，切断了第7兵团与“徐州剿总”的联系。早在12日，李辅乾的独立师就协同友邻部队一举歼灭了由运河车站西窜的国民党63军两个师，已经彻底把黄伯韬兵团四个军围困在碾庄地区，只待野战军司令部一声令下聚而歼之了。

李辅乾从前线指挥部回来，很恼火，敌人突围的主要方向是运河大桥，而那里的攻坚任务交给了别的纵队。

“娘的，号称死打硬拼第一军的独立师拣了块肉蛋啃！”李辅乾在指挥所里喝了一口凉水，发着牢骚。

参谋长郑狩天只是文静地一笑，说：“肉蛋也不一定好啃，若是蒸不熟、煮不烂的大板筋呢？我看，咱们还是先侦察一下再说。”

李辅乾说：“侦察个屁！‘野司’说，守卫那里的只有 44 军两个团。”

郑狩天说：“一纵的侦察大队方才通知咱们，说黄伯韬的布防、番号一日三变， he 现在是惊弓之鸟！”

“好吧，”李辅乾妥协了，“你去侦察吧。”

说实在的，李辅乾不怎么喜欢他的参谋长，好咬文嚼字，喜欢讲兵法、战术。“屁战术！”两军相逢勇者胜，他只相信这一条。有一次动员攻打临沂时，李辅乾在誓师大会上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有不怕死的劲头，一定能拿下临沂来！”

但郑狩天就不同意他这种动员，认为太片面。

可是，独立师是屡战屡捷，所向披靡，李辅乾每次战斗结束提起酒壶时总是嘲笑郑狩天“打仗不是在纸上写字儿、描花，哈哈哈哈哈。”

“野司”首长把他们搭配到一起，本来是有一番匠心的，一个虎将，一个儒将，要他们兼采彼此的长处。

郑狩天是读书的出身，30 年代初，在法国勤工俭学过两年，后来旅法支部把他保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乌鲁木齐回国，到了陕北前线。

郑狩天确有咬文嚼字的癖好，他有个改名癖，他周围的人，凡是男人名字沾有福禄财富的，女人名字沾有兰芳香玉的，他都

想尽办法劝你改掉。有些人固执，不愿抛弃爹娘给起的大号，他就动员人家用谐音字解决。譬如他自己，原叫郑守田，是私塾馆先生为他起的，无非是希望他守家在地，当个乡间首富，他感到俗不可耐，在里昂中法大学求学时，便改成了郑狩天，音相近，意思却大不一样。巡狩长天的雄心取代盯住家门前的两亩二分地，其实是反映了游子的大志。他是在1942年整风时和李辅乾认识的，那时他写在笔记本封皮上是歪歪扭扭的另外三个字：李福千。郑狩天拿过笔给他改成了现在这三个字。李辅乾老大不高兴，问他：“什么讲究？”郑狩天说：“福禄财气，都是封建玩意儿。辅佐无产阶级天下，不是你的志向吗？乾是乾坤的乾，代表天呀！”

李辅乾摸摸光葫芦脑袋，乐了，从此沿用。

作计划、写报告，李辅乾向来都把郑狩天推到前面去，惟有枪炮一响，他是必定要大权独揽。他对郑狩天的谨慎、周密的思考，总有点偏见，多少怀疑知识分子胆子小。在他看来，打仗嘛，就得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豁出命拼，就能打胜。

但他们从没翻过脸，合作得还算默契。遇到李辅乾脾气上来，郑狩天从来不在气头上同他顶撞，而是事后在他消气的时候，用软刀子征服他。

但是，攻打碾庄前夕，他们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了。奇怪，这个文质彬彬的家伙这回一点都不让步！

决战前夜，李辅乾关心的只有炮弹，一天之内给“野司”首长挂了十几次电话，口口声声要炮弹。炮弹运上来，他亲自带着师直机关的人去扛卸。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发起总攻不靠炮弹轰平碾庄外围的鹿砦和暗堡能扫平道路吗？

可是，郑狩天却带着侦察营长吴杰找来了。

李辅乾说：“你来得正好，卸炮弹！咱们的山炮、榴弹炮好几年没吃饱肚子了，这回来个大会餐！”

郑狩天说：“我看省下点炮弹，将来留着轰击长江对面的天险要塞更好。”

李辅乾眨眨眼，摸摸光脑壳，问道：“你这秀才又想出什么花花点子了？”

郑狩天说：“我想搞一次化装侦察，我亲自到碾庄里去探虚实。”

“探个球！”李辅乾说，“碾庄总共屁股那么大块地方，你闭着眼睛发炮，也能炸死他一大堆人。”

郑狩天说：“疯狗咬人更厉害，侦察一下，总比盲人骑瞎马乱撞强些。”

李辅乾妥协了，说：“你不怕脱裤子放屁费二遍事，就侦察好了。可你不能去。黄伯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防得很严的。”

郑狩天说：“这不用担心。方才捉到一个去碾庄的商人，是钻进去接应私盐巨款的。⁴⁴ 军军长是刘峙的小舅子，他们合伙贩私盐，弄不好会赔得底朝天，这个商人是刘峙亲自从徐州打发出来的，我可以冒他的名义进卡子，他有‘徐州剿总’的特别通行证。”

李辅乾只好同意，但他却不对这次侦察抱有什么希望，“野司”情报部昨天晚上刚刚转来敌人布防情报，会一夜之间就变吗？除非敌人是孙猴子！

事实上，黄伯韬的招数不比孙猴子差！他率 10 万之众，原来是按刘峙的命令全力向西突围，企图与徐州东进的援兵会合。现在他看会兵的希望很渺茫，就把 10 万大军密集紧缩在碾庄地区，缩成一个铁疙瘩，他所部全是精锐师团，料定解放军一口吞不下去，他是要采取固守待援的办法，背水一战。正因为他打定了这个主意，黄伯韬惟恐布防的虚实泄露出去，采用一日三变的办法，他部下的好多将领一时都猜不透他到底是想从哪个方向突

围，想要固守哪个方向。

半夜时分，化装成商人的郑狩天从碾庄回来了，他带回了令李辅乾大吃一惊的情报。

仅仅一个下午，黄伯韬就极为神速地重新部署了碾庄外围防线。原来李辅乾担当的突破口是视为肉蛋、软面团的，现在他不得不承认是个咬不动、吞不下的铁疙瘩了。黄伯韬调集了4个半师的兵力据守在那里，还配备了一个山炮团，开阔地到处埋上了磁性地雷。

李辅乾在司令部房子里走来走去，眉头皱成个大疙瘩，连声叫“好”。

郑狩天懂得他为什么反倒叫好。他是个喜欢打硬仗、啃硬骨头的人，在此之前他还一直对“野司”首长不满呢。

郑狩天喝着凉开水，说：“要不要马上向‘野司’报告？”

李辅乾吼道：“干吗？你又吃里扒外？实底漏出去，‘野司’再把咱调出去怎么办？”

郑狩天说：“这可不是藏小份子的事。我们的突破口，面临着4倍于我的强敌，打不好，那会影响战役全局的！”

李辅乾拍了拍光脑袋，说：“是啊，报告还是得报告的。不过，这块有肉的骨头是咱自个儿发现的，可不能让给别人。”

郑狩天一边摸出红蓝铅笔草拟电稿，一边说：“依我看，请求‘野司’再给咱们增加一个纵队，可能把握大些。”

李辅乾又吼了起来：“怎么？没上阵就手软了？在临沂城下，7倍的敌人，我不是一口吞了吗？4个半师吓人一跳，哼，我看那都是田里的稻草人，吓唬胆小的家雀去吧！你写上，我们独立师包了！”

郑狩天刚刚发过电报不到30分钟，就接到了“野司”回电。“野司”分析，他们的防地可能被敌人选为最后突围的口子，担子太重，想调邻近的泰山纵队过来。

李辅乾顶住了，在电话机跟前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坚决不同意从别的口子往下撤部队。

李辅乾也不是白吃干饭的，他马上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说明了情况。没有什么讲价钱余地，不惜一切代价，在总攻发起一个小时后，突进去，独立师不能扯整个碾庄战役的后腿。

郑狩天在主持了作战会议以后，到下面转了转，回到指挥所，碰见刘陟坐在台阶上，拿腔拿调地练习苏北话。

这小姑娘今年才 17 岁，原来是“抗敌剧社”的小演员。淮海战役前夕，为了加强战地宣传，文工团的小鬼们纷纷下到各纵队、师团来。刘陟的爸爸从前一直在独立师当政委，攻打临沂时负了重伤，送回后方去了。她是在“光葫芦司令”李辅乾跟前长大的，对独立师有感情，就申请到这儿来了。

这个丫头身材不高，却很漂亮，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是滴溜儿乱转，讨人喜欢。她的手也挺巧，虽说发给她的军装也是又肥又大的“二尺半”，可她会重新翻改，军装经过她改制后，穿在她身上又合体又好看，再配上一条宽皮带，显得干净、利落。

难怪她是干文工团的，真是伶牙俐齿，模仿力惊人。她能纯熟地掌握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土语，好多人都误把她当做老乡呢。现在她又练起了苏北话，唱苏北民歌。她说，部队再往南打，她还要学浙江话、闽南话、广东客家话、江西老桩话……

这是刘陟的一大发明。每当战役开始，她就顺交通壕溜到最前沿去，扬起用马粪纸卷的喊话筒向敌人阵地喊话，唱土腔民歌小调。这当然得分清对象，对面若是桂系军队，她就唱广西小调，若是湖南兵居多，她就操湖南乡音、唱花鼓戏。这丫头容易动感情，又会编即兴的顺口溜，常常一边喊话一边自个儿流泪。你想，对方抛家舍业的国民党兵一听到乡音，能不思念梓里、想起父母妻子儿女吗？本来厌战的壮丁们真恨不得马上扔了枪回到故乡去与家人团聚，哪还有心思去打仗！

去年在一次战役中，刘陝用黄梅戏调唱了一曲自编的“盼儿归”奏了奇效！当天夜里，居然有半个连的皖南籍士兵集体哗变开了小差，跑到我们阵地这面来了。

为此，“野司”下了嘉奖令，给她记了一等功。首长说：“小刘陝是个创造哟，攻心战司令呢！唱得国民党兵浑身懈怠，没心思打仗，这比一百发炮弹都厉害，哈哈，眼泪炮弹！”

小刘陝可出了名，全军上下都叫她“眼泪炮弹”，是特种兵呢！

这会儿，她正在自己校正苏北泰州腔，突然见郑狩天走过来，就赶忙从台阶上站起来，伸手拦住他，挤眉弄眼地说：“师长不叫进去，连警卫员都赶出来了。”

郑狩天伸手抻了抻刘陝军帽底下伸出的小辫，笑问道：“这么机密？连我都挡驾？”

刘陝显然知道李辅乾在干什么，而且她是感到好笑的，扑哧一声，又赶紧用手捂住嘴，朝屋里指了指，轻声说：“你趴窗户看看……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呀！”

郑狩天一笑，果真走到窗户跟前去。这座房子从前是旧文庙，被战火毁了一角，临时修修当了师指挥所。那时的房子没有玻璃，清一色小方格木窗棂，毛头粗纸是从里面糊的。郑狩天跷起脚跟，伸出舌头舔破了窗纸向里一瞧，差点乐出声来！

你猜李辅乾在干什么？他手里拿着个竹筒子，里面不知放了什么，一摇哗啦啦响。他站在孔圣人残像前，样子很有几分虔诚，把竹筒在手里狠命地摇了几下，往神供桌上一倒，噢，原来是两枚铜板。

这不是在占卜算卦吗？

这哪像李辅乾干的事情？去年，有一个解放兵给家里捎了信，几个月没得到回音，心里放不下，背着人偷偷跑到城隍庙抽了个签，无非是问问吉凶。这事叫连里知道了，对他耐心说服

后，报告给了李辅乾。李辅乾把那个新兵叫到自己面前说：“你找城隍老问吉凶祸福？哼，还不如找我给你算一个马列主义卦！迷信，那是蠢人干的事，解放军不信这玩意儿。从前，我们家祖祖辈辈信神，什么神都信，可哪路神都不替咱办事，穷还是穷，受苦还是受苦，白吃咱供品、白享咱烟火！老弟，那神，也是嫌贫爱富，替国民党地主说话的！”

这才是李辅乾的态度呀！有谁能相信，他会关起门来自己占卦问卜呢？

窗里的李辅乾，卦像大概不太吉利，低低地骂了声：“准个球！”

窗外的郑狩天哈哈大笑起来：“又求神，又骂神，还能摇出好卦来？”

李辅乾噙噙地走近窗前，伸手拉开窗扇，自己也撑不住大笑：“来，老郑，你进来摇一卦。”

简直叫小刘陕笑掉了门牙！她以为参谋长会狠狠地奚落师长一通的，想不到，郑狩天整整军容风纪，拍拍手，一边往门里跨，一边说：“看我的运气怎么样？”

刘陕溜到门口，向屋里探头望着，撇撇小嘴：“看我不给你们告状，告‘野司’首长，刮你们鼻子，这一对老迷信头子！”

只见郑狩天煞有介事地洗了一把手，拿起竹筒摇了几下，哗啦一倒，两个铜子儿在供案上转了半天，才懒洋洋地躺下，冲上的一面都是字儿。

“嗨！臭手！”在他身后伸着脖子看的李辅乾说，“比我手还臭！”

郑狩天说：“难怪呀，神不买我的账，有前仇。我领导晋西北搞土改那年，一气砸了十多个神像呢！”

两个人面对面大笑起来。

一边笑，李辅乾一边说：“你是盲目问卦，你知道我问什

么吗？”

郑狩天说：“你心里没底，想图个吉利，是不是？”

李辅乾说：“图个球！神鬼都叫咱骂遍了，会帮共产党的忙吗？”

郑狩天当然不会误以为李辅乾唯心，自己不也有时候莫名其妙吗？记得那年夜里过冀中封锁线，上路前本来是在屋子里踱步的，踱着踱着，不知怎么就数起数来，而且在心里临时规定了一个标准，数到门槛如果恰恰是双数，就证明这次闯关顺利；是单数，说明此行凶多吉少……结果恰恰是单数，他虽然心里一点都不信，可总是讨厌，似乎不如出个双数心里踏实。这件事后来他对军分区司令员讲起来，还传为笑料呢。

郑狩天明白，李辅乾也是出于战前这种自我安慰的心理，才搞了一次滑稽表演的。他说：“现用现交，神不会上当的。伙计，我有一个诱蛇出洞的办法，你还是请我这个散仙吧！”

门口的刘陝终于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

李辅乾捏起拳头，吓唬地说：“你要出去小广播，小心刮你鼻子！”

刘陝说：“我才不怕，我去告诉‘野司’首长！”

“来来，”李辅乾换了一张笑脸说，“童男童女洁净，刘陝，你来碰碰运气。”

刘陝嘻嘻笑着，走进屋子说：“我呀，准比你们灵！”

这小丫头完全出于淘气，也洗了洗手，走到供桌前。

哈，这一卦果真是两个铜子光面全冲上，大吉大利。

刘陝得胜似的笑了：“怎么样？”

“嗯，”李辅乾摸了一把光葫芦头脑壳，点着她的小翘鼻子说：“还是你和神有点面子啊！不过，这下子你怎么有脸到‘野司’告刁状去呢？”

刘陝这才知道上了当，撇起嘴说：“李叔叔真坏，真坏！”

几个人又哈哈地笑了起来。

其实，笑，有时也是掩饰焦灼心情的一种手段啊！刘陝悄悄退了出去。

她了解这两个人，他们又该各自按照自己的习惯表演了。

是的，他们是性情完全不同的人，刘陝和几个小警卫员一起嘀咕过，互相询问，到底是师长好些，还是参谋长好些？意见始终难以统一。

刘陝可不太喜欢光葫芦头师长。

一打起仗来，他就像个浑身插满了药捻子的火药桶，一不小心就能点着他的火，脾气大得出奇。从枪声一响，他就像头疯狮子，这儿走、那儿串，钻交通壕、爬前沿，弄得小警卫员看不住，还得挨“野司”首长的批。李辅乾还有一个怪毛病，打起仗来不吃也不喝，平时头一挨枕头就打呼噜，大炮一响仿佛把他身上的瞌睡虫都震跑了，他能一连几天几夜不合眼！唉，等到战斗胜利，他咧嘴一乐，该吵着“拿饭来，要五大海碗”了，可每次都是等不到饭来就当场晕倒，非用担架抬下去不可。他这毛病没人治得了，所以他的警卫员总是一任接一任地传下个奇怪的道具：用绑腿扎成的一副担架，回回用得上的。

郑狩天就有点诸葛亮唱空城计的本事。枪声响它的，照吃照喝，甚至连下围棋都不耽误。去年打临沂时，打到第二天，主阵地拿不下来，李辅乾急红了眼，回到指挥所一发现郑狩天正和一个作战参谋在悠然自得地下围棋，气得他火冒三丈，吼了声“下个球！”哗啦一声，把围棋子掀了个天女散花。郑狩天也不生气，还嘿嘿乐呢。难怪他不急，他早派人在通往敌人主阵地群堡的开阔地上挖了两条暗道，这时用上了，一连运动上去五个爆破组，一下子解决了拦路虎。

事后李辅乾弯腰撅腚，在桌子底下各处钻，给郑狩天往回捡围棋子儿，到底少了两颗白子儿，他说：“掉老鼠洞里去了，等

临沂解放了，我给你买一盘围棋。”

那么个大师长钻桌子，这可叫小刘陝大为见笑的。所以印象特别深。

不过，临沂解放了，李辅乾可没有履行诺言。郑狩天下的围棋，仍然用两颗白纽扣代替着。她几次打抱不平，李辅乾总是说：“先欠着。人不死账不烂，打下徐州买，徐州买不成，打下南京买嘛……”

徐州、南京、广州，一个又一个军事重镇被将军的脚步征服了。1950年秋天，在南京养伤的李辅乾真的买到了一盘质地上的好的围棋。当他捧着盒子赶到他所在的部队去时，营房已经空了，郑狩天没有来得及向他去辞行，就带着队伍连夜北上，去扑灭烧到鸭绿江上的战火了。

现在，这盒永远交不出去的围棋，连同那块生锈的假银元，一直保存在李辅乾手中，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天真蓝啊，像水洗过一般清静，李辅乾站在青草萋萋的刘陝坟前，好像听到一个清脆的女孩子在喊：“耍赖！李叔叔耍赖了！为什么不给郑叔叔买围棋呀？”

李辅乾的眼角又挂上了泪珠。他忽然觉得，他也欠着刘陝什么。那当然不是一盒围棋了，是什么呢？啊！也许是一座金山都买不到的青春……

李辅乾默默地坐到了刘陝的坟头，两眼发直，一把一把地拔着墓前的青草，他觉得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宛如是昨天的事情，真的，昨天……

别人种树我摘桃？不干！

怎么不是昨天呢？

初冬的苏北大地结着薄薄的霜花，天阴着，没有月亮，也没

有星星，可是工事上方照耀如同白昼，此起彼落的照明弹，曳光弹拖着美丽的尾巴，不时地划过夜空。

冰冷的、潮湿的前沿阵地交通壕里，李辅乾和刘陟趴在那里，观察着一片死寂的敌人阵地。这里是一片开阔地，割倒了的晚稻留着寸把高的茬子，连一个可以隐蔽的坟包都没有，虽然这段距离只有 300 米，通过它的实际难度却远远超过了数字本身。

“你害怕吗？”李辅乾突然问了刘陟一句。

刘陟那双好看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着，她说：“你又忘了，再有一个月，人家就 18 了！”

李辅乾爱抚地笑了。是啊，从前在家乡，女孩子到 16 岁就该出嫁了，18 都有些嫌大了呢！如果不是处在枪林弹雨的年月，她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说不定早当了孩子的妈妈。

李辅乾拔一根干硬的茅草茎咬在嘴里问：“打完仗，你想干什么？”

刘陟说：“我什么都想干，就是有点挑花眼了，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她一边细声细气地说，还一边悄悄地笑。

是啊，离天亮不远了，刘陟是黑夜里栖在林中的小鸟儿，天一亮就要迎着朝霞飞了！那天地该多么广阔！上大学？当拖拉机手？当女医生？反正，她们这一代人不会像老一辈人那样，一生下来就打上奴隶的印记了。

想到这儿，李辅乾扭头对刘陟说：“等咱无产阶级坐了天下，我来给你安排职业，建一个儿童剧院，我看你演儿童剧最像，唧唧喳喳的。”

刘陟说：“那，我老了呢？等脸像核桃皮似的，还能演儿童戏吗？”

“这可没想到。”李辅乾被难住了，“总不能再建一座老头老婆子剧院啊……”

这一老一小都忍不住低声笑了。

多亲切的笑语！啊，这是昨天的对话吗？今天与昨天的间距太大了，整整 32 个年头。

如果刘陝活着，她早已经是鬓发染霜的半老太婆了！啊，可笑！怎么也想像不出刘陝会同老太太的形象联系起来，她永远是一个活泼的小女孩！

啊，如果她活着，她见了自己会说些什么呢？怕首先要嘲笑自己在文庙里摇卦的事吧？

春风摇撼着陵园里的树木，叶子簌簌作响，像是她那绵长的絮语，又像刘陝抿着小嘴发出哧哧的笑声。啊，一切都恍如在前天。

她怎么会死呢？

当然，战争中倒下一个人那是极其简单的事，可刘陝的死不同。多少年来，刘陝那双亮闪闪的眼睛总在夜暗中出现，她好像用不能原谅的神情盯视着他。

是的，李辅乾是内疚的，同时又是崇敬她的。她作为郑狩天的特使，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替李辅乾纠正了一场即将铸成的大错。她的死，换来了成百上千个战士的生存……

一个霹雳般的声音炸响了：“不，是你的个人英雄主义，葬送了她的生命！”

这是谁的声音？啊，郑狩天的。

烈士陵园像方才一样安静，只有一对对白的、黄的蝴蝶在花草上方飞来飞去。

李辅乾觉得郑狩天骂得痛快。

他今天答应到军事学院去讲点什么，也许就是去卸掉压在心头 30 余年的重载。失败，难道不也是一种经验吗？

那双可怕的眼睛！被火焰烧得通红，两手抖动着，浑身沾满了泥垢，衣摆被弹片撕得一条一条的，左胳膊流着血，他，就这么站到了自己面前！

啊，郑狩天……

一切都好像是昨天！昨天的事情，今天无论如何不会忘得一千二净的。

总攻的命令下达了，激动人心的淮海大战的序幕拉开了！

对于李辅乾来说，只有三个字：冲上去！

炮火淹没了一切！在这方圆十几里的地方，敌我双方集中了三十几万人马决战，那是人类战史上都不多见的壮烈场面。落地的炮弹像铺天盖地的冰雹，大地都被重新犁了一遍！

号称“钢铁第一团”的主力团冲上去了！仅仅半个小时，反复冲锋几次，都被敌人强大的火力网压下来。

李辅乾带着师预备队冲上来了，一直运动到交通壕最前沿，那里有个前沿指挥所，郑狩天带着几个参谋守在电话机旁。

见他到来，郑狩天说：“敌人火力很猛，正面突进损失太大……”

李辅乾根本没听进去。他在侧着耳听左右两翼友邻纵队的炮声：“你听，左边聂老虎上去了！右边的老秦也攻上去了，炮火延伸了！”

郑狩天会听不出来吗？他们都有这个本事，像一个乐团指挥可以准确地指出哪个小提琴手走了弦、差半个音阶一样，他们也能够从枪炮声中断定敌人是主力还是散兵游勇，是固守还是仓皇迎击……

郑狩天仍然坚持己见：“我们应当采用第二套方案！”

“第二套方案？”李辅乾火了，“在我们独立师的字典里，没有第二套方案。我是保留了意见的，我从来没有同意！”

为什么他对第二方案这么反感呢？

原来昨天的师党委会上，郑狩天首先提到了第二方案。他说：“万一我们的突破口遇到了劲敌，我们就转由友邻部队的突破口跟上去。”

绝大多数党委委员都赞成。李辅乾认为这是“没出息”的方案，只是他过于自信，认为他的队伍无论如何，不会惨到起用第二方案的地步，所以才没有坚决反对，只是冷笑了一声，说：“这倒自在。别人种树我摘桃，别人吃面我喝汤！亏你们想得出来。好吧，只要你们没有打不赢竖白旗的第三套方案，我就不说什么了。我可是保留意见的。”

才较量一个回合，就要用第二方案？呸！李辅乾一阵阵无名火往上冲，他甚至怀疑，郑狩天压根就没有信心，他的第二方案说不定就是没敢打出来的第一套方案呢！

因此，李辅乾说：“见硬就回避？”

郑狩天说：“这样正面冲击，伤亡太大，‘野司’命令我们随时可以走泰山纵队的突破口。方才我到临时包扎所去了一下……”

“见不得血了？”李辅乾红着眼睛说，“你不是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吗？你别给我破气了，快，组织第二次冲锋，把总预备队拉上去。”

战士们打得够英勇的了，可是第二次冲锋又被压下来了。

李辅乾突然吼了一声：“组织敢死队，跟我上！”

说着他把肩上的棉大衣一甩，从警卫员手中夺过一支卡宾枪，咔嚓一声上了弹匣。

战士们纷纷挤过来，都红了眼，争相报名当敢死队。

郑狩天把李辅乾悄悄拉到一旁，说：“老毛病又犯了？你把自己降为战士了？”

这句话起了点作用。那年涟水战役时，因为李辅乾亲自带兵冲上去，被“野司”首长批了个鼻青脸肿：“你多英雄！要不要给你发一枚奖章啊？孤胆英雄？你丢下万把人不管，自己打头阵，你这是对人民的犯罪！”

事后，他到底递了个检讨书才算了结。

其实，他这种冲动不完全由于性格，他是尝到了甜头。从他当营长、团长时就常这么干，每当攻不上去，他只要挺身站出来，拉上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敢死队上去，攻无不克。他有他的道理：有不怕死的将，才有不怕死的兵。

但他这次多少有点顾虑，被郑狩天吓住了。

经过一阵争论，李辅乾坚持重新组织进攻，他是师长，指挥权在他手里，郑狩天只得服从。

这时，意外情况发生了。被指定组织第三次冲锋的二团指挥所中了一颗炮弹，团长、副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只剩下团参谋长，还是重伤。

在这种情况下，郑狩天说：“我去带二团。”

李辅乾的眉头舒展开了，他有点顾虑，但还是同意了：“你去吧。万一‘野司’首长怪罪下来，咱们俩各挨50大板。”

郑狩天说：“这是意外情况，不会挨批的。不过，我请你再考虑一下第二套方案……”

李辅乾肚子里老大不高兴，他哼了一声，心想，没上阵就拉松套，能打得猛吗？他想了想，说：“我可是要听你攻上去的消息的，不准备再听你回来劝我实行第二套方案！”

郑狩天似乎有话要说，情况紧急，他终于没有说出来，给李辅乾敬了个军礼，走了。

李辅乾放下心来，用不着守在前沿阵地了，就同师指挥所的一群小家伙们回到了后面。

刚跨进指挥所，刘陕迎上来：“‘野司’首长来了几次电话找你。”

李辅乾摇了摇电话，挂通了，还没等他张口说话，“野司”司令员那温和而严厉的声音响了：“李辅乾吗？又坐不住板凳了是不是？我们知道，你们碰到了一块硬骨头，硬啃下去会崩了牙齿的。只留下少量队伍在阵地前虚晃一枪，攻不进去没关系。你

的左面，聂老虎已经杀出一条血路，你马上从聂老虎的突破口上去……”

李辅乾感到像挨了一记耳光那么难受，脸上热辣辣的，他对着话筒说：“再给我们 20 分钟！不管骨头多硬，我们都要啃下来！”

“不要瘦驴拉硬屎嘛，”对方在批评他了，“战争嘛，消灭敌人是为了保存自己，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李辅乾放下电话，愣了半晌。

突然他拍了一下桌子，吼道：“叫我李辅乾走别人的突破口，这是我们独立师干的事吗？”

心跳、耳热！

这话好像自己刚刚喊出口一样，唉，当时怎么就喊得出来呢？如果是当着“野司”首长喊的，他们也许会及时制止他的蛮干，可是，那错误到底铸成了，是用鲜血铸成的！

操着生死的将军

他只能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他一看见饭菜就恶心。为了劝他吃口饭，刘陝都掉眼泪了，仍然没有用。

时间一秒一分地艰难走过去，每一秒钟，都像从他心上碾轧过去似的。他每隔一分钟都要打电话，问问队伍打开突破口没有，回答是令他厌恶的千篇一律的：“正在猛攻。”

司令部门外为什么吵吵嚷嚷？啊，有一伙从敌占区逃出来的难民拥挤在小村庄街头上。

李辅乾关严了窗子。若在平时，他早去慰问受苦的百姓了。

刘陝蹑手蹑脚地走进屋来。

李辅乾从座位上弹起来，问道：“有消息了吗？”

刘陔忽闪着大眼睛，摇摇头，说：“有一个老百姓，要见你。”

“不见！”李辅乾烦躁地一挥手，想想不妥，改口说，“你去和后勤部的人说说，有事叫他们办。”

“我说了。”刘陔说，“她指名道姓，非要见你不行，她说，她快死了……”

李辅乾从桌上抓起军帽戴上，对刘陔说：“带我去！”

要找李辅乾的是个刚过 30 岁的女人，脸色蜡黄，骨瘦如柴，躺在一户人家的柴棚下，有几个衣衫褴褛的难民正喂她水喝。

刘陔指指这病弱的女人对李辅乾说：“师长，就是这位大嫂找你。”

扶着那女人头的是个没牙的老太婆，头上罩着一块破了洞的土蓝布帕子。她对李辅乾说：“您姓李吗？她口口声声要找姓李的、姓郑的，您跟她说几句话吧……”一边说，老太太一边抹眼泪。

李辅乾略弯下腰细打量一下那女人，忍不住叫出声来：“是你？邱凤？”

那女人睁开了眼睛，发散的目光渐渐对准了焦点，她认出了李辅乾，她想挣扎着坐起来，没有办到。她勉强笑了笑，伸出枯树枝一般的手，在大襟底下哆哆嗦嗦地掏了半天，掏出一个破旧的红布包，递给李辅乾。

李辅乾把红布包接过来，打开，是光闪闪的 20 块银元。

这时，邱凤颤抖地说话了：“……叫我好找……总算找到了……这钱，还给队伍……”

李辅乾回身对刘陔说：“去叫军医，医助也行。”

刘陔跑步去了。

邱凤疲倦地笑笑，声音很微弱地说：“不用……叫医生了……我……没有病……”

头盖蓝帕子的老太婆说：“她，是饿的呀……”

李辅乾一边叫贴身警卫员到大伙房去拿饭，一边流着泪对邱凤说：“这 20 块大洋算什么呢，你还专程送来！其实，你当年贴补伤员的花销，200 块也不止啊！”

李辅乾叫人把邱凤抬到师指挥所的后屋，放到床上。

刘陕带着医生来了。医生给她检查了一下，把李辅乾叫到一旁说：“其实，没有什么病，她是饿的。”

李辅乾一边催伙房火速做饭来，一边埋怨邱凤说：“你这么死心眼儿！身上揣着 20 块银元，却饿成这个样子！你好好将养一下，郑狩天在前方，等攻下碾庄，我叫他来看你。”

邱凤说：“你……以为我是来找他的吗？”说到这里，她眼圈一红，塌陷的眼眶里噙满泪水。

李辅乾问道：“郑大妈好吗？”

邱凤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她说：“她老人家饿死了。临咽气前把这个红包塞到我手里，叫我不管怎么苦，一定要找到你们，她说，队伍上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打老蒋用得着啊，咱不能抢队伍上的一口饭吃……”

李辅乾心里很难过，放在桌子上的那个红布包刺痛着他的眼睛。

邱凤是郑狩天的妻子，郑大妈是他娘，娘俩一直在凤阳农村苦巴苦曳地过日子。

那还是 1940 年的事。当时李辅乾在新四军江北支队当营长，受了伤，他和另外两个伤员被地方上送到堡垒户郑大妈家。那时李辅乾还不认识郑狩天，只听交通员告诉他，说这老太太家万分保险，她儿子也在陕北干红军。

这娘俩对伤员真是没比的。凤阳是个穷地方，淮河年年闹灾，遇上灾荒年头颗粒不收，凤阳人年年拄起讨饭棍，打着双条鼓去讨饭，郑大妈没让伤员挨一顿饿，她和儿媳天天轮换着出去

讨饭，讨来吃的做成杂烩汤，下点野菜，给李辅乾他们吃。这事他们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有一次老太太讨饭被地主家的狼狗咬伤，他们才真相大白。在他们伤愈归队时，来接他们的同志身上带着一点当盘缠用的银元，李辅乾以个人名义打了张借条，借出20块银元，交给了郑大妈。

郑大妈死活不肯要，她说：“队伍上这么艰难，我能夺你们饭碗子？再说，你们路途那么远，穷家富路，身上一个子儿没有还行？”

李辅乾说：“老天饿不死瞎眼雀，何况我们几个大活人呢！”

这样争来争去，没个了结，直到最后李辅乾说：“算是借给您的，总行了吧？将来您手头富裕了，再还给部队。”

这样，郑大妈才算勉强收下。

在李辅乾想来，所谓“借”，只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回到队伍上，他勒紧裤带，仅用半年的军饷就把20块银元的账还齐了。

又有谁能想到，郑大妈宁可自己饿死，不肯动用一块预备还账的银元呢？

李辅乾想起了告别郑大妈的情景。她非要让李辅乾给儿子捎个口信去，在老太太看来，凡是当人民子弟兵的，总能见到，她说：“山不转水转，一个队伍还能不碰头？”

李辅乾明明知道这种口信儿可能永远捎不到，可他不忍心伤害老太太，就痛痛快快地应诺下来。

郑大妈没有告诫儿子努力杀敌立功，没有叫他放心家里老小，却意外地嘱托了这样一番话：“上次他捎信来，听说他带兵了。哪个兵都是人家父母的心头肉，为了打老蒋解放天下受苦人，才舍出孩子上前方的，哪个当父母的不是醒时梦里惦记着孩子呀！为革命死是值得的，可带兵的人得爱护他们，一个令发错了，就能叫多少人送命啊，自古以来带兵不易。将对兵，得有父

母心肠啊！”

这是一个母亲、一个长者的教诲，当时李辅乾很感动，却并没有引起内心的震动。孩子上路，母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无非是叫孩子知冷知热自己保重，李辅乾把郑大妈的这番话也当做婆婆妈妈的嘱咐对待了。

几年以后，李辅乾见到了郑狩天，谈起这桩事，他已经忘掉了郑大妈的原话，只是笼统地告诉郑狩天：“带兵不简单，你母亲希望你好好干。”

李辅乾倒不是有意抽掉郑大妈谈话的精髓，他实在是没有细品味老太太的言词中还有什么值得一个指挥员深思的内涵。

如今，老太太已经离开了人世，宁肯饿死，却不肯动用那20块银元，这是怎样的母亲啊！

伙房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面片汤，李辅乾叫刘陝喂邱凤，正待转身，小警卫员走进来，敬了个军礼，低声说：“师长，参谋长回来了。”

李辅乾只觉得头轰地一声，眼前一阵发黑，不祥的预感袭击着他。他勉强沉下心问道：“他在哪儿？”

警卫员说：“在参谋室等你呢。”

李辅乾大步走出去。

参谋室在东厢，从前是文庙的东配殿，几百年来一直是村里设塾的学堂，门前有一片苦竹，长得很茂盛。

李辅乾推开门扇，一眼就看见了郑狩天。他完全不是平时那种英姿潇洒的气度，衣衫被弹皮扯成条条，头上缠着绷带，看样子左胳膊也受了伤，卫生员正在给他包扎，两个警卫员在给他准备洗脸水、更换的军服。

李辅乾的头涨得有笆斗大，耳朵嗡嗡直叫，心头一股无名火正在往起蹿……他强忍着怒气，在屋里踱着步子，一句话没有说。

郑狩天默默地望着师长，也没有说什么。

看着卫生员替郑狩天吊好了胳膊，李辅乾低沉而严厉地说：“你们，都出去！”

几个小战士望望师长阴沉的脸，又互相看了看，提起卫生箱，端起洗脸盆，一个个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把房门紧紧掩严了。

李辅乾迈着虎步，在东配屋里噤噤地走了几圈，突然站定在郑狩天面前，粗鲁地问道：“你打败了，没有冲进去，是不是？”

郑狩天望了他好一会儿，才点点头：“是的。”

李辅乾的嗓门一下子提高了八度：“你把二团的元气伤了，损失惨重，是不是？”

郑狩天说：“比你估计的要严重得多！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二团和总预备队的全部指战员！”

说到这里，郑狩天的眼泪簌簌流下来，流过沾满硝烟泥土的面颊。

李辅乾吓了一跳，踉跄地后退一步，他有点不信！几百个人的队伍上去，只剩他一个人回来？啊，他不会撒谎的，你看他那痛苦的表情！

李辅乾的心都快要爆炸了，他走上去，劈手抓住郑狩天的衣襟，声音发颤地吼了起来：“你再说一遍！什么？你把战士都给我丢到国民党的炮口下了？就你一个光杆司令跑回来了？”

郑狩天一动没动，点了点头。

李辅乾手一松，自己跌坐到地上，费了好大力气才爬起来，他暴怒得像一头狮子：“你还有脸回来吗？你算什么指挥员？战斗没有打响，你就鼓吹什么第二套方案，难怪你不肯卖力地往上冲，事情都坏在你手里了！你有罪，你知道吗？你葬送了战士们的生命，你应当受军法制裁，应当枪毙你！”

李辅乾喊着、喊着，眼泪也哗哗流下了面颊。

郑狩天冷静地说：“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枪毙了我，能使我们今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死也瞑目！只是，我觉得，我的错误不在于什么第二套方案，而是向你的盲目拼消耗和个人英雄主义妥协了，斗争得不力。”

“你说什么？”李辅乾更火了，“你打了败仗，你葬送了这么多人，你还找客观？好！你等着，我马上组织第四次冲锋，你看我是怎样冲上去的！”

李辅乾刷地从腰间拔出驳壳枪，张开大机头，飞起脚踢开门，吼了一声：“警卫员！”

四五个警卫员，还有刘陟，其实早都在东厢房墙跟底下悄悄听声呢，听见师长吼叫，立刻绕过竹丛跑到门口来，站成一排。

李辅乾简短地命令道：“把参谋长禁闭起来，等我回来请示‘野司’后处置。马上通知师直机关紧急集合，除伙房和电话班的人而外，一律随我上前沿阵地！”

几个警卫员同声喊了一声“是”，却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动作。

“执行命令！”李辅乾道，“愣着干什么？”

这时刘陟从苦竹丛后钻出来，双手抱住李辅乾的胳膊说：“郑叔叔是对的，不要关他禁闭，我求情还不行吗？”

几个小警卫员趁势上来，七嘴八舌替参谋长求情。

李辅乾甩脱他们，问道：“你们干什么？你们还像个革命战士吗？”

警卫员们退后几步，只得分头去下达命令。

“慢！”这时郑狩天忍着伤痛跨出屋门，说：“这样的大事情，要经过师党委研究，要请示‘野司’同意才行，你一个人没有权利专断！”

“我是独立师师长！”李辅乾说，“我会懂得对党对人民负责。在这万分紧急关头，我有权决定打不打、怎样打。难道打进碾

庄，这不是‘野司’的死命令吗？我没有那么厚的脸皮，向首长请示拉松套！不惜一切代价，突进封锁线，这就是我的职责！我相信我的战士，为了夺取胜利，他们不怕流血牺牲！”

“正因为我们有这样好的战士，”郑狩天也急了，“我们才更应该爱护他们，没有权利轻率地下令，没有理由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

“住口！”李辅乾说，“无谓的牺牲？你别跟我咬文嚼字了！革命别怕死，若怕死，就在家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发宣言、写文章，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不会跪在地上打白旗的！你有这种右倾思想、战争恐惧症，你当然要打败仗！我……甚至怀疑你，你一个人活下来，你是不光彩地活下来的！”

郑狩天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血一下子涌到脸上，连脖颈都在发烧。他不便当着战士们的面再同师长争执下去，反身进门，说：“你一定要这样干，我先报告了‘野司’首长再说。”

他刚摇了一下电话，李辅乾跑了进来，劈手夺过话筒，啪地摔下：“你没有资格打这个电话！”

郑狩天又伸手去拿话筒：“我是独立师参谋长，我有权在没有被撤职前向上级反映情况；即使被撤了职，我还有权尽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

李辅乾驳不倒他，可是让师长平心静气地再思索一下，那也是绝不可能的了。拿不下突破口，那是耻辱，这种念头像火舌一样烧着他的心。他急着要去前沿阵地，又怕留下郑狩天同他捣乱，他只好再次狠心下令，命令战士把郑狩天禁闭起来，而且要监押在没有电话的房子里，不准任何人接近。

几个战士簇拥着郑狩天向外走。

郑狩天对李辅乾说：“同志，你是鬼迷心窍了！你想的只是个人出风头，不惜拿战士们的生命换得你个人的荣誉，这同旧军阀宣扬的‘一将成名万骨枯’，有什么两样吗？”

李辅乾如同挨了一鞭子，全身痉挛了一下，但马上怒不可遏了！李辅乾 15 岁参加革命，出生入死，为人民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连军委首长都知道有他这么一个孤胆英雄，怎么一下子同反动军阀拉扯到一起了？

李辅乾感到比吃一个枪子还难过，他真想上去打他两个耳光才解气。可是当着好多下级的面，他忍住了。他脸色铁青，只是冷笑了一声，大步跨出房门去。

刘陕迎了过去，哭着对李辅乾说：“让……郑叔叔见见婶婶吧……”

李辅乾的心毕竟是肉长的，何况他同郑猗天有过那么多年的战斗情谊，他忽然感到对老战友太过分了，尤其一想到已经不在人世的郑大妈，那慈祥的面容在眼前一闪，他就受不住了，就重重地叹了口气，算是默许。

未了的心愿

“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是郑猗天说过的话吗？是的。可李辅乾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可不是从他嘴里。啊，那是在抗大的时候，是朱老总讲过的。

用士兵的血染红肩章的底子，用士兵的白骨化成肩章的星星，这当然是指旧军阀。朱老总说过，今天我们从事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指挥员同战斗员是同志，是手足，是心连心的，可是军阀残余得肃清，要求我们的各级指挥员爱护人民的子弟兵，保护自己，才能打击敌人，这要求我们要提高战略战术水平，因为你的一个错误决定，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士兵白白流血……

为什么当时自己没有想到朱老总的这段话呢？就饭吃了吗？啊，后悔药是没处去买的。

不，当时即使有再多的人批他是“军阀主义”、“个人英雄主

义”，他都不会服气的，有些事情，也许要经过一辈子的思索，才能得出正确或近乎正确的答案。

哼，当时他怎么能服气呢？

我李辅乾沾有“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嫌疑？放狗屁！

哪次行军打仗，我李辅乾的肩膀上没扛着伤员的两三支步枪？哪次长途奔袭，我李辅乾骑过马？马是有的，不都是让给伤员的吗？在宿营地，亲手拿马尾线给战士挑脚上的泡，三更半夜去巡视营房，给战士一个个地盖严被子……

啊，当年在受到了郑狩天的激烈抨击，走出屋门时，他偷偷地流泪了，那是委屈的泪水！真的，他从来没感到这样委屈过，哼，他对战士所做的这一切，难道都是可以解释为“一将成名万骨枯”吗？

“是的，你给战士盖被子，把马匹让给伤员骑，你这是爱护，可是在你红了眼，眼看自己的名誉受到影响时，你却叫这些好同志去盲目送死，这比起盖被子来说，是不成比例的！”

这是事后郑狩天又一次刺痛他的话。

春风轻轻地拂过嫩绿的草地，烈士陵园里的青草滚过一排排草浪，露出一个个漫圆的坟头。

坐在刘陝坟头的李辅乾又流出了苦涩的泪。这泪水，同32年前的泪大不相同了，不是委屈，而是惭愧。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指挥，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头脑里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东西作怪，这些长眠地下的好同志，也许有很多很多的人今天还在为党工作，像自己一样……唔，刘陝呢，也许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工团员，不，早是哪个军区的文化部长了吧……

那块没有光泽的假银元又托到他的手掌里了。真是不可思议，一颗枪弹竟然没有穿透这个5毫米厚的铁板，仅仅钻了个小洞，弹头被夹住了。

“人做好事，命里注定要免灾的……”

这是那个头盖一块蓝帕子的乞丐老太婆说的话，当然是宿命论、唯心论的观点，可是在指挥部院里演出的那一幕戏，时过32年，李辅乾也无法忘怀呀！

当几个战士簇拥着郑狩天走向禁闭室时，突然有一声凄厉的喊叫传来，走在前面的李辅乾一愣，停步看时，只见一个老太婆蹒跚着脚步扑过来，拦腰抱住郑狩天，哭喊着跪下去，嘶哑着嗓子喊道：“天哪！可不能枪毙这个好人啊！要杀，就杀我这个没用的老太婆吧，我替他去死……”

老太婆松开郑狩天，跪着爬到李辅乾面前，抱住他的腿摇晃着：“千万别枪毙他呀，我求求您，我给您磕头……”一边嚷，一边真的趴下去接二连三地磕起响头来。

李辅乾气得浑身乱颤，这还了得？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敢来闹军营？更何况，李辅乾又何曾下过枪毙郑狩天的令呢？

李辅乾毕竟不能向这个老百姓发脾气。他正要叫人把老太婆弄走，他忽然认出来，这个讨饭的人，不就是救护过邱凤的那个讨饭婆吗？

奇怪！她怎么会认识参谋长郑狩天？又出于什么缘由替他来喊冤鸣不平？

在李辅乾沉默的当儿，老太婆从地上爬起来，重新走近郑狩天，伸出青筋裸露的手，替他整理零乱的衣衫，拍掉身上的尘土，轻轻抚抚他的伤口……她问郑狩天：“好人啊，你……还认得我这个穷婆子吗？”

“认得，”郑狩天勉强笑笑，说：“大娘，我没什么事。这是我们部队里的事，您不要再说些什么，谢谢您……”

老太太发现郑狩天左上衣口袋被子弹打破了一个洞，她大概担心他胸口还有伤，忙伸手扒开衣服，没有伤！

老太太大概觉得奇怪，伸手去掏参谋长的口袋，竟掏出一块假银元来。

人们都看见了，假银元被击穿了一个洞，一颗汤姆枪的铅弹头恰好夹在银元中间，成了强弩之末。

假如没有这块假银元，这颗子弹不就要钻进郑狩天的心脏吗？这真是奇迹，连参谋长自己都不知道，这块假银元救了他一命。

老太婆扬起了那块假银元，说：“看看吧，这叫好人得好报，枪子儿都长眼睛的……”

说起这块假银元的来历，只有参谋长和老太婆两个人知道。

原来，昨天郑狩天化装成盐商，拿着“徐州剿总”的特别通行证混入碾庄侦察时，无意中遇到了一桩事。

当时，郑狩天在“又一村”小酒馆里小坐，要了一碟五香花生米，一碟酱猪肚，一杯薄酒，一边吃喝，一边想着下一步侦察的主意。

忽然，他听到街上一片吵嚷声传过来。郑狩天撩起长袍走到廊下，看到一个国民党上司正在殴打一个拄着讨饭棍的老太婆。老太婆哭天喊地，骂着那个上司：“天杀的，昧了良心的杂种，欺侮我这个要饭的，你不得好死，上阵就得碰上枪子儿……”

被骂得恼羞成怒的国民党上司从腰间解下皮带，没头没脑地抽打着老太婆，骂着：“你这个老不死的杂种！老子不过是逗你玩儿的！谁稀罕要你那一块臭银元？是假的，那是你上了别人的当，想讹老子吗？瞎了你的狗眼！”

人越围越多，好多人敢怒不敢言，之后过来一队国民党宪兵队，那个上司才扬长而去。

老太婆从地上爬起来，手里托着一块银元，骂道：“天杀的，你不得好死！把我的真银元夺去，扔给我一块假的……”

这时，杂货店掌柜的走下台阶。他是个干瘦的小老头，戴一顶瓜皮帽，对围观的人们解释说：“这老太太够可怜的了，讨来点铜板不容易，她攒了半年，才攒成一百个钱，身上不好带，就

央求我给她换成一块银元。我答应了，当面点清，老太太自己又吹又转的试过了，银元是真的，我还能欺侮一个穷婆吗？那可要犯天条，遭雷劈的……谁知道怎么的，和那个丘八吵起来了……唉，这年头啊，兵祸比天灾怕人哪……

杂货铺掌柜的显然怕围观的人误解他欺骗老太太，见众人没有这个意思，才双手抄在袖筒里，摇头叹息着回到铺子里去了。

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述说开了。原来，她同店掌柜的换了那块银元以后，分外小心，夹在两个手指头中间反复吹了几次，再放到耳朵旁听听有没有嗡嗡的声音，用手掂了好几次，弹了好几回，确信是真货了，才笑吟吟地往外走。

她刚下了店铺台阶，正要把银元掖到怀里去，迎面走来那个国民党上司，笑嘻嘻地对老太太说：“小心上当。这年头，人心都坏透了，市面上假银元多得是。拿来我看看，我这眼力，鉴别银元真假，那是十拿九稳的。”还没等老太太婆反应过来，他早把银元夺到手中，用手指头弹了一下，捂到耳朵上一听，连声说：“咦？声不对啊，怎么像假货呢？”说着又弹了一下，按到另一个耳朵上听。

老太太说：“若真是假的，我可不依他……方才我试了，是真的呀，你再好好看看……”

“我还能骗你吗？”那个上司不知怎么一摆弄，像变魔术一样，把银元朝老太太手里一塞，说：“假的！不信你拿到银店去问问。太不像话了，你去找那个换给你的人！”

说罢，他转身就要溜走。

老太太觉得交还给她们的银元轻飘飘的，一点分量没有。她心里一惊，连忙细看，天哪，这哪是方才换到手的那一块呀？没有亮光，弹一下声儿也不对呀！她明白过来，那个该死的丘八昧良心使了个掉包计，骗走了她的真银元。

老太太扑过去扭住了那个上司：“还给我真银元！你这老总

黑了良心吗？欺我这么个穷婆子你不心亏吗？”

国民党上司矢口抵赖，先前骂她“不识抬举”，“不认真假人”，后来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被乞丐婆纠缠得没法脱身，便动起武来痛打了老太太一顿，一走了事。

人们只能同情她，有谁敢替老太太申张正义？又到哪里去找那个可恶的丘八算账？碾庄小小的地面，国民党兵简直多如牛毛。

人渐渐散去了，只剩下老太太伏在路旁哀哀哭着、骂着。

这时，郑狩天步出酒馆，来到老太太跟前，把她扶起来，替她掸掉身上的灰土，掰开她死死攥着的手，接过那块假银元，看了看，确是假货。他从自己大襟下的口袋里摸出一块锃亮的新银元，放到她手里，说：“老大娘，别难过，我换给您一块真银元。”

老太太止住哭，看看手里那块闪闪发光的银元，再望望郑狩天和气的面孔，突然双膝跪下，连续叩了几个头，说：“上天保佑！你真是个菩萨心肠的好人啊！我给你烧高香，愿你长寿，兵荒马乱年头，枪子儿都躲着你……”

这便是那块假银元的来历。

当然，假如李辅乾遇到这种情形，他也会毫不迟疑地像郑狩天那么做，甚至可能打那个上司一顿解解气。

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使乞丐婆这样的受苦人过上人的日子吗？让每个人生活得更美好，这是没有错的。为了这个目标，有多少志士不惜洒尽自己的鲜血，牺牲自己的幸福，去换得别人的幸福，长眠在眼前烈士陵园里的人，不都是这样的人吗？

董存瑞、黄继光，这是千百万革命烈士中闪光的典型，他们用自己的死，换得战斗的胜利，用自己的死，换得更多的人活下来，用自己的血，铺平胜利的道路！董存瑞在举起炸药包即将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一瞬间，不是喊出了激动人心的那一句吗：“为

了新中国，前进！”

忘我而高尚的呐喊！

这难道不是刘陝这些烈士们的呐喊吗？是的！这些好同志们，在当年淮海战场上饮弹牺牲之前，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指挥员，可能会保存下自己，同样取得胜利呢？

不，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在那样忘我的战斗中想过这个问题的，他们不愧为英雄！

然而，他们是死于李辅乾的不正确指挥，不，是死于他的个人英雄主义！

啊，太可怕了！然而这是事实，不管李辅乾愿意不愿意承认，这是不以他的感情为出发点的。

32 个年头过去了，他天天在同死去的烈士对话，这是别人听不见的。

他感到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多了，他有过一个私下的计划，从前就想付诸实施，那时没有时间。

现在离休了，他同一个老百姓一样自由，他只有两桩心事：第一桩，是把自己的教训传给未来的将军们，这个马上要实现了，他要军事学院的学员们牢牢地记在心底。

第二桩，他准备在这次讲课后付诸实施，他有过充分准备。

他手头有 3 万元的存款折子。

他的工资不低，但是一个人积攒起 3 万元的数目，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多年来，他粗茶淡饭，从来没摆过阔气，没有像别人那样保养过自己。他没有要过厨师，没有要过保姆，他大多数时间是拿上两个小铁盆到大灶食堂去打糙米饭，吃馒头。

他得罪了老婆、孩子。

老婆想买一身皮大衣，他都没有答应过。是不是太苛刻了一点呢？大概是吧？4 个孩子已经在骂他守财奴了。是呀，他们本来可以像别的将军子女一样，从老子那里分享到一点好处。他们

想要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可是老子回答他们说：“你们自己挣到钱再买吧，假如你们的老子是个农民呢？”

在机关里，他也是出了名的“葛朗台”，他从不占别人便宜，别人也别想占他便宜。有人嘲笑他准备把10元大票当纸铺满棺材底，他听见了只当没听见。

有谁能知道李辅乾打着什么主意呢？

多年来，他到处写信，有的是寄往各省、县公安局，有的是捕风捉影地往偏远的乡村投函。终于，他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一个庞大的花名册。那是攻打碾庄牺牲的烈士名单和他们亲属的地址、名册。除非实在找不着下落的，他都设法打探明白了。

他要把手上这3万元给他们分掉。从这个意义上说，3万这个数目又实在太少了，可他只有这么一点力量。过几天，他就要带上这笔款子云游天下了，去安慰失掉亲人们的人们，也了结自己的心愿。

他没有把这个打算告诉任何人，他老伴怕他，根本不敢过问他的事，为了不惹来一场家庭麻烦，他决定生米煮成熟饭的时候再向家人宣布。他知道，儿子们都在等他，绝不相信老子会真的把巨款带到棺材里去，他们总有“四一二十二”那一天。一想到这些，老头子常常在心里暗笑。不过，他也不是一点念性也不想留，3万元折子上的利息，每年总有那么一两千块的，这笔钱留给孩子，也就是了。

他仍然感到自己可能要挨儿子们的骂，但躺在地下，心却多少可以得到一点宽慰了……

不光彩的胜利

南京军事学院的讲堂够气派的了，据说从前是国民党的什么炮兵军官学校。

如今在这里听老红军讲课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大军区团以上的干部，据说又都是年富力强、有军事指挥才能、有培养前途的。

李辅乾讲了一个上午，没有收住尾，午后又接下去讲。

他的演讲是别开生面的，以至于厨房的伙夫们、后勤车队的人、包括招待所的小服务员们都挤到礼堂里来，没有座位，就搬张折叠椅，过道挤得人走不过去了。

午后，他讲到了把郑狩天监禁以后的事情。他说：“我把师直机关人员，连文书们都在内，又集合了二百多人，拉到前线上去了，接替了二团防地，准备组织第4次冲锋。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攻上去，打开我们独立师自己的突破口。就是用牙啃，也得啃进去，就是剩下一个人，也得完成任务。但是，这个时候，指挥所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军事学院的大礼堂里静悄悄的，甚至听得见摆在台口小方桌上几十台录音机磁带盘吱吱地转动声。

李辅乾又把人们带回到32年前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气氛里去。

郑狩天见到了分别几年的妻子，只是匆匆说了几句话。他的全部心思都在战事上。

友邻纵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地传来，惟独独立师的防地没有动静。郑狩天了解李辅乾的脾气，他带兵可从来没干过闹本位、图保存实力的事情，如果可能，他甚至愿意包打天下！他最受不了别人抢头功，他向来不愿去参加别人的庆功会。现在，友邻部队纷纷告捷，打开了突破口，他能不窝火吗？他把机关的文书都带上了前线，无疑是去拼命，他这个“拼命三郎”，是什么莽撞事都干得出来的，尤其在失利的情况下。

郑狩天对个人的事几乎没有去计较。蹲禁闭也好，受处分也罢，只要能赢得战斗的胜利，不使部队受不应有的损失，他都心甘情愿。

可是他意识到，个人英雄主义的脓包正在李辅乾的身上胀裂，很快就要给这支英雄的队伍带来覆灭的危险。

郑狩天决定马上向“野司”首长报告！

正巧，刘陝悄悄走来了，她是个人人喜欢的姑娘，以送水为名，哨兵轻易地放她进了禁闭室。

刘陝将水钵子放到窗台上，见郑狩天正伏在膝上急促地写着什么。

刘陝问道：“参谋长叔叔，有什么事要我办吗？”

郑狩天刚好写完，从笔记本上扯下两页纸，叠成窄窄的字条儿，望着刘陝说：“你认得路吗？离这儿5里地，是‘野司’的前线指挥所，你跑步去，把这封信交给首长，你能完成任务吗？”

刘陝向他敬了个军礼，说：“保证完成任务！”

郑狩天点点头说：“这是十万火急的事，关系到这次战斗。”

“我知道。”刘陝那对稚气的眼睛，突然间变得十分老成、庄严，她又敬了一个军礼。

5里地一个来回，刘陝仅用了四十几分钟就返回来了。

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面色潮红，汗水把棉军装都打湿了。

她带回了“野司”首长的指令，也是写在一张纸上的，通往前沿的电话线断了几十截，电话兵正在抢修，只好临时采取最原始的办法。

郑狩天打开那张字条，只见上面寥寥几句：命令独立师立即放弃强攻计划，跟上泰山纵队，从他们的突破口上去，进入碾庄后，包围、分割敌25军军部，切切此令。

底下是“野司”首长的签名。

郑狩天放下了心。但他却为自己忽略了一件事而懊悔。他在打给“野司”的报告中，并没有渲染自己同李辅乾之间的矛盾，更没有说及自己被关了禁闭的处境，他只是阐述了独立师所受到的挫折，提出了走泰山纵队突破口的建议。

假如“野司”首长知道他被关了禁闭，那么这道命令里，肯定要宣布对他无条件开释！那他郑猗天就可以到前沿阵地去下达命令。

可是，转念一想，似乎这样更好些，不会激化矛盾，他只希望李辅乾服从命令，放弃冒险计划，至于谁是谁非的争议，战斗结束后，有得是时间去讨论，他从来不在别人不冷静的时候去说服人家。

可是，这件十万火急的命令由谁送达呢？指挥所可以说形同虚设了。只有刘陝去最合适，可是看她那一脸热汗，他有点不忍心。

刘陝看出了郑猗天的心思，她问道：“命令是不是要送到师长那里？我去！”

郑猗天心头一热，一时很难受。如果不是战争年月，像刘陝这么大的姑娘，在父母膝下还是个娇儿呢，你听，她说话都没有脱掉奶腔。可这是战争年月，她必须在弹雨中生活、战斗。而死，对一个打仗的人来说，那是每一秒钟都可能到来的。

郑猗天不愿意再想下去，他替刘陝理了理军装，给她擦了擦汗，对她说：“去吧，带上一支枪。记住，豁出命，也要把命令送到，亲自交给师长。你的肩膀上，担着全师万把人的生命啊，懂吗？”

刘陝庄严地点了点头，说：“我懂了！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您！”一边说，一边把纤细的右手举到帽檐儿下。

她走了，是骑着马上路的。

嗒嗒的马蹄声像一阵急雨点，敲击在郑猗天的心坎儿上。“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您”，这句豪迈的、在人民队伍中很流行的话，他一点都不陌生，这是一个革命战士视死如归的诺言。这不是和平时期的戏言，那是哪一分哪一秒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刘陝弓身伏在马背上，向前沿阵地冲过来，像一阵小

旋风。

处在没有遮拦的开阔地，目标太明显了！敌人发现了她，60炮和机关枪同时拿刘陝当活动靶子扫射起来。

我们的战士扭头发现了刘陝，急忙调集轻重火器向敌人阵地射击，想压下敌人的火力，掩护刘陝平安到达前沿阵地。

这真是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

一支以三团为主力的集团冲锋队都已经各就各位，只待师长一声令下，就要扑向敌人阵地了。

师长李辅乾早已甩掉了棉大衣，棉袄也没有穿，腰间插着两把盒子枪，一只脚蹬在战壕土壁上，正抓着步话机的话筒在叫：“喂，喂……电话兵都死绝了吗？”

这已经是他第4次同前敌指挥所联系了。他要告诉“野司”首长放心，不出半个小时，他所辖的独立师队伍，就将出现在碾庄大街上，他将按原定任务炸掉运河大桥，切断黄伯韬兵团向西溃逃的去路。

他是信心百倍的，距离“野司”要求他攻进碾庄的时间还有一小时50分。他的心都发痒了，他眼不花、耳不聋，他听得见友邻部队攻进碾庄吹的号角，他看得见敌人溃退的惨象。

独立师是面团捏的吗？

这是他在动员第4次集团冲锋时激励战士们说的话。回答是一声雷：“钢铁独立师！”

他满意极了！独立师的人，说话、干事，都得有个吃钢嚼铁的劲头才行！强将手下无弱兵。没有怕死的兵，只有怕死的官，他是确信这一条的。他有点后悔了，干吗要让郑狩天带兵第3次冲锋呢？若是自己上阵……

这次，当然是他打头阵了！

他知道，打完仗下来非挨批不可，这是老毛病了。批归批，只要打胜了，记一大过都不在乎，你以为李辅乾历史上没有这样

的事吗？仗是打胜了，他却挨了处分，那他也高兴。

当他从望远镜里看见刘陝伏在马背上向阵地飞驰而来时，他的心陡然一沉。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吗？不然，她为什么冒险骑马而来，把自己全部暴露在敌人火力网中呢？

敌人的枪弹泼水般地向刘陝扫射着，尽管战士们使出全力掩护她，她还是中弹了。在距离前沿交通壕 50 米的地方，中了弹的白马翻倒在地，把受了重伤的刘陝也掀到十几米远的地方。

十几个战士俯身冲出交通壕，把刘陝抬了过来。

刘陝胸部中了三弹，血把前大襟都浸透了。卫生员跑步过来要给她包扎伤口，她双手捂在胸前，拒绝了。

李辅乾跪下一条腿，把刘陝的头轻轻抬起来，放在自己肘弯里，连声呼唤着她的名字。

刘陝吃力地睁开眼睛，苍白的嘴唇动了动，只是轻轻说了声：“郑叔叔是对的，你……放了他吧……”她轻轻地合上了眼睛，却把抓在手里的那张纸递到了李辅乾眼前。

命令不中他的意，但毕竟是命令，他是革命军人，是共产党员。

一场全军覆没的危险过去了，尽管当时的李辅乾并不一定认识到。

他怀着耻辱的心情带着队伍运动到泰山纵队的阵地上，跟上别人的脚步冲进了碾庄。

他的队伍不愧钢铁的称号，插入碾庄后，立即包围了 25 军军部，切断了 25 军同敌兵团司令部之间的联络，使敌人乱了营，连逃走的部署都来不及下达了。

但是，李辅乾却耷拉下头来，自认为是打了一个不光彩的胜仗，他将怎么去见“野司”首长，怎么去见他的参谋长呢？

将军的遗产

这是 1948 年 11 月 22 日凌晨。

碾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了，黄伯韬的尸体已经找到，有人说
是被我们击毙的，有人说他是自杀的。反正都一样，黄伯韬本人
连同他的不可一世的第 7 兵团从历史上铲除了。

李辅乾骑着马，赶到村外，亲眼看到了黄伯韬的尸体，用脚
踢了两下，这才上马回师指挥所来。

在此之前，李辅乾已经派两个作战参谋先回去，要他们马上
释放参谋长郑狩天。他知道这件事非闹到“野司”去不可，他甚
至又要挨处分。

如果是在往次，打了胜仗挨个处分也够本，反正他师长记了
过，他手下的各团照样去领奖旗、奖章，那些小兵嘎子们反倒会
来安慰他们的师长，好像怕师长会闹情绪，这不也是一种别人尝
不到的乐趣吗？

这一回可不同了，他无论如何也乐不起来。整个二团没有
了，给他发一枚脸盆那么大的军功章也抹不掉他心头的阴影。

昨天夜里，他在战场呆了一整夜，亲眼看着战士们把烈士一
个个掩埋上，一个个同他们告别。

刘陝是最后一个掩埋的。他请了一个老乡，给刘陝重新梳理
了头发，洗了面，甚至叫人找来点胭脂涂了涂，穿上了一套新军
服。他没有动用公款，自己出钱买了老乡一口薄板棺材，含着泪
把刘陝入殓了。

是偏爱，又不完全是。她的牺牲，是为了挽救整个独立师，
她是独立师的功臣。也正因为这个，当刘陝的棺木下葬时，李辅
乾组织了 100 支枪同时鸣 21 响志哀。他是听郑狩天说的，国际
惯例，凡是迎接最重要的国宾，鸣礼炮 21 响，他觉得刘陝应当

享受最高一格的待遇。

将来，“野司”首长问起“眼泪炮弹”刘陝来，怎么回答呢？她是首长们的掌上明珠啊！

李辅乾就这样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师指挥部所在的村落。

他发现，指挥所院子里拴着几匹马，还有两辆美式吉普车。

李辅乾顿时觉得脚下像坐上了铅板，迈步突然沉重起来。

“野司”首长在这里！没错，那个梳理马鬃的小鬼不是好唱河北梆子的小王吗？那个坐在台阶上擦枪的，不是下象棋把老总都击败了的小吕吗？

发昏当不了死！早一天挨批评比晚一天好受些，反正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李辅乾把跟在身后的几个警卫员打发走了，整理一下军容，跨进了指挥所的大门。

走进大门，是一个挺宽的走廊，从前是有一堵影壁墙的。

他正要喊报告，忽听屋里传出郑狩天的话，他又收住了脚步，“报告”也没喊出口。

郑狩天说：“首长批评得对，我应当受处分。”

李辅乾的眉头皱起了个大疙瘩，怎么搞的？郑狩天干吗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呢？很明显，他的主张是对的，如果当时听他的话，事情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野司”首长说话了：“处分？处分只是警戒别人的一种手段，它并不能挽回你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你真行啊！风头出得蛮漂亮啊！师参谋长亲自带着敢死队打冲锋，你这是拿战士的生命当儿戏，是个人英雄主义冒头！你们为什么不执行第二套方案？”

门外的李辅乾真替郑狩天着急，他尽可以把过失都推到李辅乾身上嘛，这不是推诿过失，这是事实。

屋里郑狩天的回答是完全出乎李辅乾意外的：“主要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

至于理由，他没有说，首长也没有问，只是说：“本来你们可以跟在泰山纵队后面攻进去的，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干？怕丢了面子，丢小集团的面子，丢了你们自己的面子。打仗不是下象棋，不是我打迎头炮你飞马的事，敌人部署变了，你们却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在正常情况下，死伤再多，那虽然也是痛心的，但那是值得的、不可避免的。可是在你们面前，哪怕只牺牲一个战士，都是不应该的，因为是死于自己人的错误指挥！”

一句句，一声声，像鞭子打在郑狩天的身上，却疼在李辅乾的心上。

好同志啊，郑狩天，他一句都没有为自己申辩，他在默默地代人受过，这是怎样一种品格啊！

李辅乾实在受不住了，连“报告”也忘了喊，哗啦一声推开门，闯进去就喊：“不要批评郑狩天，他是和我斗争了的，一切蠢事都是我干的！为了这个，我还关过他的禁闭。应该受处分的恰恰是我。如果没有‘野司’的死命令，我说不定要把整个独立师无谓地葬送掉……”

历史的风云早已过去。当一个将军带着队伍浩浩荡荡举行入城式的时候，当一个将军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检阅三军的时候，向他投来的目光，百分之百是赞叹、景仰的，没有人去设想他们之中也有人打过败仗，更没有人得知常胜将军的内心深处也有创伤！

光彩和荣耀的事情，自己不去说，也自有人去争相传诵，我们不缺过五关斩六将的经验；缺的也许是走麦城的教训。

李辅乾正因为想到了这一点，才有了今天的举动。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的战争总还不能说从此绝迹了，那些虎视眈眈地伏在国门之外的敌人们还时时刻刻在威胁着祖国的安全，仗总是要打的。作为一个战士，不怕死，那是第一位的，而作为一个指

挥员，只有这一条，那远远不够。

这便是李辅乾在离休后的晚年，终于讲出了这段经历的真正原因。

他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不需要掌声，虽然他知道这掌声首先在赞扬他的坦白和赤诚。

他心里踏实了，可以去悄悄地干另一桩事了。少许的钱，对被安慰者来说不见得是大事，可对一个终生心里不舒服的人来说，那却是一桩大事。

我们的将军不愿意带着遗憾去找马克思报到。

（原载 1981 年 4 期《长城》）

离离原上草

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相信的人

历史常常在奇怪的轨道上兜了个大圈子以后，又回到原来的某一点上，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申公秋坐在南下的特别快车上，反复地被这古怪的思绪纠缠着。是啊，历史常常嘲弄人，就像凶猛的海潮戏弄蛋壳样的小舟一样。

申公秋感到可笑、可叹。

他是几经沉浮的过来人，已经接近古稀年龄，现在当着全国政协委员，坐火车享受着软包的待遇。而能睡在柔软舒适的软包里的人，在 9 亿人口中，不是屈指可数的吗？

牛棚呢？那散发着干草气息和水牛粪味道的牛棚，他不是整整睡过两个年头吗？由牛棚到软包，由每天出工先听一遍管教人员对牛鬼蛇神们的训斥，继而到人民大会堂去参与时政，这之间有一堵不可思议的高山、有一条无法填平的鸿沟吗？是，又不是。这高山不是像冰山一样融化了？那鸿沟，不是像经历了新的造山运动一样夷平了吗？

三十多年前，申公秋穿着国民党的将军服，佩着寒光闪闪的

中正剑，坐在美式吉普车里，无疑是有充分自信力的叱咤风云者。

那么，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硬板床呢？一切都像是迷离奇幻的梦！

将军、阶下囚、文史资料馆的高级资料员、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挂上黑名签送到牛棚去改造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终于，又是政协大院的座上客了。

这一切，是真理的战胜，还是道义的法轮恢复了常轨？抑或是历史对于反动者的反动呢？

似乎都对。

然而，70岁的申公秋的血管里，却潜流着另一种意识，这是他后半生获得的，仿佛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意外地补充了新鲜血液，使他感到充实。

他永远忘不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

这，便是申公秋重返凤凰庄的原因。

其实，说重返并不确切，这该是第三次了。

凤凰庄是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归江苏省邳县管辖。它像离它12华里的碾庄一样，如果不是历史的风云在小小村庄上空卷起一股龙卷风，碾庄、凤凰庄也许再过两个世纪也没有人知晓。

申公秋不知道这个村庄的来历，为什么冠上凤凰这个美好的名字？是乡村学究一时雅兴命名呢，还是穷怕了的农民希望借美名讨个吉利呢？无可考证。

申公秋却在心底为这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好。凤凰，据生物学家考证，在地球上是没有过的，正如飞天的龙、驾云的麒麟没有在生命史上存留过一页一样。可是，古老的、善良的中华民族一定要臆造出这些沾有祥瑞之气，代表吉祥、幸福和友爱的东西，难道不是寄托了美好的夙愿吗？

申公秋是过了半世戎马生涯的军人。他在黄埔军校念书时，有一位教官给他灌输了一种思想：政治是不讲良心与道德的，犹如军人不讲友爱与怜悯一样。“一将功成万骨枯”，对军人也是真经。

这种铁一样的信念，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泡酥、融化的呢？啊，在凤凰庄。在那里，申公秋看到了升腾而起的金碧辉煌的凤凰，凤凰是从他心中升起的……

秋天的淮北平原，真是金子般的世界。申公秋凭着挂有勾花丝窗帷的车窗，望着向车后飞速旋闪的田野、竹木、荷塘和碧水，心里有一种沉醉感。

那躺在天边的一条碧玉带便是古老的淮河吧？你看，夕阳多美，它像个红灯笼悬在地平线上，把夕照投到澄碧的水上，白翅水鸟在烟霞雾霭中飞翔……申公秋想起了初唐诗人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种情致，他来得太迟了。半世的沙场转战，半世的落拓非人生涯，他都没能有机会在大自然中陶冶一番心性。到了 70 岁的高龄，却萌动了人本来具有的情致。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谁的诗呢？大概是李商隐的吧？这位古人的诗句，简直要把老年人的泪水都咏叹出来了！

列车广播员已经在通告，徐州车站快要到了。软包的服务员彬彬有礼地叩门，客气地请“首长”收拾行李。

有什么好收拾的呢？申公秋除掉一个瘪瘪的公文包而外，本来就没带什么。不过，人的神经总是经不起刺激，像通常在电车上有人提醒“注意钱包”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捏捏钱口袋一样。

现在，申公秋竟下意识地捏了捏公文包的夹层，那里有一颗硬硬的、有如蚕豆大小的东西。

这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也是为了纪念不被忘却，几年来，他

一直珍藏着它。

申公秋情不自禁地又把它拿了出来。啊，这是一支枪牌橧子的弹头。铜壳弹头发发出绿莹莹的光。

这颗弹头是4年前，一个女地委书记给他作为纪念的，她叫苏岩。

苏岩先是把弹头紧紧地攥在手心里，眼里闪动着泪光，她似乎要说什么，却到底什么都没有说出来。于是，这枚弹头落到了申公秋张开的手心上，苏岩拭着泪走远，申公秋也是没有一句话。

用得着语言吗？这枚弹头上不是集注了所有的恨、所有的爱吗？不，这所有的爱和恨都被一种世上高炽热的力量熔掉了，化成了一种使爱和恨的双方都不得不接受的物质，这种可以液化流动，也可以凝固起来深深贮藏的东西，不就像铅芯一样凝结在这小小的弹头里吗？

这小小的弹头啊，它给申公秋带来的是什么呢？

1948年11月22日黄昏时分，天空飘着大雪，碾庄上空飘散着浓烈的火药味，枪声已经逐渐稀疏，偶尔划过夜空的榴霰弹、曳光弹，照出雪地上遍布的尸体，那情景，真像刚刚收割的稻地堆满了稻捆一样。

拥有10万之众的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

换上了士兵棉军装的申公秋，在一所房屋废墟里找到了兵团司令黄伯韬。他拒绝出逃的建议，他要求申公秋杀死他。他把腰间的一支枪牌橧子推上子弹，递到申公秋手里，说：“开枪吧，有什么好犹豫的？把这支枪带到南京，交给我老婆，我离开她的时候，曾经说过：‘这里的5发子弹，也许有一颗是用来结果我自己的。’”

申公秋无论如何不肯下手。

解放军的收容队和民夫正在打扫战场，危险在随时加剧。黄

伯韬火了，伸手夺过手枪，厉声说：“不成功，则成仁，大丈夫何惧马革裹尸？”言犹未尽，砰地一声枪响，黄伯韬击中了自己的胸部，却没有马上断气。

申公秋看着他可怜地痉挛着，两手抓着一根冒着残烟的房梁在打滚，眼睛恐怖地盯着他。

申公秋拾起黄伯韬的手枪，眼一闭，向他开了第二枪。

黄伯韬僵直不动了。

申公秋拉了块门板，将他的尸体放上去，一直拖到村外一堆桑树前，那里是碾庄的乱葬岗子，乌鸦在枯树上嘎嘎叫着盘旋。

为了防止乌鸦叨吃尸首，申公秋把门板翻过来，压在尸体上面，就摸着黑向西北方向走去。

凤凰庄灯火照耀如同白昼，村里住的支前民夫和解放军伤员不知超过居民总和的多少倍，远远地只见人来人往，人声鼎沸。

申公秋不敢进村，他想绕过这个村庄再向远处走，找一个僻静去处。

他走了一程，其实连半里路都没有走出去。他觉得左腿像条大木棒，棉裤冻得僵硬，一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难道裤子湿了吗？没有下过水呀！

申公秋坐在一棵老槐树下，扳过左腿一看，哪里是水，那是血！啊，一滴滴殷红的血还在顺着裤管往下流。

他忽然觉得一阵眩晕，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不，大概有两天了。昨天早晨，他和黄伯韬分吃过一听牛肉罐头，仅此而已。

饥饿、疲累、困顿和伤口剧痛把他的体力全部耗尽了！

申公秋终于失去了知觉，趴在雪地上不动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差不多把他掩盖起来，同附近的士兵、土坎儿没有什么两样。

不知过了多久，申公秋又活过来了。生命的火光照亮了他的

眼睛。

啊，不，那是一盏昏暗的棉籽油灯，在他眼前照出一圈又一圈的光环，很像灶王爷头顶上的圈圈。

这是在什么地方？周围一片漆黑，黑得怕人。申公秋突然记起了地狱。地狱是这个样子吗？儿时看过十八层地狱图，那里确是没有一点亮光的。

可是这里有一盏棉籽油灯啊。

他嗅了嗅，怎么有一股冲鼻子的霉味呢？好像是蔬菜腐烂的味道。他伸手摸了摸，摸到一个圆滚滚、凉冰冰的东西，凑到眼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地瓜。

他终于明白过来，自己是躺在地瓜窖里，身底下有一张厚厚的像和尚打坐的蒲团样的垫子，是用玉米叶子编的，鲁南和苏北人都喜欢这种经济实惠的编织品。他身上觉得暖烘烘的，是一床纳上了补丁的家织土布面子的麻花被。

碾庄大战，5个整军的覆灭，黄伯韬的自杀……一切记忆都恢复了。他忽然产生了一种恐怖感。摸摸腰间，黄伯韬的那支枪牌橐子不见了，再摸摸胸口，只有藏在贴胸夹克口袋里的自己那支手枪还在，也是枪牌橐子。他松了一口气。如果丧失了武器，还叫什么军人呢？在他看来，武器如同猛虎的利齿、苍鹰的锐爪一样重要。

他到底弄不明白，自己是怎样躺到这漆黑潮湿的红薯窖里的。他揉了揉麻木得没有知觉的左腿，像不属于他的一样。不能想像，他能够拖着一条伤腿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躲到这里。那么，是被好心人搭救了吗？还是变相囚禁？

他不相信什么良心，也从来没施人以善良，更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他却知道人心的分量，人心的向背。他清楚地记得，两年年前当他乘坐吉普车在涟水城举行入城式时，他从沿街百姓发红的眼睛里看到的仇视火焰。他惟一的办法是杀，用人血来洗掉那种

仇恨眼神留在他心头的不快。

难道这些赤化的百姓当中，还会跳出来一个东郭先生吗？不，这不可能，多半是把自己当成了便宜的战俘，暂时囚在地窖里，或许到解放军那里去报信了。

他认定了自己的猜测，摸索着从皮夹克里掏出短枪，拉出梭子看看，还有 5 粒子弹，4 颗用来攻击，一颗用来结果自己——像黄伯韬那样。

可是，他的手又触到了身底下的东西，一床绵软的褥子，铺在玉米叶子编的草垫子上，还有缠在伤腿上的布条条，这种待遇像一个身处逆境的战俘吗？

一想到自己可能碰到了好运，他就尽力去摒绝这种念头，他有意地在心中默诵在黄埔军官学校念书时教官留给他的一句座右铭：“政治是不讲良心与道德的，犹如军人不讲友爱与怜悯一样。”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他毋庸置疑的信条。

黑暗的地窖分不清日夜，看不见日月星辰。渐渐地，他感到了饥肠辘辘的苦痛，生的欲望攫取了我的心，他从身旁的红薯堆里摸到一个凉冰冰、湿漉漉的红薯，用手抹了抹，泥土都没有擦净，就送到嘴里啃了一口。他感到生红薯真甜，简直是世上少有的美味。他刚要咬第二口，猛然间一道亮光泻了进来。真亮啊，刺得他目眩神悸。窖盖被人打开了，他听到了脚步踏雪的嘎吱嘎吱声。窖里贮藏着的热气像火山喷吐熔岩一样腾腾地涌出去，使他看不清窖口上面的一切。

他的手里已不再是生红薯，而是那支打开了保险的枪牌橛子了。

申公秋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僵卧在那里。他看见，有一张吱吱作响的竹梯子从窖口竖下来，随即有一个人影顺梯子爬下来。

申公秋忽然感到羞辱，他藏起了手枪。因为他看清，来到他

面前的是一个女人。堂堂的军人用手枪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不是太神经脆弱了吗？何况，她到底要干什么，还不清楚呢。

这女人站在灯影里，看不清她的面孔，她手里好像提着个什么物件，放下后，给灯碗里又注进了一点棉籽油，用指甲掐了掐焦黑的棉花捻子，地窖里忽然亮堂起来。

申公秋模糊看清了女人的轮廓，这是一个不超过 25 岁的青年妇女，是结过婚的，在脑后梳了个圆圆的大髻，用黑丝发网罩住，插着一根质地粗糙的凤头钗。大概她是山东人，耳畔故意留有一络散发，好看地垂在脸颊上。

她穿着一身海昌蓝家织布裤褂，宽大的裤腿滚着青边，腰间扎着一块花带子围裙。这又是苏北农家妇女的标准打扮了——她们即或不在灶间煮饭，也总是扎着围裙的。申公秋在新安镇、海州、郯城一带驻扎过几年，他见得多了。

这个年轻女人右手擎灯，左手遮住那摇来晃去的火苗，渐渐凑到申公秋面前。

她笑了，那是女性特有的又惊又喜的表情。大概她没有料到，申公秋会睁着那样一双充满猜疑、警觉的眼睛在盯视她吧？

这女人放下棉籽油灯，压低声音问道：“你醒过来了？”

这证明，申公秋是在昏迷当中被人弄到红薯窖里来的。他没有出声，一只手又不由自主地抓住了身边的手枪。

那女人似乎没有去注意他，只顾动手解开她带进地窖来的蓝布包袱，里面是一只冒着热气的大沙锅，沙锅底下是一个又大又深的陶钵子，盛有半下子热水，这是苏北农家土造的保温器。

一股奇异的香气直透申公秋的脑门。啊，真香！他觉得，黄埔军校毕业典礼那顿鱼翅席、在新安镇“社会贤达”们为他设的海参宴，都没有对他产生这么大的诱惑力。

女人把沙锅和烤红薯、一沓千层饼放到申公秋跟前，说：

“吃吧。”

申公秋咽了一口唾沫，扭过头去，冷冷地说：“我不吃。”

女人鼻孔里哼出一声冷笑，她的声音不高，却透出一种逼人的力量：“你倒成功臣了？看看你那双手，沾了多少百姓的血！若讲解恨，我昨天晚上就该搬起一块石头，把你的脑壳砸碎！”

申公秋不由得一抖，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把我送到俘虏营去？为什么还要给我送饭、治伤？”

女人嘴角的笑容消失了，好一会儿没有做声。是呀，为什么不把这个受伤的战俘送到战俘营去呢？其实，那天晚上她去叫过收容队，一听说是个昏死过去的国民党官儿，收容队的一个大胡子说：“咱自己的伤兵还顾不过来，等打完仗再说吧，死了臭块地！”

她觉得大胡子说得有几分道理，难道说国民党伤兵比解放军伤员更重要？真的抬了来，半死不活，不是给他们添累赘吗？

她犹豫再三，决定先将养他几天，然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她所以把申公秋弄到红薯窖里，倒没有掩护他的意思，那完全因为这大嫂的家里有一个眼里揉不下沙子的姑娘，她怎么好向申公秋明说呢？

她想了想，对申公秋说：“我想，你总还是个人，心不会叫狗掏吃了。我小时候听老人讲，从前鲁南地界出了三害：猛虎、蛟龙和一个地痞无赖。后来那个地痞被人们感化过来，还杀虎、蛟为民除害呢。你有罪去领罪，和治伤是两码事。”说完又把沙锅往他跟前凑了凑，“吃吧，你不犯挨饿的罪。”

申公秋听得出来，她的话是带有敌意的，却又说得那么掏心，那浸透着女性温柔慈爱的声音，对他来说，是那样隔膜。多年来，他对别人讲话的词语从来是“命令你如何如何”，听到的回答除掉“是”和“遵命”而外，再很少有别的词汇了。

不知为什么，这带有教诲的语言，使他想起了母亲——如今

早已埋在黄土垄中的母亲。

申公秋是生长在高邮湖边的人。儿时，他特别刁钻、顽皮，常常逃学。每逢这时候，他的寡母总是含着泪，温柔而严厉地对他进行教诲，给他讲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给他讲孙膑和庞涓……

这都是久已淡漠下去的旧事了，他自己都奇怪，面前这个女人的话，怎么会引起他对母亲的思念？难道她会不讲阶级一味地善良？不，不会，你听，她不是说“若讲解恨，昨晚上就该搬起一块石头，把你的脑壳砸碎”吗？

申公秋决定先吃了再说。

沙锅里煨着杂烩汤，有荸荠、鲜冬笋和肉圆，还有几片新鲜绿菜叶。千层饼是夹了葱油的，又软又薄，烤红薯更是引人食欲。

他没有道一声谢，抓起一个烤红薯，连着咬了几口，双手捧着沙锅，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他差不多成了一只饿狼。

吃过，他用脏污的袖子抹了抹沾在硬胡楂儿上的菜汤，把沙锅一推，冷冷地说：“你，随便把我送到哪儿去吧。”

那女人似乎意外地愣了一下，一边收拾餐具，一边瞪了他一眼说：“眼下你先看看自己身上的伤！”

申公秋没有做声。用他心中的天平，他一时无从量准这女人的分量。她到底属于哪一种人呢？是见到国民党兵就眼红的那种穷人吗？像，又不完全是。

那女人又移过棉籽油灯，蹲在申公秋左腿旁，解下浸透血渍的布条绷带，露出小腿肚子上的伤口，用盐水给他洗涤着。

申公秋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你不怕我吗？”

那女人怔了一下，抬起眼睛扫了他一眼，说：“在战场上，你们是张牙舞爪的老虎，我见过，腿肚子也没转过筋。这会儿，你是虎落平阳，在我眼里，连只猫的威风都没有，哪个怕你？你

别装硬，你心里才怕呢！”

申公秋被她说得半晌没做声。

这女人的话，不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凛凛正气中夹杂着无法琢磨的善良，她这听来平平常常的话，在申公秋听来，有如五雷轰顶那么令他震动。他久久地凝视着这个面目和蔼的不可理解的女性，多年泯灭了、好像是天良吧，又从遥远的地方回到了他的躯壳中，他感到不能自制，心里不好过，连眼角挂上了冰冷的泪珠自己都没有察觉。

这女人的脸正冲着灯火，使申公秋第一次看得仔细。她长得很美，不，美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端庄。清秀的眉毛、漆黑的眸子，还有那自然有点向上翘的嘴角……五官透露出来的全是善良。申公秋又想起了母亲，她不是也有着这样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吗？可是，善良人的结局却往往是可悲的。申家是个大户，申公秋的妈妈 23 岁死了丈夫，就守着申公秋这一根独苗过活。她无所求于人，却处处关心着别人。记得那是申公秋在扬州读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了母亲死去的噩耗。他母亲因为资助同宗一个童养媳私逃，被认为犯了败坏名节玷辱门风罪，被族长宣布处死，按族规，把她钉到一个竹笼子里，坠上大石头，沉到了高邮湖底。等申公秋赶回去时，连母亲的尸体都没有见到，只能跪在白浪滚滚的高邮湖畔大哭一场。从那以后，他投笔从戎去了。

那是上路前夕，他磨快一把七寸匕首，想要行刺族长。这件事被他的一个开牙行的堂叔劝阻了。他对侄子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何争一个朝夕？你不是要弃文习武吗？等将来你成了带兵的将军，要他的头，岂不如探囊取物？你此时势孤力单，弄不好，连小命都要赔上！”

申公秋收起了匕首，对堂叔说：“我听叔叔的话。”

却不料这个叔叔龇出长板牙，笑嘻嘻地说：“忘了小时候挨

摔的事了？你额上的疤，就是最好的教训。”

17 岁的申公秋禁不住摸了摸左眉梢上的一道突起伤痕，那是这个堂叔对他教育的纪念。

在申公秋很小的时候，这位堂叔还没有开牙行，是家塾里穿竹布长衫的角色。不知怎么回事，他特别高看申公秋一眼，常在人前人后夸奖这孩子“久后必成大器”。预言虽然和不值钱的许诺一样，申公秋的寡妇娘还是深信不疑，逢年过节从不忘准备一分厚礼去酬谢先生，希望堂叔能把申公秋造就成人。这位堂叔并没有白吃寡妇的鱼肉，他对申公秋的教育确比别的孩子上心。

那是怎样的教育呢？

就拿至今留在申公秋左眉角的那块疤痕来说吧，就足可见一斑了。

那年申公秋刚满 6 周岁，有一天，堂叔放学后把他留下了。他叫孩子站到椅子背上去，申公秋不敢，那不是明明要挨摔的吗？不过，老师和颜悦色地哄他说：“不要紧的。你站去，我扶住你，还能摔着吗？你连叔叔都不信？”

申公秋相信了叔叔的话。

结果，他刚刚扶着叔叔的肩膀战战兢兢地踩到椅子背上，堂叔突然松手退到一旁去，申公秋失去重心，狠狠地跌到砖地上，额角摔了一个三角口子，孩子大哭起来。

堂叔不准他哭，一边拿戒尺吓唬他，一边叫孩子规规矩矩垂手站在面前，教训他说：“懂了吗？人世间是没有诚实、良心可言的，你谁都不要相信，连你的叔叔父亲都会骗你的。你只有记住了这一条，你才能成人！”

可怕的泯灭人性的教育，深深扎进了申公秋的心灵中。在此后漫长的一生中，这个军人身上反映出来的冷酷、无情，不正是结果吗？

今天，这个从不相信世上有好人的人，不是遇到了好人吗？

一阵强烈的颠簸，把申公秋从30年前的漆黑地窖里拉出来，眼前是一片灯火辉煌的徐州车站。

他没来得及走出车厢，市委管统战的工作人员已经走上软卧车来接他了。看来，北京早已打过长途电话来，关照过这里了。是啊，他必须在徐州住一夜，才能动身去凤凰庄的。

“爱神”同时中了仇敌双方的子弹

申公秋下榻在徐州的南郊宾馆，坐落在风光奇秀的云龙山脚下，离云龙湖也不远。

吃过晚饭，天还没有黑透，他就沿着一条东西大街向西走去。

路口一个玉石牌坊门，院庭中露出黄色琉璃瓦殿顶，那是从前乾隆皇帝南巡时修筑的行宫。不过，据说乾隆皇帝从来没有住过，因为通往行宫正宫的台阶是就地势修的，一步比一步低，这使得乾隆很不高兴，皇家怎么能步步低呢？

这里的夜市很兴隆，西瓜、脆枣，还有糖烤地瓜，一片市声；有一个夫妻小店，还挑出一个罗圈幌，上书几个大字：彭城老辣糊汤。

辣糊汤的土语不是称做“沙”的吗？30年前，申公秋从新安镇专程赶到“徐州剿总司令部”开会，他尝过辣糊汤，觉得滋味很好，比关中、河南一带的胡辣汤一点都不逊色。说起辣糊汤来，还有一段笑话。据说乾隆皇帝南巡到徐州，正值黄淮大水泛滥，一片荒凉，他本来就不大愉快，有一天清早他微服来到市井上，看见一个老太太卖辣糊汤，就凑过去看，却叫不出名字来。于是乾隆问老太太“这是啥？”老太太正忙着招呼买主，顺口答了句“沙”，乾隆皱了皱眉头，以为这老姬故意打岔，就又问了第二遍：“这是啥？”老太太没好气地顶撞他道：“啥？沙！”

连续三次，乾隆皇帝都被撞回来了，他不知道“沙”便是辣糊汤的土名，以为老太太故意捉弄人。由于有了这个坏印象，当彭城令请文采风流的乾隆皇帝题匾留御迹时，乾隆抓起毛笔气呼呼地写了八个大字：“穷乡僻壤，泼妇刁民，”从此不再来徐州。

申公秋可说不上徐州的优劣。

他在这里名扬四海的彭城酒家里吃过徐州名菜，也许就在现在走着的这条大同路上，还留着他刺马针踏出来的历史陈迹。那时，他作为不可一世的将军出现在徐州街头时，谁人不得侧目？

可是，1968年他在阔别了徐州20年后重回这里的时候，是另一番模样了。挂着“大战犯”的牌子，剃了阴阳头，像个叫化子站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前低头认罪。中学生们往他的秃头上吐痰，往他脸上摔西红柿。他感觉自己就是永远跪在岳武墓前的秦桧，遭万人唾骂，简直不是人。

现在呢，他住进了设有空调机的特等房间，他像人一样，毫不脸红地走在这块沾着他一生荣辱的土地上。有谁能认得出，他当年的秃头上沾过浓痰，脸上糊过烂柿子呢？又有谁知道，他在如今作了市劳动局的那栋楼房里，接受过蒋介石授予他的青天白日勋章呢？

他痛切地感到，一切荣辱、尊卑都是浮于身外的，只有一样是永恒的，可惜，这永恒的东西在他身上复苏得太迟了。

第一个把这永恒赋予申公秋的人，却早已同大地一道永恒去了。啊，那个救过他性命的农家少妇杜玉凤啊，她是凤凰，是申公秋心中的凤凰。然而飞去了，飞去了……

子弹，一支枪牌橐子的子弹！

申公秋觉得自己是残害凤凰的罪人。对于这样一个好人，自己给予她的是什么呢？一颗子弹。

申公秋的心在隐隐作痛，好像那颗弹头嵌进了自己的心房。

他是怎样从黑暗的地窖里走出去的呢？是在一场决斗以后。

其实，在决斗的当时，他什么都不知道，连对方的姓名都不清楚，但他本能地感到，对方那个穿灰军装、梳齐耳短发的女兵是代表共产党，而自己，当然是为国民党尽忠的。

历史的答案，往往是在若干年后揭晓的，如果 1968 年没有与那个决斗者的重逢，申公秋也许永远不知道地窖以外的事情。

在申公秋住进杜玉凤的地窖养伤半个月以后，集中在凤凰庄的民夫向南开去，伤员都集中到东海县野战医院去了。

但是杜玉凤没有让申公秋从潮湿的地瓜窖里搬出来。她家里还住着一个轻伤员，叫苏岩，是个年仅 18 岁的解放军女战士。苏岩能歌善舞，会说二十几种地方方言。她在碾庄敌人被围以后，就顺交通壕爬到前沿阵地去，用喊话筒喊话，瓦解敌人士气。她喊一段，就唱一段方言小调、地方戏，常常使得来自四面八方的蒋军士兵趴在机关枪上流眼泪。

后来，在搜索第七兵团司令部大院时，苏岩被冷枪打中了左臂，她被纵队首长留在凤凰庄养伤。

苏岩是个开朗的姑娘，爸爸妈妈从前都在新四军里工作，皖南事变那年，阵亡了，苏岩成了孤儿，那年她已经 10 岁，生活可以自理，就没有把她送到老乡家寄养。

应当说，她是个火爆性子，和娴静安分的杜玉凤是水火不容的，可是她们相处得好极了，几乎无话不谈。

在杜玉凤看来，苏岩不像个女孩家，没羞！

有一回，天很冷，为了省一把点火盆的柴火，苏岩提议早早地钻到被窝里去，而且要两个人合盖一条被，她说这样更暖和。

杜玉凤同意了。

那天夜里，老北风刮得猛极了，霰雪像开春的沙子一样，哗啦哗啦地摔打在白麻刀纸的窗户上，远处传来野狼的嚎叫，叫得十分瘆人。

苏岩问道：“你平时一个人住这么一座空房子，不怕吗？”

杜玉凤坦然地一笑，说：“不做亏心事，有什么好怕的？”

苏岩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她批驳杜玉凤道：“这叫唯心主义！就是迷信！天地间根本就没有鬼、没有神。你看，蒋介石干了多少坏事？他不是还耀武扬威地活着吗？葬在村外乱葬岗子里的穷人，一辈子靠汗水过日子，却没有一个长寿的。”

杜玉凤拧了苏岩的脸蛋一下，说：“我说不过你，你是识文断字的人。我倒不是信神信鬼，总觉着人活在世上，要怜贫惜老，要对得起心口窝，拿人当人看，别人才能拿你当人待。”

苏岩格格地笑起来：“你这叫不懂阶级斗争！依你这么说，若是有个国民党跑到你家来，你也好吃好喝地招待了？”

这句话可触到了杜玉凤的痛处。此时，地窖里不就果真有个国民党在那养伤吗？

杜玉凤并不拥护国民党，她是以着人的尊严来对待一切的。她自己也感到可笑，一个寡妇家，居然同时养着两个伤员，一个公开的共产党，一个暗藏的国民党，这若声扬出去，不但村里农会主席要骂她“不分敌我”，就是肯和自己说悄悄话的苏岩知道了，也不会饶过她的。

想到这里，杜玉凤有点发抖。

“你冷吗？”苏岩向她跟前靠了靠。

杜玉凤摇摇头，决定把这件事瞒到底。

后来，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杜玉凤的婚姻上来了。苏岩问道：“你才25岁，干吗守寡？莫非你要守到头发白吗？”

杜玉凤叹口气，红了脸说：“你是没出阁的闺女家，你问这个干什么？”

苏岩说：“你这也是封建思想！丈夫死了就不兴再嫁。若是我呀，早就看中哪个好小伙子了，笑骂由人，我才不管他呢！”

杜玉凤为苏岩这话感到羞臊，她伸开双手捂起脸来，过了半晌才讷讷地说：“我不忍心啊。”她伸手指了指东屋，说：“我9

岁那年，家乡蒙阴颗粒不收。你不知道，蒙阴那地界，山高地少，又全是石头山，连茅草都不生，爹娘都饿死了。我随着村里人逃到苏北地界，是我婆婆把我收养了，没有她的饭菜糊糊，我早就饿死在大道旁了。如今，我丈夫死了，她又瘫痪在床上，我怎能忍心把她扔下，谁给她端汤送水、倒屎接尿啊……”

说到这里，她那长长的睫毛上挂上了泪珠。

连苏岩都叫她说得心软了。半晌，苏岩才叹口气说：“你的心太好了。不过，这样下去不是毁了你的一生吗？我看，嫁个人，一样侍奉她嘛。再不，就招个上门女婿！”

“不跟你说了。”杜玉凤生气地掉过身去，说：“你越说越下道了！”

她们一直相处得很好，直到苏岩与申公秋决斗的日子。

那是转年开春的日子，苏岩帮着杜玉凤把畦在厢房炕上的地瓜秧移到地里去。

地瓜秧，要用地排子车运到地里去。排子车在邻家的露天磨坊里放了一个冬天没用过，扶把都干裂了，杜玉凤叫苏岩到屋子里去拿麻绳，将扶把缠起来，省得磨手。

苏岩答应一声，跑到屋子里。她到处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麻绳。她分明看见杜玉凤天天晚上吊着牛骨纺锤，纺出好多麻绳的，怎么就不见了呢？她正要反身到院里再问，突然，她伸到躺柜里乱翻乱搅的手，碰到了一个冰凉铁硬的东西。

苏岩一愣，凭着军人的经验，她不用拿出来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她的心怦怦一阵乱跳，连毛毛虫都害怕的杜玉凤，怎么会藏着这种东西？

苏岩的手从柜子里拿出来，手心托着一支亮着烤蓝的短枪，是最新出的枪牌橐子。这种枪，连苏岩的纵队司令员都还没有呢，显然不是解放军的。这种枪牌橐子，仅仅是防身用的，因为射程近，战场上是用不着的，苏岩知道，只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才佩带。

难道说，她家里藏着什么国民党的要人吗？

苏岩突然打了个冷战。她开始怀疑那个地瓜窖了！为什么杜玉凤从来不允许自己下窖去拿菜呢？对了，有一次天很黑了，苏岩从村公所回来，见杜玉凤从地窖里出来，捏着个包袱，不像是拿菜的样子。苏岩当时问过她，她支支吾吾没有正面回答……

苏岩不住地埋怨自己，太缺乏革命警惕性了，怎么这样粗心大意？

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杜玉凤，把那支枪牌橛子藏到怀中，找到麻绳，照样同杜玉凤下了地。

中午 10 点钟左右，苏岩向杜玉凤撒了个谎，说：“村长找我有点事，我先走一步。”就头也不回地进村去了。

杜玉凤在地头坐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苏岩的神色不对，她有点慌里慌张。是啊，一上午干活，她总像心事重重，心不在焉的样子，问她三句话，她都难得哼一声。从前她可不是这个样子，她是个唧唧喳喳的小喜鹊，永远没有住嘴的时候。

是她要背着自己归队吗？完全可能。她前几天就说，她们纵队已经向长江边挺进了，围攻南京巢匪的决定性战役，她不能不参加。

杜玉凤知道留不住她，这几天正在稍稍赶做一双鞋，她还打算过几天到集上去卖点鸡蛋，给她再扯一身布料，做一套内衣内裤。大概苏岩怕杜玉凤破费，才决定悄悄走的吧？

杜玉凤觉得自己猜中了，就脚跟脚地跑回了村子。

苏岩根本没去找村长，村长也并没有找她。

杜玉凤更加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就直奔自家去了。

她还没走进院子，就一眼看见，地瓜窖的盖子远远地掀到了一边。她吃了一惊，惟恐有什么变故，就跑过去，俯身窖口向下一望，她的心都快跳到喉咙口了。

只见苏岩果然在地窖里，她手里握着那支枪牌橛子，正一步步向前逼近。

申公秋呢，没有反抗的意思，拖着一条不大灵活的伤腿，警惕地向后退着。

杜玉凤只觉得头轰地响了一下，差点晕倒。这两个在她羽翼下保护过来的人，正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杜玉凤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她不用细想，也能猜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时情急，她连梯子都没来得及竖，一纵身，跳下红薯窖，恰好跌到两个人中间。

申公秋和苏岩都吓了一跳。

杜玉凤拍拍尘土，忍着疼痛站起身来，有点语无伦次地对苏岩说：“别、别这样，你、你听我说，我是这、这么想的……”

“你好糊涂！”苏岩不容她说完，眉峰一耸，厉声说道：“你闪开！”说着用力一搦，把杜玉凤搦到了窖壁上。

一时，杜玉凤脸红气喘起来。她能怨苏岩粗鲁吗？不，不能。杜玉凤和苏岩一样，都是贫寒人家出身，是吃糠咽菜和着眼泪过来的，哪个人对国民党没有一本血泪账？何况，上过战场的人就更不一样了，苏岩不是说过吗，眼见同志们一排排倒在国民党枪弹下，恨不能把敌人生吞活剥了……她怎么能容忍房东大嫂家里藏着一个杀人刽子手呢？

可是……杜玉凤又觉得，放下了武器、受了伤的人，到底不同战场上啊……她正要再说什么，苏岩又向申公秋逼近一步：“你到底是什么人？说！”

申公秋一直处于守势。这时，他那一双眯着的小眼睛突然瞪得雪亮，充满了杀机，这使杜玉凤大为骇然。这以前，她在地窖里熟悉的那双眼睛，不是一天天变得温顺起来了么？杜玉凤是相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可是苏岩她……难道这就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吗？

杜玉凤不知如何是好，呆呆地靠在潮湿的土壁上，茫然地盯着这两个她熟悉的、又陌生的人。

这时，苏岩正在又一次厉声喝问，而且把枪口瞄准了申公秋的头：“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申公秋侧着身子，也斜着眼，说：“一个上等兵。”

“上等兵？”苏岩冷笑一声，“不喝兵血，长得了你这么肥胖吗？”

申公秋突然凑前一步，哗地扯开衣襟，露出一副亡命徒一样的凶相，说：“算你走运！我嘛，25军中将军长申公秋！”

苏岩挥挥手枪，说：“原来是你，我还以为你逃了呢。告诉你，你欠人民的血债太多了，只有低头认罪，才能得到从宽处理，否则，就是黄伯韬的下场——被我们击毙！”

不知为什么，申公秋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也许他从来不会笑吧？那笑声显得很怕人，像枭鸟的叫声一样难听，震得地瓜窖嗡嗡作响。

笑够了，申公秋用挑战的口吻对苏岩说：“大不了是个死！黄伯韬并不是你们击毙的，他是自杀，是成仁！这需要我给你纠正一下。”

就在这时，苏岩下了命令：“你想死吗？没那么容易！你是逃不脱人民对你的审判的！走，举起手来，乖乖地上去！”

“跟你走？”申公秋冷笑一声，说：“那还要较量一下，你不要高兴过早了吧！”

说时迟，那时快，申公秋像变魔术一样，嗖地一下从怀中抽出一支手枪，咔嚓一声推弹上膛，没等杜玉凤明白过来，已经砰地响了一枪。

子弹打在菜窖柱子上，腐朽的木屑飞散开来。他正要开第二枪，杜玉凤尖叫一声扑过来，她想要扑过去抱住苏岩，她相信，申公秋无论如何下不得手往恩人身上开枪的。

她刚冲出两步，恰好居于两个人中间，双方的枪同时响了，倒下的既不是苏岩，也不是申公秋，倒是他们的保护人。

杜玉凤倒下去的声音很重、很缓慢，像沉重的石夯夯在大地上一样。

这夯声，难道就不是砸在申公秋、苏岩心坎上发出来的吗？特殊的环境，常常创造出不可思议的奇迹！

枪声没有再响，苏岩和申公秋好像同时忘掉了对方是仇敌，同时忘记了自身的安危，不约而同地扑过去。

苏岩把杜玉凤扶起来，把那失去血色的脸向着自己。

申公秋一条腿跪在地上，茫然地望着那张苍白而美丽的脸。

一时，他产生了幻觉，他觉得这张渐渐失去血色的脸，是大理石雕出来的，不，是世上本来就存在的，那不是希腊爱神维纳斯吗？

“你还愣着干什么？”突然，苏岩在向他下命令了，像他从前习惯于向下级下命令一样自然：“竖起梯子，然后你抬起她的脚……轻点，你真比猪罗还笨！”

真是奇怪，自尊达到了惟我程度的申公秋，居然像一头驯服的羔羊，听着苏岩的摆布，他们仿佛本来就是一个壕堑里的战友！

生活啊，这也是生活？此时主宰着苏岩和申公秋全部活动的，到底是一根什么样的神经呢？

一副门板变成了简易担架，8个农民抬起腹部在流血的杜玉凤飞一般向台儿庄跑，那里有我们的战地医院。

申公秋一直跟在担架后头，他似乎没有想到过要逃跑……虽然机会是有的。也没有人怀疑他会逃走……虽然谁都没有心思去管他。

当一切就绪以后，人们都松了一口气，在这种时候，人们又记起了申公秋。

苏岩派人向解放军驻台儿庄的留守处报告了。

在前来押解申公秋的人没有到来之前，杜玉凤上了简易手术平车。几个女护士手里托着输液瓶，推着平车向手术间走去。

申公秋内心忽然涌出一种生离死别的情绪，这在他看来，是很不寻常的。即使是他视为战神的黄伯韬开枪自毙的刹那，他也没有过这种感情，有的只是崇敬和为了成全仁人志士的道义，而给他追补一枪。

他踉跄地从破竹椅上站起来，跟着手术平车走了几步。一个高颧骨的小护士回头凌厉地瞪了他一眼：“你要干什么？”

申公秋垂下头，站住了，他差点流出了泪水。是啊，在这群人面前，自己是惟一的一个敌对分子。尽管现在还查不清究竟是他的、还是苏岩的枪弹射穿了杜玉凤的躯体，反正都一样，杀人凶手的罪名，注定要由他来承担。还是那句话，他在这群人中间，过去、现在（也许还有将来）都是惟一的敌人。

苏岩走过来了，经过一阵忙乱之后，仇恨的火重又在她心头燃起，她双手叉在腰间皮带上，用三分嘲弄七分自责的口吻说：“你不后悔吗？你放过了最好的逃跑机会。”

申公秋的眼睛又眯了起来，他抬起长满蓬草样胡须的脸，望了一眼越推越远的手术车，喃喃地、像是自语地说：“为了她，为了良心……我不准备逃走了……”

他说过，又一次快步追上手术车，不等别人动手拉住他，他已经把左手腕子上的瑞士产航空表、无名指上的钻石戒指撸下来，一块掖到杜玉凤的枕头底下。

可惜，那张苍白如纸的脸没有一点表情，那对好看的眼睛微闭着……

申公秋又垂下双手，像孤魂一样，踽踽独行地走回原处，闭起眼睛，靠在石灰墙上，直到解放军留守处的三个军人出现在他面前，他乖乖地伸出双手，等待着手铐。

可惜，他们手里还没有手铐。

一个负责人模样的军人问他：“你是谁？”他手里在翻着一个贴相片的簿子，不用问，那是贴有国民党高级将领照片的备查簿。

申公秋出人意料地老实，他说：“申公秋，第7兵团第25军中将军长，黄埔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生。”

他被带走了。

他在走出门的一瞬间，忽而萌生了一个于他很不相称的好奇心，他竟回头看了一眼苏岩。他想，那张带有政治色彩的稚气的脸，此时一定流露出洋洋得意和胜利者的自豪吧？

然而，比他想像的还要寒心，苏岩那双好看的眼睛里充满了仇恨的火焰。他在心里打了个哆嗦，他真不明白，枪响以后的她，和现在的她，究竟哪个是本来面目呢？茫然。

又是不光彩的重逢

苏北的秋天，是醉人的。

申公秋又沉缅于家乡的风光里了。天，明净而高爽。云，轻纱一般舒卷。那蔚蓝的天，真像故乡的高邮湖，那白得像白绢的云片，不是很像浮泛在高邮湖上的樯帆吗？

再不是30年前彤云密布、朔风吹雪的阴霾天气，过去的都过去了。他万万没有料到，此生此世，他还能以这种清闲的情致回到苏北来，而且乘坐着一辆草绿篷的吉普车。

徐州市委的同志坚持不让他坐陇海线的火车上路。他们说，碾庄和凤凰庄都不在铁道线上，不如坐小车去，还自由一些。

车子出了徐州一个多小时，已经过了大许家。一片片竹林、桑园，一座座粉刷得很白的房屋，新建的水电站，旋风般闪到他身后。

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水，都还像从前那样。你看，那水塘里的白荷花，那田垄间的小路，在他印象中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再往前追溯呢？几百年前是什么样？几千年前又会是什么样？怕也是这种风貌。可是人，却像走马灯地变换，一批批走向坟墓，一批批又来到这硕大的舞台上角逐……

眼前这条马路，三十多年前他走过，所不同的，坐的是美式吉普车，有带枪的护兵陪同。那时，他只要高兴，随时下一道命令，一座村庄、一片竹林就会在地球上消失。啊，权力！是权力使人变得疯狂，抑或是疯狂使得人滥用权力呢？

同是这条公路，1968年的春天，他也走过一回的。那不是乘的美式吉普车，也不是北京吉普车，是解放牌大卡车，没有帆布篷顶。天下着讨厌的雨，车上人的衣服、行李全都淋湿了，司机像发了疯一样驱车狂驰，把车上的人一颠三尺高。好像车上载的不是人，而是一种耐摔的钢锭、丢弃的垃圾。

对，是垃圾，是从健康社会的角落里扫起来的垃圾！不是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的特务，还有像他这样的战犯。不仅是垃圾，应当确切地呼之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天哪，这不是徐州通往海州、连云港的公路吗？错不了。你看，那不是大许家的古塔吗？据说那塔是金代建的，粗犷有气势，可惜淮海大战时被炮弹炸掉了塔顶，至今没有修复，塔顶居然定居了一株小榆树！

为什么要把申公秋送到这里来呢？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哪一平方米倒不下他这一堆垃圾呢？

难道把他送回到这不堪回首的地方，是为了惩罚他那还在流血的心吗？这是人为的残酷，还是冥茫之中有什么东西在作祟呢？

申公秋双手攥着拦在卡车高栏中间的铁链子，任雨水浇淋，一直凝视着裹在雨雾中的田野村庄。他多么希望车子会突然停

住，有人吆喝一声“滚下来”呀！他真怕再向前走。

然而，汽车一直在疯开，碾庄的一片灰黑房脊看见了，解放后在碾庄村外新修建起来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碑，像一把黑光闪烁的利剑，刺向铅灰的天，也刺在申公秋的胸膛上。

这是国民党第7兵团写下耻辱记录的旧战场，这是黄伯韬结束他自己生命的地方，也是申公秋开始新生活的地方……不要再往前开了吧，哪怕就把旧日的战犯丢在他遭到灭顶之灾的地方也好啊！

可是，汽车穿过了碾庄的街道，向西北方向折去。

申公秋完全绝望了！这不是向着凤凰庄开吗？他不能想像，他怎样再见杜玉凤？如果1948年的申公秋还是个不明身份的伤号，现在却是打上了明显黑印记的敌人——连不懂事的孩子都可以向他吐唾沫、掷西红柿的人。

在绝望中，他还存有一丝侥幸，他把头掉向一个披雨衣的女青年。

这个女青年看上去不过20岁，表情极为严肃。别人都喊她小刘。这种脸上没有阴晴的面孔，申公秋见得多了，都是些被严肃的阶级斗争观念充塞了头脑的人。阶级斗争的那根弦既然一秒钟都没有松弛过，当然就不苟言笑了。

她和另一个40多岁的人，是专程赶到徐州去接收“垃圾”的。

申公秋向姑娘凑近了点，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问道：“请问同志，我、我们是到哪里去呀？”

“谁是你的同志？”姑娘声色俱厉地训斥道，“少乱说乱动！送你到哪儿就是哪儿！”

申公秋哑口无言，本来是自讨没趣嘛！他索性听天由命算了，连抚顺战犯收容所都呆过十几年的人，到哪里又有什么关系？

申公秋闭起眼睛，什么都不再看了。

又走了一程，卡车终于停住了。

这是一个只有一条街的小村庄，村口有一棵枝桠交错、有着伞盖样树冠的老槐树。看样子这棵老树遭过雷殛，左边有一根枝桠焦黑干枯，一片叶子都没有。

申公秋的心都快冻结了！他认得这棵老槐树，这正是他最怕重游的凤凰庄啊！可命运偏偏同他作对，真的就把他抛在这痛苦的渊薮里了。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正赶上村子里小学校放学，孩子们都围上来瞧热闹，他们比比画画嘻嘻笑着，那神情同在动物园里观看猴子差不多。

在持枪民兵监押下，他们十几个各种名目的“垃圾”跳下车，提着被雨水泡得水淋淋、沉甸甸的行李卷，在汽车前面排成瑟缩的一列。

孩子们开始动武了，稀泥饼子向他们摔过来。个子高大的申公秋因为站在排头，首当其冲，立时脸上沾了几团泥巴，成了大花脸。他们没有人敢动一动，“好人打坏人活该”嘛！

负责押送的人到大队办公室去了，他们在交涉。小小的凤凰庄怎么能住得下这么多“黑帮”？何况此前已经从扬州地区、盐城地区来了一批“走资派”了！真是大有“鬼满之患”。

于是，大队长发火了，又拍桌子又跺脚：“我们凤凰庄又不是泔水桶，什么脏水都往我们这儿倒啊？”

里边在吵，外面的黑帮们只好规规矩矩地站在雨地里挨淋。

天已经麻麻黑了，“黑帮”被挑走了大多数，只剩下3个人，其中就有申公秋。

哪家都不愿意没事找事，拉个坏人去住。一定得起到“监视”敌人的作用，那大家也都宁愿领一个罪行轻一点的。大概算来算去，战犯是最惹人恨的了，特别是在淮海旧战场，人们还没

有淡漠战争的灾难。所以申公秋剩在最后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直折腾到晚上 10 点，申公秋还站在老槐树下。看热闹的孩子早已感到单调乏味，跑回家去吃热饭了。只有一个民兵躲在大队部的门斗里，远远地看着他。

雨早停了，起了风，申公秋感到冷得钻心，还不如下着雨好受。他又饿又累，几乎要站不住了。哪怕允许他倒在泥水坑里，他也会幸福地睡去，像 18 年前趴在村外雪地上一样。那时，还有个杜玉凤，糊里糊涂地把他救到地窖里去，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即使杜玉凤还活在世上，她还是不是像从前一样有一颗善良的心？不，不可能！可是，她事后知道了我申公秋的身份，那个托人捎到抚顺的包裹，和夹在包里的一句话……啊，他摸不清她怎样对待那一枪之仇……幸而凤凰庄的人没有认出，他就是当年的申公秋！农民是不善于记人名字的。

又过了好一阵儿，大块的云团开始在天际迅跑、消散，一弯上弦月像一把镰刀出现在天幕上。

有两个黑影向申公秋走来，从他们边走边谈的话语中，申公秋听出是一男一女。

女的站在申公秋十步开外，没有再往老槐树下靠近，男的走上来，对申公秋说：“跟辛嫂走吧！你可要老老实实改造！”

申公秋抬起眼来看看披着一件蓑衣的辛嫂，看不清她的面影。他迟疑地迈了一步，却见辛嫂踏着泥水在头里走了。她光着两只脚，挽着裤腿，腰里扎着花带海昌蓝土布围裙，脑后盘着个馒头状的大发髻，典型的苏北农村妇女装束。

进村不远，申公秋忍不住向后趟街张望：在一片池塘坝边上，原来是有三间破旧灰瓦房的，那是杜玉凤的房子旧址。可现在在那里矗立着扬水站泵房，旧时的痕迹已荡然无存。申公秋不禁有几分凄然。

辛嫂住在村子最东头，和大片房屋拉开两百步的距离，她有

三间正屋、两间厢屋，都是红砖砌的，房顶扣着青瓦。这里倒很幽静，房后种着一丛茅竹，房前是一片菜畦，即或在月下，你也能看出主人是过日子的能手，菜地里井井有条。

辛嫂只顾在前面走，一次都没有回头看他一眼。大概是不屑一顾吧——申公秋想。

辛嫂拉开了用竹篾条编成的篱笆门，门扇上爬满了牵牛花，绿莹莹的。

她直奔厢屋去了，申公秋不敢贸然跟进去，就站在房檐底下，檐流水滴滴答答直往脖子里灌。

厢屋里灯亮了，辛嫂叫了一声：“还没有冻够吗？进来吧！”

申公秋下意识地向着院子里环顾一下，除了自己再没别人，这才确认辛嫂是在叫自己，便提着湿行李卷跨进去。

这是一明两暗的房子，北屋是堆放农具和杂乱家什的，南屋除了有几个米仓而外，地下堆着好多用水浸泡过的竹篾子，看来女主人在这间屋子里编织筐篓之类。

辛嫂的声音是从南屋发出来的，那屋子亮着灯。

申公秋跨进门槛儿，只见辛嫂正背着身在收拾竹篾子，腾出窗下的地方，用两张竹凳接起来，搭成一个临时床铺。

申公秋想说句什么，总得有句话来搭讪啊，今后，说不定要永生永世住在这里了呢！可是说句什么呢？“谢谢”？万一人家要恼了呢？你是来接受监督改造的，又不是来做客，“谢谢”是你配说的吗？

想来想去，还是不说的好。多年来他已经变得快和语言绝缘了。语言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谁稀罕与他交流？除了在受审时向审判员回答“是”或“不是”而外，能供他选用的词语就实在少得可怜了。

申公秋为难地把湿行李卷打开来。除了裹在被芯里的枕头是干的而外，被褥捏一把能出水。他刚把行李放到床上去，从角落

里拿把竹扫帚的辛嫂走过来，瞪了他一眼，将行李扔了下去：“这能睡吗？”

这一次，申公秋听得十分清楚，这声音怎么这样耳熟？

他抬起了头，辛嫂抿着嘴也在打量他。

申公秋吃了一惊，哪里是什么辛嫂？这不分明是杜玉凤吗？她今年该有 40 多岁了吧？那清秀的眉毛，那黑漆闪亮的眸子，那有点自然向上翘起的嘴唇……一如从前，只是在眼角，已经有了几条细碎的扇骨形纹路。她怎么会是辛嫂？啊，是的，难道她不会嫁人吗？

令申公秋奇怪的是，杜玉凤并没有一点惊诧的表示，没有怨恨，也没有喜悦，用琢磨不清含义的眼光望着他。

啊，老了，是自己老得不成样子了！申公秋恍然大悟了，难怪她认不出自己了。认不出该有多好啊，省去多少烦恼，减去多少苦痛！可是，应当瞒着她吗？瞒过初一，还能瞒过十五吗？

良心发现的力量，有时候比逼供的威力要大得多。良心使申公秋大为不安。

他嗫嚅着试探地说：“你、你……难道……认不出我了吗？”

杜玉凤冷冷地望着他，说：“认得出来。人都在长进，20 年过去了，你怎么又犯了罪？我就不信，是狗改不了吃屎？”

申公秋低下头说：“我有罪。”

杜玉凤问：“你说说看。”

申公秋说：“我是战犯，残杀过革命人民……”

“谁问你陈芝麻烂谷子？”杜玉凤说，“你从前的事，我都知道，我问的是眼下。”

申公秋有点茫然，半晌才说：“特赦后，我觉得脱胎换骨了，可……我有罪……”

杜玉凤忽然明白了，连历史上清清白白的老革命们都游了街，更不要说他这屁股底下不干净的人了。

杜玉凤漆黑的眸子里似乎投上一束暗影，她喃喃地说：“唉，没想到，每次见到你，总是……”下面的话，她噎住了，转身跨出屋门。

墙角的蟋蟀吱吱地叫着，叫得申公秋好不凄凉。杜玉凤那没有说完的话咬着他的心。“总是”什么呢？当然了，总是以不齿于人的敌人身份出现的。

当他跨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监狱大门的时候，那脚步是军人的步子，是透露着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气概的，他不孤单，范汉杰、杜聿明、黄维，这些人不是都在这儿吗？他那时没有想过要请谁宽恕，胜败乃兵家常事，申公秋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

申公秋不相信思想能够改造，正如他历来不相信国民党的“反省院”、“思想矫正院”有什么功效一样。

但是，在抚顺的日日夜夜里，没有人强迫他什么，他甚至挑衅性地提出要看“三民主义”丛书，人家都给他找来了。他们出去参观，进行自食其力的劳动……不知怎么回事，他的头脑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改变，这是后来他自己百思不解的。

是这样，他不是被政治改造过来的，他是被某种意识感化过来的。

难道他不应该上断头台的吗？

然而，他是保持着人的尊严活过来的。难怪他在被特赦出狱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痛哭流涕了。

他在文史资料馆的时间只有两年，他凭良心写了几十万字的资料，没有观点，只有史料。他相信的是“史料长青”的观点，那不过是附加的成分。然而，世上哪有根本没有观点的纯史料呢？有褒有贬、有扬有弃的史料本身，不就包含着笔者的倾向了吗？

一切都在重新开始，在申公秋接近晚年的时光里，人生的霞光正照耀着他……

然而，一切都要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年代里，申公秋不过是个死老虎，是逃不脱被否定命运的，人人得打上几拳，还要踏上一只脚。

他又由人变成了鬼，于是梦一般地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凤凰村来。

他正在胡思乱想，杜玉凤抱着一床被子、一床褥子进来了。是里面三新的，柔软、散发着新鲜棉花的气息，还是土织布的麻花面子。

杜玉凤替他铺好床，又找出几件男人的衣服，叫他换上。

申公秋见那衣服是小帆布的劳动服，就有几分奇怪。

杜玉凤说：“我丈夫的衣服。”她的脸红了一下，接着解释了一句：“婆婆过世后，我就……他在县城水泥厂当工人，逢年过节才回家，忙得要死呢。”

杜玉凤带上门出去了。

申公秋躺在床铺上，望着吊有塔灰的房顶，身子犹如驾云一般，轻飘飘的。他好像进了奇异的神话境界，又好像进入了小说家编纂的离奇情节中，一切都来得这么巧……

北京的抄家，政协大院门前的“站班”，“喷气式”以及从渣滓洞集中营文献里学来的新刑具……这些滋味都尝过了。他没有一点怨气。真的，连打败过他的陈毅元帅都没有逃脱“横扫”之列，他申公秋算个什么！

他没有过自杀的念头，从来没有过。真的，他是带着点研究眼光力求活下来，想看看结局的。

现在，他仿佛从刀山上被抛到了甜蜜而安乐的梦乡里来了，那不是蟋蟀在吱吱地唱着催眠曲吗？

杜玉凤还是那样善良，给他以安慰，给他以女性的爱抚。

母爱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记得8岁那年，他被巡长的儿子打碎鼻青脸肿，回到家里，妈妈研了一种红药末给他敷在创口上，

坐在儿子床前，用手抚着儿子蓬乱的头发，陪着他悄悄掉泪。啊，母爱，除了动物性的保护而外，母爱能给儿子反抗强梁的力量吗？但是，心灵是安适的、踏实的，正像此时睡在这散发着竹筏子清新味道的房子里一样，危险、凌辱和一切非人的折磨，都暂时远远地退到黑暗的角落里去了……

有时泾渭也能合流

新的生活是从甬河泥开始的。

凤凰庄四周到处是水塘、河道，河塘相连，牧鸭人从早到晚赶着成群的麻鸭顺水飘游。大概因为河塘里积了好多鸭粪的缘故，塘底的灰泥很肥，当地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甬一次，把一船船泥浆倾到田里去做底肥。

有着丈把长夹竿的甬具很不听使唤，从小没有种过田的申公秋使起来别扭得很。社员们每次能夹上一大堆河泥，他呢，费了好大劲儿，到头来只夹上盛不了一饭碗的一点。每逢这种时候，同在一个船上劳动的那个叫小刘的姑娘（就是专程到徐州去接收他们的人）便教训地说：“别偷懒，这又不是开机器，使力气就行嘛！”

申公秋不敢吭声。他怕这姑娘，她的嘴很挖苦，像刀子一样厉害。

据杜玉凤告诉他，这姑娘叫刘四新，是扬州城里红卫兵一个兵团的司令呢，是新下乡来插队落户的。因为她表现得好，县里早有风传，说不久就能把她抽回城去，说不定能结合到市革委会里当什么常委、主任呢。

刘四新果然与杜玉凤这种女性有着天壤之别。她不苟言笑，无论工作怎么忙，地头歇息时从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采野花、戏水，总是一本正经地坐在船头看书，当然是红宝书。申公秋常常

想，那 4 本书，她怕是能背下来了吧？

这并不夸张。每次她罚牛鬼蛇神们，从来不搞体罚，别出心裁地叫他们背红宝书。她真厉害，一张口就说：“背第一卷 180 页第二段！”

黑帮们很少有人背得下来，那么，她便替你背一遍，然后叫你背熟为止，否则饿饭、不准睡觉。

这使得申公秋很害怕，他小时候在私塾里就怕背“子曰诗云”。怕背书，这比怕“喷气式”还要甚十分。他总是讨好地多干些活，希图幸免那种独到的惩治。

可他干活比背书还要笨，因此，这种处罚又要常常降临头上。

今天，申公秋虽然累得汗流浹背，到傍晚总共甬了不到两担河泥，刘四新就罚他在老槐树下背《愚公移山》。交代完了，刘四新自己走了，一点都不担心申公秋耍滑。

申公秋摒绝了一切杂念，背呀背，从日落背到月亮升起，讨厌的长腿蚊子竟像泥点子似的糊了他一脸。

有人拿毛巾替他赶开了蚊子，剩下几道细细的血流在脖子上流动。

申公秋转过头来，原来是杜玉凤。她什么都没说，把一个大沙锅放到槐树下，转身走了。

啊，冒着热气的大沙锅，又是煨在一个热水陶缸里，诱人食欲的鱼圆子、荸荠浮在汤上，还有烤红薯和一沓千层饼。

申公秋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

这时，穿着退色黄军装的刘四新又转了回来，她身后跟着一个梳短发的女干部模样的人，看上去不超过 40 岁，可能平时保养得不错，脸很细嫩，只是有几分憔悴。

不用问，这女干部也是下来改造的黑帮。

女干部也被带到大槐树下，她被罚背的科目是《敦促杜聿明

投降书》。

女干部惟惟。

刘四新又昂然走去，说不定又去叫哪个黑帮了。

申公秋情不自禁地看了女干部一眼，恰好女干部也在打量他，四目相视，双方各自吃了一惊，都不觉向后退了一步！

是她？苏岩？

是他？申公秋？

一点都不错！这两个当年在凤凰庄决斗过、誓不两立的仇敌，今天又相会在大槐树下。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斗了几十年，却斗到一起来了。身份一样、处境一样，都是受刘四新管制的敌人！

这是历史对人的捉弄吗？

申公秋不知为什么，有点替她委屈。记得昨天他还向杜玉凤打探过苏岩的下落，为什么问起她，连申公秋自己都莫名其妙。

杜玉凤听到他的问话，只是苦笑了一下，说：“解放以后，她当了几年邳县县长，后来调到省公安厅当过副厅长，1962年调到盐城地委当了地委书记。她本来应当很知足的，丈夫是个长征老干部，原是军区的副司令员，后来当了副省长呢。她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家里有保姆……”

杜玉凤说的都是史有前例的陈芝麻烂谷子。史无前例以后的事，她始终没有吐口。直到她起身要去舂米时，才又补充了这么一句：“你要想见她，也不难的，不过……你不能当小人！谁没有个三长两短的呢！”

这个闷葫芦叫申公秋闷了好几天。听杜玉凤的口气，苏岩是倒了霉的。是呀，连国家主席、省委书记都成了“走资派”，更何况一个地委书记呢？为什么杜玉凤要说“不能当小人”的话呢？莫非苏岩就在这附近住？

今天证实了，他们不过是咫尺天涯，同是天涯沦落人。

申公秋很想同苏岩说几句什么，找来找去，都不大合适，既不能不合时宜地祝贺重逢，又不能劝人家好好改造，说什么呢？

沉默了好久，申公秋倒是冒了这么一句：“你……还记着过去的事吗？”

这话显然不那么得体，苏岩愣了一下之后，忽然动了肝火，她冷冷地说：“什么意思？你以为过去我们不一样，今天反正一样下场了吗？这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员和战犯永远不会坐到一条板凳上！我挨了斗，那是暂时的。苍蝇永远不会是战士。”

言下之意，申公秋挨斗则是永远的了！他感到这话不无道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即使在黑帮的营垒中，也有天生的左派势力啊！

大概为了表明泾渭分明，苏岩不再理他，躲到一边去背书了。

申公秋木然地站在树下，蚊子列成强大的阵容向他攻击，他忘了去扑蚊子、忘了去吃饭，甚而忘了背书。他不知是悲哀还是痛苦，听着她那虔诚的朗朗读书声，申公秋真想说：“《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应当拿来叫我背，你应当背的是《论持久战》。”不是吗？这场斗争本来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这不是在“敌人”营垒中也在继续着吗？

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等回到住处时申公秋才弄明白，苏岩原来也住在杜玉凤家，他占了上房的西头，比申公秋下来早一个月。

18年前，两个伤号，一个住在房里，一个躲在红薯窖；18年后，两个没有伤的人，又集合到杜玉凤的篱笆院里，真叫人难堪。

从那以后，苏岩时刻保持着同申公秋的距离，她拒绝与他同桌就餐，即使在一起劳动时，她也一定保持缄默。

申公秋只能尊重她的这种天生左派的心理，对他来说，反正

都是无所谓的。

杜玉凤却显得不那么舒服，有好几次她都试图在他们之间沟通一下，可这种努力都白费了。

那是中秋节的晚上，队里总算取消了原定的“夜战”。那晚上天始终阴着，没有月亮没法去修梯田。杜玉凤借着难得的休息机会，拿出了一些苏北家乡菜，加上丈夫也回来过节了，想一道请两个冤家。在她看来，人怕见面、树怕剥皮。本来，她的丈夫是持不同政见的，他吸着烟，沉吟着说：“怕不妥当吧？不要让人家知道了，又是划不清界限啦。再说，他们俩，那是一个属水，一个属火，相克的，永远聚不到一块。”

杜玉凤说：“瞧你说的！解放这么多年了，人还没个变化。冤仇宜解不宜结嘛！这不是运动整到一起来的吗？”

丈夫是个厚道人，拗不过她，同意了，而且派啃着枣泥馅儿月饼的小儿子阿锁到门外去望风。

杜玉凤费了好大劲，才算把苏岩劝来了。

当苏岩跨进东屋，一看申公秋垂着头坐在屋子里，她二话没说，扭身就走。杜玉凤追出来，在堂屋里扯住了她：“这是怎么说，在一起吃顿饭，又伤不着改造。你们在饭桌上别提正事，不就结了吗？唉，那老头子够惨的了。听说，他在战犯监狱里住了十好几年，等他出来时，媳妇早带着孩子改嫁了，剩下他孤苦伶仃一个人……月圆时节，人最容易思亲，大伙儿一块喝两盅，就忘了忧愁了。”

苏岩叹口气说：“你不懂啊，玉凤姐姐。你别看我现在和他打到一块，可毕竟是本质不同。一个共产党人，受再大的委屈也不能忘了立场。”

杜玉凤还能说什么呢？既然立场和人情是冰炭般的难容，她就毫无办法了。

中秋节后，从县里不断刮来小道消息，说要成立革命委员会

了，罪轻的干部有可能选一部分进“三结合”。

这些天，苏岩少说冲杜玉凤多要了2斤棉籽油，天天熬到大半夜，写啊写的，一沓沓材料都交到大队办公室去，那里有人管他们黑帮的专案。

苏岩有了点笑模样，她偷着告诉杜玉凤，说她丈夫已经从泰州五七干校回省城了，很有可能当革委会副主任。

杜玉凤替她高兴。她是相信“夫贵妻荣”这条理的。怎么不是呢？能够由于丈夫犯法妻子受牵连，就不能夫贵妻荣吗？她算计着，苏岩快从这凤凰庄拔出腿去了，说不定官复原职呢。为讨个吉利，杜玉凤特意从菜地里割了一绺黄韭菜芽，给她包了顿饺子。

政治风云的变幻，可不像看图识字那么容易。

有一天，杜玉凤担着从队里分得的一担糙米赶回家来，听见西屋里有呜咽的哭声，就赶紧放下箩筐，跑过去拉开房门，只见苏岩两眼哭得像一对胡桃。地当间站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杜玉凤猜到，这男孩一定是苏岩的儿子孙垣了。

果然不错。苏岩的儿子专程跑到凤凰庄来，不是报喜，倒是报忧来了。

原来3天前，苏岩的丈夫突然被逮捕了，罪名是破坏“三结合”，是哪一派的“摇羽毛扇的角色”，还有反对“三支两军”的种种罪行。

苏岩大病了一场，只几天的工夫，就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她的一切希望都付之东流了，眼前琢磨不定的希望之火灭掉了。

苏岩该怎么办呢？家里只剩下一个14岁的男孩、一个8岁的女孩，他们要生活、要糊口，可她每月只有15块钱的生活费。原来她是抱有希望的，她把抄家后剩下的东西都托人变卖了，应付过了暂时的艰难。现在，她回城去已经是遥遥无期了。

杜玉凤为难了好一阵儿，劝她说：“我进城去，替你把孩子

们接来吧。吃糠咽菜都顾不得挑拣了，总比饿肚子强。”

苏岩死活不愿意。她舍不得离开孩子们，却又不愿意让孩子生活在自己身边。这以前，她这个做妈妈的，是以令孩子们在人前骄傲的姿态出现的。她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怎么能是现在这副样子？她可以在千人、万人面前做“喷气式”，那都无所谓，却惟独不能以受凌辱的姿态出现在儿女面前。

杜玉凤这可犯愁了，她惟一能够慷慨奉献的，就是地瓜干儿，她没有余钱。去年为了盖这几间房子，丈夫在水泥厂互助储金会那里挂了800元的欠债，至今还有一半没有还上，丈夫每月去了伙食费，几乎要全部扣掉，她连吃盐都靠卖几个鸡蛋应付，没有一个钱能支援苏岩母子。

那天晚上，杜玉凤搂着小儿子阿锁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后来，她听见有人拍打窗棂的声音，就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点起墙洞里的油灯，问道：“哪一个？”

是一个低哑的男人声音：“是我，对不起，打扰你了。”

她听出来了，是住在厢屋里的申公秋。她相信申公秋一定有什么要紧事，不然他不会半夜三更来讨人嫌的。

杜玉凤迅速穿上衣服，拔去门栓，问道：“有事吗？”

申公秋站在门外，不肯进来，他吞吞吐吐地说：“我、我都知道了，苏岩的孩子来过……”

杜玉凤说：“进来说吧，外面凉。”

申公秋这才随她走进屋子。

他告诉杜玉凤，他知道了苏岩的遭遇，他说：“我……想帮她一把，可是，我的身份不合适，所以想拜托你……”

杜玉凤明白了。她的眼睛湿润了，望着面前这苍黑而衰弱的面孔，她一下子想到了20年前的情景。他那时虽然受伤了，却仍然保持着高傲的、不可一世的神气，就是在菜窖里同苏岩格斗

的时候，他都带有盛气凌人的架势，杜玉凤曾经暗自思忖过：真是一头受伤的野狼，狼性是难改的呀！

可是你瞧，他现在呢？眼里流露出来的不是充满同情心和人道的光焰吗？

杜玉凤差点激动得要扯住他的手了！谁说人的秉性是天生的？谁说铁石心肠是不能软化的？你看，20 年的风风雨雨，不是把他的心泡软了吗？

申公秋看出了杜玉凤是高兴的，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印花手绢包，往她手里一塞，说：“拿去给她吧，不过，永远不能说是我的。”说罢，一闪身，走了出去。

杜玉凤不用打开那印花手绢，也能猜到里面包的是什。他只觉得那沉甸甸的小包热得烫人。

这包东西，杜玉凤熟极了，那印花手绢，还是她的东西呢！

杜玉凤呆呆地坐到灯下，把手绢包放到针线箩里，轻轻打开，有两件东西在灯下闪闪发光。

果然猜得不错，一块航空夜光表，一只钻石戒指。

这正是 20 年前杜玉凤中了枪弹以后进手术室前，申公秋从手上撸下来塞到她枕头底下的。那阵子她处在昏迷之中，她没法拒绝。

两个月后，当杜玉凤带着航空表和钻石戒指走出台儿庄军医院时，她心头像压了一砣重债。

她只知道表和戒指都是珍贵东西，却不知道它们的真实价格。有一个护士看过这两样东西，吓得吐出了舌头。她是有资格说话的，她的父亲就是镇江一家金银首饰店的手艺匠。据这个护士说，这块航空表，诨号叫空中霸王，至少值 800 万（旧币），那枚钻石戒指的价格，怕要值到航空表的 10 倍。

杜玉凤拿着这两件东西，像两手捧刺猬一样难受。她是感激申公秋的。将心比心嘛，他扔下这两样东西是为了表示答谢。可

是杜玉凤如果无声无息地收下，岂不等于说“施恩图报”吗？

后来她决定送还给申公秋。

左邻右舍的人都笑她太傻气。她不管，她有她自己的生活哲学。

她打听到申公秋被监押在抚顺监狱。于是，她趁一位地方干部出差东北的机会，把表和戒指用印花手绢包着，盛在个木匣子里，外面又包上一层又一层的布条，托他捎到了监狱。她还求人写了一张字条，信上就是一句话：好好改造。

当然，监狱里的规矩是不允许战犯们身边保存钱钞和贵重物品的。这两样东西被造册后拿走了。申公秋只见到一张小字条。以后直到申公秋被宣告大赦后，才又交还给他。

这两样东西，经过了一番奇异的旅行后，20年后又回到了杜玉凤手上。这回，不是给她的，而是通过她，去资助他的仇敌。

啊，这是怎样的一颗心啊！

爱的残酷报复

吉普车在公路上行驶着，时断时续的记忆忽而像飞速扑来的景物一样反映到申公秋的脑海里，忽而又像甩在车轮后的尘埃一样渐渐远去。

左前方，那躺在天地间的翡翠样的是池塘吗？啊，是的，那水多么平静？蓝汪汪的水面倒映着天上的浮云，倒映着一个洗衣少女的倩影。吉普车的马达声大概惊扰了她吧，她用沾着水珠的手捋了一下乌黑的鬓发，带有笑意的脸向着车子开来的方向瞩目的。

自己的女儿，如果活着，会不会像这女孩子一样坐在这水墨画一样的地方浆洗衣衫呢？啊，会的，会的。

那是什么？为什么平静的水面起了一层层浪环？浪环的中心，不就是埋葬着他最后一点爱的位置吗？

不，他从来没有施人的爱，也没有得到爱的权利。

申公秋痛苦地双手捧起了头。

司机为了加点水，停住车子，提了一个三角形铁桶跑到湖边去了。

申公秋想下车，却又怕下车。那清亮亮的秋水，留在他记忆中的只是一片凄凉惨淡！

那是 1968 年初冬的事情，大概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吧！

有一天，踏着夕阳斜晖积肥归来的申公秋刚走进院子，听到一片欢笑声。他看见，一群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都凑在院子里，有人在用开水焅鸡毛，有人在洗冬笋，正房灶间透出一阵阵炒菜的香味。看他们热热闹闹的样子，像是要庆祝什么喜庆事。

一定是这样。每当有一个小青年抽调回城，不管是进工厂还是去当兵，大家准到杜玉凤家闹闹嚷嚷地来聚一顿餐，杜玉凤永远是送往迎来的“福星”。

今天又是为哪个来饯行呢？

申公秋没有去讨嫌。这一切本来与他没有关系。

他放下手里的鸭嘴锄，到后院塘边洗过脸，就回到厢房去了。

已经到了掌灯时分了，还不见杜玉凤给他送饭来，莫不是忘记了吗？这是没有先例的。自从他住进了她家，即使她卧病在床的日子，她也没有忘记叫阿锁给他按时送来饭菜。

事实证明了申公秋的判断，杜玉凤显然是有意这么做的。

门轻轻地推开，原来是多次罚他背书的刘四新亲自提了个竹制食盒跨进厢房。看样子她喝了酒，脸蛋红扑扑的，带有三分羞。

申公秋吓得不知所措，连忙站起来。说心里话，他怕新一代的人，尤其怕这个小姑娘。

但是，大概判官的脸也不永远是阴着的。你看，刘四新的脸色多么晴朗！她还带着几分和气呢。

她摆摆手，把食盒放到竹桌上，说：“现在用不着害怕，我是给你送吃的来了。”

虽然没有危险，申公秋仍然心有余悸。他猜到了，是这位姑娘的喜庆事，说不定像传说的那样，她马上要进城去参加“三结合”的新领导班子了。申公秋虽然不能理解像刘四新这种全新类型的新一代，可是他也挑不出毛病来。看上去，她是冷峻的，可是对领袖那样虔诚；他除了用基督徒对上帝的虔诚来类比而外（当然他自知这是极其反动的了），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形容。他申公秋从前对他的蒋校长也是差不多达到了顶礼膜拜程度的。

申公秋能够理解，一个人，一个民族，没有信仰，那是不能想像的。连最原始的部族，不是也有图腾的崇拜，不是也有拜物教吗？而况现代人？

不过，这并不包括他本人，他已经什么都信仰不起来了。

他拿起了筷子，却希望刘四新快快走掉，去加入到正房的欢乐人群中去。你听，他们大概在酒桌上唱语录歌吧！

奇怪，刘四新却没有立即走开的意思。她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她笑吟吟地说：“吃吧，你想要一点酒吗？”

申公秋惶惑地摇了摇头。他已经好多年不喝酒了，惟一破戒的一次是在他被大赦的那次宴会上，喝了半瓶辽宁的凌川白酒，喝得酩酊大醉，却没有说一句走板的话。

申公秋像在后娘监视之下吃嗟来之食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吃着米饭，夹着爆炒牛肚、香菇卤鸡，不时地瞟刘四新一眼。

这姑娘的心情好像格外好，她当真给申公秋端来一碗米酒。

申公秋十分纳闷，这种样子才是这姑娘的本性吗？人的本性

可以掩盖起来的吗？像元宵节跳大头人舞一样，在头上扣上一个假面具？

刘四新今天的话格外多，她不是用平时那种训斥五类分子的口气、腔调，倒像在同他拉家常，虽然那内容并非家常。

她说：“我要走了，希望你好好改造。你的表现还算好。你不应当有抵触情绪。你想想，碾庄后山上千座烈士墓，他们不是死在你们的屠刀下的吗？人民没有杀掉你，除了拿你做个活标本外，还有一条，那就是要拯救你，让你重新做人，七斗八斗，总会把你斗过来的。”

她是一片好心，申公秋从那对诚恳的眼睛里看出来了。他明白，七斗八斗不过是泛指，他自己被斗过七百次、八百次怕都不止了。“活标本”，这不太好听的词汇，他也能接受得了。他除了是“标本”而外，还能是什么呢？

女孩子临走，特别嘱咐说：“千万要好好改造。就是不为你自己着想，也要为你的子女着想啊！你没有权利让你的后代跟你背黑锅。当然了，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不惟成分论了……”

她还说了些什么，申公秋却一句也没有听清。

她走了，又加入到上房欢腾的人群中去了，扔下他孤零零的一个。

是的，他是世界上最孤零的人！

他有过妻子，然而没有过爱。他娶了她，只不过把她当成将军的夫人，一种人生必不可少的程序，一种丈夫尊严的装饰！她漂亮，她一个字都没有违拗过他。然而，申公秋并不了解她，他只把她当成女人——和烟花柳巷的任何女人一样。只是因为一种习惯的势力，他才不得不有那么一个家。

他有过孩子，长子夭折了。他那时正在前线，他没有掉过一滴泪，没有写封信去安慰妻子。他是将军，一声命令，一个早晨可能倒下去一万个人，一个小生命对于他，不当回事。

他还有过一个女儿，是在淮海战役炮火中降生到人间的。那时他所带的 25 军正向运河大桥挺进，军务匆忙，他只尽了一个义务，为女儿起了个名字：申圆圆，便派人把她们母女送回南京去了。

刘四新的话，对申公秋来说，那是一顿棍棒，她并不了解申公秋的底细。刘四新有多幸福啊！她有一个印刷工人的父亲，她家履历表是洁白而没有半个污点的，在一切“有无被镇压、被管制、被处分”的栏目中，她都可以大笔一挥，填上个“无”字。

申公秋有儿女吗？也许有，不，没有了。他从抚顺出来到北京就职的时候，他想请上半个月假，回南京去探亲。他下过决心，要用一百倍的悔过之心，去补偿对妻子、女儿欠下的感情债。

然而，他用不着去还这笔债了。在他动身之前，统战部的副秘书长去找他，委婉地向他说明了真相：他的妻子带着女儿，早在 1949 年 6 月，就改嫁给一个工人了。

他曾经痛苦过，却自知没有半点理由谴责妻子。过去的年代里，妻子除了作为摆设和附属品从属过他而外，他给过她什么呢？对了，还有打骂！离开一个万人切齿的战争罪犯去找寻自己的出路，那不但是法律所允许的，也本来应当是道义所允许的。

听了刘四新的劝告，他没有一点负担，有的只是庆幸。他宁愿永生永世不去认他的亲生女儿，让她在清白的地方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把痛苦留给自己一个人好了。幸好妻子带着她另嫁他人，否则，一个战犯的女儿，可能早就在沉重的空气里窒息了！

他居然喝了那碗甜米酒。

他觉得有点头重脚轻。这么一点米酒就能醉倒他吗？从前，他是诨号“海量将军”的呀！

看来，什么都能够退化呀——他这样想。

躺在铺上，听着上房不断传来的喧闹声，渐渐沉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早，他早早起来去拾粪，还要挨家挨户去搜集夜壶里的人尿。

走到街口，他看见好多人在为刘四新送行，连苏岩都跟在后边。

队里把惟一的一辆二八拖拉机开出来了，散热片前面挂着一朵纸扎的红花。穿着一身褪色军装的刘四新正和人们握手告别。

申公秋本想低下头走过去的，可是刘四新叫住了他：“申公秋！”

“有！”他习惯地垂手站住，脚旁放着蒸发着尿臊味的脏桶。

刘四新又是平常那副严肃的面孔了，好像昨天晚上的她，只不过是演戏！

她毫不客气地在对他进行最后一次义务教育：“你听着，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如果不是说话，这里本来要用黑体字的），你要老老实实改造一辈子，不要走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是！”申公秋答应着，连大脑都不用通过，说：“我有罪。”

“去吧。”

从那以后，申公秋的身边少了一个影子，消失了他已经习惯了的训话声音。

有一天，申公秋到塘边给队里的猪割最后一茬青草。已经立冬了，说不上哪天，下一场雪，草就要枯死了。

他已经是人人放心的劳改犯，没有人担心他自杀，也没有人怀疑他会逃走，他是个可以“放单飞”的人。

他佝着腰，一气割了两担猪草，当他在池塘边洗净腿上的泥，准备担起猪草担子回庄时，他忽然看见离他百十步远处有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水塘边，手里拿着一根茅竹梢，在平静的水中随意地搅来搅去。

那是谁呢？申公秋的眼力不行了，他看不清面孔。但辨得出

是个女孩子，依稀是穿着黄军装的，是褪了色的。他觉得那身段有点像刘四新。不过，他马上自我否定了。怎么会呢？刘四新此时早就坐在扬州市革委会办公大楼的椅子上了，不，这会儿早已下班了，说不定在瘦西湖边散步呢。

申公秋吃力地担起湿漉漉的猪草担子，向村子走去。

今天有点奇怪，凤凰庄的人都三三两两地聚到一起唧唧喳喳，好像庄里出了什么大事、奇事，特别当申公秋担着猪草走过别人身边时，人们交头接耳的神情更显得神秘了。

申公秋是消息闭塞的人，除了收听“最新最高指示”，他能与别人同时收到电波而外，其他消息一概是迟到的。话又说回来，他也不关心这些，哪一派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哪一派进京去上访，某个文革成员发布什么命令……这些距离他都十分遥远。

申公秋把猪草卸到猪栏里，拍掉沾在身上的草屑，正要往回走，杜玉凤有几分慌张地推开猪栏的木栅门闯进来，扯住他的袖子，说：“我到处找你，你原来在这儿。”

“有什么事吗？”申公秋有点奇怪地望着杜玉凤，她的鼻子尖上沁着细密的汗珠。

你见到刘四新了吗？就是……那天给你送酒喝的那闺女呀！”杜玉凤急切地说道。

“她？”申公秋茫然地答道，“不是回城了吗？”

“唉，”杜玉凤用快要哭出来的腔调说，“她又回来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申公秋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来了，方才在水塘边看见的那个姑娘，这样说来肯定是刘四新了。

这时，猪场的饲养员裘阿根老头来喂猪了。在这里说话不便，杜玉凤向申公秋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就脚前脚后地回家去了。

杜玉凤没有回到上房去，明明见到苏岩在院子里磨镰刀，她

也没打招呼，随着申公秋进了厢房。

杜玉凤坐到椅子上，未曾说话，先滴下泪来。

申公秋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怔怔地坐在床沿上，望着她纳闷儿。

隔了一会儿，杜玉凤告诉他说：“真是晴天打雷呀！这孩子怕受不住啊！听说本来她当市革委会常委，令都下了，又不算数了。”

“为什么？”申公秋追问了一句。

“还不是因为你！”杜玉凤又是一声长叹。

“因为我？”申公秋莫名惊诧。

杜玉凤说：“进革委会的人不是要审查过筛子的吗？四新叫人家给审下来了，没等用查祖宗三代，第一关就没漏过去！她的生身父亲是国民党将军，是战犯！”

轰地一声，申公秋眼前一阵金星乱进，头像炸开了一样。

他一切都明白了！

刘四新便是申圆圆，便是他直到人生暮年才日重一日地思念不已的女儿！

然而，刘四新和他的申圆圆真会是一个人吗？他感到这两个影子无论如何重叠不起来，像水与火，像冰与炭！可是，他的申圆圆又该是什么样子呢？他醒里梦里曾有过多少费尽心思的想像，仍旧徒然，除了女儿刚来到人间啼哭的样子而外，没有半点具体的印象。

就父亲的本心来讲，他无论如何不敢设想，女儿会是像刘四新那样生活的。不，刘四新不就是他又想见到、又怕见到的亲女儿吗？

申公秋曾经为子然一身而凄凉苦恼过，但这时日并不多，后来，他倒为自己不牵挂任何人而感到慰藉、安实了。几天以前，

他还向冥冥祝福，祝福那脱离了他这潭污泥塘，拔步找到了向阳草木而栖的女儿——虽然他不知道女儿究竟在何方。

说心里话，他在夜里不能成眠的时候，常常产生离奇古怪的念头。他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出去暗中寻访该有多好啊！他不求找回永远失去的父女之爱，更不敢奢望女儿会认他这个爸爸，他只希望远远地看上女儿一眼，知道她是幸福的、不被人欺凌的，他就心满意足了。虽然，这对他来说，未免是残酷的。他不怨天、不尤人，谁让自己种下苦果了呢？

对刘四新，他敬畏，却并不喜爱，他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去喜爱。他总觉得申圆圆会是另一种样子，贤妻良母式的，还是纯东方型的？反正不会是只会讲斗争的……

然而，老太太狠毒了，他的圆圆居然就是刘四新，不打一点折扣！啊，他感到周身发冷，现实像是严酷的第四纪冰河一样残暴地漫过他那破碎的心，旧的伤疤崩裂，渗出新的血来……

他实在受不住了！他为什么要在风烛残年知道女儿下落？女儿为什么偏偏是刘四新？天哪！生活为什么这样无情地惩罚他呀！

他瑟缩着，牙齿捉对儿打架。他忽然可怜起刘四新来！但愿她永远不知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生身父才好，不，这是不可能的，她怎么会不知道呢？天哪，她会受得住吗？一个刚刚走进人生社会的女孩子，一定经不起这致命一击的。几天前，她还在声色俱厉地教训她的老子，几天后，她却为这个不齿于人的战犯背起了黑锅！啊，当她知道，深恶痛绝的战犯申公秋正是她生身父亲时，她会不会发疯？

申公秋忘却了自己的痛苦，他好像看见了女儿那痛楚万状的面孔，女儿的安危压过了一切。

“原谅我吧，”申公秋耳畔这时响起杜玉凤那温和的语声：“我不是故意拿冷槌子敲你的心，实在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

我思忖了好久，除非你能够救她，别人，干着急呀。”

“我？”申公秋像听了怪诞离奇的事一样张大了嘴巴，不解地望着杜玉凤。

杜玉凤点点头，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到底是她的亲爹呀！”

申公秋痛苦无力地摇了摇头。他觉得杜玉凤是痴人说梦话。他申公秋能有什么力量？一个使女儿丧失一切的人，反过来去劝女儿想开一点吗？一个应当被女儿痛恨的父亲，却异想天开地想把痛恨化成爱吗？申公秋再愚，也不至于愚到这种地步。

他决定不认女儿，他对杜玉凤说：“这……一定是弄错了，我，从来没有过女儿，我不承认。”

杜玉凤苦笑了，她说：“你真愚呀！你不承认，就能救她吗？从城里回来，四新就不吃不喝，什么人都不见，成天在塘边转，我担心孩子想不开，要寻短见啊！”

一句话说得申公秋出了一身冷汗。他觉得有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地勒住他的心，勒得渗出了一滴滴的血，他痛苦得快呻吟出来了……

申公秋虽然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有半点用处，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杜玉凤出去了，申公秋心乱如麻。

他这一生，经历了人世间所有的坎坷，他都挺过来了。像今天这样使他无法承受的打击，还是空前的。

刘四新就是申圆圆？刘四新，那个总是穿着时髦的褪色黄军装、一本正经地看红宝书的女青年，就是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女儿应当是这个样子吗？莫名其妙！

他没有抚养过女儿，他没有对女儿施过半点父爱，他自然觉得无权要求得到女儿的爱，女儿也根本不会爱他的。相反，有的只是恨，比对从前毫不相干的战犯的恨还要强烈几倍！

他觉得女儿陌生得很，她和爸爸有哪一点共同之处呢？没有。除了在她的血管里流着的血，也许是属于申公秋的外，他与她，没有一点联系。

血统，难道可以传染政治立场吗？

申公秋不懂。他愤懑，他痛苦，他像一头困兽一样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杜玉凤来了，她悄悄告诉申公秋，说：“大家好歹把四新从村外塘边劝回来了，她两个眼睛都哭肿了。现在在她原来住的房子里，我把她的同伴都打发走了，你快去吧。”

申公秋答应着，却迈不动步子，两条腿像被牢牢钉在地上一样。他觉得这是天下最难、最痛苦的事了，大概比上断头台还要别扭。

然而，他不能推托，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孩子，像几天以前刘四新教育申公秋那样。不是为了寻找快乐，而是为了赎罪，像他一生所做的那样。

申公秋像害了摆子病的人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出杜玉凤的院子，低着头穿过一条林阴路，来到村子北面。那里是知识青年住的房子，是县里出钱给盖的。

刘四新住的屋子没有开灯，清虚虚的月光把梧桐树干树枝子的影儿投到窗上，横一道、竖一道，像是一片乱七八糟的网。

申公秋一走进院子，腿就有点发软，好歹算走到门口了，喘了好一会儿，伸手去推门，推不动，门从里面上了栓。看来这姑娘决心拒绝一切同情和劝慰。是啊，她什么不明白呢？只有糊涂人和精神脆弱的人才需求徒有虚名的安慰。

这样一想，申公秋又犹豫、后悔起来。可是，自己的使命又不单单是安慰，还有拯救！啊，一个沉沦的人居然要去拯救别人！

他又一次下了决心。即使她骂我，也没有什么，那毕竟是女

儿骂父亲，该是另一种滋味的，他什么样的诅咒和谩骂没有听过呢？亲人的责骂该是另一种滋味的吧？

他鼓起勇气敲门，敲了很久，都没有回音。

申公秋又转到了窗前，伸手去敲窗户，还是没有声音。

他有点害怕了，莫非她……

他忽然不顾一切地去撬窗户。

就在这时，通风窗哗啦一声推开了，露出刘四新那张脸来。

申公秋的心放了下来，但旋即又提到了嗓子眼。

那是怎样一张冷峻的脸啊！两条眉毛拧成个疙瘩，眼睛里放射出一股令他胆寒的仇视的光。

申公秋不由自主地退后一步。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倒是刘四新冷冷地发问了：“你来干什么？你的耳朵倒挺长啊！你是来幸灾乐祸吗？”

申公秋垂下了头，这凌厉的、审判式的质问把他最后一点余勇都打下去了。

刘四新冷笑着说：“你以为这回你可以来认女儿了吗？休想！我就是死了，骨头烧成灰，也没有一片灰是与你有关系的！你是人吗？你是一条狼！你害了妈妈，你还不够吗？”

申公秋发抖了，虚汗顺脸滚下来，他一阵阵心悸腿软。如果不是扶住那棵快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他几乎要摔倒下去。

“你说话呀！”风窗口的刘四新仍然在步步紧逼：“你准备好的话呢？还有眼泪炮弹呢？为什么不拿出来？”

“圆圆——”申公秋刚喊了这一声，突然又改了口：“不，不！我不是人，我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怎么会是申公秋的后代？这是绝不可能的。你去说吧，找他们说，没有这么回事！”

他一口气说了这许多，原以为刘四新会接着骂他的。不，他猜错了，刘四新伏在通风窗上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申公秋木呆呆地站在院子里，过了很久，听见刘四新迸着哭声说：“你走吧！”随后砰地一声，通风窗关死了。

几片落叶从树上飘下来，落到申公秋肩上，抖着，发出萧瑟的声响。

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支使着，申公秋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奔跑着，跑得快极了！

他一口气跑进大队办公室，不管开会的干部们是不是愿意听，也不管合不合时宜，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我不是刘四新的生身父亲！我向党保证，真的不是！这是搞错了，希望他们下来调查。求求你们，向扬州反映反映吧，我求求你们了！”

他说得口吐白沫，说得满脸淌汗，说得双眼流泪，到底晕了过去。

啊，他这个聪明人啊，却鬼迷心窍到这种地步！他连“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常识都忘记了。他的话，除了证实干部心目中将信将疑的事情外，没有半点作用。话又说回来，他们不过是种田人，即使在场的人百分之百举手，否决他与刘四新的血缘关系，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大队革委会能够做出任何市革委会常委的决定吗？

申公秋被架回了住处。

他发高烧，喊着梦呓，反反复复是那一句话：“相信我吧，我不是刘四新的父亲啊……”

一整夜，杜玉凤始终守在厢房申公秋床前，不断地拿凉手巾替他敷在前额上，她除了用这最原始的降温办法而外，一筹莫展。大队没有卫生院，即或可以到12里地外的碾庄去就医，还不是徒劳往返、碰一鼻子灰？半月前住在凤凰庄的一个“走资派”得了肠炎，她好歹说合几个人扎副担架送到碾庄医院，大夫一听是强制改造的黑帮，二话没说，揣起听诊器就走了。是啊，

红十字、药片与黑帮是无缘的，一片阿斯匹林，对于常人来说太平常，而对于敌人，那是无法想见的奢侈！

在昏黄摇曳的灯光下，杜玉凤不忍心去看那张颧骨高耸的蜡纸样的脸，这张脸与当年杜玉凤在风雪原野上救起来的那个人，简直判若两人。那时的申公秋尽管伤痛昏迷，那张油光闪亮的胖脸上却漾着一种盛气凌人的影像。而今，20年沧桑，这种不可一世的气质泯灭了，取代它的却是苍凉和绝望。无所求于人，无所求于世，成了申公秋木然表达的基调。

杜玉凤真正同情、可怜他，是自今日始，而1948年的救他一命，还算不得同情，那只不过是把他当成一个人，一个有罪的人。

杜玉凤是现代人，骨髓里却奇怪地搀和了一点古典民族的成分。她记得老人说过，古时候上法场就戮的死刑人犯，还给碗酒喝呢。在她看来，人只有一刀罪，没有饿饭罪、皮肉受苦罪。而且，她是坚信良心是圣水的人，她总相信良心、人的本性的圣水可以化开铁疙瘩！

申公秋不是由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变得通达人性了吗？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呢？是他往杜玉凤枕头底下塞那块航空表和钻石戒指的时日呢？还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日夜夜？抑或兼而有之？

不管是从哪一天起，申公秋不再那么可憎了，由可憎到可怜，是不是变得太过分了呢？

听着申公秋含糊的梦呓，杜玉凤感到撕心裂肺般地难受。世上的凄楚哀伤，莫过于生离死别。可是一般的生离死别，亲人还能够面对面地哭几声，让心底的泪泉喷放出来。惟有堵在心底闸门里的感情的潮水将心一块块地吞噬掉，那才是最难忍受的苦痛！杜玉凤心头的负荷一点都不比申公秋轻，她为这对面不相识的父女俩心痛得心都要流血了！

她能想像得出，申公秋心里的滋味，那也许比战犯服刑还要

苦上 10 倍。杜玉凤却无法想像刘四新此时此地的心理。当然，这孩子突然间从梦幻中的宝塔顶上跌到世上最不洁净的地方，绝望会比哀伤的成分多。可是，不认一个过去有罪的父亲就能再把那破碎的梦重新编织起来吗？

杜玉凤毕竟不是刘四新的同龄人，她对这过早成熟的姑娘谈不上喜爱，却也谈不上反感。在她们相处过程中，她总把刘四新当成一个没有血肉的影子看待，刘四新身上带有时代风云赋予她的一切痕迹。有时候刘四新到扬州去出席讲用会，一走就是半个月，杜玉凤常常努力去回忆这个暂时离开她的影子，可这影子却是那样模糊，没有吸引力，没有这个影子，她并没有感到过缺少什么……

现在，她却又怜悯起这个影子来了……不，这不是影子，这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只不过是用了另一种质料铸成的罢了。啊，真是怪事，难道女儿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她父亲的血液吗？这两条血管不是本来应当相通的吗？

杜玉凤是个识不了几个字的农家妇女，她不懂得什么深奥的人生哲理，她却有自己的执著信念，她从没怀疑过爱和人性的力量。然而，面对这两个陌路仇人般的父女，她有点动摇了，她不知道用什么力量能搬开阻隔父女情的那座看不见的大山。

申公秋沉沉地睡去了。杜玉凤悄悄地从床边站起来，她忽然又想到陷入另一种苦痛之中的刘四新，这一对受尽苦难的父女，她就是放心不下啊！

申公秋难得做一个好梦，梦里常常像镜子一样折射出白天发生的一切。

今天的梦却是反色彩的，他得天独厚地享受到了神话王国的乐趣。

你看，那是谁来了？啊，一个穿着轻羽一样白纱衣裙的姑娘正沿着花的草坪跑来，她眼波含笑，手举着野花……那不是他的

圆润吗？是她，她向自己跑过来了，她那小巧的嘴唇一张一合，在喊着什么，啊，听清了，那是一迭声甜脆的“爸爸”……

申公秋的心都碎了，他惊喜地打量一下自己，这时不知什么时候换上的新衣服，摸摸下颏，胡子也剃光了。“爸爸”，是冲自己叫爸爸呀！

他这个有女儿的人，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甜蜜的呼唤。人都说，年轻的男子，第一次听见孩子喊自己爸爸，高兴中总难免搀杂几分别扭的害羞。可是，申公秋是年过半百的人，他此时的喜悦是高浓度、没有半点杂质的。女儿那银铃似的喊声，像融着蜜糖和薄荷的泉水一样，漫过他那颗疮痍累累的心，清爽、甜蜜，掩盖了心上的伤痛……

申公秋跑起来了，他奇怪，平时步履蹒跚，现在怎么像腾云驾雾一样轻巧呢？

近了，父女俩只有咫尺间隔了，申公秋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拉住女儿那双擎着鲜花的手了……

突然，一道飞泻而来的泉水横在父女面前，顷刻间漫成一片无边无涯的汪洋。

申圆圆缩成了一个迷茫的小黑点，远远隔在汪洋一方。

申公秋嘶喊、奔跑，女儿的影子越来越迷离……

申公秋从梦中醒过来，心还在怦怦乱跳，出了一头虚汗。

他望着昏暗的油灯火花，明知道这梦像灯花一样不会久长，却不舍得让这梦境瞬息即逝，他反反复复地回忆着每一个细节，重温女儿的音容笑貌。

在平时，他从没看到过刘四新随便笑过，他曾怀疑这一代青年人是没笑神经的。可他觉得自己过分幸运，他居然发现刘四新——他的女儿本来也会笑的，笑得那样天真、那样甜蜜。这就足够补偿他那冷漠的心灵了，他还有什么多余的要求呢？

不，申公秋突然产生了一个近乎奢求的欲望：假如，在自己

呼出人间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能让女儿守在自己身旁送终，听完自己这一生的检讨，那有多好？哪怕她不叫一声爸爸都行啊！

不！申公秋马上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不能这样苛求孩子，她应当永远属于光明向上人群中的一个，她不当承认我这个只会给她带来耻辱和灾难的爸爸。

大概天快亮了吧？淡淡的鱼肚白色爬上了纸窗。

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杜玉凤刚从集体户的房子那里回来，她的脚步有点慌乱。

刘四新的住屋是空的。

杜玉凤心头突然被一种不祥的预感塞满了，她一路呼喊向村外跑去。

恰在这时，有几个小青年从村外慌里慌张地跑过来，村里往外跑的人都扛着浆板、大眼网和铁钩索。

杜玉凤感到心咕咚一沉，连发问的勇气都没有了。

一个姑娘扑到杜玉凤肩头上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大嫂……四新她、她……投塘寻短见了……”

杜玉凤只觉得眼前的树木、房屋全都摇晃起来，她栽倒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刘四新的遗体从东池塘里打捞上来了，她躺在一片枯黄的草地上。

她那雪白颀长的脖子向后仰着，一头浓密的短发湿透了，水珠从发际间点点滴滴地渗到草丛中。她的眼睛微微闭着，嘴却半张着，像是对着铅灰色的太空呼喊着什么，又像是同亲人说着永远说不尽的告别话。

不知为什么，杜玉凤觉得这张苍白的脸并不那么可怕，反倒不像这女孩子生前那么冷峻、理智。她该有多少诉说不完的爱和恨啊，如今，都随着那在人间存留过的影子一起去了。

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杜玉凤给好多人送过葬。她一次

一次地陪别人流泪、和别人一起哀伤，可那眼泪，一般都是同情和现场感染流下来的，真正痛切心髓的，莫过于这一回了。刘四新是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还没来得及展开花蕊，就这样凋零了。这到底应当归咎于谁？她爸爸申公秋吗？不，他是一个既没有能力施人以爱、也没有能力报人以怨的弱者啊……

围在刘四新遗体四周的人，大多数人都湿透了衣衫，无论亲近的、疏远的，还是年老的、年少的，都在黯然落泪。

有人提议，让申公秋来见见他的女儿，人死了，所有的仇疙瘩都烟消云散了。

可是杜玉凤无论如何不叫人们去告诉申公秋。杜玉凤几乎是用恳求的悲声向人们说下面这番话的：“让他心里留点希望吧，若不，他还怎么能活得下去呢？”

杜玉凤甚至要设置一场美好的骗局，让人们都同她一起撒谎，造成一种声势，说刘四新的问题又解决了，已经到扬州去上任了……杜玉凤了解申公秋的心，虽然他梦寐以求地想同女儿相认，可他更希望他的女儿挣出爸爸羽翼的阴影，飞向光明。那，他哪怕是听着也是高兴的。

却不料，这时有人扶着脚步蹒跚的申公秋向池塘走来。等杜玉凤明白过来，想拦挡也来不及了。

申公秋好像一下子老迈了好几岁。他的头微微摇颤，风吹散了稀疏的头发。他的目光是迟滞的，嘴半张半合。

人们轻轻地闪到两侧，申公秋看见了女儿的遗体。

申公秋像要仔细辨认死者，又像要多看女儿几眼一样，在刘四新身旁转了一周，默然地立了好久。

啊，这是真的吗？那么，梦里穿着白纱衣服的女儿呢？那个不苟言笑、专门罚黑帮们背语录的人呢？这几个概念、形象，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啊，这张苍白的脸，昨天晚上在风窗口露过的，那是因为愤

怒而变得苍白的脸。可是几个小时以后，这张苍白的脸，却再也不会表现愤怒了……刘四新在风窗口说过的话，尽管决绝、冷酷，可总比现在一言不发要甜蜜。

啊，她死了。死掉，就不会知道痛苦了。可是申公秋想像得出，女儿决定轻生的过程却是痛苦不堪的。

他恨自己，恨自己没能够把一切罪过全都揽到自己身上，恨自己不能够替女儿去死。他真想举臂呼天，大哭一场。他没有给过女儿半点爱，也没有得到过女儿一丝一毫的温暖。他从得到噩耗的刹那间，脑海中就一直盘桓着一个问号，到底是谁把孩子逼到这个地步呢？

现在，他心里突然明白过来，不是哪个人害的，也许就是刘四新那永远感觉良好的神经绷得太紧，反而容易断吧？

人们怀疑申公秋要疯了。

他没有哭出一声，没有流出一滴泪。他屈下双腿，坐到刘四新头前，把女儿的头轻轻扶起来，放到自己膝上，用颤抖的手梳理着她的湿发。

杜玉凤从发髻上拔下一柄月牙形牛角梳，递到他手中。申公秋仔细地、一下一下地梳理着……

突然，一丝笑容浮上了申公秋的嘴角，他仿佛看见女儿向她笑了，她好像在向爸爸悄悄说：“爸爸，只有我死去了，你才有权爱我，我才允许你当我的爸爸，因为，人间的烟尘刮不到这儿了……”

送殡的也有被埋的危险

水，还是那么蓝，山，还是那么绿，吉普车在路上行进。

申公秋坐在车里，头仰在靠背上轻轻地摇晃着。

旧地重游，对于心境好的人是一种享受；那么，对于在这个

地方损失太大的人来说，非但谈不上享受，反倒是一种痛苦。

申公秋是去挖掘记忆的坟墓，要看一看记忆的尸骨。到凤凰庄来，他是矢志不渝的。

现在，随着四个车轮的滚动，目的地在一步步靠近，他内心的伤痛也一点点加剧。岁月的车轮碾压着他的心。

他是约好苏岩同来的。她，是不是已经到了凤凰庄呢？

申公秋好像看见了一幢顶天立地的青石碑，比曲阜孔庙碑亭里的御碑都要雄伟。

碑，总是要有字的，写什么呢？

这是一个难题。申公秋和苏岩书来信往，至少有过十历次的磋商，至少想出过 20 种碑刻的方案，但没有一个满意的。

这倒不是因为申公秋缺乏文采，也不是因为苏岩没有激情，他们共同的慨叹是：世间竟没有一句合适的词能够概括一个平凡的人。是啊，太平凡了，没有哪一位作家肯以她作为写作的原型，没有哪一位画家肯以她作为创作的模特儿，也不会有哪一位记者肯为她写一篇报道。

啊，那凤凰庄该是枫叶醉人的时刻了吧？坟头栽的一圈三角枫树该长大了吧？

啊，那长眠的伟大的灵魂！

凤凰庄留给申公秋的精神负担太重了。他活了快 70 岁，走过大半个中国，可他一生带有转折性的重场戏，全都是在凤凰庄那个小小的舞台上演出的。

那高潮的一幕，是不能叫人忘怀的。戏剧的高潮通常即是结尾了，申公秋的高潮戏却仅仅是序幕而已。

申公秋和苏岩，一直是活动在凤凰庄舞台上的男女主人公，真正的导演却是杜玉凤。

苏岩的处境越来越不好。她丈夫在坐了半年牢以后，被秘密送走了，不知下落。随着时间的流逝，苏岩重新工作的梦一天天

淡漠了。

只有一样没有改变——她始终同申公秋保持着原来的距离。她属于那种有自信力的人，相信自己是光明磊落的，哪怕一世被人误解，也要洁身自好，绝不与敌人同流合污。

她不知道她用了申公秋的钱。杜玉凤把航空表、钻石戒指换成了厚厚的一沓钞票，细水长流地给苏岩的孩子用光了。

苏岩感激杜玉凤，她记着一笔账，有朝一日，她要加倍偿还给恩人。

申公秋是坦然的。然而杜玉凤却背地伤心地流过泪。她为占了个虚名而自愧，可是她不敢把真情告诉苏岩，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

杜玉凤相信，总有一天，苏岩的心会被感化的，像申公秋那铁石心肠也变软一样。杜玉凤绝不相信，区分一个人好与坏的分界，仅仅在于已成为历史的政治表现或宗教信仰。

风声一天比一天紧，草木皆兵的“清队运动”的扫帚扫到了乡间。

记得那是1969年残雪刚化的季节吧？大地里的麦苗刚刚返青，凤凰庄外的迎春花抽出淡黄的花朵。

忽然来了个倒春寒，麦苗差不多要冻死了。

省里来了工作组，双重任务，既要监督凤凰庄学大寨，又要打掉五类分子的气焰。凤凰庄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坏典型，居然和各种坏人“和平共处”！

首当其冲的是苏岩、申公秋这些人，枷板上再加一道锁链！

杜玉凤开始成了上边注意的人物。

当然，调查了解杜玉凤，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申公秋是在铁幕的缝隙里闻出一点味道的。

有一天，一个大人物亲自找他谈话，看他的举止作派像个军人，但穿着便装。申公秋估计，这人至少是省一级的要员，他自

报姓隋，并且很随和地向申公秋说：“你叫我老隋好了。”

申公秋无动于衷，也没有一点好奇，无可无不可地坐在那里。

老隋很客气，递给申公秋一支大中华牌香烟，还给他泡了一杯茶。

申公秋把茶接过来，烟退回去了。

老隋不是那种单刀直入的性子，有点婆婆妈妈，他好像根本没有谈话的主题，只是随便聊家常。如果有第三者在场，一定以为他们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老隋先问了问他的牙口好不好，要不要去堵堵虫牙；后来又问到抚顺的一段生活，他说那里的周副所长是他的老同学；他也谈到过文史资料馆，他说他应约写过几篇淮海战场的回忆录。

申公秋听得出来，这个老隋是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听口气，他当时的身分不高也不低，大约是个师长的样子。

谈到淮海战役，老隋的兴趣颇浓，他眉飞色舞地说：“黄伯韬这小子，倒霉倒在饭桶刘峙身上了，是不是？听说刘峙在盐城东海一带做盐买卖，他怕舍了老本，在没有下令叫黄伯韬向徐州撤兵前5天，就下令盐商们开拔了，要黄伯韬这个傻瓜掩护盐商。有这事吧？”

申公秋笑笑，不置可否。这些老账，在他记忆的底层早都霉烂了。

老隋哈哈一笑说：“还有44军，黄伯韬为了等这一个军，足足耽误了5天。为什么刘峙非让第7兵团等一个军，还不因为44军军长是刘峙的儿女亲家？唉，腐败哟，裙带关系，拉拉扯扯，这样的队伍怎么能打仗？”

申公秋不得不承认，老隋掌握的小资料，还真没有虚构。

“当然喽，”老隋还在侃侃而谈，“我知道这点儿，不过是鸡毛蒜皮罢了。你是当事人，更了如指掌了。有时间，你好好回忆

一下，写一写这些，也是一种别人起不到的作用嘛！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国民党非垮不可，太腐朽了！假如这样的队伍打败了，见鬼了！他们能治理好中国？充其量是个朱元璋，要当皇帝，为自己打江山。”

申公秋有点疲倦了，眼皮直打架，他已经很少用大脑了，他不理解、也不想理解老隋说这些不咸不淡的话用意何在。

有一点，老隋的意图表露出来了，他尽量消除对方的紧张情绪。

渐渐切入正题了。元宵馅儿包得再严，你要吃，总是能吃露馅儿的。

老隋说：“你住在杜玉凤家，是吗？这是个好同志啊！她懂得党的政策，眼光长远，别看她没有多高的文化。听说她过去掩护过你，是不是呀？”

他的态度极为和蔼，他越和蔼，申公秋越感到不舒服。他的睡意全消了，他怕因为自己给杜玉凤带来什么不利，赶紧声明说：“不是掩护，她……在不知道我身份时，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给我治过伤。后来，她协同苏岩同志，把我捉拿归案了……我，我还因为这个打过她一枪。”

申公秋也算得上狡猾，可水平不怎么高，因此没有逃过老隋的眼睛。你看，他眯着肿眼泡笑了，那是揭穿对方伎俩的笑。

老隋吸着香烟，说：“你不要紧张嘛。唉，多有几个杜玉凤这样的同志，工作就好做多了。对敌我矛盾，七斗八斗也还是要斗成人民内部矛盾嘛。能推能拉的，当然要拉。拉，就要感化嘛。”

这以后，老隋又问了问杜玉凤给他们吃什么，对他们的生活有没有照顾等等。

申公秋一一做了回答，但不是发自内心的。

事后，申公秋没敢把这件事告诉杜玉凤，更没法告诉苏岩，

他的心整天担惊受怕。

又过了3天，老隋把所有在凤凰庄改造的各色各样的人物集中起来，先是官样文章地讲了讲清队以来各地阶级斗争的形势，勉励大家加强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接着问大家生活上有没有困难，他说：“改造你们，不是在肉体上消灭你们，不是给你们吃糠咽菜，不是虐待你们，是思想的革命。”他还当场责成负责管教他们的一个干部，到县商业局去为他们办一点副食、香烟，甚至连定期叫理发员下来给他们理发的小事都没有遗忘。

好多人十分感动，苏岩就是感动得最厉害的一个，她哭了。她大概从老隋身上看到了老传统吧？

后来，老隋居然让大家民主一下，帮助上级挑选一个利于他们改造的辅导员（自从担当辅导员的刘四新死去以后，一直没有人兼任）。

苏岩不假思索地提议：“杜玉凤！”

除了申公秋外，所有的黑帮都异口同声地喊出了杜玉凤的名字。

申公秋的心在隐隐作痛。他何尝不明白，那喊声里浸透着爱呀。可是，在特定的环境里，爱一个人，是可以把人置于死地的！

老隋真够民主的了，居然当场拍板，同意由杜玉凤当黑帮们的政治辅导员。

会散了，三星已经平西。

只有申公秋、苏岩两个人是同路。

苏岩走在头里，和申公秋保持三五步的距离。申公秋几次想缩短这个距离，不知是因为他老迈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呢，还是因为苏岩发誓不与他并行，反正他总是赶不上她。

今天，申公秋太想说话了，不说，有如骨鲠在喉。

他终于鼓起勇气，说：“请你等等，我有一句话……”

苏岩看看左右没人，才不情愿地站住，声音里透着不耐烦：“什么事？”

申公秋觉得怪不舒服的。她分明是用一种永不倒牌子的优越感来同他说话的，他仿佛是一出生就正了名的“贱民”。可是，为了杜玉凤，他宁愿低三下四，去乞求她。

申公秋凑到她身旁，低低地说：“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你……为什么要提杜玉凤呢？我总有点不祥的预感……”

苏岩用鼻子哼了一声，说：“还有别的吗？”

申公秋摇摇头，又补了一句：“我总觉得那个领导……醉翁之意不在酒……好像……”

“住口吧。”苏岩打断了他的话，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就是立场问题。立场不同，对待事物的观点、态度，永远是南辕北辙！”

说罢，她不屑一顾地只顾在前头走了，把申公秋丢在清冷黑暗之中，他除了深深地叹息一声，能说什么呢？天上的星星密极了，没有月亮的夜，银河两岸的星群显得格外拥挤。假如星星是人心有多好？那么，它是发光的、不发光的，是亮的、暗的，不就都叫人一目了然了吗？可是，人的心，为什么要隔着肚皮呀！

他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他真害怕，他透过夜暗，好像看到有一只魔爪正向杜玉凤伸过去、伸过去……

他还是没有勇气对杜玉凤吐露。

杜玉凤屋子里的灯亮着，她又在忙着什么活计吧？天天不到深夜，她窗口的棉籽油灯是不会熄掉的。

他看见，苏岩从杜玉凤的房间走了出来。她一定去向杜玉凤报喜了，苏岩为有杜玉凤这样一个监护人，一定感到从心里往外乐。

申公秋感到苏岩白白搞了这么多年政治。“凡是被敌人拥护

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不是政治常识吗？一群形形色色的敌人一齐站出来拥护杜玉凤，那杜玉凤也就岌岌可危了。

申公秋站在院子里好一会儿，徘徊着，走近了杜玉凤的窗子。他真想伸出手去敲窗棂，像从前交出航空表和钻石戒指那次一样。

外面黑，屋里亮，他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屋子里的一切。

杜玉凤在补衣服。啊，那不是自己的衣服吗？一针一线地缝补啊，她为什么要惹这些麻烦呢？

申公秋忽然想起了母亲。记得，那是他到外地求学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妈妈几乎一宿没有合眼，她戴着花镜，一针一线地缝连、补缀，那情景多像杜玉凤啊！

申公秋感到有一条凉冰冰的东西流到了腮边，他伸手抹去，那是眼泪。

啊，母性的感召，居然对一个快 60 岁的人还有这么大的力量！

申公秋终于叩响了窗户。

杜玉凤把他让到了房中，替他搬了一把矮脚竹椅，从堂屋端来一个炭火盆，放到他脚边。她说：“今年春天真怪，天老爷的脸子说变就变，清明都过了，夜里还凉飕飕的。”

说着，她又拿了几个红薯烤在炭火上，说：“一定饿了吧？干那么重的活，吃稀的顶不住啊。”

“还好。”申公秋想笑，虽然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模样，但肯定笑得像哭一样难看。

杜玉凤继续在灯下缝补着，她说：“有一件事，我对不起你。唉，这个苏岩哪，还和小丫头那时候一样任性，十个老牛都拉不动。我到如今……还没有告诉她表和戒指的事。人，不能吃昧心食、花昧心钱哪！”

申公秋在火盆上搓着手，说：“还提这个干什么？我……是

从你这，得来一颗人心的。真的，我从前哪有一点人味？我女儿至死不认我，她是有志气的……”

一见勾起了申公秋的心事，杜玉凤又笑了：“别往窄处想啊。其实，你从前的罪过不是认了吗？该坐牢也坐了，学好就成了。要我看，你现在就是个好人了。”

她停顿了一下，又说：“从前，我们村上有个老私塾先生，还是我丈夫的一个堂叔呢，他为人就不错。他常说‘君子不党’，他说，人不管入了哪一宗哪一派，都不好。我不信他的。抗战那咱，我们村的有德行的人都是入党的。我觉得党章啊、党纲啊，都没教人学坏。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和苏岩中间，像隔着一座山呢？那个老先生说过，‘忍为高，和为贵’，大伙说他这是阶级调和论。就算调和不对，那没事找事，芝麻大的仇疙瘩越结越大，就算觉悟高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我看，人心是能感化的，可不能伤人家心。”

申公秋像听天书一样听着、咀嚼着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话。

天书，是人间所不懂的，可是她嘴里流出来的可要比天书要浅显易懂得多。

申公秋是亲耳聆听过大独裁者面谕的人，那些除了使人丧失人性以外没有一点用处的道德文章，比起杜玉凤的话来，太逊色了。

他手里捧着烤得焦黄的地瓜，心里都发烫，他终于带有几分暗示地说：“人心太善良了，也要招来祸患的。我说，你以后还是……少跟我们来往吧。尤其……尤其不要操心我们这些人吃的、穿的，我们不能把好心的送殡人也一起埋到坟里啊！”

杜玉凤咬断线脚，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你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我是根红、苗正的，你不知道吗？你不用操这个心，要真到了连我这个不值得一整的人，都得过过筛子的分上，那，中国可就没指望了。我听苏岩说，不是叫我当你们的政治辅导员吗？

我可不懂那么多，心里没几滴墨水。可话又说回来，什么都能灭，人心是灭不绝的。”

你能说杜玉凤说得没有道理吗？

一个普通农家妇女的话，竟然叫一个将军无法驳倒。这是福呢，还是祸？

对大玩笑再开一个小玩笑

打死老虎是没有罪的，还能一定程度地显示勇敢。

申公秋不能下地去劳动了，他已经被连续拷问过3次，单刀直入地追问他在凤凰庄发展了几个“地下国民党党员”。

他若真是那样忠于国民党的党徒，怕是在黄伯韬自戕的当时，也会用手枪自己结束生命，去为蒋介石“成仁”了。

申公秋想着感到好笑。然而这玩笑开得很正经，而且他从审讯者的口气里，听得出，要挖他背后“隐藏得很深的”指挥者。先时他听不明白，一个将军头衔还顶不住天吗？国民党里又没有元帅的军衔！

后来他摸到了一点蛛丝马迹，他们是在向杜玉凤迂回进攻。

哈哈，一个农村妇女，竟要驾驭一个倒运将军充当“反攻大陆”的前哨？既然说他是假投降、负有使命用苦肉计长期潜伏的大特务，那么掩护过他的杜玉凤，不就成了编织圈套的上级了吗？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小说构思。

他一笔交代材料都写不出来。唉，他们想入非非的事情，真具有小说家的天赋，传奇色彩！

看来不帮助他们编圆这个70年代的传奇，那是过不了关的。申公秋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口供，他们已经点拨过他了：“你与苏岩的假决斗，大概就是一个很巧妙的烟幕弹吧？”

啊，为什么要把苏岩也牵到“地下国民党”的案子里来？是

了，既然苏岩可能是国民党，苏岩的丈夫以及她丈夫的上级……如此类推下去，不就很可观了吗？

他被隔离了，送到小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去。没有人在外面看守，他跑不掉。他的一双腿被打折了骨头，只能躺到课桌搭起的床上。他也没有能力自杀，裤带被抽去，屋里连一根木棍都收走了。

申公秋头脑是清醒的，他相信，他们不加看守，肯定是有意的“疏忽”，说不定把他当个钓饵，来钓大鱼上钩。

申公秋宁可饿死，也不希望杜玉凤再来给他送饭。

现在，他过的是标准的囚徒生活了：一日两餐，每餐一个玉米面窝头，一碗地瓜叶子汤。

他瘦得皮包骨头，躺在硬邦邦的杨木课桌上。胯骨以下都生了褥疮。

在又一次皮鞭蘸凉水的拷问过后，申公秋昏死过去，被褥都是湿的，那是泼凉水叫他苏醒留下来的痕迹。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好像变成了一个娃娃，大概才落草不久吧？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他张着手、踢着腿哇哇啼哭，他觉得饿，本能地要吃人间第一口奶，就向身旁的母亲怀里拱着，去寻找乳头。

他被母亲双手举起来，狠狠摔到窗外去。外面下着雨，天冷极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一切都包容在黑暗里。他像所有的人一样——不，动物在这一点上也是相通的——需要母爱。然而母亲把他摔出来了。

那是一个什么东西来了？亮着两盏蓝盈盈的灯笼，一闪一闪……不，那不是灯笼，那是一对兽眼。啊，一头夹着尾巴、伸着舌头的狼！它有着很大的乳房，是一头母狼。

他哭，他拼命叫，试图要站起来躲避，然而他的双腿好像被钉在地上一样，一动都不能动，他绝望了，只有做母狼的一顿美

餐了。

但是狼没有吃他。它围着他转了三圈，伸出舌头舔了舔他的脸、他的手，蹲在他面前好一会儿，突然一弓身，叼住他的头发，一甩，把他甩到狼背上，便摇摇晃晃地消失在黑暗中了。

啊，这是什么地方？不是房屋，没有光滑的墙壁，没有床铺被褥。凸凹不平的石头洞，一堆干草铺在洞中，有一股腥臊气息。他被丢在干草上，身上还盖着草呢。他不冷了，却仍然感到肚子饿。

好大一个乳头！

他忘了一切，本能地伸出双手抓住乳头，吮吸起来……咦，这乳房怎么是毛茸茸的呢？啊，这是夹在四个细腿中间的！啊，他在吃狼奶！

他好像一下子吸足了一切狼性的精髓。他神奇地长大了，浑身上下都是毛，他像母狼一样用四肢走路，他学着狼的样子嘴拱在地上长嚎！

母狼回来了，背了一个血淋淋的人，被咬断了喉管。

母狼上去撕吃人肉。它把一块人肉甩到他面前。

突然，他大叫一声跳到洞外，直起身来喊起人话来：“我不吃人，我不吃人啊！我要做人，我要做人……”

“醒醒，你怎么了？”有人在摇晃他的头，申公秋睁开眼睛，才知道这是一场噩梦。他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喉头一阵阵发紧。

他看见了杜玉凤，她正弯着腰，用汤匙舀了一点蛋羹，冰凉，送到他唇边：“喝一点吧……”

申公秋泪如泉涌。他望着离他只不过半尺远的那张慈爱的女性的脸，不禁回想起方才梦境中的情景，还禁不住心跳。人和狼，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真想大哭一场。

见他不肯吃，杜玉凤劝道：“你这样怎么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会总这个样子儿的。”

申公秋伸出手挡住杜玉凤凑过来的汤匙，说：“你……怎么又来了？你不该来的。”

杜玉凤温和地说：“没有人能把我怎么样。就是犯着该吃枪子的罪，也不犯饿罪。”

唉，她总是用自己的人生哲学来衡量一切！申公秋不得不告诉她实情，使她从此有所收敛。

申公秋吃力地从枕头上欠起头来，说：“好辛嫂，你吃亏吃在心肠太软上啦！我……本来不该告诉你的，他们，是对着你去的呀！怀疑你是地下国民党的后台，这都是因为你……把我们这些黑帮当人看……你快走吧，从此不要再来看我，我给你磕头！”

说着，就要趴在枕头上磕头。

杜玉凤拦住他，坐在床头的板凳上发起呆了，端着的蛋糕碗倾洒了她都没有发觉。

她在想什么？申公秋无从得知，他不知道，一个只会把善良施舍给别人的人，对待邪恶的报复会作何设想。

不管怎么说，他的话起作用了，她动心了！这就好，只要她学会保护自己，哪怕她选择非善良的手段，申公秋都不会责怪她！

她留下饭走了，把门带得严严的。

申公秋松了一口气，他料定，从今往后她不会再来招惹是非了。一想到将要见不到这惟一可亲的面孔，申公秋哭了，泪水滴到枕头上。直到此时，他才觉察到，他是多么需要她！需要她什么呢？那颗能够熨平所有心灵创伤的心！然而，这惟一的人走了，再也不会来了。

他一口东西都吃不下，胡思乱想了很久，又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天亮时分，他醒来了，不是冻醒的，是热醒的。他感到浑身上下暖烘烘的，腿也不像从前那样痛了。

他睁开眼，发现淋湿的被子不见了，他身上盖的是一条拆洗得很干净的麻花被，中间是带三道黑杠的。

啊？这不是杜玉凤自己那床被吗？申公秋认得，她在院子里浆洗过的。

他抬起头来，发觉床旁边生着一个炭火盆，也是杜玉凤家的，他吃过炭火盆里烤出来的地瓜！

门口传来一阵丝丝的声音，和谐而有节奏，像六月里的蝉鸣，又像飞翔在花间的蜜蜂振翅声，不，那是杜玉凤坐在门槛儿上纳鞋底抽麻线的声音。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好像就停在门外。

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啊，你在这里？”

“怎么，”杜玉凤在说话，“不行吗？”

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你躲开，我们要提审申公秋！”

“不行。”意想不到，杜玉凤竟敢挡起驾来：“他的腿都断了。出西门的犯人，有病还得给治呢。他得住医院。”

申公秋想挣扎着起来，他不明白，杜玉凤这是怎么了？世上只有墙倒众人推，哪有她这样傻的人，偏往墙底下钻呢？可是，申公秋费了好大力气也没有爬起来。

这一回，专案组的人可不那么客气了：“告诉你，杜玉凤，你这是对群众专政的挑衅！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你以为专案组不知道吗？”

杜玉凤笑了起来。笑过，她说：“你们怎么不知道？我和他啥关系？那不是明摆着的吗？我是地下国民党，白天是共产党，晚上是国民党！你们看我交代得彻底不彻底？”

大概那几个搞专案的人没有思想准备，也许按他们的部署，还没有到“动”她那一步，因此有点不知所措。哑了半天，才有一个人说：“你别忙，有收拾你的时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闪开，我们要进去！”

杜玉凤说：“进去？除非我不在了。”

谁知道怎么回事，那些人居然没有进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申公秋想，完了，她闯下了大祸，等于自己送上门去。

从那以后，一连三天，都没有来提审他，杜玉凤和她的阿锁始终轮换着班守在申公秋身旁。

他不明白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第4天，杜玉凤没有来，阿锁也没有来，申公秋的伙食又变成了一日两餐，每餐一个黑窝头。

他预感到厄运降临到杜玉凤头上了。

一直过了7天，倒是杜玉凤的丈夫单根宏来了。他好像比从前苍老了很多，工作服上沾满了水泥的粉末，看来是刚从县里赶回来的。

单根宏的眼泡红肿着，一言不发地坐到申公秋旁边，从怀里掏出两个烤地瓜，放到申公秋的褥子上。

申公秋挣扎着坐起来，他觉得自己是罪人，做了对不起单根宏的事。

他声音打着颤，说：“我……对不起你的妻子……她，现在怎么样了？”

单根宏拿起一个地瓜，慢慢地剥去皮，塞到他手里，说：“吃吧，这是她让我给你烤的，还热乎呢。她说你最爱吃烤地瓜。”

申公秋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抓住单根宏的手，追问：“她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呀！”

单根宏叹口气，说：“她……给弄到县群专去了。”

申公秋的眼前如同打了个霹雷。杜玉凤的遭遇远比他想像的还要糟。

单根宏是个寡言少语的人，杜玉凤说他除了干活吃饭，什么

都不知道，觉悟之低，也是少有的。他 50 多岁的人了，旧社会就是水泥窑的打石工，那是给窑场老板出苦力。单根宏干活从不偷懒，一年 365 天，没缺过勤。前几年，他的事迹上了地区小报，连省报记者都下来采访他。单根宏不爱说话，他讨厌那些记者，光问事，倒还好应付，最难办的是抠根源，挖思想动机，非要问“动力”是什么。有一回，单根宏被抠急了，就说：“干活就得像个干活的样子呗，咋想的？咋也没咋想。我从前给窑主干活那年月，也是这么个干法！”

坏了，从此他这个典型告吹。他也不在乎，省得去抛头露面。

这个语迟的人，今天本来是有话要同申公秋说的。来时的路上，他左思右想，想了一大套。可是一见到申公秋那形容枯槁的样子，他又不忍心说出口了，再说，若叫老婆知道了，非骂他个狗血喷头不可。

老实人心里有事，是瞒不住人眼睛的。申公秋见他两手搓来搓去，就断定他有不好启齿的话要说。

申公秋对他说：“你有事吧？有话你就说。只是怕我没有能力帮助你们啊。”

单根宏还是搓着手不肯说，脸都憋红了。

申公秋实在没有办法撬开他的嘴。

两个人像互相相面似的一直坐了很久，单根宏才吞吞吐吐地说：“他们说，我女人是、是受了你们的牵连，只要你……都能揽过去……就没事了。”

申公秋听明白了。他简直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可以。只要能救她出来。”

这话一出口，申公秋立即又失掉了自信力。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自己不过是一个明牌的死老虎，本来就没有什么价值，自己能揽过来什么呢？即使把自己说得十恶不赦，说成是想要独霸全

球的野心家，对杜玉凤又有什么益处呢？

单根宏到底是实心人，一听他答应了，就千恩万谢地走了。

申公秋可作难了，单根宏给他出了一道世界上最难的难题。为了报答杜玉凤那一片心，他粉身碎骨都不会皱一下眉头的，可是能找到这把金钥匙吗？

他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苦思冥想。

他不是作家，居然调动了文学、艺术手段，在脑海里走马灯一般编着各种离奇古怪的故事，没有一个令他满意。

后来，不知是哪个艺术细胞起了作用，他到底想出了一个开脱杜玉凤的办法！

这开脱的代价将是他自己的毁灭！

他在所不惜。

他把一个用来抄写语录的小笔记本找出来，扯掉前边写了字的几页，开始伪造一本日记。

这是个很吃力的活，要尽量叫人看不出是同一次写出来的，还要努力回忆一年来的主要活动，人家会对质清楚的。

在这本伪造的日记中，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长期潜伏的军统特务，他说他有一部收发报机，藏在村外，他发现杜玉凤总在监视他，常常偷着翻他的住室，他怕她，又恨她。他说，杜玉凤为了能探明他的机密，故意装得对他特别人道、特别关心的样子。最后的几页日记中，他甚至说自己想要杀死她，他的办法是借刀杀人，让群专的人怀疑她，把她抓走，自己好把电台和真正身份掩盖起来。

其实，申公秋这一手并不高明，试想，哪有这样的蠢特务？干谍报工作还要记日记？

这本来是唬不了人的。

可是，高烧能使正常的人发昏，既然能相信全国有成千上万国民党地下党部，他们对一加一等于三就也能相信。

第二天，申公秋故意鬼鬼祟祟地爬起来，从教室的墙上往下抠砖头，“企图”把日记本藏进去。为了证明这东西有藏的价值，他在日记本的后面，写了几页电报的“密码”，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全用汉字胡乱组合。

他被当场捉获，日记本被拿去研究、侦破。

申公秋没想到，他收到了预想不到的奇效！他被正式投进了盐城监狱。

第一次预审，他装得极不老实的样子，拒不交出电台。

第二次，他答应带他们去起电台，他被押上卡车，直奔凤凰庄。

他故意说电台埋在村口大槐树下，为的是能在村里逗留一会，看看杜玉凤是不是被释放了。

听说要挖电台，凤凰庄一下子轰动了，男女老幼都跑来看热闹。

掘地三尺，一无所获，他被打得七窍流血。不过，他特别高兴，因为他看见了杜玉凤，她牵着阿锁的手，远远地站在当街上向这里张望着。

啊，打死了也可以瞑目了，他申公秋有生以来第一次得以偿还心灵上的债务。

一撇一捺的人

申公秋同捉弄他的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的本意是要拯救善良，没有把自身的非善良的手段考虑进去。为了这，他得到了惩罚，坐了牢。

申公秋认为，他不是因为“军统特务”而坐牢，他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心而自愿服刑受苦。耶稣是不是这样呢？

他在铁窗里过了4年。他的问题被弄清了：全属子虚。他没

有招认是有意恶作剧，却推诿说“屈打成招”，有身上的累累伤痕为证。

于是他重新获得了有限的自由——再回到凤凰庄去接续那无限的改造。

这次他下定了决心，宁死不住杜玉凤家。他有理由，“陷害过”她。

他被安排到大队养猪场，装猪草的屋子隔壁有一间小耳房，一口大锅有一人深，是煮猪食的。旁边有一张铺，是耳又聋眼又花的饲养员裘阿根老头住的地方。由于新加一个人，裘阿根不得不在板铺旁多加了一块板，两个人合睡。

于是，申公秋在猪食味熏天的环境里开始了新生活。

他庆幸得很，裘阿根耳聋眼花对他极为有利。那老头每天很有规律，喂三遍猪，上下午各铡一遍猪草，三顿饭后喝饱一壶茶，抽足一袋烟，其余的时间便是倒头大睡，而且必定是鼾声如雷，难为他有那么多觉。

他们基本是和平共处的。裘阿根对他不好也不坏，不远也不近。偶尔碰上他高兴，还把自己炒的辣油酱拨到申公秋饭碗里一点；也有那么几次从嘴里拔下旱烟袋，用粗糙的手掌抹蹭几下，递给申公秋，请他抽几口。

他们没有交流过感情，跟他说话需要扯着嗓子喊，而申公秋多年来早已没有大声说话的习惯了。

据说裘老头挺可怜。他一共有5个儿子、3个闺女，又都在附近几个庄子上。但没有一个肯养他的，裘老头自己抱怨说：“鸡多不下蛋，龙多不降雨，儿女多了是造孽！”

他已经73岁，若在城里，怕是已经退休十几年了。在农村，却不行，用他自己的话说：“脸朝黄土背朝天，有一口气就得干，不干就得饿肚皮。”

裘老头只对杜玉凤一个人知近。他那二分半自留地里，不论

是哪种蔬菜下来，他总是把第一筐菜给杜玉凤送去，叫她尝第一口鲜。也难怪，如果没有杜玉凤的周济，裘老头连衣服都穿不囫圇，说不定得披树叶、裹兽皮。

有一次，裘老头喝醉了酒，不管申公秋爱听不爱听，一只脚蹬在猪食锅的灶台上，像跟人吵架一般骂起街来：“×他祖宗！好人没好报，黑心肝的倒自在。那回我买了2斤蛋糕去探大狱。奶奶的，狗日的们把蛋糕一块一块都掰开，要检查里边有没有夹带字条，怕我串供！我一赌气，把蛋糕都揉碎了，摔了狗日们一脸！”

下半截他没有说，那是“走麦城”了。他为这事被群专拘留了10天，后来是大队出人把他保释回来“就地监督”。没有他，队里的猪饿得吱吱乱叫。

申公秋很奇怪，自从他出狱后，感到凤凰庄有点异样，工作组走了，新选出的队长整天泡在田里，很少来过问“牛鬼蛇神”们的事，天地好像翻了个个。

杜玉凤像从前一样，常来看他，给他洗洗涮涮、缝缝补补。

听杜玉凤说，苏岩终于走马上任了，不过没有复原职，只在地区工交政治部里当个一般干事。这也够叫申公秋惊奇的了。他还听说，苏岩的丈夫快从甘肃回来了，问题马上有结论，他的儿子居然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水利系去念书。

申公秋替苏岩高兴，却不免为自己悲伤。他现在不得不承认，苏岩始终不同他取消界限，是对的。这不是吗？她的话应验了，他们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申公秋很想了解点政治风云的内情，可他看不见报纸。文件永远传达不到他这一“级”。养猪场倒是有个有线广播喇叭，可是一天三遍播音，除了喊一气“学大寨、赶昔阳，誓叫邳县过长江”的口号而外，便是样板戏，什么都听不到。

还是杜玉凤悄悄告诉了她：“有能人出山了，说他是好军师呢。”

原来如此！

申公秋消消停停地干了几个月活，真有点像个自食其力的农民了。

转年到了春天，清明节过后的第3天，凤凰庄的空气又紧张起来了。

他和所有五类分子一起，又被集中到小学校教室里去，说他们是邓小平右倾翻案的“社会基础”，要他们老老实实。

看来，邓小平又下台了！

申公秋有点悲凉，他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是谁的基础？反正走马灯一样换过不少“主子”了！先是刘少奇的基础，随后是林彪的基础，现在又是邓小平的基础了……唉，将来说不定还会变成什么人的基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谁被打倒，他就是谁的基础。命中注定，他来到世间，就是给随便哪个坏人充当基础的。

他终于知道了天安门事件，他看见了邳县大街上声势浩大的声讨“邓纳吉”的游行。

那天，他跟着队里的拖拉机到县城去拉尿素，一直被游行队伍堵在十字路口道南，差不多有一个半小时。

那天去运化肥，本来杜玉凤也去了的。在生产资料公司开过票子后，她要去看苏岩，让拖拉机在城关外的化肥仓库门前等她，她关照“去去就来”。

可是拖拉机一直等到日影平西，还不见杜玉凤的影子。拖拉机手干着急，却又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她，只好抛下她往回赶路了。

邳县县城离凤凰庄80里路，一扭三晃的拖拉机足足跑了3个钟点，到家卸完化肥，已经快有小半夜了。

尿素怕雨淋，队里仅有的两间库房又满着，大队长临时决定，卸进小学校教室，队长总是认定念书事小，吃饭事大的。

申公秋实在累极了，他扛完最后一袋尿素，就一头倒在尿素

袋子中间睡着了，竟然没有人发觉。

后半夜，他被一阵窃窃私语声惊醒过来。侧耳细听，隔着化肥袋子垛，他听出有几个人躲在教室黑暗角落里在说什么。

是来偷化肥的吗？那为什么不动手呢？

突然，他听出来了，都是他所熟悉的声音，一个是杜玉凤，一个是苏岩，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声音。

申公秋大为惊诧，苏岩深更半夜，跑回凤凰庄干什么？有事为什么不到杜玉凤家去谈，却躲到这里来？这么说，杜玉凤误车，是与苏岩有关系了？

只听苏岩说：“在你家不行！他们是拿着照片追下来的，孙垣的照片就在他们手里。今天垣儿早车刚到，公安局的人中午就到家里去查问，若不是垣儿当时在街上买菜，正好叫人家堵上。”

孙垣，不就是苏岩的儿子，刚进了清华大学的那个吗？

申公秋听出眉目来了，苏岩的儿子是公安机关通缉追捕的对象。拿着照片来捉拿凶手，可见凶手的要紧。

下面是杜玉凤的声音：“你放心回城吧。孩子交给我了，有我杜玉凤在，就有孩子在。”

苏岩叹口气，说：“你别犯难。自己的孩子什么样，做母亲的心里要有数，这孩子绝没干坏事。他的罪名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事件……唉，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明白，也许日后总能见天日。”

孙垣插了一句：“我本来不想来添麻烦的。大家非叫我躲起来不可。我身上带着天安门广场现场照相底片，这是历史的记录，无论如何不能落到他们手的。”

看来，杜玉凤对这母子俩的解释感到多余，她接过话碴儿说：“别说这些了……天安门的事，乡下人摸不清头尾，可笨寻思，也不大托底，天底下会一下子冒出几十万反革命来？雨后的笋芽子也没这么快呀。唉，6月雪斩窦娥，这种冤枉事，如今看得也多了……”

孙垣又插了一句：“谢谢杜阿姨，您真是好妈妈……不过，我有个担心，妈妈在凤凰庄插过队，公安局容易首先把注意力转到这里。”

这句话大概提醒了苏岩和杜玉凤，几个人哑了半晌，没有说话。

苏岩叹口气说，“从前，叫国民党追急了，还有老区乡亲们家可躲，可现在……哪里能保险呢？”

杜玉凤冷丁说：“有了。养猪场有个青贮饲料的水泥大窖，前两年学习先进养猪法时挖的，这一阵子废了不用，藏在那里万无一失。袁老头腿脚不灵便，他下不去窖。”

申公秋屏住呼吸，把嘴贴在尿素袋子上，惟恐叫他们听到声息。他知道，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倒不是担心自己受牵连，他怕苏岩信不过他。

从第二天起，杜玉凤每天在傍晚时分绕着圈子到青贮饲料窖转一回，申公秋知道她是给孙垣送吃的。每当这种时候，他总是千方百计把袁阿根拖住，使他暂时不到猪栏里去。

在苏岩回邳县的第二天，凤凰庄来了一辆挂有公安军管字样小红旗的吉普车，跳下几个警察，兵分两路，有两个人奔大队办公室去了，另外两个人直接去了杜玉凤家。

这时，申公秋刚好收工回村吃午饭，他看了个一清二楚，知道是为捉拿孙垣来的。

申公秋这几天借着给大队办公室抹墙的机会，抽空在办公室看了几张报纸，他已经知道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大致情形。在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个广场上，半个世纪以后重又喊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叫他震惊。一伙青年人斗争锋芒所向，那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这使申公秋联想起“反饥饿、反内战”年月里，在南京总统府前示威的学生。这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但是，有一点他是领悟到了，道义和人心的火山爆发了，压迫愈深，其发愈速。他是站在纯第三者立场上看问题的人，他完全不是从自我得失来衡量一切的。

在他看来，无论刮东风、刮西风，也无论张三上台、李四执政，民心都是不可欺的。

申公秋放心不下，回到饲养场，对裘阿根大声说：“辛嫂不是要抓一只仔猪吗？她方才还来过呢，你去问问看。”

裘阿根答应一声，去了。

其实，申公秋是故意打发他去探个究竟。

过了一袋烟工夫，裘阿根神色沮丧地走回来，把烟锅扣得当当响。

申公秋问道：“她要马上抓吗？”

“抓个球！”裘阿根气呼呼地说，“玉凤倒给人家抓去了！唉，这天底下还有没有公道了？”

申公秋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严重。莫非从前那段不了了之的公案又被重新纠起来了？他问道：“你没听说因为什么吗？”

裘阿根说：“听说在她铺底下翻出什么违法的东西了，见他娘的鬼，再过两年，说不定连放屁都要犯法了呢。”

申公秋默然，能是什么违禁品呢？

哦，大概是孙垣从北京带出来的照相底片吧？那天晚上，苏岩不是提到过吗？申公秋不禁埋怨起杜玉凤的粗心来，干吗不藏到野外去呢？

杜玉凤被抓走，孙垣怎么办？

看来只好由申公秋充当送饭的角色了。

正在他胡思乱想的当儿，阿锁哭哭啼啼地来找申公秋了，他把一张叠好的小字条交给他，说：“我妈让我给你的。”

申公秋给孩子擦干泪水，把他抱到膝上，打开那张写在小学生方格纸上的短信，她文化低，别字不少：

老申：

请你安（按）时给孙元（垣）送饭，我只能托你。

他长（藏）在青主（贮）食（饲）料叫（窖）里。

申公秋鼻子一阵阵发酸，她这个好心眼儿的人啊，在自己遇到危难时，还忘不了周济别人。

申公秋很感动，杜玉凤肯托他办这件机密事，那是信得过他，那是相信他申公秋还有一点人味。唉，人哪，人！他从小就听先生讲，“人”字不过是一撇一捺，写起来最简单，可天下没有一个有学问的人把“人”字解透，做人就尤其难了。

从那以后，申公秋接替杜玉凤按时给青贮饲料窖里的孙垣送饭。他没有露过面，总是在深夜里用小桶把吃的东西吊下去，孙垣也许还以为这是杜玉凤阿姨在接济他呢。

孙垣一直在地窖里困了5个半月，他妈妈来接他的时候，小伙子脸色苍白，头发有半尺多长，像个多年不见天日的重囚犯，苏岩都快认不出他来了。

那已经是1976年的秋天了，苏岩是同她丈夫乘坐上海牌轿车，专程从南京赶来的。

这件事轰动了小小的凤凰庄，他们天天在这方圆不到半里的小村庄里过日子，却没有人能想得到，他们庄上居然藏了一个天安门事件的小英雄！

阳光是那么和煦，金凤是那么温和，只有春天才有的气息，却在秋天来到了凤凰庄。

谁都没有想到，苏岩夫妇要立刻见到申公秋！

人们都纳闷，苏岩和申公秋是多年的冤家对头啊，这是为什么呢？

然而到处都找不到他，饲养场里没有，积肥场里没有，凡是

他这种身份所能出没的地方都没有。

申公秋躲出去了，在他看到苏岩陪着丈夫从上海牌轿车里走出来，奔向青贮饲料窖的时候，他就悄悄地顺着一片竹林夹道出村了。

他没有权利分享快乐，他不要任何人感谢他。

此时，他枯坐在清水塘前一堆荒冢旁，伸手拔光了泛黄的坟头草。

这是他女儿的坟，她已经死去好几年了。申公秋在内心里叹惋，她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却来不及享受到阳光，偏偏他这风烛残年的人，倒有幸见到了光明。

清清的水塘倒映着蓝天和白云，破败的荷叶和野菱角秧点缀着凄清的郊野。

天边的过雁，它们叫着回家去了，那是甜蜜的、令人神往的叫声。

申公秋倒在草地上，望着流云，望着雁阵，他在想：“我不是也找到了归宿的吗？人类的归宿不应当是如此吗？”

不知过了多久，苏岩带着丈夫、儿子来到了申公秋的身旁。

苏岩带着哭声对儿子说：“垣儿，给申伯伯磕头！”

那清华大学的学生遵从母命，真的跪下给申公秋磕了三个头。

申公秋从草地上爬起身，垂着头要逃开，可是苏岩抱住了他的胳膊：“原谅我吧，我革命半世，现在才知道什么是……”

申公秋漠然地望着面前的这个女人，心里想，她马上又会是地委书记了，不，也许级别要高于地委书记。她是标准的、信仰坚定、宁折不弯的共产党，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呢？这是她嘴里说出来的吗？啊，是的，没有错，你看，苏岩的眼角挂着泪痕，那是真诚的、不带虚伪成分的。泪水，在这种时候，是没有水分的。然而，申公秋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苏岩感情上、

信仰上的背叛吗？

他在迷离恍惚间听见苏岩在说：“和我们一道进城去吧，永远永远地离开凤凰庄，我们养你老……”

申公秋听明白了。可是他苦笑着摇头谢绝了：“不，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此生此世不会离开凤凰庄了……我在这小小的村庄里结识了一个人，我看上她一眼，心里就是安实的，能够睡得着觉……我要等她回来。”

苏岩低声抽泣起来。她明白，申公秋眼里的人，是指杜玉凤。饱经人世间的沧桑之后，苏岩又何尝没有同感呢？可是……她为难地看了看丈夫和儿子。

她的丈夫说话了：“今天，我们请你来，就是要同你一起到邳县去看望杜玉凤，迟了，就见不着面了。”

申公秋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觉着耳鼓嗡嗡作响，他尽管不愿意，总还是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不吉祥的弦外之音。他呆了半晌，不顾一切地走上去，抓住苏岩的袖子，眼睛死死地盯住她说：“不，这不可能！你说谎！她不会有危险的，你是不是说谎？你说！”

苏岩哭得更厉害了，一句话都说不出。还是她的丈夫说出了真情：杜玉凤在坐牢的恶劣环境中，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几天前释放出狱，住进了医院，医生已经说过，她没有多少时日可活了。

申公秋不知道自己怎样被架到上海牌小轿车里的。马达的声音显得特别大，掠过车窗的风沙、枯叶像一道道流星……

在邳县医院的窄小走廊里，长凳上坐着杜玉凤的丈夫单根宏，他的脸又黑又瘦，看样子好多天没有充足的睡眠了，眼睛四周印着明显的黑圈。他见申公秋、苏岩一干人从大门外走进来，本能地站起身来想笑笑，没有笑成，却哭了起来。

杜玉凤正在垂危当中，经过再三交涉，医生只准两个人进去

探视。这是不消争执的，除了苏岩和申公秋而外，没有再合适的人选了。

这是一间充满了怪味的大病房，一共有九张病床，杜玉凤躺在最里面的一张床上，有七八个医护人员围在床前忙碌，这是抢救病人才有的场面。

苏岩和申公秋一步步来到了杜玉凤的床前，她正在吸氧气，胶皮方口袋捧在护士手里，她的鼻孔里插着一根用胶布粘着的橡皮管子。

杜玉凤的脸白得像一片纸，头微微后仰，一双本来就很大的眼睛努力睁着，恐怖地盯着天花板。

一个主治医生模样的人，手一直号着杜玉凤左手的脉息，他毫无表情地闪了申公秋、苏岩一眼，向身旁的护士扫了一眼。

小护士拦住了他们：“请你们先出去！”

苏岩还要解释，护士早掉过身不理他们了。

申公秋费了好大气力才嘟囔出一句话来：“叫我们看她一眼吧——一眼就行。”

这时，杜玉凤突然动了一下，眼睛急速地转着，她喃喃地叫着：“来了，他们来了……我听见脚步声了……”

一个护士俯下身子问她：“你说谁来了？”

杜玉凤叫着：“苏岩、申公秋，叫他们到跟前来……”

申公秋忘记了一切，他迅速地挤到床前去叫着：“辛嫂，我来了，苏岩也来了。”

杜玉凤显然是清醒的，她听见了，艰难地在枕上侧过头来，似乎想说句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伸出一只手来，在枕底下摸索着什么。

申公秋俯下身子，两条腿几乎跪倒在地上了，他流热泪说：“我来迟了……辛嫂。”

苏岩早已泣不成声：“玉凤，是我害得你这样……”

杜玉凤轻轻摇了摇头，她说：“不，我谁都不怨。唉，看见……你们俩一起来我……也就放下一条心了。可惜，我回不了凤凰庄了……给裘大叔做的那双鞋，还没有纳好鞋底子……”

申公秋真想放声大哭一场。一个人在生命垂危的关口，想到的仍然是别人的饥寒，这是怎样一种人格啊！

终于，杜玉凤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纸包，索索地抖着青筋裸露的手，把纸包塞到苏岩手中。

苏岩打开纸包，那是一颗金黄锃亮的枪牌槽子的弹头！

啊，一颗凝聚着仇和爱的弹头啊，这是 1948 年从她身上取出的子弹！无论是苏岩和申公秋，都无法断定这颗子弹到底是他们之中谁的枪管里喷射出来、击中杜玉凤的。可是，此时面对这粒子弹，他们都觉得自己是真正戕害善良的罪人。

当然，申公秋明白，杜玉凤拿出这颗她保存了 28 年的子弹头，并不是出于某种记恨的需要，恰恰是作为友爱的标志还给这一对仇敌的。

申公秋是受过各种主义教育的人，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彻底清醒过，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无言的教育，要胜过一生一世所读的书，一点都不夸张。

他还能说什么呢？

主治医生直起腰来，把杜玉凤的左手掖到被子里，向后退了一步。

杜玉凤溘然长逝了。

申公秋跪倒在她床前，和苏岩一起哭得天昏地暗。在场的医护人员，有谁能理解这哭声里的真谛呢？

不应该是尾声

小说、戏剧常有尾声。人生的长河是不会有尾声的，正如人

生没有序幕一样。

那么，申公秋是不是到了人生的尾声呢？不，他觉得一切都刚刚是开始。

吉普车的发动机发出嗡嗡的、和谐的音响，像奏着一曲生命的歌。

啊，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团翠绿，那是伞盖一样的老槐树，凤凰庄就在眼前。啊，凤凰庄，那使他死亡又使他复苏的地方！

假如，这个时候，杜玉凤能站在老槐树下，该有多好啊！

但是，永远不可能了。

她已经悄悄地离开了人间，离开了她爱过的一切。

现在，那颗枪牌槽子的弹头握在申公秋手中，亮闪闪、沉甸甸，那是去年申公秋告别苏岩，准备回到政协去工作时，在上火车前由苏岩把这颗受害人保存了 28 年的弹头移交给了申公秋。

这是一个残酷的纪念品。

苏岩的用意是明显的，为了让这残酷的弹头永远只击毙过去的记忆，不要在未来的生活里复活。

天是那样的湛蓝，大地是那样清新。上穷碧落下黄泉，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除去要对这个“人”字做出回答和已经做出回答以外，留给活人思索的是历史的教训，什么时候混淆了敌我友，什么时候就会造成悲剧。

人啊，一撇一捺的人，真正做起来，何等的不易！

申公秋终于想不出杜玉凤那块墓碑上到底应当题上什么字恰当，做的做过了，说的却说不出来，难道也要留待后人去评说吗？

（原载 1982 年 2 期《新苑》）